

多余的话（代前言）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80% 以上的人口是农民。他们长期在生活条件和生存条件都比城市艰难贫穷得多的广大农村，默默耕耘，辛勤劳作，用自己的心血汗水和聪明才智，一代接一代一年复一年，源源不断以农产品及其加工品，为全国人民提供着 80% 以上的生活物资。他们的生态代表着中国的生态，他们的现状就是中国的现状。人们说，不了解中国农民，就不了解中国，堪称至理名言。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一直非常关心农民，非常重视中国农村和中国农业问题。建国以后，首先就在全中国实现了中国农民世代梦寐以求的“耕者有其田”，将中国农民一代一代开垦耕种的土地，归还了农民。为了发展农业生产，改变农村面貌，改善农民和全国人民的生活，土改后，党和政府就将在解放区普遍推广，反复证明行之有效而受到广大农民普遍欢迎的互助合作形式，推向全国。将张家缺农具，李家无耕牛，势单力薄的个体农民组织起来，以调剂有无，互助互惠，引导他们逐步走上集体化道路，利用组织起来的集体力量和广大农民当了土地主人以后火山般爆发出来的生产热情，战天斗地，重整河山。首先是大兴水利。在短短 20 多年内，中国农民用自己的双手，一锄一锄挖；凭两个肩膀一筐一筐挑，修建了 86400 多座水库，总水面达 3000 多万亩，总蓄水量达 4660 多亿立方米，相当于 8 条半黄河的全年水量，等于全国 700 多条主要河流总水量的 17%；此外，还修建了 27640 多座水闸和数

以千万计的山塘河坝。如此浩大的水利工程，任何个体农民做梦都不敢想象，全世界其他任何国家都不曾有过。这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伟大奇迹。水利的空前发展为农业生产的高度发展，提供了最基本最可靠的保障。1949 年我国 5 亿人口，全国产粮 11318 万吨，到 1980 年我国人口达到 9.8 亿，粮食产量则达到 32056 万吨。人口增长 96%，粮食增长 183%。中国人均寿命由 1949 年的 35 岁，提升至 1980 年的 69 岁。即在人口数量、人均寿命都几乎增长一倍的情况下，大体上满足了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对粮食的基本需要。从而使我国经济总值跃居全球各国第六位，而且成了与苏美三足鼎立的航天大国。对此，谁能说农民没有立下汗马功劳？

1978 年底，我国开始在农村推行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大包干”。当时最响亮的口号是：“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缴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大包干”带头人严宏昌说起“一包就灵”的“大包干”时，“十分自信”地说：“要是凤阳都这么干，我保证只要三五年，吃陈粮，烧陈草，个人富，集体富，国家还要盖粮库。”时任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向万里汇报时，更是喜形于色为“大包干”描绘了一幅迷人美景：“大包干就是好，干部群众都想搞。只要搞上三五年，吃陈粮，烧陈草，个人富，集体富，国家还要盖粮库。”

于是，“一包就灵”的“大包干”，立即以排山倒海之势推向全国。九亿农民在一夜之间由人民公社的集体经营者，变成了一家一户的个体生产者，很多人梦想分田后能发家致富。

然而，“大包干”的结果却并不那么美妙。“大包干”23 年后的 2001 年，曾经全力支持并直接参与小岗村“大包干”的凤阳县所属滁县地委政研室主任，此时已官至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陆子修，谈起“大包干”后的农民，痛心疾首地说：“农民实在太苦，什么人都可以欺侮呀！当年我们搞的那个‘大包干’，轰动了全国，也影响了全国。可现在呢，‘大包干’带

给农民的好处，一点一点都被各级政府拿走了。如今是，‘缴不足国家的，留不够集体的，剩下没有一点是农民的’。”（陈桂棣、春桃著《中国农民调查》第133页）。“一包就灵”的“大包干”23年后，却变得“剩下没有一点是农民的”，岂不悲乎？

那位当年“我保证”只要搞上三五年“个人富，集体富”的“大包干”带头人严宏昌，此时再谈起“大包干”的三句话——“缴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更是苦不堪言：“想不到后来的麻烦就出在这三句话上，上面刮下来的‘三乱风’（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没有一项不打着国家和集体的幌子，后来就没法‘缴足’、‘留够’了”，村里“五保户”、贫困户、优抚对象的救济款、补助款“无法兑现”，村干部的工资“没有着落”，严宏昌这位“大包干”带头人也只能靠老婆孩子养活（《中国农民调查》第441—442页）。

“大包干”26年后的2004年2月，安徽省委从省财政厅遴选副处级官员沈浩到小岗村任村支书，一位村支书由省委直接指派，在新中国历史上大概是绝无仅有。但村里连写欢迎标语的墨水、纸张都是借钱买的，村集体没有一分钱，还欠着4万多元债（陈桂棣、春桃著《小岗村的故事》第264页）。“一包就灵”的“致富典范”，包了26年后却穷得买不起一瓶墨水、一张纸，还欠着4万多元债，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大包干最早的安徽六安地区某村庄，大包干19后的1997年春节，全村三分之一的农民“没米过年”（1997年8月21日《报刊文摘》），这大概也是建国以后的奇闻吧？

在鱼米之乡湖南，截至“大包干”21年后的1999年7月，全省85%的乡镇负债，平均负债157万元，“乡镇财政大多濒临瘫痪”（见1999年7月7日《中国经济时报》）；中原河南截至“大包干”23年后的2001年5月，全省2000多个乡镇，负债金额95亿元，平均每个乡镇负债489万元，有的乡镇被债主告上法院后，汽车、办公用品乃至乡镇领导的手机都被法院

查扣抵债（2001年第11期《半月谈》）。基层财政被弄到如此地步，还能说“集体富”吗？

“大包干”以后，农民的处境如何呢？湖南澧县车溪乡南阳村种田能手罗善平，夫妻两种80亩水田，一年辛苦汗白流，结果倒亏1700多元，要不是14岁就辍学外出打工的女儿从每月500元工资中省吃俭用寄钱回家，2003年的春节都没法过（2003年第8期《半月谈》）。江苏射阳县“种粮大户”杨定海承包300亩地，1992年亏了13万多元；大连“种粮王”潘有才种450亩地，1994年亏了十六七万元，同村一位张姓“粮王”种了500亩地，1994年亏了二三十万元，他老婆深感绝望，服毒自杀（1995年第32期《瞭望》）。湖北监利县棋盘乡4万多农民，种6万多亩地，1999年全乡农业收入不足1000万元，而这一年全乡农民的实际负担是1382万元（2001年9月6日《文摘报》）。全乡农民把全年农业收入都交给国家至少还缺382万元。该乡一位侯大爷步行10多里，找到乡党委书记李昌平，诉说自己 and 老伴都是70多岁的老人，一年还得交700多元“人头税”后，侯大爷当面问李昌平：“请问李书记，中国哪朝哪代要70多岁的老人交人头税？”老人在诉说自己几十年来修“三线”，修长江大堤、修水利“落下一身病”后，一声大吼：“天理难容啊！”（李昌平著《我向总理说实话》第3页）。

2008年全国“两会”期间，国务院发改委主任马凯在会上说了一句“大实话”：“农民兄弟不容易，十年粮价才涨8分钱”，平均每年涨8厘钱（见2008年3月10日《文摘周刊》）。而化肥、农药、种子等农用物资成倍暴涨，这地还怎么种？而且，粮食丰收了，国家有粮了，就拒不收粮，收了粮往往也是只给白条不给钱，白条满天飞；粮食歉收了，国家缺粮了，就采用“强硬措施”向农民征粮：“乡长、书记分片包干，去劝去催去哄去抢，身后跟着司法助理或派出所民警，侍卫者大都腰里掖着或手里提着家伙，一个村一个村地过，拉网一样”

（1989年6月11日《文汇报》）。据对皖、赣、苏、湘等产粮大省调查，大包干10年后的1988年入库的征购粮，70%是县、乡、村干部开车到农民家里拉来的（1989年4月11日《报刊文摘》）。而且，苛捐杂税多达1000多项至2000多项。在河南一些地方，凡养猪户，不论老人小孩，都得交一次“猪头税”，甚至没有养猪或者猪已病死，也得按“人头”交一次“猪头税”。当地屠宰户刘国义气愤地说：“算上农民交的猪头税，一头猪得交三次猪头税，不知一头猪有几个头？”（1996年8月2日《中华工商时报》）。重庆一些地方，一头猪得交15种税费；不少地方不管你家种没种“特产”，都得交“特产税”。在竹乡福建，农民种一根竹子，交完政府的各得税费，得到的是“一双筷子”；在“大包干”发源地安徽一些地方，农民做饭冒出来的炊烟，政府也收“排污费”。对于这种旷世未闻的收费，有农民不满便与收费官员理论，立即又说你“态度不好”，要收“态度费”，收多收少全凭官员对你“态度”的“看法”；在河南农村，有的地方政府则出台了“老天下雨要收自然水费”。按人头收，有的乡一收就是几百万元；在各种明文规定收费项目多达2200多种的湖北利川市，有的政府官员到饭店“晃了一下”，就说“空气密度不合标准，收费300元”。山东某县质监局一位官员坦率告诉记者：“收费、罚款，省局、市局都要扣一部分，剩下大约80%是自己的，所有人的工资、福利都从收费、罚款中出……我们现在每天的工作就是想着如何完成‘创收’任务。”（引自2011年4月9日《东方早报》）农村改革后，某些地方政府部门“每天的工作目标”就是想着如何完成省、市、县三级的“创收任务”，如此向农民层层拔毛抽血，农民能承受得起吗？

农民承受不起也得承受，致使悲剧频发。1992年5月15日，湖南湘乡市新研乡向韶村农妇潘群英，无法承受政府乱收费，

被逼抛夫弃子，跳入离收费官员仅仅 17 米的水塘，官员们眼睁睁看着她沉入水底而无人施救；同年 6 月 9 日，湖南邵阳县白马乡腊树村农民邓贤清，因抵制乱罚款，遭乡官殴打，愤而服毒自杀；同年 11 月 19 日，河南平舆县辛店乡两路口村蔡玉堂家，突然闯入 19 名乡村干部，强行拿走了仅有的 25.5 斤芝麻、198 斤小麦后，深感走投无路愤而自杀……

为了强行收费，不少地方政府派出动辄十几人至几十人的“打人队”、“硬结队”、“扒粮队”到农民家扒粮、赶猪、牵牛、搬东西、骂人打人、甚至杀人。安徽阜南县中岗镇沈寨村支部书记沈河理，派出“联防队”挨家挨户收费，规定凡骂人者罚款，打人者还手。农民刘朝兴家中无钱，但“保证决不过明天中午 12 点”交钱，因“联防队”拒不答应而发生争执，联防队即开枪射人，当场造成一死两伤（1996 年 2 月 5 日《华南报》）；重庆市梁平县新盛镇民安村农民罗昌荣，因交不出 300 元乡统筹款，被收费官员用悬空吊起来的板凳，像和尚撞钟一样活活撞死，连肠子都撞烂了（1998 年 12 月 4 日《南方周末》）；苏北某县农村李士成，“因交不出这费那费”，被收费队长一刀捅死（1999 年 12 月 17 日《中国青年报》）……

地方政府可以违反中央政策规定乱收、乱罚，但农民如若向上反映就该死。安徽利辛县纪王场乡路营村青年农民丁作明，因向上反映基层政府大大超出国家规定乱收费，被乡村干部联手设计抓到派出所，用桑木棒、电警棒、扁担等凶器活活打死；河南邓州市陶营乡徐楼村农民陈重申，因向上面反映基层小吏恶意加重农民负担，领着“棒子队”挨家挨户逼款、扒粮、抓人打人等等恶劣行径，地方小吏一次又一次密谋，最后将其活活勒死，再将其尸体拉到外地抛尸水潭……

如此种种足见某些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目无法纪，丧失人性，丧尽天良到了何等地步，有的地方甚至作出这样的规定：“吊颈不解绳，投河不拉人，喝药不夺瓶，告状不开门”，使死

亡悲剧屡见不鲜，而农民只能含泪长叹：“生在新中国，死在乡政府，有冤无处申，谁为民作主？！”

中国的主要财富已集中到极少数人手里，早已人所共知。

世界各国衡量贫富有一个基尼系数，1978年中国为0.18，到2004年中国基尼系数已创造了比全球贫富悬殊最大的美国（0.408）大得多的0.47，到了2011年，中国基尼系数已达到全球罕见的0.761的高峰（2014年2月28日的《文萃报》），而国际上公认的警戒线是0.4。在中国农村，不少人家已到了穷困潦倒，家徒四壁的地步。

1998年7月6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播报了“大包干”20年后一个叫“四方井”的“小康村”的情况，此时该村人均年收入不超过300元，多数农民靠卖血度日。比如李章会那个组，14户人家11户卖血，占78%。在甘肃、青海交界处的天祝县东坪乡，乐都县、民和县的芦花乡、马营乡、马厂乡、北山乡等地农民中，绝大多数家庭都靠卖血度日，芦花乡湾子村40多户人家中35户卖血，该村87%的家庭“主要经济来源”就是卖血。2002年年届61岁的该村农民李守忠说：“几十年来卖的血液足有两大水缸”，村里“夫妻卖血，一家五口四人卖血，是很普通的事”，信达希望学校90%的学生靠父母卖血支持学业（2004年第11期《半月谈》）。

河南上蔡县文楼村一位农民说：“我一年最少卖300次血，……一天抽两三管血是常有的事”，如此卖血，与卖命何异？在一些地方甚至产生了一种过去根本没听说过的“特色经济”——“血浆经济”。

“大包干”25年后的2003年，在率先富起来的广东高州农民高耀径，因为“现在连碗粥都喝不上”，牵着小儿子站在街头，泪流满面当街送子（2004年1月29日《文萃报》）；因为生病发烧，父母拿不出10元钱去看病，广东汕头农民高贵增9岁

的儿子，用红领巾上吊自杀（2008年12月19日《生活文摘》）；家住内蒙古临河县新华镇永红六队的38岁农民刘军，自己患病，而药费暴涨，弄到家贫如洗，但三个女儿都在上学，根本无力承担昂贵的学费，左思右想，无以为计，“干脆一起死得了！”便弄来安眠药，谎称是防疫站发的“扶贫药”，能治多种病，让全家人一起服食。因药量不足，刘军半夜醒来后，发现全家人只是昏迷不醒，使用毛巾将三个女儿一个一个捂死（2005年12月16日《内蒙古晨报》）；陕西富平县曹村镇小贾村农民赵小林，育有一儿一女。一个上高中，一个上初中。但一家四口主要靠教书的妻子800元工资支撑，根本无力负担儿女上学，走投无路，竟在杀死一儿一女后，用菜刀割断喉管自杀，整个家庭毁于一旦；2004年初，陕西省旬阳县桐木乡涌泉村，五天之内，三人自杀。因为交不起几百元罚款，刘立文穷得连自杀的农药，也是赊来的（2004年1月29日《文萃报》），如此等等惨案，堪称天下罕见。

大概没有人听说过有人故意犯罪以求入狱求生吧？湖南省祁东县灵官镇无依无靠的73岁老人付达信，就曾去北京车站两次有意抢劫并请求多判几年刑，以入狱求生而成为几十家报纸报道的“名人”。而截至2009年，在祁东县像付达信这样的五保老人就有10789人，其中仅有8%的人入了养老院。这种“坐牢就是救命”的奇闻谁听说过吗？

其实，国家为了救助贫困人群，每年都拨出了巨额经费。但有的地方，1万元扶贫款，连1元都到不了村里。万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以上都被地方政府“层层拔毛”拔走了（2006年2月27日《文萃报》）。据报纸披露，80%的贫困户吃不到低保，而能吃上低保的60%不是贫困户。扶贫成了扶富，乃至中央副部长的父亲都能吃低保。

农村妇女特别是农村留守妇女，“大包干”以后，由于青

壮劳力外出打工谋生，她们的头上压着“生产、家庭、老人孩子”三座大山外，还要承受天下罕见的人身和精神折磨与蹂躏。买卖妇女早已司空见惯，甚至出现了“妇女批发市场”，“小姐批发市场”。安徽涡阳县丹城乡茅庵赵村居然发展到80%的人都“贩卖妇女”。农村改革后，“什么人都可以欺侮”农民，新出现的“黄世仁”、“南霸天”、“西门庆”更是无法无天。云南镇雄县的恶棍杜风华，居然霸占村里十几名留守妇女长达十几年而无人过问，最后遭乱棍打死；甘肃省天水市平安乡瓦资村的刘少洲，在农民成为一家一户的一盘散沙后，欺男霸女，偷扒抢劫无恶不作。村里所有妇女，不分老少，不论婚否，只要他看上了，就得跟他上床。即使丈夫在家，他想睡谁的老婆谁就得让出老婆任他蹂躏。大到五六十岁，小至十三四岁，村里被强奸的妇女不下五六十人。山东淄博周村村主任韩刚，凭借权势，从十几岁的少女到60多岁的老奶奶，想强奸谁就强奸谁。即使光天化日之下，也敢带着打手，提着凶器，将妇女拖上床就强奸。三门峡附近一个村庄的党支书公开说：“这个村，有一半都是我的娃”（2013年9月2日《南风窗》）等等等等。一些地方的村霸、村主任、村支书肆意霸占、凌辱妇女无法无天，他们欺压甚至残杀村民和民选村官也惨无人道。山西忻州东楼村村主任张×全，组织“私人武装”，以“打、杀、抢”开路，“人挡杀人，鬼挡杀鬼”，横行乡里；湖北仙桃市朱湾村副支书汤×波率领几十名打手在春节“携枪扫荡村民”；郑州市七里河村村支书康×山无法无天，残酷杀害民选村官康建伟和母亲魏国英；山东莱阳市于家岚村村支书隋×宾等人买凶威胁群众拥护的鲁言奎，如敢竞选村官就要“拿斧头把你剁了，拿刀把你劈了”。鲁言奎被群众选上村主任后，果然被“剁了”“劈了”。至于砍断胳膊，劈断腿的民选村官更多。在这些地方，农民特别是农村妇女还怎么生存？社会治安和稳定怎么保障？

疾病对农民的折磨触目惊心。在全国 2933 个县（市、旗）中，有 2431 个存在一种至几种地方病，截至 1996 年，地方病患者达 6000 万。在全国 592 个国家级贫困县中，有 574 个（占 96.96%）的农民受到 2 种或 2 种以上地方病的折磨。在西部地区，“通渭的农村妇女，95% 以上都有妇女病，大多是子宫脱垂”，只能“成年用一个布袋子把脱出来的子宫挂在身上，那袋子、裤子常常是血糊糊的”。一些地方 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高达 25%，即 4 个中就有 1 个死亡（2001 年 12 月《中国周刊》）。农民因为穷，只能“小病拖，大病扛，重病等着见阎王”。湖北公安县埠河镇万众村贫病交加的陈正先夫妇，走投无路，于 2007 年相拥投江而死（2007 年 4 月 6 日《嘉兴日报》）；53 岁的重庆农妇吴碧君，家贫如洗，于 2011 年赌命用菜刀“剖腹自医”（2011 年 6 月 3 日《生活文摘报》）；河北清苑县臧村镇东臧村农民郑艳良，双腿溃烂不止必须截肢，无钱上医院，用钢锯自做“截肢手术”，钢锯崩成两节，牙齿咬断四颗（2013 年 10 月 4 日《文摘周刊》），如此等等，惨不忍闻。

由于地方政府往往一味追求 GDP，以彰显“政绩”，有害有毒的高危企业在一些地方“蓬勃兴起”，使不少农村的生态环境惨遭破坏，因污染引发的疾病日益严重，造成的癌症村难以胜数，尤以沿海地区为甚。从浙江萧山南阳镇往北走，经过江苏无锡广丰村，常州市新北区，阜宁县洋桥村、东兴村，安徽宿州张庄村，山东肥城市肖家店村，阳谷县西关村、邵楼村、西汉庄村、国庄村，到天津市西堤头村、刘快庄村，在如此漫长的沿海“经济活跃带”，都被癌魔的阴影笼罩。那里的水不能喝，种出来的粮食不能吃，只能“昧着良心”卖到外地去。癌症造成的死亡堪称举世罕见。比如，河南沈丘县东孙楼村，食道癌、肝癌、胃癌、直肠癌、子宫癌、乳腺癌等等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死亡幽灵笼罩全村。新垒的坟墓、花圈、挽联充斥

全村，一年四季绵延不绝。2004年6月一个月内，仅王子清一家就被癌魔夺走三位亲人。面对记者王子清泣不成声：“死人就像家常便饭，我已不知道村里死了多少人，只知道一个接一个地死”。这样的癌症村，各地并不鲜见，连河南省副省长张大卫也痛斥，污染无异于“直接杀人”（2007年9月28日《生活文摘报》）。但是，不少地方政府为了GDP，一味袒护污染企业，乃至不少地方的农民，甚至包括大学教授，也不得不向地方政府“跪地”以求生存（2007年8月14日《生活文摘报》、2011年11月7日《人民日报》）。

由于农业已变成微利甚至倒亏产业，不少农民种地成了一种无法承受的负担，于是2亿多农民被迫离乡背井外出打工谋生。他们对自己的打工生活作了这样概括：“起得比鸡还早，睡得比猫还晚，干得比驴还累，吃得比猪还差”，不少老板为了榨取工人的血膏，根本不管工人死活。一天24小时，他们是“3饭5睡16工”（3小时吃饭，5小时睡觉，16小时干活），在有的地方成了常态。24小时连班干，两天两晚不休息也不鲜见，因此累死工人的事比比皆是，每年活活累死（即所谓“过劳死”）多达60万人，这肯定是当今世界罕见的奇闻。

再就是被泛滥成灾的职业病折磨。早在2005年中国有毒有害企业不少于1600万家，身染职业病者达2亿（2005年5月7日《广州日报》）。不少老板只顾自己发财，全不管工人死活。湖南有关部门对该省新宁县私营铋矿中51名矿工进行体检，43人确诊为矽肺病，占84.3%（2003年10月23日《潇湘晨报》）；云南西畴县莲花塘乡者项村发现铋矿后，村里青壮年“几乎全部上了矿山”，凡挖过矿的人，80%以上得了矽肺病，者项村成了远近闻名的“寡妇村”。最惨的是年届66岁的熊兴才老人，他的4个年富力强的儿子，全部死于矽肺病。其中，1996、1997、1998年，连续三年死了三个儿子。儿媳或者改嫁，

或者跟人跑了，一个十多口人的大家庭，在几年间人亡家破，几至毁灭。剩下老人和两个年仅 11—13 岁的小孙子相依为命，凄凄惨惨，苦不堪言。（2001 年 9 月 1 日《羊城晚报》）；湖南浏阳枨木镇发现金矿后，金老板纷至沓来，矽肺病一个个死去，最惨的周文明四兄弟全部死于矽肺病（2003 年 2 月 18 日《潇湘晨报》）；革命老区江西修水县上杉乡发现金矿后，政府争相挖金，全乡“几乎所有男人上山挖金”。结果造成一场“建国 50 多年来罕见的职业病灾难”，成了令人落泪的“寡妇乡”（2011 年 4 月 15 日《城市商报》）。如此等等的根本原因就是地方政府和老板们完全不管工人生命，普遍使用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国家就严禁使用的“干钻”，而不使用成本较高，能避免矽肺病的“湿钻”，使不少工人打工两三个月就得了一上身便是“死刑”的矽肺病。

最令人愤慨的是，农民工被老板活活打死。农民工用透支生命超负荷为老板创造财富，老板却任意拖欠、拒付低得可怜的工资，截至 2003 年拖欠农民工的工钱达到 1000 亿元，温家宝为重庆女农民讨回被拖欠了 2 年多的工钱时，呼吁“欠农民的钱一定要还”。但全国各界为农民工讨了一年多工资后，到 2014 年 11 月，全国拖欠农民工的工钱仍是 1000 亿元。而且工人不能讨工钱，一讨就挨骂挨打，打死打伤打残的工人屡见不鲜。2002 年 6 月 24 日，广东惠州一外资企业因工人买饭遭保安殴打发生争执，导致 160 多名保安手持铁棍、长刀，对工人见人就打，逢人就砍，前后持续三天，70 多名农民工被砍伤或打断骨头。用烧红的铁铲烙工人的脸和手，逼迫工人剁掉手指，用菜刀砍下工人耳朵，甚至任意打死工人，再焚尸灭迹等等恶行也白纸黑字登在报上。黑心矿工强逼工人在高危巷道作业，井下多次报警后仍不让工人离开，乃至一次造成数十名至数百名工人遇难的重特大死人事故连绵不绝。据上海市相关部门连续 10 年统计调查，95% 以上的死人事故都是人为造成的。

中国矿业大学教授陈红经多年调查统计，在煤矿所有死入事故中，人为因素造成的占 97.67%（2011 年第 25 期《中国经济周刊》）。这就清楚地告诉人们，老板卖煤赚大钱不也是卖工人的血吗？而有的地方政府和官员却和老板沆瀣一气，有意瞒报矿难，故意封锁消息，甚至将死难矿工的尸体偷运到外省、外县私自火化，或者抛尸野外，死难者家属连亲人的尸骨都见不到，这种旷古罕见的惨无人道，在今日的中国矿山并不鲜见……

仅从以上简略介绍的种种令人心酸落泪，愤慨难耐的事例，一切有良知的人谁能不动情？我们可以没有经济学家，可以没有文艺学家，可以没有这“家”那“家”，但谁也不能没有农民。没有农民我们就无法生存。想到“大包干”几十年以后，不少农民处在如此不可思议的艰难贫困乃至险恶的环境之中，我们该作何感想？

以上所说中国农民、农村、农业一丝半缕的点滴情况，在后面相关章节里均有较为具体介绍，完全是“多余的话”，权且作为一个“引子”，以代前言。

还必须说明的是，书中所涉及的各种数据和相关资料，主要源于公开出版发行的书报刊物。笔者遵循的原则是，说话要有根据。离开它们笔者根本无从写作本书，谨在此向它们的作者、编者致谢。

2015 年 1 月 15 日

目 录

多余的话（代前言）	1
第一章 是改革的先锋，还是倒退的标本？	1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几千万党员不敢干的事， 你们干了”	1
第二节 “凤阳本是个好地方”	5
第三节 小岗村，在 156 个月中有 87 个月 靠救济过日子	8
第四节 如果都像小岗村，今天还有我们吗？	11
第五节 从“牛房周围堆满牛粪”到第二次按手印	15
第六节 《人民日报》发表了两件意见对立的来信	22
第七节 一场尖锐对立的争论	27
第八节 一个老外和中国高官的交锋	32
第九节 “不换思想就换人”	36
第十节 “吉星高照”小岗村	43
第十一节 敲开了中南海“北门”的村长	48
第十二节 致富“典型”，“村集体没有一分钱”	53
第十三节 是历史的前进，还是历史的倒退	57
第十四节 包产到户的“漏网之鱼”	60
第十五节 要机械化还是要锄头化？	68
第十六节 震惊世界的“18 颗手印”原来是假的	76

第十七节 小岗村要“壮大集体经济， 走向共同富裕”	82
第十八节 小岗村能统一中国吗？	90
第二章 我们丢掉的是珍宝还是垃圾	95
第一节 成也萧何，败了萧何	95
第二节 说说大寨	103
第三节 陈永贵其人	107
第四节 大灾之年：“三不要”、“三不少”	118
第五节 大寨天天搞阶级斗争吗？	124
第六节 奉周恩来之命进行的调查	130
第七节 中共领袖与大寨	137
第八节 郭风莲调走了，陈永贵去世了， 只有大地在诉说着大寨的昨天	147
第九节 到底是谁在干蠢事	154
第三章 从百业支农到百行坑农	169
第一节 由热而冷的中国农业	169
第二节 假劣种子坑农天下罕见	172
第三节 农资坑农更胜洪水猛兽	177
第四节 百业坑农，“各显神通”	183
第五节 “护农天使”成了“坑农杀手”	194
第六节 受害农民欲维权，怎么这样难	201
第四章 农民头上两座山 ——历久不衰的“白条”和日益膨胀的“三乱”	210
第一节 屡禁不止的“白条”满天飞	210
第二节 不应该出现的困境	216
第三节 中国农村有了“第二货币”	222
第四节 “只限本村使用”的村币	226
第五节 历史课本上的名词回到了现实中	228
第六节 谁把苦果抛给了农民	232

第七节	农村集体经济的崩溃和“三乱”的兴起	239
第八节	竹农种一根竹子，得到一双筷子	243
第九节	中央三申五令——令不行，禁不止	247
第十节	税费改革——“税”加上去了， “费”也加上去了	253
第十一节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259
第十二节	收费大军和“讨债运动”	263
第十三节	捉人队、打人队……农民见了心也碎	267
第十四节	怵目惊心的隐形负担	276
第十五节	盲目决策造成的恶果	283
第十六节	震惊全国的“减负”血案	288
第十七节	中央政策法令是洪水猛兽？	297
第五章	中国的耕地能养活中国人吗？	305
第一节	中国到底有多少耕地	305
第二节	频频敲响的耕地警钟	310
第三节	农民的“命根子”想夺就夺？	321
第四节	日益严重的弃耕抛荒	327
第六章	粮食！粮食！粮食	335
第一节	艾奇逊预言的破产	335
第二节	人均上调粮食的“全国冠军” 变成了粮食调入大户	337
第三节	“我种 80 亩田，还不能养家糊口”	341
第四节	“粮食大王”不再种粮	344
第五节	“农民兄弟不容易， 十年粮价才涨了 8 分钱”	349
第六节	“缺粮了就想到农民， 丰收了就忘了农民”	356
第七节	硕鼠如虎：猛吞粮食收购款 大嚼农民“白条粮”	366

第八节	骗你没商量：骗了总理、副总理， 再骗国务院	374
第九节	粮食警报频频传来	384
第七章	转基因食品触目惊心涌入中国	391
第一节	“转基因工程——新一轮鸦片战争”	391
第二节	中国不应该承受这样的风险	397
第三节	中国人不能成为洋人转基因试验的白老鼠	404
第四节	转基因作物引发的异常	408
第五节	“到处都是转基因，我们还能吃什么”？	410
第六节	转基因食品敲响了民族繁衍警钟	416
第七节	在生存问题上不能搞双重标准	418
第八节	“中国需要保护自己的粮食安全”	423
第九节	福建吹响了抵制转基因主粮的号角	428
第八章	中国人的一日三餐不能受制于洋人	432
第一节	中国大豆业的崩溃	432
第二节	中国人炒个荷包蛋都要看洋人的脸色？	435
第三节	外商在中国掀起的粮食抢购大战	439
第四节	中国人的“一日三餐”也要受制于洋人？	442
第五节	警惕外资公司和外国禽兽垄断中国餐桌	446

第一章 是改革的先锋，还是倒退的标本？

人们对“改革”二字的普遍理解，应是改换陋规，革除弊政，制订和推行符合历史发展规律与绝大多数人民利益及其愿望一致的新政，以加速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历史的发展，使人类跨入一个更文明更先进的时代，过上更幸福更和美的生活。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从农村开始，随后扩展到全国各个领域各个行业的改革，至今已经三十多年。中国有“三十而立”之说。对这场历时已经三十多年的，涉及每一个人切身利益的改革，人们多有评说。见仁见智，有褒有贬，理所当然。笔者对农村改革是一个十足的门外汉，本来并无甚么发言权，但中国人爱凑热闹，以致各种议论层出不穷。

于是，笔者也来凑凑热闹，就农村改革说一点门外汉的话吧。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几千万党员不敢干的事，你们干了”

公元一九七八年，对于建国已经 29 周年的新中国，是一个极不平常的年头。特别是这一年的 12 月 31 日，被人们称为“一个历史性的日子”。“就在这一天，邓小平在中央工作全会上的一篇长篇讲话，宣布了他的时代开始。”即后来人们所说的，毛泽东时代结束了，邓小平时代开始了。尽管此时邓小平的“职位在华国锋之下”，他在中央的排名也“在叶剑英之后”，但这并不影响邓小平的“最高地位，而掌控着国家命运”，这就是

人们所说的邓小平时代开始了的标志。

紧随这个“历史性日子”而来的，是那场由中国农村掀起，然后席卷全国所有城镇和各行各业的改革风暴。因为在这场席卷全国的改革风暴中，邓小平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被称为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

农村改革的发源地，乃是后来名震天下的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据媒体报道，1978年11月24日晚上，由小岗村生产队队长严俊昌（后来任小岗村党支部书记）、生产队副队长严宏昌（系严俊昌堂弟，后来任小岗村村长）带头，共18名户主，按下红手印，立下生死状，搞起了包产到户。他们赌咒发誓，如果生产队干部因包产到户而被抓去“坐牢”，社员给干部送牢饭；如果生产队干部因包产到户而“被杀”，干部的孩子，由社员抚养到18岁，以此显示他们包产到户搞单干的决心。

然而，一切风险都没有发生。而且，很快得到了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的支持。据后来的新闻报道称，万里先后五次到凤阳，亲临小岗村指导。万里对小岗村搞包产到户十分“赞赏”，他对那里的干部说：“我就想这么干，就怕没人敢干。你们这样干，我支持你们。”

那一次离开小岗村时，万里让汽车开得很慢，不时探头窗外，一再叮嘱严俊昌，一定要把地种好。甚至在汽车已经开到村口，万里还再次回头，招呼严俊昌过去，鼓励他说：“如果有人查你，你就说我同意的，让你干五年。”（以上“引文”均引自《1978 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的兴起与失败》）。

在全国都在搞集体化的1978年，小岗村却搞起了包产到户，为了使读者分析或探索此中的原因，不能不对小岗村的历史作一点介绍。

解放后，土改划成份时，小岗村没有一个地主富农，仅有一户中农；此外，除了一户贫农、一户雇农和两户佃中农，其余均为下中农。以致无地的贫农、雇农和佃中农，只能到外村

去分地。是一个典型的自耕农，自给自足，自负盈亏，自由自在的小农经济村。

1952年，全国开始搞农业合作社，当时34户人家的小岗村，仅有四户加入了互助组，其余30户坚持单干。

这个生产队的依赖性很强，从高级社以后，除了1956年，全队收了16.5万斤粮食，留下口粮、种子，卖给国家4万多斤粮食，再没有给国家卖过一粒粮食，而且基本上是靠国家救济过日子。生产队有一句顺口溜：“农民种田，国家给钱；缺吃少穿，政府支援。”生产队10头牛，全部是国家给买的，用的犁耙等农具也多是国家给钱买好。这样依赖国家的生产队，在全中国大概也只是一个小岗村，他们仅在1966至1978年间，不仅吃掉了22.8万斤救济粮，国家先后给予的种子即达6.5万斤。

从合作社到人民公社的整个过程中，因为小岗村一直消极对待集体生产劳动，上级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年年派工作组，工作组人员最多的时候，一户派一名工作人员，但就是无法改变小岗村的面貌。整个生产队一盘散沙，谁也不怕谁，谁也管不了谁。

1978年，仅有18户人家的小岗村生产队，被公社允许分成两个作业组，实行包产到组，社员不干；分成四个组，社员还是不干；分成八个作业组，即父子两家一个作业组，或兄弟三家一个作业组，或兄弟两家一个作业组，或岳婿两家一个作业组，即使这样分组，还是不行。其中的关键问题，就是斤斤计较谁占了便宜谁吃了亏，最后只好包干到户。

这种包干到户，实质上就是分田单干。当时国家强调公有制集体化道路，除了极少数偏僻落后的山区，国家不支持也不允许一家一户搞单干。但是，小岗村的包产到户，得到了省委书记万里的肯定和支持。当地的一些党政官员也跟着响应，并对小岗村的做法进行了精心包装。当时的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

就不讲小岗村是“包产到户”，而说是“包产到组”。小岗村的做法，也得到了当时的滁县地委支持，地委书记王郁昭不仅亲自参与其中，还和地委政策研究室主任陆子修一道，亲临凤阳，就如何为小岗村的“包产到户”“正名”进行了整整一天的密谋策划，最后把小岗村的做法，定为“大包干”，概括为：“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缴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后来，“大包干”又被称为“联产承包责任制”，将“包产到户”上升为一种“体制”。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种定位只是掩耳盗铃。田地分到了户，各干各的各顾各，有何“联产”可言？谁跟谁联产？但经过如此包装，既遮蔽了一家一户搞单干的实质，还把党和政府历来倡导和强调要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表述得颇为形象。

很快，“缴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余下都是自己的”，就成了小岗村农民用自己的实践，创造出来的中国农村改革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真经”，在一夜之间传遍全国大地。

“包产到户”的小岗村人，土地分了，农具分了，谁也不管谁了，你不种好地，唯有饿肚子，为了个人发家致富的欲望便迅速上升，生产积极性大大高涨。据后来办起来的小岗村展览馆里展出的粮食产量数据显示，集体化时遭受大旱的1978年，小岗村的粮食总产量只有3.6万斤，也即是说在小岗人拥有的517亩土地上，平均亩产粮食仅69.6斤；包产到户后的第一年，小岗村收了13万斤粮食，平均亩产达到251.5斤。由于使用良种和开垦荒地（据说小岗村在20年人民公社期间耕地减少了一半，即原来拥有1034亩土地，由此应造成了大量荒地），小岗村包产到户以后的头几年（大约五年），粮食都获得了丰收，农民生活大有改善。

1980年过完春节，万里闻讯后，再次来到小岗村。他看到家家户户都有粮食吃，非常高兴，激动地对严俊昌说：“中国共产党几千万党员不敢干的事，你们干了，因为你们头上没

有乌纱帽。只要敢想敢干，没有干不成的事。中国农民的温饱问题，解放三十年了，都没有得到解决，你们却冒着风险，自己解决了”（引自陈桂棣、春桃著《中国农民调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第233页）。

对小岗村的包产到户，万里使用了“中国共产党几千万党员不敢干”作为反衬，用以赞扬严俊昌、严宏昌兄弟的“敢想敢干”，这是一种高得不能再高的评价。但万里忘记了一点——中国几千年的小农经济，就是一家一户搞单干。合作化以前，中国共产党实现了我们的祖先梦寐以求的“耕者有其田”以后，中国农民不也是一家一户搞单干吗？

第二节 “凤阳本是个好地方”

属于凤阳县的小岗村，位于淮河中游东南，距淮河仅有三四十华里地。据史料记载，凤阳在古时候比较富庶。史书上曾有这样的记载：“走千走万，抵不上淮河两岸。”由此可见，凤阳在历史上曾是富庶之地。凤阳的败落，始于黄河夺淮以后。由于淮河的入海通道被淤塞，包括小岗村在内的凤阳县及其淮河流域，水旱灾害连年不断，乃至农业凋敝，民不聊生。

出生于凤阳县的朱元璋，对那里的水旱灾害本应有切肤之痛，但他领导农民起义取得胜利并当了皇帝以后，不仅没有对其袍衣之地的水旱灾害，进行治理，苛捐杂税却如牛负重，弄得无数家庭生计无着，被迫离乡背井，身背花鼓，四处逃荒乞讨。他们一边打着花鼓，一边含泪唱道：

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个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便有九年荒。大户人家卖骡马，小户人家卖儿郎。我家没有儿郎卖，身背花鼓走四方……

这一段在凤阳流传了不知多少年，老人们无不耳熟能详的花鼓词，把包括小岗村在内的凤阳人民在旧社会的苦难，表述

得淋漓尽致。

新中国成立后，包括小岗村在内的凤阳县，也和神州大地所有农村一样，对沿袭了几千年的小农经济，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他们通过互助合作，组织起来，走上了集体化道路。

管子曰：“善为国者，必先除五害。五害之首，水为最大。”早在1949年10月，人民共和国水利部成立还不到10天，西南、海南等地尚未解放，国内战争仍在进行，刚刚被任命的水利部长傅作义就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召开了解放区水利联席会议。会上确定了“防洪防旱，兴修水利”的基本方针，这也就是此后我国大办水利，发展农业的基本方针。由此可见，在毛泽东同志心里，水利问题摆在多么重要的位置。而治理淮河，则更被摆在重中之重。1952年，毛泽东就提出“要根治淮河”。这年深秋的一天，他邀请邵力子和傅作义来到他在中南海的家里，说：“今天请二位来，就是为治理淮河的方案，听听你们的意见。”接着对傅作义说：“傅将军是新中国第一任水利部长，虽然带兵打仗几十年，但傅将军博学水利工程，对我国的水利情况是了解的。请傅将军拟定一个全面的兴修水利方案。要想改变我国的贫困面貌，看来首先要大兴水利建设，才能把几千年的水患化害为利，那可是造福于民啊！”

傅作义频频点头：“对！对！对！”

1951年5月，美帝国主义发动的侵朝战争正打得如火如荼，而各项治淮工程在整个淮河流域却热火朝天地全面展开。由中央人民政府派出的治淮视察团，带着毛主席亲笔题写的“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题词，和用这一题词制作的四面锦旗，分别授予治淮委员会和河南、皖北、苏北三个治淮指挥部。

1951年11月，傅作义发表了《毛泽东的领导决定了治淮工程的胜利》一文。文章说：“毛主席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毛主席的决心，对淮河流域1300万受害人民成为一个救命的福音。已经逃亡的人民回来了，未逃走的人民安定下来了，积

极地参加了生产自救的工作。毛主席的决心对淮河流域 5700 万人民是一个巨大的动力，无论灾区和非灾区，多数群众都踊跃地自愿报名参加治淮工程。”（引自《中华魂》2010 年第 12 期）。

治淮和抗美援朝，成为 20 世纪五十年代初轰动全国的两件大事，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同时展开的两个大战役。祖祖辈辈饱受洪水灾害之苦的淮河流域人民群众的热情和干劲，如同火山爆发。“父子齐上阵，兄弟争报名，夫妻同出征，姑嫂不示弱”的动人场面随处可见。治淮第一年就有 220 万农民加入治淮大军，为了保证治淮工地上需要的大批物资，有 90 多万工人、农民，日日夜夜奔走在数千里淮河运输线上，他们用汽车、牛车、马车、独轮车等等所有能用的工具，把来自东北、华北、中南、西南各省区的治淮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工地，保证了治淮工程的顺利进行。数以百万计的治淮大军，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和改天换地的气概，凭着锄头、铁镐、扁担、柳条筐，人挑肩扛、牛拉马拖，在淮河流域展开了一场移山填海大修水利的战斗。如此壮观，如此浩大的治水场面，在今天的中国，再也不可能出现。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淮河两岸共修建了 5000 多座水库，库容量达 250 亿立方米；在淮河中下游修建防洪、行蓄区 30 多处，闸坝 4000 多座，培修干、支流堤防 15000 多公里，在下游扩大入江水道，开凿新沂河、新沐河，引淮入沂，修建苏北灌溉总渠，扩大入海通道等等，仅完成的土石方即达 326 亿立方米，若以一米见方排列，可绕地球 900 多圈。这无疑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水利史上绝无仅有的浩大工程。

在治理淮河流域山山水水的过程中，小岗村人同样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和干劲，投入了大修水利的战斗。他们和附近农民并肩一起，共同战斗，修建了一座长 20 华里、宽 10 华里的燃灯寺水库，这也是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因此极大地改善了当地农田灌溉条件，有效地抑制了水旱灾害。

经过几十年艰苦奋斗，整个淮河流域已形成一个比较完善的防洪、除涝、灌溉、发电相互配套的水利工程体系。数以千计的水库和蓄滞洪区的蓄、滞能力，达到 600 亿立方米，排洪入海能力，由解放初期的每秒 8000 立方米，增加到每秒 24000 立方米，扩大了 3 倍。淮河流域年均水资源为 854 亿立方米，其中地表水为 621 亿立方米，每年为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提供用水超过 500 亿立方米，这样的水资源利用率，在全世界也是十分罕见的。如果没有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决策，没有组织起来的淮河两岸广大人民众志成城的艰苦奋斗，是绝对办不到的。由于构筑了如此浩大的水利工程，征服了危害几千年的淮河水患，彻底改变了淮河流域的水利条件，仅有效灌溉面积，就比治理淮河以前，增加了 10 倍，达到 1.1 亿亩。其中仅共和国最大的淠史杭灌区（1958 年开工修建）在 1972 年全面运行后，为主要受益的安徽、河南提供的灌溉面积，即达 1200 万亩，较好地解决了水利问题，加上各地正确贯彻农业“八字宪法”，在这块只占全国国土面积 3%、全国耕地面积八分之一的大地上，生产了占全国总产量 1/6 的粮食，占全国总产量 1/4 的油料和 1/4 的棉花。仅从这三个数字就不难看到，在共产党领导下，坚持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淮河两岸果然成了“走千走万，抵不上淮河两岸”的富庶之地。淮河两岸的经济获得如此飞跃的发展，在几千年来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社会，即使在梦中，又有谁敢想象呢？

第三节 小岗村，在 156 个月中有 87 个月靠救济过日子

叫人们意想不到的，同样生活和耕作在淮河流域江淮平原这块大地上的小岗村，向人们展示的，却是食不果腹的悲苦和凄凉，委实叫人难以理解。

众所周知，小岗村在严俊昌、严宏昌兄弟带领下分田单干，

并得到万里和邓小平等国家高层领导支持后，宣传小岗村的各类文章、报道、评介、访谈、电视、图书等等，汗牛充栋，浩如烟海。而以《人民日报》高级编辑、资深记者、畅销书作家的凌志军撰写的长篇报告文学《1978 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的兴起和失败》（以下称《历史不再徘徊》），被称为“讲小岗村这段故事的文字极多”的“最好作品之一”。该书出版后，立即在社会各界引起了褒贬不一的争论。万里听到有关争论后，断然肯定：“这本书写得好。写的是历史，材料真实充实……有人说‘失败’二字不好，不赞成用‘失败’，我看‘失败’这两个字用得好。这是事实，是历史的结论。”

那么，这个被万里肯定“材料真实充实”，“是历史的结论”的小岗村，是一种什么情景呢？

凌志军在书中写道：小岗村“在 1978 年 12 月，只有 18 户人家，110 口人……在这个时候，他们是人民公社制度中最基层的一个集体，叫作生产队，共拥有 517 亩耕地和 10 头牛。20 年人民公社，小岗村减少了半数人口、半数耕地和三分之二的牲口，每一个人每年生产出来的粮食则由 500 公斤减少至 50 公斤。直到 1979 年底，也即对于人民公社的失望情绪，已经在中国大部分地区公开弥漫起来的时候，小岗村的上级凤阳县委才敢公布这本账目：1966 年至 1978 年，总共 156 个月里，这个小小的村庄，有 87 个月靠救济度日，总计吃掉救济粮一十一万四千公斤，比他们自己生产的粮食多出三分之一；花去救济款一万五千多元，比他们自己挣的钱多出十分之一。”

凌志军披露的由凤阳县委公布的这些数据，为人们了解小岗村的真实情况，提供了非常具体的依据。

据《新中国 50 年统计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9 年出版）显示，1978 年，全国耕地面积为 99,389,300 公顷，合 1,490,839,500 亩；1978 年全国农业人口为 81000 万，人均耕地面积为 1.8 亩。小岗村 110 口人，拥有耕地 517 亩，人均耕地 4.7 亩，超过全

国农业人口平均耕地面积的 2.6 倍；凤阳县人均耕地不足 2 亩，小岗村相当于凤阳县人均占有耕地面积的 2.3 倍，一般家庭都拥有二三十亩耕地。土地自古就是农民的命根子。被称为“政治经济学之父”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有一句经典名言：“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小岗村人既拥有比全国农民多得多的土地资源，又拥有和全国农民完全一样的劳力。他们理应拥有比全国农民更多的财富，首先应当拥有更多粮食。

但是，小岗村在 1966—1978 年的 12 年间，共吃掉一十一万四千公斤，即二十二万八千斤救济粮。凌志军还告诉我们，在 1966—1978 年的 156 个月里，小岗村人“有 87 个月靠救济度日”，如果没有“救济”，小岗村人能饿着肚子挺过 87 个月吗？

那么，小岗村在 1966—1978 年 12 年间，在 517 亩耕地上，生产了多少粮食呢？

凤阳县委没有公布这 12 年间小岗村的粮食总产量或年产量，但是告诉了我们，这 12 年中，小岗村“共吃掉一十一万四千公斤救济粮，比他们自己生产的粮食多出三分之一。”我们设小岗村在 12 年间共生产粮食为 x 斤，通过计算可知，小岗村在 1966—1978 年 12 年里，总共生产粮食八万五千五百公斤，即一十七万一千斤粮食；平均每年生产 14250 斤（ $171000 \text{ 斤} \div 12 \text{ 年}$ ），平均每亩耕地每年种出了 27.5 斤粮食（ $14250 \text{ 斤} \div 517 \text{ 亩}$ ）。

这就告诉我们，小岗村在 1966—1978 年里，总共吃掉一十九万九千五百公斤粮食（ $114000 + 85500$ ），即三十九万九千斤粮食。

凤阳县委公布的数据还告诉我们，1966-1978 年，小岗村人花掉了 15000 多元救济款，“比他们自己挣的钱多出十分之一”。通过计算，得知小岗村人在 12 年中总共挣钱 13630

元。也就是说，小岗村人在 1966-1978 年 12 年中，总共花掉了 $(15000+13630) 28630$ 元。全村平均每年花了 2385.83 元 $(28630 \text{ 元} \div 12 \text{ 年})$ ，平均每月花了 198.8 元，由此我们得知，在 12 年中的 156 个月中，小岗村除去有 87 个月靠吃救济粮过日子之外，还有 75 个月花的是救济款 $(15000 \text{ 元} \div 198.8 \text{ 元})$ 。

如果将小岗村在 12 年中花掉的 15000 多元救济款，按当时湖南省 100 斤稻谷国家收购价 9.5 元计算，15000 元可购稻谷一十五万七千八百九十多斤，加上小岗村吃掉一十一万四千公斤救济粮，则等于小岗村在 1966—1978 年 12 年里，总共吃掉三十八万五千八百九十多斤救济粮。

如果将救济款也换算成救济粮，我们可以得知小岗村总共吃掉：自产粮 85500 公斤即 171000 斤，救济粮 385890 斤，总共吃掉 556890 多斤粮食，按 156 个月平均，每月吃粮 3569.8 斤。换言之，按小岗村每月耗粮 3569.8 斤计算，而小岗村总共吃掉了 385890 多斤救济粮，通过计算可以得知，在 1966—1978 年的 156 个月中，小岗村有 108 个月 $(385890 \text{ 斤} \div 3569.8 \text{ 斤})$ 是靠救济粮过日子。在如此漫长的岁月里，并不缺胳膊少腿的小岗村人，占有比别人多得多的土地，却长期靠别人养活，叫人们怎么理解呢？不是说只有落后的领导，没有落后的群众吗？人们要问：小岗村的上级和上级的上级领导者们，在干什么呢？

第四节 如果都像小岗村，今天还有我们吗？

我们在上一节里通过计算，得知小岗村在 1966—1978 年的 156 个月中，如果没有救济款和救济粮，就有 108 个月要饿肚子，这是任何人都不可能挺过来的。上一节的计算还告诉我们，小岗村在 1966—1978 年的 12 年中，在 517 亩耕地上总共生产了 171000 斤粮食，平均每年生产 14250 斤，平均每年每

亩生产粮食 27.5 斤。

那么亩产 27.5 斤，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据西藏大学经济管理系副教授图登克珠的论文《依靠科技创新》引证的西藏《卫藏通志》记载，清朝康熙年间西藏的青稞亩产约为三十四五斤。也就是说，小岗村在 1966—1978 年间的粮食亩产，比 300 年前西藏地区的青稞亩产量还低得多。

且不说西藏地区的气候、土壤等自然条件，与处于江淮平原的小岗村相比，不知要恶劣多少倍；也不说康熙年间处于奴隶社会的西藏地区生产工具是多么落后，饱受奴役的藏民生产积极性是多么低下；更不说 300 年前西藏地区的水利条件、生产技术、种子质量等等，肯定比 300 年后的小岗村要差得多，仅就小岗村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粮食产量比 300 年前西藏地区的产量还低这一点，就叫人无法理解。

我们再看看另一组数据，也许更令人惊愕。

据新华社合肥 1998 年 9 月 27 日电报道，此前五天的 9 月 22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到小岗村视察。严俊昌陪同江泽民参观小岗村改革展览馆时，对江泽民说：“实行‘大包干’后，小岗村当年就打了一十三万多斤粮食，相当于 1955 年至 1970 年的总和。”

我们且以这位曾经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的带头人，向中国当时最高领导人报告的数字为依据，算几笔账——

1、小岗村在 1955—1970 年 15 年间，总共产粮食 130000 多斤，平均每年产粮为 8666.67 斤（130000 斤 ÷ 15 年）

我们姑且按小岗村 1978 年共有 517 亩耕地计算，那么，在这 15 年间平均每亩耕地每年产粮为：（8666.67 ÷ 517 亩）=16.76 斤。

2、凌志军在《历史不再徘徊》中告诉我们，小岗村在“1978 年 12 月，只有 18 户人家，110 口人……共拥有 517 亩耕地……20 年人民公社，小岗村减少了半数人口、半数耕地以及三分

之二的牲口”，这就告诉我们，从 1958 年成立人民公社至 1978 年 20 年间，小岗村的人口是由 220 人，减少到 110 人；小岗村的耕地是由 1034 亩，减少到 517 亩。无论人口或耕地，非异常灾难（比如大地震、大瘟疫），都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减少一半。我们权且以平均减少计算，即 20 年减少 110 人，平均每年减少 5.5 人（ $110 \text{ 人} \div 20 \text{ 年}$ ）；20 年减少 517 亩耕地，平均每年减少耕地 25.85 亩（ $517 \text{ 亩} \div 20 \text{ 年}$ ）；按此平均数计算，则距 1978 年尚有 8 年的 1970 年，小岗村应有 144 人（ $110 \text{ 人} + 5.5 \times 8$ ）；应有耕地 723.8 亩（ $517 \text{ 亩} + 25.85 \text{ 亩} \times 8$ ）。

上面第 1 项已经告诉我们，1955—1970 年小岗村平均每年产粮 8666.67 斤，按 723.8 亩耕地计算，平均每亩产粮 11.97 斤；

3、如果按 1958 年成立人民公社前的 1955 年至 1957 年，小岗村尚未减少耕地时应有 1034 亩耕地，而在 1955—1970 年 15 年间，平均每年产粮为 8666.67 斤，则小岗村的粮食亩产仅有 8.38 斤（ $8666.67 \div 1034 \text{ 亩}$ ）。

4、从本节一开始的计算已经得知，小岗村在 1966—1978 年 12 年间，年均产粮 14250 斤，以 517 亩耕地计算，平均每年亩产 27.5 斤粮食。

根据以上计算出来的小岗村粮食亩产，我们再算一算，如果都像小岗村一样，全国人民平均每年可拥有多少粮食。

1999 年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的《新中国统计资料》显示，1978 年全国共有耕地 1490,839,500 亩，全国共有 94,780 万人口，平均每人拥有耕地 1.57 亩。

如果以小岗村的产粮水平计算，全国人均每年可产多少粮食呢？

甲、按上面第 1 项，小岗村平均亩产粮食 16.76 斤计算，则全国人均拥有 1.57 亩耕地，全年可产粮食 26.31 斤；

乙、按上面第 2 项，小岗村平均亩产粮食 11.79 斤计算，则全国人均拥有 1.57 亩耕地，全年可产粮食 18.51 斤；

丙、按上面第3项，小岗村平均亩产粮食8.38斤计算，则全国人均拥有1.57亩耕地，全年可产粮食13.16斤；

丁、按上面第4项，小岗村在1966—1978年12年间，平均亩产粮食27.5斤计算，则全国人均拥有1.57亩耕地，全年可产粮食43.18斤。

甲、乙、丙、丁显示出来的四个数字告诉我们，如果全国农民都像小岗村一样种地，在1955—1978年24年间，全国平均每年每人产粮为：26.31斤，或者18.51斤，或者13.16斤，最多43.18斤。

农民耕地，不能没有种子，得留种子；老百姓要生存，不能不养马牛羊、鸡犬豕，那就需要饲料；国家不能不搞建设，那就得安排工业用粮。我们权且设定，农民不留种子，老百姓不养牛马羊、鸡犬豕，国家不安排工业用粮。按小岗村自1955—1978年24年间的产粮数据计算，则全国所产粮食若按每年每人拥有13.16斤计算，则每天每人仅有0.36两；若按每年每人拥有18.51斤计算，则每天每人仅有0.51两；若按每年每人拥有26.31斤计划，则每天每人仅有0.72两，按最高每年每人拥有43.18斤计算，每天每人也只有1.18两。在长达24年里，无论是每天每人0.36两，或0.51两，或0.72两，或1.18两，除了九天神仙，大概谁都难以维持生命。果若如此，则不仅三分之二的时间靠救济过日子的小岗村，大概早已不复存在，我们这些靠五谷杂粮养命的凡夫俗子，如果在长达24年间，每天只有0.36两，或者0.51两，或者0.72两，最多也只有1.18两粮食，能不能活到今天，恐怕也只有天晓得。

与小岗村不同的是，千千万万中国农民，依靠人民公社的集体力量，艰苦奋斗，辛勤耕耘，积极实施“八字宪法”，大力开展科学种田，不断提高粮食产量，使小岗村人有救济粮吃，有救济钱用，使全国人民过上了衣食大体无虞的日子。据《中国统计年鉴》显示，1949年，全国人口为54,167万，全国产

粮为：11,318 万吨，平均每人拥有粮食为 417 斤；到了 1979 年，全国人口为 90,859 万，全国产粮为：28452 万吨，人均拥有粮食为 626 斤，与 1949 年相比增长 49.64%；到了 1980 年，全国人口为 98,705 万，全国产粮为：32,056 万吨，人均拥有粮食 649 斤，与 1949 年相比，增长 55.64%。到 2003 年，全国人口为 129,227 万，全国产粮为 43,070 万吨，人均拥有粮食为 662 斤，与 1949 年相比，增长 58.75%。我国人民的生活之所以不断有所改善，我们的事业之所以能不断发展，民族不断兴旺，我们的国家之所以能有今天的繁荣，九亿农民实在功不可没！

第五节 从“牛房周围堆满牛粪”到第二次按手印

以笔者的经历和理解能力，怎么也无法相信，位处江淮平原的凤阳县小岗村，人均占有相当于全国农村人口平均占有耕地近 3 倍的土地资源，在长达几十年间，三分之二的日子，只能靠救济维持生命；同样也无法相信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至七十年代后期的漫长岁月里，那里的粮食产量，居然比 300 年前西藏地区的粮食产量还低。

但是，这些数据是根据安徽省委书记万里认定是“材料真实充实”和严俊昌向中共最高领导人汇报的数字计算出来的，我又不敢不相信。

好在后来接触到一些资料，总算从某种程度上解开了我一直无法解开的小岗村为什么那么落后，粮食产量为什么那么低的疙瘩。

农家有一句格言：“庄稼一支花，全靠肥当家”；又说：“有收无收在于水，多收少收在于肥。”如果没有水，农民根本无法种地；如果没有肥，就可以说，农民种田基本上是白种。因此，没有一个农民不珍惜肥料。但是，小岗村的改革带头人却说：分田单干以前小岗村“牛房周围堆积的牛粪，十几年没有人挑

过一挑”。由小岗村带头人说出来的这种状况，如果不是白纸黑字摆在我的面前，我也是不会相信的，难道小岗村的农民，竟懒得自己牛房周围堆积的牛粪，宁可让它长期臭气熏人，也不肯去挑一挑？我的老家在江南农村，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我从六七岁开始，每天早晚都要提着箬箕，去村后村前坡前岭下拾野粪，就是为的多打粮。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经常回老家，我看到所有乡亲们家里的牛房、猪舍乃至鸡窝，没有一家不按时出粪。而且生产队也规定，牛粪、猪粪必须由集体统一出粪，过秤交公，秋后参加统一分配。只有鸡粪由社员自由支配施于自留地。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一家乡亲的牛房、猪舍周围长期堆积着牛粪、猪粪。可小岗村的“牛房周围堆积的牛粪”，居然“十几年没有人挑过一挑”，那里的党支部、队干部，那些敢于冒着“坐牢”、“杀头”危险，按手印带头搞包产到户的生产队长、副队长，在如此长的时间内，自己不肯去带头挑一挑牛粪（这可绝没有坐牢、杀头的危险啊！），也不组织、安排社员去挑一挑牛粪，那里的大队、公社干部，也没有人去检查一下，过问一下、督促一下，他们到底在干什么呢？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干部干部，先干一步”，“群众看干部，干部看支部”，等等格言，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大地上，无人不晓，难道小岗村及其上级组织的众多干部，竟会一无所知？我老家所在的公社，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共有15000多人，21个大队，全公社12名国家干部，另有植保员、水利员、广播员等八大员共8名集体干部，每个人都负责一个大队（其中有一个大队是杉木林基地，由县林业局负责），他们得经常到自己分管的大队的各个生产队去，了解社员的生活、生产情况，听取群众意见，帮助生产队解决诸如化肥、农药、种子、植保、农具、燃料、柴（汽）油等具体问题，并和社员一起参加劳动。我曾亲眼目睹一位叫李寿庄的公社副书记，正值双抢（抢收、抢插）时期，在他分管的大队和社员一起，一

身汗水一身泥巴收割打稻，那模样至今历历在目。

然而，上世纪七十年代，在小岗村无论谁当队长，都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每家可以派一个人（人口多的家庭可以派两个人），由队干部带头组织大家去江苏、浙江以及皖南、皖北一带讨饭，十天半月就可讨回几十斤至上百斤口粮，送回家后再出去讨，这比参加集体生产要强得多（引自戴中立《六十年纪事》第249-252页，炎黄文化出版社2010年10月出版），因此，小岗村人宁可饿肚子，宁可当叫化子，也不肯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自己养活自己。

小岗村人靠外出讨饭、十天半月就能讨回几十斤上百斤口粮，同样是人民公社集体生产，另外一些地方的社员却能几十斤上百斤施舍口粮，说明什么呢？

其他地方的基层干部深入生产队组织生产，小岗村的干部带头组织社员外出讨饭，以致那里“牛房周围堆积的牛粪，十几年没有人挑过一挑”。人们从此不难看到，当年的小岗村党支部、队干部以及他们的上级组织和干部对老百姓的生产和生活是何等冷漠，在这类干部掌管的地方，那里的生产能不越来越糟，粮食产量能不越来越下降，那才怪呢！

透过以上情况，我们不难看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小岗村干部的精神面貌和工作态度之一斑。那么，实行大包干以后，小岗村的干部，被万里称为“干了中国共产党几千万党员不敢干”的事情的大英雄，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的“先行者”，中国农民致富的“典范”以后，他们的精神面貌、工作态度以及群众对他们的反映如何呢？

我们且看看小岗村49家农户，于1998年在一份告状材料上按下鲜红手印，要求上级查处和解决的几个主要问题吧——

- 1、1978年按下18颗手印的带头人，到底是严俊昌还是严宏昌？

- 2、要求发展严宏昌入党，并民主选举小岗村负责人；

3、要求党支部书记严德友（严俊昌的四儿子）下台，并查清他的有关经济和打人骂人问题；

4、要求小岗村公开财务；

49户村民提出的若干问题中的四个主要问题，说的全是干部的事。

由于小岗村的特殊地位，1993年上级从邻近的大严庄村并过来一些农户，成立了小岗行政村。全村扩大到90户373人。此后五年，不少小岗村群众对村干部特别是对村支书严德友的霸道作风和经济问题意见很大，却一直没有解决，于是90户人家中的49户（占55.44%），联名向上级告状，并在书面材料上郑重地按下鲜红的手印，其中包括原小岗村33户和后来并入小岗村的大严庄村的16户；原小岗村的33户中，包括1978年按手印的18名户主中的11名（占61.11%）。

不可思议的是，1978年小岗村18名户主，秘密按手印要求分田到户，由此在全国掀起了铺天盖地的土地大包干，严俊昌因为被万里称为“干了中国共产党几千万党员不敢干”的事情的大英雄，早已红遍中国，扬名世界。但是，作为大包干发源地的小岗村人民，而且包括原来按手印的18户农民中的11户，直到整整20年以后的1998年，却还不知道那次带头按手印的人，到底是谁，岂不滑稽？

由于小岗村占半数以上的群众提出质疑，1998年以后，“各级新闻媒体在报道中都重新认定严宏昌为‘十八户’带头人的地位”（1999年1月6日《中华工商时报》）。

但严宏昌却没有入党，并由村里的49户农民向上级组织要求，发展严宏昌入党。

新闻媒体重新认定严宏昌为十八户带头人的地位，我想一定是经过深入调查得出的结论。否则，他们决不会有随便将一个早已定格为“中国农村改革带头人”、“吹响农村改革号角”的英雄，轻易否定的胆量。但不知当年众多媒体和诸多官员将

严俊昌定为十八户带头人的依据是什么？或者换言之，小岗村的带头人到底是谁？

严俊昌 1983 年入党后，当了大队长、小岗村村长，后来又当了小岗村支部书记。1991 年，严俊昌将自己的四儿子严德友发展入党；1996 年，严俊昌调到小溪河镇当了农委副主任，他便让 24 岁的儿子严德友接了自己的支部书记，并兼任小岗村经济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谁知，这位子继父位的党支部书记，上任后的霸道作风和胆大妄为以权谋私，立即引起了小岗村人的公愤。只要提起严德友的恶霸作风，群众就“痛哭流泪”；只要说起小岗村干部的“财政特权”，村民们就“慷慨激昂”。

严美昌，是严俊昌的亲弟弟，严德友的亲叔叔，也是 1978 年按手印的 18 名户主之一，居然也被他那个当了支部书记的侄儿子“不当人看”，被打被骂，只要提起严德友，严美昌就激愤难耐：“一个连叔叔都敢打的人，还有哪个村民不敢打？！别的村可能也有干部称霸的情况，可小岗村不行。小岗村是党和国家树起来的，书记不可能是哪一家祖传的。书记不把村民当人看，小岗村人就有勇气和力量叫他下来”（引自 1999 年 1 月 6 日《中华工商时报》）。

有的秀才总是看不起农民，认为农民没文化没水平。但这位严美昌说得多么入情入理啊！既讲了小道理，又讲了大道理，我看比那些既不深入农村，根本不了解农民愿望和农村情况，却在对农村改革指手划脚，说三道四以英雄自居的人，高明得多！

从严美昌对他那个当了村支书的亲侄儿子“不把村民当人看”，“连叔叔都敢打，还有哪个村民不敢打”的谴责中，我们不也听到了小岗人对这位村支书的怨愤之声吗？

自从小岗村因分田到户而扬名以后，全国各地给小岗村提供了大量的物资支援和帮助。但是，那里的村民却不知道“这

些钱物到哪里去了”。村里的事，都是村干部，特别是村支书一人说了算。比如，外地给小岗村捐献的推土机，就被严德友一家独占；外地捐献了一部中巴车，但中巴车的营业收入从不向村民公布；村里每年收入多少钱？这些钱怎么花的？村民们全不知道。那时参观小岗村的人很多，但小岗村的商店、饭馆，都是严德友的兄弟占有等等。

诸如此类引起公愤的问题，一直都得不到解决，于是，小岗村的49户村民，不得不在告状材料上，像1978年决心分田一样，再次按下鲜红的手印，要求上级组织调查处理。

同年8月，经县、镇同意，小岗村成立了由小溪河镇四位工作人员和小岗村的严宏昌、严立学组成的清算小组，主要清查严德友当村支书以后的“有关账目”。清查中发现“大量白条发票”，比如，“小岗村清账情况汇报”中显示：1997年，除了外面的招待费，仅在书记、村长家里吃饭，由书记、村长自己开条、自己批报的白条招待费即达21,000多元；1998年1—8月，白条发票招待费为21956.6元。也就是说，在一年零八个月即20个月中，除去在外面的招待费不算，仅由书记、村长在自家招待、自开自批开支的白条发票即达42,900多元，平均每月超过2100元。

村民们没有想到的是，大家郑重其事地按下鲜红的手印，要求上级查清和处理严德友存在的“有关经济和打人骂人问题”，在清查后，凤阳县小溪河镇只是将严德友调到镇里当副镇长，而将小溪河镇一位副镇长安排到小岗村当村支书，和严德友换了一下官位。对这种“换岗”处理，小岗村人“坚决不同意”。于是，他们又于1998年10月26日，再次联名写报告，要求上级“及时认真严肃处理严德友的问题”（1999年1月6日《中华工商时报》）。人们不能不怀疑，那里的上级对这位一朝权在手，就敢将全国各地捐献给小岗村的推土机之类钱物据为己有；“不把村民当人看”，“连叔叔都敢打的人，还有哪

个村民不敢打”的村支书存在的问题，作出的是如此仁慈宽厚的处理，村民们能满意吗？

2008年11月10日，已经升任小溪河镇党委副书记的严德友，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以“小岗村30年和农村改革”为题，与网友进行在线交流时说的一番话，似乎为人们了解这位小岗村支部书记提供了某些佐证。

严德友在谈到小岗村之所以“分田到户”时，说：“那时候就是……为了自己多一碗饭吃，怎么调动大家的积极性，自己干自己的肯定积极性就高了，所以就想到把这地分田到户。”因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直接利益和间接利益是不一样的”。

自古道，“言为心声”。这些话大概可以理解为他对人生观、世界观和为人处事的自我表白。因为他认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因为他认为“直接利益和间接利益是不一样的”，只要分田单干，“积极性就高了”。所以，他当了村支书以后，就把外地捐献给小岗村的推土机，“积极”据为己有，“积极”地自开自批“大量白条发票”；外地捐给小岗村的中巴车的营业收入和村里财务，他都“积极”搞暗箱操作而不向群众公布；为了自己的“直接利益”，他“不把村民当人看”，“打人骂人”，“连叔叔都敢打”，最后弄到全村半数以上的群众，不得不像1978年要求分田单干一样按下鲜红的手印，“要求严德友下台”，要求“及时认真严肃处理严德友的问题”。

从严德友这位党支书身上，人们大概不难看到当年的小岗村干部的影子。当年小岗村“牛房周围堆积的牛粪，十几年没有人挑过一挑”，也没有干部带头去挑一下，过问一下，督促一下，他们是不是都在为自己的“直接利益”奔波忙碌，而无暇顾及群众生产和群众生活呢？小岗村在1955—1970年连续15年，平均亩产粮食仅八九斤至十一、二斤，直到1978年前的12年里，平均粮食产量也不过27.5斤，弄得在二十多年里，一半以上的岁月，全靠救济度日，其原因是不是也在这里呢？

第六节 《人民日报》发表了两件意见对立的来信

由小岗村开始的“包产到户”，得到安徽省委书记万里支持，并在安徽被大规模推行后，在各地造成了不少思想混乱，反对之声频频传来。

最典型的是，后来被称为“影响安徽改革”的“张浩事件”。

1979年2月，甘肃省档案局干部张浩回老家洛阳出差，发现洛阳地区不少县、社已经或正在采取“自找对象，自由结合的形式”，搞“包产到组”，一般是6—8户为一组，“然后将土地、农具、大牲畜分到各组，包种、包产。有的社、队把生产队库存粮食也分光了。这是第一步，下一步就要分田到户，有的地方还在开现场会，县、社催得很紧，责令快分。”

“干部和群众对此做法持怀疑态度”，他们称这种组为“互助组”。因为“农村干部群众都很关心这事”，张浩有意问了两个大队干部（一个支部副书记，一个支委），两个生产队干部（一个队长，一个保管员）和不同出身的社员。

两个大队干部说，“现阶段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制度已经20多年了，实践证明是符合农村实际情况的，群众也都习惯了”。包产到组“肯定会削弱和动摇队为基础”，“他们表示很不理解‘上头’为什么要让这样干。”

两位生产队干部都“担心分田到组以后，生产队无法实行有效管理，生产计划、劳动调配不好做，现金实物也不好分配，还可能带来混乱”，“用这个办法来调动积极性，我们看不中啊！”贫下中农社员直截了当地说：“这样分田到组，怎么搞农业机械化、现代化？”一位60多岁的富裕中农说：“这样搞也许能行，就是拖拉机可使不上了。拖拉机也包给了个人，一台‘四〇’拖拉机，一年向队上交5000块钱，包给个人去了，还能使上吗？”这就是说，连富裕中农也认为，搞包产到户，

就得放弃机械化，不利于发展生产。

张浩认为：“如果从便利管理，加强责任心着眼，划分作业组是可以的，在很多地方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但作业组只是一种劳动组织形式，并不是核算单位。”“现在实行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符合当前农村的实际情况，应充分稳定，不能随便变更。在条件不成熟时，轻易地搞大队核算是脱离群众，是不得人心的，会挫伤干部、群众积极性，给生产造成危害。另一方面，轻易地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包户到组，也是脱离群众，不得人心的。同样会搞乱‘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搞乱干部、群众的思想，挫伤积极性，给生产造成危害，对搞农业机械化是不利的。”

3月15日，张浩的信刊登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纸同时配发了编者按，支持了张浩的看法，认为“张浩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并号召“坚决纠正错误做法”，“稳定地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

张浩的信和《人民日报》编者按，立即在已经或正在推行包产到户、分田到组的地区，引起了巨大震动。

首先，在万里治下的安徽，就出现了尖锐对立的两种观点。在带头分田到户的小岗村所在的风阳县内，“很多人都赞成张浩的观点，反对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县委机关内，人们甚至指着积极推行包产到户的县委书记陈庭元的鼻子说：“赶快纠正，不然会犯大错误”，使这位带头推广“大包干”的风阳县委书记，几乎处于孤立状况。

与风阳县相比，在安徽来安县委班子里，反对之声更为强烈。据该县档案馆会议记录记载，在县委会上，除了县委书记王业美主张分田到户以外，其他县委领导一致反对分田到户，并表示，对已经分田到户的地方“必须及时纠正”。由于王业美坚持自己的主张，弄得县里各级干部与王业美迎面走过时，连话都不愿多说一句。王业美被人们称为“单干书记”，成了

孤家寡人（参阅 2008 年 3 月 3 日《新京报》）。

在安徽，不仅地方干部反对包产到户，军队干部也反对包产到户。安徽省军区一位副司令员，专程跑到带头包产到户的肥西县，旗帜鲜明地对县里的头头们说，如果再这样下去，“军队绝对不答应！”肥西县随即停止了分田单干。

与安徽省毗邻的山东省，60% 已经包产到户的生产队中，有四分之三的生产队重新回到了人民公社体制。在山西，省委机关报已经奉命安排好了批判安徽包产到户的文章。与安徽相邻的江苏省委书记许家屯则在会上强调：“试行责任到组联系有奖有赔办法，进行比较，但不要急于全面推开。大农具不能分，更不能包产到户。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要坚决纠正过来”。他一再表示：“要保持革命晚节，坚决抵制包产到户”。会后，许家屯专门派一位省委常委亲临一线坐镇指挥，在苏皖两省边界江苏一侧的社队，进驻工作组，严防死守……（引自 1979 年 2 月 19 日《新华日报》，2011 年 3 月 8 日《作家文摘》），陕西省委作出决定：“必须继续稳定地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山西作为“农业学大寨”的发源地，当然反对搞分田单干，省委第一书记王谦说：“大寨是在毛主席指引下成立起来的，山西是坚持学大寨的”（引自 1979 年 1 月 25 日《山西日报》）；湖南省委书记毛致用的态度同样鲜明：“湖南要继续坚持学习大寨的基本经验”（引自 1979 年 6 月 5 日《湖南日报》），不仅大多数省都不赞成或明确反对分田单干，在与安徽交界的一些省份，田间、村庄、路口，都挂满了抵制“包产到户”的标语、口号，有的地方还用高声喇叭不断向安徽这边广播——坚决反对安徽复辟倒退！打倒万里！

仅从以上所述，就不难看到抵制和谴责包产到户的呼声是多么强烈。安徽因为带头搞包产到户，几乎陷入了这种批判的四面楚歌之中。

为了扭转反对包产到户的声浪继续高涨，万里决定在《人

民日报》发表文章，于是，责令安徽省农委的辛生、卢家丰给《人民日报》写了一篇题为《正确看待联系产量的责任制》的信。该信一开头就说：“《人民日报》三月十五日头版头条刊登的张浩同志的来信和‘编者按’，在我们这里造成了混乱。已经搞了以作业组、联系产量责任制的干部和群众，担心又要受批判了。原来害怕党的政策有变化的人，现在疑虑更大了，有的人看到报纸好像找到了新论据，把联系产量责任制说得一无是处。”

辛生、卢家丰的信认为：“从安徽各地实践情况来看，实行包工到组、联系产量评定奖惩的责任制，效果很好：一是可以防止定额管理中出现的只讲数量、不讲质量；只顾千分、不顾千万的倾向，有利于提高劳动效率，提高农活质量；二是职责明确，便于检查、验收、考核劳动成果，实行合理奖惩，做到多劳多得；三是能使社员把个人利益和集体生产紧密结合，从而更加关心集体生产，充分发挥劳动积极性。”

辛生、卢家丰的信，在回答实行“包产到组”，“会不会划分生产队形成一级核算单位呢？会不会滑到分田单干呢？”的问题时，认为“关键在领导。只要我们严格按照党的政策办事，坚持几个统一，一般是不会的。因为：第一，土地、耕畜、农具、机械等生产资料仍归生产队所有，有些地方虽然把耕牛农具固定到作业组，但作业组只有使用权，并没有所有权，不能说改变了所有制。而且，生产资料定到作业组使用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生产队可以根据作物布局、生产条件、生产资料的变化，以及耕作制度的改革，随时进行调整。第二，由于种植计划归生产队统一安排，产品和现金统一分配，作业组仅仅是劳动管理的一种形式，无权决定生产计划和收益分配。超产奖励部分数量很少，不会构成一级核算，也不会改变‘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因此辛生、卢家丰认为，“包产到组”，“既不改变所有制性质，也不改变生产队基本核算单位，又不违背党

的政策原则，为什么现在却把它当作‘错误作法’，要‘坚决纠正’呢？”“‘好像‘包’就是资本主义，一‘包’就改变所有制性质，集体经济马上就要瓦解了，这种看法实在是站不住脚的”。

《人民日报》在张浩的信刊登半个月后的3月30日，将辛生、卢家丰的信也刊登在头版头条显著位置上，同时配发了题为《发挥集体经济优越性，因地制宜实行计酬办法》的编者按。

辛生、卢家丰在信中说的是，1、“土地、耕畜、农具、机械等生产资料仍归生产队所有”，而且可以“随时进行调整”；2、“种植计划归生产队统一安排，产品和现金统一分配，作业组仅仅是劳动管理的一种形式，无权决定生产计划和收益分配，超产奖励部分数量很少，不会造成一级核算，也不会改变‘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而万里在小岗村等地推行的“包产到户”，其实质就是一家一户搞单干，根本没有什么“土地、耕畜、农具、机械等生产资料仍归生产队所有”，更无什么“随时调整”的可能；“种植计划”完全是各搞各的，没有什么“归生产队统一安排”；“产品和现金”当然更不可能存在由生产队“统一分配”；哪里还有什么“使社员个人利益和集体生产紧密结合，从而更加关心集体生产，充分发挥劳动积极性”可言？“集体”二字当然已不复存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则完全成了一句空话。

如果安徽推行的包产到户，真的如辛生、卢家丰在给《人民日报》的信中说的那么美好，怎么会在安徽“造成一片混乱”，甚至“把联系产量责任制说得一无是处”呢？

《人民日报》编者按的标题，就是《发挥集体经济优越性，因地制宜实行计酬办法》，强调的是“发挥集体经济优越性”，这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发展农业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规定的，“不准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的原则，是完全一致的。

但是，万里却一意孤行，迫不及待地全力推行他的“我早就想这么干，就怕没人敢干”的“包产到户”。

1979年5月，正是夏收临近之际，万里到了分田到户的肥西县山南，他和围过来的群众一一握手后，开门见山问起了包产到户——

“这样干，你们有什么想法？我是来听你们的意见的。”

“我们有点怕。”

“怕什么？”

“怕变。”

“不会变，省委支持你们。”

“你能不能给个准信，到底我们能干几年？”

“不放心？你们就这样干吧。‘包产到户’想干多少年就干多少年。”（引自1990年9月28日《中国改革报》）

共产党的规矩是：个人服从组织，全党服从中央。万里作为一名省委书记，一方诸侯，既不管《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发展农业问题的若干决定》中“不准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的规定，也不顾安徽省内如凤阳、来安、肥西等地干部群众抵制和反对包产到户的群众情绪，不顾当地“军队绝对不答应”，更不理睬全国各地对安徽包产到户的批评，就以“省委支持你们”在安徽发出了“包产到户想干多少年就干多少年”的指示，这不是将自己置于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之上，也根本不考虑群众情绪和群众呼声吗？如果各地“诸侯”今天也像万里那样，对事关国家大局、民族前途的大事，在中央已经作出明确决定之后，自行其是，自作主张，另搞一套，难道应该容许吗？

第七节 一场尖锐对立的争论

1978年12月，王任重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农业。此时，对农村到底应该如何改革的争论，自上而下正日益尖锐。各地

农村因为在分田不分田，如何分田的争论中，搞乱了人民群众的思想，他们不知道中国农村在下一步要怎么搞了。受个人利益的驱动，到处出现了抢牲口，争农具，闹分社，甚至打架斗殴，争抢生产队的库存粮食、私分生产队公款等事情层出不穷。有关这方面的报告、材料，不断飞到了王任重的案头。反映此类情况的电话，不断打到了他办公室。

作为国务院分管农业的副总理，王任重深感责任重大，那可是事关全国人民吃饭问题的大事啊！为此弄得他寝食不安。他觉得“必须依靠国家现行政策，努力地稳定人民公社制度和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所有制”。

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也发现农业上的问题不少，特别是有人想通过突破“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否定人民公社体制。因此，华国锋考虑让国家农委在北京召开一次农村工作座谈会，以统一思想、稳定农村形势。

华国锋很快就把王任重叫到他的办公室，经过商量，确定了座谈会的规模、人员、时间、地点。

1979年3月，由王任重负责的九省市农业负责人座谈会议，在北京向阳饭店召开。

到会的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包产到户破坏了集体所有制，应予抵制。应该说思想比较统一。但是，安徽省农委副主任周曰礼，独树一帜，提出无论“包产到户”还是“包产到组”，都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主张包产到户。在与会人员都认为“包产到户破坏了集体所有制，应予抵制”的氛围下，周曰礼的发言无异于在会议上甩出一颗重磅炸弹，他的发言在会上受到与会场人员的严厉批评。也就是说，在王任重以国务院名义召开的九省市农委负责人会议上，唯有安徽省对包产到户投了赞成票。

会议快要结束时，王任重把电话挂到了安徽省万里处，询问万里：周曰礼同志在会上的发言，你们审核没有？能不能代

表安徽省委？

万里回答：周曰礼是我省正式代表，他的发言当然代表安徽省。

王任重又问：你们是不是都搞“包产到户”啦？

万里回答：我们在搞试点。

王任重不客气地说：没有中央的命令，不能试点，要立马停下来。

万里以当时正值春耕大忙，怕影响生产为由，等收完庄稼再说，搪塞了王任重。

这实际上是省委书记万里和国务院副总理王任重的一次交锋。而万里和王任重在农业集体化还是农业单干化这个问题上的分野，则早已出现。1978年10月，王任重坚持的是：“大寨是毛主席提倡的一面红旗，农业学大寨不能动摇”（引自1978年10月31日《陕西日报》）。同在1978年10月，万里已经在安徽宣布：“我们省不去大寨参观，也不学大寨那一套”（引自《历史不再徘徊》第134页）。万、王的另一次交锋则发生在1979年3月，即《人民日报》发表张浩那封信以后不久，王任重从北京打电话到安徽，找到正要去看戏的万里后，征求万里对包产到户的看法，王任重的本意是希望听到万里的新态度，但万里毫不客气地在电话里盛气凌人地告诉王任重，他是“秋后算账派”——“所以不管什么形势，在他领导的地域里面，就是单干也不变了”。一名省委书记公然和一位国务院副总理对立到这等地步，在新中国历史上显然极为罕见。“王任重在电话里尖锐地指责万里，二人在电话里争吵达半小时之久”。但接完电话，万里却对在走廊里等着陪他去看戏的工作人员谎称“副总理同意他的意见”（参阅《历史不再徘徊》第141页）。

1980年8月，国家农委在北京召开人民公社管理经营会议。国家农委主任王任重和副主任杜润生，各自起草了一个讲话稿。交李先念副总理审查。王任重特别强调集体经济的优越性，杜

润生则强调允许地方搞“包产到户”。二者针锋相对。

李先念批示：“王（任重）的讲话很好，内容、文字均好。”同时指出：“王、杜两人的讲话精神应当统一，不能两个调子……”

李先念同志是坚决反对“包产到户”的。1979年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有人讲到农村出现“包产到户”受群众欢迎时，李先念当场就讲：“包产到户”不宜提倡，中国单干了几千年，还是没粮食吃，还是受穷嘛！此后他又多次讲过反对“包产到户”，有人提出可以试验，他反驳道：“几千年都是小农经济，已经试验过了还要试验什么？”（引自2011年3月8日《作家文摘》）。

根据李先念的指示，王任重亲自动手，大刀阔斧修改了杜润生的讲话，并把有人提出可以允许先搞“包产到户”试验时，李先念回答：“几千年都是小农经济，已经试验过了还要试什么”的话，也加入了杜润生的讲话。

王任重的讲话为这次会议定了调，杜润生自然不好另吹他的号，但他特意再次安排安徽的周曰礼上台发言，让他坚持把“包产到户”的话说出来。

周曰礼发言的题目是《联系产量责任制的强大生命力》，主要讲了三个观点：一、包产到户没有削弱、瓦解集体经济，相反，它有利于在贫困地区加强集体经济；二、“包产到户”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三、“包产到户”是一种责任制形式，他说，由于“包产到户”在生产队统一领导下进行，土地仍属国家和集体所有，农户仅仅按规定承包耕种，既没有改变所有制形式，又符合按劳分配原则，他同时借所谓“用他们的话来说，队不如组，组不如户。”

周曰礼的发言历时两个小时，他代表安徽省的发言，再次遭到与会者一致批评的重围，其焦点是，“包产到户”到底姓社还是姓资？面对众口一词的严厉批评，周曰礼哭了。

只有杜润生安慰周曰礼：“别急！沉住气！不能不让人家讲话，你们实验的结果有利，懂吗？这不是最后的较量！”

会后，国家农委以《纪要》的形式转发了这次会议的精神，强调两个坚持：“坚持农村社会主义阵地”；“坚定地走人民公社集体化道路。”

周曰礼郁郁寡欢地回到安徽后，暗地里受到高层人士支持和默认的万里，听了周曰礼的汇报后决定：不传达，不贯彻。

此后，不几天，就在安徽独树一帜，大规模实行“包产到户”的情况下，万里与到安徽视察工作的一位长期从事农村工作的农业部京官又发生了面对面的交锋，那场面可谓惊心动魄：

京官说：“包产到户”，不同于田间管理责任制，没有统一经营，不符合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性质，不宜普遍推广。

万里答：“包产到户”，是群众要求，群众不过是为了吃饱肚子，有什么不符合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行？

京官：它离开了社会主义方向，不是走共同富裕道路。

万里：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你要什么？

京官：我要社会主义！

万里：我要群众！（引自 2011 年 3 月 1 日《作家文摘》）。

后来杜润生谈到这次争论时说，失去群众支持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但是，连社会主义都不要了，还谈得上群众支持的社会主义吗？

后来万里回忆这一段的情况也说——我们这些做法既不符合宪法中规定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也不符合中央文件规定的“不要包产到户”，当时“就是这种‘违法乱纪’的情况”（见 2010 年第 9 期《中国作家·纪实版》）。既然中央规定可以不理睬；国家宪法也可以不理睬，那还有什么不能干呢？如果各方诸侯，今天也依此办理，不管党中央和中央政府的规定，不管宪法和宪法之下的所有法律法规之规定，各行其是，中国将是一种什么局面呢？

第八节 一个老外和中国高官的交锋

人们不会想到的是，在中国千千万万村庄里，为包产到户爆发出千万次激烈争论的同时，一个外国人也加入到了这场发生在中国的争论中。

此人就是美国人韩丁。

韩丁于 1919 年生于芝加哥一个知识份子家庭，父亲早逝，母亲是一位一生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家。是她一手抚养了儿子韩丁和两个女儿。

韩丁 17 岁时，就靠一路给货船洗碗打杂，开始周游世界。1937 年他途经日本统治下的东北，第一次来到中国。然后经苏联、波兰、德国返回美国。由于受斯诺《西行漫记》的影响，以后又多次来到中国。1945 年，他就在重庆会见了正在那里与国民党谈判的毛泽东、周恩来。1948—1953 年，韩丁目睹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他还在解放区培训了中国第一代拖拉机手。1948 年，韩丁参加了由北方大学教职工组成的张庄土改工作队（张庄是山西省长治市郊区的一个村庄），亲自经历了那里的土改全过程，目睹了土改给翻身农民带来的喜悦，给中国这块古老的大地带来的蓬勃生机和巨大变化。在此期间他做了大量的笔记。后来根据自己的亲闻亲见和笔记，完成了几十万字的长篇纪实著作《翻身》，对张庄的土改进行了真实的描绘和由衷的礼赞。这本书在美国出版发行后，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不管是敌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人，还是向往和支持中国革命的人，都把这本书当作了解中国的蓝本。周恩来总理对这本书给予了高度评价。

1971 年，是中美关系处于重大变化的时期。周恩来再次邀请韩丁来到中国，并于 1971 年 5 月 24 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韩丁和夫人雷州安、韩丁的妹妹寒春、妹夫阳早，韩丁的

女儿卡玛，外甥阳和平，并帮助韩丁重返他长期思念的张庄。

韩丁到张庄后，像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立即深入社员家中，了解群众生产、生活情况和张庄 20 多年来发生的巨变。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还和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和张庄农民一起赶马车，去张庄水泥厂和工人一起抡锤粉碎石头；到张庄学校和那里的学生一起听课，一起跳美国佛蒙特的木屐舞，经常端着碗，和社员们蹲在村头、树下一起吃饭、聊天，指导张庄农民搞科研。在韩丁的帮助下，张庄农民研制出了百米圆型喷灌机，并亲自为张庄设计制作了螺旋提升机……

在这种亲密无间、心心相印的交往中，韩丁和他在《翻身》一书里描写的主要人物郭真宽等老农民，和王金红等基层干部，亲如兄弟，他曾邀请他们到他的美国农场去参观，到他家里做客，向他们介绍美国的大农业。

在韩丁的帮助和指导下，张庄从 1978 年开始大搞机械化，很快就使张庄有了施肥机、平土机、收割机、烘干机、喷灌系统……张庄因此成了山西省推行农业机械化的试点。

由于大力推行机械化，张庄的农业生产效率得以大大提高，而且使过去社员们流大汗，出大力也干不完的农活，一下就“变得轻松”起来，极大地减轻了社员的劳动强度。使社员也增加了收入，比如，1979、1980 年那两年，附近其他大队，一个劳动日只拿几角钱，张庄已超过 1 元，而且一个小小的张庄，集体一年就能拿出 26 万元现金发给社员，每人 100 元，谁家建房集体补助 100 元。那时的 100 元可不是个小数字，在笔者家乡，中学生一个学期的学费就 10 元钱。村里装自来水，社员不用出一分钱，水管接到每家每户，你只管扭开水龙头喝水。全年的生产资料，比如，化肥、农药、种子及电力、柴汽油、机械维修、耕畜饲料等等，社员都不用出一分钱，全由集体包揽。

韩丁认为，像张庄这样的村庄就不能分田单干。就在分田风席卷中国大地之时，韩丁找到了时任国家农委副主任杜润生。

被称为农村“改革之父”的杜润生，当时正在以满腔热情不遗余力推行分田到户。韩丁和杜润生争论的焦点，就是像张庄这样的地方分还是不分，是对中国农村走什么道路的抉择。

对于这场争论，笔者未见到媒体的详细披露。但有关媒体在涉及这场争论的报道中，有这样的对话——

韩丁说：“我不干涉你们的政策，但张庄有张庄的情况，不能一刀切。”

杜润生回答：“你有一个张庄，我得考虑整个农村。中国有多少地方不分地就得发救济粮，甚至饿死人！”

这位“改革之父”的话，显然有点危言耸听。1978年前，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大地上，除了极少数偏僻山区是分田到户，99%的农村都是集体化耕作，他们难道都是靠救济过日子吗？如果全国99%都是集体经营的农民要靠救济过日子，“救济粮”又从哪里来呢？

其实，韩丁不光对张庄的情况非常了解，那里的机械化就是在他的具体帮助和指导下搞起来的。但他看到的远不止一个张庄。

韩丁对大寨就非常了解。他先后九次到大寨考察，其中五次是集体化时期，四次是大寨遭到批判，搞了分田单干后，对大寨的前后情况进行了认真调查研究。

当时，中国一些倡导改革的年轻经济学家认为，1980年有30%的人民公社发展得好，30%经营得差，中间的40%有发展潜力，也存在不少问题。韩丁在他后来出版的《大逆转》中，这样写道：“我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里，合作化能取得30%的成功，已经是非常难得的成就，这意味着2亿4千万人进行了很好的合作，既然这么多人能够进行合作，那么合作化确实是中国农民一条可行的出路。2亿4千万农民能够通过政府的帮助和重组以及他们个人的努力，开展很好的合作，那么对于中间那40%的3亿2千万人也一样可以。”“这就是大寨

在毛泽东时代，成为典型在全国宣传这一问题的重要所在。”韩丁接着说：“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国 30% 的村庄沿着大寨的模式，发展的很好；另外的 40%，显示出很大的潜力，但仍存在不少问题；最下的 30%，或者歪曲使用或者根本不采用大寨模式，陷于停滞之中，这部份农村确实很穷，联产承包制是对这 30% 的回答……于是政府在全国推行，掀起一股新的风潮，不管中间的 40% 和发展很好的 30% 的农民怎么想，强迫他们必须走同一条路”（引自《大逆转》第 148 页）。

韩丁使用的是当时一些年轻经济学家的数字。

1980 年后，中共中央在山西省有关农业学大寨的报告上作的批语则肯定：“全国各地学大寨的农业先进典型绝大多数在生产、建设上都是有成绩的，有贡献的。”

在韩丁看来，按照中国那些倡导改革的经济学家的估计，“30% 发展得好”，张庄无疑就是那“发展得好”的 30% 中的一个村庄。那时候，张庄因为使用机械化，“平均下来，每人每天可以生产 400 斤粮食，在山西省是算最高的了”（引自 2008 年 12 月 5 日《文摘周报》转自《先锋国家历史》）。这正是韩丁在张庄大力推行农业机械化，提高了生产效率的结果，也是事关集体化生死的大问题。

1982 年，韩丁重返张庄，他认为“张庄之所以有特殊性，就是在集体化的基础上，农业机械化搞得好，如果土地一分，什么都完了”（引自 2008 年 12 月 5 日《文摘周报》）。

这就是韩丁和杜润生争论的焦点，也是他认为分田到户“不能一刀切”的理由所在。但是，对于大权在握的杜润生，他认为“整个农村”如果不分地就要发“救济”，唯有分地到户，让农民自个儿到地里去刨食，才能解决中国的吃饭问题，中国才有出路。对于一个外国人的话，即使他有一万条理由，作为坚持分田到户的“改革之父”当然也是不会听的。

于是尽管张庄已经拥有平土机、施肥机、除草机、收割机、

烘干机、喷灌系统——实现了从平土、播种、施肥、除草、收割、烘干到烘干后粮食入库的机械化，劳动效率比以往提高15倍，而花费只需要原来的一半，以致成了山西省推广农业机械化的试点，成了全中国机械化生产率最高的村庄之一，尽管张庄的干部和群众都坚持要搞集体化，因为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更有利于大型机械化的推广和使用，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而大大减轻农民的劳动强度和减少花费”。但是，来自上面的分田狂涛，汹涌澎湃，势不可挡，张庄自然在劫难逃。

张庄大队党支部书记王金红，好多年后在谈到被单干狂涛冲击的1981年时，依然心有余悸。他说：“这一年很难”，每次到上面开会，领导都讲：“不管什么理由，必须跟中央保持一致，别的村都搞了，就你不搞？”

这话已说到底了。就是不管你是什么情况，不管你有什么理由，必须分田到户。不分田到户，就是不“和中央保持一致”，就是和中央有二心，也即是反中央。这样的大帽子谁戴得起？这样的压力谁承受得了？而且，“别的村都搞了”，你敢不搞？张庄党支部在这种压力下，当然不敢不执行上级的“命令”，只能“和中央保持一致”，分田到户。

于是，在张庄就出现了这样令人揪心的情景——

施肥机、喷雾器、喷灌系统、收割机、干燥机……都躺在院子里，慢慢地锈烂，默默地叙说着那个过去的年代和那个年代的辉煌……

当权力高于一切的时候，在权力掀起的那股分田到户的狂涛面前，别说一个韩丁，即使十个韩丁也注定要失败。张庄给予我们的回答不就是这样吗？

第九节 “不换思想就换人”

对“包产到户”的两种尖锐对立的看法，无论在上面还是

在下面，一直在争论不休，乃至针锋相对。

1980年初，时任国家农委副主任后来被人称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的杜润生，在中央长期规划会上，率先提出了在贫困地区试行“包产到户”的主张，并拿出了一个文字稿，将“只要群众要求就允许包产到户”作为一条“原则”，拟作为中央文件发出，邓小平表示赞成。

但是，在紧接着召开的中央省（市区）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多数与会者都不同意“只要群众要求就允许包产到户”这条“原则”。他们认为，包产到户仅限于贫困地区，其他地区都不能允许。这就与杜润生提出的邓小平赞成的“原则”，形成尖锐对立，甚至弄得这样的高层会议都“无法继续”（引自2008年12月5日《文摘周报》），这大概是中共执政以来前所未有的事情。

在这种情况下，坚持包产到户的杜润生、万里、胡耀邦等高层领导，随即商量对策，并由杜润生“巧妙”地改写文件，最后成为后来著名的1980年75号文件。

文件中最重要变化，是杜润生在原来的草稿上加了一段话——“集体经济是我国农业向现代化前进的不可动摇的基础，但过去人民公社脱离人民的做法必须改革，在现有条件下，群众对集体经济感到满意的，就不要搞包产到户，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可以包产到户，并在一个较长时间内保持稳定”（引自2008年12月5日《文摘周报》减五P44）。

现在人们已经看得十分清楚，杜润生在增加的这段文字中采用了以退为进的策略，欺骗了当时的许多人。

第一，“过去人民公社脱离人民的做法必须改革”，他使用了以点概面，抓住一点否定全盘的手法。某些人民公社的某些干部，确实存在脱离人民群众的做法，但不是所有人民公社的所有干部，都脱离人民群众。那是属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应

当也可以克服和纠正，但不能因为人民公社中某些干部“有脱离人民的做法”就整个否定人民公社，解散人民公社。解散人民公社以后的几十年来，各级党政组织中的官员们脱离人民，前“腐”后继，掠夺人民，欺压人民的事，比比皆是，是不是这些组织都要解散呢？

第二，分田到户，就是单干，还谈得上有什么“集体经济是我国农业向现代化前进的不可动摇的基础”呢？分田到户，就必然动摇而且无可避免地要瓦解“集体经济的基础”。“农业现代化”也就成了一句空话。分田单干30多年的实践已经无可辩驳的证明：小岗村作为包产到户的发源地，集体经济已彻底崩溃——2004年，安徽省委派出省财政厅干部沈浩到小岗村任村支书，不仅连欢迎沈浩“写标语的墨水、纸张都是借钱买的，村里没有一分钱”，而且“还欠着四万多元债”就是证明。由此可见，杜润生一方面在全国推行包产到户，一方面又说什么“集体经济是我国向现代化前进的不可动摇的基础”，岂不是欺人之谈？

1980年2月，万里升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主管全国农业，大权在握，这位被“尊”为“中国农村改革的真正先驱”，“真正的圣明天子”（见《历史不再徘徊》第92页），更是以非凡的“胆略”和“气魄”，全力以赴推行小岗村分田到户的农村改革。

然而，这样作完全违背了中央文件规定。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还专门发出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重申“人民公社要坚决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稳定不变”，“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必须受到国家法律切实保护”等。1980年9月，中央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文件中明确规定：“经过二十多年努力，农村集体经济在多数地方已经得到巩固，农业集体化方向已为广大农民接受。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农业的生产力有了较大提高……。在我国条件下，不能设想可以在一家一户的小

农经济基础上，建立起现代化农业，可以实现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和商品率，可以使农村根本摆脱贫困和达到共同富裕。因此，毫无疑问，农业集体化的方向是正确的，是必须坚持的”（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43页、544页）。但是，万里等人完全置中央规定于不顾，一意孤行，在中国强行大搞分田到户。

这种违反中央规定，也违背民意的做法理所当然面对着反对分田单干的重重阻力。

在下面，频频传来的消息就是一派混乱。成片的土地被瓜分得七零八乱，凡是好地大家竞相争抢，最后只得分割成一块一块的小碎片。人们说这哪里是在种地，简直是在“捞面条”。牲口分了，农具拆了，拖拉机被大卸八块，劳动少的人家唉声叹气，五保户更是冷泪横流，民办教师丢下满教室的孩子回家种地去了。本来是一块平展展的好地，现在被几家瓜分，你要种粮，他要种棉，机械化完了，水利化也完了。好一个乱字了得！在上面，国家农林水利口官员，从国家必须实行农业机械化、水利化才有出路的大局考虑，都反对分田。国家农委在他们主办的用以指导全国农村工作的刊物《农村工作通讯》上，更是旗帜鲜明地指出：“人心一散，各奔前程，集体经营没有了，基本建设不搞了，科学种田搞不起来了，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就被破坏了”；在下面，中央召开的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多数人不同意搞包产到户。据万里等人后来回忆，在省委书记中，只有辽宁任仲夷、内蒙周惠、贵州池必卿三人同意。在当时的30个省（市、区）中，只占十分之一。但是，即使在任仲夷主政的辽宁，直到1980年12月10日的《辽宁日报》，也还在解答“包产到户”的有关问题时指出：“党中央允许一部份地区实行‘包产到户’”，“是作为在困难地区联系群众、发展生产、解决温饱的一种必要措施，而不是到处搞包产到户”；文章同时指出：“特别是‘搞大包干’的形式，副作用就更明显。

有些群众总结包产到户是‘天灾抗不了，人祸顶不了，干部管不了，农机用不了，劳动累得不行了’，所以其前途还是集体化。”能说《辽宁日报》反映的不是群众呼声吗？

河南省一位县委书记。甚至编出一首顺口溜，概括了“包产到组”后的“巨大变化”：

耕地累死牛，
用水打破头，
拖拉机不用了，
大片土地成了花布头。

就在万里治下的安徽，直到1979年夏季，还有人对当地包产到户后的农民行为和农村景象，进行了这样的概括：

集体干分掉了，
人心干散掉了，
干部干瘫掉了，
耕牛干死掉了，
农具干毁掉了，
机械干锈掉了，
公房干倒掉了，
大田干小掉了，
科学干停掉了，
公活干歇掉了，
教育干低掉了，
贫富干大掉了。

“此文上达京城，令人触目惊心，农业部一位副部长惊叹道：‘我的天呀！这些农民正在干什么呀！’”

于是，“官员们再也顾不上字斟句酌，细嚼慢咽。在他们掐灭烟头怒发冲冠拍案而起的时候，就谈到了下面这些话题：

‘万里这家伙到底要干什么！’

‘什么解放思想，我看是天下大乱！’

‘搞包产到户比‘四害’横行还坏！’

‘我们这些老同志可要保持革命晚节，坚决顶住复辟风！’”
(以上均引自《历史不再徘徊》第 178—179 页)。

由此可见，要在全中国推行分田单干，并不像喝蛋汤那么轻松。万里断然采取了两步棋。首先他利用手中大权，撤消了国家农委，拔掉了反对“包产到户”的一颗硬钉子，成立了以积极推行分田到户的国家农委副主任杜润生为主任的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取代国家农委；与此同时他采取的另一步棋，就是用支持分田单干的材料影响中央高层人物。据原国家农委一位官员披露，“为了扭转人们的观念，万里每天都要求将支持改革的文章和调查报告，交送中央高层审阅”（引自 2008 年 3 月 3 日《新京报》农三 P55）。

这就是万里。身为省委书记时，对国家农委发出的强调要“坚定走人民公社集体化道路”的文件，因为不合自己心意，就以“不贯彻，不宣传”进行封锁抵制；身为国家领导人以后，对来自下面各级组织和各地群众的声音，则只将“支持改革的文章和调查报告，交送中央高层审阅”，而将其他与自己心意不合的文章、报告、消息，则压住不予上报。这就使下面不能了解上面的政策精神，上面则无法完整而准确地了解下面的真实情况。中国很多事情，不就是被这种以个人好恶为标准的官员，欺上压下，报喜不报忧，甚至用个人意见强奸民意的恶劣作风搞坏的吗？

但是，在集体化道路上运行了几十年的各级干部和广大农民，都目睹了集体化给中国农村带来的巨大变化，给中国农业带来的无比生机，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懂得，只有坚持集体化道路，中国才能走向共同富裕，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他们对为什么要把中国退回到合作化以前的一家一户单干，不理解、不支持也不赞成。

在推行小岗村“包产到户”的过程中，遭遇到来自广大干

部和农民的重重阻力后,高层提出了“不换思想就换人”的“原则”。而且,这个“原则”一出台,就成为后来被称为“分田派”官员们推行小岗村模式的杀手锏——谁不搞分田单干,谁就下台。于是,接踵而来的就是,各级班子大调整,各级干部大换血。

据杜润生回忆,河北省是他和胡耀邦都认为是“死堵”党内高层分田到户的省份。为此,胡耀邦指派杜润生去河北督促分田。杜润生到河北后,下车伊始就以“钦差大臣”的派头在河北省委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上,大讲“包产到户”,并在会上极力吹捧和推荐河北省唯一的分田积极份子、邢台地委书记邢崇智及其推行的“五统一”经验。

但是,杜润生的讲话,并没有说服大家。在这种情况下,胡耀邦只好亲自出马。驾临河北后,胡耀邦在大会上严词批评了河北省委,指责他们“耽误了三年时间,要抢回来”。随即将原河北省委书记调离,指派高扬去河北主政(参阅杜润生口述——《中国农村体制改革重大决策纪实》200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第130-131页)

由于胡耀邦、杜润生、万里等人,以撤职相要挟,才勉强在河北推行了分田到户的改革新政。

杜润生主持分田单干后,最担心最恼火的是“三五牌干部”(五十年代参加工作,五十多岁年龄,五十多元工资的干部)反对分田单干。这是一大批干部,他们经历了合作化的全过程,很多人是合作化的带头人,为合作化出过大力、流过大汗,作出过不小的贡献;对中国农村实行合作化以后,依靠集体力量,在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治山改土,推广科学种田,大力推广良种、推行农业机械化等方面取得的成就,既是参加者又是见证人。因此,对这一大批人,采取的组织措施格外严厉。据有关资料披露,在省委书记中主张分田单干的三个积极份子之一的任仲夷,在辽宁对农村基层干部采取的组织措施,几乎是一扫而光,他们打着“猛揭狠批四人帮”、“批极左”等等的幌

子，撤销了一大批基层干部的职务。大连市某郊县一位公社书记曾披露，连公社的宣传干事、组织干事都不放过，更不用说公社书记、社长这个级别的干部了。在河南，全力实现焦裕禄遗愿，带领兰考人民成功治理了“沙、涝、碱”三害的整个县委班子和公社干部群体，几乎都被打成反革命。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的优秀事迹，被说成是瞎编的而否定，焦裕禄展览馆被封掉，大批宣传焦裕禄同志英雄事迹的材料被烧毁（直到1996年以后才又恢复开放）。焦裕禄同志的亲密战友、原兰考县委副书记兼县长、治理“三害”时期的县委书记张钦礼，被判刑十三年，副书记杨捍东被判刑五年。据杨捍东后来回忆，新派来的县委书记刁某，居然在一次常委会上就莫名其妙地免去了18名公社书记的职务。为了推行小岗村的分田单干，对党的基层干部进行如此大规模清洗，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据说即使战争年代也没有出现过。在这种“不换思想就换人”的“原则”指导下，把小岗村作为一个政治符号、一种政治需要，在全国强行推广，而将占中国98%的集体经济，无论搞得好的还是搞得不好的，统统砍杀，把人民群众几十年积累起来的集体财产，几乎彻底摧垮，以致使不少地方的农民痛心地说，他们说这是一种倒退，在更深层次上更是一种文化的坍塌，后来的事实证明难道不是这样吗？

第十节 “吉星高照”小岗村

当今中国是个贵人时代。有人用“十年寂寞无人问，一遇贵人便升天”来形容。此言也许有点夸张。但不管什么人，只要和贵人沾上点边，往往就能飞黄腾达、身价百倍，却屡见不鲜。比如，一个贫困山区的小孩，平时谁也不会管他，一旦有某位贵人抱了一下，立即成为明星，各种关怀、温暖、恩泽，就会纷至沓来，小孩乃至小孩的一家都会“旧貌换新颜”。再

比如，某个贫困山村，如果幸得某位贵人光临，随手揭开某家锅盖，看到锅里煮着的是野菜之类，立即就有上级领导送来温暖，送来米啊、面啊、油啊、慰问金啊等等，那是泰山都挡不住的。这类大喜大幸之事，人们在电视上见的还少吗？

小岗村也不例外。尽管它的“包产到户”，比安徽的来安县、肥西县不少生产队都晚，但因为有万里多次光临，并把它称为“干了中国共产党几千万党员不敢干”的事，立即在政治上赢得了金光耀眼的光环名播全国。于是，全国各地捐赠的各种物资源源不断从四面八方涌入小岗村，表示支持。甚至连日本驻上海领事馆，也与凤阳县农业局签订了一个合同，由日方支援1000万日元（当时相当于67万人民币），由中方在小岗村搞农业开发。去小岗村学习、参观、考察的各级领导和各界人士更是络绎不绝。江苏省张家港市的长江村，除了给小岗村每家每户送彩电，帮助小岗村发展葡萄业和其他副业之外，还一次投资120万元巨款，帮小岗村修了一条平坦宽阔的“友谊大道”。不是说要想富，先修路吗？长江村可是帮到了点子上啰！

令人惋惜的是，长江村为小岗村修起了漂亮的水泥马路，小岗村却没有富起来。而且，当长江村来小岗村投资修马路的时候，有的人居然提出，要把人家捐赠的修路钱分掉，把长江村负责人弄得有点尴尬。

直到小岗村改革20年后，虽然得到了不少外援，却依然停留在包产到户一年就达到的“温饱水平”，依然“盖不起房，修不起路，用不起电话，吃不上自来水，没有一所学校，没有一家企业，甚至没有一处称得上‘卫生’的厕所”。因此，作家用“江山依旧，旧貌犹存”来描写这个被称为中国农村“改革先锋”的小岗村在改革20年以后的面貌。

誉满中国，名震全球的“改革明星”，长期处于这种不乏寒酸的状况，那不是败坏改革的名声吗？

果然，小岗村时来运转，迎来了“吉星高照”。

那是1998年6月中旬，即小岗村改革20周年将临之际，安徽省委一位领导亲自率领省交通厅、省建设厅、省教育厅、省水利厅、省卫生厅、省新闻出版局等有关厅局的大员，在市、县领导陪同下，光临小岗村。因小岗村名声远播后，前来参观、采访、考察、学习或者指导工作的各色人等实在太多，他们往往是蜻蜓点水式的这里走走，那里看看，小岗人对此早已见惯。因此，浩浩荡荡到来的省市要员，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注意。

然而，此时光临小岗村的众多要员，却是小岗村“旧貌换新颜”，“鸟枪换大炮”的“福星”。

最早进入小岗村的是凤阳县教委主任徐彪，他给小岗村带来的福音，是帮小岗村建一所小学，其规模要能够容纳1—5年级5个班，共160名师生。6月破土，8月必须竣工，以确保九月一日开学时，能正式投入使用。

省建设厅、省水利厅、省卫生厅三家联手，为小岗村建造一座水塔。到底是省厅要员气魄非凡，他们说干就干，并且保证七月底完工，让小岗村人破天荒喝上自来水。

交给凤阳县县委、县政府下面六个部门的任务是：由建委牵头，六家共同出钱，帮小岗村所有人家的住房，一点不拉全部刷上涂料，让整个村子的面貌“焕然一新”；此外，还要为每户建一个“卫生厕所”；如此等等。有省、市、县三级要员出马，自然一切好办。你看，由滁州市委、市政府和凤阳县委、县政府合作出资300万元，在小岗村占地30亩，建筑面积2600平方米的红色旅游景观——巍峨的大包干纪念馆，很快拔地而起；村支部、村委会办公室，被装修得亮丽堂皇；县建设局则按照省建设厅的要求和规划，设计了40套村民住房，按上级规定，所需经费由县委宣传部、县计生委、县卫生局、县供销社、县人武部、县建委联合出钱。但工程建好后，总共耗资23万多元，却有5家不肯出钱，县建委是牵头单位无法赖账，只好垫付了21.2332元，余下的1.7万多元，也不肯再付，

最后成了“狗头账”。

行动最快的是电信局，接到任务后，立马就从银行贷款100万元，为小岗村每家每户装上了程控电话。电话安好后，这笔连本带息由领导指定任务的贷款，据说后来也成了“糊涂账”。

原来张家港市长江村投资120万元无偿为小岗村修的那条四公里长的水泥马路——友谊路，当时长江村只修路没栽树，以致多少年以后，友谊路两旁依然光溜秃秃，当然令人扫兴。于是，凤阳县林业局奉命组织人马开进小岗村，他们的任务是在友谊路两旁栽上绿化林。当时正值酷暑，炎热难当，树能栽活吗？上级有令，自然得开动脑筋想办法。林业局自筹资金从100里外的凤台县林场买了830株名贵的蜀桧，每株都在2米以上，为了保证株株成活，他们还为此搞起了科学试验，将每株蜀桧的根部都包上“营养土”，连夜抢运弄回小岗村，然后精心栽培，按时浇水，日夜守护。果然苍天不负苦心人，他们居然创造了酷暑植树，株株成活的奇迹。林业局的技术人员专门为此撰写的科研论文，还获得了安徽省的科技进步奖呢！

以上工程总计投入270多万元，各单位自备的各种材料、工具、人力等等当然不在内，那是无法统计也不须统计的。为装点全国的改革明星村，贡献一些人力、物力、财力，难道不是责无旁贷、荣光之至的事情吗？

当然，光有这些装点，还不足以显示小岗村焕然一新的“品位”。于是，省财政拨下200万元专款，为小岗村修了一条8公里长的柏油马路，以便于领导视察出入。在村头修一座颇具规模的牌楼，以显示改革明星的气派；县里专门为小岗村布置了展览馆，并且连讲解词也代为写好了；在村西头新修了整齐的院墙，把村里破破烂烂的房舍遮挡起来，以免影响小岗村的形象……

20多年来，小岗村的上级和上级的上级，一直在为装扮

小岗村不停地忙碌、奔波、运筹，他们为把小岗村这个自己的“政绩工程”装扮得更加亮丽、辉煌，可是下了大力气，费了大心血。至于其他似乎少有人关注。

然而，当这许多工程组成的人间美景，像变魔术似的，突然出现在小岗村人面前时，他们并不知道这种“改天换地”的“玄机”在哪里？目的是什么？难道真的是为小岗人造福吗？

直到1998年9月22日，中共总书记江泽民突然光临小岗村，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一切，都是为江泽民搞的，是给江泽民看的。由省委领导率领那么多省里大员亲临小岗村精心策划、具体指导，由省里和市里、县里那么多部门一齐出动，不惜本钱，在短短三个月时间内，给江泽民摆好一幅小岗村改革后的美妙图景，使小岗村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由“温饱”跨入了“小康”，这种魄力和胆略，如此关怀如此恩泽，小岗村人做梦也不曾想到。

但是小岗村人对这种“改天换地”的事情，并不领情，仿佛村里发生的一切都与他们并无关系。

水塔修好就要送水时，修水塔的工人老大哥在炎天暑地上苦力的干活，唇干舌燥想喝口水，小岗村立即有人站出来，说：“那不行！得拿啤酒来换”；路旁栽蜀桧得用土培，小岗村人可不客气，要用小岗土吗？那得先付钱，每平板车10元，少一文也不成。谁说小岗村通过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意识不浓？那土的价格比凤阳城里还贵一倍呢！

小岗人当然不傻。他们说，你早不帮，晚不帮，单选江泽民要来看小岗村了，小岗村的小学也开学了，墙也带彩了，路也变平了，“大包干”展览馆也冒出来了，路旁的两排蜀桧也绿树成林了，家家户户电话也通了，厕所也变了，自来水也喝上了……除了傻子看不出来，小岗村一下“小康”了，根本不是变给小岗人看的（参阅陈桂棣、春桃著《中国农民调查》）。

我不知道，那些为迎接江泽民到来，在小岗村做了那么多

“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的大小官员们，听了小岗村人的这些议论，作何感想啊？

第十一节 敲开了中南海“北门”的村长

看了这个标题，读者也许以为笔者在说笑话。村长敲开了“中南海”的“北门”？中南海是什么地方？那是党中央、国务院所在地，是全中国人民心中最最神圣而又最最神秘的地方，能随便去吗？但是，中国之大，能人无处不在。有一位能量非同一般的村长，硬是不费吹灰之力，就敲开了中南海的“北门”，走进了那个神秘而又神圣的地方。如若不信，且听在下慢慢道来：

说的是2002年元旦前夕，位处江淮平原的凤阳县已是寒凝大地，朔风如削。此时，人们非特殊情况，一般不再出远门。

突然有一天，凤阳县衙里的何效平、孔少林两位县太爷和水务局副局长朱士银，火急火燎找到小岗村村长严宏昌，说：“快，马上跟我们进京去！”

县太爷们进京怎么还来找村长陪同？如此急于星火，到底有什么大事呢？

原来凤阳县在人民公社大修水利时，也修了一座规模可观——20里长、10里宽的燃灯寺水库。几十年来，这座水库一直肩负着包括小岗村和小溪河镇在内的凤阳县东部缺水地区六个乡镇的农田灌溉和农家用水的重任。是凤阳县里极其重要的水利命脉，是这六个乡镇人民的生命之源。但是经过几十年运转不息，而且年久失修，已是“身疲力竭”，老病缠身，不堪负荷，急需进行综合治理。被严宏昌称为“摇摇晃晃”的县里财政颇为吃紧，市里省里大概也不想出这笔钱，他们便决定打“小岗牌”，找国家水利部要钱。当然省、市、县三级组织都得出面。这就是二位县太爷找村长严宏昌的缘由。

第二天一早，严宏昌跟着省、市、县三级头头，便赶到了国家水利部。

水利部的高官当然不是谁都能见的。他们只放行了省、市、县的官员，严宏昌和那位县水务局副局长朱士银大概是级别不够，都被挡了。可是，不一会，省、市、县三级官员也无精打采地走了出来。因为水利部每年只能为有限的几个水库灌区安排治理问题，上一年才帮安徽肥东县解决了一个水库治理项目。全国八万六千多座水库，水利部就这么多钱，总不能年年都给安徽吧？凤阳县的燃灯寺水库，再急需治理，“至少得等到四年以后”。人家说得非常明确，也说得合情合理，这是没有商量余地的答复。

于是，省、市、县三级官员各奔东西，准备办完自己的事情，便打道回府。

严宏昌和朱士银都还想在北京待几天。对于他们来说，来一趟北京毕竟很不容易。

坐下来一想，严宏昌和朱士银都有几分懊恼，如此无功而返，岂不是白跑一趟！

突然，严宏昌问朱士银：“你身上还有多少钱？”

“还有四五百块。”朱士银显然还没有弄清严宏昌问钱的缘由，信口回答。

严宏昌心中暗喜，说：“那就再试一试，明天还去找水利部。”

第二天，他们刚进了水利部大门，就被办公厅的官员拦住：“你们安徽一些领导昨天才来过，这事不行。走吧！走吧！”边说边往外推。

严宏昌却不甘心，说：“我找部长，只说两分钟。”

“找部长？你要找部长？谁都可以随随便便找部长，那部长还能工作吗？”那官员手一挥：“走！走！走！”

严宏昌一见这光景，心中便生出些不悦。他可是进中南海

告过御状的人物，受到过万里多次接见，而且据说还是政治局安排的，难道要见见部长都不行吗？只见他飞快地写了一个条子：“我来自安徽小岗村，我叫严宏昌，请首长耽误五分钟，让我汇报一点事情。”

他有意亮出了举国皆知的小岗村这块金字招牌。

谁知对方居然连瞧都不瞧，就把条子扔在桌子上：“这是不可能的！”

但严宏昌就是不走，他屁股一挫就在椅子上坐了下来，也招呼朱士银坐下，然后好言好语，一再恳求对方把条子递上去。

终于，对方被感动了，说：“我拿去试试吧！”

没想到这一招还真灵，不一会就出来个大男人，严宏昌想，这大概就是部长吧？

果然是部长。他笑着问：“你就是凤阳县小岗村的严宏昌？”

严宏昌连忙点头：“是！是！”接着向部长汇报了燃灯寺水库的治理问题。

听完严宏昌的汇报，部长说：“部里确实年年有这方面的指标，可现在已经到年底了，实在没有办法。”

“那明年呢？”严宏昌紧追不舍。

“即使明年安排，也必须得到国家项目规划部门的批准才行呀！”

水利部长的话无意中点燃了严宏昌心中的一盏灯。走出水利部，严宏昌拉着朱士银，立即直奔负责审批项目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谁知，一进大门就被两名站岗的武警战士拦住了。正在和战士交涉时，电梯里走出来一个人，那人立即被严宏昌的凤阳口音吸引住了，不无意外地问：“你是不是小岗村的严宏昌？”

严宏昌连忙回答：“我是。”

原来此人就是国家发改委的杜鹰。严宏昌曾在中央农村改革研究室主任杜润生家里见过他。

听了严宏昌的汇报，杜鹰也只好无可奈何地说：“到年底了，不行了啊！”

“明年呢？”严宏昌照例紧追不舍。

“明年也得按程序报上来。主要还是钱的问题，你们得找财政部。”杜鹰把球一下踢到了财政部。

说起严宏昌也真是个有心人。小岗村因为被树为农村改革的旗帜，红遍天下，名震九州，去小岗村参观、考察的各级官员和各界人士可谓多如牛毛。严宏昌在接待他们时，凡是他认为对小岗村或对自己可能有用的各级官员、学者、专家、记者，他都会在本子上留下他们的姓名、电话、通讯地址等等。走出国家发改委大门，他立即打开了那个小本子，很快找到了财政部程微的手机号码，把电话打了过去。

程微给他的回答是：“财政部的钱确实很多，但也不能随随便便往下面拨呀，你们这个项目必须有全国人大管农业的副委员长批示才能立项。”

要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批示才能立项，那是谈何容易？严宏昌仿佛被人兜头淋下一瓢冷水，从头凉到脚。但他仍在翻自己的小本子，他希望从中找到一个对自己有用的大官。

果然，他找到了原来在全国人大管过财经的物资部部长柳随年的电话。他曾接待过柳随年。

出乎严宏昌意料的是，柳随年居然把严宏昌召到了家里，听了他的介绍后，爽快地说：“我给你写封信。”

严宏昌顿时喜得心花怒放，高兴地说：“柳老，有你老这封信肯定能成！”

没想到，柳随年接着又说：“如果有问题，我还可以找总理。”

严宏昌拿着柳随年的亲笔信，回到招待所就给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秘书打了电话。得知朱秘书正在河南，但温家宝在北京，朱秘书让他直接给正在北京的田秘书打电话。田秘书接到

严宏昌的电话后，立即说：“我马上向总理汇报，你不要离开，我很快与你联系。”

严宏昌简直比打了吗啡还兴奋。他点燃一支烟，有滋有味地吸了起来。一支烟没抽完，田秘书的电话就打过来了：“你明天上午八点半到中南海北门，有人接你进来，总理等着你。”

第二天上午，严宏昌被领进中南海，见到了温家宝，把报告递了上去。为便于联系，他在报告上留下了朱士银的手机号码。

温家宝接过报告，说：“我现在不能答复你，明天得和有关同志协商一下。”

有了温家宝这句话，严宏昌知道，这事已经成了。回到招待所结完住宿账，立即买好了回安徽的火车票，就和朱士银打道回府了。

第二天，严宏昌刚跨进家门，朱士银就打来了电话，激动得声音都发颤：“老严，行了，温总理已经批了！”

原来，温家宝的批示，在第一时间就电传到了国家水利部，国家水利部立即就电传到了安徽省水利厅，又惊又喜的安徽水利厅迅即又电传到了滁州水利局。很快，全省都知道小岗村的严宏昌找温家宝为安徽，为滁州，也为凤阳办了一件大事。

省、市、县三级官员得到的各部门答复是：“至少四年以后”才能安排，或者，“即便明年安排，也必须得到国家项目规划部门的批准”，必须“按程序报上来”，还要有“人大副委员长批示”。但是，因为有了小岗村这块牌子，有了柳随年写的条子，什么“至少四年以后”，什么“国家项目部门的批准”，什么“按程序报上来”，什么“人大副委员长批示”，通通都靠边去吧！严宏昌用小岗村这块金字招牌，凭着柳随年一纸条子，一下就敲开了国务院的“北门”，享受了共和国总理给予的“小灶”待遇，在全国几十万个村级组织中能有几个？如此神通不能不令人佩服之至啊！如果全国八万六千多座水库中三分之一

的病险水库，都能享受这种待遇该多好啊！

第十二节 致富“典型”，“村集体没有一分钱”

小岗村被树为中国农民的致富“典范”，而且得到国家和各级政府的各种优惠待遇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和支援。那么，小岗村到底富得怎么样了？几十年后应该家家“小康”了吧？

先说说严德友吧。他是被万里称为中国农村改革带头人严俊昌的儿子，由父亲发展入党，并在1996年接过父亲传给他的岗村党支部书记的宝座后，确实如媒体报道的那样，成了率先致富起来的典型。据有关资料显示，从2003年至2005年，在这三年时间里，他就有不少于30万元收入。2007年，他又用自己的积累投资，扩展了葡萄园，转到他名下的土地，已达200亩。

这个已归属到严德友名下的葡萄园，原本是张家港市长江村为帮助小岗村发展副业而建的示范园。长江村在2001年至2003年，在小岗村投资的这个优质葡萄园，刚刚完成前期投入，不知何故突然要转租。葡萄是“当年栽培，两年挂果，三年丰收”的速生果品，到2003年正好是第一个丰收年。也就在这一年，严德友将这个示范葡萄园，拿到了自己名下，从而获得了新的致富资本。人们不难预见，严德友的进一步致富，指日可待。这是农村改革后，普遍出现的书记率先致富的标本。

村长严宏昌也已率先致富。他的五个儿子都已成家立业。大儿子开公司，收入自然不菲；小儿子出国留学，更令人羡慕。1989年，他就花10万元盖了一栋大瓦房，宽敞明亮。严宏昌对自己率先致富非常满足，他曾对人说：“比30年前，不知幸福多少倍。”严宏昌也是干部先富的典型。

还有几家，也和严宏昌一样发了财。但这些富裕户，都不是靠种田发家，而是凭着某些特殊关系和跑运输等一般农户不

可能具备的门路，致了富。

那么，小岗村的集体经济增加了多少积累呢？

我们且听听后来被认定是 1978 年按手印带头人、村长严宏昌，在小岗村“大包干”23 年后的 2001 年春天，向前来小岗村采访的两位安徽作家，无奈地说起的几句顺口溜：“现在是，国家财政扶摇直上，县里财政摇摇晃晃，乡镇财政没啥名堂，村级财政一扫而光！”

作为村主任，严宏昌本人已经富了。他最关注的当然是村里财政，但村级财政已是“一扫而光”！他告诉两位作家，小岗村的“办公费，一分钱没有”。

2004 年 2 月，安徽省委、省政府派出省财政厅副处级干部沈浩，到小岗村任村支书。沈浩后来谈到他赴小岗村上任时的情景，说：“2004 年 2 月，村里为欢迎我写标语的墨水、纸张都是借钱买的，村集体没有一分钱，还欠四万多元债。‘大包干’展览馆陈旧不堪，村小学门窗桌椅破破烂烂，国家投资办起来的自来水，有线电视也停了（这些项目都是 1998 年为迎接江泽民视察小岗村，由国家投资建起来的，使用时间还不到 6 年——笔者注）。唯一的资本——‘名气’，如‘小岗’、‘小岗村’、‘大包干’，也都被别人注册了”。

“大包干”23 年后即 2001 年的小岗村，穷得“村里的办公费，一分钱没有”；“大包干”26 年后即 2004 年的小岗村，“村集体没有一分钱，还欠 4 万多元债。”数据胜于雄辩。这就清楚地告诉人们，“一包就灵”的“大包干”，在它的发源地，“灵”到包了二十多年后，集体经济已崩溃到“一分钱也没有”了，“还欠着四万多元债”。难怪一些媒体在报道中说：“凤阳县已经很少有人提到小岗村了，小岗在一度辉煌之后，终于在人们的视野消失了”（引自 1998 年 6 月 12 日《湘声报》农三 P12）。作为农村改革“一包就灵”的发源地，小岗村在大包干 20 多年后，集体经济崩溃到如此地步，按照小岗村“依葫芦画瓢”的全国

农村自然也难得好到哪里去。以“湖广熟，天下足”的湖南为例，截至包产到户 21 年以后的 1999 年 7 月，全省 85% 的乡镇负债，乡镇平均负债达 157 万元之巨。据《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周静恺对湖南郴州市某县调查发现，该县 1998 年各乡镇负债高达 3159.34 万元，占全县乡镇财政赤字和负债总额的 78%。“湖南乡级财政大多濒临瘫痪”（引自 1999 年 7 月 7 日《中国经济时报》减三 P15）。河南的情况更难堪。截至 2001 年 5 月，全省 2100 多个乡镇，负债总额达 95 亿元，平均每个乡镇负债 489 万元。不断有债主把乡镇政府告到法院。汽车、办公用品甚至乡镇领导的手机，都被法院查扣抵债。尤其是 79 个负债 1000 万元以上的乡镇，被法院上门封账的已不在少数。灵宝县负债 9000 多万元，仅 1999 年上门讨债的债主就超过 800 户，如果按全年 260 个工作日计算，平均每天上门讨债的债主超过 3 户（2001 年第 11 期《半月谈》减三 BP15）完全可以说那里的乡镇已经破产。湖南和河南的经济状况，在全国都属中上水平，其乡镇财政尚且糟到如此地步，其他地方也就可想而知。农村实行大包干以后，出现如此大面积乡镇，“濒临瘫痪”甚至“破产”的局面，是人民公社时期绝对不曾有过的。

2002 年 9 月，在湖南长沙市召开了一次中国“村官论坛”。9 月 23 日的《城市广播电视报》在报道这次会议时，对参加这次“论坛”的小岗村代表是这样描写的：“在日前长沙召开的中国‘村官论坛’上，小岗村村主任严宏昌在谈到小岗村近几年的贫困状况时，显得黯然神伤。”在这样一次向全国人民露脸亮相的“论坛”上，严宏昌本该眉飞色舞畅谈“一包就灵”造就的辉煌，喜笑颜开大讲小岗村一部分人富起来后，如何先富帮后富的体会和经验，为什么却“黯然神伤”说着小岗村大包干 24 年以后的“贫困状况”呢？因为这时小岗村的人均收入还不到 2000 元，30 多人常年外出打工，60% 的村民负有外债，不要说与华西村、南街村等等坚持集体化道路，年产值十几个

亿、几十个亿的村庄相差天高地远，也远远落后于全国农村的人均收入水平，这种窘迫和尴尬，不是叫这个名震天下的改革明星村、中国改革第一村，太没面子了吗？难怪连央视在采访小岗村的报道中，也慨然感叹：“到了凤阳不去小岗村，是一生遗憾；到了凤阳去了小岗，是遗憾一生”。

我们再具体看看小岗村一些贫困家庭的景况吧。

2001年即小岗村大包干23年后，有记者在小岗村采访时，曾问村主任严宏昌的亲弟弟严富昌，他家里是不是像小岗村大包干展览馆里所说那样，已经脱贫致富？他那位率先富起来的村长哥哥，是不是对他“先富帮后富”？严富昌听后直摇头：“村长没有帮过我家一分钱，现在一家一户各顾各，哪有什么先富帮后富？”

严富昌有一儿一女两个小孩，都在离家8公里左右的小溪河镇住校上初中，除了吃自己的粮食以外，一年得花3000元左右。他算了一笔账：“我家种地14亩，今年年景不好，只收了六七千斤粮食，就说每斤卖0.45元（国家规定的稻谷保护价是每斤0.53元，但在压级、压价、压称以后，实际上卖不了这个价，而且有的农民因劳力和运输的限制，很难到粮站去卖，只能将粮食卖给上门收购的粮贩子），也只能卖3000元左右，只够两个孩子念书用。”说起家里的困境，这位率先富起来的小岗村村长的亲弟弟，感慨不已：“真没想到，搞承包，把别人包富了，却把自己包穷了！”说完，他指着挂在墙上的一只空木匣和电话线说：“你们看，这就是江泽民来视察前公家给我家装的电话。没想到，不打电话，一个月也得八、九块钱。我家用不起，已经把电话送人了。”

村民缪夕五家，与严富昌家相比，就更困难了。缪夕五为供两个孩子上学，到2001年已借了五、六千元债，偏偏这一年地里歉收，生活非常艰难。屋里空空荡荡，床上乱七八糟，连一床像样的被子都没有。在无奈之下，只好让老婆背着花鼓

要饭去了。

繆夕五的嫂子李文秀这时也走进门来了。李文秀老家是四川大竹县，因不堪婆婆虐待，跑到小岗村，嫁给了繆夕五的哥哥繆夕海。说起家里的困难，顿时眼含热泪。为了盖房和供两个儿女上学，已经负债五、六千元。房子虽然盖好了，但因没钱，一直没有泥墙。每到冬天，墙缝里钻进来的寒风，冷得让人哆嗦。下雨天，房里地上湿糊糊的，走路不小心就会摔跤。说到伤心处，李文秀的泪水便溢出了眼眶。她说：“我是四川人，不会唱花鼓，要是会唱花鼓，我也和兄弟媳妇一起，背着花鼓出去要饭了……”

听起来实在令人心酸。

据村里徐家松说，全村 50% 以上的农民欠了债。少则六、七千，多则一、两万。为了还债，只好出去打工。仅合并到小岗村的原大严家村就有 20 多家外出打工。

震惊世界的中国农村大包干，包了二十多年后，怎么把这个中国农民致富的典范、中国改革第一村，包到了“村集体一分钱没有，还欠四万多元债”，那里的农民在土改翻身后就丢掉了的凤阳花鼓，怎么又“包”出来了呢？

第十三节 是历史的前进，还是历史的倒退

在高层某领导者提出“不换思想就换人”的“原则”以后，各级干部特别是农村基层干部，就面临着一个不容犹豫的抉择——要想继续当“官”，就必须按照小岗村模式——分田到户；如果你不愿分田到户，就只有摘下乌纱走人。执行不执行分田到户，是决定干部去留的唯一标准。在这种非此即彼不许犹豫的压力之下，不少基层干部为了保住官位，保住饭碗，他们能做的，就是不管你心里赞成不赞成，愿意不愿意，都得将集体所有的土地，分给个人。于是，一个强力推行分田到户的运动，

便以排山倒海之势，在全国波澜壮阔地展开。

当时，分田到户称为“第二次土改”。人们不会忘记，解放初期，在中国广大农村进行的土地改革，那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农民打倒地主阶级，把属于地主的土地——在给地主家庭留下和当地群众同等份额自耕地以后——全部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第二次”土改，则是在政府领导下，把属于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即属于每个农民共有的土地，分给个人。第一次是打倒作为“阶级”的地主，第二次则是解散人民公社。

几十年来一直属于集体所有的土地、耕牛、农具、机械、山林、圪坝、仓房等等，都按家庭和人口多少进行分配。土地有肥有瘦，地块有大有小，距离有远有近，水利灌溉条件有好有孬，在分配过程中，无不矛盾重重。于是，就把大田分割成小块，对远近、肥瘦、好孬进行抓阄分配。一家人分到的土地，西边两块，东边三块，岭上一块，沟里两块等四分五裂的现象，比比皆是。因此，骂娘的，吵架的，层出不穷。耕作时矛盾迭出，今天你的地里必须抽水抗旱，我偏不抗，但水必须从我的地里经过，等于你要抗旱就先得无偿给我抗旱；今天你要治虫，但我没钱买农药没法治虫，于是你地里的虫子，被农药驱赶，便往我地里跑；明天我治虫，虫子又往你地里跑，这种情况在农村屡见不鲜。

山林的分配，往往变成山林破坏。因为山林不仅有远近之分，还有树多树少，树大树小，材质优劣不同之别，很难按块分割，就只好砍树卖钱分款，致使很多在六七十年代栽植的人工造林，或经过几十年封山护林成长起来的满山树木，被一砍而光。即使按照分割的山林，农民分到户以后，既怕政策变，又怕别人偷，谁家也不可能再像过去大队有看山员专门看护，于是纷纷把分给自己山林上的树木，竞相砍伐卖钱。他们说：“多得不如少得，少得不如现得，没到手的钱是靠不住的。”笔者去过的不少林区，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封山护林都搞得非常

好，不经县林业局批准，谁也休想进山砍一棵树。外地人在林区连买一个木盆，都必须办理“出境证”，才能通过竹木检查站。山林分掉后，到九十年代，那里的林区再也找不到几棵像样的树了。某省林业厅一位朋友陈平先生告诉我，由于包括绝大多数林场在内，都实行分山到户，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对林业是一次空前规模的毁灭。与山林破坏相伴而来的是水土流失，土壤恶化，塘渠淤塞，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

最麻烦的是耕牛、农具、机械的分割。在笔者家乡，一个生产队普遍都是几十至一百多口人，一般就几头牛、几张木犁、几架耙、三两部抽水机、几部打稻机、几架蒲滚，有的生产队有一两部手扶拖拉机。分田单干后，多数人家没了耕牛，不是缺犁就是少耙，不是没打稻机就是没蒲滚。有限的机械更难分割，往往就只能把好端端的机械，拆零瓜分，结果只能作废铁卖。有一位我叫二叔的老邻居告诉我，某生产队分割农具时，由于各不相让，吵得不可开交，最后竟把一根新买的抽水机皮管，按户砍成许多节，各分一截，硬是把那根崭新的皮管，变成了什么用处也没有的废物。那种“我得不到，你也休想得到”的自私自利小农意识；在实行私有化的土地、农具、山林、机械分割过程中，是新中国建立以来，最充分最残酷的一次表演。

自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国家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以后，笔者家乡从生产队到生产大队，都搞粮食储备，叫作“储备粮”，又叫“战备粮”。一个生产队普遍都有几千至几万斤，一个生产大队少则几万斤，多达几十万斤储备粮。这种储粮于民的决策，无疑是一件利国利民、有备无患的好事。分田单干后，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个人的眼前利益，田地都分了，谁还愿意保存集体粮食呢？于是，通通分光。生产大队在六七十年代，普遍开展了多种经营，办起了林场、茶场、果木园、卫生所及其与之配套的药材场（基地）等等，也没有不被分光、卖光，最后被毁灭的。生产队和生产大队几十年积累起来的集体经济、

集体财产，几乎在一夜之间，全部分光卖光。笔者老家所在的双冲大队双雅堂生产队，是一个不足 20 户人家的小生产队，连保管室、粮食储存室、牛房都卖了，没卖的公房因无人维修后来也倒了；老家所在的双冲大队，人民公社时盖了一栋在当时是很不错的大瓦房，作为大队部，既是大队召开各种会议的地方，也是大队卫生所、药房所在地，分田单干后，大队部卖给了私人，赤脚医生、卫生室、药房等等自然也不复存在，直到现在（2011 年）村支两委连个开会的地方都没有，只好到支委家里去开。老家所在的公社不仅中西两全，门诊、住院兼备的卫生院很快被撤销，房子也改换了门庭，由于撤并连从解放起一直是乡政府和后来的人民公社所在地的一个大院子，也拆的拆，卖的卖，早已变得破破烂烂，几乎不复存在。

面对这种变化，很多人都不理解。一位从土地改革就入党、当村长，后来当了几十年大队党支部书记的老共产党员，曾痛心疾首地对笔者说：“真没有想到啊，辛辛苦苦三十年，这不又回到解放前了吗？这哪里是共产党的搞法呀！”

此言也许不无偏颇。但是，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走了几十年集体化道路的中国农村，又被全盘否定，重新回到和解放前几千年来一样的一家一户个体生产，对党和政府这几十年在农村的领导及其工作，到底该如何评价，是不是全都错了？这样作到底是历史的前进还是历史的倒退？

第十四节 包产到户的“漏网之鱼”

是分田单干好，还是组织起来走集体化道路好，最有发言权的当然是农民。他们说，如果有人硬要把零零落落散布在深山老林里的少数几户农民，和山下的农民组织起来搞集体化，农民肯定反对，因为那是不符合实际不得民心的胡搞。如果有人硬要把实现或基本实现了农业机械化、灌溉自流化地方的农

民，强令他们把连成大片的土地，再人为地分割成一小块一小块搞所谓“包产到户”，农民肯定也难从命，因为那同样是不得民心的胡搞。

北京市房山县（现房山区）窦店村就是一个例子。

窦店不像小小的小岗村，是一个有着四千多人口的大村庄，而且一直是县里的先进，名声远播。当大包干的旋风刮遍神州大地后，窦店自然成了上面特别关注的地方。县里除了一次又一次召开各种会议传达贯彻“包产到户”的精神，提出分田到户的具体要求，还一次又一次派人来窦店，找干部谈话，向群众做工作，施影响，加压力，说你们是老先进，必须带头，你们不分，附近大队都不动，上面规定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怎么贯彻落实？这不成了农村改革的阻力吗？干部们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

窦店的党支部书记叫仇振亮，从1955年20岁就担任这个职务，称得上老书记。此人是一个很有思想而且个性倔强的人物。

上世纪七十年代，县里组织社队干部到山东泰安参观学习，主要学泰安的农田基本建设和生产队合并。回来后，县里要求下面都像泰安那样合并生产队。当时窦店大队共有14个生产队，上面规定要合并成四个。在仇振亮看来，这是上面不了解基层实际情况的瞎指挥。有的队没有合并，还搞得不好，矛盾不少，如果把几个队再合到一块，等于把几个队的矛盾都搅到了一起，岂不更加麻烦？但你不合，就批评你不执行上级指示，又是谈话，又是通报批评，谁受得了？被上级逼得没法，仇振亮被迫也合并了几个生产队。但合并后，他就跑到县里讲，今年不减产，社员生活不下降，你把我的两个眼珠挖出来当水泡踩了！这话说得倔，也说得绝。听的人自然很不高兴。但秋后合队的果然减产，减少了收入的农民，坐在县里不肯走。这就是上面根本不了解下面的实际情况，逼着下面干蠢事造成的恶

果。幸好仇振亮只是应付式地合并了几个生产队，如果他完全听从上面的指令，把 14 个生产队合并成四个生产队，可能窦店大队的 4000 多社员，都会“坐在县里不肯走”，那样县里才热闹呢！

泰安的农田基本建设是学大寨。他们像大寨一样，开山凿石，用一块一块方方正正的石头，砌成一条一条整齐而漂亮的水渠，清悠悠的水从渠道里滔滔流入地里，省工省力，确实很好。上面要求房山也学泰安，一律用石头修水渠。大寨是山区，石头多得很；泰安是丘陵区，石头也不缺，而且用石头比用水泥更省钱。但房山位处华北大平原，一马平川，到哪里去开凿那么多石头修水渠？但不学不行，谁不学泰安，就批评谁。不少地方为了不挨批评，到处找石头，结果弄得劳民伤财，费力不讨好，群众怨声载道。

因为“上面”的官僚主义者瞎指挥，造成的这类恶果，人们见得还少吗？

窦店硬顶着没学泰安，大伙儿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齐心协力打机井，埋管道，搞喷灌，结果实现了旱涝保收。这不就是窦店人民拒不听从上级的瞎指挥，用自己的双手写出来的一曲“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的新歌吗？

接着，窦店继续打机井，平整土地，积极推广良种，使集体经济大发展，仅 1978 年，交交给国家的粮食就超过 100 万斤。

粮食吃不完，就养猪、养牛、养鸡，一养就是十几万只，二十几万只，既大大发展了养殖业，增加了社员收入，又添了大量肥料，促进了农业发展，一举多得。

因为发挥了集体力量的强大优势，只用三年时间，窦店就把专业化、机械化、商品化，一化接一化引进了村里……

全国推行“包产到户”以后，面对村里的现实情况和上面的一次又一次谈话，仇振亮左右为难。通过大打机井、平整工地，改革耕作方法，原先分布在偏坡和溜岗上的 5000 多亩土地，

已变成一马平川，机井已增加到 570 多口，连成一片的 5000 多亩土地，已经实现统一灌溉，统一施肥，统一收割，粮食旱涝保收，而且添置了大量农业机械，早在 1978 年窦店就拥有 30 台手扶拖拉机，1979 年又投入 50 万元添置了一大批机械；由于社队企业的迅速发展，村里有了肉联厂、奶牛场、养鸡场和服装厂、砖瓦厂等十几家企业，奠定了村里产业结构的基础。全村 347 公顷土地只需 100 名劳动力就可以耕种，亩产 500 公斤以上，正朝着吨粮田的目标前进，大部分劳力已走上田埂，从事他们熟练的工副业。村里食堂也办得很好。村民自家可以不做饭，也可以自家做副食，到食堂打主食，还不用付现金，到年底结算，村民对此都很满意。如果分田单干，机械怎么分？企业怎么办？统一灌溉、统一施肥、统一收割还怎么搞？但是，上面一次比一次催得紧，逼着你分。县委领导一再说，“想不通也得通”啊！

仇振亮确实想不通。中国这么大，条件千差万别，怎么能只允许搞一种生产模式呢？但是，如果不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老先进，怎么向县委交待？能过得了关吗？

那日子可真难熬啊！尽管难熬，但在沉重的压力下，仇振亮心里还是作好了分田到户的打算。不分不行啊！

在痛苦的煎熬中，仇振亮想起了党的群众路线。他决定把问题交给群众，让社员们作出最后的决定。

他们开了一次又一次社员大会，把上面的改革条文，原原本本，一字不漏念给社员听，几千社员听得鸦雀无声，但听完后，谁都不吱声。仇振亮不得不在大会上郑重宣布：“谁愿分田？要分田的请举手，大队把机井边最好的土地分给你。”但是，没人举手。

仇振亮反复问，还是没人举手。

开大会没人举手，于是又分头开小会，反复征求社员意见，仍然没人举手。

社员们对仇振亮说，那些穷山沟地方，那些农业长期搞不好的地方，那些零散住户，土地又分散的地方，可以分田到户。咱们窦店已是几千人一盘棋了，怎么能把盘子再砸烂？那些拖拉机、收割机、发动机……你能拆了分？你一个轮子，他一个马达？这不是破坏农业生产吗？

这就是窦店的声音！这就是中国农民的声音！

仇振亮多少次夜不成眠，辗转反侧。最后终于从中央文件上找到了不分的理论依据。中央文件上明文写着：生产方式宜统则统宜分则分。找到了理论依据，底气就足了。

仇振亮特意跑到县里汇报，说大会小会都开了，文件也学了，思前想后，大伙儿都认为，窦店不仅不能分田，还要进一步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中央文件不是说宜统则统吗？我们就统了，如果出了问题，你们就撤了我吧。

仇振亮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上面也只好同意，“按你们的想法搞吧。”窦店村因为有个仇振亮，小岗村的分田单干在这里便“此路不通”。

窦店于是就成了“包产到户”的“漏网之鱼”。

不久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到到窦店村考察，听了汇报，实地参观后对仇振亮说：“窦店走的是共同富裕的路子，够得上现代化农村的雏形了。”（见2013年第10期《党史博览》）

“漏网之鱼”，当然不止一个窦店。河南巩县竹林大队，是又一条“漏网之鱼”。人们也许不会忘记，随着分田单干的疾风暴雨而来的，还有一股先使少数人富起来的浪潮。竹林大队的一些能人立即看到了自己可以发财致富了。特别是某些党员干部，他们为了自己率先致富，丢下群众不管，外出跑单帮搞个体去了。群众的事开始没人管了，群众看到干部只顾自己发财，发起了牢骚，与其这样搞下去，还不如干脆把集体财产分光算了。党支部书记赵明恩眼看这股分田风造成的影响，地未分，心已散，非常着急。他决定开一次“竹林村的三中全会”，

以决定竹林村的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没想到，“竹林村”的“三中全会”一开就是七天七夜，开得好不激烈！土地分不分，怎么分，涉及到每一个家庭的切身利益。自然引起了所有干部群众的特别关注。党员干部在屋里开会，社员群众挤在屋外听会。一部分主张自己先富起来的党员干部说，你不要弄得社会主义不像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不像资本主义。政策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们先致富，有什么不对？不外出找门路咋能先富？另一部分主张首先要帮助和带领群众共同致富的党员干部则说，国家允许党员干部带头致富不错，但不能为了个人致富，就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丢了，不能把群众丢了，如果把群众甩在一边不管，还算什么共产党？这样的共产党要它干啥？

两种观点的党员干部针锋相对，争得热火朝天，难分难解。

在屋外听会的群众，一听党员干部争论得如此激烈，纷纷嚷开了，特别是那些家底薄，劳力差，既无关系又缺文化的群众，更是慷慨激昂，嗓门宏亮：赵书记，你们干部可不能丢下我们不管啊！共产党要为人民服务嘛！……

赵明恩是党一手培养起来的干部，心里始终牢记着共产党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自从搞合作化开始，他就认准一个理，共产党就是要发展集体经济，如果不发展集体经济，不带领群众致富，要共产党员干什么？要党支部干什么？要共产党干什么？

经过七天七夜的争论，两种尖锐对立的思想，都表达得差不多了之后，赵明恩更加坚定了决不瓜分集体经济，一定要坚持走共同富裕之路的决心，他一针见血地说：如果把集体财产，把大队企业都分光，都去搞个体，村里能富起来的无非三种人——一种人是党员，不是能人入不了党，全大队 2000 多人中，只有 31 个党员；二是干部，熟人多，关系多，好办事；三是退伍军人，他们当过兵，出过远门，见多识广，到处有战友。这三种人，具有一般群众不可能具备的致富优势，都可能

率先致富。但这种人在竹林村总共不到 100 人。大家想一想，其他 2000 多乡亲怎么办？村里的鳏寡孤独、老弱病残谁来管？共产党的理想和目标怎么实现，咱们都是共产党员，都在党旗下宣过誓，难道能只顾自己不管群众吗？……

赵明恩的话音刚落，屋内屋外都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有的群众甚至高声吼道：“是这个理，赵书记讲得对啊！”

就是赵明恩这一席话，决定了竹林村的发展方向——走发展集体经济为主的道路。党员干部要富在群众之中，村民要富在企业之中，全村要富在集体经济之中。

这三个“之中”，就是竹林村的“三中全会”决定的三条“原则”。在竹林村，干个体、干集体都支持，但干部、党员在这两条之中只能选一条：干集体。如果你硬要干个体也可以，但必须先除去干部职务，不允许脚踩两只船。

人们也许要问，这种“漏网之鱼”，走的是一条与“上面”强调必须“分田单干”相反的道路，实际上是不执行上级的指示，他们是富了还是穷了呢？

先说窦店吧。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窦店就开始改革耕作制度，推广良种，1977 年就达到亩产 1200 斤，一举“跨过了黄河、长江”，仅这一年的余粮即达 150 万斤。窦店从来没有人见过这么多粮食。因此，谁都不知道拿这么多粮食咋办？

有人算了一笔账：每斤 2 角，150 万斤就是 30 万元，全大队 4000 人，每人可分 75 元，分了好啦；也有人说不能全分光，得多买些化肥，再增加产量。全大队讨论了四个月，最后决定，30 万元余粮钱，全部用来买猪、买牛、买羊，打一个“畜牧战役”。

首先养猪。1977 年养 380 头，1978 年养 800 头，1980 年养 1000 头，1991 年养 8000 头。

年底一算账，光养猪一项，就比粮食分的钱还多得多。

窦店人找到了致富的门道，决心把地种得更好，打更多的

粮食，发展养殖业。但是光靠两只手不行。毛主席不是说“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吗？

1978年，窦店共14个生产队，总共30台手扶拖拉机。

1979年投资50万元，1985年再投资79万元，不是添置而是更新了全部农业机械，仅大型农机总量即达60台。由此便极大地解放了劳动力。

过去种5000亩小麦，得2000个劳力。此时种5000亩小麦，只需80个劳力。

人们也许难以相信，80个劳动力种出来的小麦比美国的还好。1990年5月，美国农业考察团共35人，由团长罗代尔带领来窦店参观访问，当时正是麦穗将黄未熟之际，煞是爱人，深深感染了罗代尔团长，他一个劲地拍照，一个劲地“OK！OK！”，高兴地对仇振亮说：“这里的小麦，是我见过的世界上最好的，仇振亮先生是我所结识的最能干的实业家。”

窦店走的是一条以机械化为龙头的，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道路。到1992年，窦店仅牛、羊、猪、鸡、鱼一年的产值就是1700多万元。

窦店的发展，既为集体化是中国农民的共同富裕之路写下了生动的注释；也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创造了一个令人不能不信服的典范。

竹林村的情况，同样令人振奋。

自从1983年开了那次“竹林村的三中全会”，统一了思想后，集体经济就一天天发展起来。他们从建耐火材料厂和开煤矿起步，有了积累后，每年都要新建两三个厂子，到1993年，村里的集体企业已由1983年的3个增加到23个，10年翻了将近8倍，初步形成了耐火材料、化工、制药三大系列产品。随着集体经济的日益火爆，原来津津乐道于个人发家致富的个体户，纷纷回到了集体，8个私人联营体全部自动解散，企业则由村里有偿收购或让利收购，绝大多数个体农民卖掉了自己

的汽车、拖拉机等私人机械，回到集体企业工作，个体经济由1983年22.7%锐减到1993年1.6%。在城市大搞“国退民进”的热潮中，竹林村农民在“竹林村的三中全会”指导下，写下了“公进私退”的新篇章。

第十五节 要机械化还是要锄头化？

分田单干和农业机械化，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而且一直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中国农民，几千年来就是一家一户靠“锄头加扁担”、“木犁加黄牛”从事农业生产。这种生产效率极其低下的经营模式，决定了中国农民决不可能摆脱贫困，国家也决不可能富强。这是已经被历史证明了的铁的事实。新中国成立后，为了使农民尽快摆脱贫困，使国家富强，党和政府在大力推广化肥、农药、良种、大修水利、治山改土等等的同时，遵照毛泽东同志关于“通过农具改革运动逐步过渡到半机械化和机械化”的指示，中国政府在陆续建立地县农械厂，积极生产农业机械的同时，积极鼓励人民群众努力改进和改革农机具，大力推广双轮双铧犁等新式农具。1955年，国家就明确提出了要实现“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后来改为科学技术）和国防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在广大农村，自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走上合作化道路以后，很多地方就利用土地集体经营的优势，垭块合并，平整土地，大搞治山治水，治理盐碱化土地，为实现农业机械化做准备，不少地方开始向半机械化进军，并且取得了可喜的成效。比如，湖北省新洲县刘集公社，在1955年实现合作化以后，就开始“自力更生办机械化，他们针对当地易涝易旱的特点，从发展农用机械入手，逐年增添农业高产稳产最急需的农业机械”，“依靠集体力量，1965年就基本实现了农业机械化，粮棉连续八年

跨过‘纲要’，发展了集体经济”；而且“机械化不仅使他们进一步做到精耕细作，还腾出了四分之一的劳动力，发展副业和社办企业，1970年工、副业收入占总收入的三分之一，公共积累已达三百万元，贫下中农自豪地说：‘农业机械，我们买得起，用得了，管得好’”。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山西省昔阳县大寨，也“基本上实现了碾米、磨面、脱粒、铡草、饲料粉碎的机械化；整地、改土、耕作、运输的机械化。由于搞了这些机械化，相当于给大队增加了一半以上的劳动力，就能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不仅农业连续高产稳产，粮食亩产从二百多斤，增加到一千零七十一斤，还发展了副业生产，开展了多种经营，改变了山区面貌。”河北遵化县“正确处理农、轻、重的关系，正确处理工业、农业、商业之间的关系，做到分工不分家，工农业互相促进，各行各业拧成一股绳，从当地实际出发，狠抓钢、铁、水泥等原材料工业，为加速农业机械化服务，为发展社会主义农业服务”。“狠抓粮食生产，又积极开展多种经营，增加了收入，扩大了积累，为购买机械提供了资金，促进了县社工业的发展，1970年全县粮食平均亩产502斤，工业和副业产值2600多万元，都超过历史上最高水平”（以上均引自1971年12月3日《国务院关于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问题的报告》）。

毛泽东同志对中国的农业机械化问题一直十分关注和重视。在1959年4月29日的《党内通讯》上，他就向全党指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1966年2月19日，他又在《对湖北省委关于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设想的评语》中指示：“农业机械化的问题，各省、市、区应当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做出一个五年、七年、十年的规划，从少数试点，逐步扩大，用二十五年时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12页）。

1971年底国务院在召开的全国农业工作会议上，对今后

五年、十年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规划进行了认真讨论和研究，最后形成了《国务院关于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问题的报告》。

会议一致认为，要落实十年规划，前五年是关键。因此，国务院对1971年至1975年的五年间，耕作机械、排灌机械、渔具机械以及机械制造、化肥、农药等方面，都提出了非常具体而切实可行的目标。在此基础上，规定了“十年的奋斗目标是要在1980年使我国农、林、牧、副、渔的主要行业机械化水平达到百分之七十五以上，全国拖拉机拥有量达到八十万台左右，手扶拖拉机达到一百五十万台左右，排灌力达到六千万马力左右，平均每亩地施化肥八十市斤左右，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与会人员“坚决表示，一定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保证在1980年完成毛主席提出的‘用二十五年时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的伟大战略任务”。

《国务院关于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问题的报告》还强调指出：中国的农业机械化，一定是要走自己的道路。“就是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用革命化领导机械化，依靠群众，自力更生，农业和工业同时并举，既搞机械化也搞半机械化；坚持农业机械制造以地方为主，农业机械产品以中小型为主，农业机械购买以集体经济为主”；这两个“并举”和三个“为主”是中国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基本方针，也是必由之路和根本保证。为了更好地落实两个“并举”和三个“为主”，中央要求“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坚持科研、制造、使用相结合，坚持为农业生产服务”，与此同时，要求各地大办农机农械厂。当时已有约百分之九十三的县办起农机农械厂，重点是制造当地农业生产需要的农机具，并根据当地的实际需要，用领导、技术人员和工人三结合的方式，积极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不断改进农机具。

1974年，周恩来总理在四届人大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

报告》中，再次重申，在二十世纪末实现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四个现代化”。

1978年，华国锋总理在第五次全国人大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代表国务院向全国人民公布的十年规划中，提出：农业总产量的年增率超过4%，工业总产量达到10%，并将建设十二个大面积商品粮基地，十个钢铁基地，九个有色金属基地，八个煤炭基地，三十个电站，六条铁路和五个大港口，粮食产量达到四千亿公斤。他不仅强调，到1980年一定要实现毛泽东主席的遗愿——“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同时代表国务院宣布，到1985年我国农业要达到的三个目标：1、“农业主要作业机械化水平达到85%以上”；2、“按农业人口达到一人一亩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田”；3、1985年粮食产量达到八千亿斤。

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是毛泽东主席在二十五年前就提出的，周恩来、华国锋两任国务院总理向全国人民承诺实现的目标。截至1979年，人民公社拥有拖拉机已经达到155万台，拥有了大约一亿八千万马力的机械总动力，在世界上仅低于美国和苏联而居于第三位。1978年春季，全国农业基本建设办公室主任钱正英又宣布，1977年冬季，全国农村基本建设完成土石方达130多亿立方米，比上年增长60%，扩大了3300万亩水浇地（见《人民日报》1978年2月6日）。

这些非常振奋人心的数据充分显示，我国在1980年实现农业机械化进程正在迅速、稳步前进。

人们也许不会想到的是，某些不愿中国实现机械化、现代化的精英人物，对此十分反感。他们认为：“将毛泽东生前提出的农业机械化的设想加以推进，按照这个计划，中国的农业机械化要在1980年完成，这当然并非外人所想象的那样，仅仅是劳动技术的改进。事实上，按照当日共产党的设计，农业劳动改由机械完成，是将土地大规模地连在一起的基

础，千百万农民的劳动，亦将由此集中于统一的意志之下。所以，机械化的最重要的意义，不是改造自然，而是成为一种统治人的力量，甚至可以造成一种压力，让人民公社的土地制度更快地转向国家所有的制度。这个计划在毛泽东时代已经不遗余力地加以推进，到了1977年，乡下的拖拉机已经达到一百五十五万台，并且拥有大约一亿八千万马力的机械总动力，只低于美国与苏联而居第三”。（引自《历史不再徘徊》第91页）。但在这些中国“精英”看来，中国农业机械化的迅速推进，人民公社拥有的拖拉机已经达到155万台，机械总动力达到一亿八千万马力，居于世界第三位，不仅不是好事，简直“祸国殃民”、“罪大恶极”。因为“重要的意义，不是改造自然”，而是“一种统治人的力量”，会给人民“造成一种压力”。在这类“精英”看来，中国永远不能搞机械化，不能搞现代化，而应该强迫中国农民永远用“锄头加扁担”、用“黄牛加木犁”，实行“刀耕火种”，做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者，使全国农民成为一盘散沙，才不会成为“一种统治人的力量”，才不会给人民“造成一种压力”，才不会“让人民公社的土地更快地转向国家所有的制度”，中国才有出路，中国经济才能发展！这类“精英”人物，打着改革开放的幌子，利用自己的话语权，极力攻击、反对中国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

果然，1978年12月31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全会上”，“宣布他的时代开始后”，立即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领导中国人民艰苦奋斗几十年，决心在“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规划，“毫不留情地删去了”。

《历史不再徘徊》的作者，用尖刻的笔触，对此作了这样的描述——

“毛泽东时代……制造的六十条（即1962年9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邓小平时代……把它扔到了一

边”。由于邓小平主持制定的“新六十条”，“增加‘我们狠抓粮食生产是对的，但是忽视和损害了经济作物、林业、畜牧业、渔业，没有注意生态平衡，这是一个教训’一句，显然是对毛泽东‘以粮为纲’的露骨批评”，“最后它毫不留情地删去了‘首先要实现农业机械化’，这就等于是宣告了毛泽东倡导并由华国锋继承的‘在1980年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计划已经流产”（引自《历史不再徘徊》第112页）。

此时离“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还有两年。自1955年中国政府提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经过几十年艰苦奋斗，特别是1971年《国务院关于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问题的报告》，“保证在1980年完成毛主席提出的‘用二十五年时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的伟大战略任务”后，经过八年拼搏，不仅如湖北新州县刘集公社、河北遵化县、山西的大寨、刘庄、河北的窦店以及华北平原、东北平原的广大农村，在原来就已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条件下，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从全国来看，由于国务院作出的五年、七年、十年规划很具体，各地抓得很紧，农业机械化的进展很顺利。全国农村在几年间，拥有的拖拉机数量就已经增加到155万台，机械总动力达到一亿八千万马力，都超过了国务院原来的计划目标，就是最好的证明。可以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指日可待。但是，被邓小平“毫不留情地”这一“删”，以及同时在全国推行小岗村的包产到户，“土地分了，人心散了”。就使中国人民为之奋斗了几十年的四个现代化，“首先要实现农业机械化”，被拦腰斩了一刀，而致功亏一篑，前功尽弃。解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就向全国人民描绘的“点灯不用油，耕田不用牛”的社会主义美景，就被“精英们”欢呼着“毫不留情地删去了。”

我们且来看看，山西省长治市张庄，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经过五年努力，投入大批人力、物力、财力，搞起来的机械化

项目，是怎么化为乌有的吧。

“1978年，张庄人就开始自己搭建组装农业机械，在200英亩（合1200市亩）玉米地上，可以自动完成从施肥、平地、播种、除草、收割、烘干到将烘干的玉米送进仓库的全部过程。机械组只需要12个人，但劳动效率是手工的15倍，而且花费仅仅是原来的一半。但改革后，土地被划分为无数的小块，分给单个农户，机械化农业也不得不让位于原始的间断的个人耕作了。农民没有选择，只有抛弃他们先进的机械，重新扛起锄头。而银行向村里要贷款时，村里的头头们说，把机器拿走吧。银行自然是不可能找到买主的。所以直到今天（1989年），这些施肥机、平土机、喷雾器、喷灌系统、玉米收割机、干燥机都躺在院子里慢慢地锈烂，默默地述说着那个过去的年代，那个被刻意回避的年代。”

这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美国农学家韩丁在他的《大逆转》中，描写的张庄农业机械化由兴起到“锈烂”的变化。他为此感到非常悲伤，并曾为已经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张庄该不该分田，斗胆与国家农委坚持分田单干的副主任杜润生进行辩论。

我们不妨看看韩丁笔下华北大平原的变化，是何等怵目惊心——

“1983年夏天，我乘飞机从北京飞上海，在3万英尺高空，我向下俯瞰，我第一次看到了‘责任制’给广阔的华北平原带来的令人震惊的变化。

“我向下看着，越来越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眼泪也禁不住流了下来。从前，在村落和连接它们的道路间，有着整齐的方形的土地，绿色的、黄色的、褐色的，一直伸展到地平线。而现在，细碎的一小块一小块的土地排列成零碎杂乱的图形，蔓延上千公里。这不是土改前的所谓的‘邮票一样小块’的土地！那些地是那样狭窄，以致马车经过时，一个轮子压在这个人的地里，另一个轮子就压到了另一个人的地里。在我看来，面条

一样小块的土地，只能是死路一条。我无法想像，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只有小块土地的小农可以有什么长远的希望，而且他们当然不是中国现在这样只有四处分散的一两亩土地的小农。农民用锄头耕作，这种低效率的生产方式意味着一年到头最多能收获一吨粮食，只是我在宾夕法尼亚用拖拉机机械化耕作产量的八百分之一。”因此，韩丁作出结论：“在我看来，面条一样小块的土地只能是死路一条。”

“中国的农民一度曾有了这样的生产规模和农业制度，使他们可能同那些高科技导向的机械化武装起来的城市居民兄弟们一起，多少能算同步进入现代社会。可到头来却成了这样！就像荧光屏上闪过的一个小小的亮点，曾经有过的规模化生产，曾经有过的制度，就这样消失了。历史的书卷中，新的一页刚刚翻开，却又马上退回了千百页，又一下回到了起点。”（引自韩丁《大逆转——中国的私有化 1978—1989》第 8—10 页）。

我又当了一回文抄公，不厌其烦地大段抄录了韩丁的原文。这位熟悉中国情况，对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一直非常友好，一年能种出 800 吨粮食的美国农学专家眼中，看到的中国农村改革及其带来的变化，难道不令人深思吗？

华北大平原“蔓延上千公里”的土地，因为推行小岗村的分田单干，被分割成容不下一架马车的“带子一样的、面条一样的”小块。随着全国人民公社的解体，截至 1985 年初，全国农村 98% 以上的大队，都分田到户，也变成了与华北平原一样“零碎杂乱”的土地，在集体化道路上走了几十年，为改变中国农村面貌付出了巨大心血，作出了卓越贡献的九亿农民，在一夜之间又变成了和解放前一样的一家一户的小生产者，他们不得不重新拿起锄头、镢头、木扁担、柳条筐，重新采用沿袭了几千年的原始耕作方法。在有的地方人均仅有二三分地，人们养牛不合算，加上人民公社解体后，社会风气败坏，农村治安普遍不好，盗风四起，歹徒作恶，农民不得不“养牛跟牛睡，

喂猪伴猪眠”，加上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干脆不再养牛，连木犁也不再使用。我的一位在某省报当了几十年记者的朋友顺庚先生曾告诉我，他的家乡就因为人多地少，有的农民连牛和木犁都不用了，而是一家老少用锄头“挖田”，他们幽默地说：“过去人民公社天天讲机械化，现在我们只能搞‘锄头化’”。

从中国政府“保证在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的目标，被邓小平在1978年“毫不留情地删去了‘首先要实现农业机械化’”，同时在全国农村强制推行分田单干以后，迄今（2011年）已经33年。从中国农村的土地“被分割成容不下一驾马车的带子一样的，面条一样的小块”这种现状来看，再过33年，甚至再过53年，中国能不能实现农业机械化，恐怕没有人敢打包票。果若如此，则中国的农业机械化和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岂不就要至少推迟六七十年一百年甚至更久吗？而且，现在几乎没有人再提农业机械化和“四个现代化”了，我们就不能不考虑这样一个问题——

毛泽东从蒋介石手里接过来的中国，是一个美国造出了原子弹，我们还是一个只会造茶盐鸡蛋、造石灰皮蛋，连一部自行车、一部缝纫机都不会造的中国；毛泽东给我们留下的，是一个有了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和美苏三足鼎立的航天大国；那么，我们这一代人交给下一代的，会是一个机械化、现代化的大国呢，还是一个木犁化、锄头化的大国呢？

第十六节 震惊世界的“18颗手印”原来是假的

小岗村之所以一夜之间能震惊华夏，名播中外，成为中国大地上空一颗“光彩夺目”的改革明星，在笔者看来，主要是两条——

一、他们搞了大包干；

二、18名户主按下鲜红的手印，立下生死状——如果队

干部因为包产到户而被抓去“坐牢”，社员给他们送牢饭；如果队干部因为包产到户被“杀头”，社员负责把他们的小孩子抚养到18岁。

两条中最重要的是第二条。如果没有第二条，也许就不会有后来名震中外的小岗村。

此话怎说？

小岗村确实是因为“包产到户”而出名。但在安徽省最早包产到户的，并不是小岗村。比小岗村更早的，是距安徽省会合肥不远的肥西县山南区。1978年9月15日晚上，山南区山南公社黄花大队21名共产党员，召开了一次惊动安徽省委的支部大会。这次会议由山南区区委书记汤茂林主持，会议形成的决议就是“包产到户”。而小岗村是同年11月24日晚上，由生产队正、副队长为头共18名户主，商议“包产到户”。黄花大队比小岗村早了两个月零七天；而且，在汤茂林主持召开支部大会以后，分田到户在山南地区风靡了1073个像小岗村那样的生产队，人口达十万之众。和凤阳县同属滁县地区的来安县十二里半公社（因距县城十二里半而得名），则比肥西县黄花大队更早。来安县委书记王业美因此受到各级舆论的批判，堪称“名声远播”。

以上情况告诉我们——

从时间上看，小岗村搞包产到户，不仅比黄花大队晚（笔者手头没有山南区紧步黄花大队搞包产到户的1000多个生产队中，是不是有或有多少比小岗村更早搞包产到户的生产队），比十二里半公社更晚，顶多排在第三。

从规模和规格上看，小岗村只是一个“18户人家、110口人”的小生产队，是由正、副生产队长领头共18名户主秘商决定搞“包产到户”；而黄花大队是由区委书记主持，有21名共产党员参加的支部大会，作出决定搞“包产到户”，而且会后还风靡到全地区1000多个生产队，人口达10万之众，无论会议

规格、规模、与会人数、会后造成的影响，小岗村与黄花大队及所在的山南区相比，都不可同日而语；来安县则是由县委书记出面推行包产到户，涉及范围是一个公社，并受到各地媒体批判，其规格和影响则不仅比小岗村大，比黄花大队也大。

由此可见，在包产到户这一点上，无论按分田到户的先后，还是论分田到户的规格、规模，涉及的范围，以及造成的影响，小岗村都只能屈居于黄花大队、十二里半公社之后，若论分田到户的“头功”，怎么也轮不到小岗村头上。

小岗村与众不同的，是他们赌咒发誓，按下红手印，立下生死状。这是黄花大队和十二里半公社都没有的“壮举”。正是这个非同一般的“壮举”，显示了小岗人为了分田到户，不惜“坐牢”、“杀头”、“誓死如归”、“生死与共”的决心和气概，“感人肺腑”、“动人心魄”，而成为小岗村的最大的亮点，以致那张按着手印的小纸片，还被中国革命博物馆精心“珍藏”起来，而且据说在中国革命博物馆里“成千上万大大小小的文物中间”，这个被按了手印的小纸片，还成了“史家们最关注的一件”，将“永久保存”下去。

但是，很多人都不相信那张按手印的“珍藏品”是真的！其理由是，连接了手印的小岗村人自己都说不清楚。

我们且来看看各种版本的说法吧。

一位署名为曾德方的记者，在一篇文章中对小岗村按手印的条子，作了如下描述——

“在小岗村‘大包干’20周年展览馆里，墙上有一条很醒目的大标语：‘以民为本顺应民意的爱民精神’，大标语下面，就是18个人按手印条子的影印件，这个影印件上，还写着这样几个字：‘原件存于中国革命博物馆’。”

“我们看了很久，还是看不出这个按手印的条子是假的。后来我们又进行了仔细琢磨和比较，才发现这张按手印的条子，从前言到签名都是一个人的手笔。而且，这张条子并不是18

个人的名字，而是 21 个人的名字。

“我们找到村长严宏昌。严宏昌一听就笑了，他说按手印的条子是他写的，并把来龙去脉说了说。

“据严宏昌讲，那是承包以后的事。有个名叫王影东的高级记者，来拍电视，王影东说，有个按手印的条子，北京很重视，中国革命博物馆要陈列展览。这可给小岗村出了个难题，时间这么久了，还到哪里去找按手印的条子呢？于是，从前言到签名都由严宏昌一手包办，写了一张假的按手印的条子。至于手印，也不是真的，是乱按的。”

看了这段文字，实在令人费解——中国官府和新闻媒体向全中国和全世界报道的，都是小岗村 18 个人按手印立下“生死状”，怎么那张“生死状”却按着 21 个人的手印呢？而且，这个自相矛盾的“原件”，居然成了“中国革命博物馆”这个中国最权威的革命博物馆里的“珍贵藏品”，要被“永久保存”下去，岂不滑稽？

到小岗村采访的安徽作家陈桂棣和春桃，对 18 颗手印却作了这样的描写——

“我们采访过很多当事人，似乎都对那张‘珍贵藏品’（即按手印的条子）提出过质疑，说‘藏品’的纸张那么平展，几无褶皱，何以被农民密藏这么久而如此光鲜？说秘密会议在谁家召开，契约又由谁执笔，这些重要的细节至今（2001 年）亦无定论。甚至连参加秘密会议的是 18 户还是 20 户也有不同说法，而博物馆的藏品上写着的 20 个名字，‘严宏昌’就出现了两次，出席会议的又成了 19 人”。

看了这段文字介绍，更叫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1、“许多当事人”都对按手印那件“中国革命博物馆”里的“珍贵藏品提出过质疑”，“说秘密会议在谁家召开，契约又由谁执笔，这些重要的细节”20 年后仍“无定论”。那么，“许多当事人”都说不清楚的事，难道“非当事人”能说清楚吗？

2、在被万里认定“材料真实充实”的《历史不再徘徊》一书中，凌志军这位《人民日报》高级记者、资深编辑白纸黑字写着：小岗村“在1978年12月，只有18户人家，110口人”，怎么按手印的却是20户人家？“严宏昌”出现两次，小岗村又变成了19户人家，小岗村到底是18户、19户、还是20户人家，连小岗村人，特别是那些不惜“坐牢”、“杀头”带头按手印的人，都弄不清小岗村到底有多少户人家，他们所干的这件事，叫人们怎么相信呢？

3、正因为以上这一系列极其简单的具体问题，小岗村人长期（长达几十年）都说不清楚，以致20年后，包括按手印的18名户主中的11名（占61.1%），连同后来并入小岗村的大严庄村的村民共49名户主，仍然不知道按手印的带头人，到底是严俊昌还是严宏昌，便再次按下鲜红的手印，要求上级查清楚。参加按手印的多数人都不知道谁是带头人，上级又向谁去查清楚呢？

然而，不管如何众说纷纭，事实终究只有一个！

2001年6月14日上午，陈桂棣、春桃两位安徽作家就小岗村按手印等事，访问了从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岗位上退休的陆子修。陆子修对小岗村按手印的条子，作了断然否定：“小岗村按手印是假的，这我能不知道吗？”他使用的是先肯定再设问的表达方式，其结论是不容置疑的。

陆子修在小岗村搞大包干时，是凤阳县所属的滁县地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是和地委书记王郁昭一道，多次亲赴凤阳指导“包产到户”，并直接参与对小岗村“包产到户”一事研究和策划的主要决策者之一，“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缴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余下都是自己的”，这几句后来传遍全国的改革“经典”，就是陆子修和地委书记王郁昭等人总结升华出来的。可以说陆子修对小岗村搞“包产到户”是全程支持，对其全过程了如指掌，后来又被提升为滁县地委书记，

最后从安徽省人大副主任位子上退下来，是被万里称为积极支持全国农村按小岗村模式搞“包产到户”的一位“突出的领导干部”，他对小岗村按手印的断然否定，无疑是权威之说。

我们再看看《历史不再徘徊》的作者凌志军对这张名震天下的条子是如何表述的——

“当日小岗所属之直接领导为凤阳县，凤阳之上又为滁县地区，其最高领导是地区党的委员会书记，此人名王郁昭。是小岗‘包产到户’极力的庇护者，数年后升任安徽省省长，到了1990年，这个浑身上下都充满自信的人已是党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如今，是党的高层领导里面最熟悉农村的人之一，亦对自己曾经庇护的小岗村知之甚多。然而，谈及那一张‘合同’（即按手印的条子），他满脸的疑惑。‘小岗那时户户家徒四壁，一贫如洗，饭碗瓷边都缺一块’，他说道：‘根本没有可能拿出那么大的一张白纸来。假如他们真要立下字据，更可能是把它写在一张烟盒纸上’。”（引自《历史不再徘徊》第9页）

从亲自参与策划小岗村“包产到户”的地委书记陆子修断然否定，“小岗村按手印是假的”，到“小岗村包产到户”的庇护者，此后升任安徽省省长，最后官至“党中央农村政策室副主任、党的高层里面最熟悉农村的人之一”的王郁昭，连小岗村写“生死状”的那“一张白纸”都否定了，那张生死状还可能是真的吗？

我们不妨再对小岗村的自身情况作一点分析。小岗村分田单干前，是一个“牛房周围堆积的牛粪，十几年没有人挑过一挑”的村子，从1955年—1978年，那里的粮食亩产量仅二十几斤，十几斤，甚至八、九斤，穷得几十年时间里全村人的绝大部分日子都靠救济粮过日子，那里的所有18户人家，都被凌志军称为“一串叫花子”或者“一群叫花子”（见《历史不再徘徊》第8页、9页）。而且，笔者至今未见小岗村人对此提出异议，

等于小岗村人承认或默认了这个称呼。这是笔者闻所未闻的地方。他们宁愿当“叫花子”，也不肯在人民公社领导下，团结起来，利用比全国农民多出几倍的土地资源，种好地，多打粮食，自己养活自己，而是靠吃救济和外出讨米过日子，他们能在一夜之间，突然变得“肝胆相照”、“生死与共”，团结得像一个人，连“坐牢”、“杀头”也在所不辞决不回头，难道可信吗？连自己牛房周围长期堆积的牛粪，即使臭气熏人，也不肯去挑一挑把庄稼种好的人，会给别人去“送牢饭”、负责把别人的孩子抚养到18岁吗？

而且，他们“明明”知道，“包产到户”会有“坐牢”、“杀头”的危险，还要傻乎乎地按下红手印，立下生死状，并且精心保存下来，岂不是留下被关、被杀的“罪证”吗？天底下有谁见过这样自己刻意留下“罪证”，等着官府来抓进牢狱，绑赴刑场杀头的蠢蛋吗？

但是，小岗村那个所谓按着“18颗红手印”的“生死状”，经过官方和媒体的操作、宣传，却欺骗了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连那位明明知道，小岗村“根本不可能拿出那么大一一张白纸”（更遑论在白纸上写什么生死状？）的“党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副主任”王郁昭这样的高官，也只好以“随它去吧”的口气说：“既然当地党的领导正式承认这合同是真的，我也没有理由否定它。”（引自《历史不再徘徊》第9页）。

这就明白不过的告诉人们，所谓按下18颗红手印，立下生死状，原来不过是某些媒体记者或某些官僚政客道听途说或者凭空编造出来的骗人把戏。这样震惊世界的事都是假的，他们还有什么假不敢造呢？

第十七节 小岗村要“壮大集体经济，走向共同富裕”

都说谎言重复一千遍，就变成了真理。尽管小岗村闻名天

下的“18颗手印”上节介绍的那么多当事人都否定了，但因官家和媒体不遗余力地反复宣传，便写下了“谎言重复一千遍就变成了真理”的现代版，弄得千千万万不知内情的人，信以为真。笔者和周围的许多朋友曾经不仅深信不疑，而且对小岗村人那种“生死与共”、“视死如归”的决心和魄力，深为钦佩。

小岗村被称为中国农村改革的“榜样”，被树为指引中国农村乃至整个中国前进的一面旗帜以后，堪称“旗开得胜”——“包产到户”第一年就过了“温饱线”，因此又被誉为“一包就灵”。但是，令人十分遗憾的是，只“灵”了一下，很快就不那么“灵”——小岗村只在原地踏步了。并且，出现了这样一种状况——30年合作化，小岗村主要靠吃救济粮、花救济款度日；30年大包干，依然只能依靠国家和其他地方的支援过日子。有关资料显示，建国59周年（至2008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以来，国家支援小岗村的钱财达数千万元，还有资料说达亿元之巨，但小岗村仍然没有摆脱贫困，记者说它是安徽“相对比较落后，组织比较涣散”的地方，南京农业大学陈文林教授考察小岗村后，称它是“落后的代表”。

分田单干后，小岗村曾出现了一个“黄金增长期”，但粮食多了又卖不出去。种经济作物，啥贵种啥，种了又贱价，有时除了成本，每亩收益还不足300元。单干农民深感个体经济弱小的切肤之痛，连严俊昌也说：“大包干只能解决温饱问题，解决不了致富问题”，面对“小岗村今天这个样子，我心里有愧。”

“一包就灵”几十年改革后，小岗村“江山依旧，旧貌犹存”的状况，使它的上级组织脸上颇少光彩，心中自然焦急。于是，自1998年严德友因为“有关经济和打人骂人问题”，被上级调到小溪河镇当副镇长后，小岗村就再也没有产生过一任村支书，全是由上级多次派国家干部到小岗村任职。但是，村里“正气压不住邪气”，弄得上级组织派去的国家干部，也难以开展工作，要改变小岗村的“旧貌”，实在太难。

2004年2月，安徽省委对小岗村的发展，作出了一项重要决策，由省委直接派出省财政厅副处级干部沈浩，赴小岗村任支书。

众所周知，现在的村，就是人民公社时的大队。大队干部从来都是只拿工分补贴，并不脱产的“集体干部”。连大寨那样世界闻名的大队支书陈永贵，也是拿补贴工分（他本人还不要），笔者从没有听说过哪一个大队是由上级派“国家干部”去任职的例子。而小岗村是绕过市、县、镇三级组织，由省委直接从省里下派干部，而且不是从省委直管的宣传部、组织部、办公厅系统选派，而是从属于省政府直管的掌管全省钱袋子的财政厅，选派一名“从七品”的副处级官员，去担任中国历史上从没有过的“九品”村“官”。由此可见，在安徽省委的天秤上，小岗村的规格之高和份量之重。等于省委把一颗名播中外的中国改革“明星”，交给财政厅管理，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全国只有一个小岗村，全省只有一个财政厅。由财政厅选派干部去领导小岗村，既是对财政厅的信任，也是交给财政厅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如果小岗村再搞不好，财政厅就不好向省委交账，财政厅长大概也不能不担责吧？

沈浩去小岗村任村支部书记，当然有着别人不可能具备的优势。小岗村很穷，缺的就是钱。沈浩所在的财政厅手里，攥着全省的钱袋子，为小岗村争取点资金，还不就是厅长一句话？据有关资料显示，沈浩用300万元，修建了小岗村的大包干纪念馆，花200万元修建了小岗村的“快速通道”，还争取到800万元财政专款，作为小岗村的发展基金；他弄来的一笔补助，给每户村民补助2—8万元，帮助全村村民翻修了住房等等。要弄到这许多钱，当然并非易事。但沈浩没有一分钱用在自己身上，这在某些地方财政局长给下面拨款都要拿回扣的当今社会，确是十分难得的清廉。

但是，沈浩在小岗村的工作，并不因为他是省委派来的财

政厅的副处级官员，就一帆风顺。

《人民村官沈浩》的作者商昌万在该书中，为人们了解沈浩任小岗村支部书记后的某些情况，打开了一个小小的窗口。

沈浩上任后，发现小岗村“一年过了温饱线，二十年没过致富坎”，心里很着急。他发现此中的重要原因，就是村里“正气压不住邪气”。这句话就写在2004年8月28日的沈浩日记中。什么是“邪气”呢？作者继续写道，就是带领大家按手印的人自恃当年按手印“有功”的严宏昌，谁的话他都不听，总是在村里乱折腾，村里拿他没办法，上面派下来的几任干部也拿他没办法，因为他动不动就去中南海告御状，而且两次受到万里接见。回来后对村里干部大吹，万里接见他是中央政治局安排的（大意如此，原话可参阅《人民村官沈浩》）。

沈浩面对这样一个非常特殊的村庄，他的困难人们不难想见。但他是真心实意想为小岗村人民服务，从心底里想把小岗村搞好。他曾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今天发生的一切，使我感到交困难耐，但我仍愿意担当。只是可怜我的女儿要中考，年逾九旬的母亲会伤痛。没有办法！也许我的举动，能换来小岗村真正地（的）发展和繁荣。我无怨无悔。”他甚至认为自己在小岗村，“虽然吃苦受累有委屈，但作为丰富人生的一个平台，使自己得到锻炼，这是花钱也难以实现的。”他想的是，“怎样才能有限的的时间里，为老百姓干更多的实事”，这种思想境界，在今天的中国官场实在难能可贵。

小岗村的现实，教育了沈浩，使他对只知各顾各的小岗精神，逐渐产生了迷惘和怀疑。他感到如果继续这样一家一户各顾各，小岗村何时能跨进“致富门”，实在是一个未知数。他想把土地集中起来，走集体致富的道路，但却遭到率先富起来的“改革功臣”严宏昌等人的抵制和反对。

其实，通过几十年实践，小岗人民也看到了一家一户各顾各这种原始小农经济的弊端。比如，农技站的农技员吴广法提

起“大包干”就摇头，他说：“从农业发展的角度来说……弊端确实很大，它一不利于科学种田，二不适宜规模经营，三不利于农业机械化，四是浪费物力和不利于劳动力的合理使用，五不利于兴修水利……总之，不利于生产，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P13）

连那位曾经被誉为“包产到户”带头人的严俊昌，提起“一家一户搞单干”也说：“就说今（2001）年吧，因为天旱，简直像放鸭子，各顾各，争着用水，塘里有水的，就能收稻谷八、九百斤，没水的就只能收稻谷二、三百斤。要是组织一下，也不至于像今年这样减产。”他甚至说：“搞成这个样子，我实在睡不着觉啊！”

经过反复思谋，沈浩决定先让小岗村的干部开阔开阔视野，去看看天外天是什么模样。

沈浩带着一行人来到了大寨，郭风莲听说是“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的客人来了，很热情地接待了他们。沈浩握住郭风莲的手，第一句话就说得颇为幽默：“你们大寨是干出来的，而我们小岗村却是‘按’出来的。”这句诚恳、真挚而不失风趣的话，道出了两个村的不同，把所有在场的人都逗笑了，大寨人笑得更爽朗。

沈浩所说的“我们小岗村是‘按’出来的”，指的是“按手印”一事。他当然清楚，事实也已经证明，靠“按手印”，是按不来富裕，按不来社会主义的。

2006年，沈浩又带着小岗村的村主任、会计、妇联主任和18名按手印中的4人及有关代表，共13人，赴河南临颍县南街村学习参观。南街村是曾经分田单干，但很快就觉悟到必须坚持集体经营，才能实现共同富裕的典型，年产值达十几个亿，是被中外称为“毛泽东的共产主义小区”的一个红色村庄。党委办主任段林川热情接待了小岗客人，并向他们介绍了南街村的发展历程，特别讲述了南街村如何在分田单干三年后，就

及时认识到分田单干所出现的新问题，又果断作出了发展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决策。他们听后很激动，感受颇深，说“这次来一定要看个仔细，学个认真。”

接着，小岗人兴致勃勃地参观了档案馆陈列室。认真地观看记录着南街人奋斗历程的每一张图片资料，仔细地倾听着讲解员讲解的每幅图片背后的动人故事。当看到“难忘岁月”专栏中“土地分了，人心散了”的图片时，他们默默地看着，驻足良久。

原来，1981年中国农村以排山倒海之势，全面推行小岗村的大包干时，在“承包就是改革，改革必须承包”的大气候下，南街村也把土地分了。但南街村是个人多地少的村庄，全村有3100多人口，而耕地不过1000亩，人均只有二、三分地。分田后，原来的机械再也没法用了，只好一卖了之，卖不出去的就当废铁卖。农业生产则回到了解放初期的一头牛、一头驴、一张木犁、一架耙的耕作模式。一家一户的经营造成的利益纠葛不断发生，各种矛盾层出不穷。有本事有门路的人外出赚钱了，缺劳户、贫困户只能死守那二分地。田地分了，人心散了，赌博风起，社会治安恶化，农业生产倒退，粮食产量下降。村里的两家企业也由个人承包，结果是——“群众受了骗，个人落了钱，党组织落了赖。”因为群众为承包户干活，该给的工钱承包户不给，该交给集体的利润承包户不交，该上缴国家的税款承包户不缴，所有利润都落到了承包人腰包里，他们自然发了财。

对这种极不公平也极不合理的结果，群众当然不满。从1981—1983年间，由于搞大包干，南街村超过一半的群众，群起而告党支部和村干部的状。大字报贴到了党支部书记王宏斌的门上，贴到了临颖县委的门前，村里的男女老少，对党支部和村干部，当面指责，背后骂，骂他们“没有良心”，责问南街村党支部还是共产党吗？纷纷要求中止承包，走共同富裕

的集体化道路。

面对绝大多数群众的要求和指责，党支部进行了反复研究，最后决定，由群众自愿写出申请，首先将一部分要求十分强烈的农户的土地收归集体，包出去的企业重新收回，由党支部集体承包，结果面貌大变。重新实行集体化第一年（1984年），村里产值达到70万元，以后更是扶摇直上——1985年，130万元；1986年，320万元；1987年850万元；1988年1500万元；1989年2100万元；1990年4200万元；1991年1.01亿元；1992年2.0亿元；1993年4.2亿元；1994年8.0亿元；1995年12亿元；1996年15亿元；1997年16亿元；1998年16亿元……

从1984年—1997年13年间，南街村经济增长2200多倍，即从70万元上升到16亿元。南街村向国家上缴的利税，在2005年就达到4000万元，2006年达到6000万元……

南街村重走集体化道路带来的巨变，和小岗村分田到户以后，村集体穷得没有一分钱，沈浩赴小岗村任村支部书记，连欢迎他写标语买墨水、纸张的钱都是借的，村里还欠着四万多元债相比，简直是天上人间，这能不使小岗村人深思吗？

得知小岗村客人来到了南街村，档案馆副馆长张天顺热情接待了他们。沈浩紧握着张副馆长的手，感慨地说：“向你们学习，首先把思想武装起来，将农民组织起来，走共同富裕道路。”

恰在此时，档案馆的电子屏幕上缓缓映出一行字：“大包干发源地的人员，看到了南街村的变化，为我们提供了发展模式，使我们的党组织看到了前进的方向。”

张副馆长指着电子屏幕，说：“瞧，这就是两年前小岗村驻村干部来南街村的留言。”

张副馆长还向小岗村人介绍了南街村的变化，介绍了学习南街精神，很多地方重新走集体化道路，建合作化的村庄，比如，山西省壶关县小篷村，洛阳市新安县土谷洞村，开封兰考

县、山东济宁鱼台县、吉林四平梨树县等等，农民自发组织合作社，已经发展起来的集体经济，这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出路。”

小岗人听后深受鼓舞。他们认为，这次“南街之行让我们大开眼界、精神振奋。我们一定要学习南街村精神，结合实际，务实工作，付诸行动”；一致表示，“要学习南街村，坚定信念，找准方向，努力发展集体经济，实现共同富裕。”他们还说，也准备建一个档案室，将小岗人那段历史陈列起来，希望与南街村档案室交流。

当年分田到户十八个发起人之一、年逾六旬的严宏俊老人深有感触地说：“分那一亩二分地，现在只能管温饱，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家里的地靠留下的老弱病残人也照料不好，不是荒废着，就是廉价卖给了那些私企老板。村民想干什么也干不成，被自己那一亩二分地束缚住了手脚，迈不开步子啊！”

参观后，沈浩非常激动，在档案馆的留言簿上，欣然留言：“学习南街村，壮大集体经济，走向共同富裕。”

笔者不厌其烦地，几乎照抄了《南街村报》对沈浩带领小岗村一行13人，在南街村参观学习的情况报道。从沈浩在南街村的留言，从小岗村人参观南街村后的感慨和决心，从小岗人“一年过了温饱线，二十年进不了致富门”的实践及其与南街村走共同富裕道路的鲜明对比中，他们已经清楚地看到了分田单干的局限性，更真实地看到了组织起来走集体化道路优越性，并且下定决心“学习南街精神，结合实际，务实工作，付诸行动”，“壮大集体经济，走向共同富裕”。这不是告诉人们，小岗村人通过实践和对比认识到，分田单干之路走到了尽头吗？

著名的《羊城晚报》在2008年3月25日，以《小岗村重走集体合作之路》为题，报道了小岗村经过30年实践后，决心抛弃“包产到户”，走“努力发展集体经济，实现共同富裕”

的南街村道路，这不是告诉我们，中国农村和中国农民要真正摆脱贫困，只有走集体化之路才能实现共同富裕吗？

第十八节 小岗村能统一中国吗？

由小岗村肇始的“包产到户”在全国推行后，“精英”们就把小岗村和朱元璋统一中国相提并论。说：“凤阳出了两个统一中国的人物，第一个是朱元璋，在马背上打天下统一了中国；第二个是陈庭元……用‘大包干’统一了中国”（引自《历史不再徘徊》第172页）。作为当时凤阳县委书记的陈庭元，支持了小岗村的“大包干”，但要把小岗村的“包产到户”推向全国，一名七品芝麻官显然不具有这种权力和能力。应该说，是那位被称为中国“农村改革的真正先驱”、老百姓“不三呼万岁才怪”的“真正的圣明天子”（见《历史不再徘徊》第92页）万里及其支持者们，用小岗村的“包产到户”“统一”了中国九亿农民的小农经营模式。

在前面，笔者对凤阳县委和小岗村人提供的数据进行具体计算后，得知，拥有相当于全国农民平均将近3倍耕地的小岗村人，在1966—1978年的156个月里，有87个月靠别人养活。他们在1955—1978年的24年里，平均在每亩耕地上种出来的粮食，仅仅8.38斤或者11.97斤或者16.76斤，最多27.5斤。因此，他们的绝大部分岁月，都只能靠“吃救济”过日子，以致那位《人民日报》高级编辑、资深记者凌志军，把小岗村人都叫作“一群叫化子”或者“一串叫化子”（见《历史不再徘徊》第8—9页）。

如果全国农民都像小岗村一样种粮，则在1955—1978年间，人均耕地只有1.57亩的全中国人民，平均每年每个人只有13.16斤或者18.51斤或者26.31斤，最多43.18斤粮食。即平均每人每天只有0.36两或者0.51两或者0.72两，最多1.18两粮食。这点点粮食显然是任何人都无法生存的。因此，全中

国的人就只能都去当叫化子了。这就告诉我们，小岗村大概是当时全中国九亿农民中，粮食生产水平最低，人均产粮最少的村落，小岗村生产队可能是全中国当时 5 万多个公社，60 万个大队，300 多万个生产队中，最落后最贫穷最糟糕的生产队，至少是笔者和笔者周围不少朋友闻所未闻、根本无法相信的一个最落后最贫穷最糟糕的生产队。

对于这样一个生产队，随它怎么搞，搞集体化也罢，搞单干化也罢，无论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包产到人，都没有关系。一是应该尊重他们的选择，二是这么一个仅仅 110 人的生产队，不管它搞成什么局面，都无关大局。即使小岗村一粒粮食都不生产，以中国之大，中国当时九亿多农民之勤劳，白养活小岗村的 110 口人，显然不成问题。

不可思议的是，这样一个生产水平最低，粮食产量最少，最落后最贫穷最糟糕的生产队，居然被“中国农民改革的真正先驱”，农民应该“三呼万岁”的“圣明天子”及其支持者们，树为中国农村改革的“榜样”、中国农民致富的“典范”，并强行推向全国，以“不换思想就换人”的“原则”，把小岗村这种我们的老祖宗使用了几千年，并被实践证明不可能摆脱贫穷的生产模式，强加于九亿中国农民，实在令人费解。

而今，小岗村群众通过几十年实践检验，再次以“一年过了温饱线，二十年过不了致富坎”的事实，证明此路不通，自动改弦易辙，这不是给了“圣明天子”们一个响亮的回答吗？但它带来的“麻烦”，却不能不令人深思。

小岗村村长、“包产到户”带头人严宏昌，在包产到户 23 年后的 2001 年说：“小岗村出名，就出在带头搞了大包干，大包干的三句话，如今已是家喻户晓：‘缴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余下都是自己的’。没想到，后来的麻烦，也就出在这三句话上。上面刮下来的‘三乱风’，没有一项不是打着‘国家’和‘集体’的幌子，后来就没法子‘缴足’‘留够’了。你喂猪吧，牲猪

税，又多又烂，气得村民们最后干脆不养猪……现在村里的办公费，一分钱没有”（引自陈桂棣、春桃著《中国农民问题调查》第441—442页）。

因为全国农村都被强制要求照小岗村的葫芦画瓢，我们就不能不从小岗村想到全国农村——

1、“缴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余下都是自己的”，被称为农村改革的三句“真经”。小岗村人经过实践证明：“后来的麻烦，也就出在这三句话上。”这就是说，小岗人用自己总结出来的三句改革“真经”，首先给自己带来了“麻烦”——“上面刮下来的‘三乱风’，没有一项不是打着‘国家’和‘集体’的幌子”造成的；“又多又烂”的牲猪税，甚至“气得村民们最后干脆不养猪”。这样的“麻烦”，难道就没有同样祸及和小岗村一样“包产到户”的九亿农民吗？在全国各地引发的“三乱风”，不也和小岗村一样严重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吗？得到国家各种优惠待遇的小岗村人，尚且被那三句改革“真经”弄得“没办法可以‘缴足’、‘留够’了”，没有得到小岗村同等优惠待遇的九亿农民，难道能够“缴足”、“留够”吗？

2、“牲猪税，又多又烂”，“气得村民们最后干脆不养猪”。小岗村不养猪无关大局。吃惯了救济粮，用惯了救济款的小岗人，可以再吃“救济肉”。“牲猪税”同样“又多又烂”的全国农民，如果也像小岗村一样，气得都不养猪，十三亿中国人民今天还有肉吃吗？如果我们一年不吃肉，甚至一个月不沾肉，会是什么滋味呢？

3、“村里办公费，一分钱没有”。小岗村作为中国农村改革的“榜样”，中国农民致富的“典范”，集体经济却被“干了中国共产党几千万党员不敢干”的大事的中国农村改革带头人及其支持者们，弄到如此“一贫如洗”的境地，如果其他地方的集体经济也穷得和小岗村一个模样，中国农村的八十多个村级组织，岂不就无法运转吗？无法运转不就要瘫痪吗？果若

如此，中国农村会是一个什么情景呢？

4、三年后的2004年，即小岗村包产到户以后的第24年，小岗村不仅“村集体没有一分钱”，“还欠着四万多元债”。如果全中国的八十四万七千八百九十多个村委会，也像小岗村一样，“一年更比一年穷”，“还欠着四万多元债”，则我国村级组织就得借款339.1576亿元，这许多钱到哪里去借呢？小岗村有省委从财政厅派一名副处级干部去当村支书帮助筹钱，成千成万个村委会，都能从省财政厅派一名副处级干部去当村支书吗？

据凌志军介绍，被他称为“中国农村改革的真正先驱”、“真正的圣明天子”万里，“没有任何领导农村的经历”、“既没有积累下对于人民公社的任何感情，也用不着对人民公社肩负任何责任”，“既不知晓农村经济，又不曾洞悉农民感情”（分别引自《历史不再徘徊》第134、154页）。这就告诉人们，万里根本没有接触过农村工作，不懂农村经济，不了解农民的所思所想和追求，当然也就不可能了解或懂得中国农村、中国农民和中国的农业问题，但中国的农村改革，却是他这位“没有任何领导农村的经历”，“既不知晓农村经济，又不曾洞悉农民感情”，“也用不着对人民公社肩负任何责任”的“圣明天子”在策划和操作，是他在大谈小岗村“干了中国共产党几千万党员不敢干的事”，“我早就想这么干，就怕没人敢干，你们这样干了，我支持你们”云云，一位“没有任何领导农村的经历”，“既不知晓农村经济，又不曾洞悉农民感情”的领导者，“早就想这么干”（包产到户），难道凭的就是“用不着对人民公社肩负任何责任”？

中国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从江南水乡，到西藏高原，从华北、东北大平原到湘西滇贵大山区，情况千差万别，“圣明天子”们却用一个生产水平最低，粮食亩产最少，最落后最贫穷最糟糕以致绝大部分岁月，都只能靠别人养活的小岗村作

为旗帜，用它来“统一中国”，要九亿农民都按照小岗村模式经营，岂不是太匪夷所思了吗？

第二章 我们丢掉的是珍宝还是垃圾

第一节 成也萧何，败了萧何

在小岗村因为包产到户，一夜之间红遍中国大地的同时，全国人民学了十几年的大寨红旗，也在一夜之间遭到全方位炮轰，被全盘否定。各种质疑、责难、批判、抨击大寨和大寨带头人陈永贵的声音，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大有浊浪排空，惊涛裂岸之势——《抓典型的教训》、《评大寨经验》、《从陈明珠的违法乱纪看父母的责任》、《人妖为什么颠倒》、《太行奇冤》、《再也不能干西水东调的蠢事了》、《大寨背离了大寨精神》等等等檄文，堪称铺天盖地而来。不是说大寨就不存在一点问题。“世界上有好的东西，也有坏的东西。自古以来就是这样，一万年以后也会这样。正因为世界上有坏的东西，我们才要改造，才要做工作。但是我们不会把一切都做好，否则我们的后代就没有工作可做了。”更不是说大寨存在的问题，就不应揭露，不能批评，中国共产党和她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历来认为：“不应该肯定我们的一切，只应该肯定正确的东西。同时，也不应该否定我们的一切，只应该否定错误的东西。”对包括大寨在内的所有人物和有关事物，都应该如此，才是正确的态度。但在批判大寨的狂涛中，其主流并不是针对大寨存在的问题，进行治病救人式的批评，更多的主要的是事后诸葛式的指责、谴责、抨击，特别是心怀叵测、暗藏杀机的一些人，完全是在鸡蛋里挑骨头。这些人对大寨发生过的一切，都戴着有色眼镜，在审视，在挑剔。大寨几十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改

天换地的战斗，被他们说成“苦行主义”，是“拿人不当人”。但是，他们对大寨人民经过几十年奋斗，用自己的双手，把那个“山多石头多，出门就爬坡，地无三尺平，年年灾害多”的穷山村，改造成了海绵田，高产稳产田，总计向国家交售了数百万斤粮食的巨大贡献和辉煌成就，却只字不提。

在改造七沟八梁一面坡的战斗中，大寨人发扬“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经过了在零下20多度的严寒中坚持苦干的峥嵘岁月，才使那个乱石遍地，荒草没膝的穷山沟，变成了天下闻名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大寨人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和巨大的牺牲。这和中国人民如果不经历八年浴血奋斗，就不能赶走日本帝国主义，不是一个道理吗？我们能说因为八年抗战付出了巨大牺牲，就应该全盘否定乃至谴责八年抗战吗？

况且，即使在群众干劲迸发的拼搏苦干中，大寨根本不是某些秀才们所说的“拿人不当人”，而是积极保护群众的热情。

有一次，在工地劳动时，一位姑娘和一个小伙子较劲，看谁挑得多。陈永贵发现后，立即走过去，大声斥责：“胡闹！不准比！”

陈永贵这一吼，那姑娘并不在意，反而笑嘻嘻地说：“咱俩比谁挑得多，又不是偷懒，你还能开我的会吗？”

陈永贵喜欢开会，在大寨是有名的。凡是他认为不能做的事情，往往都会拿到会上去公开，其目的是使更多的人受到教育。他看那姑娘被批评后，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接着说：“你不听话，我就开你的会！”

姑娘心想，你永贵大叔干啥不带头？我多挑一点，不也是为了集体吗？你还能开啥会？

没想到，当天晚上陈永贵真开了会。他把白天发生的事，向大家讲述后，断然宣布：“从今天起定个制度，妇女挑担子，不准超过80斤。谁不听话，就不给谁记工分。”

陈永贵的话，在大寨一言九鼎。他在会上宣布的制度，谁敢不听？据说从此以后，再没有发生妇女挑重担的事。这是“拿人不当人”吗？

再比如，某些秀才的文章，甚至某些高官大吏也抨击大寨的“大概工分”，工分关乎每个人每个家庭的切身利益，能“大概”吗？

在互助组时，大寨搞的是死分活评。首先对每一块土地上的每一项农活（比如播种、中耕或收割）定出总工分，干完后，再根据劳力强弱把工分分配到人。合作化初期，按土地分红，大体上也是这样评定工分。高级社时，主要使用定额记酬，开始是干一天评一天，根据各人的劳动强度和劳动态度记工分。后来又实行标准工制。就是在所有劳力中，选一个大家公认的强劳力。其他人则以他为标准，自报公议，确定每个人的底分。大寨最高为每天十二分。有一次评底分时，有人自报十二分，但大家只同意九分半。此人立即嚷开了：“他躬着，咱也没站着；他干着，咱也没歇着，凭什么他拿十二分只给我九分半？”吵得不可开交。陈永贵站出来说：“这事好办，从明天起，他（标准工）干啥你也干啥，他咋干你也咋干，让大家看看。”那人自然无话可说，可干了两天，他只能甘拜下风，说：“算了，我还是拿我的九分半。”这样的工分评定，用陈永贵的话说就是：有差别，不悬殊；有制度，不复杂；讲劳动，讲思想，也讲风格。据说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笏向毛泽东汇报这种方法时，毛泽东竟打断陶鲁笏的话说：“是个好办法！”（引自映象《陈永贵传》第93页）。

但是，诸如此类事例，秀才们不知是不知道不了解，还是不愿说，总之没有人说。而那种捕风捉影，甚至想当然的事，倒说得绘声绘色，有眉毛有眼睛。从大寨的输电线、滑道索、推土机折旧，到修建灌溉系统，改造七沟八梁一面坡，都成了秀才们丑化、攻击大寨的“证据”。比如，大寨最早改造的白驼沟，

因为是陈永贵领导的农业初级合作社修的，为了纪念合作社，就取名“合作沟”；后来改造的黄麻沟，为了“教育青年人”，就取名“教育沟”，后来根据周恩来建议，又改名“教育青年沟”；有一条渠道因为解放军帮忙挖过，为了纪念，就取名“军民渠”。但是，这些作为“纪念”取名的沟渠，就被秀才们拿来说事、演义。比如，“军民渠”因为有个“军”字，有人就说是解放军修的。有了这个前提，又有人凭想象演义成派了多少多少解放军官兵，帮大寨修了一条渠道，修了多少多少天，再据此进行仔细计算，干这些活，得多少多少个工，每个工值多少钱，总共得多少多少钱；这一算，那数字可就惊人了！再比如，几条拉滑索道的钢索，本来买的是“处理品”，到了秀才们笔下，就变成了“正品”，为的是算出大寨占了多少便宜；甚至有一个单位的推土机，在大寨帮忙干过活，结果出了故障，也成了大寨占人家便宜的“罪证”，说修理花了多少钱，大寨只付了多少钱，少付某元某角某分，等等。他们用这样的方法，对大寨算了一笔又一笔“很小”的“细账”后，又据此算出了一笔“很大”的“细账”，说大寨历年卖给国家的粮食，实际上国家每斤还倒贴二角二分五厘几，秀才们这类计算法，堪称天下奇闻。

然而，大寨经过几十年拼搏奋斗，把全村 700 多亩分割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的 4800 多块耕地，经过平整改造，变成了 2900 多块海绵田，粮食亩产从 1952 年 287 斤，增加到 1962 年的亩产 772 斤，以后又达到平均亩产过 1000 斤，“跨过了长江”。在 1972 年，最高亩产达 1520 斤，这是当时南方很多水稻区也没有达到的产量，从 1953 年到 1962 年 10 年间，共向国家交售粮食 175.8 万斤，平均每年每户交粮 2000 斤，此后向国家交售的粮食平均每年超过 20 万斤，最多达 50 万斤，这些粮食大寨人付出了多少劳动和心血汗水，可以养活多少人，这些被养活的人，可以创造多少财富，秀才们都闭口不说。

先后去大寨参观、学习、考察的各界人士，达千万之众，其中仅 1967 年即达 300 多万，最多的一天达数万人，大寨为此耗费了多少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用这些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可以创造多少财富？

几十年间，大寨接待了多少记者、作家、画家、演员采访和体验生活，他们耗费了大寨多少时间、精力，吃掉了多少饭菜，误了多少工，造成多少损失，该付多少采访费，等等等等，秀才们全都三箴其口。

世界上有这样算账的吗？

一些本来与大寨无关的事，也成了大寨的不是。比如，大寨人用“愚公移山”的精神，开山凿石，砌了几十道堤坝。他们开凿的石头，若以一米宽、两米高排列，可以从大寨铺到大庆。这是大寨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构建的一系列工程。为改造大寨的山水田园，发展大寨经济，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某些平原地区的人，参观大寨后，也大搞砌堤垒坝，而当地又没有石头可凿，结果弄得劳民伤财，群众怨声载道；再比如，大寨是以大队为单位核算，是因为大寨是一个仅有几百人的大队，实际只相当很多地方一个生产队；经过长期教育，大寨人一心为公、克己奉公的思想，是很多地方无法企及的。但某些地方的头头参观大寨回去后，好大喜功，也搞起了以大队为单位核算，弄得矛盾重重，人心涣散。如此等等，都被秀才们作为批判大寨、否定大寨的“证据”，把账算在大寨头上。这不是与有人看了飞檐走壁的电影，便去跳楼，结果摔死了，便怪罪电影厂拍了“杀人电影”，要电影厂赔人一样不讲道理吗？

人们不会忘记的是，当年几乎就是这些人及其领导他们的某些党政官员和他们掌管的报纸、刊物、广播、电影、出版社，不遗余力地宣传大寨，赞颂大寨。那时，不光山西、不光华北，北京所有最具权威的报纸和通讯社无不都派出强大的记者队伍，长年驻在大寨，把他们发现的每一件他们认为的好事，宣

传出去，为大寨大唱赞歌。其中不少人就是靠宣传大寨出了名、得了利、升了官。大寨所在的山西省《山西日报》，更是独树一帜。几十年间，《山西日报》在宣传、报道大寨中，总是一马当先，唯恐宣传大寨的“头功”被别人抢走。早在1961年，《山西日报》就把大寨称为“太行山下一面红旗”而大歌大颂，使大寨成了吕梁山区和太行山区的“标志”。据《山西日报》的编辑后来披露，该报曾发表歌颂大寨和昔阳的文章即达762篇，总计超过200万字；而且这些文章所占位置之显要，版面之突出，文采之出众均堪称首屈一指。他们还曾以非凡的气魄，非凡的胆略和非凡的行动，于1965年创造了中国新闻史上罕见的连发十篇社论，推介大寨和陈永贵的历史纪录。但当批判大寨的潮流出现后，《山西日报》也和很多媒体一样，完全忘记了自己曾经为大歌大颂大寨的“光荣历史”，一转身就充当了批判、抨击、否定大寨和陈永贵的先锋。

这就是人们说的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吹大寨的是记者，批大寨的也是记者；提供信息的是记者，提供炮弹的还是记者。他们在不断制造典型的同时，不断毁灭典型。

众多党政官员对大寨的宣传，与妙笔生花的记者相比，也毫不逊色。

特别令人难忘的是，1964年1月19日，北京市委和市人大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召开了罕见的万人大会，专门把陈永贵从大寨请去，向首都人民报告大寨战天斗地的事迹。大会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副市长万里亲自主持。与会者既有名声显赫的党政高官，又有满腹经纶的各路专家、学者和社会名流。其中不乏旷世奇才和著作等身的大作家，是一次空前规模、空前规格的大寨事迹报告会。首都各大媒体无不闻风而至，忙得不亦乐乎。据说，在共和国首都汇集如此多各界精英，去听一位大字不识几个的乡下农民作报告，建国以来唯此一次。

陈永贵是第一次走进神圣的人民大会堂，是第一次面对如

此济济一堂的首都精英。但是，这个头系白毛巾、身穿对襟褂子的大寨汉子，和后来被人称为“真正的圣明天子”的万里等高官一起坐在主席台上，以他独特如泥土般淳朴的憨笑，望了望大厅后，就像在大寨那棵大柳树下，和乡亲们开会一样，照样没有讲稿，说起话来照样从容不迫，有条不紊。他滔滔不绝地讲着大寨人民造田种粮夺丰收的故事，讲着大寨依靠集体力量改天换地，建设新大寨的种种经历和体会。他一句也没说自己，仿佛是在讲述别人的故事。但他那一脸憨笑洋溢的纯朴、坦诚和非同一般的魅力，他那带着浓郁泥土气息和拂面春风一般的语言，把大寨的故事讲得有声有色。他的报告感染了所有的听众，征服了学富五车平时颇为自负的专家、学者和身经百战的共和国将军。一万多人的大会场里鸦雀无声。被中国文坛誉为铁笔圣手的著名作家赵树理，听完报告后，就有人说：“陈永贵的报告实在叫人佩服。他讲了几个小时，没有一处提到毛主席，却处处是毛泽东思想；没有一处讲到哲学，但处处是辩证法。”

陈永贵还没有离开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向全国播放了现场录音。那录音竟如行云流水，人们根本无法想象这是一位大字不识几个的大寨农民，没有讲稿，当着一万多首都精英侃侃而谈的现场录音，能叫人不佩服吗？就是这个现场录音，使陈永贵和他领导的大寨战天斗地夺丰收的事迹，传遍了全国。

仅仅过了几天，《人民日报》也刊登了长篇通讯《大寨之路》，详细报道了大寨的感人事迹。同时配发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号召全国人民学习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全国各地赞扬大寨、决心学习大寨的文章和信件，像雪片一般飞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编辑部。大寨和陈永贵一下成了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

应该说北京市委、市人大组织召开的这次万人大会，为宣传大寨和陈永贵立下了汗马功劳，作为重要决策者之一，并亲

自主持大会的万里，当然也“功不可没”。

没有想到的是，这位曾经参与决策、亲自主持万人大会，把大寨推向全国的万里，在批判大寨的狂涛中，却变成了反对大寨的急先锋。

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华国锋身为党中央主席，“号召学大寨经验”的声音刚落，就是这位曾经请陈永贵向首都人民传播大寨经验，宣传大寨精神的前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副市长立即“斥责大寨的‘大队核算’、‘大概工分’”，大批促大干“是给贫困的人民公社扒了一层皮”，指责华国锋“你说你是大寨经验，我说你是‘极左’样板。我学不了他们，也不想学他们。”（引自凌志军著《1978 历史不再徘徊》第 154 页）。与他当年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亲自主持万人大会，请陈永贵向首都精英们宣传大寨大干社会主义的先进事迹，已经形同冰炭，判若两人。

随风转，大概是我们这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伟大民族，在一个时期以来存在的一个令人揪心的劣根性。其中尤以某些心怀叵测的官员和心术不正的秀才为甚。他们“对任何事物都不加分析，完全以‘风’为准。今天刮北风，他是北风派；明天刮西风，他是西风派；后天又刮北风，他又是北风派。自己毫无主见。往往由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这种人如果不是白长一个脑袋便是别有用心，完全没有是非曲直，他们心中装着的只有两个字：功利。这种人，我们难道见得还少吗？

由于一些人不顾事实，大搞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对大寨所做的一切和整个大寨大加挞伐，极尽丑化、歪曲之能事，把毛泽东、周恩来等第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树起来的这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红旗，一度批得声名狼藉，“体无完肤”；一些人甚至把大寨当成了“愚蠢、卑劣甚至是野蛮”的代名词，大寨人也成了“祸国殃民”的劣等农民，以致在有一段时间，“大寨人外出，在车站不敢说自己是 大寨人；在旅

行社，有人说起那一段经历，就痛哭失声。”（引自映泉著《陈永贵传》，长江文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

一个不过几百人的大寨，几十年如一日，依靠集体力量，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改天换地，首先大抓粮食，使粮食亩产从1952年的287斤，在十几年后增加到亩产超1000斤，先后向国家交售数百万斤粮食，却被一些人弄到那里的人外出竟不敢说自己是“大寨人”，“说起那一段经历就痛哭失声”，而另一个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都比大寨好得多，几十年间却主要靠救济粮、救济款养活的小岗村，却被树为中国农民致富的典型和中国农村改革的先锋，这到底是大寨的悲剧，还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悲剧？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被否定了，抛弃了，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这个国家，难道可以靠救济粮、救济款甚至有组织地外出乞振中国，走向现代化吗？

第二节 说说大寨

大寨位处晋东山区，是一个“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地无三尺平，年年灾害多”的地方。全年无霜期仅100多天，降水量也很小，对农作物的生长和产量的提高都不利。因此，人们普遍比较贫穷。解放初期，大寨只有60多户人家，有个赵旦妮，一辈子没穿过一双鞋。1945年大寨解放时，全村仅有十一个劳动力，村里流传着一首歌谣，对大寨的贫困作了非常形象的描述：“打长工，没铺盖；卖儿郎，当乞丐，有女不嫁穷大寨。”那时，全村700多亩地，被七沟八梁一面坡分割成4800多块，土地贫瘠加上无霜期太短，粮食亩产只有六七十斤，而且十年九旱，不旱即涝，连续下几天雨就成灾。

大寨人在共产党领导下，很早就走上了互助合作道路。组织起来的大寨人，依靠集体力量，战天斗地，对处于恶劣环境中的土地，进行了不懈的改造。

第一个改造的是白驼沟。跟其他沟相比，这是一条小沟。长一里半，宽不过三丈许。合作化以前，为三姓九户所有。陈永贵要改变大寨面貌，就是从这里开刀。从1953年冬天开始，男人抬石头，女人挖沟，从下往上砌。合作社50多个劳力，全部上了工地。连七十多岁的老人贾金元受大家的热情鼓舞，也主动参战。这在合作化以前，是谁也不敢想象的事。偏偏那年冬天特别冷，天空大雪纷飞，但工地上热气腾腾。人们在风雪中一直干到腊月二十九日。第二天是大年三十，人们才不得不收工。但正月初三，大家又上了工地。原来计划一个月完工，结果只用十八天，就砌好了二十四道大小堤坝。从下往上，一层迭一层，非常壮观。可一丈量才五亩地。这是盘古开天以来，大寨人用双手改造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开始，它充分显示了合作化的优越性。因此，这条经人工改造后的白驼沟，被陈永贵取名为“合作沟”。

大寨人为此付出的心血汗水，所经受的磨难、打击，今天的人们大概都无法理解。

最典型最艰苦的，是大寨人三战狼掌窝。

狼掌窝，看它的名字，人们就不难联想到此地之凶险。近两公里长，三四丈宽的深沟，每年夏季暴雨，这里就是出水口，整座山的雨水，从两旁汇集于此倾泻而下，在落坎上腾起一股黄色浊浪，惊心动魄。天长日久，从上到下，只剩下光秃秃的乱石，石头缝里长着荒草，荒草丛中藏着野狼。野狼出没，洪灾频仍。是一处令人望而生畏的造祸酿灾之所。

大寨从1955年开始向狼掌窝宣战。那一年，人们苦战了整整一个寒冬，三个多月，100多天，58名男子汉，筑起了38道堤坝，充填了几万方黄土，凭着双手和汗水，终于造就了20多亩粮田。

第二年，人们满怀希望播下的种子，很快发芽生长。历尽艰辛的人们，望着蓬勃生长的禾苗，无不暗暗在心中计算着秋

后能打多少粮食。突然，一个黑夜，一声惊雷，一场暴雨，把人们肩扛人抬，刚刚垒起来的几十道堤坝和粮田，连同种子、肥料和希望，冲了个底朝天。最高的堤坝，高达2.5丈，仅灌浆的石灰，就用了6万多斤。老天爷这一招，对大寨人的打击，人们不难想见。

但是，组织起来的大寨人，已不同于当年一家一户的小生产者。他们有着非同一般的坚强和毅力。大家总结教训，重鼓干劲，第二年再战狼掌窝。还是一样寒冷的冬季，一样刀削般的朔风，他们流淌了更多的汗水，手上磨出了更厚的硬茧，砌好了更加高大更加坚固的石坝，终于又造出了20多亩粮田。

在这片用拼搏奋战第二次开出来的粮田里，大寨人第二次播种，种子第二次发芽，面对日益茁壮的禾苗，人们眉头第二次舒展开了。谁知人们还没有来得及计算地里的收成，又是一个黑夜，又是一声惊雷，又是一场暴雨，人们第二次垒起的粮田，又一次变成了一片乱石，一片狼籍，一片废墟。

老天爷似乎在有意和大寨人作对，它要彻底摧毁大寨人战天斗地的雄心壮志，不允许大寨人改变狼掌窝天设地造的原始容貌。

面对在两个天寒地冻的冬季，两度拼搏造就的粮田，两次都被老天摧毁，大寨人几乎绝望。他们感到要把万年不变的狼掌窝，真正变成粮田，实在太难太难。

但是，陈永贵心中的希望之火，并没有因为频频失败而熄灭。他一有空就去狼掌窝转悠。望着被山洪冲得七零八落的乱石泥沙，默默地琢磨、思考。他要找出失败的原因，再接着干，他不信狼掌窝不能改造。

终于有一天，陈永贵从砖窑和石拱桥得到启发。因为他们都是拱形，所以虽然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却能长期不垮。找到了失败的原因，就有了成功的希望。有了希望就有了奋斗目标。于是，经过陈永贵的组织动员，大寨人展开了第三次大战

狼掌窝。当时全大队总共不到 60 个全劳力，在工地上战斗的却有 70 多人，全大队有 17 对夫妻并肩上阵，7 户社员全家一齐参战。那一年，大寨的气温达到零下 22 度，而且，开工第二天就下起了大雪，大寨人却干得热火朝天。特别令人佩服的是，27 名大寨姑娘在年仅 16 岁的郭风莲带领下，冒着鹅毛大雪和零下 22 度的严寒，和男子汉一起进山抢修堤坝。脚冻肿了，手磨烂了，肩上的皮肉磨得化脓了，她们照样肩挑手提，没有一个人退却。

为了拿到好石头，他们不得不到三里外的金石坡开山凿石。路不好，走不了车，只能靠人抬回狼掌窝，来回六里地。肚子饿了，就在工地上吃着冰渣饭（因为天寒，热饭送到工地就冻成了冰）。

在第三次大战狼掌窝的苦战中，大寨大队首任党支部书记贾进才的任务是砸石头。那石头坚硬如铁。据说他甩起 30 斤重的大铁锤连砸 98 锤，才砸开一条缝。但在那次开田中，他一个人就开凿了 1800 多立方石头。而贾进才一生为改造和建设大寨，用双手开凿的石头，足够从大寨铺到北京再铺回大寨。这就是共产党的大队书记，这样的书记中国历史上有谁见过？

大寨就是在那一片穷山恶水的土地上，以常人不仅难以做到，甚至无法相信的拼搏精神，用双手开出了 700 多亩海绵田。

所谓“海绵田”，是陈永贵和大寨人独创的“特产”。陈永贵在改造大寨山河时，鉴于大寨非同一般的地貌地形，主张在山坡上内砌外垫，让倾斜的山坡变成平地，在深沟筑坝，拦洪淤泥，即可成田。陈永贵将前者叫作“水平梯”，后者则取名“刮金板”。如此造成的全部耕地，都是人挑肩抬，垫上至少一尺土壤，这样就能使降水之时，能吸收保存水分，仿佛如海绵吸水，乃称海绵田。这是一种劳动量非常大的造田运动，也是大寨独创的特产。

这就是大寨人艰苦奋斗的大寨精神。这就是我们民族传统

中流传已久的“人定胜天”思想在大寨得到的前所未有的发挥。对于陈永贵和大寨人的这种精神，就连那些痛骂“陈永贵和他的大寨，在中国农村具有极为愚蠢、卑劣甚至野蛮影响”的“精英”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传承“我们民族传统中‘人定胜天’的哲学精神”，“在当代中国，最为著名也最有成效地移山平地的人，就是陈永贵”（引自《历史不再徘徊》第149页）。陈永贵和大寨人凭着一双手，两个肩膀，一把锄头，两个筐，不分昼夜地苦干，在河沟造粮田，在荒坡开梯田，苦战十年，彻底改造了七沟八梁一面坡，修成了高产、稳产海绵田，使大寨那个全年无霜期仅100来天的穷山沟粮食产量从1952年的287斤，增长到七十年代亩产过千斤，不仅解决了大寨人的温饱，而且每年向国家交售粮食逾20万斤之多，总共向国家交售的粮食数百万斤。

这不就是精神变物质吗？

但是，大寨的苦干，却被一些头上顶着什么高级记者、资深编辑之类桂冠的秀才们，斥为“得不偿失”，斥为“欺世盗名”；他们把人民公社集体干活，说成是“磨洋工”、“混工分”、“出勤不出力”；说人民公社“养懒汉”，弄得“人心涣散”，“粮食产量下降”等等，自从盘古开天到如今，有哪个秀才见过像大寨人“三战狼掌窝”这样的“懒汉”？有哪个秀才见过像贾进才、大寨铁姑娘队一样在冰天雪地里那样“磨洋工”、“混工分”、“出勤不出力”的先例吗？

第三节 陈永贵其人

说起大寨，就没法绕过陈永贵。其实，说陈永贵，也就是说大寨。在我看来，大寨和陈永贵是一个无法分开的整体。

1915年出生的陈永贵，是个苦孩子。他的父亲陈志如，是专给地主打长工的苦汉子。在一个大旱年头，东家不再请长

工，陈志如浑身力气无处使。为了保存生命，他被迫卖掉妻子连同妻子怀里的小儿子；把尚未成年的女儿，卖给人家做了童养媳。剩下的一个儿子陈永贵，不忍心再卖，便挑着他来到了大寨。到大寨后，陈志如找到一座破庙住下，将儿子委托给一户贾姓人家，自己则外出打工。东家几天，西家几天，四处流浪。他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养儿糊口的人家。那是一个暗无天日的社会，是穷苦人家没有活路的社会。走投无路的陈志如，深感心力交瘁，前路阴暗，最后选择了很多穷苦人们无奈选择的归宿。他含泪跑回老家，在祖坟上的一棵树上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都说环境造就人。也许就是这样一种令人揪心的环境，造就了陈永贵倔强不屈，不畏艰难险阻，誓死不回头的性格和对穷苦人家非同一般的怜悯之心。

1、“咱们也成立一个吧”

日本投降后至1946年，大寨也和山西大部分地方一样，变成了解放区。日本鬼子赶下了大海，蒋介石立马就发动了内战，解放区的主要任务就是发展生产，种好地，多打粮食，支援前线打老蒋。那时，共产党已发出了“组织起来”的号召，解放区不少地方成立了变工队、互助组，以便互相调剂农具、牲口，共同把地种好。那是完全自愿的组合。

在大寨，贾进才是第一位共产党员，他带头组织了第一个互助组。参加这个互助组的成员，主要是由劳力强、家境好、农具、牲口都比较齐全的农户自由组合而成。因此，后来被人们称为“好汉组”。

不久后的一天，陈永贵刚从外面回来，几个孩子就找上门来了。最大的是梁便良，十六岁，最小的贾承联，才十二岁，家中就母子俩，是孤儿寡母之家。梁便良则是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儿，8岁开始讨饭，9岁打短工，10岁多就开始当小长工，吃尽了人间苦，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孤苦伶仃。虽已16岁，个头与十二三岁的孩子并无区别，而且又黑又瘦。面对这些孩

子看着都叫人心酸。

见到陈永贵，几个孩子就说开了：“人家成立了互助组，不要我们，咋办？”

这几个孩子之所以找陈永贵，一是因为互助组是自愿组合，参加贾进才互助组的人，嫌他们太穷，又没有劳力，不愿要他们；二是因为陈永贵好打抱不平，过去没少帮助家境贫困的乡亲，谁家有困难，只要吱声，他都会伸出手来。

面对几个找上门来的孩子，陈永贵沉思了一会，对孩子们说：“那没关系，咱们也成立一个吧。”

陈永贵是个说干就干的人。他马上就成立了一个由九户人家组成的互助组。这九户全是无依无靠的人家，其中仅小孩就有五个，最大的是十六岁的梁便良；另外四个是老的，他们之中最年轻的也已年过半百，既没骡马没农具，又没劳力。这些人如果各干各的，土地就没法种，就得饿肚子，最后只有卖土地。陈永贵是组里唯一的劳动力，他甘愿和这些除了土地几乎一无所有的贫困户、无劳户搞在一起，无异于把一个本来与自己无关的大包袱扛在肩上。在今天这个连老人在街上摔倒，都没有人愿意伸出手来扶一下的社会，大概不会有人再干这种“傻事”。

陈永贵组织的这个互助组，后来被人们称为“老少组”。

当时大寨的互助组，并不止这两个。由于完全是自愿组合，并没有任何限制，两家组合，三家结伴，都可以成立互助组。只因“好汉组”和“老少组”的人数最多，又独具特色，格外引人注目。

“好汉组”因为大家都有劳力，有牲口，有农具，即使不组织也有条件种好地，组织起来后，有的人生怕自己吃亏，搞生产反而不如过去卖力。

“老少组”却与此相反。他们因为没有劳力，更没有骡子没有马，而且还受到各种讥笑，听的闲话更不少。人家说“老少组，老少组，老的扶不上马，少的拉不开弓，能搞好生产，

做梦吧。”

陈永贵是个从不服输的人，大家对他的信任，把他当做依靠，更使他深受感动。听了这些闲言碎语，心里憋着一股子气。他当时说了一句让老少组一辈子都忘不了的话：“不用怕，咱们组老的有经验，小的会长大，我们会超过他们。”

陈永贵看问题就是高人一筹。他看到了“老少组”的长处和未来的希望。

陈永贵历来甘于吃亏，又有使不完的劲，组里的累活、重活，都是他在干，但从无怨言。大家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全组老老少少，没有一个人不跟着他拼命干。他们是在困难中相依为命的集体，如果搞不好，大家都得挨饿。在陈永贵带领下，年过半百的老人和十几岁的娃娃，团结得像一个人，谁都怕自己干活落后，谁都不愿拖累陈永贵。每个人心里想的就是如何加劲搞好生产，多打粮食。

“老少组”都是家境不好的穷人，但他们人穷志气大。有陈永贵领头，没有一个怕苦怕累，个个争先恐后。天下大雪时，他们也打破旧时陈规，在地里干活。这在大寨是破天荒的事。这种干劲与“好汉组”形成鲜明对比。“好汉组”因为大家都有牲口，有劳力，谁也不愿带头吃苦。他们采用的仍是几千年传下来的老办法，一切按部就班。以致使他们做梦都没有想到，“老少组”成立第一年，粮食产量居然超过了他们，达到亩产150斤，平均每亩比他们多打整整30斤。无骡无马又缺劳力的“老少组”创造了这样的奇迹，不能不叫“好汉组”刮目相看。

1950年，县里已知道陈永贵领导的“老少组”，粮食产量超过了“好汉组”。这年底，县里开会还奖给他们一面锦旗，上面写着八个字：“组织起来，发展生产”，以示鼓励。

老百姓最看重的是粮食打得多不多。于是，人们纷纷加入“老少组”，很快由九户壮大到二十户。

1952年，陈永贵领导的互助组，创造了亩产500斤的高产

纪录，这在当时的整个昔阳县也是罕见的。因此，陈永贵成了全省劳动模范，光荣地出席了山西省农业丰产劳模代表大会。

也就在这一年，陈永贵领导的互助组，办得越来越红火，“好汉组”有一种望尘莫及之感。贾进才看出陈永贵确实是一个大公无私的能人，深得群众拥戴，前程无量，主动提出，让陈永贵当党支部书记。这就是后来新闻媒体多次宣传的“贾进才让贤”。

2、“找陈永贵入社去”

陈永贵当了支部书记后，深感自己肩上的责任更重了，工作和生产积极性也更高了。

1953年，陈永贵向县里提出了办合作社的要求。他领导的互助组，因为粮食产量高，在县里已有一定的知名度，山西又是带头搞合作化的省份，一直走在全国前面，县里自然支持他的要求。但是，当另一位劳动模范李顺达办起金星农业合作社被刘少奇知道后，便对金星合作社写了一个批示，说那样搞“是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给山西乃至全国的互助合作化运动，泼了一瓢冷水。不久后，刘少奇的批示又受到毛泽东批评，随后毛泽东又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决定（草案）》，同时写了一个“通知”，要求各级党委“把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抓”。

两位中央领导完全相反的观点，使山西对发展互助合作社，采取了一种比较谨慎的态度。县里批准了陈永贵成立合作社，同时规定只能办三十户以内的小型试验合作社。

陈永贵的态度是，只要你批准我办，我就可以不受30户的限制。他办起来的新胜初级农业社，一下就发展到50多户。

当时，大寨还有三个小互助组，四个单干户没有加入合作社。陈永贵想的是要让大家加入合作社。但他知道，如果合作社不能充分显示它的优越性，不能比互助组、比单干户多打粮食，他们是决不会加入合作社的。

合作社不同于互助组。首先是，土地入股，按股分红。土地肥瘦不同，产量也不一样，这就涉及到各家各户的切身利益。因此，大家都想把自己地里的产量定得高一点，所占股份多一点，分红自然也会多一点。

陈永贵家共有十三亩地，每年可产 34 石粮食。按全社土地评估，定为 37 股。这样评估大家都认为比较公平。但陈永贵不认可。他主动压低所持股数，能产 34 石粮食的地，被他一压再压，最后压到 24 石。

受陈永贵影响，贾承让也把自己地里的产量压了下去。这样一来，其他人当然也就不好将自己的土地产量定股太高，使土地评估比较顺利，也比较公平。

陈永贵说：“产量定高了，缺劳力的人吃不住。”他主动带头对自己的土地压产，想的是“缺劳力的人吃不住”。

没想到，办社第一年夏至刚过，天旱无雨，新成立的合作社能不能增产，对陈永贵和合作社都是一个严峻考验。但是只能搞好，决不能搞砸。陈永贵认为，合作社人多力量大，越是有灾之年，越能显示优越性。面对老天爷造成的干旱，陈永贵发动大家抗旱，与老天展开了较量。也是苦心人天不负。这年秋天，陈永贵领导的合作社，平均亩产达到 240 斤，比那些条件好但没有入社的单干户家的产量高多了。这说明人们一旦抱成团，齐了心，就没有不能战胜的困难。

事实比任何说教都有力量。人们看到陈永贵领导的合作社比自己地里的粮食打得多，原来自恃条件好，不愿入社的人纷纷要求入社。有个中农，认为自家农具齐全，又有劳力，不愿入社。他不信自己搞不过那些条件比自己差的人家组合起来的合作社。因此，他在暗中跟合作社漂着干。经常偷偷去看合作社地里的庄稼。他在心里一再叮嘱自己：决不能落在合作社后面。秋收后，合作社的人在场子里称粮算账，他就隔着窗户在扒拉算盘。最后算出合作社的地里愣是比自己打粮多，他丢下

算盘，对家里人说：“找陈永贵入社去！”

3、他把评估组的评估砍了一半

1955年，陈永贵领导的初级农业合作社，转为高级农业合作社。互助组时，地里产的粮食都是个人的，只是大家相帮着干活；初级社时，是土地入股分红；高级社产的粮食就得归集体统一分配了。首先，各家各户的农具、牲畜都要作价变成集体的。

村里成立了一个评估组，由各方面的代表人物组成，对各家各户的农具、牲畜进行评估。这是涉及到各家各户切身利益的麻烦事，哪家都想把自己的农具、牲畜的价格估得高一点。据有关资料记载，评估组里有一个干部，还有一个中农。那个干部有意让那个中农先评估。因为中农是群众，他如果认为对自家的耕牛、农具评估低了，就可以吵，这样他就可以从中调解，把中农家的耕牛、农具估价抬高，然后再估自己的。没想到那个中农没有看出那位干部心中的小九九，一再嚷着要干部带头。

陈永贵当然看出了此中的玄机。他知道，为了合作社的兴旺，只有牺牲自己才能让群众信服。于是大声说：“那就先从我家评估吧。”

当时，陈永贵家已有一头壮牛，三年前买牛时花了140元；一头母猪，已怀胎100多天，就要下崽了，任何人估价都会把母猪肚里即将出世的小猪崽算进去；一张犁，还有八成新。

就这么一个小村庄，谁都知道谁家的耕牛农具是啥样，值多少钱。大家正在看陈永贵的牛时，陈永贵却说开了：“买这牛时花了140元，已经用了三年，去年耕地崴了脚，别人看不出来，但我知道。”他开门见山说出了牛的毛病。

评估组对陈永贵的牛作价140元，母猪连胎作价80元，一张犁作价8元，一共228元。

大家都知道，这个作价是就低不就高。比如母猪带崽作价80元显然就偏低，但大体还算合理。

没想到陈永贵立即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说：“这牛最多不能超过80元，因为我花140元买来，已经使用三年，而且还崴了脚；一头母猪值40元，这张犁作价5元就够了，共计120元。”评估小组的估价几乎被他砍掉一半。

大家一听，都感到这样作价实在太低，说：“你那头母猪一窝生10只小猪，每只卖10元，就值100元嘛！”

陈永贵却说：“我买时只花了22元，去年下了9只猪崽，已经赚了，为什么还要占这个便宜呢？”

同一个东西，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就有不同的算法。陈永贵对他的耕牛、母猪、犁的算法可谓“别具一格”。大家都觉得他太亏了，不同意这样算。但陈永贵是支部书记，又是社主任，坚持非这样算不可，大家也只好依他。

由于陈永贵带头降价，不仅整个评估过程很顺利，而且出现了一些在今天的人们看来根本不可能出现的感人事件。比如，贾进才嫌自家的牛老了，便到集上卖掉牛再添钱买回一头壮牛加入合作社；贾进才是大寨第一位党员，又是他让贤，让陈永贵当了大寨党支部书记，人们也许会说他思想好，境界高。牛国栋则是一名在旧社会为地主打过20多年长工的老贫农，他家三代人用的就是一个木头做的枕头。他家里没有牛，但他看到了集体化给他带来的希望，看到陈永贵如此克己奉公，深受感动，于是也到集上买回一头壮牛入社。这样感人的事，与分田单干时，很多地方为分农具、分良田，吵得一塌糊涂相比，不是天壤之别吗？这不就是陈永贵一心为集体，舍己为公的奉献精神，为人们树立了榜样，使大寨人们心甘情愿作出牺牲，跟着他在集体化道路上一往无前的动力和原因吗？

在雷锋已被某些人视为“傻瓜”的当今中国社会，陈永贵、贾进才、牛国栋等人当然都成了大“傻瓜”。但是，不知那些大批大寨的秀才们是否想过，如果没有陈永贵和他带领大寨的一批“傻瓜”，艰苦奋斗，“早起五点半，中午带顿饭，晚上加

班干”，使粮食产量由解放初期的亩产六七十斤，增加到七十年代的亩产超千斤，从而向国家交售了数百万斤粮食；如果全国没有众多像陈永贵、贾进才这样的“傻瓜”，不辞辛劳，不畏艰难，大修水利，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使中国的粮食产量，由1949年的11318吨，增加到1980年的32056吨，诸如“牛房周围堆积的牛粪，十几年没人挑过一挑”，亩产粮食长期在几斤、十几斤至几十斤徘徊，以致156个月间就有87个月靠救济度日的小岗村农民，岂不就要饿肚子吗？

4、困难时期，大寨大队借出去几万斤粮食

如果说陈永贵克己奉公，甘于吃亏，一心为集体的精神，在当今这个很多大老板为了个人利益，造假药，造有毒奶粉，用死猪病猪造香肠，不惜谋财害命的社会里，人们已经很难理解；那么，陈永贵乐于助人，勇于牺牲的境界，大概就会使更多的人无法相信了。

由于连年的天灾和赫鲁晓夫背信弃义的逼债，加上领导者决策的某些失误，中国从1959年以后出现了近三年的经济困难时期。生活物资严重不足，在这种情况下，投机倒把也就乘机抬头。

一天，陈永贵听说大队小卖部的很多香烟，一下都被买光了。经了解，得知县城有人用一斤大枣换一包香烟。这当然是一种有赚头的事。那时大寨还吃大食堂，等到吃饭的时候，陈永贵就说了：“你们用香烟换大枣的人听着，这事不能干！过去我们斗地主，就是他们的富不是靠自己的劳动。你们想一想，那些用大枣换香烟的人，不就是为了赚钱吗？他们把香烟拿到别处，又会赚比一斤大枣更多的钱，这就是投机倒把，就是剥削，咱们不能干！”

说起投机倒把和剥削，老贫农们谁都有亲身体会。于是议论纷纷，大家讲起旧社会谁谁谁怎么赚黑心钱，谁谁谁如何剥削别人，倒香烟的事，一下就变成了—场阶级教育课。

大家这么一议论，再没有人拿香烟去换大枣了。

几天后，有人告诉陈永贵，平定县一些地方正在卖谷糠谷草，价格挺好。

陈永贵听后断然拒绝：“我们不能搞投机倒把。”

谁知有人找上门来了。那人找到陈永贵，问谷糠多少钱一斤，不等陈永贵开口，对方已主动开价：“两角钱一斤行不行？”

陈永贵回答：“不行！”

“两角不行，那就三角吧。”

陈永贵还是回答：“不行！”

“那你要多少钱一斤？”

“三分，但不卖私人。”陈永贵回答。

当时不少地方缺粮，但大寨有粮，有谷糠谷草。消息传出去后，不少人蜂拥而来。

陈永贵坚持一条，买谷糠谷草必须有大队证明，否则谁也不卖。

证明自然好开。不少人拿着大队证明请求大寨支援。借口粮、借种子的都有。不管过去是赞扬大寨还是对大寨不满的，陈永贵都借。买谷糠谷草的更多，一车车谷糠谷草，从大寨拉出去，价格一律每斤3分。

当时集市有卖馒头的，那是小商小贩。陈永贵也派人去卖馒头，人家一个馒头卖2角，陈永贵只准卖5分。

仅仅几十户人家的大寨，当然不可能满足人们的需求。陈永贵是要用这种独特的方式，证明大寨集体化的优越性。同时，也要向人们宣传一种思想、一种品德、一种理想。

听说大寨有粮，找上门来的越来越多。陈永贵总是尽力而为，来者不拒，而且不带任何附加条件。

人们也许难以想象，自1959年开始三年自然灾害，大寨人均留下420斤口粮外，全村平均每户向国家交售了3000斤粮食，1960年人均交售了3500斤粮食。就在这一年，全国粮

食都非常紧张，而大寨不仅保证了社员的口粮，而且向外借出去的粮食就有好几万斤！这能不令人刮目相看吗？但陈永贵认为，帮助阶级兄弟度过难关，大寨义不容辞。秋收后，人家还什么粮，大寨就收什么粮，绝不为难人家。有的人实在还不起粮，就按国家收购价付钱。

据说，当时有能力并且如此慷慨助人的大队，全国也只有一个大寨。

5、自觉克己助人

自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媒体公开宣扬“抬头向前看，低头向钱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鼓吹“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等腐朽理论以后，私欲恶性膨胀，拜金主义、个人主义更是如暴雨中的山洪一样咆哮而来。损人利己，损公肥私，化公为私，偷税逃税，买官卖官，贪污受贿之风，日益猖獗，弄得百姓怨声载道。在这样一种氛围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大概无法想象更难以相信当年的陈永贵和大寨人民是如何舍己为人，克己助人的了。

有一次，县里有关部门得知某公社供销社有一套马车，连同四头壮骡子一起卖，要价很低，特意给陈永贵打来电话。当时大寨已有两套马车，基本够用。陈永贵接完电话，立即想到了附近的金石坡大队，他们不仅一套马车也没有，甚至连走马车的路都没有。于是，陈永贵和支委商量，决定把马车让给金石坡。消息很快被群众知道，不少人找到办公室责问，这么好的车为什么要让人？

陈永贵是一个性格非常倔强的人，他一直拒绝接受别人支援，但支援别人不仅不含糊，而且非常慷慨。他反复给大家讲共产党人就是要实现共产主义，而实现共产主义就必须解放全人类，我们怎能看到自己的阶级兄弟有困难，却不支援呢？他不仅自己反复给群众讲道理，还通过支委层层做工作，终于得到大家理解。

但是，人们没有想到，陈永贵认为光把马车让给人家，还不足以显示大寨人的风格，他又叫会计拿出钱来，买下那套马车和四头壮骡子，然后再给金石坡大队送去。金石坡不是连走马车的路都没有吗？陈永贵和支委商量后，又决定派工去帮金石坡大队修路。这可是“送人送到家，帮人帮到底”啊！

从1972年年初大寨就开始干旱，一直持续到1973年6月，干旱时间长达17个月。当时，大寨的半山腰已修了一条渠道，完全不需人力抗旱。但是，陈永贵为了显示大寨人们的精神风貌和大寨集体化的优越性，他决定不从渠道放水，让清清凉凉的渠水，从大寨地边流过，再流入附近大队的地里。大寨自己却采用挑水点播，在一连40多天里，他们刨了100多万个坑，挑了12万多担水，种了500多亩玉米。这就是有名的“千里百担一亩苗”的壮举。这500多亩玉米，秋收平均亩产达1026斤。但这件事，在批大寨时，竟被秀才们当作“蛮干”、“得不偿失”的典型例子而遭痛斥。

在这个大旱之年，大寨助人为乐舍己为人，用非同一般的苦干、实干，夺得了总产粮食77万斤的大丰收，交给国家50万斤。

我不知道，在分田单干搞了30多年，天旱时为了抢水，往往打得头破血流的中国农村；在农技站、农资公司，都向农民出售假农药、假种子、假化肥，坑农自肥的当今社会，人们还能看到像陈永贵和大寨那样舍己为人、助人为乐的事例吗？

第四节 大灾之年：“三不要”、“三不少”

中国人自古称“患难见知己”。这就是说，在灾难、困苦、祸害之时，最能体现一个人的品格和境界。那么，我们且来看看大寨人在面对百年不遇的天灾时，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品格和境界吧。

1963年,在大寨历史上可以说是最为惨烈的一年。那一年,大寨连遭七次天灾,特别是那年八月,突然袭来的暴雨,连下七天七夜,这是百年不遇的天灾。仅这一次降水量,就超过往年全年的降水量。八月正是庄稼抽穗壮籽的时刻,倾盆而下的暴雨,把400多亩丰收在望的庄稼,彻底冲毁。其他地里的苗,也被冲得七零八落。最揪心的是113孔窑洞被冲毁,77间房被冲倒,只剩下12间房和5孔窑洞还能住人。全大队800多名社员中,大多数无处安身,挤在仓房、学校、机器房里,人们乱作一团,不知如何是好。粮食被毁了2万多斤。损失之惨重由此可见。一个几百人的大队,被暴雨弄到这等地步,堪称没顶之灾啊!

当时,陈永贵正在县里开会,大雨中道路被冲毁根本回不来。但由陈永贵带出来的大寨支部,当机立断,按照历来的做法,坚持先集体后个人,先群众后干部的原则,连夜挨家挨户进行检查,对群众都进行了妥善安排。

第二天,心焦如焚的陈永贵,冒雨绕道赶回了村里。看到人、畜都很安全,说了一句俏皮话:“我给大家道喜。”他的解释是:“人都在,不是大喜吗?”在陈永贵的眼里,只要人在就什么都好办。

当时大寨已是全省先进典型,面对一片狼藉、惨不忍睹的家园,陈永贵没有悲伤。他整天在地里转,反复在琢磨。产粮的坡,几乎被彻底摧毁;住人的窝,也惨遭破坏,是先治坡还是先治窝?最后决定:既治坡又治窝。白天治坡,晚上治窝,齐头并进,重建家园。陈永贵同时决定,一方面从集体积累中拿出3万元钱、3万斤粮食,购买木材石灰等原材料,帮社员建窝;另一方面从外地雇请了一批工匠常年修房。

1963年,即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刚刚过去,一个小小的大队,能拿出这么多钱和粮食为老百姓修房,实在是一件很简单的事。

陈永贵从县里回来的第二天，县里就打来电话，告知已给大寨拨了一笔医药费。

没有想到的是，在如此大灾之年，送上门的钱，却被陈永贵婉言拒绝：“感谢上级领导关心，我们心领了。”

接着，县委书记张润槐亲自来到了大寨，询问陈永贵需要什么帮助，还答应到外地去联系木材。

陈永贵诚恳地对县委书记说：“其他地方也遭了灾，还是帮助其他地方吧。”

两天后，公社组织了大批席子，准备给大寨搭建临时住所，陈永贵照例没要。他说：“感谢上级组织关心，我们的人都安顿好了。”事实确是如此，陈永贵家里的房子没有被冲毁，住着村里的孕妇，仅大队小学就安排了100多人。

又过了两天，县里再来电话，告知上级决定给大寨拨了一笔钱。那钱不是县里的，整整1000元。那时100斤大米才10元钱，1000元，可不是一个小数字啊！

陈永贵一开始就打定主意，不要任何援助。他宁肯累死，也不能丧了英雄气概。他要保卫大寨红旗，堵住一切可能对大寨进行挑剔的嘴巴，让人们看到陈永贵和他领导的大寨，依靠集体力量，能够干出别人不敢干、不能干、干不好的事。当时，由于大寨遭受特大灾害，各级组织的慰问信、慰问电，像雪片般飞向大寨，陈永贵一一表示感谢。但他绝不接受任何援助。在他看来，吃人的嘴短，拿人的手短，接受了援助，就失去了底气。

陈永贵的办法，从来都是先和支委商量，取得支委一班人的支持。陈永贵把情况和自己的想法一说，大家很快就统一了思想，便分头做群众的工作。大寨支部在群众中威信很高，绝大多数人都支持支部意见。个别人心中不通但口里却不好再说。于是，上级要给大寨的这笔钱，大寨硬是没要。

就是在这样一个几乎全队都遭到灭顶之灾的大灾之年，大

寨人做到了三不要——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资。这样的大队（村），在分田单干以后的中国大地上今天还能找到吗？

在陈永贵看来，如果遭了灾，只是不要外面的支援，还不足以显示真正的英雄气概。陈永贵随即又提出“三不少”——向国家交粮不少、社员口粮不少、集体库存不少。

在这样的大灾之年，陈永贵提出这样的目标，在今天的人们看来，如果不是天方夜谭，也是陈永贵在吹牛皮。但是，最后的事实，却让人们无法不承认陈永贵非同一般的胆识和气概。

大寨人按照陈永贵的部署，在被百年不遇的大暴雨冲得七零八落、满目疮痍的土地上，生产自救，重建家园。首先，陈永贵组织了一个专门班子规划住房，拉石头，砌墙基，重新建设新农村。他拿出了轻易不肯动用的储备粮和储备钱，他要让社员们看到集体经济的优越性。他同时号召社员自愿集资，当时全大队80户人家，就有70多户拿出了存钱，一夜之间集资一万多元。所有的房子则由集体修建，给私人住，但只需出一半钱。

为了生产自救，全队社员同心协力，同艰共苦，顽强拼搏。白天，人们一早就下了地，妇女和孩子在被冲得乱七八糟的地里扶苗、补苗；男人们则在砌田堪、凿石头。晚上，煤气灯把全队照得如同白昼；建房工地上更是一派忙碌，大家你追我赶，争分抢秒。有一名因公负伤，被马车压断了腿的赵小和，甚至提出一天上四个班的建议，上午下午再加早工晚工，动员全家老少一齐上阵。不少人干到深夜却不肯离去，连走路都打趔趄。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大寨群众之所以能够如此忘我地为集体而拼搏，与陈永贵长期严格要求干部模范带头，密不可分。

陈永贵有一句名言：“不劳动不能当干部，劳动不好不是好干部。”陈永贵带了头，大寨所有干部没有谁敢不下地，下

了地没有谁敢不好好干。陈永贵对干部规定了两个“三不准”。

1、不准用劳动时间开会，不准用劳动时间办公，不准用劳动时间找人谈话。他还把这个“三不准”概括为两句话：整时间劳动，零时间办公。

2、大队干部要参加各种会议，要做各种政治思想工作，要处理各类矛盾纠纷，给干部适当补贴工分，理所当然，任何群众都不会有意见，在中国大地上大概没有几个例外的地方，但大寨却属例外。

1963年前，大寨对干部也有工分补贴。陈永贵开会多，事情多，大队给他补贴100个工，他只要了45个。贾承让当大队长，给他补贴80个工，他只要了50个。

从1964年开始，他们全都不要补贴。自己劳动一天记一天工分。凡开会或在家做账，都不记工分。而且，陈永贵又制定了一个三不准：不准不参加劳动，不准自私，不准特殊。

贾承仁前后当了10年会计，每年参加劳动都在350天以上。所有的账都是利用工余时间做的。他仅有小学文化，但10年间没有出现一笔差错，被群众誉为“万笔清”。

贾承让当了20多年保管，由他经手的粮食、种子达数百万斤之多，从没有发现错过、烂过、丢过。每年出工都在300天以上。

陈永贵带出来的是如此清廉勤政、带头劳动的班子，群众能不跟着学吗？大寨有一位年过半百的老人，居然十年没有缺过一天勤。

有这样的干部，有这样的群众，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还有什么险关不能闯过呢？

面对罕见的天灾，大寨的干部群众，用罕见的气魄，罕见的拼搏，赢得了罕见的硕果。

陈永贵原来规划用“五年恢复土地，十年建成新村”，结果两年就全部恢复了土地，仅三年社员全部搬进了新居。而且，

在这百年不遇的大灾之年，大寨获得了平均亩产 704 斤的丰收，比无灾的 1962 年只减产 4%，除了保证社员每人 400 多斤口粮外，还卖给国家 24 万斤粮食。这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发表长篇通讯《奋发图强，自力更生，以国为怀，顾全大局——大寨大队受灾严重红旗不倒》；中共山西省委发出红头文件，号召各级党委和党组织学习大寨藐视困难的英雄气概和高尚风格，对大寨给予高度赞扬。

第二年，即 1964 年，大寨的粮食产量就一步“跨过长江”，达到了国家对江南的产量要求。

人们或许要问：大寨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都不好，他们怎么能生产出那么多粮食呢？

据有关资料显示，从 1952 年开始，大寨投入农田基本建设的劳动量，比在田间的劳动量多三倍。平均每个劳动力作业的土石方达 1000 多立方米，担土 80 多万担，每人每年挑石头 800 多担，挑粪、挑庄稼 10 万斤，如果把大寨修造的堤坝，按一米高两米宽计算，可以从大寨铺到大庆；展现在人们面前的还有：植树造林 1000 多亩，修整梯田 800 多亩，修盘山水渠 28 华里，铺设地下水管 3 万多米，使旱地灌溉面积达到 400 多亩，实现了农业水利化、机械化……

大寨人走过的道路，是一条依靠集体力量，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拼搏创业的道路。这是一条任何地方任何人都能走的道路，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历来提倡的道路。不同的是，面对穷山恶水和各种艰难困苦，大寨人甘愿让自己的双手磨出更多的血泡、更厚的硬茧；毫不吝啬地把流淌的汗水，成吨成吨地洒入地里，不断向新的目标奋进，不断创造辉煌。那些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并不比大寨差的地方，经过大包干变成一家一户的小生产者后还能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像大寨干部和群众那样苦干、实干、拼命干创造出同样的辉煌吗？

第五节 大寨天天搞阶级斗争吗？

在万炮齐轰大寨的批判狂潮中，很重要的一条“罪状”，就是说大寨“天天搞阶级斗争”，而且硬说因为毛泽东提出“农业学大寨”使其影响到全国。

事实果真如此吗？

掌管大寨的陈永贵，是苦出身，他父亲为地主打了一辈子长工，当然没少受气，没少吃苦。最后因走投无路，吊死在祖坟旁的一棵树上。可以说陈永贵对地主阶级有一种天然的仇恨。有一个标榜是某大报高级记者的凌某，曾公开写文章说陈永贵“一贫如洗，苦大仇深，对地主富农深恶痛绝，甚至对中农也不肯有一丝容情”云云。但陈永贵管理的大寨，打土改以后，人们就没有斗争过地主富农。在陈永贵看来，人民当家作主掌了权以后，作为一个“阶级”的地主，已经成了社会的弱者。一个人去斗弱者，算什么本事？他对斗地主富农，几乎完全没有兴趣。

当然，陈永贵不是不讲阶级斗争。从共产党人信奉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说，阶级斗争贯穿有史以来的全部人类历史，能说现在中国没有阶级斗争吗？如果没有阶级斗争，还要不断加强作为阶级专政工具的——监狱、警察等等专政机关干什么？但陈永贵要斗的是那些干扰、破坏他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

解放初期，有一个人干扰他组织农业合作社，此人在解放前又曾给日本鬼子做过事，被群众称为“二本鬼子”，那就对不起，陈永贵就组织斗过他。1953年，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陈永贵首先带头卖粮，同时和上级派来的工作组一起对村里的粮食产量进行了摸底。有个富裕中农因为陈永贵粮食卖得多，对自己压力很大，在背后骂陈永贵。他认为要不是陈永贵贪积极，多卖粮，就不会把自己弄得很被动，越骂越有气，最后竟

举着一把刀，大喊大叫：“杀不了陈永贵，大寨就没有出头之日！”吓得陈永贵老婆担惊受怕，晚上睡觉都用木头顶着门。

“老少组”的人，听说陈永贵受到生命威胁，夜里自动轮流守护着陈永贵的家。

村里的人对这个人的气焰也很愤怒，便开了对他的斗争会。人们聚集在村中那棵大柳树下，让那个人站着，先叫他说，为什么要杀陈永贵，他自然不敢说。大家就一条一条跟他算账——你家过去产多少粮，现在产多少粮？陈永贵逼你了还是压你了？他自己是不是比你卖得多？给你发的布票是多少？你是不是比陈永贵少了一寸？等等，说得那人哑口无言。斗争会也没人喊口号，更没人动手，就是跟他摆事实算细账，让他认错。那个人本来也只是不愿多卖粮，与陈永贵并无怨仇，只是一时气不过，怪罪陈永贵，便说了些过激的话，心里并不是真要杀陈永贵，大家这一批，就把他批老实了，事情也就完了。

这样的“斗争会”，不就是一个“教育会”吗？在今天，如果有人公然举着刀扬言要杀村干部，开个会教育教育又有多大的错呢？分田到户以后，农民要求村里公布乱摊派、乱收费的账目，和村干部发生争执，遭到村干部打骂，甚至被打伤、打死的事情，各地并不鲜见，那是搞的什么斗争呢？但是，大寨对那个举着刀扬言要杀陈永贵的教育会，通过秀才们的“合理想象”，生花妙笔下的富裕中农，就升格为“地主份子”，成了大寨和陈永贵大搞阶级斗争的典型例子，有鼻子有眼地被他们写进了传遍全国各地的书报刊中。这种由秀才们编造出来的“阶级斗争”，到底是大寨在搞阶级斗争，还是秀才们在造阶级斗争呢？

如果说这个富裕中农因为不愿多卖粮，说了过激的话，有了出格的行动，被陈永贵开了“批判会”，但大寨的保管员就是中农，一直是陈永贵的依靠对象，让他做了大寨的“管家”，又该作何解释呢？

解放初期贾进才成立的“好汉组”，因为劳力强，有骡有马，农具齐全，而后来陈永贵成立的“老少组”，因为不是孤儿寡母，就是老人，既无骡无马无农具，又无劳力，但陈永贵不服输，他和大家相依为命，团结奋战，成立第一年，粮食产量就超过了“好汉组”，这本是两个互助组之间的正常竞争，是陈永贵领着“老少组”成员憋着劲和“好汉组”暗地里的比拼。但是经过秀才们的“加工提高”，就变成了两种思想、两条道路的阶级斗争。

文化大革命中，有的地方在“四类份子”的门上，贴着《守法公约》，以示和贫下中农的区别。在批大寨时，秀才们又把这种《守法公约》，说成是从大寨学来的，成为大寨搞阶级斗争影响全国的“证据”。然而，大寨人却根本没有听说过什么《守法公约》。与此相反的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地方大搞阶级斗争时，大寨却独树一帜，为表现好的地富份子摘了帽，只是不让对外说。对他们的子女，陈永贵认为，毛主席说他们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大寨就应该听毛主席的话，把他们教育好，他特意让大寨团支部发展了一些地富子女入团。

而且，陈永贵对只要不干扰、破坏他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地富份子，从不歧视。

五十年代初期，村里一名叫贾志寿的富农份子，因为在隔壁村里有地，也雇那里的人替他打过短工，对他过去一些丧失理性的做法耿耿于怀，就派人来把他弄走了，临走时还扔下一句话：“他回不来了。”那意思是说，不想让他活了。

此话传到陈永贵耳朵后，他立即跑过来，对来说：“谁把他弄走，谁就得给我把他送回来！”

说了还不放心，陈永贵又派去几个人跑到隔壁村去接人。但赶到时，贾志寿已被弄得够呛，派去的人只得把他背回来。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大寨的玉米长得特别好，经常有人到大寨地里偷玉米。陈永贵极为恼火，便派民兵在夜里巡逻。

终于有一天晚上，民兵抓到了一个偷玉米的，交给陈永贵发落。陈永贵一看那人的脸色就明白了八九分。他不仅没有惩处人家，却请他吃了一顿晚饭，还倒给他几斤粮票，打发他走了。民兵们不解，问陈永贵：“怎么抓到的贼你却放了？”

陈永贵却严肃地说：“惩办人不是目的呢！……”

最典型的，是文化大革命中，陈永贵为地富反坏等四类份子免去向集体借的粮食。

1967年，文化大革命正搞得热火朝天之际，陈永贵不仅掌握着大寨的权，也执掌了昔阳县的大权。在他的心目中，整个昔阳县就成了大寨。他要把昔阳搞成全国的大寨。但此时的昔阳，现实情况并不理想。比如，粮食产量就没有上去，全县的总产量只有8000万斤，就凭这一点，昔阳就称不上大寨县。陈永贵下定决心，要在一年内改变昔阳面貌，首先就必须把粮食搞上去，让大家吃饱肚子。而要提高全县粮食总产量，除了精耕细作之外，必须设法增加耕地面积。

他首先瞄准的目标，就是在县内的界都河修一道拦河大堤。这样就可以增加大片土地种庄稼。他一个人沿着界都河考察调查了一个多月，认定自己的想法是可行的。

接着，陈永贵开了一个全县大队长干部大会，提出了“重新安排昔阳山河”的口号，作出了“界都河工程大会战”的决定。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在他之前，谁也不敢有这样的设想。

这年九月，农业部在大寨召开十二省市负责人学习大寨管理经验现场会。陈永贵在会上晃了一下之后，便带着几千人上界都河筑坝造田去了。有陈永贵亲自带头，工地上干得热火朝天。

人们苦干一个冬天，到第二年春天，拦河坝筑起来后，2000亩耕地的雏形就展现在人们眼前，陈永贵非常高兴，他开始了新的谋划。

1968年春播后，县里照例召开四级干部大会安排全县生产。陈永贵突然在会上宣布：“今年咱们好好干，等秋后丰收了，社员们欠集体的粮一律免掉。”

这个决定简直像一颗原子弹在会场爆炸，把与会人员震得目瞪口呆。那是多少粮食呢？全县一共2000万斤，是历年来全县社员向集体借的粮。他在会上说得很感人：“这不是社员欠集体的粮，是我们干部欠社员的粮。年年说丰收，年年不够吃，算什么丰收？！”

整个会场掌声雷动，不少人听后感动得热泪盈眶。

大会过后是小会讨论。陈永贵又说了一番令人深为感佩的话：“社员们欠的粮，你们以为能还吗？那就是秋收还了春天借，头年还了第二年再借，集体不但没有实际收到粮食，反而伤了社员的积极性，这责任就在干部。我们必须从根本上解决社员的用粮问题，使社员不需要再借粮，才对得起社员。这事如果出了问题找我就是了。”

散会后，陈永贵的决定在一夜之间传遍了昔阳县的每一个角落，人们无不欢欣鼓舞，当然也有人怀疑：陈永贵的话能兑现吗？这可是2000万斤粮食啊！群众看到了希望，生产积极性一下就迸发出来。这年秋天果然获得大丰收，全县粮食产量破天荒超过1亿斤，以20%的年增长率创造了昔阳县产粮历史最高纪录。

当时，陈永贵正在北京开会。但他走前已决定了县里开会的时间，并交代县里作好方案，只等他回来就要宣布。但陈永贵不在，谁也不敢拍板。陈永贵春天讲的是“一律免掉”，那么地主富农等四类份子免不免？中农免不免？如果免，怎么免？这是摆在头头们面前一道很是棘手的难题，弄不好就会被人上纲上线，说成阶级立场问题。

于是，给陈永贵打电话，问到春天在大会上宣布的决定怎么办，陈永贵回答很干脆：“兑现！”

问到怎么兑现，有人提出地富免一半，有人提出四类份子不免，中农免一半，有人……

不等对方说完，陈永贵斩钉截铁地回答：“一律免掉，就说我讲的。”

有人担心陈永贵这样搞会犯错误，是阶级不分，劝他：“这事你得再好好想想，到底怎么免。”

“想什么想！”陈永贵显然火了，“通通免掉！社会主义就是要人人有事干，人人吃饱饭！连战犯都要吃饱饭嘛！通通——免掉！”陈永贵显然是有意加重了语气。

陈永贵从北京开会回来，就在县里召开的四级干部大会上宣布了这个决定。全县人民，包括地主富农等四类份子，对陈永贵简直是感恩戴德，只差没喊他“万岁”了。

这就是陈永贵！这就是一个政治家的胆略、气魄和胸怀。他免掉了2000万斤数字，却实实在在得到了2000万斤粮食，补好了历年来全县社员借粮留下的那个大洞。更难得的是，他得到了全县人民的衷心拥戴。借谷还粮，自古皆然。社员们借的2000万斤粮食，一下全免了，人们获得了连自己也不敢奢求的利益，还有谁不听他的话？不跟他大干社会主义呢？

这样的事，除了陈永贵，除了大寨和昔阳，在中国大地上当年不可能找到，即使今天能找到吗？那些批判大寨天天搞阶级斗争的各类官员和秀才们，你们扪心问一问，大寨和陈永贵是那么干的吗？如果真是天天搞阶级斗争，陈永贵掌管的昔阳县能在一年间，由年产8000万斤粮食，增加到过1亿斤粮食，并且把包括地主富农等“四类份子”在内的全县社员历年借的2000万斤粮食“一律免掉”吗？

人啊人，说话要凭良心呢！

第六节 奉周恩来之命进行的调查

弄虚作假，虚报浮夸，在中国官场始于何时，笔者没有考证，只听说1958年刮起来的浮夸风始于中原某个大省。那时叫“放卫星”。有人带了头，一些好大喜功的官员，唯恐自己管辖的地方落了后，便竞相争放“卫星”，乃至亩产千斤、几千斤，上万斤乃至几万斤粮食的大“卫星”，通过记者们的生花妙笔，频频见诸报端。

眼看各地不断发射高产“卫星”，山西省的头头们也坐不住了。于是，就开会，让大家报产量。省里特别看重的是劳动模范，希望他们带头放“卫星”。当时陈永贵已是山西省特级劳模，是全省农业战线的“大明星”，会上特意安排专人注视陈永贵和另一位特级劳模李顺达的表态。但这两位都是凭自己的苦干、实干获得光荣称号的劳动模范。都不愿报那种明明是糊弄人的高产数字。他们面对工作人员的启发，装聋作哑，就是不吱声。

领导们便有点着急，让人旁敲侧击：“别的地方都上去了，咱山西怎么办？”

李顺达仍不表态，陈永贵只顾叼着旱烟袋吞云吐雾。

于是，就直接问李顺达，李顺达说：“我的产量上不去。”

问陈永贵，陈永贵笑了笑，说：“哪个亩产达到一万斤，我这个陈字倒起来写。”

再问陈永贵：“亩产到底可达多少？”

陈永贵回答：“五百四十斤。”

“你能不能报二千斤？那样才好向北京推荐啊！”

“那就不去吧，报了后产量上不去怎么办？”

谁知从太原回到县里，大寨就有人找来了，说大寨红旗快要保不住了，怎么办？陈永贵一生特别看重荣誉，当然也特别

看重那面红旗。但他一听就明白此中原因。

陈永贵很快回到了村里。进村时正好社员休工，人们争相围上来问情况。陈永贵面对关心红旗会飞的乡亲们，只说了一句话：“明天我去送红旗。”

有人提出，还是派个人去吧。

陈永贵说：“这责任在我，当然应该我去。”

第二天，陈永贵一个人，不声不响地把红旗送到了另一个大队。

陈永贵送走了红旗，省里领导却没有忘记他这个特级劳模。第二年一开春，省里又派了那位后来在晋中地区当了十年农业学大寨办公室主任的雷震一和《山西日报》一位副总编，专程到大寨做陈永贵的工作，希望他把产量报高，好上北京。那样做对于陈永贵和山西省都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是很多人求之不得的“好事”。

然而，陈永贵回答得很干脆：“宁可不上天安门，产量一斤也不多报。”

果然，这一年陈永贵和李顺达都失去了去北京的机会。

在法院判决书都敢造假，在当权者为了把与自己有性关系的妓女，扶上宣传部长的宝座，居然敢为妓女制造假档案；在官员们为了享受残疾人的优惠，就敢利用职权把自己弄成残疾人的当今社会，人们还会相信省里领导一再启发、暗示、诱导、动员你虚报产量，居然还有死死坚持“宁可不上天安门，产量一斤也不多报”的人吗？

然而，中国的很多事情，往往超出人们的正常思维之外。弄虚作假者，常常可以加官晋爵，不肯虚报浮夸的老实人，往往受到嘲讽、奚落、打击；甚至被弄得焦头烂额。

陈永贵和他领导的大寨，就是一个典型。

1958年，出现放“卫星”搞浮夸以后，很快就被一些好大喜功的官员，发展成“五风”——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

风、强迫命令风、生活特殊风。由于这些官员的胡搞，结果弄得群众少食缺衣，怨声载道。

接着，就反“五风”。

谁知，一些曾经刮“五风”的能手，此时，摇身一变又成了大反别人“五风”的英雄。上级派到大寨的反“五风”工作组，也不例外。他们凭着自己臆断，认为大寨粮食产量有水分，有虚报，便对大寨的账目查了又查，对土地量了又量，结果查出大寨新开了几亩几分几厘土地，再除以粮食总产量，亩产便少了几斤几两，顿时高兴得手舞足蹈。这不“证明”大寨搞了浮夸吗？

更没有想到的是，有人居然把大寨的所谓“粮食问题”捅到了中央。那时，办事极其认真，中央很快就派出农业部长廖鲁言率领一班人，赴大寨进行调查。廖鲁言为了把问题搞清楚，在大寨一住就是二十多天。他们将各种材料上说的和陈永贵报的一条一条核对，查账本，量土地，走访社员，实地察看，不敢有丝毫马虎，最后总算得出大寨所报情况“基本属实”的结论。

其实，一个大队的粮食亩产，相差几斤有多大关系呢？今天比这种“误差”严重10倍、100倍的事，人们见得还少吗？就连国家公布的GDP，地方上报的和中央统计的，相差几千几万个亿那样巨大的数据，不也是常事吗？有谁管过查过处理过？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四清运动接踵而至。

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正主持中共中央的一线工作。1964年8月又正式挂帅“四清运动”指挥部，成了四清运动的总指挥。刘少奇夫人王光美领导的四清工作团就在距离大寨并不很远的新城县桃园大队搞“四清”。新城县是一个只有28万人口的小县，但王光美领导的社教工作团就有15000多人。王光美创造的“桃园经验”，经刘少奇批转后，成为指导四清运动的“经典”在全国推广。当时作为指导全国四清运动的刘少奇对四清

运动的基本观点是：①四清运动，“不会比上次‘三反’、‘五反’小，要大一些，涉及面要广一些，人要多一些，而且这一次不是抓原来的资产阶级，是搞新的资产阶级，是搞共产党和国家干部中间的资产阶级，是搞劳动人民中间出来的一部份人”（引自王双梅主编：《刘少奇与中共党史重大事件》第396—397页）；②在如何正确对待干部和群众的问题上，刘少奇不同意毛泽东对干部和群众的两个95%的估计，即95%的干部和群众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刘少奇认为毛泽东的估计偏右，“四不清”干部实际比估计的多，“比例大得多”，四清运动中很多干部表现出严重的右倾思想，对运动领导不力，必须开展反右倾斗争。1964年6月21日，刘亚楼、吴法宪致信王光美，反映抚宁县公安局的问题，刘少奇阅后批示：“抚宁县委和县公安局的错误，实质上是严重的右倾思想的表现”；10月18日，刘少奇复信李富春时强调：“右倾危险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引自《刘少奇传》（下）第958页）；③要“挖根子”，“要追上面的根子直至中央”。1964年6月2日，刘少奇主持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和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时指出：“和平演变已经演变到高级机关中的某些人，省委、市委都有他们的人”，“根子不仅上面有，而且上下左右都有根子……上面的根子也要追，上面的根子更危险，一律要追，追到什么地方算什么地方，是公社追到公社，是县委追到县委，是地委追到地委，是省委追到省委，是中央追到中央”（引自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537页）；刘少奇甚至认为，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一个省可以独立，可以造反”（引自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538面）。根据四清运动总指挥刘少奇的这些指示，各地四清运动在一些重点区县，往往集中上万人的工作团，撇开当地党的组织和广大基层干部，搞神秘主义的“扎根串联”，搞“大兵团作战”，开展夺权斗争，在基层干部和群众中大找“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在有的地方已着手重新划成份，将一些比较富裕的农民划为新

地主、新富农，将矛头指向基本群众，不断扩大打击面，使大批基层干部受到残酷打击，无情斗争，弄得人人自危。

昔阳完全是按照“桃园经验”于1964年2月29日全面展开四清。全县仅12个公社，四清工作团即达4000多人。他们在那里轰轰烈烈开展“四清大会战”。工作组首先将各大队进行分类，共分一、二、三类。

这年11月，“四清”工作队进驻大寨。他们将大寨列为三类队，即由坏人掌权，必须“把权力夺回来”的那一类。工作队扎根串联，发动群众，清查账目，寻找大寨干部的问题，和当年共产党在白区搞地下工作并无多少区别。

当时参加大寨四清工作队的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生张斤夫，2001年在《史海文坛》上撰文介绍了工作队进驻大寨后的一些情况——“第二天，大队和生产队所有干部因为‘四不清’嫌疑而‘靠边站’，陈永贵、贾进才、贾春旺都不例外。”“工作队员，除了每天与自己的扎根对象‘三同’以外，其他人员一律不准靠近，就连不是‘扎根对象’的贫下中农，也不能随便与他们说话。如果知道哪个社员出身不好，老远就得躲开，弄不好，就会站错立场。”工作队员只在极少数根子户中“秘密串连，秘密发动，秘密调查，粮食产量有没有虚报？社员到底分了多少口粮？有没有扣除水分？”千方百计“挖山寻蛇”找问题。经过秘密串连、发动，两个月后终于“有一个社员揭发陈永贵隐瞒土地，虚报产量，我们的工作队长喜出望外，找陈永贵谈话。陈永贵说瞎扯哩！我一分地也没有隐瞒，一斤粮食也没有虚报。我们的组长根本不相信他，竟让我们队员用绳子一块一块地去丈量虎头山上的梯田。”

四清工作队就是这样按照“桃园经验”，在昔阳在大寨进行“四清大会战”。有关资料显示，昔阳所有的大队干部都挨过四清工作团的整，而且搞的是“无情斗争，残酷打击”，在短短三个月内，就有40多名大队干部被整死。在大寨，连贾

承联、贾进才这样的优秀干部，都被整得差点自杀。

今天的人们也许很难理解，那位刚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就被分配去参加四清工作队的“初生牛犊”张斤夫，居然敢在大会上对“桃园经验”这种搞法进行尖锐的批判。

1965年元月3日，各队队员到县委党校向四清运动工作总团汇报工作。就在这次汇报大会上，张斤夫毫不客气地说：“我们搞四清，就像搞地下活动，说是‘团结依靠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可是，我们连陈永贵、贾进才这样全国有名的劳动模范都不相信，还相信谁？扎根串连，扎来扎去串来串去，就那么几个社员，这叫什么‘广大’？”然后，他“大着嗓门吼了一声：‘我们犯了路线错误！’”。

这个初生牛犊在全县四清工作总团的汇报会上，如此否定“桃园经验”，自然是“大逆不道”。几天后，在进一步动员搞好四清运动的动员大会上，晋中地委书记严厉批评了张斤夫：“否定四清运动的成绩、主流和大方向，说出了连阶级敌人都不敢说的话！”使动员大会变成了对张斤夫的批判大会。

1965年1月2日，毛泽东主席在他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针对王光美带领中央“四清”工作队在新城县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些做法，说：“一个新城县，28万人口，下去15000人，还说人少了。哪里来那么多人？哪里要这么多的人？我看是人多了。你只依靠工作队，为什么不依靠那个县里的二十几万人？比如二十八个人中有一两个是坏的，还有二十六七万是好的嘛！为什么不依靠这些人？如果依靠好了，我看十几个人就行了。”两天后的1月5日，毛泽东主席再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王光美领导的新城四清进行了批评：“我听说有六怕，一怕扎错根，二怕沾干部等，所有的怕，都是怕右倾来的。怕右倾成为一种框框。还是江苏那句话，有啥反啥，有多少反多少，有右反右，有‘左’反‘左’。现在的问题是工作队的人数很多，按兵不动，搞人海战术。”（引

自邸延生著《文革前夜的毛泽东》第358页至359页）。

1965年春节后，中共中央下达了关于四清运动的《紧急通知》，传达了毛泽东主席关于“95%的干部和群众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的指示。对“桃园经验”指导的前一段四清运动作了全面、深刻、彻底的批判和否定，说四清运动“把斗争矛头指向广大农村基层干部”，“保护了党内极少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扎根串连是神秘主义”。“桃园经验”终于寿终正寝。

接着，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笏带着农业厅厅长、作家马烽等一行人来到大寨。随后，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河北省副省长刘子厚一行也来到大寨。李雪峰一来就对四清工作队避开支部，搞秘密串联进行了批评，说：“去年就讲过大寨是一类队，四清要依靠党支部，怎么当作三类队整？”

陶鲁笏也说：“这工作组是谁派的？怎么连我都不知道！”

四清工作队在大寨混不下去了，只得撤离。

至此，大寨的所谓虚报浮夸问题，应该了结了吧？可有的人还不肯善罢甘休。他们写了个内参，这内参又有人送到了周总理案头。周恩来此前不久才在第三届全国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肯定“大寨大队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进行农业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现在却有人写内参说大寨的耕地报少了，1964年粮食亩产800斤也是假的，根本没那么多。周恩来对此十分重视。看了内容，马上打电话，将李雪峰、陶鲁笏和山西省长卫恒召到中南海，严肃指出：“如果大寨耕地亩数确实有假，外国记者捅出去，国际影响不好”，他指示，立即派人到大寨重新丈量土地，核实粮食产量。于是，立即组成了国务院、华北局、山西省、晋中地委和昔阳县委派人组成的五级联合土地丈量队，奔赴大寨，开展五级丈量大寨土地工作（引自2013年9月26日《快乐老人报》）。

经过一个多月的丈量、核实，对大寨耕地一块一块丈量，

对粮食全部过秤，最后得出一组精细得不能再精细的数字。

大寨实有耕地 705 亩 1 分 9 厘，不仅没有少报，他们报的耕地比实有耕地还多了几亩；1964 年大寨粮食总产 570892 斤，平均亩产 809 斤 6 两，比他们报的亩产 800 斤，多出 9 斤 6 两，这一年，大寨人均产粮 1500 多斤，人均卖粮 800 斤。

直到此时，自从“反五风”、“四清运动”以来，有人总是怀疑大寨耕地面积不实，粮食亩产有假的风波才得以平息。

自古道：真金不怕火炼。大寨经历这几次被指造假的风波，直到由共和国总理派出的五级联合调查组认真、仔细调查，用事实证明他们没有造假，是一块经得起“烈火”炼的“真金”。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全国掀起的那场批判大寨、否定大寨的狂风暴雨中，那些牵强附会的、无限上纲的、别有用心 的指责和抨击，已经不属于“烈火炼金”的范畴，而是要把洗澡的婴儿连同澡盆一起倒进下水道彻底抛弃了。

第七节 中共领袖与大寨

1、毛主席对陈永贵说：“你搞出个大寨很好啊！”

大寨和陈永贵出名很早。1952 年，陈永贵领导的互助组，创造了亩产 500 斤的纪录，这在当时的昔阳县非常罕见，他因此成了全省劳动模范，并出席了山西省农业丰产模范代表大会。1958 年，陈永贵成了山西省特级劳模；1959 年，大寨粮食总产量达到 23.5 万公斤，亩产达到 308 公斤，陈永贵被树为昔阳县农村党支部书记的标兵应邀上北京，在天安门城楼见到了毛主席。1960 年 2 月，山西省委发出通知，号召全省基层干部学习陈永贵，将他树为“既当司令又当兵，手脑并用新英雄”，在山西已是名闻遐迩。1964 年，陈永贵应北京市委、市人大的邀请，在人民大会堂向一万多名首都精英报告大寨事迹后，其现场录音由中央广播电台向全国播放，大寨和陈永贵的名字，

立即传遍了神州大地的每一个角落。

但是，中共领袖们知道大寨和陈永贵都比较晚。那时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各行各业的英雄人物如群星璀璨，谁也无法都知道。毛泽东同志十分关注农业，他也直到1964年才听说大寨和陈永贵。

那是1964年3月，自1959年开始国家出现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已经过去，祖国大地生机勃勃，春光明媚。毛泽东心中充满希望，他决定趁春暖花开之际，到各地农村去走一走，看一看。

毛泽东乘坐的专列自京往南开，到达河北邯郸后，他通知河北、山西两个省的领导向他汇报工作。河北省前往汇报的是省委副书记刘子厚，山西省去的是省委书记陶鲁笏和副书记林铁。陶鲁笏的汇报重点非常突出，他着重谈了大寨和陈永贵。

当时，毛泽东尚不知道全国几十万个大队中还有一个大寨大队，更不知道有陈永贵其人，但陶鲁笏对大寨和陈永贵的情况已了然于胸，他汇报得非常具体，对大寨和陈永贵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事迹非常欣赏，他的汇报又极富感情，一下就感染了毛泽东。

“他是哪几个字，识不识字？”

陶鲁笏一一作答后，又专门介绍了陈永贵在北京万人大会上的演讲，讲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放的现场录音，《人民日报》发表的长篇通讯《大寨之路》及其配发的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等等。

刘子厚在汇报中，也谈到河北一些典型，有的也很不错。但真正打动毛泽东的是大寨和陈永贵。

“你们有没有材料？《人民日报》那篇文章我怎么没看到？”

陶鲁笏知道，大寨和陈永贵已引起毛泽东的关注和兴趣，立即让秘书把有关大寨和陈永贵的材料全部呈上。

毛泽东历来提倡调查研究，他讨厌对事物的一知半解。第

一天陶鲁笪汇报后，毛泽东感到还不够，让陶鲁笪留下继续谈。第二天，陶鲁笪集中谈了山西省学大寨学陈永贵的情况，以及山西农村由此出现的新气象。

听了陶鲁笪一天多汇报，毛泽东非常兴奋，他竟高兴地站起来，说：“好！山沟里出了好文章。陈永贵识字不多，做的事情可不少！”

专列继续南下，听了陶鲁笪对大寨和陈永贵的详细汇报，又看了有关材料，毛泽东为发现了一个新典型高兴不已。每到一处地方，他都要向前来汇报的省委领导讲大寨，讲陈永贵。

对于陈永贵来说，1964年12月26日，是他终生难忘的日子。

那天是毛泽东主席七十一岁生日。毛泽东历来不主张过生日，也很少过生日，即使过生日也就和身边工作人员吃一顿饭，工作人员给他做一碗寿面，连他的孩子都很少参加。这一年刚好开过三届全国人大，他决定用稿费置办三桌饭，宴请一部分工农战线和科技界有突出贡献的劳模代表。那天散会后，周恩来总理突然通知陈永贵，说，跟我吃饭去。陈永贵跟着周恩来，一走就走进了毛主席住的地方。钱学森、王进喜、邢燕子、董加耕、余秋里等人已经在座。

毛泽东似乎是向人们申明：“今天不是过生日，也不是祝寿，而是实行‘三同’。我用稿费请大家吃顿饭。我的孩子没有来，因为他们没资格。这里有工人、农民、科学家、解放军。不光吃饭，还要说说话嘛！”

陈永贵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能享受这种殊荣，他被幸福冲得不知所措。他更没有想到的是，一见面，毛主席就握着他的手说：“你是农业专家。”他一听毛主席这样夸他，连头都晕了，只是一个劲地嘿嘿傻笑。

入座后，被邀请的工农和科技劳模都和毛主席同席，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坐另外两桌。

吃饭时，毛泽东还向陈永贵介绍湖南菜，一下叫他吃这

个，一下叫他尝尝那个。毛主席得知陈永贵那年正好 50 岁，说：“五十而知天命，你搞出一个大寨很好啊！”

在中国五千年历史上，我敢说，没有哪一个农民享受过这种殊荣。

1966 年 8 月 14 日，毛主席向全国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把大寨推向了全国。

2、周恩来对陈永贵说：“我都不敢认大寨了，你们老的少的都干得好啊！”

周恩来总理对大寨的肯定和推介，同样堪称前所未有。

就在毛泽东主席宴请陈永贵等劳模吃生日饭之前，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大会议上，代表国务院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以罕见的篇幅，对大寨作了大力宣扬——

“……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地进行农业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

“这个大队原来生产条件很差，是一个穷山恶水土地薄，全部耕地都在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地方。十几年来，这个大队在党的领导下，充分调动群众积极性，以加工改造耕地为中心，结合运用‘八字宪法’，高速地发展农业生产，他们进行了大量的、艰巨的农田基本建设，把过去四千七百多块土地弄成了二千九百多块，并且都建成了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田。他们的粮食亩产量，1952 年为 287 斤，1962 年增加到 772 斤，1963 年虽然遭遇很大的水灾，但是仍然保持在 700 斤以上。

“大寨大队进行了这么多农业建设，农业生产发展这样快，完全是依靠集体力量。他们正确处理了集体和国家的关系。他们向国家只借过一次钱，第二年就归还了。从 1953 年到 1963 年的这十一年中，这个大队在逐步改善社员生活的同时，向国家共交售了一百七十五万八千斤粮食，每户每年平均交售二千斤……”

《政府工作报告》接着强调：“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

掌管九亿人口的共和国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不惜篇幅，如此详细向全国人民介绍一个仅仅 80 户人家、几百口人的生产大队的具体情况，在古今中外有谁见过吗？共和国总理对大寨作出如此高的评价，将“大寨原则”、“大寨精神”和大寨的“共产主义风格”，向全国人民如此推介，新中国历史上还有第二人吗？

1975 年 1 月，召开全国第四届人大，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陈永贵当了副总理，当然也得到毛泽东主席认可。陈永贵当了副总理，表现得确实非同凡响。他遵循毛主席“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教诲，会一散，就去了广西，接着是福建、浙江、西藏……他四处调查研究，奔走呼号，将大寨种子和大寨精神，传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他不遗余力地把“农业学大寨运动”，不断推向高潮，全国大地响遍了学大寨的声音，打开收音机，就能听到各地学大寨的新闻，能说陈永贵对中国农业的发展没有贡献吗？

周恩来不仅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肯定大寨，宣扬大寨，而且不顾年事已高，工作又十分繁忙，一次又一次陪同外宾访问大寨，让大寨走向世界。

1965 年 5 月 21 日，周恩来和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陪同阿尔巴尼亚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一副主席科列加率领的阿尔巴尼亚政府经济代表团访问大寨。这是他第一次把外宾带到大寨。周总理这次来大寨，给大寨人民留下了十分难忘的印象。

刚走进大寨，周总理就发现在欢迎的人群后面，有一个老汉非常激动，立即主动伸出手拉住了老汉的手。此人就是那个在旧社会打了半辈子长工，入社时受陈永贵影响，特意到集上买了一头壮牛入社的老贫农牛国栋。这使大寨人民亲眼看到了

共和国总理对一个普通农民是多么亲切啊！

周总理领着阿尔巴尼亚客人来到郭凤莲家后，郭凤莲的姥姥送给他窝窝头，周总理一边把一半窝窝头分给客人，一边带头吃起了窝窝头，这就是有名的周恩来在大寨用窝窝头招待外宾的一段佳话。

接着，周总理来到老英雄贾进才家，宋立英也送周总理一个窝窝头，他立即吃了一半，将另一半用手绢包起来，说是要带回北京，“让其他首长也尝一尝大寨的窝窝头。”

面对1963年被特大水灾冲毁后新盖起来的房子，周总理连声说：“大寨人不多，干的事不少，不简单啊！”

看完村子，周恩来又领着客人上了虎头山。山上树不多，便对陈永贵说：“虎头山应该多栽些松树。”

望着山下的田，又说：“应该修一些排水沟，防止洪水危害。你们这里十年九旱，不解决水的问题不行啊！”

来到地头，周总理说：“你们要注意改革农具，要向机械化要劳力。”……

共和国总理对大寨的山水田园，如此细微地观察，如此周到的叮嘱，在当今世界不说绝无仅有，肯定也十分罕见。可见周恩来总理对大寨是多么关心，对大寨的感情有多么深厚。

周恩来离开大寨后，当天晚上，陈永贵就召开支部大会，山西省省长卫恒没走，也列席了支部会。陈永贵在会上极为激动地说：“总理指出大寨的林业和水利没有上去，这就是我们的努力方向，我们决不能辜负总理的期望……”

第二天，又召开了大寨联队党总支会议，山西省长卫恒在会上深情地说：“现在大寨已不是一个中国问题，而成为世界问题了，一定要搞得更好……”

陈永贵是一个雷厉风行的人。开完会，他就组织大寨人民落实周总理的指示：栽树、治水。

1967年4月23日，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陪同越南总

理范文同，再次来到大寨。与他第一次来大寨相隔不过一年多时间，可一进村，周恩来就高兴地说：“大寨变化真快啊！同我第一次来大不一样了。”

此次来，周恩来对大寨已非常了解了，他一边陪客人参观大寨的田园村庄，一边不停地向客人介绍大寨的七沟八梁一面坡，介绍1963年的特大灾害和大寨人民如何艰苦奋斗创建家园……娓娓道来，如数家珍。

周总理第三次到大寨是1973年4月23日，他偕夫人邓颖超和副总理李先念偕夫人林佳楣，陪同墨西哥总统及总统夫人一行共65人，浩浩荡荡访大寨。这次是墨西哥总统提出要看大寨。此时，周总理因有病在身，身体大不如前，但他对大寨的感情却有增无减，还像前两次一样，仍然不坐车，坚持步行上虎头山，而且在山上兴致勃勃地向客人详细介绍大寨人民艰苦奋斗的事迹，一讲就是几十分钟。连邓颖超都笑着对客人说：“你们看，总理成了大寨的讲解员了！”

周总理不无自豪地回答：“我对大寨就是比较了解嘛！”

在虎头山上，周总理举目四顾，高兴地说：“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山上没有树，如今已树木成林，梯田又修得这么漂亮，还修了蓄水池，我说的大寨人全都这么做了，好啊！”

时值四月下旬，天气已开始热，周总理既不坐车，也不戴草帽，却走遍了虎头山上山下。陈永贵几次去扶他，他都不让扶，只顾一路谈笑，向客人介绍大寨，一边赞扬陈永贵：“我都不敢认大寨了，你们老的少的都干得好啊！”

是的，陈永贵领导着大寨，“老的少的都干得好”，使大寨一年一个样，一天一个样。以致连周总理都惊叹“大寨变化真快啊”，“我都不敢认大寨了”。这对于日夜关注全国人民吃饭问题的共和国总理，确是一种慰藉，他打心里希望有更多大寨，更多昔阳。在虎头山上，他就殷切地对陪同他的山西省和晋中地区的领导说：“昔阳是天大旱人大干，我要将你们一军，你

们要学大寨，学昔阳啊！”

临走时，周总理叹息道：“我老了，不会再有希望来大寨了，如果身体好，一定再来。”

这是周总理在大寨的最后留言，短短数语，充分体现了他对大寨的牵挂之情。

一个拥有 960 万平方公里土地和九亿人口的共和国总理，每天有多少问题要操劳，人们不难想象。但是，他却三次去大寨，又有病在身，他却坚持步行，一走就是四公里，其辛劳人们不难想见。但他却说：“来到大寨，就要有大寨精神！”如此钟情大寨精神的精神，难道还不感人至深吗？

3、叶剑英：“大寨真经取不完，全民奔向虎头山”

1977 年 9 月 11 日，叶剑英和汪东兴带着各自的家属，由陈永贵陪同，和当时的国防工办主任邹家华以及吴冷西、熊复、胡绳等人来到大寨。专列抵达阳泉后，叶剑英就对前来迎接他们的大寨党支部书记郭风莲诚挚地说：“我是来向大寨学习的！”

叶剑英、汪东兴一行进入大寨后，先去看望了陈永贵的家人，并赠送了礼品，然后和陈永贵全家合影。接着去看望了大寨老英雄贾进才、宋立英一家，夸奖他们为改变大寨作了贡献。

在大寨期间，叶剑英、汪东兴一行看了大寨海绵田，登上了虎头山，参观了大寨牧场，考察了石坪大队……大寨的山山水水和大寨精神，深深感染了两位党中央副主席，他们和随行人员一起谈笑风生，夸大寨不简单。

一天参观回来后，陈永贵见汪东兴情绪很好，就请他题字。汪东兴欣然答应，提笔就写下了：“学习大寨人民……”

陈永贵连忙说：“汪副主席，请你别这样写。”

郭风莲也接着说：“汪副主席，您这样写，俺就不叫您写了。”

汪东兴停下笔，非常动情地说：“永贵啊，我是真心实意

学大寨。毛主席在的时候，他老人家经常对我们说，大寨很好啊，全国都要向大寨学习。主席因年纪大了，工作又忙，生前没能来大寨，现在毛主席不在了，我们来了，亲眼看了大寨。我和叶副主席来大寨，是完成毛主席的遗愿。我是真心实意学大寨。全国农村都像大寨该多好啊！就像小平同志说的，全国有三分之一，粮食就没地方放了，所以我要这么写。”

汪东兴说得很动感情，也拨动了所有在场人的心弦，大家都点头称是。陈永贵也点了点头，说：“汪副主席这么一说，我同意写这句话。因为大寨是党的，是全国人民的。”

经过几天参观，叶剑英更为大寨精神和大寨的变化，高兴不已，诗情洋溢。十四日晚上吃完饭，就伏案作诗，写得很晚。睡下不久，半夜过后又起来写。凌晨刚睡一会，天不亮又起来写，几乎是一气呵成写好《游学大寨杂咏》八首（选七）。

大寨当年乱石岗，劈山育土捉龙王。
我来正值风灾后，产量能超去岁粮。

叠叠梯田密密粮，通风水利足阳光。
山区自古难耕稼，大干今成粮果乡。

村无懒汉地无荒，万众齐心上战场。
登上虎头山上望，环山绿带披新装。

大寨姑娘大寨型，热心集体不谋身。
共同学习同劳动，苦战关头没后人。

老少上工不锁门，不虞偷盗不欺邻。
忠诚老实为集体，革命养成大寨人。

火车飞越靠车头，永贵领班居上游。
莫道丰收来得易，斗争场上度春秋。

大寨真经取不完，全民奔向虎头山。
中游击揖争先渡，共产仙乡唱凯旋。

叶剑英的诗，几乎对大寨的方方面面，都作了生动的描写和由衷的赞扬，堪称字字含情，句句动人。特别是“大寨真经取不完，全民奔向虎头山”两句，形象地道出了这位革命前辈，对当时全国学大寨的盛况和希望全国人民都学大寨“真经”的殷殷之情，更令人感动。

4、邓小平说：“中国有三分之一的地方，赶上大寨、昔阳，我们的粮食就没地方搁了。”

邓小平对大寨的充分肯定和赞扬，同样令人难忘。1975年全国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半截在昔阳召开，下半截在北京开。会前毛泽东主席有个批示，要求能去的政治局委员都参加会议。

1975年9月14日，这次大会在大寨开幕，邓小平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在开幕会上发表了讲话。他一张口就提出了问题：“毛主席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现在我们有多少粮？”问完以后，他接着自己作了回答：“全国还有的县、地区，粮食产量还不如解放初期……”

江青立即插话：“不能那么说，那只是个别地方。”

邓小平并不让人，马上反驳：“就是个别地方，也是值得我们很好注意的。”

邓小平主张学大寨。他认为如果都用这种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战天斗地，中国农业、农村、农民就大有希望。因此，邓小平在和江青争论的同时，对大寨赞赏有加。他说：“我早就跟外宾吹过，中国只要有三分之一的地方，赶上大寨和昔阳

县，我们的粮食就没地方搁了。”

邓小平说的是真话。这些话，他不仅对国内同志讲过，也对外宾讲过。这说明他对大寨比较了解。一个仅几百人的大寨，当时向国家交售的粮食，平均每年都超过20万斤，多时达50万斤，总共向国家交售了数百万斤粮食，这是了不起的贡献。因此，邓小平在会上强调，学大寨一定“要真学，不要假学，不要半真半假。真学，就表现在学到了，回去就老老实实干……”邓小平认为，“实现四个现代，关键是农业现代化”，而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在中国就离不开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大寨精神，他在会上特别告诫与会人员：“学大寨，请大家注意，不要只看到粮食产量，要研究大寨、昔阳的一些具体政策……”

邓小平在这样一个全国性大会上，对大寨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并特别强调，学大寨“要真学”，“要研究大寨、昔阳的一些具体政策”，无疑说到了学大寨的点子，给与会人员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第八节 郭风莲调走了，陈永贵去世了， 只有大地在诉说着大寨的昨天……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这艘巨轮，驶入了一个新的航道。开完三中全会，陈永贵匆匆回了昔阳，他要去参加县里召开的党代会。此时，安徽正在大力推行小岗村的包产到户。对于这种经营模式，当时众说纷纭。有的人高兴，更多的人却是反对或者不理解。带领大寨人民搞了几十年集体化的陈永贵，从自己的实践中，亲眼看到了集体化的优越性，他认为，要使中国农民达到共同富裕而不是穷的穷富的富那样一种两极分化的局面，除了集体化别无出路。他在会上说：“人家怎么干，咱管不了。我们昔阳不干就是。”

大寨人经过几十年艰苦奋斗，有效地治理了七沟八梁一面

坡，从乱石荒草中开垦出了 700 多亩海绵田，实现了高产稳产，亲身体验了集体化道路给大寨的山山水水，给大寨人民的生产、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真实地享受到了集体化的甜头，自然不愿分田单干。要分田，干部不通，社员不通，陈永贵、郭风莲当然更不通。但是各地都在执行“不换思想就换人”的原则，分不分田，已经成为区别是非的标准，成为干部去留的界线。那里的上级对大寨当然也已“另眼相看”，他们一次又一次，连续五次派出工作组，到大寨去开会，做工作，对那里的“极左”思想进行批判、轰炸，但效果并不理想，问题并未解决。其中的关键因素，就是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郭风莲“跟不上形势”。上级领导对这种顽固的“思想僵化”，自然十分恼火，他们决定采取强制措施——“不换思想就换人”。

1980 年 6 月 21 日，身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的郭风莲，正在大寨有名的狼掌窝和群众一起埋水管，突然传来一道“圣旨”，叫她立即去县委一趟。

接“旨”后，郭风莲甚至顾不得抹一抹满脸汗水，跨上单车，就直奔县城。

在大寨已经成为很多人——从政府高官到几乎所有媒体——批判的靶子以后，包括郭风莲在内的大寨人，心里都有点懵，不知中国发生了什么事？不知大寨犯了什么弥天大罪？党和政府一贯倡导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和坚持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怎么一下都错了？

郭风莲一边使劲蹬着单车往县里奔，一边隐隐地感到，似乎要出什么事。但她并没有想到，等待她的是一个叫她无法承受的打击。

匆匆走进她熟悉不过的县委大院，来到不知多少次来过的县委书记办公室。

木无表情的县委书记，面对满头大汗的郭风莲，居然连握手这种最一般最起码的热情也没有，不仅没有半句客气话，甚

至连官场那种难以免俗的开场白，也省略了。面目冷峻的县委书记，就像铁面判官宣读判决书一样，立即向郭风莲宣布县委决定：郭风莲，组织决定你离开大寨。

除了战争年代，在中共历史上，凡干部调动，从来都要先通通气，听取本人意见。如此宣布的决定，仿佛一根猛然击向郭风莲的大棒，几乎把这位当年坚强无比的铁姑娘队队长、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击晕。她木然地站在县委书记面前，半天没有说出话来。

“为什么？”过了好一会，郭风莲才开口，但县委书记立即打断了她的话：“不要发问，不要争辩，服从组织决定。就这样，越快越好。”

这就是一名县委书记，对一位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宣布调离决定的全过程，简单到不足半分钟。比法庭完成审判程序后，法官向罪犯宣布判决结果还简单。

此时，郭风莲已经明白，在这股批判、否定大寨的狂潮中，大寨不光必须分田单干，曾经为改变大寨面貌，为大寨这面红旗，出过力，流过汗的人，都已经成了被批判对象，自己已成了牺牲品。

拖着沉重的脚步，郭风莲推着单车默默地走出了她曾经非常熟悉，此时却十分陌生的县委大院。

第二天一早，郭风莲带着极其简单的一卷行李，一步一步回头告别了 20 多年来，她不惜淌血流汗、不辞辛劳为之奋斗、拼搏的这片热土。她知道，至少在当下的大寨这片热土上，已没有了自己的立足之地，她被“上级”赶出了大寨。

当年赫赫有名的铁姑娘队队长，冒着漫天飞雪和零下 20 多度的严寒，带领姐妹们在狼掌窝夜以继日奋战，手上不知磨出了多少血泡，磨烂的肩头不知多少次化脓流血，钻心地痛，她眉毛都不曾眨一下。此时，她那罕见的泪水却盈满了眼眶，顺着脸颊往下流，心中的痛苦实在太重太重，压得她喘不过气。

她是党一手培养起来的干部，是一名女干部，她和所有女干部一样，需要理解，需要关怀，需要信任。几十年来正是党的关心、爱护、支持和信任，使她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鼓满了干劲；每一根毛发，都焕发着精神，她以中国妇女特有的纯朴，对党怀着海一般的深情；她像虎头山上的青松一样，坚韧不拔地迎着艰难险恶，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拼搏奋斗，为造就大寨的辉煌，献出了自己的全部青春和全部心血。她把党视同自己的母亲，她没有做过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的事。她对党和人民总是赤胆忠心。她实在无法理解，上级的决定，怎么会如此突然，如此无情，如此残酷！离开大寨还不行，还得离开昔阳，这和古代的流放，有多少区别呢？她像一只落难的孤雁，被人抛到了晋中地区一个她很熟悉的果树研究所，去挂一个副所长的空衔。她对果树研究可是一窍不通啊！

在批判、否定大寨的岁月里，最难受最焦心的当然要数陈永贵，他与大寨的每一寸土地，与那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血肉相连。那里是他几十年如一日为之奋斗，为之拼搏，为之献身的地方。就是在那片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土地上，和大寨人民一起，创造了大寨无与伦比的辉煌，树起了誉满全球的大寨红旗。大寨对于他，已经比生命还重要。他宁肯去死，也不愿让大寨红旗倒下。

他几乎整天闷在家里，成天抱着头，经常不吃饭，不睡觉，不说话，实在困了，就往沙发上一倒，他像丢了魂一样，分不清白天黑夜，弄不明斗转星移。几十年来，在各种困难各种灾害面前，他表现出来的是无所畏惧的彪悍和勇猛，他从来没有在任何困难、任何挑战面前有过退却。但当他面对潮水般涌来的批判、攻击和诽谤，却没有招架之力，他甚至无法预测，等待自己的是什么样的命运。

当时的陈永贵，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堪称名声显赫。但陈永贵从不为名声所累。身为共和国副总理，

家属小孩理当进京。但是，陈永贵不干，他始终认为，共产党人时刻要想到自己是人民的勤务员，而不是旧社会高高在上的官吏。从互助组、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他在大寨、在昔阳总是吃苦在前，吃亏在前，为群众做出榜样。当了共产党的“高官”，更要为共产党人立个榜样，决不能搞旧时的夫荣妻贵。他让老婆领着孩子，仍在大寨挣工分养活自己，连城市户口也不让转。山西曾经背着陈永贵，给家属小孩转过户口，还准备把他们送到北京。手续都办好了，最后才告诉陈永贵。陈永贵一听，就拍了桌子：“我不同意，谁敢！谁办的，谁给我退回去！”结果硬是把办好的户口退回了大寨。

陈永贵不仅让家属领着小孩仍在大寨挣工分，自己也在大寨拿工分吃饭，自然也就没有城市户口。那时粮食随户口供应。陈永贵的户口在大寨，粮食当然也只能由大寨供应。因此，每年秋收后，分给陈永贵的那份口粮，就得由当地粮站将粮食换成粮票，再分给陈永贵。大寨仍按全劳力给陈永贵记工分，每天工值一元五角钱。和大寨的其他劳力享受的是完全一样的待遇。

这样的共和国副总理，我敢断言，无论古今中外，肯定是绝无仅有。若与今天某些高官大吏——不，甚至某些芝麻小吏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相比，岂止是天壤之别呢？

周恩来总理曾建议陈永贵拿工资，他却回答：“算了吧。”婉拒了周总理的美意。

按照陈永贵的级别，得给他配专职秘书、警卫员、厨师、专车等等。

但陈永贵有自己与众不同的想法和个性。对国家规定的这些东西，他至死都不习惯。后来，周总理通知山西省军区政委谢振华，在山西军区给他配警卫。陈永贵的回答只有两个字：“不要！”谢振华告诉他，不要不行，这不是对某个人的问题，是组织的安排，必须服从。陈永贵一听“组织安排”，只好说：

“那就要个昔阳的。”但他规定，警卫员不能跟他去大寨。到了大寨他要下地干活，后面还跟个当兵的，那像什么话？给他配的秘书，也是昔阳县委的干事，同样不能跟他去大寨。他说屁股后面跟着警卫员、秘书，会吓着大寨人。

大寨曾经决定给陈永贵每月补助40元，他坚决不要。他说，“吃双份”就是剥削。直到1974年，山西省委书记做了工作，每月给他补助60元。当了副总理以后，国务院按规定每天补助1.1元，此时，山西也给他加到100元。这就是陈永贵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全部收入。这些钱都由警卫员张银昌管理，到月底拿着账本向陈永贵报账。那时的中国不像今天，公款吃喝成灾，那时根本没有公款吃喝一说。陈永贵客人多，有大寨的、昔阳的、山西的，还有在北京的老乡，他不仅留人吃饭，还留人住宿，那些钱当然无法对付。当时陈永贵是“三三制”，即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北京办公，三分之一的时间到全国各地农村搞调查研究，三分之一的时间回大寨劳动。每次回大寨，他都要把家里的棒子面、土豆之类的大寨土产大包大包带回北京。陈永贵烟瘾大，他抽的是1角9分钱一包的劣质烟，那烟只有太原一家宾馆有卖，每次去太原他都要买一大包带回北京。他吃的也很简单，早晨就是一碗小米粥，再加几片腌菜，中午最多两个菜；如果吃面食，就是炒苦瓜之类的蔬菜；平常主要吃小菜。他过的基本上还是中国农民的生活。他对这样的生活，已经感到很满足。

这就是身为九亿人民的共和国副总理陈永贵的生活和为人。

自从各种媒体批判大寨以后，陈永贵虽然很想不开，但他首先把公家给他配的厨师退了，让妻子料理生活。才过完春节，他又匆匆搬出中南海，住到了复兴路的部长楼。他退掉了国家配给他的红旗车，仅留下一台生活车，而且他也很少用。他宁肯去挤公共汽车，宁肯自己走路。这就是农民“宰相”的陈永

贵难改的秉性。这样的干部今日中国还能找到吗？

各种无限上纲、捕风捉影的责难、抨击、诽谤，使他深感委屈，甚至愤怒，但他无处诉说。他日夜想回大寨，那里与自己同艰共苦的乡亲，那里的山山水水、花草树木，没有一样不叫他牵肠挂肚。一想到这里的大寨，他就心痛，他就揪心。然而，他回不去大寨。

1986年3月25日，陈永贵这位和农民一样拿工分的共和国副总理，这位在大寨七沟八梁一面坡奋斗了一生的中国农民，这位以罕见的气魄和毅力征服过常人无法征服的大自然狂暴的铁汉子。终于走完了他人生最后的痛苦旅途，离开了这个纷繁凌乱的世界。

4月4日是中华民族传统的清明节。陈永贵将在这一天回到他魂牵梦绕的大寨。为了按照我们民族的传统，迎接陈永贵回来，大寨乡亲们为他搭了一个简易灵棚。谁也不会想到的是，“上级”传下来一道“圣旨”：立即撤掉！不许迟疑，没有任何商量余地。在陈永贵的骨灰还没有到达之前，大寨人迫于那个不容商量的“上级命令”，不得不撤掉了他们为迎接陈永贵搭建的灵棚。

当捧着陈永贵骨灰盒的陈明珠踏进大寨，整个大寨都被哀恸的哭声啜泣淹没，人们倾“寨”而出，在陈永贵的骨灰后面，跟着浩浩荡荡的人流和花圈。那是“上级”无法阻挡的老百姓，是一辈子也忘不了陈永贵带领他们几十年如一日，为改天换地日夜挥汗战斗的大寨人民，那是谁也无法改变的民心 and 良心。他们永远不会忘记陈永贵给大寨带来的新面貌，给大寨群众带来的新生活，给大寨这个穷山沟带来的荣耀和辉煌。

郭风莲被上级调走了，陈永贵去世了，连灵棚都被“上级”拆掉了。但是，虎头山无法调走，变成了高产稳产田的七沟八梁一面坡，以及用那些可以从大寨铺到大庆的条石，修建起来的几十道巍峨屹立的堤坝和堤坝内高产稳产的海绵田，既无法

调走也无法拆掉。大地是谁也搬不走的。因此，今天走进大寨，人们依然能看到陈永贵和乡亲们用心血汗水，写在那片大地上的锦绣文章；依然能听到那片拥抱着陈永贵的大地在诉说着大寨的昨天……

第九节 到底是谁在干蠢事

1、上级命令：立即下马！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这个民族出现了一种很不好的现象——因人废事，因言废事，甚至因言废“字”。林彪成了反革命集团头子以后，就说林彪根本不会打仗。可他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岛，三大战役指挥了两大战役，能说他不会打仗吗？邓小平说了一句“永远不再搞运动”，“运动”二字就被绑赴“刑场”，打入十八层文字地狱，在中国从此消亡。1978年以后推行小岗村的“大包干”，人民公社在一夜之间被消失，98%以上的农村搞了分田单干，比当年的“合作化运动”，声势更大，也更迅猛，能说不是“单干化运动”吗？在否定大寨的狂潮中，凡是大寨或陈永贵干的，就都是错误的，都要批判，都要否定。“西水东调”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大寨缺水，陈永贵带领大寨社员修渠道，修水池，做出了别的很多地方可能至今没有做到的事情。特别是1965年周恩来总理陪同阿尔巴尼亚客人访问大寨时，对陈永贵说：“虎头山上应该多栽些松树”，“应该修一些排水沟，防止洪水危害。你们这里十年九旱，不解决水的问题不行啊！”周总理离开后，陈永贵就带领大寨社员栽树、治水，很快使虎头山绿树成荫，使水利问题得到了较好的解决。

陈永贵的眼睛当然不止看到大寨，他心里装着中国。

昔阳缺水比大寨有过之而无不及，全县五分之四的地方都缺水。一遇干旱，因为没水，四处逃荒流浪的事司空见惯。不

少人家为了挑一担水，得翻山越岭走几十里路，堪称滴水贵如油！人与人之间，村与村之间，因水打架斗殴之事，时有发生，由此造成了多少悲剧，谁也说不清。陈永贵对这种情况，了如指掌，时常挂在心头。很早他就知道河南林县人民艰苦奋斗，历时十年修好了红旗渠的事迹，使他心灵震撼。但他只是大寨大队支部书记，对昔阳没有发言权。

陈永贵当了昔阳县的领导后，认为昔阳学林县的机会到了。为解决大寨的水，他向周总理拍了胸脯。现在昔阳成了他的大寨，他要解决昔阳的水利问题。他无数次翻山越岭，到处找水。不断琢磨，怎么解决水的问题。

昔阳西边有一条河，叫萧水河。但中间隔着一座并不很小的山。要引萧水河的水灌昔阳，就必须把这座山打通。那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得修 180 公里干渠，凿十九公里隧道。大体核算需要 5000 万资金，需投数百万个工。这样浩大的工程，在昔阳历史上，绝对没有人想过。这个工程被称为“西水东调”。陈永贵在昔阳县委书记任上就提出来了，因为县委中有人反对，曾被搁置。

然而，这个浩大的工程最终还是在 1977 年上马。从搁置到上马的过程，笔者手头没有具体资料，但可以肯定经过了不少曲折；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陈永贵从中斡旋，根本不可能上马。但是，如果没有比陈永贵级别更高权力更大的人物支持，没有昔阳县广大干部群众的认可，陈永贵一个人也绝对不可能把这样一个牵动全县上上下下的浩大工程推上马。

工程上马后，县委领导几乎全部上了工地，还动员机关干部、学校教师、企业工人……浩浩荡荡开赴工地，和社员们一起劳动。全县各部门的所有机关干部，先后都到 30 里外的工地劳动了两个多月。也有人对此心中不满，但陈永贵带了头，有话也说不出口。陈永贵当了 7 年昔阳县委书记，也配了一个办公室，但他几乎就没有在办公室坐过，不是下工地，就是去农

村。即使开会到深夜，他还要回大寨，也不要车，总是一个人叼着旱烟杆往回走。若是白天散会，回到大寨总是不入家门先下地。即使后来当了国务院副总理，他也经常回大寨，只等车子送到村口就下地了。他有一句口头禅：“劳动模范，不劳动算什么模范！”

西水东调工程上马后，陈永贵更是心系工地。当时提出的口号是：“向一九八〇年第三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献礼。”

令人欣慰的是，经过昔阳人民三年多苦干，西水东调工程进展顺利。杏庄水库即将竣工，安坪渡槽已搭好架子，各种材料也运到了工地……昔阳人民付出的巨大劳动，已是硕果初现。

1980年6月，人们正在热火朝天大干，工地上人山人海，炮声隆隆。人们无不盼望早日解决昔阳的缺水问题。谁也没有想到的是，突然有人驱车来到地工，宣布上级命令：立即下马！

正在挥汗干活的人们全都呆了，埋炮的人问：“还点不点？”

指挥部的所有头头脑脑顿时懵了，他们心焦如焚，欲哭无泪，苦苦哀求道：“缓几天吧，不要多，只要几天！”

但是，命令如山倒！不行！一刻也不行！

有人气得晕倒在地上……

《人民日报》随即发表了题为《再也不能干西水东调的蠢事了》的社论。此文所说“干蠢事”的人就是指陈永贵。接着，又发表了长篇通讯，指责西水东调“投资巨大收益小，劳民伤财效果差”，文章还列举了一些数据，说搞西水东调花了多少工，耗了多少钱，搬迁了多少人，造成了多少人无家可归，算出了每亩地花多少钱，我们“花不起这钱”等等；还有的文章把“西水东调”和秦始皇修万里长城、隋炀帝造运河相提并论，以证明“劳民伤财”必定垮台。

笔者对秦王朝、隋王朝因何垮台，不想详说。但一千多年前开凿的大运河，至今还在灌溉两岸粮田和航运，为人民提供生活用水和饲鸭养鱼；万里长城则和非洲的金字塔一起被列为

世界八大奇迹之一，成为中华民族和所有炎黄子孙的骄傲，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西水东调”被说成是陈永贵“干蠢事”、“不懂科学”的典型例子，受到众多中国“精英”及其掌控的各种媒体狠批痛斥。但是，陈永贵却一直没有忘记西水东调。1985年，那位当过十年晋中地区农业学大寨办公室主任的雷震一等人，去看望陈永贵时谈起西水东调，陈永贵还凄苦地笑着说：“碰到省里领导、中央领导，还是说说，已经花了那么大功夫，丢了可惜，好不好？”此时，陈永贵已没有任何职务，甚至已被批得“声名狼藉”；而且直到他的生命已走到尽头的弥留之际，他还用低得没有力气的声音，对来看望他的人说：“我死后，只要有机会，还是向领导说说，请他们把工程搞好，国家已经花了钱啊……”陈永贵至死都牵挂着、惦记着“西水东调”工程和昔阳缺水，希望为老百姓解决水的问题。

西水东调工程被上级强令下马，是权力发挥到极至的表现，也是官僚主义不顾昔阳缺水、人们盼水大搞瞎指挥的“杰作”。但是，历史是人民写的，是非功过，最后并不由权力决定。公理自在人心。

十年后，昔阳大旱，人们便想起了那个“西水东调”工程。包括众多领导者在内的不少人，在那个半截天桥前，在尚未完工的水库旁，沉思，叹息，痛惜工程的半途而废，怀念陈永贵的叱咤风云和非凡胆识。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到山西考察旱情时，人们在汇报中特别提到“西水东调工程”，此时再没有一个人说搞西水东调工程不合算，也没有一个人说搞这个工程我们花不起钱，当然更没有一个人再说什么“西水东调”是“劳民伤财”之类的混账话了。

听了汇报，邹家华说：“现在不仅昔阳缺水，山西缺水，整个华北都缺水。要把解决水作为经济的一个重要问题加以研究和规划……”

山西省委书记胡富国在这个大旱之年，去昔阳调查灾情，来到了当年的工地，面对半拉子工程，沉默良久，说：“我赞成再咬咬牙，花点钱，争取‘八五’把这件事办好。”

“八五”时，“土地分了，人心散了”，要调动浩浩荡荡的大军，要协调好千家万户的土地，谁有这个本事？！要花的钱，当然也远远不再是当年那个数字了。

报载，当年写《再不能干西水东调的蠢事了》那篇文章的作者，在文章发表五年后重返昔阳，看到昔阳的旱情之后，说了一句话：“如果当时上马是蠢事的话，那下马就更蠢！”

当年那个“上级”的“下马命令”，为什么人们苦苦哀求：“缓几天吧，不要多，只要几天”，都不行？不就是因为“西水东调工程”是陈永贵搞的吗？当时的气候就是，只要与陈永贵有关的事都要否定，都要批判，这样的“上级”真是匪夷所思啊！

在“西水东调”工程上马之前，陈永贵为了把昔阳办成大寨县，从1967年他在昔阳掌权开始，就对昔阳全境着手规划，展开了改造。他的办法就是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搞群众会战。先后修建大坝一千多公里，造耕地六万多亩，干了大小工程八千多项。一个二十多万人口的小县，在短短几年间，干了这么多工程，在中国历史上我不知有谁见过。陈永贵就是在经历了亲自实践的基础上，认定一条路，只要依靠群众，干了大的还能干更大的。于是，在上级领导支持下，上了“西水东调”工程。我在想，西水东调工程因为是陈永贵搞的，后来的“上级”就当成是“干蠢事”的典型命令下马，那么陈永贵主持修的1000多公里大坝，造的6万多亩耕地，干的大小大小8000多项工程，是不是都要否定，都要废除，都要摧毁呢？

而今，昔阳城里居民生活的用水，企业的用水，全都有赖于那个工程。如果那个强令下马的命令晚来几天，或者面对人们的苦苦哀求晚宣布几天，该多好啊！真不知道那个“上级”当时是不是有点神经错乱？

有一位作家曾经写道：“用‘不按科学办事，必然付出惨重的代价’这句批评西水东调工程的话，若是安在那个下马的命令上，倒是恰到好处。”后来的事实，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这位作家的话非常正确，让人民“付出惨重的代价”的，难道不就是那个下达下马“命令”的“上级”吗？今天，人们有理由问：到底是谁在干蠢事？这种蠢事的结果应该由谁负责呢？

2、“不敢白抽人民一盒烟，不敢白吃人民一顿饭的社会主义实干家”都下台了

干部问题是一个很重要很敏感的问题。是能者上、勤者上、廉者上，还是相反？是任人唯亲唯派还是任人唯贤唯公？既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利害福祸，也关系到国家民族的成败兴衰。

陈永贵历来对干部要求很严，他的用人标准就是唯公。大寨大队的保管员是一个在当时被很多人认为不堪信任的富裕中农，就是一个例子。大寨的干部在陈永贵言传身教的熏陶下，一心为公的思想普遍在心中扎了根。这是大寨这个穷山沟，能够比较彻底地旧貌换新颜，迅速发展经济的基本保证，它与那个在156个月中，竟有87个月靠救济过日子的小岗村，形成不可思议的鲜明对比。

但是，国家把大寨树为农业战线的红旗后，人们对大寨的要求更高了。一直非常关心大寨的周恩来总理，就对当了昔阳县委书记的陈永贵提出，昔阳不仅要出粮食，也要出人才，好一点的支部书记就可以派出去。不久后，李先念副总理参观大寨后，也向陈永贵提出，可以把有经验的干部调出去，帮助落后地区改变面貌。这对陈永贵既是要求和希望，也是一个启发。如果能从大寨从昔阳派出去一些得力干部，到各地去传播大寨精神改变那里的面貌，农业学大寨不就能取得更好的成效吗？

也就在这时，寿阳县有人提出县里班子不力，工作搞得不好。要求昔阳派人去帮助工作。这个要求很快还反映到了省里。当时，陈永贵已成了晋中地区领导，他的目光也从一个昔阳县

扩大到整个晋中地区。寿阳县属晋中地区。如果先把寿阳县搞成大寨县，再把晋中地区搞好，就能在全省更好地推广农业学大寨，使大寨县在山西遍地开花岂不妙哉？因此，陈永贵同意了寿阳县的要求。

1974年，由山西省委下发文件，派出张怀英等8人组成的班子，去寿阳主政。但是，陈永贵对这支即将去寿阳主政的班子，既充满希望又不无担心。临行前，除了和张怀英谈话外，还专门和他们集体谈话，又鼓励、又交代、又警策。一再嘱咐他们，到了新地方，决不能丢了大寨精神，绝不能给大寨和昔阳丢脸！一定要把寿阳的工作做好，首先必须把粮食搞上去。

张怀英是一个很有头脑的干部，对农村工作非常熟悉。他一到寿阳就发现那里派性严重，导致干部队伍思想很不稳定。“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他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稳定干部队伍。他公开指出：“没有稳定的干部，就没有稳定的工作，就没有稳定的产量，就没有稳定的发展。”他对干部采取的办法是，不管你“派不派”，就看你“干不干”。很快稳定了干部的队伍，使不少干部的思想由“派”转为“干”，整个派性也缓和了。

接着，由自己带头，张怀英安排县里领导每人负责一个公社，要求和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谁搞不好就换谁，一下就把干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调动起来了。

张怀英去寿阳之前，全县粮食总产量是九千万斤，两年后，全县向国家交售的余粮就超过1亿斤。寿阳县的粮食产量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全县人民皆大欢喜，并受到邓小平的高度赞扬：“有个寿阳县，这个地方我去过，那里和昔阳一样穷得不得了，两年（粮食）就翻番了不得啊！”

张怀英在寿阳的工作特别出色，获得中央和地方的肯定，两年后被山西省委提拔为运城地委书记，他从运城的实际情况出发，特别注意着眼于未来，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仅引黄

干渠就修了五千多里，使那里的粮食获得大丰收，水利部长到那里视察时，激动地说：“这是没有见过的高速度”。可是，在推行小岗村大包干时，他不肯分田单干，有人就说他一个夏天吃了一万多斤西瓜，还说他“搞特殊化坐过北京吉普车”。一个地委书记坐过北京吉普车就是“搞特殊化”，一个夏天谁能吃得了一万多斤西瓜？这样的问题听起来就很荒唐。但是，就因为这些问题，不仅被撤职，连党籍也被开除。说到底不就是不愿分田单干，不就是因为他用大寨精神，改变了寿阳的落后面貌，又使运城面貌大为改观，但这样的好党员、好干部，却被撤职、开除党籍！

1975年，全国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首先在大寨召开，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听说昔阳李家庄公社石坪大队搞得很好，便去石坪参观。石坪的党支部书记叫陈有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农村干部，华国锋见了他高兴地说：“陈有棠，大有名堂，到我那里去帮助一下吧。”

华国锋的老家在山西交城。于是，山西省委派陈有棠带着一帮人，到交城主持工作。

此后，山西省委又把昔阳南恼大队党支部书记李锁寿派到平定县当县委书记，很快使平定县的面貌大为改观，粮食产量大幅增长，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对李锁寿在平定县工作中的突出表现和所取得的成绩，极为赞赏，特意指定《人民日报》派记者去采访。很快，《人民日报》就刊登了《社会主义实干家李锁寿》的长篇通讯，对他的优秀事迹进行了报道。后来有人拍了一部电影《泪痕》，那位县委书记的原型就是李锁寿。

西固壁大队党支部书记李七毛，被山西省委派到榆次县当县委书记后，积极深入基层，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地头和农民研究生产指导生产，甚至亲自挑着粪桶掏厕所，挑大粪，充分显示了劳动人民的本色，深受群众欢迎。

临县是一个非常落后的贫困地方，粮食产量一直上不去。

山西省委书记王谦亲自点将，将昔阳县拖拉机队的支部书记刘乃柱派到临县任县委书记，让他尽快解决临县人民的吃饭问题。刘乃柱到临县后，首先深入调查，发动群众，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解决了那里几个老大难问题，使粮食产量大幅增长。国家农业部部长霍士廉到临县考察时，对刘乃柱去临县后发生的巨大变化极为赞赏，高兴地对他说：“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解决了老大难，了不起，临县人民拥护你们……”

从昔阳派出去的这些干部，完全可以说个个都干得很出色。每到一处都使那里的面貌发生了令人刮目相看的变化。因此，昔阳的干部不仅被上级派到昔阳以外的县，也走进了山西省委，还走到了山西省外，前后从昔阳派出去的干部达数十人之多。

陈永贵对这些派出去的干部，无不寄予满腔希望，离开昔阳前总要再三叮嘱：“你们去，一定要好好干，不要叫人家撵回去！我对你们又放心，又不放心。我最担心最害怕的是人家把你们撵回来……”

那些干部长期受到陈永贵言传身教的熏陶，熟悉陈永贵的套路，也佩服陈永贵的为人。他们被派到一个新地方后，都把改变当地面貌，首先提高粮食产量，改善群众生活当作首要任务来抓。在工作中他们自觉地以陈永贵为榜样，身先士卒，身体力行，艰苦奋斗，勤政廉政，受到群众的拥戴。他们无愧于“人民公仆”的称号。

但是，这些在“农业学大寨”时，由“上级组织”委派出去的昔阳干部，在“大寨红旗”被人“抛弃”后，又被他们的“上级组织”莫名其妙地免职了，赶下了台，赶回了老家。他们带着两手老茧，一身汗渍，和该干的事却尚未干完的遗憾，回来了。但他们问心无愧，那位被称为“社会主义实干家”的李锁寿被免职回来后，曾动情地说：“我在平定这么多年，不敢白抽平定人民一盒烟，不敢白吃平定人民一顿饭。我不干好对不起人啊！”

在干部问题上，用谁不用谁，谁上台谁下台，是一种无声的但十分具体形象的导向，是执政者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和人品道德思想的反映，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标志。对于一个执政党，当然也是执行什么路线的大事。“不敢白抽平定人民一盒烟，不敢白吃平定人民一顿饭”的“社会主义实干家”下台了；派到一个“穷得不得了”的地方，迅速使那里的粮食“两年就翻番”、被邓小平称赞“了不起”的县委书记下台了；和农民一样“挑着粪桶掏厕所，挑大粪”的县委书记，“临县人民拥护你们”的县委书记等等，因为来自“不仅要出粮食，也要出人才”的昔阳，因为他们坚持和传播大寨精神，因为他们派到哪里就改变了哪里的面貌，创造粮食“两年翻番”的奇迹，都下台了，被赶回了老家。谁上台了呢？福建政和县丁仰宁那种“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的县委书记，请来了；像山西翼城县武保安那种8个月敛财500多万元，最多时2天就敛财100多万元的县委书记上台了；像湖北天门县张二江那种“吹卖（官）嫖赌贪”五毒俱全的“五毒书记”；像湖南郴州市雷渊利那种“玩权力、玩金钱、玩女人”的“三玩书记”都高升了；像福建林龙飞那种“全县的官位卖光，财政的钱花光，看中的女人搞光”的“三光书记”，杭州市许迈永那样“钱多、房多、女人多”的“三多书记”；像安徽宣城市杨枫那种安排首席情妇用MBA管理“情妇团队”的市委副书记；像江苏盐城市徐其耀那种把140多名二奶一一登记造册供其玩乐的市委副书记；像山西长治县王虎林那样两个月批发430顶官帽的卖官书记；像安徽省安庆市王成那种已搞了500个女人，奋斗目标是搞800个女人的贪官等等，都打着改革的旗号，纷纷登上了中国官场史无前例的腐败“明星”榜。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批大（寨）学小（岗村）以来，中国官场如此上台下台，对于我们的人民和我们这个民族，到底是悲还是喜是福还是祸？是大幸还是大不幸？到底是谁在干蠢

事？

3、“是中国的骄傲”还是“极左的样板”

大寨精神被抛弃了，大寨的红旗被砍倒了；陈永贵被批“臭”了，连他死后大寨人民为他搭建的简易灵棚，也被“上级”拆掉了，可谓死无“停尸”之地；郭风莲被县委书记命令：迅速离开大寨。当年山西省委从昔阳派出去帮助落后地区改变面貌、夺取粮食高产的“社会主义实干家”们，一个个都被赶下了台。一句话，大寨以及与大寨有关的人和事，都被打入了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冷宫，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

但是，人们没有想到的是，很多外国人却没有忘记大寨，没有忘记陈永贵。

大寨被党和国家树为中国农业战线的一面红旗后，仅1963—1979年，就有134个国家计二千二百八十八批，总共二万五千四百七十八名外国各界人士竞相去大寨参观学习。其中包括二十二个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特别是那个莫桑比克总统，参观一次还不过瘾，第二次又去了大寨。荷兰公主来到大寨后，高兴地说，她和她的丈夫早就向往大寨，要来参观大寨。来到大寨她感到非常高兴。

陈永贵作为中国副总理，曾代表中国农民访问美国、日本、朝鲜、柬埔寨、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墨西哥等许多国家，无不受到热烈欢迎。比如，访问墨西哥时，陈永贵还没到，人家就印好了他的大幅画像，陈永贵抵达墨西哥时，墨西哥总统不仅亲自率领农业部长等一批政府要员前往机场迎接，还组织人们举着陈永贵的画像，夹道欢迎。那可是西方人欢迎总统一级的规格。与此同时，在全国各大影院放映电影《大寨田》，向墨西哥人民宣传大寨精神。

尽管墨西哥农业和中国农业的搞法不是一个模式，但墨西哥也学大寨，搞起了农业改革，大寨影响了墨西哥农业，给了墨西哥农业以启发和鼓励。

1973年4月，墨西哥总统偕夫人，率领数十名政府官员来到中国后，就要去大寨参观。他们兴致勃勃地看了山下看山上，看了堤坝看海绵田。总统喜不自胜地说：“陈永贵的有机农业战略，对我们很有启示。”

也许是为了感谢“陈永贵的有机农业战略”对墨西哥的启示吧，墨西哥总理居然不远万里，特意给大寨赠送了一套喷灌设备，以支持大寨农业的现代化！

佩服和怀念陈永贵的，当然远不止墨西哥总统。那位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就参加过中国农村土地改革，后来又受周恩来特邀重返中国的美国人韩丁，与陈永贵和大寨堪称情深意笃。陈永贵生前，他五次去大寨，陈永贵死后，还四次去大寨。1994年再次去大寨时，这位七十五岁高龄的美国农业专家，竟大跑到大寨地里，把一块块石头往外扔。陪同人员不解，问他这是干啥？他毫不客气地说，“这样种地不行，还得有陈永贵精神！”原来那石头是分田单干后的地界标志。

1996年清明后，昔阳要开一个纪念陈永贵逝世十周年大会。韩丁的妹妹韩春闻讯后，头天深夜打来电话，说要参加大会。这位曾参与制造了美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核专家，从上世纪四十年代来到中国，就和丈夫阳早一起在中国养了一辈子牛，为中国的畜牧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的美国老太，当时正在北京。会议负责人得知后立即回电，告诉她离开会只剩几个小时，等不及，叫她不要来。她却说不用你们等，我能赶到。韩春放下电话就上火车，一夜未睡，第二天果然提前赶到了会场。既代表她哥哥韩丁，也表达了自己对陈永贵的怀念。

我们的东邻日本，不少中国精英对它的腾飞非常佩服，把它视为强国的榜样。其实，日本的腾飞首先就得益于中国。早在1894年，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后，被迫向日本赔偿白银二亿八千万两。当时的日本天皇即刻发布圣旨：这笔钱一分也不许乱花，全部用于教育。日本政府奉旨大办学校，即使是偏僻的

山寨、渔村，也都办起来一所相当像样的小学，因此奠定了日本教育的坚实基础。正是在这个基础上，通过明治维新，造就了日本的经济腾飞。再比如，我国五十年代制定的《鞍钢宪法》，曾经是我国在基础十分薄弱的情况下，快速建立起工业化体系的指路明灯和动力。上世纪八十年代被当权者抛弃，而日本许多大企业，至今将《鞍钢宪法》的精髓——两参（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一改（改革技术）三结合（领导、技术人员和工人相结合），运用于企业管理，收到了良好的效益。

大寨也不例外。我国对大寨和大寨精神，弃之如蔽履，日本人却一直在学大寨。直到陈永贵去世，大寨被批判后，日本人还不惜跨洋过海多次来大寨参观取经。日本土地匮乏，堪称寸土寸金，唯一的出路就是向大海要地。他们搞围海造田，就是从大寨筑堤垒坝搞人造平原中，受到启发，并学习大寨艰苦奋斗的精神搞起来的。大寨艰苦奋斗，改天换地的精神和事迹，使日本人获益匪浅。日本学者们说：“大寨海绵田，不仅对中国农业发展有意义，对日本的农业发展同样有意义。”

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说得更令我们感动：“大寨是中国的骄傲！”

笔者学识浅薄，实在难以判断：被某些中国精英们视为“在中国农村具有极为愚蠢、卑劣甚至野蛮的影响则属无疑”的陈永贵和他的大寨，被那些大权在握的“圣明天子”和高官大吏们抛弃了，被众多当年大歌大赞大寨，一转背又大批大毁大寨的“精英”们批“臭”了，但是，包括日本那样的发达国家，却不辞辛劳一次再次跨洋过海来大寨学习取经，到底是日本人蠢得不远万里到中国来把我们丢掉的垃圾，拿回去当珍宝，还是某些中国精英蠢得把自己的宝贝，当作垃圾抛弃了呢？到底是谁在干蠢事呢？

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称赞“大寨是中国的骄傲”，中国的副总理、人大副委员长万里，却说大寨“是极左的样板”，

他们把大寨打入了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冷宫，到底是谁在说蠢话，干蠢事呢？

1964年，毛泽东主席对陈永贵说：“你是农业专家”，“你搞出了一个大寨很好啊！”1966年又号召全国“农业学大寨”。

1965年，周恩来总理代表国务院在《政治工作报告》中向全国推介：“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此后又三次领着外宾去大寨参观，甚至亲自作“讲解”，把大寨推向世界；

1977年，叶剑英副主席在大寨参观后，欣然赋诗八首，礼赞：“大寨真经取不完，全民奔向虎头山”。

1978年，华国锋总理在五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代表国务院强调：“要把农业搞上去，主要靠认真学大寨，实行科学种田，加快农业机械化步伐”，并且“保证到1980年把三分之一的县建成大寨县”。

周恩来总理曾指示陈永贵：昔阳不仅要出粮食，也要出人才，要把好一点的支部书记派出去；

李先念副总理也指示陈永贵：要把有经验的干部派出去，帮助落后地区改变面貌。

数以百计的省、部级领导和众多各界人士参观大寨后，赞扬大寨，歌颂大寨……

邓小平不仅跟国内同志讲，还跟外宾讲，“中国只要有三分之一的地方，赶上大寨、昔阳，我们的粮食就没地方搁了”；1975年在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大会上，他除再次重申以上讲话外，特别强调：“学大寨，不要假学，不要半真半假。真学，就表现在学到了，回去后老老实实干……”，而且，还要求与会人员：“学大寨，不要只看到粮食产量，要研究大寨、昔阳的一些具体政策”。这些话可是言犹在耳啊！

1980年，中共中央在山西有关“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报告”

上的“批语”中，赫然写道：“全国各地学大寨的农业先进典型，绝大多数在生产上、建设上是有成绩的，在农业战线上做过贡献。周恩来所总结的大寨的基本经验以及这些经验在全国的推广，也曾起过积极的作用……”

党中央主席、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对大寨说过的这许多话，中共中央对大寨充分肯定的批语，以及数以百计的省、部级领导和各界无数专家、学者对大寨的赞扬，后来全被称为中国“农村改革的真正先驱”、“中国农村改革之父”、“真正的圣明天子”及其支持者们，全盘否定。他们把大寨一棍子打入了冷宫，用生产水平最低、粮食产量最少、最落后、最贫穷、一半以上日子靠别人养活的小岗村作为旗帜，取代了大寨。到底是从中国的毛泽东、周恩来、李先念、叶剑英、邓小平等第一代中央领导，以及数以百计的省部级领导乃至外国元首、学者专家对大寨的赞扬和肯定都错了，还是“真正的圣明天子”、“农村改革的真正先驱”者万里们错了？到底是谁在说蠢话、干蠢事呢？

第三章 从百业支农到百行坑农

第一节 由热而冷的中国农业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从新中国建立之日起，就十分重视农业。特别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吸取苏联忽视农业的教训，确立“农轻重”的国民经济发展国策后，农业被摆到了首要位置。书记挂帅，全党抓农业，全民大办农业，各行各业支援农业，成为当时国家的重要方针和整个社会的共识。县委书记、县长、地委书记、专员乃至省委书记省长和各省农、林、水等方面的厅局领导下乡办点抓农业的例子比比皆是。每到春耕春播和抢收抢种季节，机关，学校，工厂，矿山，街道……纷纷组织支农小分队，自带粮票餐费，打着红旗下乡支农，成了不成文的规矩和人们的自觉行动。

当时，国家工业还不够发达，不少物资相对匮乏。但是，诸如化肥，农药，柴油，汽油等农用物资的生产和供应，无不优先满足农业需要，而且价格也特别优惠。笔者至今记得，在家乡农村上世纪七十年代市场汽油供应每升 0.15 元，支农汽油每升仅售 0.08 元。优先农业优惠农民成了全党和整个社会的共识。

没有想到的是，农村改革后，各级组织对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的关心和重视，普遍大不如前，使中国农业由热变冷。比如，国家对农业的投入，是国家对农业重视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在国家推行市场经济后，金钱成了市场的唯一杠杆，离开钱什么也干不成。但各级政府

及其官员似乎只忙于改革，忙于发展经济，几乎把农业排除在发展经济之外，国家虽然连发了5个一号文件，但并没有落到实处，在事实上对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越来越淡漠，国家对农业投入的急剧下降就是证明。从国家财政对农业资金投入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看，据国家有关部门统计，1953—1980年27年间，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在全部投资中的比重，平均为10.6%，其中1979年高达13.5%，1981—1985年平均下降到5.1%，“七五”期间再下降到3.36%。“七五”期间与1953—1980年27年间的平均比重相比，已不足原来的三分之一，1994年则降到了2.6%，此时已不足1953—1980年平均投入比重的四分之一。1994年6月底，全国计划投资500万元以上的在建工程总规模为3.4万亿元，而其中的农业项目合计投资仅9.23亿元，只占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0.28%（引自1995年5月7日《湖南日报》）。

从国家对农业的投资总量来看，即使排除物价上涨因素，也是逐年下降。其投资总量从1980年的52亿元下降到1987年的36亿元，从整个“六五”期间来看，国家对农业投资年均172.8亿元，仅占国家全部投资的5%左右，还不到“五五”期间10.5%的一半。农业银行和信用社对农业的贷款，则由1980年的128.3亿元，下降到1985年的27.8亿元，占整个农业贷款的比重为22.3%，下降到5.3%；乡镇企业对农业的支援，由1980年的22.7亿元，下降到1985年的8.8亿元，下降了61.2%（引自1988年5月30日《世界经济导报》），国家用于农业基础建设、农田基本建设、农业技术改造、科技开发、农业机械、农业资源开发等等增加农业发展后劲的中长期贷款，也少得可怜。

这三三十年来，有关省（市、区）里的厅（局）长、处长，地（市）县里的县长、书记、科（局）长买官卖官、贪污受贿几百万至几千万的报道，屡见不鲜，层出不穷；地方官员强征强占农田，以化肥、农药、种子坑农害农的报道，也时有曝光。

而省里的厅（局）长、处长，地（市）县里的官员到农村去蹲点，深入田间，指导农业生产，推广科学种田，帮助农民解决具体问题的报道，却鲜有所闻；就连那些农业大县的书记、县长、农业局长，甚至连乡（镇）党委书记、乡长，深入农村，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帮农民解决诸如农药、化肥、水利等问题的事，在我们的报端杂志等新闻媒体上，再也难以见到。这类应该抓农业、管“三农”的官员们，似乎都忘记了农业，忘记了我国仍是一个农业大国的基本国情。仅从上面列举的若干数据和有关情况，我们就不难看到，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国家的不少政府机关和管理部門，对事关 13 亿人民吃饭大事的农业问题，已经越来越淡漠，投资越来越少。

我们再看看农机农具的生产供应情况。

毛泽东同志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提出，用 25 年时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国务院据此于 1971 年召开的全国农业工作会议上制定了在 1980 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的目标任务。1978 年被邓小平一刀砍掉农业机械化以后，国家几乎不再提四个现代化，更不提农业机械化。而且，连原来办起来的专为满足农业生产需要的大批农机农具厂，也被砍掉或被搞垮，弄得农机农具生产大滑坡。

以南京为例。据人民日报 1989 年 12 月 5 日报道，截止 1988 年，南京市的农业机械生产厂家，由 1983 年的 75 家，锐减至 15 家，只剩下原来的五分之一；而且，剩下这五分之一的农机农具企业，受利益的驱使，有相当一部分主要不是生产农机农具，其中的 10 家企业只有三分之一的产品是农机具，三分之二的产品不是农机具，有的是生产工业除尘设备或压力容器之类的产品。据南京市统计，1983 年全年中小农机具年产量为 223.583 万件，到 1988 年，只生产 182.04 万件，减少 41.59 万件；半机械化农具，由 1983 年的 1914 万件，下降到 1988 年的 508 万件，锐减 1406 万件，只剩下原来的 26.54%，

减少了 73.46%。

南京只是全国的一个缩影。农机农具企业和农机农具产品，如此锐减，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家大力发展扶持农机农具生产，并要求每个县都办一家农机农具厂，形成鲜明的对比。

尤其令人忧虑的是，国家对农业的忽视与忽略，造成人们对农业的淡漠乃至淡忘。

1989 年《人民日报》报道了山西省阳高县进行的一次问卷调查。参加测验的 1000 人中，干部、工人、学生、知识分子，各 250 人。问卷中有一道题——“您认为我县当前要抓好哪几项工作？”其中回答要抓农业的仅占 0.5%。阳高县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在一个农业县里，从国家公务员、知识分子到工人、学生，还记得要抓农业的比例，居然少到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这难道不是国家淡漠农业的具体反映和中国农业的悲剧吗？

第二节 假劣种子坑农天下罕见

“好崽要好娘，好种才有好粮，”是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大力提倡农民选种，积极推广良种时，笔者家乡的老师为配合宣传政府号召，到处张贴的一条标语。它比较形象地说出了种子与提高粮食产量之间的关系。

农村改革后，随着政府机关对农业的由热而冷，随着官场腐败的日益加剧，拜金主义的日益泛滥和社会道德的日益沦丧，以及由此造成的某些政府管理部门的日益疏懒、不负责任，导致中国农业的种子问题日益严重。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竟然恶化到了叫人无法容忍令人发指的地步。

1994 年 4 月 25 日国家技术监督局公布了对河南、山东、河北、湖北等七个农业大省的 89 个经销单位经销的玉米、棉花种子，共 156 个样品的抽查结果，合格率仅为 19.2%，不合

格率超过 80%；其中抽查的 108 个玉米种子中，纯度合格率仅 2.8%，不合格率高达令人膛目结舌的 97.2%；抽查山西、河南两省 18 家经销商经销的 42 个种子样品中，无一合格。其中山西太原市南郊种子分公司经销的“农大 60”种子，四项检测指标，一项也不合格（见 1995 年 10 月 19 日《中国检察报》）。

1996 年 4 月 26 日，国家技术监督局再次公布了种子专项检查结果。共抽查四川、江西等十三个省、自治区 120 家企业生产和经销的 189 批次种子样品，合格率仅为 40.7%，其中抽查玉米种子样品 89 批次，合格率仅 9.0%，棉花种子 38 批次，合格率为 60.5%，水稻种子 72 批次合格率为 68.1%。也就是说，国家技术监督局抽查十三省（区）120 家种子企业生产和经销的 189 批次种子样品中，合格率连一半都不到。由此造成的后果更是令人愤慨。比如，所抽查的水稻种子样品，拿到海南进行种植试验，结果发现总数 1572 株中，不育系杂株 968 株，占 61.85%，如果将这样的种子播到地里，秋天将颗粒无收。

这是国家技术监督局于 1994 年 4 月和 1996 年 4 月先后两次在全国范围内抽查的结果，其情况之严重堪称触目惊心。再看看局部地区的情况吧。

1996 年 5 月 31 日《中华工商时报》披露，新疆自治区种子质量监督部门对全区 24 家种子企业的玉米种子进行抽查，结果情况更加严重，按照国家规定的种子质量标准检验，无一合格。

三年后的 1999 年 5 月 9 日，《中华工商时报》再次披露，陕西省技术监督局于当年一季度对全省部分农资产品进行抽查，重点抽查全省市场的农用水泵、农膜、地膜和夏播杂交玉米种子等产品，对该省 7 个地市的 47 家种子生产经销企业的抽查发现，其中夏播杂交玉米种子共 97 批产品中，仅有一种达到国家规定的二级产品标准，其余 96 批种子全部不合格，合格率仅为 1.03%。

关系到中国农民切身利益、中国农业发展前途和 1.3 亿中国人民生存的种子问题，从全局到局部地区都恶劣到如此地步，我相信无论在中国历史上还是世界历史上，大概都不曾有过。

一位老农曾对报社记者说：“我种了一辈子地，从未见过不抽穗的种子。”但是，农村改革后，他终于亲眼看到了“不抽穗的种子”。

我们再看看，那些“不抽穗”的“种子”，给中国农民带来了多少欲哭无泪的灾难和损失。

1995 年，是广西邕宁县 2600 多户农民最痛苦的一年。这年夏天，他们望着 7000 多亩良田颗粒无收的惨景，望着自己投入的种子、化肥、农药和起早贪黑的辛勤劳动，全部付诸东流，他们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愤怒，一个个跺脚骂娘！

春天，他们曾满怀希望从县种子公司购买了“汕优 63”杂交水稻种子，谁知后来才知道，这批种子根本就不是早稻杂交组合的“汕优 63”。

该县东平坡村农民龚庭侃说：“今年春上，我买了 10 斤稻种，插播 6 亩责任田，光化肥一项，每亩就用了 80 多公斤，打了 3 次农药，总共投入了 700 多元，结果却弄得颗粒无收”！这位老实巴交的农民，流着泪不解地说：“我们农民一年辛苦只盼个好收成。收成不好，城里人不也没有口粮吗？为什么要用假种子坑我们呢？”

1999 年，山东省章丘市黄河乡和高官寨镇的众多农民，在 4000 多亩地里播种的“鲁单 50”玉米种子，出苗后，任你怎么中耕，浇水，施肥，就是不长高。他们从没有见过这样不长高的玉米，深感不安，便将种子送到农业部质量监督检测中心济南站，请求检验。结果发现这批“鲁单 50”玉米种子的纯度，仅为 14%。如此低劣的种子根本不能使用。农民们不得不含着眼泪，愤怒的为几千亩永远长不高永远不会抽穗的玉米犁翻，损失达 100 万元之巨。

1996年可能是山东省曹县庄寨镇农民最倒霉的一年。他们谁也无法相信，通过正规渠道，从章丘市与刁镇种子站以每公斤80.1元价格调入，上面堂而皇之印着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标志和章丘大葱发明人孙日如头像的铁罐里装着的5000公斤大葱种子，居然全是假冒伪劣货，用这些种子播种的万亩良田，根本长不成大葱，给农民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即超过4000万元。满怀希望种葱致富的农民，得到的是一年心血白费汗水白流。尤其严重的是，这种大葱种子远远不止种在曹县庄寨镇的万亩良田里，还种在江苏、山东、河南、安徽、河北等省至少20万亩良田里，（引自1996年8月13日《经济新闻报》），给如此众多的地方农民造成的损失之惨烈，笔者已无法计算。

洞庭湖畔的澧县，是湖南省的重点产棉大县。1994年3月，该县金罗镇人民政府从该县良种棉加工厂购入的“湘棉10号——代棉”棉种4927公斤，供应给了8000多户农民。谁知农民们将这些棉种播种在5000多亩良田里后，平均发芽率竟不到7%，损失达100万元之巨（引自1994年7月4日《消费时报》）。

最让我难以下笔的是安徽岳西农民的遭遇。

岳西——这片红色土地，当年曾经是鄂豫皖三省游击战争的大本营，红二十八军团的发祥地，老一辈革命家李先念、徐向前等都在这一片土地上留下了自己的脚印，洒下了自己的汗水。而且这片土地上的旅游资源极为丰富，被誉为“华东的瑞士”。然而，农村改革的“浩荡春风”，并没有给岳西这片资源丰富的红色土地带来什么引人注目的生机。据1994出版的《走向新世纪的岳西》中所介绍的岳西，依然背着两大包袱。一是缺粮，全县70%的农民靠国家供应粮食，直到农村改革16年后，1997年，农民人均收入也不过500元，人均耕地0.6亩，即使丰收年景，全县缺粮超过3500万公斤，人均缺粮200公斤。二是缺钱，40万人口的县，直到1991年财政最高收入也只有

2600 万元，群众生活之艰难和县级财政的入不敷出，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经过农村改革近 20 年后，假种给岳西农民带来的灾难倒是使他们做了一次令人心酸的“扬名”。

1995 年，岳西县种子公司向湖南汝城三江口边境经济特区农林牧种源公司购入杂交稻种“汕优 63”和“协优 63”共 3 万公斤，全是假冒稻种，结果导致 7124 户岳西农民耕种的一万多亩良田颗粒无收。这一年他们至少损失粮食 700 万公斤，既使本来就非常缺粮的岳西县的粮食问题雪上加霜，更使 7000 多户白流汗水白种田的农民欲哭无泪，苦不堪言。（参阅 1995 年 11 月 5 日《中国检察报》）。

诸如此类例子，自从推行小岗村的分田单干以后，可谓比比皆是——

1994 年，历来有湖南龙山县“粮仓”之称的苗儿滩镇，由于受伪劣稻种坑害，全镇 8623 亩稻田，其中的 2231 亩颗粒无收，至少损失粮食 1000 吨；

2001 年，长沙市岳麓区天顶乡骑龙村彭振明等 10 户农民，看到很多邻居都将稻田改作菜地种西瓜，可以增加收益，便和大家一起用稻田种西瓜，希望形成规模效益，多赚点钱。谁知“面朝黄土背朝天，致富种子撒稻田”，结果却因“买的竟是劣质种，竹篮打水一场空”，以致《长沙广播电视报》响亮地发出了“西瓜绝收谁之过”的责问。

1996 年，革命老区河南确山县刘店乡的姚楼、黄楼、鲍庄、独山等 4 个村的 320 多户农民，播种的 518 亩小麦，因假种子绝收。78 岁的杨梅老大娘家种的 3 亩小麦全部绝收，见了前去采访的记者后，伤心地哭着说：“俺的口粮咋办啊！”这哭声让闻着心酸而心悸。

1999 年，陕西关中、陕南 20 个县及河南、山西两省部分地县 20 万农户，因为使用了假种子，导致 20 万农户的萝卜全

部绝收，损失达 5000 万之巨……

以上列举的，仅仅是假冒伪劣种子给农民造成生产上的最大灾难——绝收的几个例子，只是假冒伪劣种子危害农民的冰山一角，但这几个例子不是也足以令人触目惊心了吗？想到每天为我们提供粮食、蔬菜的中国农民，居然遭受着这种令人发指的坑害，当我们端起饭碗的时候能不愤怒吗？

第三节 农资坑农更胜洪水猛兽

笔者之所以用“更胜洪水猛兽”一词描写农资坑农，是基于这样的理解——洪水再凶，不过三五天顶多十天八天就过去了，一年最多一次、两次；猛兽再凶，也不过一时之猛；而利用农资对农民进行坑害，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迄今近三十年未见有多少收敛，简直是无处不在，无日不见，叫农民躲亦无处躲，防亦不胜防。真是无可奈何！不是比洪水猛兽更凶猛更可怕吗？

农资乱涨价，便是坑农的极其普遍的一招。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吸取国民党统治期间物价混乱，甚至一日三涨，害得老百姓叫苦不迭的惨痛教训，全国物价自 1950 年至 1979 年平均每年仅上涨 1%，国家对物价掌控极严。其中尤以农用物资掌控更严，国家大多实行优惠供应。比如，化肥、农药、柴（汽）油等重要农用物资，都是由公社供销社按国家规定的统一价格，直接分配到各生产大队，由生产大队直接分到生产队，不经过中间环节，谁也不敢乱涨一分钱。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国家放开价格后，各种物资的价格暴涨，便像泛滥的洪水，谁也无能为力。1989 年，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就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说，他无法控制物价。这就无奈地告诉人们，中国物价放开后已完全失控。“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待开张”。在高层领导人提出“无商不活”的口号后，全

民经商的中国，人人可以定价，特别是当时国家依然控制的部分物资，政府也是说涨就涨，想涨多少就涨多少，导致全国物价混乱不堪。三日一涨，五日一涨，乃至一日三涨的事，并不少见，其中尤以农资为甚，弄得农民苦不堪言，怨声载道。

1988年，属于国家掌控的碳氨，每吨价140元，到1993年就涨到每吨320元，1994年再涨到335元，1999年一下突破每吨400元大关，1999年与1988年相比，11年间上涨2.9倍。同样属于国家掌控的尿素，1988年每吨价580元，1993年涨到1200元，1994年再涨到1400元，1995年涨到每吨1800元，进口尿素则涨到每吨2100元至2300元；有的地方已涨至2500元。1995年与1988年相比，7年间涨幅超过4.3倍。作为农民不可或缺的碳氨、尿素，其价格如此暴涨，在过去绝对是闻所未闻的“奇迹”。

某些肥料垄断经销商，对农民实行的完全是掠夺。以钾肥为例。中国农民需用的钾肥主要靠进口，但进口权主要被中化集团和中国农资集团垄断。在2007年国际钾肥出口到中国港口的到岸价是每吨1800~1900元，而这两家垄断集团因为掌控着进口权，奇货可居，给国内经销商的批发价，一倒手每吨即涨到了4000元，差价达每吨2000元以上。2007年进口钾肥900万吨，其利润之丰厚，人们不难计算。乃至河北省政协副主席、国家肥料工业协会主席武四海，在这一年义愤不已地向中国钾肥垄断巨头发出了这样的质问：“你们对得起中国农民吗？！”

被称为世界五百强的化肥巨头们，为了集团私利，完全不顾农民利益。不少化肥企业、化肥经销商，恶意涨价更是肆无忌惮。

原湖南省委书记王茂林，1994年曾在省委省政府召开的一次会上，讲了他在湘西实地调查农民负担的一些情况，说到其中两件事更是气愤不已。

第一件事是，一位农民去集镇供销社买化肥，先看了价，回去取了钱再来买时，化肥已涨价；这位农民气愤的买了化肥回去，一位邻居听说后也赶去买化肥，结果化肥又涨了价。讲到这里，王茂林愤慨地说：“同志们呀，难道这是市场经济的做法吗？不！这是坑农！是捣乱！作为主渠道的生产资料公司只顾自己的利益，如此乱涨价，农民怎么买得起？！”

第二件事令王茂林更加气愤——“有一个化肥厂，一个月内涨了 17 次价。”

在这些地方，所谓市场经济，不就是肆意坑农吗？

国家的供销社和化肥厂竟然如此毫无节制的肆意乱涨价，足以说明一些唯利是图的资本家堕落成了千夫所指的奸商和吸血鬼。据新华社 1994 年 4 月 2 日报道，当年 3 月中旬开始，仅化肥、农用柴油等主要品种的农资价格，在一些地区同比价格涨幅超过 20%，而据业内人士按当时化肥、农药、农膜等农资价格平均上涨幅度粗略计算，就使全国农民增加生产性物质投入 390 亿元。粮食生产平均每亩农资费用投入比上年增加 20 多元。面对这种农资年年暴涨的局面，乃至一个化肥厂老板竟敢在一个月内连涨 17 次价，人们有理由问：那些执掌管理大权的政府机关，干什么去了？

在这种农资年年涨、天天涨的氛围下，各种假冒伪劣农资也如洪水般泛滥成灾，这是坑农的又一恶招。1993 年 7 月底，湖南省农药检测所承接各部门送检的农药样品 38 个品种，共 171 批样品，其中合格 102 批，合格率为 59.6%，不合格 69 批，不合格率为 40.4%。在这些不合格的农药产品中，尤以多菌灵杀菌剂、三环唑、叶双青、代森锰锌、多菌灵等品种质量更为低劣。在检测的 41 批三环唑样品中，就有 26 批不合格，不合格率占到 63.4%，合格率仅为 36.6%。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不仅连国务院总理也公开坦言，无法控制物价，在一切向钱看的年代，从众多国家官员到普通百姓

眼里都只有一个“钱”字。干什么赚钱就干什么，怎么能捞钱就怎么干。农资生产也不例外。以湖南汨罗市为例，这个小小的县级市，到1987年共建有18家农药厂，经专家和有关技术监督、农药检测部门鉴定，大多数厂家根本不具备生产农药的条件，他们是采取以次充好、以假充真的卑劣手段，大量生产假劣农药，然后利用各种促销手段，销往湖北、江西、浙江、四川等省区的131个县市，从中牟取暴利。这些假劣农药危害了大半个中国，以致国家监察部、化工部、农业部、商业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以及湖南省监察厅等诸多部门不得不进行联合调查，最后以严重失职、渎职撤销该市市长职务了事。

但是，汨罗市与金坛县相比，可就是小巫见大巫了。截至1988年上半年，金坛县发放营业执照，从事农药生产、复配和封装的企业就有150多家之众，其中半数以上是在1987年和1988年上半年的一年多时间内一哄而起办起来的，堪称全民办“农药”。这些企业“设备简陋，技术力量薄弱，管理混乱，原料进厂不检验，生产操作无流程，产品质量无标准”（引自1988年11月2日《人民日报》）。1988年8月，农业部农药检查所检验了金坛县60个农药样品，其中51个不合格，合格的仅9个，只占15%，即85%不合格。产品合格率如此低的“农药厂”，还能叫农药厂吗？

然而，这类根本不符合国家规定，根本不具备生产条件的“农药厂”，通过各种手段，把假劣农药销往各地赚了钱，成为地方财税的来源，甚至成了地方财政的支柱，备受地方政府的支持和呵护，生产假劣产品便有恃无恐。由此造成的结果，当然只能是假劣农药遍地成灾，四处酿祸。比如，1988年在山西运城地区发现呋喃丹、敌敌畏、氧化乐果、3911、1605、敌杀死等品种农药，共2000多吨，假农药占80%以上，这类假农药被销往河南、河北、陕西、北京、四川、湖北、山东等省的农村，销售金额逾千万元之巨，给农民和当地农业造成的损

失，谁能计算呢？

1992年5月，湖南省土肥站测试中心检验各地送检的35家化肥厂生产的化肥，其中23家生产的化肥质量不合格，占65.7%。其中生产复混肥的17个厂家，有13家的产品不合格，占76.5%。15家生产过磷酸钙和钙镁磷肥的厂家，有9家的产品不合格，占60.0%。其中浏阳永江磷肥厂生产钙美磷肥有效五氧化二磷的含量仅为0.8%。2001年年初，湖南省质量技术监督系统对省内农资市场进行清理整顿，在2—4月的三个月内，共抽查农资产品926批次，合格率仅19.2%，查出假劣农资总额5717万多元。也就是说，湖南省化肥测试中心和质量技术监督系统先后于1992年和2001年两次测试或抽查农资合格率最低的仅占19.2%，合格率最高的也只有40%，叫农民怎么种好地怎么夺丰收呢？农资生产厂家如此害农坑农，是无人管还是管不住呢？如此猖獗的假劣产品不是比洪水猛兽更可怕吗？难怪《人民日报》曾载文称“用无法无天肆无忌惮等词形容伪劣农药的经销商是毫不过分的”。其实，“无法无天，肆无忌惮”的，岂止是经销商呢？那些生产伪劣农药的“老板”和支持呵护他们的地方政府及其官员，难道能辞其咎，逃其责吗？

假农药遍地充斥，真农药却十分奇缺。于是，国家又出台了一个“专营”新政，将部分紧俏农用物资由国家“专营。”但是，在一个一切都已放开，乱象丛生的金钱社会，能“专”得了吗？

1993年8月初，山东临沂市工商局对26家制售假农资坑农害农的单位进行了查处，其中25家竟是“专营”主渠道的种子、供销、农技服务等国家明文规定的农业生产资料的“专营”部门，占96.2%。即96%以上的国家专设的支农帮农单位，干的都是坑农损农的黑心事。比如，某采购站，从秦皇岛购入360吨“撒可富”化肥后，再用在本地十分畅销的德国产“狮马牌”和芬兰产“凯米拉”牌等进口化肥包装袋替代原来的包装袋，冒充进口化肥，交基层农资部门每吨加价600多元卖给

农民，至案发时已卖出 57 吨。（参阅 1993 年 8 月 7 日，《中国检察报》）

农资“专营”部门采取诸如此类手法，将其农资走入了邪门歪道后，“专营”经销单位自然就无货可“专营”了。

山东省临清、茌平、阳谷等县是重要的产棉区，那里的棉农非常理解国家缺棉的难处，都愿多种棉花为国分忧。但是，在国家对紧俏农业生产资料进行专营以后，他们需要的农资却十分紧张，比如，棉农必不可少的农药，就奇缺到了令人们无法相信的地步。

以 1988 年为例。这一年临清市计划种棉 60 万亩，需要农药 400 多吨。按国家计划却只能供应 130 吨。国家计划供应量连实际需要量的三分之一都不到。尤其恼火的是，直到这年 5 月份，国家计划供应的 130 吨农药，一两都没有到位，仅仅是一张“画饼式”的空头支票，全市只弄到 5 吨“久效磷”。平均每亩棉田仅能分到一两七钱农药。棉花是一种“种子落地，管理上马”的作物，棉苗出土不久，就得打农药治虫，否则就要影响产量，甚至可能导致绝收。

该市朱庄乡朱庄村，全村 600 户棉农，1989 年种棉 3370 亩，仅分到 2 瓶“敌敌畏”，34 斤“久效磷”，全村平均每户一汤匙。村主任沈汝孝无奈地对记者说：“叫我怎么分？”

茌平县胡屯乡 1989 年种棉 41000 亩，共分到国家计划农药“乐果”500 公斤，平均每亩棉田合 2 钱。

有的农民摊开双手，忧虑不已地说：“过去俺吃够了假农药的苦，没有专营盼专营，现在专营了，专得农药见不到了”。

阳谷县范海乡党委书记王玉俭说：“由于农药无法落实，干部和棉农普遍都有恐慌感。治虫如救火，一旦出现虫害，哭都来不及”（见 1989 年 5 月 6 日《大众日报》）

国家“放开”，农民“吃够了假农药的苦”；国家“专营”又专得农药见不到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是谁造成了这样

一种新中国建立以来从未出现过的混乱局面呢？

投机倒把是中国商场一种令老百姓痛恨不已的历史痼疾，历来为人们所不齿。自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为投机倒把“正名”以后，投机倒把就成了搞活经济的“法宝”，倍受青睐。人们不会忘记，那时不少官家子弟和有关系有门路的人们，大倒冰箱、彩电、钢材等紧俏物资，甚至公开倒卖政府批文而大发横财的黑风，吹遍神州大地。在假劣农药充斥市场，真农药则奇缺的气候下，倒农药自然就成了投机倒把者们百世难逢的良机。于是，在全国各地出现了一种可怕的新景观：“农药大旅游，价格滚雪球”的歪风卷地而来。1989年11月2日《人民日报》曾载文披露某地一批“杀虫双”农药，在层层倒卖中“大旅游”导致“价格滚雪球”的实况——农药厂售价每吨3100元，第一个倒卖者涨到每吨3300元，第二个倒卖者涨到每吨4000元，第三个倒卖者涨到每吨4500元，第四个倒卖者涨到每吨4700元，第五个倒卖者涨到每吨5100元，第六个倒卖者出手时已涨到每吨5800元。然而，一吨普通的“杀虫双”农药，从每吨3100元涨到了5800元，还在那些打着公司招牌的倒卖者手中“旅游”，并没有传到农民手里。而且，也不知道还要经过几道关卡，这个残酷的“击鼓传花”，才能传到农民手里？价格还会涨到什么地步？

对投机倒把者为了赚取黑心钱，造成的这种市场混乱，价格混乱，人心混乱，由于地方政府管理不力，甚至为了“搞活经济”，根本不去管理，或者管理就是收费，更助长了能弄到这类农民必需而急需的紧俏物资的人们，囤积居奇、层层提价、任意提价的胆量，最终只能是可怜的农民饱受盘剥。

第四节 百业坑农，“各显神通”

1. 电老虎“吃”农，张开血盆大口

1994年，湖南省委书记王茂林在省委、省政府召开的一次会上，说到他在湘西农村调研时，问过很多农民，他们用电的价格每度“没有在0.8元以下的”。这位煤矿工人出身的省委书记在会上激愤地说：“请问在座诸位，你们谁用过这样贵的电？”直到19年以后的2013年湖南省会长沙市居民用电也只有0.6元，而处于“老少边穷”地区的湘西农民，在1994年已经用上每度0.8元以上的高价电。可见那里的电老虎有多凶。

中国电业历来由国家掌控，由政府定价。推行市场经济以后，各行其是，各家定价，乱价丛生。据《第一财经日报》2013年5月26日报道，电价达千种之多，仅北京市总计就有314种。全国到底有多少种电价谁也说不清。唯电老虎“吃”人，人所共知。电老虎坑农，令人咋舌。湘西电老虎与很多地方的电老虎相比，我只能用“仁慈老虎”来描写。

福建省平潭县电力公司给当地农村用电的定价是，多数地方为每度1.6元至2元，少数地方为2.5至3.5元一度（见1998年7月9日《福建日报》）

广东省惠东县静海镇坂美村的电价为每度3.1元，该县资深乡农民用电每度3元，该乡驿后村农民用电每度达3.2元（见1999年7月5日《羊城晚报》）。

广东省汕尾市陆丰县旺美村农民用电每度2.9元，该县湖东乡农民用电的价格是每度3.5元，农民因为用不起电，有的人只好重点煤油灯，不用冰箱、电扇，有的家庭长达三年不开洗衣机（见1998年12月3日《羊城晚报》）。

广东饶平县钱东镇农民用电价每度3.1元至3.2元，该乡农民陈庭茂1999年5月仅用1度电，但电力部门却以“不足2度按2度计”收费6元，面对电老虎张开的血盆大口，从解放初期就盼望“耕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的农民，被迫让“风扇冰箱退休，油灯蜡烛上岗”（见1999年6月30日《羊城晚报》）。

青海省化隆县加合乡阿扎村是一个贫困山村，1998年农

民用电已涨到每度 2.85 元，最低时用电价也达到每度 1.7 至 1.8 元。而青海省城市居民用电价是每度 0.45 元，农民用电是城市居民用电的 6.2 倍，最低也是城市居民电价的 3.78 倍至 4 倍（见 1998 年 11 月 12 日《中华工商时报》）。

2007 年，重庆市江津区规定农用电价为每度 0.52 元。但是，李市镇部分村区的实际收费，是低则每度 1.5 元，高则每度二三元，甚至更高。该镇孔目村二组农民陈昌德 2007 年 5 月，只用 1 度电，竟要他承担 118 度“跑电”，用 1 度电，实际缴费 61.9 元（见 2009 年 9 月 15 日《经济参考报》）。

电老虎如此霸电坑农，弄得农民“谈电色变”，与国家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大力推行“包字进城”、“一包就灵”，不无关系。我们且来看看电老虎通过“一包就灵”的“包”字，怎样层层掠夺农民。

广东省惠东县供电公司推行承包制后，将下面的供电所包给个人。该县靖海镇供电所就被该所负责人林汉光承包。于是全镇 7 万多人口和工业渔业用电收费就被他一手把持，等于这个供电所在承包期就变相成了他私人所有，任由他支配。惠东县供电公司以每度 0.98 元包给林汉光，林则以每度加价到 2.04 元向转包户收费。到农户时已翻了几番，每度涨到 3 元至 3.2 元。而且，乡村承包者们不允许农户将电表装在自家门前，由承包者统一安装在电线杆高处的铁皮箱里，承包者按月开箱抄表，他说多少就是多少，农户根本看不到自家到底用了多少电。弄得三分之一的村民都不敢用电，只好重点煤油灯。林汉光这个供电所承包人，一年就吞掉 170 万元，“大老虎”如此“吃电”，下面的“小老虎”通过层层加价，自然也获利不菲。唯独农民“谈电色变”，叫苦不迭。

电老虎坑农带来的恶果，几乎令人无法相信。

广东英德市是改革开放最早的沿海地区，那里的人们是率先富起来的群体。他们面对吃人的电老虎却只能徒叹奈何！该

市黄坡镇“光辉”村的“光辉”就被电老虎一手“遮住”。那里不少村民家里的电冰箱、音响、电饭煲、消毒柜因为用不起电，只好弃置于角落湾里。他们说，“家里洋玩意都有，就是用不起啊！”

光辉村村民之所以只能面对“黑暗”而不敢追求“光辉”，是因为他们无力追求“光辉”。一位村民掰着指头给《羊城晚报》记者算了一笔账——家里5口人，有三台电风扇，一台黑白电视机，每月要交四五十元电费，一年加起来近600元，而全家全年的纯收入也就1000多元。也就是说，几乎一年纯收入的60%交了电费（引自1999年9月2日《羊城晚报》）。

我实在无法相信，有哪一个家庭，敢于或者愿意用全年纯收入的60%，去交电费以追求“光辉”吗？

据国家电监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发电企业平均上网电价为每度0.38元，输配电所国家电网为每度0.16元，南方电网为每度0.20元，终端平均售电价为每度0.58元。其中居民生活用电为每度0.47元，农业生产用电每度为0.43元，贫困县农排用电为每度0.19元。

但是，各地却打着市场经济的旗号乱定价，乱涨价的歪风不断劲吹，使全国电价达千种之多。据粗略统计，北京就有314种电价（以上引自2013年5月26日《第一财经报》），全国有多少电价谁也无法统计。可见价格之混乱。

更可怕的是“官老虎”和“电老虎”狼狈为奸一起“啃农”。在安徽省的一些地方这种现象并不鲜见。以定远县为例，该县站岗乡站岗村到户电价已涨到每度1.7元。但乡政府却在此高价基础上再加价30%，涨到每度2.20元。乡政府明文规定：机关干部用电3口人以上的家庭半年交100元，2口人家庭半年交60元，单身汉半年交30元，该县新塘乡农民用电到户价每度1.2元，机关干部用电每度0.3元，干部用电仅为农民用电价的四分之一。该县兴隆乡的干部更绝，从1994年——

1998年长达5年机关干部没交过一分钱电费，在滁县物价局、监察局的一份调查报告上显示——定远县90%左右的乡镇机关用电不交电费，80%的机关干部用电不交电费或只是象征性地交一点电费，乡镇广播站，计生委，派出所，工商所，税务所等等单位也都不交电费或少交电费。他们用电应交的电费，并非电业局免费为他们供电，他们是利用手中权力，玩了一个“干部用电，农民掏钱”的坑农游戏。随着拜金主义在中国社会的恶性膨胀，有一位回城后发了财的知识青年，曾痛斥我们这个社会已“穷”得除了钱什么都没有了。正是在这样一种“穷得除了钱什么都没有了”的大环境下，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员把贪婪的目光投向最弱势的农民，从农民身上拔毛，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成了中国社会刮起的一股黑风。

2. 百业坑农，各显神通

在七届二次全国人大会议的一次分组讨论会上，一位来自基层的代表说：“农民到银行贷款一万元，得给经办人一千元”。在改革开放搞活经济后，中国的银行胆敢如此坑害农民，在中国历史上绝对是空前的。但是农民对此却不敢吱声。

分组讨论会上，一位颇具名望的老者听后气得拍案而起，要这位代表写个材料，他立即上报。但那位代表连连摇头：“我不敢”。其原因有三。一是贷款者揭发这种事，等于暴露自己，自找苦吃；二是得罪了有关人，必然断了求贷的路，今后再也贷不到款；三是这种事早以成了惯例，治得了张三，治不了李四（参阅1989年5月12日《中国金报》）。

这位全国人大代表告诉我们，农民被坑，连揭发都不敢，只能眼睁睁继续被坑下去。

2001年4月14日《中国工商时报》披露，自1999年以后，江西省金溪县珊城、石门、双塘等乡镇的农村信用社，在给农民办理农资贷款时，不给或不全部给现金，而是大量填发借款

收据，农民只能拿着借款收据到指定的农资经营者商店去购买高价农资，任其盘剥。此中的奥秘就是信用社和农资经营者结成了一条坑农利益链

以上说的是金融部门单独或与其他部门联手合伙坑农。一些地方政府甚至挖空心思从小孩身上做文章，想出了“绑架”儿童坑农的奇招。

江苏某地基层政府曾经做出这样的规定：凡有适龄儿童上学的家庭，必须安装一部电话，交纳 1200 元初装费，否则不准孩子入学（引自 1999 年 12 月 5 日《法制日报》）

甘肃省榆中县一些乡政府为了从农民身上拔毛，故意夸大农民收入数据，比如，某村农民收入满打满算就 500 元左右，乡政府却上报 1100—1200 元，翻了 2 倍多。按此数据向农民收取统筹，农民当然无法完成。于是乡政府就规定，凡没有及时完成统筹款的农民孩子，一律不准入学。仅该乡东古城小学就有三分之一的学生因此被赶出学校（引自 1999 年 12 月 22 日法制日报）

据《深圳晚报》披露，山东省昌乐县有关部门在 2000 年曾颁布“剃头法”，规定学生必须统一剃头。比如该县朱汉镇所属 45 个村的 2600 多名中小学生，必须按上面规定把剃头费交到学校，由学校老师在规定的日子里带领学生统一到“上面”指定的某理发店剃头。有的学生父亲开理发店，但孩子不得由父亲理发，必须到“规定”的理发店去剃头。某些由人民养活的人民公仆，居然挖空思想出了这种足以震惊世界的坑农点子，他们还有什么坑农“高招”想不出来呢？

据说中国电信之昂贵创造了世界之最，而农话之昂贵，更叫农民叫苦不迭。在宁夏卅池县农村，电话初装费、月租费与市话无异，但市话费是每 3 分钟 0.18 元，农话费则每 1 分钟 0.5 元，农话费比市话费高 8.3 倍。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市话费每 3 分钟 0.2 元，农话费每 1 分钟 0.5 元，二者相差 7.6 倍。而且

农话月租费是以和呼和浩特市距离加费计算，呼和浩特市市话月租 15.1 元，农话则是以每距市区 12 公里加费 12 元，若距市区 120 公里，则在 15.1 元的市话月租基础上再加 120 元。

到邮局取汇款，古今中外都是汇款时已支付相关费用，收汇人凭汇款单到邮局取款。但是改革开放后，不少地方的邮局为了敛财，肆意坑农。他们和一些与邮政业务毫不相干的企业、商店串通一气，向取款者搭售各种莫名其妙的商品。比如，甘肃通渭县一些乡邮局就规定，凡取款必须购买邮局经销的化肥，否则休想取到钱；湖南蓝山县一些乡镇邮局自 1994 年就规定，农民写信必须寄挂号，不寄平信；同时规定，凡取汇款，不论你取几十上百元，都必须订一份定价几十元的报纸。而且，你取几次钱就得订几次报纸。当地农民年收入不过 2000 元左右，对这种坑农事却敢怒不敢言，直到 10 年后的 2004 年 5 月 14 日，湖南师范大学一位老教授气愤地在《湖南日报》撰文，质问：邮局这样欺负农民还有没有人管？至于农民拿着打工儿女或亲友寄来的汇款单，到邮局取不到钱的现象，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邮局更是普遍现象。据 1993 年 11 月 13 日《人民日报》披露，当时仅河南就积压了待兑汇票 6118 张，款额高达 1729.5 万元，有的汇票积压时间长达 3 个月。四川忠县各邮电局门前每天等候取款的就有数千人，有些人甚至背着铺盖露宿邮局门口。这种奇迹，我相信除了外星人，地球人大概谁也没有见过。

河南省气象局甚至将应该免费发布的气象预警，交给垄断公司收费发布。2009 年 8 月 2 日，郑州遭遇暴雨，结果导致不少人因为没有得到气象预警而遭殃。比河南省气象局更加荒唐的事，发生在经济高度发达的广东省佛山市。2011 年 4 月 17 日，佛山市顺德区遭遇灾害性天气，冰雹及龙卷风袭击，导致 18 人死亡，155 人受伤，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而遭遇如此惨烈损失，与气象局不是普遍向群众发放气象预警密切相关。⁴

月15日，气象局已经发出了第一次极端天气的预警，但预警只向“12121”用户发放，16日、17日，气象局又发出第二次预警，但却是“内部通报”，预警短信只“向顺德区相关决策部门的决策人员，主要是村主任、村书记以上的人员，总数在3000人左右发放”。（据《广州日报》和《新华每日电讯》）。以致因此造成的18人死亡中的11人死亡发生在经济高度发达的顺德区，连该区最富裕的容桂街道，也有3人因此丧命。改革后，连天气预报都沾上了铜臭和官气，只向有钱人和有权人发放，真是怪得邪乎！

燕尔新婚乃人生之大喜，所谓“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可而今，在很多农村年轻人结婚却成了千手观音吸吮民膏民脂的良机。弄得新婚者苦不堪言。我们且看看山东省邹平县礼参镇东崔村青年农民刁勇扯一纸结婚证被坑走多少钱吧。

1995年刁勇和爱人朱锦绣临去镇政府婚姻登记前，父亲给他们1300元钱，叮嘱登完记去买一些结婚用品。谁知到了镇政府连办登记都不够。登记处让先去计生办交钱，计生办收保证金400元，准生证费180元，母子平安保险金50元，新婚费20元，立档费0.5元，定1996年《祝你幸福》杂志费36元；接着婚姻登记处收结婚纪念照相费100元，礼品费36元，晚婚费80元，社会养老保险金500元，赡养协议金30元，结婚登记手续费18元，婚姻登记工本费20元，加起来总共13项，1470.5元，所带的1300元连办个登记都不够。（引自1995年12月2日《中华工商时报》）。据湖南省政府督查室、省监察厅等若干部门联合调查组，于1996年4月12日至5月2日对长沙、石门两县的调查，发现农村婚姻登记收费五花八门，千奇百怪，除负责登记的民政部门收取结婚证工本费、养老保险及意外保险金、结婚贺花费、加碘药品费、福利奖券购买费、婚姻学校培训费等费用外，计划生育、卫生、公安等部门都加入了收费的行列。分别收取准生证费、人口理论教育基金、晚婚晚育押

金、外迁人口计划生育保证金、计划生育培训费、婴儿出生证、母子卡费、入户费、户口迁移证费等等，多达数十种，叫人数都数不过来。向每对婚姻登记男女收取的这类费用，石门县在400元至600元之间，长沙县春华镇为1498元，长沙市郊区大托乡高达2215元，如此收费弄得不少农村新婚男女望而生畏，于是结婚不登记，生育不报告。群众反映这是“乘人之喜，施人以祸”。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登记结婚无论城乡，全部费用就是2角钱结婚证工本费。如果拿以上收费数据与当年相比，分别增长了2000倍、7490倍、11075倍。这样的收费“大跃进”，不要说对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不堪重负，笔者闻听后也有点心惊肉跳！

某些地方政府非法敛财的胆大妄为和不择手段，堪称触目惊心。计划生育被称为基本国策，但这个基本国策到了下面，往往就被一个钱字压得一钱不值。比如，河南杞县从2013年3月4日起，在全县开展春季计划生育服务活动，便责令限期参加绝育手术的妇女，在向各乡、镇计生办缴纳2000-3000元不等的绝育罚款后，就能在县计生指导站以患病申请理由，获得“不能做绝育手术”的医学鉴定，进而规避绝育手术。据记者调查，这次“春季计划生育服务活动”中，全县在县计生指导站参加绝育体检鉴定的1000多名育龄妇女，基本上都向所在乡、镇缴纳了2000至3000元不等的绝育罚款后，通过了“不能做绝育手术”的医疗鉴定，单此一项，杞县计生部门就非法收取了200多万元计生罚款。而如此非法公开敛财，据城郊乡计生办主任王彦刚公开扬言：收取绝育罚款是县里开会，王永力副县长定的，乡党委副书记刘伟传达的。因此下面胆壮气粗“拉洗衣机、扣摩托车”“扒猪圈”等等无所不为。王彦刚甚至威胁村民：“找谁也没用”（引自2013年3月29日《贵州都市报》）。诸如此类以“服务”为名，进行劫财的活动，各地屡见不鲜，农民则叫苦不迭。

3. 令人胆战心惊的免费妇检

随着科学文化的发达,今天的人们比我们的祖宗更聪明了。但很多人特别是不少所谓“精英”人物,不是把自己的聪明才智,用在有益于人民、有益于国家民族发展的事业上,而是绞尽脑汁,昧着良心,干着损公肥私,损人利己的黑心事。

山东菏泽华杰医院的医学“精英”们,打着免费为农村妇女检查的幌子,坑害农村妇女就是一个例子。他们先通过乡镇妇女专干组织村妇女主任开会,大肆宣传现在农村妇女患乳腺癌、宫颈癌的情况非常严重,国家有补贴,要对农村妇女进行免费妇科检查,而且有专车免费接送,还有免费午餐供应。有这等好事,看不起病的农村妇女能不高兴吗?

医院首先把专职妇女主任用专车接到医院进行检查。妇女主任回去后用村里的大喇叭进行动员,仅许庄等5个行政村就有617名农村妇女,在妇女主任的带领下到医院进行妇科检查。说是免费检查,检查后却叫你花钱“治疗”。检查前身体很好,检查后倒出现身体不适。仅2010年九、十月份,山东菏泽就发生百名农村妇女在华杰医院“被治疗”事件。有一位妇女,检查后,医生说她子宫糜烂,子宫囊肿非常严重,如不治疗,发展成子宫癌就来不及了。这位妇女经不住连劝带吓唬,当场做了手术,接着连续输液4天,花了7100元,谁知被医院治疗后,竟出现了下身疼痛,流血不止等症状,不能劳动。

华杰医院用这种卑劣手法,通过乡(镇)村妇女主任,将大批农村妇女弄到医院“免费检查”,对她们进行治疗。一下就捞去十几万元。这年8月,当华杰医院再次开着两辆面包车去许庄、苗楼等村接妇检人员时,被几十名刚在华杰医院接受治疗的妇女及家属包围讨说法。经过3天交涉,华杰医院被迫退还40%的治疗费用,共退款40190元。同样,武汉市当代佳丽医院也是打着女性宫颈癌和乳腺癌健康公益普查的幌子,对农村妇女进行专车接送,免费检查,但该医院的生意比华杰医

院就兴隆多了。

有记者于2010年8月6日至8月9日，连续4天，在该医院大门前观察，每天都有上百名农村妇女被专车接到医院进行妇检。其中8月8日上午9点55分，同时开来的几辆大巴接来的农村妇女就有200名之众。

免费妇检后个个有病。有的妇女因为检查后，“医生说她病情严重，需要尽快动手术。”当场就吓哭了。

红安县永佳河镇妇女程巧英，于2010年7月10日和村里120多名妇女一起，分乘4辆大巴被接到当代佳丽医院做了妇科检查。当她看到医生写下的结论：“当心癌变，必须尽快手术，956.5元”后，当场就哭了。经医生动员，立即做了“子宫囊肿和子宫糜烂消融手术”。但回到家伤口却流血不止，几次打电话问医生，对方都说没事。但每到深夜她就痛得无法入睡。后来程巧英将当代佳丽医院的检查报告送到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妇科专家李萍进行检查后说，她患的只是轻度宫颈糜烂，根本不用手术治疗。

但人们在该医院手术室门口看到的是，等待手术的妇女排成长队。每次手术时间仅为3分钟，进进出出的妇女如同走马灯。这样的手术，天知道他们干的是什么！

湖南省常德中韩友好医院使用的手段，比前面两家医院更“高明”。他们首先派出医生到常德市所辖的津市棠华乡，通过分管计划生育工作的副乡长陈晓兰，在全乡召开的妇女主任工作会议上，发放中韩友好医院开展免费妇检活动的宣传资料，并在会上宣布，妇女主任每组织一名妇女到医院“妇检”，就能获得10元电话费补助，凡组织8名妇女以上医院就派专车免费接送。有此实惠可得，妇女主任们纷纷各显神通，除了利用各种关系大作宣传发动工作外，还兴师动众通过村里广播，印发宣传单，甚至挨家挨户动员，通过如此发动，大批农村妇女被妇女主任们组织到中韩友好医院去做免费检查。但检查结

果普遍不妙。比如棠华乡临东村 54 岁妇女朱英（化名）通过医院检查后，医生告诉她：阴道镜检查结果显示炎症很厉害，需马上注射消炎。根据医生建议，朱英交了 340 元消炎费。第二天，根据医生嘱咐，朱英再次来医院接受治疗。医生又告诉她，经过反复研究，朱英病情严重，必须注射另一种消炎药物，还得再加 90 元。第三天，朱英再次被医生告知，切片化验显示，她的宫颈糜烂很严重，必须马上动手术，需交 800 元。医生还告诉她，如不及时治疗，很可能引发宫颈癌。朱英顿时被吓哭了。根据医生建议，由村妇女主任担保，朱英先支付 200 元，给她做了一个 800 元的手术。

第四天，朱英听从女儿建议，到当地津市妇幼保健院进行检查，结果显示，朱英仅有轻微炎症，只需开点普通消炎药回家服用即可。这就是常德中韩友好医院，通过乡村妇女主任，大肆组织发动农村妇女进行所谓妇检的结果。

自 2010 年 6 月 9 日至 7 月 6 日，仅棠华乡下属的黄金、临东、联合等 12 个村，就有 1000 多名农村妇女，由妇女主任组织到常德中韩友好医院接受“朱英式”的联合免费检查，将十多万元血汗钱，投进了医院的黑洞。如此“友好”医院，难道不应该改为“坑农医院”才名副其实吗？。

从上面介绍的电力、银行、农村信用社、基层政府、教育、电信、邮政、气象、民政、计划生育、卫生、医院、公安等千手观音，都以各种名目，各种手法或各种自行规定，把手伸进农民的干瘪口袋，掏农民的血汗钱，我们已不难看到百业坑农之一斑，各级政府难道不应该好好想一想，作为收入最低的浩大群体，农民受得了吗？

第五节 “护农天使”成了“坑农杀手”

众所周知，从政府机关的农委、农业局到从事农科研究、

指导农业生产的农科院（所）、农技站、种子站（后改公司）等直接为农民服务的单位和部门，历来被称为农民的“保护神”、“护农天使”，他们为我国农业的发展，为我国粮食产量的增长，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特别是由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领导的科研团队，为中国农业的发展，为解决中国人民的温饱问题做出的贡献，堪称举世无双。有关资料显示，自1976年大面积推广杂交水稻至2010年，我国累计推广种植杂交水稻超过60亿亩，累计增产粮食超过6000亿公斤，每年增产的粮食可以养活7000万人。而日本自1968年完成杂交水稻“三系”至今（2013年），也没有能应用于生产，大大落后于我国。

没有想到的是，通过农村改革，农民成为一家一户的小生产者以后，变得势单力薄，更需要“保护神”保护时，不少当年受到农民崇敬和信赖的“护农天使”，却变成了“坑农杀手”。他们不再为农民和农业生产保驾护航，而是给农民和农业生产添灾造祸。

1. 农科所、农技站、农艺师，一齐坑农

1995年陕西省宝鸡市宝鸡县杨家沟乡农技站先后两次从宝鸡农科所调购“正交陕单九号”玉米种子5040公斤，销售给太公庙、大王、五一等六个村的962户农民。

杨家沟乡是农业部表彰的农业技术推广先进单位，农民科学种田积极性很高，他们对农技站提供的“优良品种”无不寄予厚望。然而，结果却令他们大失所望而垂头丧气。苗期，发育迟缓，苗相老化；抽穗期发育不全，雌雄不遇；结实期，小棒，无棒，无颗粒棒子的植株超过50%。据杨家沟乡政府调查，这批种子致使每亩减产175公斤至200公斤，全乡减产40万公斤，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超过50万元。这是一批地地道道的伪劣种子。不可思议的是，这批种子出自麟游县种子公司，麟游县则是陕西省宝鸡市确定的杂交种繁殖基地，麟游县种子公司也出具了“质量合格证”。种子收割时，是由宝鸡市种子管理站和

陕西省种子管理站两家直接搞的“田间联检”；种子“送检合格证”也是陕西省有关部门直接签发的；种子调出时，又是由麟游县种子质量检验股签发的“质量合格证”（参阅 1986 年 1 月 10 日《人民日报》）

这批坑农种子，涉及的所有单位，都是过去的“护农天使”。但是，经过如此众多“护农天使”亲自在“田间连检”，签发“质量合格证书”，到销售给农民，手续齐备，证书齐全，结果却是伪劣种子，造成那个受到农业部表彰的农业技术推广先进乡的玉米大减产，农民蒙受巨大损失，人们看到的不是“护农天使”变成了“坑农杀手”吗？

1995 年河南新蔡县涧头乡因老天作怪导致春小麦“打泡”，这就意味着一个灾年的降临。为了采取补救措施，乡党委、政府决定大面积种植高产玉米，“以秋补夏”。乡农技开发公司立即与在河南名闻遐迩的洛阳市农业科学研究所所属的洛阳技术良种服务部联系。洛阳技术良种服务部很快以每公斤 6.2 元价格向涧头乡提供了 7055.5 公斤丹玉 13 号良种玉米种子。因为洛阳市农科研究所和它所属的洛阳技术良种服务部在河南都是有名的种子权威单位，涧头乡农技开发公司对其质量深信不疑，运回后立即销售给全乡 14 个村的 2043 户农民，开始播种。

人们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洛阳市农科研究所这个在河南赫赫有名的权威种子销售单位销售的种子竟是假劣产品，给 2043 户农民带来的不是丰收的希望，而是凄惨的灾难。

2043 户农民播种洛阳技术良种服务部提供的种子，种下的 3529 亩丹玉 13 号杂交玉米，刚出苗就出现异象——苗弱、枯黄、伴有死苗。那里的农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现象，便跑到乡里、县里向技术人员请教，得到的答复是缺水，缺肥，农民们便不惜人力、物力、财力，给令人心痛的玉米浇水、施肥。然而，农民费尽心血，却不见好转，死苗却随着时间的逝去越来越多。直到临近收割，玉米秆仍然瘦骨嶙峋，弱不禁风。玉米棒上的

玉米粒不仅屈指可数,颗粒也出奇的瘦小。面对这种凄惨景象,农民们心如刀绞。彭庄村农民彭学清,望着几乎失收的玉米地,失声痛哭,妻子埋怨他上当受骗,在地里和他大吵一架。杨庄村一对老年夫妻,老汉杨从轩年高84岁,老伴杨兰英也已82岁,无儿无女,家里仅有两间破草房,一贫如洗。这一年是向别人借来20元钱,买了丹玉13号良种玉米,种了2亩地,两个耄耋之年的孤寡老人,不辞辛苦,拼尽全力精耕细作,结果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一提起假种子,老两口就泪流满面,哭声不止,他们不知道日子该怎么过。2043户播种洛阳市农业科学研究所所属的洛阳农业技术良种服务部提供的玉米良种的农民,面对这场人造的灾难,个个欲哭无泪,最高的亩产都不到70公斤,与当地前三年同类品种平均亩产348公斤相比,平均每亩减产278公斤,如把这些玉米折成现金,远远不及投入的成本,由此造成的损失超过150万元(资料来源:1997年4月1日人民法院报)

1995年秋季,江西省上高县蒙山乡肖坊村的108户农民,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一点也不比别人差的责任田,既没有耽误农时,也没有疏于中耕管理,施的肥料更不比别人少,为什么长得比别人田里更加高大肥硕的杂交稻,会抽穗少,结籽率低,大减产已是无法避免的事了呢?

百思不解的农民,经过观察分析,终于发现,问题出在稻种上,是假种子造的祸。叫他们无法想象的是,为他们提供种子的人,是和他们有着多年交情,相互非常熟悉,人人信赖的县种子公司助理农艺师吴道记。这位助理农艺师,曾多次承担全县稻种制种任务,对水稻栽培技术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从事种子采购和推销已达20年之久,对稻种优劣非常熟悉,过去还经常下乡指导农民种田,颇受农民欢迎。这样的助理农艺师,完全可以说是支农的能手,农民的好帮手,怎么会提供假种子坑害农民呢?

然而，这位曾经深受农民信赖的支农能手和农民的好帮手，提供的却是地地道道的坑农假稻种。

1992年，邓小平发表视察南方的讲话后，中国立即出现了一个不问姓资姓社各显神通发财致富的热潮。吴道记立即看到自己的发财机会来了。他不仅有着丰富的制种经验，长期从事种子推销的经验，能识别各类种子的优劣，而且还有着极为广泛的人际交往关系，全县各乡各村，没有几个人不认识自己，大家都信赖自己，就凭着这些别人并不多见的条件、特长和人缘，不愁发不了财。

1992年8月，吴道记办理了停薪留职手续。很快制定出一个熟门熟路推销种子的发财计划。

一开始，吴道记还正儿八经向农民推销稻种不敢作假。但这样搞了一段时间后，觉得利润不理想，发财速度太慢。当时社会上广泛信奉“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致富箴言，官场里贪污受贿比比皆是，社会上假冒伪劣泛滥成灾，在这种恶风邪气的侵淫熏陶下，吴道记开始以次充好，很快发了一笔财。但他发现，不少制假贩假着，很快致富，而政府却很少干涉，顶多罚点钱了事，乃至假冒伪劣愈演愈烈，有民谣唱道：无官不贪，无水不污，无货不假，无路不堵……吴道记便开始在心里琢磨，我何不卖点假种子，也来一个快速致富？

1994年，他以每斤0.8元的低价，收购了“密阳46”父本稻谷4000多斤，自行包装后，贴上“汕优64”杂交稻种的标签，向农民推销。当他得知蒙山乡肖坊村需要稻种时，便上门联系，大家早已熟识自然一说就成，一次卖出“汕优64”杂交稻种“密阳64”父本稻种1035.8斤。这些稻种被播种在410多亩稻田里，结果使农民大受损失，按当地当年正常收成，平均每亩减产320多斤，总共减产13万多斤，相当于凤阳县小岗村分田单干第一年获得大丰收的总产量，造成经济损失约10万元。

令人深思的是，在审判吴道记贩卖假稻种一案时，审判长

和吴道记的一段对话：

审判长：“农民购买你出售的稻种，他们为什么不询问稻种是哪里生产的呢？”

吴道记：“不会的。由于我在种子公司时间长，农民大都认识我，我也认识农民，熟悉农民，我过去在种子公司曾为农民栽培和推销过优质稻种，农民会相信的。”

审判长：“那你为什么现在却去坑害他们呢。”

吴道记：“是为了赚几个钱的心理作祟。”

这不就是“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活生生的典型吗？

甘肃省民勤县农民因该省农垦公司销售假农药造成的损失，比起江西省上高县蒙山乡肖坊村农民的损失，可就不知惨重多少倍。

地处腾格里沙漠的民勤县农民，因种植籽瓜开始走上致富道路，种瓜积极性大大高涨。

1993年甘肃省农垦服务公司，从外地购进一批“乙草胺”农药后，不顾原产品说明书上，明明白白写着“不能用于瓜类作物”的字样，他们将大包装改成小包装后，取名“杀草一号”，运到民勤县各乡镇农技站加价销售时，却以“宜于瓜类作物，是进口农药”向农民进行欺骗宣传，大量推销，乃至农民使用这种农药后，造成瓜苗大量死亡。经调查，最高死亡率达93.8%，最低死亡率达52%，因此造成的损失达6600万元，欲哭无泪的农民称“杀草一号”是“杀瓜一号”，“杀农一号”（参阅1993年7月1日《中国商报》）

2. 顶着“农”字招牌的政府机关也层层坑农

政府机关特别是头上顶着“农”字招牌的政府机关大权在握，本来是农民最可靠的“保护神”和坑农者畏之如虎的克星。农村改革后，却成了杀人不见血的“坑农杀手”。

江南某省地区农委就是一个典型。

1989年4月，X底地区农经委分配给X底地区农委1000吨“农用补助肥”。当时正是农民急需化肥的季节，这批肥料本是为着“补助”农民解决燃眉之急。但地区农委随即改换名目，以“技术配套肥”的名义，给所属的5个县（市）农委分配890吨，留下110吨，并布置下面县（市）农委在原来每吨550元的基础上，加价200元出售。县（市）农委得到了地区农委加价出售的授意，立即竞相加价倒卖。比如，X底市农委将分到的150吨尿素，提价到每吨960元，每吨提价410元，提价幅度达74.5%，赚取巨额差价；各县（市）农委除将所赚取的差价，部分向地区农委“进贡”外，其余的钱则用于吃喝送礼。

此后，X底地区农委又将省里先后三次分配的532吨计划内平价化肥，通过加价出售，甚至私自批给关系户，从中牟利。比如，X县金家乡某人直接从地区农委主任袁裕文手中批得尿素32吨，袁裕文当即索要尿素1000斤。

地区农委如此带头违法乱纪，下面的县市、乡镇农委便纷纷效仿，加价倒卖。比如，X县青树坪镇先后八次从袁裕文手中批得尿素64吨，全部加价倒卖；X源市三甲乡从市农委主任梁巨大手中批得尿素50吨，钾肥40吨，全部加价倒卖，牟取差价21918元，梁巨大从中提取10000元，送给地区农委4000元，市农委每个干部分得200元，那里的所有人民公仆，都成了坑农的受益者。

2013年，江西省查办的农机领域腐败系列案件中，省、市、县三级仅落马的农机局长即达20名之多。2013年中央财政下拨江西的农机补贴资金达7.348亿元，农机局长们从大到手扶拖拉机、挖坑机，小到太阳能杀虫灯，纷纷钻空子，大肆套取农机补助。造成国家巨额农机补助的流失。比如，江西省原农机局长王绍萍，先后收受各地22名农机商700万元贿赂，结果造成国家农机补助资金的损失达2200多万元（据新华社

2014年3月3日讯)。

从以上公开媒体曝光中，人们看到从农科所、农技站、省市种子管理站、农业技术良种服务部、农垦服务公司、农艺师，到主管农业的某些政府机关——省、地、县农机局、地区农委、县市农委、乡镇农委，这些曾经都被誉为农民的“保护神”、“护农天使”的单位和部门，在农村改革后，在农民成为一家一户的个体劳动者，势单力薄，孤立无助，更需要扶植、支持、帮助的时候，他们却摇身一变成了“坑农杀手”。因为他们在前几十年间，曾经热情服务农民，热心传授农业技术，指导农业生产，给农民带来了好处，赢得了农民的信赖，在农民心中威望很高，以致农民对他们的坑害毫无戒备。利用农民信任的坑害比什么都可怕而残忍。诸如江南某省X底地区的地、县、(市)、乡镇三级农委沆瀣一气，编织一张坑农黑网，罩在农民头上，而受害农民却根本不知道自己的“保护神”环环相扣，在暗中坑害自己，乃至出了“血”还不知道害人者是谁。社会环境糟糕到如此地步，我们的农民还能信任谁依靠谁呢？这是农民的悲剧，难道不也是我们社会和我们这个民族的悲剧吗？

第六节 受害农民欲维权，怎么这样难

在“百行坑农”的中国，坑害农民已是一种随处可见、比比皆是的社会现象。但受害农民要想讨回公道，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往往难于上青天。

因“愚公移山”而闻名的河南省济源市王屋山下王屋乡麻院村，因为愚公最后没有移走王屋山，人均耕地不足六分，人们世代都受穷。直到他们遵循上级指示，以小岗村为“榜样”分田单干十几年后的1992年，依然过着贫苦的日子。就在这一年，经过济源市开发办公室和乡政府以及市里果木专家劝导，全村农民经过五天五夜的热烈讨论，终于接受了上面提

出的“要想富，种果树”的理念，决定拿出全村最好的、被村民誉为“养家田”的一百亩水浇地，建一个“高标准、高质量、大规模”的王屋山优质红富士苹果基地。

农民满怀希望，甩开膀子，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和魄力，苦干一冬一春，投入 20000 多个工日，打了两眼深水井，以抗旱；修筑了一条 500 多米长的大堤，以防汛。全村农民没有一个吝嗇自己的汗水，他们想的就是早日把苹果基地建成致富基地。

也就在 1992 年，济源市山区办和王屋乡政府领导都从公开报纸上看到河南省农村科技培训办公室，出售红富士苹果苗的广告。经与河南省农村科技培训办联系，他们可提供优质短枝红富士苹果树苗，便签订了购买 10000 株短枝红富士苹果树苗的合同。苹果树苗栽下后，农民年复一年的精心培育，不停的施肥、浇水、整枝、治虫。可是四年过去了，农民们满怀致富希望栽种在全村最好的 100 亩“养家田”里的红富士苹果树，竟没有结出一个苹果来。失望的农民心急如焚，不得不请来果木专家鉴定，结果发现栽在苹果基地里的全部果苗，居然没有一棵是合同上规定的短枝红富士，绝大多数是劣质淘汰品种。

愚公的后代被激怒了。他们感到自己被坑了，无人不气愤。

从 1995 年 4 月开始，村民们多次找到济源市山区办和王屋乡政府，要求赔偿一切经济损失。与此同时，他们选出张学轩为代表开始上访，请求上级组织和领导为他们主持公道。

张学轩来到省会郑州，费尽周折总算找到河南省农村科技培训办公室地点，可是已经人去楼空。张学轩得知武汉有一个“社会弱者权力保护中心”，立即南下武汉寻求帮助，可人家说这种情况不属“保护范围”。

张学轩筋疲力尽回到郑州后，决心通过法律维权，但被告知，需要几万元律师代理费和诉讼费。为建立苹果基地，已弄得村民们财力枯竭，再也拿不出这笔钱，只好无奈放弃。

1996 年 3 月，已经山穷水尽的张学轩写了一份“假冒苗木

坑害山民谁来管”的上访材料，打印了一百多份，分别寄给了河南省委、省政府领导和有关部门。还好，省政府有关领导将材料批给了省政府农村经济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下称省农经办），明确要求抽调专人进行调查。“省农经办”调查后，认为河南省农村科技培训办公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接着，副省长李成玉在调查报告上批示，要求有关部门“积极处理好这件事”。省委副书记范钦臣也在调查报告上批示，要求“有关单位专题进行研究，尽快提出解决办法，使此案早日有个说法”。

愚公的后代得知有这么多省领导批示，心中立即点亮了希望之光。

在中国自古官大一级压死人，谁知在愚公的家乡，省委、省政府的批示，在“有关部门”那里却不起作用。张学轩在郑州奔波了一个多月毫无结果，有关部门仍然声称对此案“不负责任”。

在郑州已经走投无路，张学轩心里十分窝火，决定进京告御状。这位愚公的后代决心用“愚公移山”的精神维护全体村民的合法权益，他不相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块革命先烈用鲜血染红的土地上，就没有说理的地方，他不相信这种坑害农民的缺德事，就可以不受惩处。他背着30多斤上访材料，20多斤苹果样品，一箱方便面，带着全村农民兄弟的委托，开始了新一轮艰难奔波……

据《农民日报》记者刘波调查，向王屋山农民提供苹果树苗的河南省农村技术培训办，是河南省农村经营者协会等三家单位成立的一个为农民服务的机构，直接隶属于河南省经营者协会，该协会的主管部门则是河南省农村经济委员会，他们都是顶着“省”字和“农”字号招牌的组织，合同上则明文规定：“若不是以上品种（指短枝优良红富士品种），甲方（河南省农村科技培训办）赔偿三年经济损失。”案发后，河南省科技培训办人去楼空，但它所属的河南省农村经营者协会还在，河南

省农村科技培训办成立时，负责协调的领导及其工作机构也还在。为什么省委、省政府领导批示，对他们却如同一张废纸呢？直到1997年3月，与此案难脱干系的大多数部门仍然明确表示“责任不应由自己负”。愚公的后代用“愚公移山”的精神，奔波劳累了5年多，却仍然没有讨到任何说法。随着用心血汗水浇灌的“百亩优质苹果基地”的日趋荒芜，愚公后代的心也随之荒芜。如果老愚公地下有知，对其后代的这种遭遇该作何感想？这种遭遇当然远不止王屋山下的愚公后代。

山东袁州市速达工贸公司盗用湖南攸县第一塑料厂的名优产品商标和合资标志，大量生产速达牌劣质饲料，对广大农民的坑害及其造成的悲剧更加触目惊心。据新华社1998年4月13日济南电报道，仅速州、宁阳两县市9户受害农户，因为使用速达牌假劣饲料，就被毒死肉鸡6万多只，牲畜数千头，损失数百万元。

宁阳县白马镇中屯村，1996年初村里6户农民共养了9万多只肉鸡，因使用速达牌假劣饲料，一个多月就死掉3万多只肉鸡，直接损失41万多元。

袁州市新驿镇河湾村养殖大户杨德河1995年7月至1996年2月，花41万多元，先后购入速达牌猪饲料180多吨，结果使存栏的972头猪死了892头，一眼望去，整个猪栏里全是死猪，埋的时候用8辆三轮车，拉了大半天才拉完，直接经济损失超过66万元。

袁州市王固镇苏庄村农民苏恭仁，因为使用速达牌假劣饲料，一下就毒死3000多只肉鸡，但又无处伸冤，老婆深感绝望，服毒身亡……

速达工贸公司生产的速达牌假劣饲料，给各地农民造成的经济损失、精神摧残以及各种家庭悲剧，谁能算得清呢？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受害农民使用速达牌假劣饲料，造成鸡、猪大量死亡后，立即与供货方袁州速达工贸公司交涉，提

出在没有正式做出鉴定前暂不支付剩余的饲料款。速达公司不仅对此置之不理，反而恶人先告状，以拖欠饲料款为名，将众多正在讨说法的农民告上了法庭。

经山东省农业大学中心实验室化验，速达牌饲料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假劣饲料，该饲料中的黄曲霉素 B1（一种致癌物，可使动物肝肾中毒），超过国家标准三倍，食盐含量为国家标准四倍。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和山东省政法干部管理学院的专家都认为，按照受害人提供的证据，“速达牌”饲料的假商标，假“名优”“假合资”均属欺诈行为，而且给众多农户造成了严重损失，公司不仅要赔偿受害人的经济损失，而且对责任人应追究法律责任。

令人气愤的是，直到 1998 年 4 月，被速达公司先后送上当地法庭“被告席”的众多受害农民，竟无一人讨回公道，而原来的速达饲料厂已改名百灵饲料厂，原任厂长则被调任原公司所属的方便面厂担任副厂长，惨遭严重经济损失和精神摧残甚至弄得家破人亡的农民，还在为伸冤四处奔波，谁知道何日才是尽头、谁能为被坑的农民主持公道呢？

坑农最残忍，最令人发指的，就笔者手头资料来看，非山西省原平市供电局莫属。这个供电局，仅仅为了一件已经由派出所处理完结的小事，还想“出一口气”，居然把该市非常红火的磊北村，变成了一个“无人村”。

1998 年磊北村农民赵楞小与乡供电所职工张怀田发生治安纠纷。纠纷发生后，磊北村所在的大牛店派出所及时做了处理，事情已经完结。但供电局认为“自己的人挨了打，不能咽这口气”，居然把整个磊北村的电全部停了。

当时朔黄铁路正在紧张施工，需要大量石子。磊北村经济的主要支柱——几个石料厂的生意非常红火。由于供电局为了“出一口气”，长达三年拒不供电，全村农民赖以生存的几个石

料厂全部倒闭，变压器、电线等供电设备，因长期没有使用，全部被盗。磊北村的整个经济遭到毁灭性打击。村民生活无着，被迫四处流浪，红红火火的磊北村变成了“无人村”（见 2000 年 4 月 30 日《山西日报》）。

“无人村”这个名字，对于我们这一代人并不陌生。日本鬼子侵略中国时，为着摧毁中国人民的战斗力，曾疯狂的推行残酷至极的“抢光、杀光、烧光”的“三光政策”，在解放区和敌后根据地，制造了不少“无人村（区）”。我相信谁也不会想到，在人民当家作主 60 多年的社会主义中国，在五星红旗迎风招展的神州大地上，一个小小的县级供电局，居然就敢无法无天到利用掌握国家电力资源的权力，制造新的“无人村”。

停电期间，村支书陈保中先后 11 次跑到供电局求情，好话说尽，就差没有下跪磕头，但供电局的头头脑脑，就是不同意通电。

县、乡等有关部门曾多次协商调解，前后历时 3 年，直到 2001 年初，供电局仍然软硬不吃，拒绝给磊北村供电。

磊北村农民在忍无可忍的愤怒中，于 2000 年 7 月将供电局告上法庭，希望通过法律为村民讨回公道。但直到半年后的 2001 年春天，仍未开庭。磊北村农民想通过法律讨个说法的希望也成了泡影。

一个红红火火的村庄，因为其中的一个村民和供电局一个职工发生纠纷，并且已得到司法机关的及时处理，就被供电局残酷的变成了冷火寂烟的“无人村”。祖祖辈辈在自己的热土上辛勤耕耘的农民，变成了四处漂泊的流浪者，至少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那里的政府、法院和众多食民俸禄、手握大权的各级官员，居然无可奈何，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是谁给了供电局如此坑农害农的权利呢？农民的合法权益包括生存权利，还要不要维护？由谁来维护？

在有的地方，受害农民要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即使引起

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也难于上青天。黑龙江省绥化市兰西县一百多农民的遭遇就是一个例子。

2002年5月，兰西县一百多户农民在本村张凤带领下，满怀致富希望，向兰西县“大业种苗有限公司”购置了该公司生产、销售的“丰神牌”，“丰度牌”西瓜种子500多盒。谁知种下后竟颗粒无收。经东北农业大学教授崔崇士、黑龙江省种子管理局高级农艺师陈树春等八人组成的专家联合调查组鉴定，认定：“丰神牌”、“丰度牌”西瓜籽……确实属于劣质种子。

100多户因此陷入困境的农民，纷纷上访维权，他们先后找遍了县里、市里的众多机关和有关部门，总计上访达200多次，但是毫无结果。当初为着使乡亲们早日脱贫致富而带领大家大种西瓜的张凤，做梦也没有想到，结果却给乡亲们带来了无法解救的灾难，在绝望之中于2002年8月24日服毒自杀。临死前留下遗言：“就让我变作西瓜籽，种出大西瓜来给全村老少谢罪。”由此使这起特大坑农害农案，轰动东北，震惊中央。

2002年9月，绥化市兰西县公安局立案侦查这起特大西瓜种子坑农害农案。并于不久后抓获犯罪嫌疑人刘金辉、张海庆。

谁知，2003年5月，案件起诉至兰西县法院后，法院却迟迟不予审理，由公安局移交法院的犯罪嫌疑人张海庆也莫名其妙的“失踪”。

法院对案件迟迟不予审理，甚至连犯罪嫌疑人也从法院“失踪”了，立即引起了一百多受害农民的愤慨，导致大规模上访。

2003年5月12号，《中国青年报》对这起久拖不决的坑农案披露后，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于6月14日亲笔批示：“最近假种坑农之事颇多，要严肃执法，加大惩处力度，明确管理责任”（引自2005年8月25号《华商晨报》）。

温家宝批示后，黑龙江省种子管理局成立了由局长带队的3人调查组，对这起拖延了一年之久的坑农案进行专门调查。

不久后，兰西县法院对此案进行了审判，对被告人张海庆以犯销售伪劣种子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12万元，赔偿受害农民434100.16元；被告刘金辉犯生产、销售伪劣种子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处罚金8万元。

张海庆和刘金辉对判决均不服，分别上诉至绥化市中级法院。被告上诉后，案件立即变得扑朔迷离。本来已看到判决结果的农民，再次陷入艰难的维权。受害农民纷纷到绥化市中院询问审理进展。但法院的答复却叫农民莫衷一是——有的说案件还在审理，有的说审判已经结束，判决书几天就会下达；还有的说此案已经移交最高人民法院……而该院审判长宋长春对采访记者说的却是另一番不可思议的话：“总理批示的事已经过去了，墙上贴的（指法院办公室墙上写着涉农案件要快立、快审、快结、快执）承诺，是给人看的。”这位审判长在私下倒是一语道破了这个法院欺骗上级，欺骗农民的天机。原来人民法院白纸黑字贴在办公室的承诺只是自欺欺人的假玩意。而据《华商晨报》披露，有人曾私下给犯罪嫌疑人刘金辉、张海庆出主意，“这个案子最好的办法就是拖下去，最后农民拖不起，案件就会不了了之。”能出这种馊主意的人，肯定是对法院立案、审案和农民艰难处境都很清楚的人，他不仅成了犯罪嫌疑人逃避惩罚的“高参”，不仅道出了这起坑农大案久拖不决，乃至连犯罪嫌疑人也都从法院“失踪”的某些奥秘，也道出了一种普遍而可怕的现象。正是因为这起轰动东北、震惊中央的特大坑农案的久拖不决，使很多假种制造者、销售者的胆子越来越大，“总理批示的案件都能拖到现在，就是抓住我也不会有什么大事。”由此导致绥化市周围很多农村，生产和销售假种子（岂止假种子）的坑农歪风愈演愈烈，而买了假种子的农民，听说了兰西县假西瓜种子的情况后，也都不敢起诉了。他们说：“官司要是打上两年，我就更没有饭吃了，所以还是自认倒霉吧……”

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国务院总理亲笔批示“要严肃执法,加大惩处力度,明确管理责任”的批示,都不起作用,在中国土地上,还有谁的批示管用?共和国总理批示都治不了犯罪份子,不能维护农民的正当权益,还有谁能维护农民的正当权益呢?我们天天喊“依法治国”,但能维护人民合法权益的“法”在哪里!难道年复一年地面对防不胜防、愈演愈烈的坑农案件,我们的农民兄弟就只能永远任人宰割和坑害吗?

第四章 农民头上两座山

——历久不衰的“白条”和日益膨胀的“三乱”

第一节 屡禁不止的“白条”满天飞

改革开放以后，给中国带来了很多新气象，也出现了很多新名词以及由这些新名词承载的许多新事物。“白条”就是新名词中的一个。

中国“白条”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那是“改革开放”成为中国最时髦、叫得最响亮的时期。最早是地方政府发不出乡村教师的工资，给教师打“欠条”。这种“欠条”谁也说不准何时能兑现，因此被称为“白条”。有的白条十几乃至二十年都没有兑现。2008年第37期《瞭望》曾报道，吉林省政府于9月8日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由“省长韩长斌主持研究解决1993—1994年拖欠教师工资问题”。也就是说，那里的教师工资已被拖欠15年以上，而“这种情况远非吉林一省所独有”；随后是众多工厂、矿山等企业都发不出工资，给工人打白条；很多乡镇发不出工资，给乡镇干部打白条……他们无疑都是“白条”的受害者。而因这种新中国成立以后从未出现过的“中国白条”，受害最深的自然是当时的九亿农民。农民们怀着满腔爱国情，把自己辛勤劳动生产出来的粮食、棉花、油料、牲猪、烤烟、木材、甘蔗、蚕丝等等产品卖给国家后，国家却不给钱，只给一纸“白条”。这种旷古罕见的不平交易，对农民造成的伤害，随着白条现象的不断加剧，使很多农民陷入了雪上加霜

的困境。

1989年全国“两会”期间，湖北省鄂西州代表姚绍斌在会上介绍了当地农民手中握着的巨额“白条”。他所在的县里10万农民手中就有180多万元白条，他所在的鄂西州农民手中的白条就有300多万元；内蒙古代表德力格尔在会上介绍，他们那里的苏木乡，仅1400多人口，农民手中就握着300多万元“白条子”，人均2000多元；德力格尔所在的旗，是全国100个商品粮先进县之一，国家收购农民的粮食后，打的白条达7734万多元之巨，弄得当地农民的生活和生产都十分困难。湖南代表王连福在会上说，仅1988年，湖南打白条欠农民的钱即达9000多万元（引自1989年3月25日《农民日报》）。

在黑土地上耕耘的辽宁朝阳市农民，截至1999年4月，手中握有的白条达8000多万元，白条的持有时间，最短的已有2年，最长的达四、五年。

广西北海市福城镇农民主要靠种甘蔗为生，90%以上蔗农的生活来源，就是靠甘蔗收入。但是，他们种出来的甘蔗被糖厂收购后，却得不到钱。比如，1997—1998年榨季，当地两家糖厂，共收购该镇农民原料蔗61万多吨，应支付甘蔗款9171万多元。但直到1998年8月底，才支付了3288万元。而且，其中仅有1418万元现金，另外的200万元是以化肥兑付，1670万元是以食糖抵付。其余的6000多万元全是打白条，欠款人数达1.45万户。平均每户握有白条4137元，对于并不富裕的蔗民，要承受如此巨额的“白条”，用“如牛负重”来形容大概不是夸张。该镇红境塘村农民种甘蔗8000多亩，全村共收割甘蔗3万多吨，糖厂收购后，应付款600多万元，但直到1998年10月，才支付了1200元，仅占应付款的万分之二，这600万元“白条”，谁也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兑付完。

湖南绥宁县水口乡是有名的竹麻产地，所产的嫩竹麻是上等造纸原料。竹麻收入是当地农民的主要经济来源。据绥宁县

农副产品公司陶通 1998 年 8 月对水口乡调查，全乡 70% 的农民手中都有出售竹麻的“白条”，每户少则几百元，多达几千元。据统计，仅县造纸公司给水口乡曲溪、田幽两个村农民打的“白条”，就有近 30 万元，全乡超过 40 万元。拖欠时间最短的超过半年，长的达一年。农民卖了竹麻得不到钱，他们无不为没钱买农药、化肥，没钱给小孩交学费心急如焚（引自 1998 年 8 月 14 日《湖南日报》）。

安化县是湖南的重点林区之一，但木材收购部门给林农打“白条”相当严重。比如 1988—1989 年度该县云台区林农共交售木材 3.36 万立方米，县木材收购站开出的白条多达 2 万多张，拖欠林农 400 多万元。林农的口粮都是由政府配给的林业挂钩粮，林农购买口粮主要靠出售木材收入。国家收购木材给的是“白条”，但白条在国家粮站却买不到口粮，导致不少林农连口粮都没钱买（引自 1989 年 7 月 23 日《湖南日报》）。

国家给农民打的这类白条，被人们称为“坑农白条”，往往一拖几年至十几年，弄得农民苦不堪言。

宁都县是江西省杂交水稻制种基地，具有非常丰富的杂交水稻制种经验。该县长胜镇政府从 1981 年起，就用行政手段要求该镇大背岭村从事杂交水稻制种工作，所制种子必须全部交种子站。在销路好的时候，种子站低价进高价出，几年间就获取了上百万元利润。1991、1992 年杂交水稻种子大丰收，种子出现积压，种子站便拖欠大背岭村 591 户制种农民 101 万元种子“白条”，直拖到三年后还迟迟不予兑现。一般农户都有 2000—3000 元，很多农民因此陷入生活的困境，叫苦不迭，却无人理睬。

1992 年 4 月，该村一位蓝姓老人不幸去世，家里无钱安葬，种子站拖欠蓝家 400 元种子白条，多次催讨而不得，不得不全家出动，轮流找种子站要钱，甚至还通过关系，请熟人向种子站求情，但种子站仍然分文不给。该村一位姓曾的农民，1992

年春节前夕，一场无情大火，把整个家烧成一片废墟，春节将至，一家老少6口人生活无着，几次跑种子站求情，要求支付白条欠款，也是分文不给。这位老农民无路可走，被迫带着妻儿子女，来到种子站，在走廊里静坐两天两晚，好不容易由镇政府作出批示，种子站才勉强支付了部分白条欠款，打发他们回家（引自1994年12月9日《羊城晚报》），诸如这类农民要讨回白条欠款比登天还难的现象，各地比比皆是。

1989年山东枣庄市山宁区店子镇的罗营、蒋自崖等三个村的1600多户农民，也是为区种子公司培育玉米种子，并以每公斤玉米种换四公斤商品玉米或以每公斤1.6元至2.4元价格签订了收购合同。区种子公司收购时，规定必须按当时定的产量交售，谁私留少交加倍罚款，所有农户老老实实把晒干后的玉米种子全部上交，但他们得到的却是一张42472公斤玉米种的“白条”，此后农民们多次催讨，好不容易才要回了7500公斤商品玉米。1994年农民们联名写的《玉米种交售5年，“白条”何时兑现》的来信，在《农民日报》、《法制日报》等新闻媒体发表后，震动不少。区、局头头多次向镇里承诺分3年全部还清。区种子公司也在《农民日报》上登报作了3年还清的保证。但是直到8年后的1997年1600多户农民仍然没有见到玉米种子款（引自1997年3月24日《人民日报》）。

一手交货，一手交钱，是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的交易法则，谁知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在中国却出现政府收购农民的农副产品，给农民只打“白条”不给钱。政府带了头，地方官员们也就纷纷仿效。一些地方的官员于是将农产品白条引伸到什么都打白条。比如，江西上犹县本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全县28.1万人口中，农民占24万，而农民收入直到2005年还只有1503元，人均几乎只相当全国农民人均收入2953元的一半。其中还有1.2万农民人均收入仅668元，连温饱都没有解决。但是，县里的一些党政机关不仅借公务接待大打白条吃喝，还

打“白条”搞洗脚、美容、异性按摩。而且县里的洗脚、美容、异性按摩“做的主要是公家的生意”。一些单位每逢过年过节，就用三轮车到县城的大酒店去拉烟拉酒，用白条记“欠费”（引自2005年9月15日《潇湘晨报》）。下岗工人刘敬财夫妇开的刘庄酒店就是因为党政机关和党政官员打的白条达29万多元，弄得没有资金周转而倒闭。河北省原阳县一些部门更是白吃白喝成风。他们靠打白条吃遍全县上档次的饭店酒楼，越吃胆子越大，吃香喝辣吃饱喝足以后，嘴巴一抹，白条一掷就走人。至于欠下的“白条”何年何月何时能兑现，谁也不管，不少饭店攥着白条被迫关门。河南开封市通许县大岗乡自1992年至2005年13年间，该乡的历届乡党委书记、乡长，在一位叫万国生开的饭店里“吃喝抽”累计打的“白条”即达70多万元，白条重达2斤多。一任接一任，都用白条吃喝，谁也不给钱，吃完屁股一拍人走了。2007年乡政府才拿出还款计划，每年还万国生1万元。万国生说：“每年归还1万元，不算利息，要收回全部的白条款，我就得活到100多岁。”万国生说：“我今年56岁，难道还得让儿子、孙子跟着要账吗？”（引自2007年6月6日《北京青年报》）。

一个小小的乡政府打下的吃喝“白条”即达2斤多重，按计划要几十年才还得清。我不敢说大岗乡在全国几个个乡镇中创造了“白条”吃喝的最高纪录，但我可以肯定，这个乡绝对创造了史无前例的“白条”吃喝“奇迹”。

某些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如此大打“白条”吃喝，“白条”还能不愈演愈烈吗？

国家对白条坑农，一次又一次作出规定，收购农民的农副产品不能打白条，但这种规定，总是成为一纸空文。1994年山西省委、省政府根据中央规定，在6月18日前就作出规定，各地粮食、银行部门必须将当年夏粮收购所需资金足额到位，不允许向农民打白条。但是在不少地方就成了一纸空文，比如，

翼城县一些乡镇，农民不仅当年向国家“交售的夏粮款分文没有得到，而且1992年和1993年两年出售的夏粮款，也一直没有兑现”（引自1994年9月10日《人民日报》25P18）。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近三十年来各地普遍出现的情况，也是中央政策无法落实的重要原因。上面规定不让打白条，下面自有对策。比如，1992年贵州不少地方收购农民的烤烟，无力支付现金，便由信用社发一个存折，但存折却取不出钱。到1993年，应该向农民支付现金时，又强行扣存，一般扣存30%—50%，多的扣存80%。在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涪洋镇，全镇只3万人口，仅1992年扣存的烤烟款即达45万元。而涪洋镇仅是全县15个乡镇之一。因为信用社也没有钱，连职工工资都发不出来，还怎么支付农民的烤烟“白条”呢？（引自1993年4月12日《中国青年报》23P29）

尤其令人心酸的是，国家一再规定不允许给农民打白条，农民也十分恼火和害怕打“白条”，却不得不“要求”打“白条”。在一些地方，政府部门规定粮食收购部门不得向农民打白条，但却无法筹集收购农副产品的资金，于是就采用记账的办法收购农副产品，卖粮的农民和收购粮食的粮站各自记账以此遮蔽“白条”。对这种掩耳盗铃式的做法，农民当然很不放心。万一将来双方对不上账，以谁的数字为准？万一粮站的账目出现损毁丢失，怎么办？为避免今后可能出现的麻烦，农民无不要求粮站开白条。手中有白条，毕竟比记账多一点安全感吧。这种农民被迫要求打“白条”，岂不令人齿冷心寒？

在这样一种白条满天飞的气候下，哪里没有打白条，就成了了不得的“政绩”，成为主流媒体纷纷报道的“新闻”——

1998年8月21日《湖南日报》以《农民交粮就能领到钱》为题，报道了在该省新邵县新田铺镇中心粮站，“送粮的农民络绎不绝，粮农们都当场领到了售粮款”。

1993年8月9日《文汇报》报道上海市郊“到8月5日为

止”，共收购小麦 16193 万公斤，油菜籽 8260 万公斤，市农行已投放 3.02 亿元，没有向农民打一张“白条”。

《人民日报》在 1993 年 1 月 3 日以《南阳县收棉 3 万吨全付现款》为题，报道了“全国科技兴棉示范县”之一的河南省南阳县，到去年（1992 年）12 月中旬，已投放棉花收购资金近 2 亿元，全县已收购 3100 万公斤新棉，全部用现金支付，没欠农民一分钱的新闻……

1994 年 11 月 24 日《人民日报》以《湖北两年不打白条》为题，报道了湖北省从 1993 年至 1994 年“连续两年不向农民打‘白条’，保护了广大农民向国家交售粮、棉的积极性”。

借债还钱，购物付款，天经地义。看到一个县的某镇中心粮站收购农民的粮食没打白条，成了赫然登在省报上的新闻；一个赫赫有名的经济大市没向农民打白条，成了市委机关报的新闻；一个省两年没向农民打白条、一个科技兴棉示范县一年没向棉农打白条，都成了中国最高级别最高权威的党报新闻，成了那里的政府官员的“政绩”，我有一种说不出滋味的苦涩。这和一个储户到银行取到了自己的存款，和一个手持汇单的人，到邮局取到了汇款，不是一样天经地义的吗？如果这类事都能成为主流媒体大肆宣传的新闻，成为地方政府的“政绩”，岂不是太滑稽了吗？

第二节 不应该出现的困境

国家收购农民的农副产品，弄到了这样一种困境，那么人们要问：此中原因何在呢？

首先是国家对农业实际上的淡漠，导致了对农业投入的大幅削减。国家对农业资金的投入，包括财政和农业贷款两个渠道。其中国家财政对农业资金的投入，自农村改革以后逐年减少。从财政支农资金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来看，农村改革前的

1979 年为 13.7%，1980 年在全国全面推行大包干后，随即下降到 9.1%，一下就降了四点六个百分点，1980 年国家财政投入的支农资金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比 1979 年减少了 33.6%。1985 年，又减少到只占 8.3%，1987 年再降至 5.7%，7 年间减少了 8 个百分点，所占的比重只剩下原来的 41.6%。如此大幅度削减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投入，是建国以后不曾有过的。再从农业贷款来看，1980 年至 1988 年，在全国银行各种贷款总量中，农业贷款所占的比例也很少，1980 年至 1988 年平均每年仅占 7.2%，即使在主要是为农民和农业服务的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1980 年至 1988 年，平均每年所占的比例也只有 26.4%，仅占四分之一略多一点。这就告诉我们，无论是国家财政还是农业贷款，对农业的资金投入，在农村改革后都在大幅下降。而且非常有限的农业投入资金，并没有全部用于农业。据新华社 2000 年第 10 期《半月谈》披露，作为政府对农业扶持最重要、最直接的手段，国家财政支农投资的规模，每年约在 2000 亿元左右。但是，其中的 70% 都被用于农业行政事业单位而没有用于农业本身。也就是说，国家财政投资农业的钱中，占三分之二以上的钱都被农业行政事业单位使用。此中的关键原因，就是改革过程中，行政机构和行政官员的急剧膨胀。使国家财政投放的支农资金的绝大部分都被他们吃了。比如，2003 年四川省各级财政支农资金为 50 亿元（不含基本建设支出），其中 35 亿元被行政吃了。据四川省财政厅副厅长王雪梅说：在不少传统农区，县一级财政支农资金 90% 左右都用于“吃饭”了；地市一级财政支农资金用来“做事”的最多不超过 20%，即最少有 80% 被吃掉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他们靠加重农民负担发工资，“吃”的是农民；到了新世纪，一些农业大县只能靠支农资金甚至连扶贫款也用于发工资，说到底还是“吃”农民。在这些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的心中，农业份量还有几斤几两？

我们再看看有关部门如何截留、挤占、挪用国家投入农产

品收购资金。

据 1993 年对山东、江苏、河南、安徽、江西、湖北等 10 个农副产品主省，在农业银行开户的收购企业的收购贷款情况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1992 年末，收购资金余额为 1234 . 4 亿元，其中的 435.1 亿元被挤占，占贷款余额的 35%，此中仅财政挂账即达 183.5 亿元。这种情况并非个别，各地收购农副产品的资金普遍不到位。据四川省 1992 年对该省 10 个县的调查统计，收购农产品的到位资金仅占收购总值的 6%，即 94% 不到位。

农村资金“弃农经商”、“弃乡入城”，使农村经济和农副产品收购雪上加霜。一是各种社会集资的兴起，抽走了不少农村资金，农村合作基金会挖走了大量农村资金，民间借贷特别是高利贷的死灰复燃，分散了农村资金，如此等等从农村吸纳的资金，绝大部分都流入了城市，使农村资金更加匮乏；二是经济发达地区的商品大量向经济不发达地区渗透，导致经济不发达地区的货币大量流入经济发达地区，这种农村资金以消费资金的形式流入了城市，不仅加剧了经济不发达地区的贫困，也造成了农村消费资金和生产资金的比例不合理。据 1992 年对全国 26 个省、市的调查统计，仅 1992 年初至 11 月，从农村流向城市和县以上工业部门的资金即达 524 亿元。（引自 1992 年 11 月 19 日《人民日报》）这种反常做法，导致的是一种恶性循环——农民出卖农产品，得不到现金而是一纸白条，不仅影响农民的正常生活和生产，也直接影响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吸纳资金的来源。由于农村储蓄下降，反过来又使农村资金更紧张，农民贷款更难。以辽宁为例，2006 年，辽宁省累计有 398 万户农户从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获得过小额贷款，占全省农户的五分之三。但是，到了 2007 年，获得小额贷款的农户比例，却下降到只剩三分之一，下降了一半多。因此严重影响了农民的生产。比如，盘锦市大洼县茶兴乡农民江女士在

化肥店购买化肥时，就对记者说：“本来早该买化肥，可是家里没钱，也贷不到款，好不容易东借西凑才借到钱来买化肥”；铁岭昌图县毛家甸子的养牛专业合作社董事长张新兴说起贷款更是满腹牢骚，他与五家养牛专业户通过联保贷款，2006年借了三万元，2007年却“一分钱也借不到了，牛都饿瘦了！”

尤其可怕的是，粮食企业挤占、挪用、转移、外借粮食收购贷款的现象十分普遍而又严重。截至1991年底，仅在农业银行开户的粮食企业，挪用收购贷款搞基建、参与股份、转借外单位、支付地方政府摊派等即高达83.5亿元。商办、粮办工业的流动资金，90%以上是挪用收购贷款周转。由此，又造成数额巨大的资金被套住。据统计，截至1992年11月，仅全国粮棉调销后因贷款拖欠长期无法归位的资金即达269亿元（引自1992年11月19日《人民日报》）。

据湖南省人民银行于1992年对湘潭市所属的湘乡、韶山两市和湘潭县粮食系统，农副产品收购资金的供应和使用情况进行的专项稽核调查，发现，仅湘潭县就有6569.2万元被挤占、挪用，占全部收购款的35.3%，而被稽核的粮食单位，没有一家不挤占、挪用粮食收购专款，即100%违规。

霍邱县是安徽省第一粮食大县，也是全省十个贫困县之一和该省六安地区第二粮食亏损大户。

1998年该县粮食局系统挪用的粮油收购资金就令人叹为观止。其中县粮食局所属的汤料厂“直接占用200万元”；县粮食局所属的美猴王集团有限公司，“通过粮食系统内部财务侵占近1000万元”；县粮食局所属的金谷园大酒店和县城城关蓼都市场分别不合理占有500万元与200万元；挪用粮食收购资金购买小汽车19辆；周集粮油中心在县粮食局授意下，以每公斤1.26元的低价赊售国库157万公斤小麦，贷款没有收回分文，造成粮油收购资金300多万元流失（引自1998年7月31日《南方周末》）。

海南省屯昌县粮食系统的官员同样胆大包天。他们在 1994 年至 1996 年之间，竟将用于粮油收购的 1100 多万元专款，肆意挪用，胆大妄为地购进了一批房产、小车、夜总会设备……

1998 年国家审计署审查，仅上海市浦东粮油总公司、昆明国家粮食储备中转站、北京顺义牛栏山粮库三家粮食企业，擅自挤占、挪用的粮油收购款即达三亿元之巨。其中浦东粮油总公司在 1994 年末挤占的粮油收购款为 9866 万元，主要用于建新亚大酒店、银良公寓和房产投资；昆明国家粮食储备中转站从 1993 年至 1998 年 5 月，累计挤占、挪用粮油收购款达 1.3283 亿元，主要用于对外联营投资和建设楼堂馆所以及经营白糖、柚木等，直到 1998 年 5 月底，还有 9626 万元没有收回；北京顺义牛栏山粮库 1996 年 8 月先后将北京市粮油储运贸易公司小麦预付款等共达 7000 多万元农发行贷款，擅自用于经营期货营利。也就在这一年，全国各级审计机关，抽调 5 万多人，经过 5 个月努力，共清查审计 30850 家粮食企业，同时对 2681 个粮食主管机关和 2594 个财政机关进行专项审计，共发现和查处严重挤占挪用收购资金等违反财务法规案件即达 1181 起。全国 30 个省市，平均每个省市近 40 起。如此违法违纪挤占挪用收购资金，收购农民的粮棉油猪等农副产品，当然就只好给农民打白条了嘛！

粮食企业亏损与虚报亏损虚列开支，是国家投入的资金被粮食企业等中间环节装入了腰包而无法用于粮食等农副产品收购的又一原因。1998 年据对湖南岳阳市三家粮食部门的调查，所发现的数字就怵目惊心。该市小港粮库仅 1—3 月份就上报亏损 6800 万元。其中 5000 万元属虚报亏损，占 73.53%；该市汨罗粮食局，上报一季度累计亏损 6935 万元，虚报亏损 2800 万元，虚列费用 2100 万元，此二项共 4900 万元，占 70.66%；该市城陵矶粮库一季度上报亏损 2213 万元，4 月份又调整为 3477 万元，其中仅 3 月份即亏损 2855 万元。这三家粮食部门

和企业在此如此短的时间内上报的亏损竟超过 1.7 亿元。

从全国来看，这种亏损和虚增亏损同样严重。据权威部门统计，1996 年至 1998 年一季度全国粮食企业新增的亏损挂账为：1996 年 197 亿元，1997 年 480 亿元，1998 年一季度 270 亿元，在短短两年多一点时间内，粮食企业和部门的亏损挂账即达 947 亿元，是 1997 年中央财政总收入 4830.72 亿元的五分之一。

由于腐败愈演愈烈，粮食系统的“鼠官”越来越多，胆子也越来越大。他们为了自肥既不管国家收不收粮，更不管粮农利益受不受损。武汉市江夏区宁港乡粮管所就是一个典型。整个粮管所共 131 名“粮官”，在 1998 年公然挪用粮款的人数达 77 人，占 58.8%。宁港乡年产粮食约 2000 万斤，粮食收购资金约需 500 万元。而这个粮管所所长喻天保一人就挪用粮食收购资金 55 万多元，比全乡粮食收购资金的十分之一还多，差不多是该乡 200 户农民辛辛苦苦劳作一年的血汗钱。而他们挪用的这些粮款大多是用于赌博和摸奖。

从国有粮食企业、粮食局、财政厅（局）、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到粮管所的“鼠官”，几乎是只要与粮食收购资金沾了一点儿边的部门、单位乃至个人，无不张开獠牙毕露的大嘴，把收购资金当成“唐僧肉”，都要千方百计“啃一口”。国家投入的农副产品收购资金，被这么多部门、单位和个人挤占、挪用、截留或转借，收购农民的粮食等农副产品所需资金，自然就缺钱，甚至没钱，只能向农民打“白条”。比如，粮食主要产区的湖北省，在 1992 年截至 9 月份，全省就已经向农民开出了 9.06 亿元白条，有的粮食收购站因为无钱收购，只好停收。而这一年在辽宁、吉林、山东、新疆等省（区），同样纷纷告急，一些地方因为没有收购资金，根本无法开秤，或者一开秤就只能给农民打白条（引自 1992 年 11 月 19 日《人民日报》）。

这种局面是不应该也不能出现的。新中国成立以后到农村改革以前，在中国大地上也是没有出现过的。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主，国家重视农业，关心农民。尽管那时国家并不富裕，但收购农产品的资金是有保障的。国家拨下来的收购资金，也决没有人胆敢任意挤占、挪用、截留、转借他人。事情就这么简单。而今时代进步了，国家经济发展了，我们却陷入了这种不应该出现的困境，岂不太匪夷所思了吗？

第三节 中国农村有了“第二货币”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出现白条后，在中国大地上到底冒出过多少白条，我敢断言，一定是一个谁也无法统计的天文数字。其中最大的“白条群体”，无疑是年复一年源源不断向国家交售农林牧副渔产品的农民。九亿农民手中有过多少“白条”，这些白条给他们的生活、生产带来了多大的影响和困难，造成了多少损失，我相信谁也无法说清楚。

在90%的农民主要靠种植甘蔗为生的广西北海市福城镇，仅1997—1998年一个榨季当地糖厂就向农民打了6000多万元白条，以致很多农民的孩子，在学校开学后无法报到。8月31日是全镇各学校正式开学的日子，但学校里普遍冷冷清清。以该镇红境塘村小学为例，直到学校被迫推迟至9月3日开学，全校612名学生，仍然只有198名学生交费注册，其余400多名学生经过老师动员，虽然陆续返校，但绝大部分学生都是以甘蔗白条作抵押注册，否则就只能被挡在校门之外。但用白条注册就把学校推到了一个极为尴尬的位置。全校28名老师，其中20名是代课老师，他们的工资财政不管，靠学校自筹资金发放。“该收的学费收了一大堆废纸般的‘白条’，学校拿什么给他们发工资？拿什么维持学校正常运转？”该校李作乾校长愁苦不堪地说。

学生交来的是“白条”，但课本教材不能不发。往年学费缺口较少，学校还能设法借钱维持运转，这一年（1998年）缺口太大，学校根本找不到借得起又愿意给学校借钱的人。在新华书店购买的课本等教材，也只好向书店打“白条”，但人家要按2.5%的利率收取利息，利息又从哪里出呢？那位束手无策的李校长，面对一大堆“白条”，在办公室里含泪仰天长叹：“白条啊！白条！你何时能兑现？！”（见1998年10月16日《工商周刊》）

盛产甘蔗的福城镇，本来比较富裕。只因受“白条”之害，弄得农民的孩子连上小学都困难。仅1998年全镇22所小学，直到正式开学半个多月后的10月中旬，在已经注册的7734名学生中，打白条或赊欠书杂费的学生就有4586人，占59.3%，欠费金额78.88万元。而且，甘蔗种植越多的村子，学生打白条欠费的就越多。比如，全镇种甘蔗最多的宁海村，全村共有815名学生，仅有130人是交费注册，打白条欠费注册的却有685人，占84.6%。

福城镇一个榨季的甘蔗收入达9000多万元，无疑是一个比较富裕的地方，但却被可恨的白条，弄得“很多蔗民没钱买米，没钱看病，没钱送孩子读书，没钱买化肥投入再生产”，实在不可思议。

人们很难想象的是，在不少地方，因为农民手中都只有白条而没有现金，白条就无可奈何地成了“第二货币”，堂而皇之进入了流通领域。比如，辽宁省朝阳市，截至1999年4月，该市所属的五县（市）农民手中，就持有总金额高达8000万元的“白条”，平均每县（市）1600万元，而且白条持有时间最短的也超过2年。毫无办法的农民，不得不用“白条”交易。乡村收缴提留款用“白条”，农村收费纳税用“白条”，计划生育罚款交“白条”，连金融单位收取贷款和利息也可交“白条”，邮局和报刊部门也用白条抵现金，甚至连婚丧嫁娶，婴儿满月，

老人做寿等等，送礼也使用“白条”。

在有的地方，连捐款也用白条。海林市紫河镇江东村农民侯炳德女儿患脑瘤，需要住院做手术。但侯家是全村最困难的农户。乡亲们都想帮他一把，救活这个女孩。支书、村长顶着大雪逐户募捐，但村里的农民手中都不宽裕，卖给国家的粮食拿到的只是白条。全村100多户农民共捐出1086元，现金仅221元，其余800多元都是捐的“白条”，须等卖粮款兑现后才能给钱。最后由村委会开出证明，盖下公章，和牡丹江市第二人民医院签订协议，医院才破例收下这个打“白条”的病孩。在这些地方如果不用“白条”流通，人际交往和很多社会活动就得停摆。

我们不妨看看革命老区大别山区的情况。以金寨县为例，该县农民在1996年持有的白条为2700多万元，县里白条满天飞。该县南溪镇政府发给干部的工资是“白条”，给中学建校舍的20万元拨款是“白条”，发给全镇400多户军属的6万多元优抚款也是“白条”。政府发出的是“白条”，老百姓当然也只能使用“白条”，农民到商店购物用“白条”，交纳税费用“白条”，坐三轮车也用“白条”。乡财政收了“白条”再发工资或做其他事，当然还是“白条”。据2005年7月23日新华社报道，安徽省合肥市对全市107个乡镇的财务进行普查清理后，使隐藏多年的乡镇“财务黑洞”得以暴露，乡镇“白条”近8亿元。多数乡镇白条支出比例达60%，一部分乡镇支出的白条达80%，单张白条支出金额最大达140万元，时间最长的一张白条竟长达22年，即1983年打出的白条仍未兑现；仅清出来的100元以上“白条”，即达14万多张，金额达7.7亿多元。作为安徽省会所辖的乡镇，白条支出比例达60%甚至80%，其他偏远地区的乡镇财务状况，也就可想而知。

在白条进入流通领域的过程中，农民无疑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比如，金寨县农民用白条购物，一元钱“白条”就只能

抵七八角使用。在湖北一些地方，一元白条只能抵四五角钱。比如，浠水县洗马镇政府先后向农民发出数百万元“白条”，被当地人称为“马币”。这种“马币”开始流通时一元还能抵八九角。由于长期不能兑取现金，逐步贬值，到2002年，一元就只能抵四五角了。等于农民的血汗钱在这种旷古罕见的“白条”交易中，贬值一半甚至更多。

“白条”虽然成了流通领域“第二货币”，但广大农民却无力摆脱“白条”不断贬值的厄运。很多急需用钱的农民，干脆忍痛将手中“白条”低价卖出。于是一些头脑活泛心灵精明的人，立即发现了此中存在着诱人的盈利空间，一个倒卖“白条”的群体就应“利”而生。那是一些和银行或某些单位有关系有门路的人物。农民拿着“白条”不能兑取现金，他们却有着孙悟空七十二变的本事，拿着同样的“白条”，在转瞬之间就能变成硬梆梆的现钞。当地农民称这种行为是“白条”变“金条”。北海市福城镇农民何士德，手中有6万多元甘蔗“白条”，长期拿不到现金，便决定低价出售，几经讨价还价，最后作4万元卖给了“白条贩子”，白白损失2万多元。另一位农民祝永文，那一年甘蔗大丰收，在1997—1998年榨季本应收入一大笔钱，因为得到的是“白条”，被迫卖给“白条贩子”后，一年辛劳不仅没赚到一分钱，倒贴劳力不算，反而亏了2000多元。截至1998年10月，福城镇农民手中持有的6000万元“白条”，大约有60%都卖给了“白条贩子”，农民因“白条”造成的损失超过700万元。其中红境塘村在这一个榨季卖甘蔗应得蔗款600多万元，全村仅得到1200元现金，近600万元“白条”低价卖给“白条贩子”后，该村就损失200多万元。这样的损失还不令人怵目惊心吗？

由于利润如此丰厚，“白条贩子”蜂起，既有本地人也有外地人，既有偷偷摸摸干的，也有公开设点挂牌收购的，还有走村串户上门谈“生意”的，仅在福城镇干这种买卖的就不

下一百人。他们像蚂蝗一样吮吸着农民的血浆，被当地农民痛骂为“甜蜜的腐败”（参见1998年10月16日《工商刊减—P7》）。

“白条”在一些地方成为“第二货币”，大量进入流通领域，其危害之烈实在令人害怕。一是严重挫伤了农民的心，挫伤了农民种田积极性，辛勤劳动的成果只换来一张“白条”，先进农业技术和良种不能引进，给农业发展必然造成恶性循环；二是严重扰乱了农村金融秩序，国家金融部门不能进行正常的资金运转和投入，其权威和信誉必然大受影响；三是严重影响了农村稳定，“白条”日益增多，农民负担必然随之加重，农民的生活、生产受到影响，群众上访就会增多，党和政府的威望也必然大受损失，真是一举多害，其祸无穷啊！

第四节 “只限本村使用”的村币

随着“白条”成了“第二货币”堂而皇之进入了流通领域以后，一些地方的村官居然造出了更“高规格”的“白条”——效仿中国人民银行向农民公开发行自制的“村币”。在山东省平邑县五台镇新平村，村官们就印制了一种面额同人民币完全相同的“村币”，在村里公开发行和流通长达四年之久。老百姓用这种“村币”，可以在村里商店买肉、购油等生活物资，但不能交村里的提留。

这种可以公开流通的“村币”，其正面印着面值：50元、10元、5元、2元……但没有编号，没有发行时间，并在正面上边印有“只限本村使用，盖章有效”字样。“村币”正面还盖着现金保管员的私人印章；背面则盖着两颗鲜红大印——“新平村民主理财小组专用章”、“中共平邑县五台镇新平村支部委员会”公章。

笔者至今记得，解放前夕，家乡一个小镇上有一家叫吉庆

堂的商号，经济势力比较雄厚，为了垄断生意，发行过一种代币券，可以在那个小镇的商铺使用，历时大约半年，家乡解放，这种代币券自然不复存在。

中国《银行法》明文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印刷发售代币券以代替人民币在市场流通。自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币是神州大地上唯一可以流通的货币。

没想到通过农村改革后，一个小小的村支部却敢公然效仿中国人民银行，公开印制和发行“村币”。而且发行时间竟长达四年，那里的地方政府居然无人干预，岂不怪哉？！

“村币”问题被媒体披露后，村支书朱林孝对记者说：“这其实是一种工分票，1994年村里修河道和镇驻地公路拓宽时，村里没有现金支付农民工钱，就想了这个办法。很好用。”

但农民说，“村币”是村干部私自印制，公章掌握在他们手里，印多印少是村干部说了算，到底印了多少只有他们知道。村民们唯一知道的是，自己交给村干部的是人民币，而村干部发给自己的是“村币”。老百姓的钱到哪里去了？这是哪门子“工分票”呢？村里群众对此无不怨声载道，但绝大多数人却敢怒不敢言。

直到1999年底，忍无可忍的村民朱付生、朱林斌等几位农民，满怀激愤赶到济南《生活日报》哭诉后，山东不少媒体纷纷赶赴新平村采访，才使由村干部发行并已流通四年之久的村币问题，相继被《生活日报》、山东电视台等众多新闻媒体曝光。

但是，莫明其妙的灾难，随即也落到了被媒体采访过的农民头上。

就在山东电视台播出记者采访村民朱国平的镜头后，村委会有人指使不法之徒，在深夜放火烧了他家的柴禾垛。乡亲们赶来扑救，一直折腾到黎明才把火扑灭。朱国平遭此厄运后，哭诉道：“这日子真没法过了呀！”

与此同时，村委会还有头头公开用村里的大喇叭威胁：“有人上省里搞小动作，没用！总有一天翻案，有你好看的”（引自 2000 年 1 月 10 日《经济日报》）。

像朱国平家那样因为接受过记者采访“村币”而遭难的村民远不止一个。几天后，另外三家的柴禾垛，同样被不法之徒纵火。

频频莫名失火，把全村弄得一片恐慌。

72 岁的朱光一大爷的遭遇更惨。“村币”问题被曝光后，有一天下午，从青岛来了一位 20 出头的年轻女记者，向朱光一了解“村币”的事，刚一会，女记者就被村主任接走了。大约过了一个小时，女记者回来取包，此时天已黑了，女记者不敢走，便向朱大爷央求在他家借宿一晚。没想到这天晚上，就有人不断甩石头砸朱家的房，把女记者吓得一晚上大气都不敢出。

第二天一早，女记者说：“大爷，本来想在村里再采访一天，这里太可怕，不敢待了，我得走。”（引自 2000 年 2 月 16 日《大河报》）

朱大爷拄着拐杖，一直把女记者送到村口。

几天后，朱大爷在街上对村民家频频失火的事，说了一句公道话，竟被村民小组长一个耳光打倒在院里。

在一个连新闻记者也害怕得不敢采访的地方，在一个古稀老人说句公道话，都要挨揍的地方，难怪老百姓仰天哀叹：“这日子真没法过了”！但人们不能不问：公理何在？天理何存？

第五节 历史课本上的名词回到了现实中

“白条”进入了流通领域，但不可能进入所有领域。农民甲也不可能用“白条”向乙买 3 斤猪肉，乙再用“白条”向丙买 5 斤活鱼，丙也用“白条”向丁买 2 斤鸡蛋。如果“白条”

如此流通，则根本无法结算，金融秩序和人际交往还不一派混乱吗？

在这样一种困境中，最原始的交易——“以物易物”便在特色中国不少地方卷土重来！“应时而生”。

“1.5 公斤玉米换 0.5 公斤苹果”、“0.5 公斤小麦换 1 公斤西瓜”、“5 公斤小麦换 0.5 公斤猪肉”，这种在中国大地上早已消失的交易方式，成了二十一世纪初期中国不少农村一道新兴的奇特景观。

山东省禹城市安仁镇农民李铁军，在 2001 年种了 2 亩西瓜，由于是早熟品种，正好赶上麦收季节出园。此时别人的西瓜都还不能上市，无疑是一个绝好的销售时机。但此时也是农民最需用钱，而手中最缺钱的时候。绝大多数农民都不可能轻易拿钱买西瓜吃。而西瓜是一种不可久放的水果，如果不能及时出售，几天就会烂掉。面对这种现实，李铁军便决定搞“以物易物”，每天利用中午休工的空隙，和儿子一起赶着毛驴到周边农村去卖瓜。

说是“卖”，其实却是“换”。一进村他就高声吆喝：“换瓜啦，换瓜啦”，村民们一听可以用农产品换瓜，大家便提着刚收割的小麦纷纷围了上来，生意还蛮火爆，一车瓜居然很快卖完。

回家一清点，一车西瓜没卖几个钱，倒是换回了大半车麦子。最后一算账，一亩西瓜，居然变成了一吨麦子，种西瓜比种麦子强多了。这是父子俩都没有想到的。

“以物易物”不仅在农民之间进行，那些走村串店的小商小贩，为了尽快把自己的货物推销出去，也普遍改变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交易方式，搞起了“以物易物”。诸如花生、豆油、豆腐、小五金、小百货等等农民需要的货物，也可以用小麦、玉米等农产品按价结算，甚至连一些收破烂的人，也不再专收破烂，他们一边挑着碗、碟等餐具及小商品和农民交换废塑料、废铁、废锅等各色废品，不再给农民付现金。此中就

有了两次利润，他们和农民交换的小商品，没有一样不是低进高出，有了一次盈利，和农民交换而来的各色废品，又有一次利润，何乐而不为？

禹城市安仁镇齐尧村农民王久保，家里有一台柴油机，过去每到浇灌农田的时候，帮村民浇地都是收现金。在“以物易物”已经成为广大农民无可奈何的选择以后，也改为收粮食。因为农民手中缺钱，浇了地以后要钱非常困难，为了少跑几次腿少费些唇舌，只好收粮食，粮食卖了也是钱嘛，这样反而省去不少麻烦。

吉林是我国产粮大省，其中玉米是重要产品。但玉米价格不断下跌，乃至农民手中的钱越来越少。农村不少商贩对此自然了如指掌。他们便开着三轮车，或赶着毛驴，拉着油、盐、酱、醋、面粉、糕点等生活品下乡，农民可以拿钱买，也可以用玉米换。但农民普遍选用后者。因为即使农民手中有几个钱，他们也不敢轻易拿出来购物。小孩上学，家人看病，购买化肥、农药等等，都不可能以农产品交易。有限的那点钱，必须用在刀口上。普遍是用粮食来换取自己需要的物品。比如，用豆子换豆油，用玉米换面粉。在吉林一些农村甚至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如今食品安全已成了中国人的一个心腹大患，不少人追求的是“用要洋，食要土”。很多人把目光投向了农民家里的土特产，没有或较少有污染。于是，一些城里人就托在乡下的亲戚、朋友，用自己穿过的衣服，去换农民的鸡蛋等土特产。这些衣服大多是追求时尚爱花俏的城里人，穿了一段时间后不再喜欢或者换了更高档次更加时尚的衣服，放在家里反而成了累赘需要处理。但在乡下人看来还挺新艳，因此也愿意用自己的鸡蛋等农副产品交换。这也是各取所需吧。

由于“以物易物”的不断发展和蔓延，在一些地方甚至取代了昔日热闹繁荣的集市。农村集市历来是农民购买所需物品

的重要窗口，随着“以物易物”的兴起，很多集市上的商品已经少有人问津，因而变得冷清落寞。农民需要的东西都用粮食等农产品换了，本来就缺钱的农民谁还会去集市买呢？

但是，所有的商人都是精明透顶的，他们和农民进行“以物易物”，其目的无不都是为了最大盈利，所以最终吃亏的还是农民。吉林省农安县开安镇齐家林村农民王海在2002年3月，以用玉米换面粉算了一笔账——当时商家和他们的交换标准是，农民用50公斤玉米换取25公斤面粉，商家一袋面粉就能净赚10元钱。而当时小商小贩搞“以物易物”已有三四年时间，他们用农民需要的面粉、大米、豆油、白酒等商品换取农民的玉米，农民因此付出的代价有多大，我想人们不难想象。

这是一种令人心酸的反常现象，充分说明农民正在走向商品消费边缘化，有的人甚至连日常生活必须品的购买力都几乎丧失。

农村改革后，在浙江、江苏、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和那些以经商、办企业为主的农民，收入增长比较快，而绝大多数靠农业种植为主的农民，收入增长相当缓慢，随着化肥、农药、农机具等农业生产资料的不断提价，随着“三提五统”等乱收费、乱摊派的日益加剧，而粮食价格的涨幅，总是远远落后于农资的涨幅，导致农民收入下降。但是，政府机关总是以平均收入显示农民收入。因此就把大多数农民的低收入和少数农民的高收入拉平了。“张家有钱一千万，九个邻居穷光蛋，平均起来算一算，个个都是张百万”。这种被经济学家称为收入“一头沉”的现象，掩盖了农村分配和农民收入的真相，造成了市场消费的两极分化。据山东省农调队于2002年的一项调查显示，2000年山东省农民人均收入达2659元，但达到收入平均线的农民只有40%，60%的农民收入都在平均线以下，从最能体现购买力的银行存款和手持现金看，20%的高收入农民占有农民总收入的40%，此中的悬殊之大，不能不令人惊诧。

“以物易物”，早已成了只有在历史课本上才能找到的一个名词。那是人类早期商品经济很不发达时的一种原始的交易方式。在人类已经发展到普及电脑，购物则普遍使用刷卡的今天，中国农民却因“白条”满天飞，倒退到了原始的“以物易物”时代，除了说明农民处于收入降低，持币量减少的困境，因而无法正常消费，并导致农村集市萧条之外，难道不是一种历史的倒退吗？

第六节 谁把苦果抛给了农民

“白条”的兴起和历久不衰，使包括乡村教师、基层干部、企业工人在内的数以千万计的人们，特别是当时的九亿农民受害不浅。这种令人头痛令人叫苦不迭的现象，是新中国成立以后，谁也没有见过的。那么，人们要问：为什么会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现，并且长期难以改变呢？

这是一个涉及全局的问题，笔者自然无力回答。但却不揣冒昧凭手头资料，说一说自己的一孔之见，就教于各界方家。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起，在公有制轨道上运行了几十年的中国转入私有制轨道，即由农村大包干扩展到国有企业承包制。

国有企业是共和国大厦的主要支柱。但是承包后情况并不妙。因为在承包期间，企业完全由承包者主宰，一切都是承包人说了算。赚了是个人的，亏了是国家的。这是比私有化更落后的搞法。私有企业赚了是个人的，亏了也是个人的，个人要承担风险，而承包国有企业，只赚不亏，没有任何风险，承包者是在玩国家，玩人民，企业玩垮了，个人也捞饱了，大不了走人了事。

我们且来看看赫赫有名的首都钢铁厂承包后的情况吧。

首钢于1980年在高层直接关怀、指导下实行承包，是开

国有企业承包之先河的大型国有企业。这家建于 1919 年的钢铁厂，解放后党和政府投入大批资金，进行了全面改造和扩建，通过全厂干部、工人几十年艰苦奋斗，不断壮大发展，无论生产能力、技术设备、人员素质等等，在全国大型国有企业中，都属一流之列，具有非常雄厚的实力和巨大的发展潜力。当时邓小平亲自巡视首钢，将它列为国有企业推行承包制的首选，大概与此不无关系。邓小平离开首钢后，国务院随即派了一位副总理带着十几位中央部长，亲临首钢“现场办公”，对首钢承包人周冠武说：“你对中央有什么特殊要求，只管开口提”，中央政府对首钢承包者实行的是“有求必应”，这在共和国历史上大概是独一无二的特例。比如，首钢承包后，不实行国家已开始实施的利改税后的产品税和营业税，而实行已经废除的工商统一税，而且一定 15 年，以后国家新设的税种也可以不执行。比如，按国家规定，冶金系统的钢材，要缴 14% 的税率，首钢只缴 8%，仅这一项就比其他企业低了将近一半。

首钢的承包，得到了邓小平、江泽民、李鹏、朱镕基等众多中央高层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关照，给了很多其他企业不可能得到的特殊优惠条件，开始几年还不错，经济效益确实上去了。邓大人曾称赞：“首钢为什么搞得好，说到底就是承包制加周冠武。”因此，周冠武成了全国的改革“明星”，首钢成了全国大型国有企业改革的“样板”，名噪一时，誉满神州。

然而，承包制存在的巨大弊端，从一开始就遭到不少人的质疑。承包后不久，首钢就变成了周冠武的“父子公司”，父子俩一统天下胡乱决策，肆意折腾，贪污受贿，简直无法无天。到 1988 年，这家共和国赫赫有名的大型国企，虽然获得了很多特殊优惠条件，却被“周家父子”弄到生产难以为继，部分车间被迫停工停产的地步。

承包前的 1979 年，首钢的投入产出比为 1:2.6，到 1985 年投入产出比雪崩式地降到了 1:0.4。即承包前每投入 1 元，产出

2.6 元，净赚 1.6 元；承包后每投入 1 元，产出仅 0.4 元，倒亏 0.6 元。这样的承包国家亏得起吗？

紧步首钢后尘，以首钢为“样板”进行改革的大型国企本溪钢铁厂，遭遇的也是同样的厄运。

本溪钢铁厂在本溪这座当时已达 100 万人口的大城市中，它的职工和家属占了全城半壁江山，而它上缴的利税则占到全市财政收入 90%，人们说十个本溪人九个吃本钢。

本钢承包后，先后经历了张 × 达、李 × 达、向 × 显三名总经理，他们的决策，无一例外都是首先让自己的家庭和子女迅速“发财致富”。“太子党”们占据着钢铁厂几乎所有的要害部门，权大胆也大，他们一次就敢提取几千吨至几万吨当时十分走俏的钢材。简直就像农民在自留地里拔白菜一样随心所欲。一个曾经上缴利税占到本溪市财政收入 90% 的大型国有企业，经过三位总经理和他们的子女加上各种关系户的肆意折腾和侵吞，不过十年多时间，就被折腾得连职工工资都发不出，生产难以为继，部分车间不得不停工停产，本溪市的财政状况也就可想而知。

国企承包后，承包者只顾个人和少数人谋利，全不顾国家损失的现象十分普遍也十分严重，正如西安无线电一厂的工人们怒斥搞垮该厂的当权者时所说的：“他们可以用一头大象去换一只跳蚤，只要这只跳蚤能装进自己的腰包。”

原来吹得神乎其神“一包就灵”的承包制，结果造成的却是国有企业的巨额亏损。以全国独立核算的国有企业为例，从 1985 年开始，亏损额就一直扶摇直上——

1985 年亏损 32 亿元

1988 年亏损 180 亿元

1990 年亏损 348 亿元

1993 年亏损 458 亿元……

从 1988 年起，国家财政每年补贴国有企业亏损的支出，

即达到 500 亿元。

本来是国家财政顶梁柱的国有企业，变成了国家财政的沉重包袱。与此相伴而来的是，中国破天荒开启了所谓的“吃饭财政”时代。即国家拨款只够官员们“吃饭”，没有钱“干事”。

政府处于这种状况，哪能每年拿出数百亿巨资补贴本来是财政支柱的国有企业的巨额亏损呢？于是就卖国有企业，既可免去国家财政补贴国企巨额亏损之虞，拍卖国企的收入，又可缓解“吃饭财政”之窘迫。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们当然无不拥护。

据有关资料显示，新中国建立以后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国国有企业总共积累了大约 5.5 万亿元家底。当时的 5.5 万亿元，至少相当于今天 200 万亿元。这是中国工人阶级经过几十年艰苦奋斗，用自己的心血汗水和聪明才智创造的巨额财产，也是共和国最重要的家底。但在拍卖狂潮中，却成了地方政府甚至地方政府中某些官员的私有财产，狂卖盗卖贱卖屡见不鲜，诸如价值 4.6 亿元的四川省犍为县电力公司，以 4000 万元贱卖；陕西旬邑县一家年销售收入达 5.3 亿元，总资产超过 6 亿元的国有煤矿，以 500 万元由原国企老板“自卖自买”；某地一栋五层高楼以 150 元贱卖，价值 4600 万元的贵州元谋水泥厂分文不收，由厂长一手揽入怀中之类的例子比比皆是。河南新乡市在甩卖一家国营工具厂时，主持拍卖的领导更是嚣张，面对 100% 反对卖厂的职工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公开叫嚷：“你们企业就是我手中的杯子，产权是我的，我想送给谁就送给谁，我想把它摔了就摔了”（引自 1998 年 6 月 25 日《中国机电时报》）。

国有企业在企业改革中成了地方官员“手中的杯子”，“想送谁就送谁，想摔了就摔了”，还有什么国有资产可言呢？据报纸披露，地方政府甩卖国企时，每年至少流失 5000 亿元国有资产。当时价值 5.5 万亿元国企，到底卖了多少钱，有多少进入了个人腰包，肯定是一笔谁也说不清谁也不须说清的糊涂账。因为某些改革精英认为：“清算原罪，就是否定改革”。中

国工人阶级几十年艰苦奋斗、用心血汗水创建和发展起来的众多国营企业，就是这样被一些败家子毁了。

数百上千万家国有企业，几乎被卖光送光了，剩下为数不多的垄断性国企，由于体制设计和政策制订中存在众多不可克服的弊端和漏洞，国企由国家财政支柱变成财政包袱的局面，长期没有改观。据2011年3月3日《21世纪经济报道》披露：“2001—2008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累计获利总额为49174.8亿，但同期少缴纳的利息、地租、资源租金以及获得财政补贴共计64766.91亿元。”在长达8年间，国企创利不过4.9万亿元，而国家补贴竟接近6.5万亿元，净亏1.6万亿元。净资产收益率为-6.2%。获得国家诸多优惠条件的国有垄断性企业，处于这种局面，难道是可以理解的吗？

大批国有企业被地方政府卖了，剩下的垄断性国企依然是国家财政沉重的包袱，而国家财政供养的党政机关却膨胀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

文化大革命中，国家精简机构，河南省林县革委会全部工作人员仅有60来人，到了2001年，河南省的2100多个乡镇平均每个乡镇由财政供养人员达448人，有的乡镇高达1177人（引自2001年第15期《瞭望》）。同是改革开放后的2001年河南省乡镇官员平均比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该省林县革委会多出7.34倍至19.3倍。陕西省黄龙县是一个财政自给率只有27%的贫困县，全县仅4万余人，县里机构达308个，财政供养人员达4400余人，官员之泛滥，居然达到9个农民养一个官，尤其令人大跌眼镜的是，9个农民养一个官的县居然是“改革先进县，”（引自2001年8月1日《特区文摘报》）这样的改革“先进县”，对老百姓，对国家，到底是福祉还是灾难？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官民之比为1：600，笔者家乡所在的公社，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全公社共1.5万多人，仅有公社干部12人，而今却出现了一个省平均每个乡镇448人，

甚至创造了一个乡镇多达 1177 名官员的“奇迹”，国家财政不被如此多如蝗虫般的官员吃垮才怪呢！

然而，泛滥成灾的官员们，不光食民俸禄，而且还利用手中大权不断侵吞国家财富。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商业资本阶段，由于特许权力的资本化，一批掌握权力的官员，从国家完全垄断的外贸、商业、旅游、外汇等渠道，攫取的国家财富不下 5 万亿元；在九十年代初期开始的金融资本阶段，一批掌握权力的官员，从原始股票的私下赠送、股票上市额度的行政性分配、炒地皮、产权交易、资产评估中国有资产流失，到贷款权力的滥用，攫取的社会财富不下 30 万亿元（引自 1998 年 9 月 14 日《文摘周报》），仅这两项合计，官员们就将超过 35 万亿元国家财富装入了个人腰包，国家财政还能受得了吗？

我们且看看改革开放伊始的 1979—1987 年国家财政的收支情况。

年份	总收入（亿元）	总支出（亿元）	收支差额（亿元）
1979	1103.3	1273.9	-170.6
1980	1085.2	1212.7	-127.5
1981	1089.5	1115.0	-25.5
1982	1124.0	1153.3	-29.3
1983	1249.0	1292.5	-43.5
1984	1501.9	1546.4	-44.5
1985	1866.4	1844.8	21.6
1986	2220.3	2291.1	-70.8
1987	2346.6	32426.92	-80.29

（以上数据引自《中国：昨天与今天——1840—1987 年国情手册，解放军出版社，1989 年 8 月出版》）。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搞改革开放起，连续9年仅有其中的1985年国家财政没有赤字，这是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从来没有出现的窘迫。

这种状况的出现，其实在“包字进城”就埋下了种子。“承包制”把作为国家财政支柱的国有企业“包垮”了。最后因为国家无力补贴人为造成的国企巨额亏损而干脆甩卖国企。但甩卖国企的钱到哪里去了，老百姓却一无所知。也就在这时，政府机构却在改革中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恶性膨胀，创造了一个乡镇竟有1177名吃皇粮的官员和一个县里9个农民养一个政府官员的旷世奇迹；使已经捉襟见肘的“吃饭财政”雪上加霜；而一批手握大权的官员，不是为国分忧，为民解难，却肆无忌惮地几万亿元至几十万亿元地侵吞、浪费国家和社会财富，国家财政还能不衰竭吗？

然而，这枚由政府决策和政府官员一手栽种的苦果，最后却落到了乡村教师、基层干部、企业工人头上，特别是落到了广大农民头上。他们把自己辛勤劳动生产出来的粮棉油猪、烟麻蚕林等农林牧副产品，交给国家，国家却把“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个天经地义的、沿袭了几千年的交易法则，都破坏、抛弃了，只给农民一张“白条”。这白条何年何月何日能兑现，也没有承诺。如此盘剥农民，叫农民怎么接受呢？

邓小平曾说，十年文革把中国经济搞到了崩溃的边缘。但是从1966年至1976年，仅有1967年因大串连导致部分企业一度停产或半停产，使国家财政出现了22.5亿元赤字，而且即使财政出现了赤字的1967年，谁见过中国大地上哪一个学校、哪一个公社、哪一个企业，给教师、给基层干部、给工人推迟过一天发工资吗？谁见过哪一个地方给哪一个农民打过一张“白条”吗？如果要用“崩溃”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时候中国经济被弄到了“崩溃的边缘”呢？然而，这枚由决策者种下的苦果，最终却抛给了广大农民，难道公平吗？

第七节 农村集体经济的崩溃和“三乱”的兴起

几乎与白条同时出现的，是乱征收、乱集资、乱罚款的迅速兴起。

在农村推行大包干的经济体制改革以后，经过历时三年的“撤社建乡”，将全国五万六千多个人民公社，改成了九万二千多个乡镇。于是，在中国农村存在了二十多年的人民公社，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的组织形式宣告消亡，农村集体经济也随即被瓦解。随着财政的窘迫，国家推行所谓的“分灶吃饭”，建立分级财政，实行财政包干。并且允许乡镇政府将企业上缴的利润、管理费和各种集资款、捐款以及各种罚款收入等等，都作为乡级财政的自筹收入，由乡镇政府支配。有了这把尚方宝剑，就为各地乡镇任意增设机构、扩充人员和乱征收、乱集资、乱罚款敞开了方便的大门。

首先是各地乡镇领导以各种名目，任意新设各种机构，甚至因人立庙，大肆安插自己的子女亲属乃至七大姨八大姑都成了自己的下属。过去一个公社十来个干部一下就膨胀到诸如河南省那样全省平均每个乡镇达到 448 人，最多达 1177 人的惊人地步。这些自立名目冒出的机构和潮水般涌入乡镇大院的新增人员，要工资、要福利，还要公款消费。已经“分灶吃饭”，国家不给钱，当然就只能在国家允许的“自筹收入”的圈子里做文章，大搞乱征收、乱集资、乱罚款。

而且，国家推行“分灶吃饭”的“财政包干”以后，各级政府 and 部门之间，立即形成了一个泾渭分明的利益关系。那些手握大权，又“分兵把守”农村经济发展命脉的部门，便成了既垄断国家权力，又追求部门利益的主体。他们的手随即纷纷伸向农村，伸入农民的口袋。截至 1990 年，仅由国务院各部委颁发文件，要农民征缴的各种收费项目即高达 149 项；到了

1998年，仅取消的中央各部门的不合理收费项目即达424项，取消的各省不合理收费项目2028个，取消的地市以下不合理收费项目18261个，共涉及金额993.5亿元。如此众多的不合理收费项目，像一只只针头插入农民的血管，曾抽取了农民多少血浆有谁说得清呢？

中央、国务院各部委把手伸向农民，各级地方政府受利益的驱动和财政并不景气的困扰，挖空心思滥设的收费项目也就越来越多，收费范围越来越广，收费标准越来越高。各种自立的收费项目，更是令人瞠目结舌，郑州市规划局连老百姓查阅信息盖个章，也收费2万元（见2011年6月1日《羊城晚报》）。县、乡、村则借上面收费混乱之机，搭车收费，加码收费，自定收费。在很多地方，乱收费不仅没有约束没有制衡，而且互相攀比，互相竞赛，五花八门的收费部门也应利而生。向农民乱收费、乱集资、乱罚款的歪风劲吹不止。

乱收费、乱集资、乱罚款其所以又多又烂，，与国税、地税分开后，主要的税收都被国家拿走了，地方财政日益困难弄得很多地方政府机关连工资都发不出来密切相关。山东省某县质监局一位审查员就坦率地向记者说：“现在的财政供养机制不顺，收费罚款省局、市局都扣一部分，剩下大约80%是‘自己’的，所有人的工资福利就从收费、罚款中出……我们现在每天的工作目标就是想着如何完成‘创收’任务”。（引自2011年4月19日《东方早报》）

一个县政府的局级机关，不仅“所有人的工资福利”全靠“收费、罚款中出”；而且，省局、市局都要从收费、罚款中提成“大约”20%。这就是说，省里、市里和县里的政府机关结成了一条乱收费、乱罚款的利益链，收得越多，罚得越多，他们的口袋里就装得越多，以致“每天的工作目标就是想着如何完成‘创收’任务”。政府机关如此上上下下一齐“想着如何完成创收任务”，“三乱”还能不越来越多越来越烂吗？

在湖南涟源市 156 个副科级以上单位中，执行收费的单位和部门多达 144 个，即全市 92.30% 的副科级以上单位和部门都在执行收费，执行收费的项目达 1230 个之多，平均每个收费单位和部门有 8.54 个收费项目，其中行政性收费项目 727 个，事业性收费项目 474 个，专项收费项目 29 个（引自 1998 年 4 月 2 日《湖南税务报》）。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每天的工作目标就是想着如何完成‘创收’任务”，但是，要执行如此众多的收费项目，除了收费还能干多少事呢？

楼外有楼，天外有天。与湖北省利川市相比，涟源市的收费项目可就小巫见大巫了。据 1998 年 6 月利川市物价局局长杨兴发介绍，该市从上到下的行政事业收费多达 2200 多项，而且“这还只是正在统计登记中的一部分”。当时已经统计登记的 2200 多个收费项目都是有红头文件的。其中中央部办委 33 项，省里 665 项，其余是市里规定的收费项目。该市到底有多少个收费项目，当时尚未统计出来，杨局长当然无法说清。一个县级市已经统计出来的收费项目就多达 2200 多个，这肯定是前无古人的。但是，在全国 2000 多个县市中，利川市的收费项目未必就是最多的。

农村改革后，县乡财政普遍衰竭乃至几乎崩溃——像山东某县质监局那样“所有人的工资福利全靠收费、罚款中出”的政府机关，其经济难道还没有崩溃吗？在这种状况下，不少政府机关，不仅纷纷自立乱立收费项目，而且层层加码。比如，1997 年 8 月，湖南省物价局、财政厅、省教委三家联合颁布秋季义务教育收费标准后，下面普遍层层加码。比如，新化县由于县、乡两级财政都相当困难，按政策规定，仅教师工资缺口即达 960 多万元之巨，县委县政府便作出决定：1997 年下学期在湖南省颁布的收费标准基础上，每个学生加收“人员口子费”30 元，乡、镇又在县委县政府已经加码的基础上，再加码，其中小学 1—6 年级学生加收 48—54 元。有一位农民算了

一笔账：新化县 120 多万人口，中小学学生至少占 10%，即超过 12 万人，只以县、乡两级人平加码 50 元计算（实际当然不止此数），这个学期就给群众加重了 600 多万元的经济负担。

与新化县相比，浏阳市就更厉害，经过层层加码，平均每个学生超标准收费 121—127 元（以上数据均引自 1997 年 11 月 13 日《湖南日报》），超过新化县每个学生加收的 2 倍以上。浏阳市 130 多万人口，如果同样按中小学生占 10% 计算，则这一个学期浏阳市给群众加重的教育负担就超过 1500 万元。如果再照此计算，在总人口达 7000 万的湖南，仅仅因为教育的层层加码，在一个学期给群众加重的负担，就一定是一个令人咋舌的数字。

层层加码的乱收费，理所当然引起了群众愤怒。也引起了各级党、政组织的关注和重视。

1999 年秋天，湖南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组织减轻农民负担执法检查团，分成十四个小组，分赴湘北湖区和湘南丘陵区实地考察减负情况，到当年 11 月上旬，共清查涉及减负文件 6771 个，已废止 1304 个，取消 1455 个，清查收费项目 10139 个，也就是说，在湘北湖区和湘南丘陵区出台了 6771 个收费文件，即使废止 1304 个，取消 1455 个，还有 4012 个收费文件在执行。收费项目更是多如牛毛，仅教育收费就有建校费、课外书本费、桌椅维修费、保读费、录取费、勤工俭学费、校服费、转学费、考试费、理发费……甚至连“不可预计费”，这种连神仙听了也会感到莫名其妙的收费，也赫然成了堂而皇之的收费项目。除了种种从未闻听的收费项目外，教育部门和学校还强行规定学生要购买他们推销的各种普遍价高质劣的商品，从铅笔、钢笔、字典、书包、各类杂志到牙刷牙膏、木桶等等，如此借学生乱收费盘剥和掠夺农民，不要说在中国教育史上闻所未闻，在人类教育史上大概也是绝无仅有。因此，弄得大批不堪重负的农家子女被迫弃学。比如，耒阳市巴蕉乡石

壕村 10 组，就有 30% 的儿童因家庭无力承受不堪重负的乱收费而失学；革命老区攸县新市镇中学仅 1992 年下学期，就有 205 名学生含泪离开了学校（引自 1993 年 12 月 21 日《湖南日报》）。

令人忧虑的是，这种乱收滥罚的状况，长期没有得到有效抑制。《人民日报》在 2012 年底援引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的文章称，2009 年，中国预算外收费罚款收入“共计约 2.2 万亿元”，超过国家税收三分之一。按 13 亿人口平均，相当于每个中国人“奉献”了 1500 元以上，面对这种大概是史无前例的乱收费滥罚款；媒体惊呼：这是“以罚治国”（引自 2011 年 12 月 2 日《生活文摘报》）。

第八节 竹农种一根竹子，得到一双筷子

自从人民公社解体以后，某些地方政府向农民收费、收税之为所欲为，不说绝后，空前大概是没有疑问的。

我们不妨看看，农民养一头猪，政府要拨多少“毛”吧。

著名作家梁斌在《红旗谱》中，曾不惜笔墨，对农民英雄朱老忠带领乡亲们大反“割头税”（即猪头税）进行了生动的描写。在那个暗无天日的社会里，农民自家杀一头过年猪，只管搜刮民膏民脂却不管百姓死活的反动政府也要收税。理所当然引起了农民的愤怒，大家认为官府欺人太甚，忍无可忍，便在朱老忠带领下，组织起来大反猪头税。

然而，农村改革后，从农民养的一头猪身上收取的各种税费，与当年的“猪头税”相比，已是望尘莫及。

在河南省禹州市茌庄乡，农民养一头猪得交三次“猪头税”——卖猪时交一次，杀猪时交一次，然后再按人头交一次。“猪头税”按人头交，这可是农村改革后，政府官员们的“新发明”。

历史学家告诉我们，早在 300 多年前的公元 1712 年（康熙 51 年），清王朝就进行了“摊丁入亩”改革，将人头税（丁银）并入田赋征收，实行“新增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到乾隆时期，已在全国推广、实施。这一制度直接废除了延续几千年的“人头税”。没有想到，历史进入二十世纪末期后，这些地方居然还搞起了按猪头收取人头税的把戏。

更为荒唐的是，没有养猪的或养了猪却病死了的，照样得交税。比如，茺庄乡南茺村农民按规定向国家交售合同粮等，上面扣了提留、统筹款后，还要扣“猪头税”，不管大人小孩，每人扣 11 元。有一位李大嫂全家 6 口人，养的猪早已病死了，也按每人 11 元共扣去 66 元。该村一位老大娘和老大爷老两口生活，无力养猪，同样也扣掉 22 元。一位叫刘群昌的农民更是叫苦不迭，他说：“我更冤！养了两头猪，卖猪时叫我交‘猪头税’，每头 40 元，共交了 80 元，又让我按人头交，每人交 11 元共交 33 元，两头猪交了 113 元。”

养猪的，卖猪的，都交了猪头税，杀猪的还得交。该乡玩北村屠宰户刘国义说：“税务部门来查猪头，不管大头小头，每头 40 元。后来税务部门嫌麻烦，实行‘包干’，每个月按 12 头收税，杀不杀都得交 480 元”，刘国义对如此收税非常气愤：“算上农民交的，一头猪得交三次‘猪头税’，不知道一头猪有几个头？！”（引自 1996 年 8 月 2 日《中华工商时报》）。

1999 年全国“两会”期间，江西万载县人大常委会副主行刘性格委员在会上介绍，在江西一些地方，即使没养猪，每人也得缴纳 1—3 头“猪头税”，每头 32 元。没有特产也得交 20 元特产税。但对于特产农户的基本利益，政府却不保护。农民销售自己的特产时，常有一些“把头”强买强卖，压级压价，恶意损害农民的正常利益，政府部门却不闻不问。管理就是收费甚至随心所欲乱收费，在不少地方，早已司空见惯。

在天府之国的四川，养一头猪要缴纳的税费更令人咋舌。

2007年，四川省物价局发出文件，要求规范涉及生猪饲料、屠宰、销售环节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并取消产地出境检疫费、产地出境消毒费、治安管理费、生猪生产技术改进费等9种费用。

仅由省物价局一个文件对一头猪取消的收费即达9种之多（见2007年8月15日《华西都市报》）。文件没有说原来有多少种收费，但可以肯定收费种类一定不少。人们不能不刮目相看的是，食民俸禄的政府官员们，居然从一头猪身上，想到了什么“产地出境检疫费”、“产地出境消毒费”、“治安管理费”等等，可见其“敢想敢收”的非同凡响。农民将一头猪卖到肉食企业，再转入菜市，要进行什么出境检疫和消毒？一头猪任人宰割不招谁不惹谁，与社会治安有什么关系和影响？简直是搜刮民财不择手段。

就在四川省物价局发文取消9项猪头税的第二年，同属天府之国的重庆市綦江县委书记王越，在全国“两会”上向代表们出示的《重庆市生猪税费标准及实际征收表》上显示，在重庆市一头猪的税费多达15种。除了什么“屠宰服务费”、“消毒费”、“检疫费”还能和猪扯上一丝关系的收费外，还有什么“教育附加费”、“城市建设维护费”等与猪们八杆子打不到边的收费，也加在猪头上。由于农产品的价格是降多涨少，而农民向国家购买的工业品价格，则涨多降少，乃至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区广东省，1999年时，农民每养一头50公斤的生猪，就要倒亏143.49元（见1999年4月16日《羊城晚报》），如果我们的官员在大口吃肉的时候，设心处地地为农民想一想，这肉你吃得下去吗？

以上说的仅是各地政府从“猪头”上向农民收税的一些情况，而农民涉及的各类农副产品品种之多，每一样农副产品都是地方政府收费纳税的对象，而且收多收少，几乎全是官员说了算。

福建是我国的竹业大省，竹林面积居全国之冠，不少农民的主要收入就是靠竹子。但是，竹农从竹子身上能够获得的收入，却少得人们无法相信。《中国青年报》曾撰文，给竹农算过一笔账——每种一根商品竹，竹农投入的化肥、农药、劳力，折合约4元钱，占到“半根”竹子的销售价，剩下的“半根”竹子，经过流通领域，大小“竹蛀虫”轮番啃咬——除了缴纳生产环节税、经营环节税、增值税、所得税之外，还得通过地方政府一份份随心所欲的“红头文件”所规定的15道收费大关，而这些“红头文件”都“没有半点法律依据”，经过如此盘剥，竹农卖一根竹子的实际所得就“值一双筷子钱”。种一根商品竹，得到的是一双筷子，听来实在令人心酸。

农村改革以后，随着拜金主义的泛滥和私欲的膨胀，地方政府的钱癖似乎在一夜之间便膨胀起来，大凡国家出台各种法律法规、条例、草案，都会成为地方政府的收费借口。比如，国家颁布《环境保护法》以后，在安徽一些地方，官员们就把农民烧锅做饭冒出来的炊烟，也视为“污染了环境”，振振有词地向各家各户收取“污染物排放费”。一些胆大的农民想不通，便向上门收费的官员讨说法，不说还好，这一说立即又冒出一个“态度费”，说你态度不好要收费。收多收少则全凭官员对你“态度”的“看法”，任意决定收费多少。在河南信阳固始县黎集镇等乡镇的基层政府，甚至挖空心思出了“老天爷下雨要收‘自然水费’的改革新政。黎集镇镇长曾金有上任后于2008年5月开始，规定向农民收取‘自然水费’，每人30元。该镇是固始县第一人口大镇，全镇七八万人，一年收取‘自然水费’就是二百几十万元。”政府给的说法是：交的是自然水费，也就是天上下的雨，农民用这个水种田也要收费（引自2010年10月20日《潇湘晨报》），今天的某些官府向农民收费收到了这个份上，我真有点担心，不知何时，那些智商超人的官员会不会出台农民出门要交出门费、见了太阳要交阳光费？

第九节 中央三申五令——令不行，禁不止

向农民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即小岗村的“大包干”推向全国农村后，各界人士和各级政府以为“一包就灵”的分田单干，使农民在一夜之间就富起来了。也就在这时，各级政府却被推到了“吃饭财政”的尴尬地位。于是，纷纷把手伸向其实远未富裕的农民。一股乱收费、乱集资、乱摊派的歪风随之席卷而来，弄得农民不堪重负，苦不堪言，怨声载道。

中央当然看到了这种过去不曾有过的状况，1985年便颁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制止向农民乱摊派、乱收费的通知》。当时的情况是，众多急功近利的地区和部门，纷纷向农民伸手，使农民人均负担的增长大大超过人均收入的增长，导致农民生活下降。以湖北为例，1988年比1986年的人均负担（不含差价款）年均增长9.54%，而人均收入仅增长4.48%，人均负担的增长，几乎是人均收入增长的2倍。

但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制止向农民乱摊派、乱收费的通知》下发后，不仅没有“制止”向农民“乱收费、乱摊派”的歪风，反而愈演愈烈。地方政府任你中央三申五令，任你农民怨声载道，只要我需要，全都照收不误。

1990年2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通知》（下称《通知》），仅仅过了7个月，即1990年9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又联合发出了《关于坚决制止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的决定》（下称《决定》）。

就在1990年2月国务院发布《通知》和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决定》，1991年12月17日，国务院总理李鹏签署国务院92号令（下称“命令”），发布具有法律效应的《农民负担费用和劳动管理条例》（下称“条例”），此“条例”作

为国务院的命令，对村提留、乡统筹和劳务标准及使用范围，都作出了明确规定后，地方诸侯们，照例我行我素，对中共中央、国务院接二连三发出的《通知》、《决定》、“命令”、《条例》，视若无睹，置欲罔闻。

1992年，河南省有关部门下发的直接涉及农民负担的182个文件中，就有82个违反《条例》，占45%；在湖南省益阳地区（后改市）在1985—1991年的7年里，农民负担总额净增1054万元，年均递增29.7%，而农民纯收入年均递增仅8.8%，农民负担递增速度是纯收入递增速度的3.78倍。种田负担太重，农民感到种田没有出路，纷纷要求退田，据抽样调查，该地区南县8个村仅在1992年底要求退田的农户即占29.8%，退田面积占承包总面积的13.5%。该地区沅江县（后改市）有的农民甚至气愤地说：“宁愿出去打工，也不要作田。”河南商丘县黄陵乡高村农民李守坤，深感地方政府收费太重，在1991年4月24日，甚至给河南省人民政府寄去1000元，要求省长李长春转入国库。经了解，商丘县黄陵乡高村地处黄河北岸，全村480多口人，近3年人均收入仅250元左右，而乡村统筹、提留却一年比一年重，1989年、1991年的统筹提留分别达到上年人均收入的13.7%和15.6%，是国务院规定比例的2.7倍和3.1倍。

就在1990年2月国务院发出《通知》和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决定》的1990年10月，河南源阳县祝楼乡农民的负担，从1989年人均上交提留款70元，一下增加到1990年的120元，递增71%；四川北部一个贫困县农民负担的增长情况是：1989年人均上交提留款27元，比1988年增长66%，1990年人均上交款猛增到60元，是1989年的2.2倍；湖北荆门市蛟尾镇农民熊传生反映：“我们这里的农民上交提留款逐年增加，往年有关部门按每亩地平均提取三四十元提留款，现在（1990年）增加到每亩120元至160元”（引自1990年10月27

日《人民日报》),一下翻了三四倍。

1993年1月,国家农业部负责人在北京召开的,共有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部门参加的会议上,提出了“十不准”。

十不准是:一、不准对村提留、乡统筹等集体资金平调挪用;二、不准强制农民以资代劳;三、不准向农民收费、集资、罚款等与各级干部利益挂钩;四、不准向农民摊派报刊、保险、有价证券和电影票等;五、不准搞向农民收费的达标、升级等活动;六、不准以服务为名强制向农民收费;七、不准以任何理由强收村提留、乡统筹;八、不准在农民交售农副产品和发放预购订金时强行扣款;九、不准把非法负担项目,签订在农民承包合同里;十、不准采取非法手段向农民收款收物。

这“十不准”,是农业部根据国务院指示,从1993年1月8日至1月15日,派出9个工作组深入河北、山西、山东、辽宁、湖南、湖北、四川、陕西、江西9省17个市县农村,检查各地农民负担、听取农民意见和呼声后提出来的具体措施。

1993年3月1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再一次联合发出措词严厉的《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紧急通知》。但就在此后不久,四川省三台县新生镇大桠村的抗美援朝三等功臣龙泰银等三人,身背1953年三台县人民政府赠给龙泰银的“人民功臣”木制横匾,到四川省农民负担主管部门反映农民的不堪重负。这位“人民功臣”在1993年的人均税外负担,占到上半年人均收入的39.5%,超出中央5%的极限将近8倍,他所在村的村民平均税外负担也达到35%,超过中央规定的7倍,也即是说,除了完成国家税收之外,地方政府将他们全年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甚至将近40%的劳动成果都拿走了。

由于一些地方官员根本不顾国家政策、法令和农民的承受能力,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造成的悲剧更是层出不穷。就在中共中央、国务院相继发出《通知》、“决定”、“条例”以后不久的1992年5月15日,湖南省湘乡市新研乡向韶村年仅

37岁的农妇潘群英，不堪收费之重被逼无奈，抛夫弃子，跳入了离逼款官员仅仅17米的水塘，在地方官员眼睁睁的注视中，沉入水底而身亡。仅仅过了25天，即1992年6月9日，湖南邵阳县白马乡腊树村农民邓贤清，因抵制乱罚款，在遭乡官殴打后，服毒自杀。五个月零十天后的1992年11月19日，河南省驻马店地区平舆县辛店乡两路口村农民蔡玉堂家，突然闯入19名乡村干部，强行拿走25.5斤芝麻，198斤小麦后，使深感绝望的蔡玉堂，当天晚上在门前梨树上上吊自杀（引自1993年7月10日新华社河北分社《信息大观报》）。

199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一个最为著名的“十三号文件”《关于切实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决定》（以下称“决定”），十分明确地指出：“凡因加重农民负担，引发严重事件和死人伤人恶性案件的，要追究乡、村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的责任；凡涉及地县领导责任的，要依照有关规定追究地、县党政主要领导的责任，以吸取教训；连续发生严重事件和死人伤人恶性案件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政主要领导同志要向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书面检查，对瞒案、压案、报而不查或打击报复举报人的，经发现，要从严处理。要加快农民负担监督管理的立法工作。”

为了使“决定”得以贯彻落实，国务院派出了由农业部、监察部、财政部、国家计委、国务院法制局及有关新闻单位组成的工作组，分赴河南、湖南、湖北、安徽、山西五省现场检查，督促落实。

国务院为落实减轻农民负担的中央“决定”，如此兴师动众，其力度之大，涉及部门之多，参加人员之众，都是空前的。

不可思议的是，正是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措词最为严厉的十三号文件，国务院派出阵营空前强大的检查监督工作组的1996年，中国农民的负担不仅没有丝毫减轻，反而成了历史上负担最重的一年。这一年国家征缴的农业牧业税收入占

全国各项税收的比重，就由 1991—1993 年的 2.2%，在 1996 年上升到 5.3%，比前几年高出一倍多，如果再加上地方政府大量的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农民一年辛苦到头创造的劳动成果，已所剩无几。

1999 年 12 月，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一位侯大爷，步行 10 多里，找到新上任的党委书记李昌平，诉说他和老伴都是 70 多岁的老人，一年还得上交 700 多元“人头税”，侯大爷当面问李昌平：“请问李书记，中国的哪朝哪代要七十多岁的老人交人头税？！”这种旷古罕见的重负，当然令侯大爷无法理解，也无法接受。他对李昌平说：“我们年轻的时候，修过‘三线’，修过长江大堤，农业学大寨，搞过二十多年的水利建设，落得一身病。现在老了，天理难容啊！”（引自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第 3 页）。政府收费收到这个地步，已是天怒人怨！两位古稀老人根本无法承受，即使承受得起，难道我们的政府能这样收费吗？

对于这类匪夷所思的，与中共中央、国务院规定减轻农民负担背道而驰的“三乱”，当然引起了中央的注意。1997 年 3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又颁发了减轻农民负担的十三条具体规定——

1、国家的农业税收政策稳定不变，“九五”期间，对农业生产不开征新的税种，国家现定的农业税率不再提高。

2、村提留乡统筹不超过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百分之五的政策稳定不变。

3、农民承担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制度稳定不变。

4、严禁一切农民出钱出物出工的达标升级活动。

5、严禁在农村搞法律规定外的任何形式的集资活动。

6、严禁对农民的一切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

7、严禁各种摊派行为。

8、严禁动用专政工具和手段向农民收取钱物。

9、减免贫困户的税费负担。

10、减轻乡镇企业的负担。

11、减轻乡镇机关和人员的开支。

12、加强领导、实行减轻农民负担党政一把手负责制。

13、加强监督检查，严肃查处加重农民负担的违法违纪行为。

在随后的同年5月，中央又接二连三发出四个有关解决“三农”问题的《通知》，从落实农业发展，坚决维护农村安定到切实保护农民利益，都作了进一步的强调。

同样不可思议的是，1997年各地农民的负担，再次创造了又一个“空前”。

农业部农村合作经济统计资料显示，1994—1997年四年间的农村人均收入，只是1993年的1.91倍，而农民直接上缴有关部门的负担，却是前4年平均负担的9倍。农村改革之初，一亩地的负担才10元钱，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一而再，再而三发布减负“规定”、“决定”、“命令”、“通知”的同时，农民的负担也扶摇直上，到1997年，每亩地的负担，已飙升到少则一二百元，多则二三百元甚至更多，增幅达十几倍至二三十倍甚至更多。

在湖北监利一些乡镇，每亩地的负担达到200元，加上人头负担100—400元/人不等，两项相加平均达到350元/人亩，一个五口之家，种8亩地，全年经济负担约2500—3000元（不含防汛抗灾和水利等劳动负担），80%的农民亏本。（见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第21页）

《羊城晚报》于1994年在一篇题为《农村返贫现象探源》的报道中披露，据对一些农村地区的调查，至少有70%农户受到不同形式的罚款，更值得深思的是，在“罚”的过程中，农民很难见到罚款“收据”。“罚”了农民的钱，连“收据”都没有与“抢”何异？

中央三令五申要减轻农民负担，减出来的是如此越来越重的结果，使人感到根本不管老百姓承受能力的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简直是在和中央对着干。

到了2001年，那位在1978年全力支持和参与小岗村搞大包干的滁县地委政研室主任、后来官至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陆子修，在谈到愈减愈重的农民负担时，痛心疾首地说：“农民实在太苦，什么人都可以欺负呀！当年我们搞的那个‘大包干’，轰动了全国，也影响了全国，总结起来就是那么三句话：‘缴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可是现在呢，‘大包干’带给农民的好处一点一点地都被各级政府拿走了，如今是‘缴不够国家的，留不足集体的，剩下就没有一点是农民的’”（引自《中国农民调查》第133页）。

陆子修讲的是真话，但现实往往更严重。“大包干”第21年后的1999年，在党委书记李昌平向朱镕基反映“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而闻名的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全乡农民在这一年的农业收入不足1000万元，而全乡农民在这一年的实际负担，却高达1382万元（引自2001年9月6日《文摘报》）。这就告诉我们，这个乡全体农民的全部农业收入一分不留全部交给国家，至少还差382万元，需要通过其他劳动（比如打工）收入来补足。“大包干”包出来的是如此结果，给农民带来的到底是富裕还是贫困？农村改革怎么改成了这个样子呢？

第十节 税费改革——“税”加上去了，“费”也加上去了

地方政府我行我素的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发展到失控的地步后，中央政府出台了税费改革的新政，企图从根本上禁止地方政府乱收费。

在2001年3月初召开的“两会”上，朱镕基代表国务院

所做的《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报告》中指出，“十五”期间“要把全国贯彻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和增加农民收入作为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

3月7日，朱镕基特意来到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就安徽已经进行的税费改革，对安徽代表说：“你们做的（费改税）是开天辟地的工作，你们将功德无量，你们将名垂青史”，可见朱镕基是何等推崇安徽的费改税。

3月15日，朱镕基在记者招待会上，进一步就费改税算了一笔账。他说：“我们目前从农民手里取300亿元农业税，600亿元乡统筹、村提留，再加上乱收费，大约从农民手里拿走1200亿元，甚至更多。我们这一次税费改革，就是要把我们现在收取的300亿元农业税提高到500亿元，也就是从5%提高到8.4%，把其他的乡统筹、村提留的600亿元和乱收费一律砍掉。”

朱镕基的设想无疑令人鼓舞。因为按此设想，我们的8亿农民，除了交纳500亿元农业税，农村改革后兴起的乡统筹、村提留和各种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被中央政府“一律砍掉”了。8亿农民人均负担只有62.5元。

但是，朱镕基首先就没有把账算清楚。

《我向总理说实话》的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对此进行具体调查后坦率地指出：中国农民的负担“至少在4000亿元以上”。和朱镕基说的500亿元至少相差8倍。

李昌平指出，当时全国的县乡村负债达6000多亿元，每年仅支付的利息即达800亿元。

全国义务教育仅支付700万老师的年工资就需要800亿元，每年支付书杂费、校舍维修、设备仪器添置和教育欠费就不少于500亿元。

仅此三项，每年最低就得支出4100亿元以上。此外，全国近3000个县至少有3万个科局和5万个乡（镇）及至少70

万个乡镇部门，还有 400 万个自然村，以上所列，每年至少要支付 3000 亿元。

如此巨额开支是谁在负担呢？在县以下的各项支出中，70%~80% 甚至 90% 都是由农民负担，也就是说，8 亿农民每年的负担高达 4000—5000 亿元。而这也就是中央三令五申要减轻农民负担，而农民负担却越减越重的根本原因所在。难道一个税费改革就能把农民负担减下来吗？

我们且看看被朱镕基称为做了“开天辟地的工作”，而“功德无量”、“名垂青史”的安徽的费改税情况吧。

安徽的费改税试点是 1994 年从太和县开始的。尽管太和县把许多农民负担尽力予以减轻，但国家粮食定购的任务是不允许作任何改变的。这一年，太和县农民上交国家定购粮食为一亿三千零五十五万四千斤。当时，一公斤小麦和玉米的定购价与市场价的差价是 6 角 6 分。太和县共有三十五万三千四百五十九户，计一百二十二万农业人口，仅上交国家定购粮这一项，所承受的“差价”即高达四千零四十七万多元，人均负担 30.66 元，户均 114.5 元。

也就从 1994 年开始，中央实施国税、地税分税制，实行中央财经集权。财经集权使中央政府获得的好处立竿见影——1993 年中央财政收入为 957 亿元，1994 年实行国税地税制后，当年就猛增到 2906 亿元，差不多增加 2000 亿元，一下翻了三倍多。与此截然相反的是，地方财政收入，却从 1993 年的 3390 多亿元，锐减到 2311 亿元，将近减少 1100 亿元，即减少近三分之一。另一个是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支出截然相反——1994 年，中央财政的收入增加了将近 2000 亿元，但支出比上年仅增加 442 亿元；而地方财政收入在比上年减少将近 1100 亿元的情况下，支出却猛增了 708 亿元，高达四千零三十八亿元。这种由分税制造成的中央富、地方穷、中央大盈、地方大亏的局面，使很多地方政府连行政事业费、人头费的开

支都无法保障。

我们再看看费改税后，国家设置的税种情况吧。

据 2010 年 7 月 27 日《生活文摘报》报道——

财政部网站在“中国财政基本情况”栏目中，对中国费改税后的收税情况是这样表述的：“目前，我国共有 19 个税种，其中 16 个税种由税务部门负责征收，关税和船舶吨位税由海关征收，进口货物的增值税、消费税由海关部门代收。”

但是，国家税务总局网站上对中国费改税后的征税情况，却是这样介绍的：“目前，中国共有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城市房地产税等 20 个税种。”

以上是国家财税最高权威机关各自对中国税种不同的说法。我们再看地方税务机关如何说——

北京市地方税务局网站“税务百科——中国税制”栏目介绍我国“税种设置”时，说：“目前，中国的税收制度共设有 25 种税，按照其性质和作用大致可分为八类”。

具体负责税收征管的税务部门工作人员所说的税种更是各不相同：有的说有 30 多种，有的说 20 多种，有的说只知道国税征收的税种，其他的税种要问地税部门才清楚（综合《生活文摘报》、《羊城晚报》、《新华每日电讯》）。

费改税以后，中国到底有多少税种，不仅中央财政权威机关与地方税务机关和具体负责税收征管的工作人员说法各不相同，从十几种到三十几种；而且国家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的说法也不一样。这就是说，中国费改税以后，到底有多少种税，谁也说不清楚，由此可见中国税收之乱。

除了税种混乱，收税更乱。比如，2013 年 12 月，河北河间地区一些镇里在所谓“补缴税款”又叫临时经营税，但官方却没有将所收的钱给个说法。全凭官家一句话。有个体户反映，一开始要交 6 万元，村支书去讲情，讲到 1.2 万元，还有个个体户托人说情，从 10 万讲到 5 万，最后讲到 2 万（引自 2013 年

12月12日《京华时报》)。这种毫无规矩的税收,更是莫名其妙。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设置的税种基础上,“变”出新的税种的现象,各地并不鲜见。比如不少地方开征了“筵席税”,就是一个闻所未闻的税种。还有人在报上撰文称,通过统计,我们吃一个馒头,要交十几种税费,在广东一只鸡要交54种费。在广大农村,由地方官员“变”出来的税种有多少,恐怕更是一个谁也无法说清楚的问题。各地农民普遍反映的:“头税轻、二税重、三税四税无底洞”,大概就是指由地方政府或地方官员任意“变”出来的众多税种,加在农民头上的负担。

而且,按照国家出台的税种如何收税,也大有文章。

自从中国发端于安徽小岗村的“承包制”在全国推行后,几乎什么都搞承包。承包成了不少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们偷懒省事、不负责任,甚至为个人或部门敛财的“法宝”。在一些地方社会治安搞承包,各种罚款搞承包,收税也搞承包。比如,闽南不少地方为图省事,把税收任务承包给社会上一些有关系有门路的个人去完成。以该省龙海市某村为例,1994年镇财政所给村里下达的农业特产税任务是5.1万元,村委会将标底加码提高到15万元以后,通过向社会公开招标,承包人则以21.6万元中标。此时,农民需交的特产税已超过镇里下达任务的3倍,而其中的16.5万元将成为村委会的囊中之物。承包人中标后立即通过各种手段,甚至以任意在路上设卡收费等非法手段收取“农业特产税”,除向村委会交足21.6万元,还有十几万元就进了自己腰包。镇里下达的5.1万元特产税任务,农民却交了30多万元。闽南平和县对农业特产税也是搞承包。比如,1995年县里给某镇下达的农业特产税任务是134万元,镇财政所即承包给两名村干部,但承包基数提高到了256万元,几乎翻了一倍。两名承包人又找了几十个“帮手”收税,最终全年上交了280万元(引自1996年2月13日《经济参考报》)。也就是说,县里下达给这个镇的农业特产税任务是134万元,

因为搞承包，这个镇的财政所实际收了 280 万元特产税。至于这个镇的农民实际交了多少农业特产税，自然无法知道，因为承包人和他请的几十个“帮手”一起得了多少，他们是决不会公布的。诸如此类承包，就是税务部门和承包人合伙违法乱纪乱收税、坑农民。他们不仅使国家下达的税收任务成倍增长，极大地加重了农民负担；而且很容易让坏人钻空子，在摧毁的众多黑社会团伙中，人们不难看到黑社会头目或骨干份子，借所谓承包之类的幌子，大搞打砸抢，疯狂敛财的身影。

前面说到费改税以后，国家财政大幅增收，地方财政则连行政事业费、人头费的开支也往往无法保障。但是，处于这种窘迫中的地方政府还得运转；而且，吃“皇粮”的大军已经由当年的一个人民公社十几个人，膨胀到一个乡镇几百人至一千多人，他们要工资、要奖金、要福利，还要公款吃喝，不向农民收费到哪里去弄钱呢？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能不越治越乱才怪呢！

2001 年“两会”期间，四川省巴东市市长李克明在审议李鹏代表全国人大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全国至少有 1300 种收费项目，砍掉一半也不为过！”至于像湖南涟源市那样 156 个副科级单位和部门中，执行收费的副科级单位和部门就有 144 个，收费项目 1230 个；像湖北利川市那样收费项目多达 2200 多个，还只是如该市物价局局长杨兴发所说的仅是“正在统计登记的一部分”等等现象，各地并不鲜见。而且，这都是有“红头文件”的收费项目。没有“红头文件”的收费项目更是又多又烂，令人瞠目。比如——重庆万县谢模春，在有“红头文件”的收费项目至少 2200 项的利川市，开了一家餐馆，一天收费人员突然到餐馆里“晃了一下”，就说餐馆房间里的“空气密度不合标准”，收费 300 元，连“白条”都没有开一张。信阳市固始县黎集等乡镇的基层政府，竟然出台了“天上下的雨，农民用这水种地，也要收自然水费”的规定；安徽一些地

方则出台了“农民烧火做饭冒出来的炊烟，也要收排污费”的规定，如此等等收费规定，笔者自然无法预测，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们还会想出什么不可想象的收费规定，但我可以肯定，如此收费“高招”，绝对是史无前例。

由此可见，费改税的结果是，“税”加上去了，而五花八门的“费”，不仅没有如朱镕基想象的那样“一律砍掉”，而是不断加剧。这样的税费改革能说是成功的吗？

第十一节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是改革开放以后，地方政府抵制中央政府政策规定和法律法规的一种新手法。中央政府再三重申：“农民直接向集体经济组织缴纳的村提留和乡统筹不得超过上年人均纯收入的百分之五”。这是比较合理的，绝大多数农民也可以承受。但是，这个比例，往往成了地方政府手中的一纸空文，他们对抗和抵制中央政府规定最简便、最拿手，也最普遍采用的对策，就是任意虚报农民收入。

1998年山东李培华等人致信新华社《半月谈》，对当地乡村任意扩大农民收入进行了披露。某乡规定某村的万元户必须突破100户，达到80%，那么万元户如何达到呢？有一个三口之家收入1500公斤地瓜干，官员们便任意增加500公斤，以2000公斤计算，然后再加一笔用地瓜干喂养3头大肥猪的收入，再然后又将家中多年前的嫁妆也折算成钱……于是，这个收入不足5000元的家庭就成了万元户。

2000年第六、七期《瞭望》曾撰文披露一个山区小村的农民收入，是如何被地方政府任意决定后“科学计算”出来的。那个小村的生产条件很恶劣，即使风调雨顺的好年景，农民人均一年的收入，也就600—700元。当时已连续四年受灾，就在受灾的第四年年底，上面派下来的官员却将这个受灾山村的

人均收入定为 2167 元，已脱贫致富，达到小康。官员们甚至亲自下乡对农民收入现场进行“科学计算”。比如，某农户家养了 6 只母鸡，官员们就按每只母鸡每月下 19 个鸡蛋进行“科学计算”。于是，这个农户仅鸡蛋收入一年即达 576 元。农户提出，有一只早已丧失生育能力的“祖母鸡”不下蛋。官员们说，母鸡不下蛋岂不是“天方夜谭”！另一个地方的地方官员甚至以每只母鸡每年下 300 个蛋，计算农民收入。这样计算出来的农民“收入”，与农民的“实际收入”，当然相去遥远。那个“风调雨顺的好年景”，收入也不过六、七百元的山村农民，通过官员们的“科学计算”，大灾之年的收入却高达 2167 元，这不是比官员们说的“祖母鸡不下蛋”是“天方夜谭”，更“天方夜谭”吗？

在很多地方，农民的收入是完全不顾农村实际的官员们根据自己的收费需要，凭想象决定的。我们且看看河北省赞皇县黄北坪乡上马峪村农民的收入，是怎样被官员们层层递增算出来的吧。该村自 1995—1998 年连续四年遭灾（一年水灾，三年旱灾），1996 年，该村上报乡政府的人均纯收入是 276 元，而乡政府统计的数据却是 537 元，翻了 1.95 倍；1997 年村里上报人均纯收入为 530 元，乡政府统计的却是 961 元，翻了 1.81 倍；1998 年“旱得几乎绝收”，但乡政府报到县里的数字是 1100 元，县里又“调整”为 1304 元，于是，乡政府给上马峪马村统计的人均收入，就变成了 1304 元。一个“旱得几乎绝收”的村子，农民人均纯收入被县里“定为”1304 元，不能不佩服县官们的大胆想象（引自 2000 年 1 月 5 日《文汇报》）。

为了对付中央政府规定农民负担不能超过百分之五的上限，农民收入早已成了地方政府变幻无穷的魔方。《中国改革报》记者时和昌曾问某县一位乡农经办统计员，农民的收入是怎么计算出来的，这位统计员坦率地告诉记者：“上面让填多少，咱就只能填多少。”换言之，不是农民实际收入多少按比

例交多少，而是政府官员要你交多少，你就得“收入多少”。

面对这种层层加码的现实，河北省赞皇县统计局某局长也坦言：“如果党风不正，数字就别想准。”

我们再看看《人民日报》1993年3月20日刊登的《听凤阳人算细账》，算出来的1992年农民负担有多重。

凤阳县共有耕地108万亩，农业人口55万，人均不足2亩地。那里的农民一般在地里种一茬水稻，种一茬小麦。有人算了一笔细账——

水稻：按每亩1000斤高产计算，1992年每斤稻谷2角，每亩收入200元。而这年种一亩水稻投入是——化肥50元，农药20元，水电40元，种子5元，农膜5元，农机25元，农具损耗5元，共需150元，不算劳力，每亩纯收入为50元。

小麦：按亩产300斤计算，而这年小麦是每斤2角8分。一亩小麦可卖80多元，而投入中，肥料66元，种子13元，机械耕种收割共26元，以上开销共105元，不算劳力，平均每亩需要倒贴20余元。

稻麦两熟相抵，每亩地一年能收入30元，换言之，人均不足2亩地的凤阳人，即使按水稻亩产1000斤，小麦亩产300斤计算，年均纯收入，充其量也就60元，而且，这是不计劳力的收入。

但该县官沟村一位农民说：“大包干初期，我一家7口，一年共负担摊派款120元，现在（指1993年）一个人就要负担120元”，也就是从人均负担17元飙升到了120元，翻了将近7倍。1992年凤阳县农民人均负担为100—110元，最高达140元。如此沉重的负担，无疑是对农民生产积极性的重大打击。在那个被称为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的小岗村，因为种麦要倒贴，大片麦地荒芜，“600亩地上见不到一棵青”。全县的粮食总产量也由1987年的10.7亿斤，降到1992年的7亿斤，5年间下降34.6%。

农民负担的日益膨胀，使农民不堪重负，地方官员们唯恐收不到钱，便在农民卖粮时，和粮站联手将农民的卖粮款任意截留。于是，农民把一车车粮食卖给国家后，往往是两手空空而归。

《陕西农民报》曾刊登过一份登城县王庄乡 1990 年夏粮收购结算到户通知单，现照录如下：

户主：么么村三组朱孙圉，人口：6 人，应交粮数（包括定购粮、议转平粮、议价粮）：1011 斤；等级：4 级；金额合计：283.08 元。

应扣部分：农业税 81.12 元；乡村提留（包括乡村提留每人 4.8 元，教育附加费每人 8.5 元，村提留每人 6.7 元）每人 20 元，共计 120 元。农田基本建设筹款每人 1 元，共计 6 元；村级提留每人 4.12 元，共计 24.74 元；组级提留每人 15 元，共计 90 元，除扣完全部粮款 283.08 元以外，还应补交现金 38.78 元。

1998 年夏天，在安徽凤阳县黄泥湾粮站收购农民粮食时，更是别有一番风景——“络绎不绝的农民把一车车粮食交给粮站，村官们则拿着账本忙着收提留款。乡党委书记成祖汉等乡官则端着茶杯来回走动，监督村官向卖粮农民收款”。卖粮农民把金灿灿的粮食卖给了粮站，得到的是一张张红色的“乡镇集体提留统筹费代收收款收据”，卖粮款则被村官们拿走了。农民把粮食卖给粮站，粮站却不给农民付款，粮款都被横插一刀的村官截走了，这样的交易，大概是农村改革后出现的又一新事物。尤其莫名其妙的是，有的农民根本不知道为什么被扣走那么多钱。比如，凤阳县蒋集村农民衡传甲卖了 595 公斤小麦，应得卖粮款 809.2 元，粮站扣掉 205.9 元农业税后，还剩 603.3 元，但他怎么也弄不明白，自己不仅没有拿到一分钱，村官们说他还欠村里 15.2 元。

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处于这种前所未有的重负之下，却有苦无处诉。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位农民毅然卖掉自己唯一

的耕牛作路费，进京为乡亲们诉苦。

此人就是辽宁省台安县农民王殿才。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辽宁省一些地方公然将中央和国务院规定的农民负担不得超过上年纯收入5%的规定抛在一边，任意提高收费比例。有的地方规定不超过8%，有的地方规定不超过10%，有的地方则高达15%以上。而且，方方面面都把手伸向农民口袋，“越没钱越要捐”，弄得农民叫苦不迭。辽宁省台安县农民王殿才对这种状况非常气愤，便走乡串村调查了十几个乡的600多户农民，录制了6盘现场录音磁带，并就农民负担沉重的情况，整理出三份材料以后，不顾自家处于连购买化肥、种子都没有钱的困境，毅然卖掉耕牛作路费，专程赴京，找到《农民日报》编辑部，请求报纸为农民说话，呼吁国务院和有关部门早日制定法律，制止农村“三乱”，真正减轻农民负担。

我不知道，那些食民俸禄的“人民公仆”们，假若他们能在夜深人静之时，扪心自问：如果你们的父亲将满满一车粮食卖给国家后，一分钱不见，得到的是一张倒欠的通知单；如果你们的父亲，为了使乡亲们摆脱沉重的负担，在自己无钱购买化肥、农药、种子的窘迫中，却毅然卖掉耕牛，为农民不堪重负赴京奔走呼号，你们作何感想？

第十二节 收费大军和“讨债运动”

农民负担太重，很多人因不堪承受，很难完成地方政府下达的征收指标。于是，在不少地方就出现了一种可能是盘古开天以来，没有出现过的政府官员浩浩荡荡下乡强行收费的奇观。

1998年8月12日深夜，在云南省蒙自县红寨乡大树寨村农民李发亮家，发生的一幕就令人怵目惊心。

这天深夜11时许，李发亮一家人正坐在家里看电视。突然，

一伙彪形大汉神不知鬼不觉地破门而入，一边动手将一家三口分别按倒在地、一边大声喝叫：“谁动就打死谁！”

全家人顿时被吓出一身冷汗，以为是劫匪进了门。

就在彪形大汉们进屋之时，李发亮的门前屋后，已经被红寨乡乡长等乡官为首的 40 多人团团包围。

李发亮还来不及反应，就被几只大手死死地按倒在地上，动弹不得。妻子李美惠和 15 岁的儿子李兴伟分别被另外几个戴着派出所帽子和身着制服的汉子按在地上。被按在地上的一家三口，个个睁大惶恐的眼睛，望着这一帮凶神恶煞般的汉子，吓得连话也说不出。

过了一会，李发亮不解地问：“你们深更半夜来我家屋里打我们，为了什么？”

“把钱交出来，不然你就没有好下场！”这是乡长发出的警告。

不等乡长说完，几个气势汹汹的家伙，看了看 15 岁的李兴伟，眨了眨眼，两个怒目圆睁的汉子立即上前卡住李兴伟的脖子，另外三条汉子则一拥而上，扭住他的双手，一起对他拳打脚踢。瘦弱的少年哪能经得起彪形大汉们的痛打？几个回合的拳脚就把李兴伟打得大汗淋漓，气喘吁吁，有气无力地哀求：“请叔叔们不要打我了，我要撒尿了……”

一听小家伙打得要尿尿了，凶手们仿佛是向乡长邀功似的打得更起劲了。直打得李兴伟惨叫声声，凶手们却发出了警告：“再叫就打死你这个小杂种！”

母亲李美惠见儿子被打得这样惨叫连声，心如刀割，跪在地上给乡官和凶手们连连叩头，声泪俱下：“我儿子还小，请你们手下留情。放开他吧，他的眼睛刚刚治好，要打就打我们吧，天大的事我们承担，与小孩无关啊！”

但是，哀求换来的是一顿怒骂，吓得她昏倒在地，人事不省。

乡官和打手们却不以为然，说：“这个女人没死，不信，

谁去摸摸她的心还在跳呢！”

一个彪形大汉立即走过去踢了她一脚，说：“想骗乡政府，你骗得了吗？我当了多年公安，见多了！”

这位自称“当了多年公安”的公安，给那个“人事不省”的农妇踢去的这一脚，让人看到的是什么呢？

乡官们随后对李发亮家进行了强制性搜查，抱走了电视机一台，猪食机一台，自行车一辆，水泵一台，警告道：“三天内不到乡政府交钱，按税收5倍罚款，这些东西全部低价拍卖。”

一直折腾到深夜零点以后，李发亮要求把妻子和儿子送到红河州医院进行检查。

李美惠经红河州医院抢救，终于苏醒过来。

李兴伟被打后，说眼睛看不见，要求作眼科检查，遭到乡官们的怒斥和拒绝。后经红河州医院检查，并出具证明，李兴伟的视网膜在那天晚上被凶手们打脱落。

但是，乡官们对母子俩还不肯放过。从医院出来后，母子二人又被强行拖上汽车，带到乡政府。他们将李美惠锁在车内，而将李兴伟带到了乡政府办公室。气势汹汹的乡官们威逼李兴伟承认：“党对你们打骂是正确的。”

临近凌晨两点，李兴伟被凶手们拖上汽车和母亲一起被送到昆河公路上，将他们推下车，李美惠再次昏倒在地，乡官们却开着汽车呼啸而去。

这一夜李发亮一家三口，被乡长带领的一帮人打得五劳七伤，家里被翻得凌乱不堪，而事情的起因，仅仅是区区75元石榴税。李发亮家种了50棵石榴树，几天前的八月初，乡政府通知农民交“特产税”。但李发亮家的石榴还没有成熟，不能卖，稻子也还不能收割，而他家已断了两三个月口粮，全靠借粮糊口。就在当天上午，李发亮还特意找到乡干部求情：“不是我不交钱，是实在拿不出钱。等我把石榴卖了，一定把75元钱送到乡政府。”

仅仅过了十多个小时，由云南省蒙自县红寨乡乡长亲自率领一帮彪形大汉，夜闯民宅，毒打农民，强抢农家财产的恐怖一幕，就为1998年9月11日的《南方周末》，提供了一篇令读者心惊肉跳的黑色新闻。

如果与红寨乡乡长带着四五十人，夜闯民宅收费相比，由中央电视台报道的河北省灵寿县委发出红头文件，组织动员上万名财政供养人员，掀起的进村“讨债”运动，所表现出来的“魄力”和“决心”，可就更令人“刮目相看”了。

2000年7月6日，灵寿县委发出“红头文件”，组织上万名食民俸禄的党政官员，包括公检法等相关部门的执法人员，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进村“讨债运动”。文件规定：“新账老账一次清，村提留、乡统筹一齐征……不得留尾巴、留死角”，而且规定：“从7月8日开始，要求15天内基本完成任务，另外5天完成扫尾工作。”科级以上干部每人征收15户，其他干部每人征收10户。完不成任务的将从8月份起停发工资，直到完成任务为止。

县委某副书记还在全县干部动员大会上强调：“要打一场村提留、乡统筹的歼灭战”，全县干部必须“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要保住自己的工资就只能不折不扣的执行。”

用停发工资作为筹码，逼迫全县上万名干部“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这不就是明摆着叫官员们“不择手段”去逼农民交钱吗？

而且，除了党政官员外，全县从小学到中学的数千名教师，全部停课，都在为完成县委下达的任务，大打“村提留、乡统筹的歼灭战！”

2000年，灵寿县从年初开始，持续五个月干旱，农民的夏粮几乎没有不减产的，县委却不顾广大农民正处于这种困境，公然发出“红头文件”，集中收取提留的做法，逼得农民只能东借西凑，使不少农民不得不贱卖家产。上邵村一位农民为凑

够提留，被迫把一头还没养大的猪提前卖了，再交 150 公斤小麦，才算完成县里规定的上缴任务。

由县委发出文件，组织调动上万名党政官员和数千名教师，掀起的进村“收费运动”，我相信这一定是五千年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个“创举”。

中央电视台记者获悉后，迅速前往采访。但采访记者刚回到北京，企图阻止这条新闻播出的相关人员也奉命赶到了北京。他们掏出“一叠钞票”，企图用金钱“摆平”中央电视台。一个县的党组织堕落到了这等地步，还叫老百姓怎么相信它呢？如果老百姓连县委都不相信了，还会相信谁呢？党中央、国务院三令五申要减轻农民负担却越减越重，其原因不就在这里吗？

第十三节 捉人队、打人队……农民见了心也碎

随着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日益胆大妄为，公然无视中央政府规定，任意加重农民负担，他们对付农民的各种手段，也不断花样翻新，层出不穷。诸如“捉人队”、“打人队”、“棒子队”、“收账队”之类令人闻之色变的新名堂，使农民听后简直汗毛倒竖。

《每日新闻》曾以《鄂州有支捉人队》，报道了湖北省鄂州市临江村“有吏夜捉人”的情景。

临江村紧靠长江南岸，地势低洼，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期，连续三年长江大汛，给农民生活造成了严重困难。普遍难以完成各类多如牛毛的税费上缴任务。当地基层政府就以开办“农业税法律培训班”的名义，成立了“捉人小分队”，在夜深人静之时，“捉人小分队”悄悄闯入民宅，将正在酣睡中的农民强行捉去，投入村里空置的黑屋里“关禁闭”。一间黑屋子有时一关就是八九上十个人，而且男女混杂。“捉人小分队”出动时，少则五六人，多则十几二十人，其中总有三四个身穿

公安制服，随身带着警棍、手铐等警具的执法人员，随时准备对付农民。

在安徽省肥东县甚至出现了专门对付农民的“打人队”。比如，肥东县路口乡蒋岗村的村官们，无视中央规定，强行扣留农民向粮站交售粮、油的全部钱款，农民对此非常气愤，却敢怒不敢言，一部分胆大的农民便与干部们说理，往往就会遭到村里雇用的“扒粮队”毒打，农民把他们称为“打人队”。

路口乡蒋岗村 1995 年农民的人均收入为 1220 元，按照国务院关于农民负担不得超过上年人均纯收入 5% 的规定，蒋岗村农民 1996 年的人均负担应为 60.5 元。但蒋岗村农民的实际负担却超过 400 元，比国务院规定的数字高出六七倍，占到农民收入的 40%，如此沉重的负担，农民当然无力承受。于是，村里便组织了强制农民交粮交钱被农民称为“打人队”的所谓“扒粮队”。“打人队”的人，除吃喝全包之外，每人每天补助人民币 30 元，另加阿诗玛名牌香烟一包。这样的待遇，比年均收入仅 1200 元的农民，不知高出多少倍。因此，那些吆五喝六的“打人队员”，搜刮农民都很卖力。

蒋岗村农民李珍旭，为秋种急需买化肥，找熟人托关系，才从粮站取到 300 元议价粮款，结果被“打人队”全部拿去不说，妻子被“打人队”打倒在地上，又残忍地拖了一里多地以“示众”。等她回到家里，发现家里七八百斤粮已被“打人队”扒光，而且既没有过秤，也不给收据，等于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抢走。另一位农民程育平，妻子病故，他带着两个小孩和老母亲一起生活，家里粮食被“打人队”扒去后，还差 200 元摊派款，“打人队”就把他家里一张大桌子扛走了。程育平一家四口人，只剩下半个月口粮，生活无以为继，整天哀声叹气、愁眉苦脸。

蒋岗村共 2000 多人，1995 年共交了 100 多万元摊派集资款，这对于人均收入才 1200 元的农民群体来说，几乎是一个天文数字。但如此巨额摊派集资款，全由村支书吴玉宏一手包揽。

村里的开支单据绝大部分是“白条”，仅凭一纸“白条”他一次就可拿走6万多元（引自1997年1月19日《经济参考报》）。如此黑洞，农民的血汗能填得满吗？农村改革以前，中国大地上哪一个省哪一县哪一个生产大队发生过向老百姓摊派如此巨款，由基层干部如此胡搞的事情吗？

我们再看看湖北随州市万和镇那一支专门对付农民，被农民称为“棒子队”的“硬结队”，在冷岗村如何搞“硬结账”吧。

1995年12月4日，万和镇沙河办事处主任万新率领由19人组成的“硬结队”，浩浩荡荡开进了冷岗村一组，挨家挨户搞“硬结账”。

万和镇的所谓“硬账”，包括“三提五统”费、水费、共同生产费、镇修公路的以资代劳费、集资建校费……其中的集资建校费，是几天前镇党委才决定的，不分男女老幼，按人头每人230元，这笔收费在“硬结队”进村以前，谁也不知道。

曾金水、吴九虎等胆大些的青年农民，对“硬结队”说，正常的农业税、提留款，我们一定按时交，但突然要我们交那么多教育集资，拿不出来。

拿不出来？“硬结队”立即亮出了绳子、手铐，用上了麻袋、拖拉机。在万主任指挥下，一千人等立马就开始扒粮、牵牛。他们牵走了曾金水家里两头牛，曾金宝家里一头牛，青年农民曾金亮无牛可牵，立马就被锃亮的铁铐铐到了村办公室，开始“过堂”。直到他68岁的老父亲贷款1500元，把钱送到“硬结队”手里，才把他放回来。

你们不是胆子大、敢说拿不出钱吗？这就是下场，这叫杀一儆百。

农民蔡守国，按“合同本”上规定的数字只有270.27元负担。但是，在村支书袁楚华等众人簇拥下，涌入蔡守国家里的万主任却宣布：1995年他们这个三口之家应交1427.73元。蔡守国一听，简直目瞪口呆。

因为按合同本上规定的负担 270.27 元，麦收后已交了 85.54 元，只剩下 184.73 元。他原先预计，即使在“合同本”上规定的负担外，再怎么加码收费，也不过几百元吧。他准备卖掉一些谷，过年时杀一头年猪，卖掉一些肉，就可以全部交齐。可“硬结队”一来，突然增加一千几百元，叫他实在想不通，政府怎么能这样向农民要钱呢？面对“硬结队”一日数次上门逼讨，夫妻两只好分头四处借钱，但几乎都是无功而返。

第二天（即 12 月 5 日），万主任带领的“硬结队”增加到 20 多人，再次涌入蔡守国家，但蔡守国夫妻实在交不出钱。万主任随即下令“硬结队”，赶走了蔡家那头 100 多公斤的年猪，扔下一句话：“12 月 6 日（即第二天）交钱，可以把猪还给你，不交钱来，就卖猪抵上交款！”

第二天一早，村支书袁楚华就在蔡家门前高声喊叫：“钱弄好了没有？上午处理你的猪（变卖），万主任说了，要是（卖猪）还不够，就来撮谷。”

蔡守国当然没有弄到钱。一头 100 多公斤的年猪，已经没有任何希望要回，他感到绝望。

在村支书喊叫后，蔡守国背着妻子和孩子一咕噜喝下了剧毒农药。不一会，妻子徐桂菊从猪圈进来，一下惊呆了——只见口吐白沫的丈夫跪倒在孩子面前，泣不成声地哭诉：“孩子，我对不起你，爸爸无力抚养你……”徐桂菊连忙跑过去抱住丈夫，哭着说：“你这是为什么？！”蔡守国已奄奄一息，有气无力地说：“我已喝了农药，我连老婆孩子都养不活，活着有什么意思……”

在被农民称为“棒子队”的“硬结队”逼迫下，一个老婆孩子正需要他养活的农民，一条活蹦乱跳的生命，就这样凋落了，家破人亡啊！

蔡守国死了，立马就激起了家属和乡亲们的愤怒！人们把死者抬到了沙河办理处停尸三天三夜，愤怒的群众要求惩治丧

尽天良的地方官员，减轻农民负担。

蔡守国的死和停尸事件，惊动了随州市委市政府，也惊动了中南海，有关的责任人受到了处理。但是，蔡守国的生命，并没有唤醒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的良心，此后因乱收费逼死农民的事，各地农村依然层出不穷。

不到一年后的1996年11月3日，安徽省阜南县中岗镇沈寨村党支部，在支部书记、村长沈河理主持召开的一个“非同寻常”的会议上作出了一个非同寻常的决定，出动“联防队”，采取了强硬措施，全部收齐农民尚未交清的一部分超标准提留款。会上还制定了野蛮的“土政策”：联防队员去谁家，谁家就必须立即交钱，不交钱就扒粮、赶猪、搬东西。若是队长去收，按实际欠数交钱，村干部去收，加罚20%。村民态度好的，每斤稻谷按9角钱计算；态度不好的，按每斤6角计算。如有谩骂收款人的，每骂一句罚款10元，谁被骂钱就给谁。如有打人的，联防队可以还手。

第二天中午12时许，沈河理率领联防队来到沈军龙家。沈军龙的外祖父刘朝兴连忙笑脸相迎：“今天没有钱，卖了粮就交钱，决不超过明天中午12点。”

沈河理斩钉截铁地说：“不行，超过今天中午12点都不行！不交钱就扒粮。”

书记说完，联防队员立即涌入厨房，强行扒粮。

刘朝兴感到这帮人太不讲理，便上前说理，由争执而扭打，联防队即开枪射人，刘朝兴被子弹击中心脏，当场死亡。另有二人被打成重伤（引自1996年2月5日《华商报》）。如此强抢并恶意杀人，与土匪何异？

重庆市梁平县新盛镇民安村农民罗昌荣的死，比安徽阜南县刘朝兴的死更加惨不忍睹。

罗昌荣是民安村远近闻名的贫困户，他母亲长期患病才去世，父亲患癫痫病，他自己几年前好不容易娶了媳妇，但这个

家实在太穷，不到一个月媳妇就跑了。自此以后，罗昌荣变得神经兮兮，并在路边捡了个被人遗弃的小女孩养着，以极其有限的的能力，供养着一老一小，过着十分贫困但还算安宁的日子。

1998年10月29日，新盛镇安排镇地税所3名税官和镇国土所、城建所驻村的5名干部及有关人员，一齐来到民安村收缴农业税、镇统筹和乡提留。

上午九时许，由十几个地方官员及有关人员组成的“收账队”直奔罗昌荣家而去。罗昌荣欠1997、1998两年农业税100余元、镇统筹乡提留共100余元，加上其他欠款总共300余元。

“收账队”跨进门的气势汹汹，就把罗昌荣的父亲罗其田“吓坏了”，官员们命令罗其田把钱交出来。罗苦苦哀求：“我家现在真的没有钱，只有一头猪，但现在肉价太低，卖不起价钱，请你们通融几天，我能多卖几个钱，卖了猪马上就交钱。”罗家这头猪养了三年多，才长到300多斤，这是他们家里的全部家当。

“今天必须把钱交齐，要不就赶猪抵账！”“收账队”的官员毫无商量余地，说完就去赶猪。

闻讯回来的罗昌荣，一见官员们去赶他的猪，那无异于要他的命，他一下就爬到了屋顶，揭下瓦片当武器，向“收账队”的官员们砸去。

此事立即被报告上级，说罗昌荣“围攻执行公务的国家干部。”

中午“收账队”酒足饭饱之后，重新进行策划和部署，再次直奔罗家。

进门后，几个人一拥而上，把罗昌荣按倒了在地，对他拳脚并用，大打出手，有一个“收账队”员则爬上桌子，在房梁上吊下一条绳子，再在绳子的下端绑一条长板凳，然后把罗昌荣固定在板凳的前方，“收账队”的官员像和尚撞钟一样，推着板凳猛撞罗昌荣，罗昌荣在惨叫声中挣扎哀求，他得到的回

答是，“收账队”在狞笑中一次又一次更加凶猛的撞击。

年老的父亲和年幼的小女，眼睁睁地看着“收账队”的官员用板凳不停地撞击罗昌荣，罗昌荣不停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一老一少泪流满面。

“收账队”如此残忍地将罗昌荣撞击了一阵后，似乎还不过瘾，不仅没有停手，而且撞击的兴趣越来越高。但他们决定换一种“玩法”，“收账队”的官员七手八脚把已经打成一滩稀泥似的罗昌荣，拖到屋外的坝子上。4名“收账队”官员在众目睽睽之下，把罗昌荣的双手反拧到背上，其他“收账队”员则用木棒猛击罗昌荣的后背，打得他口吐鲜血，脑袋垂下，再也发不出任何声音。直到此时，棒击仍未停止。打人的“收账队”员居然没有人记得他们到底“打了多久”。

也许是“收账队”员打累了吧，最后他们又将罗昌荣反剪双手，逼迫他在坝子中央的地上跪下……

“收账队”很快叫来了汽车，但不是把已被他们打得奄奄一息的罗昌荣送到医院去抢救，而是急于运走痛打罗昌荣的“战利品”——那头300多斤的大肥猪。

直到运猪的汽车上了公路，一直按着罗昌荣的“收账队”员才把手松开，扬长而去。此时的罗昌荣，已像死人一样瘫在地上。乡亲们立即将罗昌荣送到医院，但为时已晚，罗昌荣停止了微弱的心跳。

罗昌荣是被“收账队”用板凳活活撞死的。如此“收账队”不是比“打人队”更残忍更歹毒吗？

“收账队”一千人等，不辞劳苦，不吝力气，用板凳痛打农民折腾了老半天，自然疲惫不堪。于是由村干部陪同走进了餐馆，大喝“庆功酒”。餐费当然是村里用摊派款买单。酒醉饭饱之后，那一群打人的“收账队”每人还获得15元钱辛苦费以示犒劳。

罗昌荣被打死后，重庆市迅速派出法医对他进行尸检。尸

检报告显示：罗昌荣因受钝器击打，造成小肠穿孔，污染腹腔，导致急性胸膜炎死亡（见1998年12月4日《南方周末报》）。连小肠都打烂了，可见“收账队”之残忍。至于那头300多斤的大肥猪，其价值当然远远超过罗昌荣所欠的300多元税费，但成了“收账队”的“战利品”赶去后，未见媒体披露下文。令人忧虑和怜悯的是，罗昌荣那位患癫痫病的老父亲和年幼无知的小女，面对家徒四壁，一贫如洗，还能生活下去吗？

1999年9月10日至16日，湖南衡阳县三湖镇党委、镇政府由领导带队，连续多日出动80多名脱产干部和职工，前往甘泉、鼓峰、三湖责任区，在区、村干部配合下，大搞“突击行动”，对农民实行“拳头逼款”，“滥施罚款”，他们挥拳便打，抬腿便踢，踢门砸窗，开口“打死你”！闭口“跪下”！共有90多位农民遭暴打，连脑膜炎后遗症病人也不放过，不少农民被打得脸青、鼻肿、口吐鲜血。农民李邦佑被打得昏迷不醒，昏死在地；女农民吴秋凤被打得太阳穴血管破裂，血流如注，连缝8针；打了人还逼多位农民放鞭炮致歉致谢。突击队见谷撮谷，见猪赶猪，抢走缝纫机、电视机、拖拉机，甚至连门窗、棺材也被抢走。农民姚佑启对打人骂人无法无天的政府官员只说了一句：“村里还欠我690元，你们这些干部哪能这样做！哪能这样打人！”责任区书记杨焕章咬牙切齿地说：“你还嘴硬！”说完左右开弓，两个耳光打得姚佑启站立不稳，杨打完，一声“给我打！”20多名政府官员一拥而上，拳脚并用，把姚佑启打倒在地，接着又把他绑在电线杆上，打了一个多小时，直打得他脸肿、眼红、鼻青、口吐鲜血。仅这一天，姚家组就有12人被打，小孩、老人几乎全被政府官员的暴行吓得躲到柴堆、猪圈里，躲了五六个小时，直到暴打农民的官员走了以后才敢出来（引自《大地》2000年第三期）。

三湖镇党政官员无法无天的恶行，被《人民日报》记者吴兴华披露后引起了湖南省委的重视，对有关人员作出了处理，

但地方官员如此强抢恶要，致 90 多位农民被暴打的恶行，在当地农民心中造成的恶劣影响能消除吗？

地方官员要农民交纳国家规定的税款，是合法的正当的收费；强制交纳国家规定以外的钱物，甚至强抢恶要，是非法勒索，是利用公权掠夺农民，这种掠夺比劫匪更可怕。劫匪打劫，农民可以反抗，可以报警，地方官员违反国家规定向农民强行收费，农民不仅不能反抗，如果交不出钱，或者发生争执，还可能被打伤、打死。这不是比劫匪可怕得多吗？

然而，自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地方政府违反中央政府规定，向农民超负荷收取钱物时，因农民无力承受而导致的被逼自杀，或者遭到诸如“打人队”、“棒子队”、“突击队”之类的地方官员毒打致伤、致死的悲剧，在各地数不胜数，层出不穷——

1993 年 1 月 5 日，湖南祁阳县楼梯乡太子村刚满 41 岁的农民高先明，因不堪摊派，被逼服毒自杀；

1996 年 7 月 24 日，福建宁德市金涵乡濂坑村 49 岁农民王和贻，花 15000 多元建的房子，乡政府却逼迫他交 25600 多元各种税费，被逼无奈自杀；

1997 年 1 月 6 日，广东罗定市新乐镇由党委书记彭爱国、镇长黄炽源带领包括公安、司法、武装部人员在内的 70 多人队伍开到木户区挨家挨户收费、搬彩电、搬录音机、拆天线、砸门窗，与该区农民黄秋新发生争执，黄被开枪打伤。

1998 年 8 月 19 日，甘肃省武山县温泉乡东梁村 4 组 58 岁农民汪东海，因不堪乡、村干部超标乱收费，被村主任汪荣军连砍数刀，深感绝望于当天晚上，等家人熟睡后，吊死在村主任汪荣军家门口；

1999 年 1 月 11 日晚上，苏北农民李大成，因“交不起这费那费”，被上门收费的队长一刀捅死（见 1999 年 12 月 17 日《中国青年报》）。

.....

面对农民无法承受地方政府违反中央规定的各种苛捐杂税，一些地方政府却完全不管农民死活，甚至作出这样的规定：吊颈不解绳，投河不拉人，喝毒不夺瓶，告状不开门。因此，使死人悲剧愈演愈烈。致使一些地方的农民含泪唱道：“生在新中国，死在乡政府，有冤无处申，谁为民作主？！”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前党委书记李昌平在《我向总理说实话》中引用的这四句民谣，真实地道出了中国农民的辛酸和痛苦。据新华社2002年1月25日报道，2001年仅一个湖北省就发生了7起农民因不堪税费重负，服毒自杀身亡的恶性案件。

而在1995年，仅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出的《关于1995年发生的涉及农民负担恶性案件的通报》中，就通报了8个省因收缴税费相继发生的13起残杀农民的命案。

通报上白纸黑字印着：“据各地上报”。

在各类恶性事故、案件瞒报成风的今天，各地有没有瞒报少报呢？

农村改革30多年来，不少地方政府随心所欲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肆意加重农民负担，在他们不择手段、目无王法的强行收费中，被逼自杀或被地方官员打伤、打残、打死的农民，到底有多少？

第十四节 怵目惊心的隐形负担

除了各种乱收费、乱摊派、乱集资所反映出来的“有形”负担之外，还有一种被经济学家称为“隐形负担”，同样使农民难以承受。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出现的一次又一次通货膨胀，造成的物价暴涨，使农用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的涨价幅度堪称史无前例，而包括粮食、油料、棉花、生猪等主要农副产

品的涨价幅度不仅很小，往往还在不断下跌。由此造成的“隐形负担”十分严重。比如猪、禽、鱼产品，据广州市1999年的调查显示，1998年由于饲料、工价等上涨而肉、禽、鱼价格低走，导致的结果是：农民饲养一头50公斤的生猪，就要亏本143.49元；每饲养100只蛋鸡、鸭、肉鸡分别平均亏损1544.96元、95.48元、37.40元；每亩塘鱼平均亏损539.03元（引自1999年10月16日《羊城晚报》）。

作为农民主要产品的粮食，是农民的主要收入。但是面对农用生产资料的大幅涨价，粮食价格不仅涨幅很小，甚至连续下跌。比如，1995年早稻、中稻、晚稻的国家保护价，分别为每100公斤120元、160元、164元；1997年的国家保护价分别降至每100公斤110元、130元、130元；1998年保护价分别再降至每100公斤94元、108元、108元；1999年再降至每100公斤90元、94元、94元。1999年与1995年相比，5年间分别下降10%、41%、43.75%；而在湖北等产稻大省的一些地方，农民交售稻谷时，实际价格还比保护价更低，早稻每100公斤为80元左右，中稻每100公斤为78元左右，晚稻每100公斤仅74元—66元。但是，上面来调查落实中央粮食收购政策时，只认收购凭证上的“标价”即每100公斤110元，而对农民结算时实际每100公斤仅66元，他们却不管。

与农产品价格不断下跌，即使提价涨幅也很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农用生产资料大幅涨价。比如，化肥，1988年碳氨每吨140元，到1993年就涨到了320元左右，1994年再涨到335元，1995年4月，碳氨一下突破每吨400元大关，7年间涨了2.86倍；尿素，1988年每吨价格为580元，1993年涨到1200元，1994年涨至1400元，1995年进口尿素涨到每吨2100—2300元，有些地方涨到了2500元，7年间涨了4.31倍；从国家统计局农调队公布的数字看，1995年2月全国农业生产资料比1994年同期上涨30.6%，化肥上涨35.7%，其中广

东尿素涨幅最大，从 1994 年初每吨进口尿素售价 1050 元，到 1995 年 2 月，突破 2800 元，一年间上涨了 2.67 倍。在黑龙江省黑河市 1990 至 1995 年，一些农业生产资料的涨幅达 300%、400%，甚至更多，其中柴油涨幅高达 450%。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如此暴涨，给农民造成的“隐形”负担怵目惊心。据农业部 2004 年初的监测显示，仅以这年 3 月中旬，化肥、农药、农膜、农用柴油等主要农资品种的平均涨幅 20% 粗略统计，全国农民增加的生产性开支即达 390 多亿元。农业生产资料的大幅涨价又导致本来就比较大的工农“剪刀差”越拉越大，给农民造成的“隐形”负担也就越来越重。据农业专家徐志全所著《中国工业化非均衡进程与农业政策选择》、王贵宸所著的《中国农村现代化与农民》和张照新按照《中国统计年鉴 1999》有关价格指数推算出来的数据显示：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剪刀差”强加于农民头上的负担一直在加重——

1980 年	300.34 亿元
1985 年	391.80 亿元
1990 年	726.45 亿元
1991 年	968.00 亿元
1992 年	1251 亿元
1993 年	1789 亿元
1994 年	2189 亿元
1995 年	2671 亿元
1996 年	2826 亿元
1997 年	3144 亿元
1998 年	3591 亿元

短短 18 年间，工农“剪刀差”竟增加了将近 12 倍，这在共和国历史上绝对是空前的。而且，时间愈后推，“剪刀差”的扩大速度愈快。随着“剪刀差”的急剧扩大，给农民造成的损失也日益巨大。全国农民因价格因素增收增支匡

算表上的数字清楚地显示，从1989年至1995年的7年间，全国农民增收一万一千八百八十亿元，而同期的增支却是一万三千四百三十七亿元。增收与增支相抵，全国农民净亏一千五百五十亿元。

由于“剪刀差”的日益扩大，使农民遭遇到一种有悖常规的“隐形”负担，即增产不增收，甚至越增产越减收。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学会会长陆学艺，为我们算了几笔账——

1996年，中国农村粮食总产量为一万零九十亿斤，1997年为九千八百八十三亿斤，1998年为一万零两百四十六亿斤，1999年，为一万零一百六十七亿斤，平均以一万亿斤计。1996年11月，大米、小麦、玉米三种中国农民生产的主要粮食的平均价格为每斤1.0355元，当年农民粮食所得为一万零三百五十五亿元；可是到了1999年11月，这三种粮食的平均价格就降到了每斤0.7075元，农民从粮食所得则降到了七千零七十五亿元。这就清楚不过的告诉人们，1999年中国农民生产的粮食比1996年多77亿斤，但增产不增收，农民的实际收入，反而减少了三千二百八十亿元。

另一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朱庆芳，提供的资料则告诉我们，由于通货膨胀的加剧，农民的生活水平不断在下降。

1978年，城市职工平均工资为615元，同期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34元，二者相差4.5倍；1999年，城市职工平均工资增加到8346元，比1978年增长了13.6倍，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也提高到2210元，从数字上看比1978年增长了16.5倍。但是，必须指出的是，由于通货膨胀，1978年的100元人民币，到了1999年只相当于22.6元，货币贬值超过77%，按逆指标计算，年均递减7.1%。也就是说，1999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2210元，其实只相当于1978年的97.78元，与197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

134 元相比，实际收入降低了 27% 以上。

据有关专家测算，由于人为地制造了“剪刀差”的日益扩大，仅 2004 年前若干年内在推进城市化过程中，通过各种形式征用农民耕地的价格“剪刀差”，就至少从农民身上“拿走”了 5 万亿元（引自 2004 年 4 月 14 日《青年参考》），到了 2012 年底，著名经济学家吴敬连在中国高层发展论坛上披露，过去几十年来，政府仅从造城运动获得的土地差价“保守估计在 30 万亿元左右”（见 2013 年 4 月 2 日《生活文摘报》转自新华社报道），如此剥夺农民利益，肯定是空前的。

高利贷从死灰复燃，到日益加剧，给广大农民造成的“隐形”负担同样令人咋舌。旧社会因高利贷曾经使难以数计的中国百姓倾家荡产。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一举扫荡了高利贷，使老百姓免受其盘剥之苦。农村改革后，随着两极分化的出现和日益严重，高利贷随即死灰复燃且迅速蔓延。特别是农民卖出去的粮、棉、油、猪等农副产品，长期以来得到的是一纸不知哪年哪月才能兑现的“白条”，导致广大农民手中无钱少钱，不少人不得不借高利贷维持生产和看病、上学等必不可少的开支，使农民的债务链条越来越长，以致陷入痛苦不堪的恶性循环之中。据黑河市纪委对北安、德都两地的 440 个村子调查，农民抬款（即高利贷）至 1998 年 5 月已达 3000 多万元，一般都是 3 分利息，高的达 5 分。在黑龙江省泰来县等地利息更高。村民刘贵军于 1996 年“抬款”（借高利贷）6000 元，年利率 45%。也就是说，他在年初借的 6000 元高利贷，到年底得还 8700 元。由于他卖给国家的 5757 公斤稻谷，换来的是一纸“白条”，当然无法还债。于是所借的 6000 元高利贷，又以 8700 元为基数，再加 10% 的利息，他要还的钱就达到 12180 元。这就是旧社会“驴打滚”在农村改革后卷土重来对农民进行的残酷掠夺。刘贵军被高利贷逼到了这步田地，当然不敢再借也无法再借到高利贷。因为没钱交电费，村里断了他家的电，没

钱交学费，9岁的女儿被迫停学，到1998年连房子也抵押给了别人。因为卖了粮食得不到钱，借高利贷种地已负债2万多元，房子也卖了，身无立足之地，便扶老携幼挥泪告别故土，外出逃荒去向不明。

分田单干后出现的这类悲剧，毛泽东同志早在1962年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向党的高级干部敲响了警钟。在这一年8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有人提出了“包产到户”的主张，刘少奇等人甚至“明确表示”，要“使包产到户合法起来”。面对当时的“单干风越到上面就刮得越大”的局面，毛泽东严肃而尖锐地指出：“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娶小老婆的。”毛泽东特别恼火的是，这股风“来自党内”：“党内有人变坏了，贪污腐化，讨小老婆，搞单干，招牌还是共产党，而且是支部书记……把群众当奴隶！”

今天的事实，正是“党内有人变坏了。”据温州警方调查，高利贷的债主80%是公务员。一个公务员动辄拿出百万、千万放高利贷，首先就令人怀疑钱的来源；而且担保公司老板帮公务员放高利贷，公务员帮老板办事，高利贷便形成一种新受贿形式，必然使高利贷加剧。对老百姓特别是对靠借高利贷生产、生活的农民祸害无穷。

四十九年前，毛泽东批评党内高级干部主张“包产到户”，指出如果“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必然出现的悲剧和两极分化，今天我们不是看得很清楚了吗？黑龙江省泰来县的刘贵军就是一个例子。诸如此类例子，在今日的中国广大农村比比皆是。就在齐齐哈尔市的泰来县，仅大榆树乡利民村的10多个屯子，借高利贷的农户就占70%以上。平洋镇燎原村家家有高利贷，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地方就只好由村委会出面，到外地借高利贷。比如，前程村从1991年就开始由村“合作

基金会”，从外地以 30% 的利率借回高利贷，再以 35%—40% 的利率贷给农民（引自 1998 年第 8 期《半月谈》）。

在有的地方，政府也变相加入了高利贷者的行列——农民欠国家的农业税也搞高利贷计息。湖北省监利县龚场镇爱民村农民姚延平，1995 年欠国家 3500 元农业税，利滚利，到了 2000 年就得交 19000 元。5 年间翻了 5.43 倍。就在地方官员催款时，声称无钱就抓人。姚延平在深圳打工的儿子姚其杰，闻讯后给村里打电话，答应马上回来交 14000 元，请求免 5000 元利息，不要抓其父母。镇、村干部不同意，姚延平于 2001 年 1 月 18 日（即 2000 年腊月二十四日）中午被镇、村官员抓走，和另外 11 人一起关进了管理区所设的“小黑屋”。三天后的 1 月 21 日（即腊月二十六日）不明不白地死在“小黑屋”里（引自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第 326 页）。成为死于地方政府高利贷的一个典型。

由于卷土重来的高利贷有着令人垂涎的利息，率先富有起来的人们和一些不知怎么富起来的地方官员及其家属，便纷纷加入到不断扩大的高利贷队伍之中，特别是地方政府官员和他们的家属，往往成为了高利贷队伍的主力军，在一些地方已经发展成一个规模可观而且正在不断壮大的“高利贷阶层”。

据李昌平在《我向总理说实话》中披露，在湖北省仅监利县一个棋盘乡的“高利贷阶层”就有 6000 人之众，他们在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就已经能够“左右全乡的政治、经济活动”。全乡 4700 万元债务就有 6000 多个债主。而在监利县，截至 1999 年村级负债约 5.5 亿元，乡区负债约 3 亿元，县级赤字 1.5 亿元，在不包括企业负债的这 10 亿元债务中，大约有 4 亿元（占 40%）是民间高利贷，而放高利贷的人员中，干部和干部家属占 70% 以上。由此可见，“高利贷阶层”主要是由地方官员和他们的家属组成，这大概是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个史无前例。

农民的“隐形”负担，当然远不止农用生产资料价格暴涨

与农产品价格走低之间的“剪刀差”和无处不在的高利贷。其他如学费、药费和生活用品大幅涨价，假冒伪劣商品无孔不入地向农村倾销，以致不少人说，城里人不要的低劣商品、垃圾商品，都推向农村，卖给了农民等等。无不都是农民的隐形负担。但是，仅从“剪刀差”和高利贷这两项所反映出来的情况，就足以看到，农村改革后，中国农民在沉重的“有形”负担之外，所承受的“隐形”负担，是多么怵目惊心！

第十五节 盲目决策造成的恶果

各地出现的无节制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在农村改革初期就埋下了祸根。当时国家为了减轻财政负担，实行所谓“分灶吃饭”。而且出台了被称为“给政策不给钱”的改革新政，给地方政府打开了一个创收的口子，即乡镇政府可以将“企业上缴的利润、管理费和各种集资款、捐款以及各种罚款的收入，作为乡级财政的自筹收入，由乡镇政府支配”，乡级政府有了这么众多敛财的门路和权力，一些手握大权的人物，随即将自己的亲属以及某种有关系的人，以各种名义弄到机关，反正可以用“各种集资款、捐款以及各种罚款”养活他们，至于怎么集资、怎么捐款、怎么罚款，官员们自有办法。“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展示，老子当官，儿子、儿媳、女儿、女婿，乃至七大姑八大姨能吃皇粮的例子，媒体时有披露。

那位敢于“向总理说实话”的李昌平，就经历了一件也许他终生难忘的事。他在监利县柘木乡当党委书记时，一次就裁减了127名由各种权势人物弄进来的各类人员，而且，特意将县委书记写条子要保的人，第一个裁减。他实行的是“127人一刀切，一律化，没有人情没有特殊”。在一个谁坚持原则，谁按国家政策办事谁就受排挤被歧视甚至遭打击的社会里，李昌平这样做的结果就只有被调离。李昌平调出柘木乡后，被

他“一刀切，一律化，没有人情没有特殊”裁减的127人，当然又都各复其职了。地方党政官员如此作为，财政供养人员还能不恶性膨胀吗？在李昌平后来担任党委书记的棋盘乡，1985年财政供养的人员还不到15人，到了1998年，全乡大大小小的干部、教师等等已达2000人之众（见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第12页）。

在中原大省河南，乡镇官员的膨胀，更令人惊叹，全省2100多个乡镇，到2000年，每个乡镇平均达到448人，最多的乡镇高达1177人。一个乡镇要供养这样一支浩大的“皇粮”队伍，我敢说，古今中外绝无仅有。这么多人要工资、要福利、还要公款吃喝，到哪里去弄那么多钱呢？于是只有向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但即便如此，地方财政也陷入了堪称前所未有的困境。

仍以河南为例。到了2000年，全省2100多个乡镇，平均每个乡镇负债489万多元。不少乡镇因负债查扣抵债，被法庭上门封账。该省灵宝市豫灵镇负债9000多万元，仅1999年，上门讨债的债主，即多达800多户，根本无法正常上班（引自2001年第15期《半月谈》）。

鱼米之乡的湖南，各乡镇的负债情况同样令人惊叹。据湖南省社科院中国新农村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曾担任过乡镇党委书记、有着14年乡镇工作经验的陈文胜于2005年历时半年的调查显示，湖南省乡镇负债面高达89%，一些地方的乡镇负债率高达100%，而且越往后发展，负债额的增速越快，比如，2002年，湖南桃源县乡镇财政负债突破1亿元的只有1个，到2005年，该县负债额突破1亿元的乡镇增加到3个，负债最高的达1.7亿元。据对湖南6县31个乡镇调查，乡镇负债额平均为1498万元，如果照此计算，全省2000多个乡镇的负债额不会低于280亿。早在1999年，该省郴州某乡镇因负债累累，一天上门讨债的多达28起，乡官们除了应付债主，几乎不能

干事，有的乡镇甚至到了“工资停发，汽车停开，电话停打”的地步（引自1999年7月7日《中国经济时报》）。经济的彻底崩溃，带来的必然是工作的瘫痪。某乡镇召开村支书座谈会，村支书居然当着乡党委书记的面说：“你那个乡镇政府有没有无所谓。”

地方财政处于这种窘迫困境，主要是地方政府自己造成的。甘肃省广河县是一个只有20万人口的贫困县，到1998年，全县财政收入仅1000万元，但在这样一个财政贫困县，却有160多名各类人员通过弄虚作假，伪造档案被招工招干。该县组织部副部长马占华将14岁的儿子先招工，再伪造年龄、学历等档案材料转为国家干部。因此等等，使这个县的财政供养人员达到5000多人，仅工资就得支出4000多万元，相当于全县财政收入的4倍。比广河县更严重的是陕西省黄龙县，黄龙县也是一个贫困县，全县仅4万余人，而吃皇粮的却高达4400多人。2000年全县财政收入仅859万元，支出却高达3159万元，支出相当于收入的3.7倍。

地方财政已衰败到了这等地步，而官员们自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滋长起来的，追求奢华，胡乱决策的胆量和气魄，却在不断膨胀。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新华社就披露，四川省德阳市的官员，创造了在一个季度内300万白条打给农民，5000万巨资购买483辆小轿车的“奇迹”。其中未经四川省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办公室批准，擅自购买的小轿车就有260多辆，耗资3100多万元，仅此即超过打给农民白条的10倍。极大地显示了德阳市官员们只顾自己享受，不管农民死活的“胆量”和“气魄”。

河南固始县是一个贫困人口大县，2006年全县财政收入2.6亿元，工资也只能依靠转移支付，但就在这一年，财政支出却高达9亿元，支出是收入的3.5倍。该县仅一个行政中心服务

大楼的总建筑面积即达3万平方米，其中办公楼建筑面积为1.3万平方米，投资1亿多元，加上广场等附属建筑达2亿元之巨，几乎是用全年财政收入的80%就建了一个办公楼。

县里带了头，各部门也就纷纷效仿大造豪华办公楼。县公安局办公楼投资3000多万元，国土资源局办公楼投资2457万元，卫生局办公楼投资1500多万元，县劳保局办公楼投资1000多万元，建设局办公楼投资1400多万元，城郊乡政府办公楼投资1200万元，水利局办公楼投资1300多万元……

一个财政收入一年不过2亿多元的贫困县，就敢如此不顾后果，一年就花掉9个亿，我不知道固始县人民是对他们的“胆量”深表“佩服”，还是为他们的胡乱决策深表愤慨？

同样是贫困县的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清水县，财力不过区区3000万元，却敢计划斥资61.1272亿元，在距旧城26公里外建一个占地5平方公里的新县城。自1998年决定迁址，到2008年取消搬迁，耗费10年时间，留下的是一大堆违规建筑耸立在一片荒山之上，成为荒唐的历史笑话。

一些县如此胡乱决策的歪风，像瘟疫一样不断蔓延，不少乡镇也不惜民财，贪大求洋，追求豪华，大兴土木。

随着官本位的不断膨胀，一些官员追求权力的欲望，已经登峰造极。天安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权力的象征，一些乡镇头头，居然也造起了“天安门”。

山西省临汾县尧都区区长宿青平，自担任区长开始，就在临汾市南约3公里处，修尧庙广场。广场上除修建了一座“天安门”外，还建有“天坛”，以及高达27米、由汉白玉雕饰而成的“中国第一华表”；在广场西边，建有高达50米的“华门”，号称“天下第一门”。简直比北京天安门更气派。因此，尧庙广场又被人们称为“华门广场”。这些建筑总共耗资7000多万元，除了向企业和社会“借款”，要黑煤窑“捐款”，主要是贷款，至于什么时候能还，大概没人考虑。

无独有偶。四川省忠县黄金镇党委、政府的办公楼，也修成了“天安门”。这幢耗资 400 多万元的仿古建筑，气势非凡。门前台阶为 6 层 111 级，两边共建有对称的 6 幢房子，形成一个“王”字排列，极为威严地显示着“王”者之气。

整个办公区共有 7 幢楼，“天安门”雄踞正中山腰之上，两边下方各有 3 幢白墙红柱的二层办公楼，办公区内的所有房屋均为红墙绿瓦，随山势蜿蜒而上、错落有致。气势之雄伟，超出一般人的想象。

“天安门”前高高竖着不锈钢旗杆，办公楼屋檐下挂着一个巨大的国徽，在最大的拱门黑色方形牌上，三个镏金大字“大会堂”金光四射。

辽宁省盘山县的县太爷们在 2010 年还造起了山寨版的“人民大会堂”。他们在新县城中心城区，建起了建筑面积为 2.5 万平方米的县委、县政府综合办公楼后，在综合楼前又建起了一个漂亮的“金水桥”。已经建成的七幢办公楼建筑面积 56900 多平方米，计划再投资 5000 万元，为有关部门建造办公楼。不难想象建成后之壮观雄伟。距综合楼不到 100 米，便是精心装饰的“人民大会堂”，高高的台阶，高大气派的柱子，抬头望去就是一座缩小了的“人民大会堂”。

而且，诸如“山寨天安门”、“山寨人民大会堂”这类象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权威的建筑，中央屡禁不止，从陕西宝鸡、宁夏银川、江苏连云港、山东邹城、湖南益阳等地，新闻媒体都有报道。2011 年有网友发起“随手拍地方政府办公大楼”活动后，截至 3 月底，就有 19 个地方政府的超豪华办公大楼被曝光。比如，江淮平原上那个安徽财政穷县——安庆市望江县委、县政府占用 182 亩耕地，建起来的超豪华办公大楼，富丽堂皇得令人咋舌，其建筑面积则达 43600 平方米，相当于八个半美国国会大厦——白宫。其中办公楼群占地 90 亩，广场占地 90 亩，广场上有休闲步道、音乐喷泉、临水广场、市民

广场、亲水平台、娱乐中心、鱼趣台、露天咖啡座、露天舞台等等，真是应有尽有。而其办公大楼，按照国务院发改委规定的官员办公室使用面积标准，县委书记、县长不能超过 20 平方米，该办公楼可供 2180 名县委书记或者县长办公。换言之，几乎可供全国 2400 多个县（市）中百分之七八十的县委书记或县长一起办公用。如此决策，岂不荒诞？

诸如这类地方政府，一味贪大求洋，肆意追求衙门的富丽堂皇和个人的超豪华享受，以显示官府的威严神圣，不顾国情省情县情民情作出的此类决策，无疑使已经捉襟见肘的甚至几乎崩溃的地方财政雪上加霜，使负债规模急剧膨胀。据报纸披露，在 2010 年上半年的短短几个月内，地方债务就由 4 万亿飙升到 7 万亿，在 2009 年 9.6 万亿元新增贷款中，地方政府占 3 万亿元。有的地方政府的负债率达到 150%，个别县市甚至高达 400%。（引自 2010 年 6 月 15 日《生活文摘报》）。由于负债运转成了很多地方政府的公开秘密，这就使国家预算法禁止地方财政负债的“明规则”，被地方政府普遍举债的“潜规则”强行替代。“前人借债，后人还债”，“谁借钱越多，谁的政绩就越大”，早已成了一种人所共知的普遍现象。为了举债而出现的各种歪风也日益猖獗。据报纸披露，截至 2010 年底，地方政府的负债达到 11 万亿元，占到 GDP 的 30%，而 2010 年国家财政收入也不过 8.1 万亿元。地方财政的负债规模，已超过国家财政收入。

面对这种种窘迫和荒唐，地方政府的另一个融资渠道，就是向农民要钱。这也是国家屡禁不止的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

第十六节 震惊全国的“减负”血案

任你中共中央、国务院三令五申要减轻农民负担，农民的

负担却越减越重，理所当然引起了不堪重负的农民强烈不满。心不平，气不顺，便要倾诉，希望上级政府主持公理、为民作主。但是，在很多地方，谁若胆敢向上面反映当地大小官员的“三乱”，等待他们的往往是没顶之灾。

丁作明就是一个典型。

丁作明是高中毕业后回乡种地的农民。他有文化，爱听广播，爱看报纸，对中央减轻农民负担的有关精神比较了解。而他所在的安徽省利辛县纪王场乡路营村农民，1992年人均收入不过400余元，而人均负担总额却高达103.17元，比国务院规定高出五倍多。他便向农民讲解中央政府规定，还找来报纸念给乡亲们听。听了报纸上的文章，大家都认为乡村干部任意重复收取提留款、加重农民负担，违背了中央规定，便推举丁作明等人向乡党委、乡政府反映。乡党委书记李富坤看了看丁作明递上去的村民“提留表”，“轻描淡写”的说：“是多提留点。让我们合议一下，两天后给你们答复”。

但两天过去了，没有动静。又过了两三天，仍没有答复。但在一次路营村干部和党员参加的干部会议上，乡党委分管政法的副书记任开才，对路营村党支部书记董应福说，让他在会上就“提留”问题作个“交待”。董应福顿时火冒三丈，他说各村都是这么多提留的，为啥要我在众人面前交待！当他得知有人把他告到了乡里，当即在干部会上大发雷霆，说：“有人要清我的账，我看谁敢！除非他不要命了！有人说我凭收入买不起小四轮拖拉机、盖不起大瓦房。买不起盖不起，可我就买了盖了，你们穷，活该！想跟我搞，怕是不想活了！”

一个村支部书记，竟敢在全乡干部、党员大会上如此嚣张，路营村群众听到后，个个气炸了肺，愤怒地说：“共产党的天下，难道就没有王法了？！”

村民们咽不下这口气，丁作明更咽不下这口气。就在过年前的三天，丁作明把路营村乱收提留款的情况写成材料，直接

送到了利辛县纪检委。纪委的同志很为难地说：“快过年了，材料先放这里吧。”

一转眼半个多月过去了。正月十八日，村民们急了，都去找丁作明。原来整个春节丁作明都在写控告材料，不仅告村干部加重农民负担，也把乡里一些严重问题写上了。比如，纪王场乡康乡长的公子，仰仗老子的权势，横行乡里，经常手持电警棍、拎着铁铐子，跑到路营村强要钱物。1991年特大洪灾，上面规定不准向受灾农民索取任何“提留”，而这个康公子居然带着民兵，像日本鬼子打抢一样，强行抢夺农民钱物，如有谁家不开门，就指使打手踢门踹门，收钱分文不少，还要额外付给踢门“功臣”劳务费，抢得钱财后，便领着一帮人吆三喝四下馆子，吃喝的花费回头还要从村民的集资款中报销。这样的“八旗弟子”难道不是比土匪还可怕吗？

丁作明写出了路营村和纪王场乡一些干部违法乱纪、无法无天任意加重农民负担的真实情况，也就在这天晚上，大伙儿你一元，他八角，凑足路费，将丁作明等8位村民代表摸黑送出了村口。

他们在县委找到了办公室汪主任，汪看了控告信后，非常震惊，感到路营村农民的负担，远远超出了想象。汪主任立即报告了新来的县委书记彭文虎。彭文虎明确答复：“我们会尽快叫乡里落实清账小组，对路营村的账目进行清查。你们反映的乡政府的情况也会很快核实处理”。

得到了县委书记的明确答复，丁作明和村民代表都松了一口气，感到路营村有救了。

然而，就在丁作明和村民们翘首企盼上面来调查处理路营村农民负担问题的时候，路营村副村长丁乐言为了打击报复丁作明，谎称丁作明打了他，纪王场乡乡长康子昌和党委副书记任开才，本来就对丁作明向县里反映路营村和纪王场乡加重农民负担问题极为恼火，听了丁乐言说丁作明打人的报告后，幸

灾乐祸。乡长康子昌随即指示派出所副所长彭志中，将丁作明叫到派出所，关进了非法设立的所谓“留置室”。罚跪、掌嘴。丁作明不服，便安排一帮“治安队员”用桑木棍、电警棒、扁担等凶器，对丁作明轮番毒打。这个打累了，那个接着打。在那一伙暴徒挥舞凶器，轮番把丁作明往死里打时，已经知道暴徒不把自己打个半死就不会放手的丁作明，用尽全身力气、瞪大双眼、无比愤怒地大喊：“我告乡村干部加重农民负担，违背党的政策，竟遭到这样暴打，我不怕！就是你们把我打死，我也不服！变成鬼，我还是要告，连你们一起告！”

望着丁作明血红的双眼里迸射出来的愤怒之光，一个毒打丁作明的治安队员举起的扁担，掉到了地上，他的手在抖。

一个打人打红了眼的小头目，立即喝斥道：“你他妈的个孬种，干吗怕他！这里是他嘴硬的地方吗？给我打！”

几个丧失人性的治安队员，一拥而上，有人用一块肮脏的抹布，塞进了丁作明嘴里，在丁作明不能说话不能动弹的情况下，治安队员展开了对丁作明更加残酷的毒打。

直到村里有人发现丁作明被派出所叫去后，一个下午都没有回来，跑到派出所，才找到已经奄奄一息的丁作明，马上将他送到医院抢救，因脾脏破裂大出血，流血过多，医生们回天无力，丁作明死在手术台上。果然如村支书董应福所说的，谁敢“清我的账，除非他不要命了”。

丁作明被暴打致死，引起了上面的重视，还惊动了中央，有关责任人当然受到了处理。

但是，一位青年农民仅仅运用《宪法》赋予的权力，向上级政府反映了基层政府违反国家政策，肆意加重农民负担问题，地方政府就敢指使派出所把他抓去关禁闭，被村民称为“打人队”的所谓“治安队”活活打死，我不知道地方政府和他们管理下的这类派出所，和法西斯还有多少区别？农民连地方官员公然违背中央政策的事都不能说，一说就可能性命难保，还

有什么话可以说？在这些地方，难道农民就只能听凭官员们宰割？

像丁作明这样反映农民负担过重，就被活活打死的花案，理所当然引起了农民的愤怒。而像陈重申那样，被村干部一次又一次密谋策划残杀致死的惨案，则更加令人发指。

年近花甲的陈重申，是距邓州市仅 12 公里的白河平原陶营乡徐楼村农民。分田单干后的徐楼村于 1986 年改组了村委会、支委会两套班子。年仅 32 岁的张德恩当上了村支部书记。时值改革大潮风起云涌，让农民致富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而徐楼村的先天条件又特别优越，一望无际的平原，沟河干渠纵横交错，从丹江电站拉过来的 22 万伏高压电凌空北上，207 国道和邓—浙公路分别从村南、村北蜿蜒绕过。村民们都希望改革中组建的新班子，利用村里优越的天然条件，带领群众致富，改变徐楼面貌。但谁也没有想到，希望很快成了泡影。这帮新上任的村官沾上一丁点儿官气，就谁也不认了，他们只顾自己率先富起来便利用手中权力大捞一把，却全然不管乡亲们的死活，村官们夏逼粮，冬逼款，沆瀣一气，敲骨吸髓，肆无忌惮、搜刮民膏民脂。张德恩一伙上台后不久就成立了一个专门对付群众的“棒子队”。接着又在村部非法设立了两间“禁闭室”。疯狂的贪婪，使他们变得无法无天。他们想罚谁就罚谁，想抓谁就抓谁，谁敢顶撞，谁敢不从，抓起来就关禁闭，关起来就打，打完还得如数给他们交钱。陈重申的大儿子陈培礼，仅仅因为把村会计刘长志妹夫一头闯入自己菜地里的猪赶出菜地，就被刘长志捆在树上，一顿棍棒打得皮开肉绽，打成了疯子。村民胡春照、陈凤仙见“棒子队”在村里乱抓人，轻声嘀咕了一句，随即被“棒子队”捆起来一顿毒打，胡春照耳朵被打坏，成了聋子；陈凤仙被打得逃离家乡，到郑州去捡破烂，根本不敢再回家。从新班子上任至 1994 年 8 年间，村民人均交了 1000 多公斤小麦，可谁也没见过一分钱。直到 1994 年，八

年过去，这个离繁华的邓州市仅仅 12 公里的徐楼村，农民生活毫无变化，依然是坯头烂瓦，茅屋草舍，90% 以上的村民家徒四壁。八年间，村里唯一的变化就是在“改革春风”中上任的村官们家里的一座座新楼拔地而起，格外耀眼。农民背上的负担就像抱着棉絮过河，一年更比一年重。陈重申所在徐楼村徐北村民小组，50 多户人家，180 多口人，人均只有 1.6 亩薄地，连秸秆、柴草都算上，全组每年人均纯收入也只有 300 多元，但村里任意虚报收入，大幅增加提留摊派款，1993 年的摊派款竟增加到每人 127 元多，农民苦不堪言。但是，面对认钱不认人的大棒子、铁铐子和凶神恶煞一般的“棒子队”，村民们敢怒不敢言。

就在村民负担急剧增加的 1993 年 8 月，村官们作出了一个简直要置村民于死地的决定。村里要收回全村的 4700 多亩责任田，实行“商品化”，重新承包。每亩地每年承包费 60—70 元。谁要地谁就掏钱，但不种地的，每亩得出 20 元罚款。在村官们看来，全村 900 多户穷棒子，谁也离不开土地，只要把土地“商品化”，到年底不费吹灰之力，就有二三十万元钞票进腰包。农村改革后，村官们居然胆大妄为到敢把村里的土地当成私有财产，打着“承包”的旗号出租敛财，这不是比旧社会地主将自己的土地向农民出租还歹毒吗？

消息传出后，全村 900 多户共 2800 多村民一下炸开了锅。祖祖辈辈靠土地为生的农民，没有土地怎么办？村官们这一招，不是拿农民往死里榨油吗？但要承包土地，农民们连买化肥、农药的钱，都是到处借的，还到哪里去弄那么一大笔钱，向村官们交承包费？

当时，正值三秋生产迫在眉睫，如不赶快种地，明年就没有吃的。无路可走的农民，只好先打欠条，承包地把麦子种上再说。村里文件不也说了吗？交了承包费，免交一切经济提留和任何罚款、任务款。谁知，麦种刚落地，村官们就翻了脸，

他们挨家挨户催交五花八门的各种钱款，什么黑娃费、独生子女保健费、责任田管理费、特产费、村办腐竹厂股金费等等，每户都得六七百元。村民们说，他们这样出尔反尔，乱收费，就是卖儿卖女也交不起啊！

全村顿时沸腾了，人们怨声载道。也就在此时，年近花甲的陈重申震怒了，村官们如此无法无天，他要“找党去！找上级组织去！”

由于乡里、村里长期没有开过会，陈重申根本不知道中央还有减负文件，省里也有禁止“三乱”的规定，他仅仅是凭自己的感觉，共产党不会叫老百姓这样活不下去。尽管当时他正在为自己两头耕牛被村官诈去而奔波告状，但他毅然决定，放下正在为耕牛的申诉，和村里26户农民商量，起草了一份控告村委会乱收费、乱罚款的状子，开始了艰难的上访。

去乡政府，他被推了回来。于是，他到了市里、地区，到了省会郑州；他去了“减负办”，到了法院、人大，到了他能去的一切地方。一次、二次、三次……

在上访接待室，有的接待人员甚至把他当成“闹事”，要把他赶出去，要把他抓起来，他却直挺挺的跪下来，说不给答复，他无法回去见乡亲……慢慢地他终于知道了一些法律、政策、文件精神；知道了中央三令五申要减轻农民负担，各级政府也有好多减轻农民负担的指示、决定，使他申诉的决心更加坚定。上访的路费，乡亲们给他凑；凑的花完了，他就向亲戚朋友借；借的花光了，他就卖粮食、贷款。他决心为减轻乡亲们的沉重负担告到底。

陈重申的矢志不移，终于打动了不少政府官员。省地市三级领导对他反映的问题都挺重视，一道道查禁令相继传了下来。张德恩、刘长志一伙开始害怕了，慌了。他们日夜密谋，一次又一次向上级递交所谓“情况说明”的答辩，歪曲事实，编造一些虚假数字企图瞒天过海；他们甚至倒打一耙，诬蔑陷害胡

说什么陈重申是“计划生育犯无事生非”，是“少数人煽动捣乱”等等。

但张德恩一伙一边在欺骗上级领导，一边却在下面继续横征暴敛。就在1993年即将过年的腊月二十七日，村官们还领着“棒子队”挨门挨户逼款、画押、挖粮食、抓人打人。

满腔愤怒的陈重申，再三再四地向上面反映情况，控告村官们的暴行。

1994年6月15日，邓州市人民法院决定，正式对徐楼村的“三乱”问题立案处理，并派出三名干警赴陶营乡和徐楼村实地进行调查，同时决定七月二十四日开庭审理。

陈重申脸上终于有了笑容，徐楼人奔走相告。张德恩、刘长志一伙当然也感到了问题的严重。他们认为是陈重申毁了自己的一场好梦，如果土地“商品化”泡了汤，再查其他账，那就一切都完蛋。他们对陈重申恨得牙齿发痒，双眼滴血。

只等市法院干警一走，村支书张德恩、村支委兼会计刘长志立即把副支书倪志春、副主任刘荣德、治安主任王玉宽召到张家开会，研究如何处治陈重申，并且很快就拿出了方案。随着开庭日期的逼近，他们决定火速行动。

1994年7月2日，刘长志以“对账”为名，把陈重申骗到家里，准备按计划用酒灌醉他再下手，偏偏水利站来了人，使计划流产。

第二天，即7月3日，急如星火的刘长志、张德恩、王玉宽三人聚集在村前柿树下，统一口径，确定了动手的时间、地点和暗号，并安排了假“证人”。张德恩最后拍板，以核对“提留款”数字为名，将陈重申骗来，把他的单车放掉气，他就必定走小路回家，再由治安主任王玉宽在路上把他干掉，为了万无一失，张德恩、刘长志又叫来“棒子队员”张德庆作帮手。此人是张德恩的胞弟。

7月4日下午刘长志第二次把陈重申骗来“对账”，但刘

却借故拖延时间，然后才把他“做好”的账本拿出来。就在对账时，刘的老婆则放掉了陈重申自行车后轮的气，然后拉亮了西屋的电灯。王玉宽、张德庆见到刘家西屋拉亮的电灯信号，立即提着木棒、绳子，借夜色藏入小路旁的玉米垛旁，只等陈重申出现即“解决”他。将近十点，陈重申对完账发现单车后胎没气，向刘长志借气筒，刘长志称不在，陈重申在犹豫中却推着单车走了大路回家。守候在玉米垛旁的两名凶手，等到深夜11点过后，仍不见陈重申出现，折回时方知陈重申早已回家去了。

两次谋杀不成，几个人都慌了手脚。但时间十分紧迫，必须尽快除掉陈重申。第二天即7月5日，再次密谋，他们设计了几套谋杀方案，但都不尽人意，恰好当天晚上村里放电影，随即决定借电影杀人。当天下午，刘长志把陈重申骗来后，让王玉宽、张德庆藏在池塘边一片庄稼地头的小砖房里。待全村老少都上大场看电影去了以后，刘长志按预谋借口想看电影停下“对账”，和陈重申一起往池塘畔大路走去，刚走到小砖房旁，等候已久的王玉宽和张德庆迅速冲上来用大棒将陈重申打倒在地，再套上绳子将他活活勒死，然后拖到不远处的坟场里，装进大麻袋，并在麻袋里装上两块重达170斤的大石头，扎紧袋口。随后，几个人都来到电影场找人多的地方坐下看电影。

电影散场后，三人趁夜深人静，用架子车把装着陈重申遗体的麻袋和他的自行车，拉到李岗村李洼沟丢进了涵洞口的深水潭。

当天夜里，刘长志把陈重申的提包拿回家后，将里面装着的所有上访材料，收集的各家各户交款数存底，搜集的各种减负文件，省、地各级组织领导批复的信件等等，连同提包一起，一把火烧了个精光，连纸灰也全部倒入了茅厕里，可以说做得干净利索。

这天晚上，陈重申老伴左等右等，不见丈夫回来，心里非

常不安，好容易熬到天亮，匆匆跑到刘长志家里打听，从刘家得知，丈夫昨晚天黑时就离开了刘家，有人在电影场还见了。两个儿子便安慰母亲，几个月来父亲都是来去匆匆，这次可能是他对完账去乡里、市里汇报去了。一天、二天、三天过去了。第四天，有人神色不安地对陈重申的三弟陈重奇说，听说“大掌柜”（指陈重申）叫人“抛锚”了，不知是真是假。于是一家人连同叔侄一起分头寻找，所有能找的地方都找了，全无半点踪影。陈重申的二儿子陈波基随即报案。

直到7月10日，有人在涵洞口发现一只绳头随水漂动，仔细一看是一只扎着口的麻袋半浮在水面上，有人把麻袋拉到浅水处，解开麻袋一看，顿时吓得倒在水里。天啊，麻袋里装着的竟是一个大死人，脖子上还系着一根绳索。

案子很快破了，张德恩、倪志春、王玉宽、刘长志、张德庆五名杀人罪犯供认不讳，这伙杀人犯当然受到了法律制裁。

诸如丁作明、陈重申这样因向上级政府反映农民负担过重，而被地方官员打死、谋杀的例子，当然远不止这两起。但仅从这两位农民的死，我们也不难看到，在当今中国社会，农民要表达自己的诉求，要反映地方政府违反国家政策肆意加重农民负担的苛政，是何等的难于上青天；我们还不难看到，某些地方政府和官员，一方面不顾国家三令五申，忘乎所以加重农民负担胆大包天，另一方面对农民向上级反映农村真实情况却怕得要死，恨之入骨，以致不择手段，践踏党纪国法，打击、迫害，甚至残杀敢于反映真实情况的农民，企图截断下情上达，任凭他们独霸一方，为所欲为无法无天而不受国家法纪的惩处，这是多么可怕的情景啊！

第十七节 中央政策法令是洪水猛兽？

各级地方党政机关和党政官员的根本任务，就是宣传贯彻

落实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就农村工作而言，他们理所当然应该向广大农民积极宣传、耐心解释党和国家有关农业和农民问题的各项政策、法令，让农民了解和掌握政策法规，以更好地推进农村工作，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然而，自从土地分到各家各户以后，不少地方的党政组织和官员们，不再向农民宣传、解释党和国家的有关政策、法令，甚至将国家的政策和法律法规，当成纸老虎、稻草人，任意踩踏；视同洪水猛兽肆意围剿，导致很多地方的农民患上了“政策饥渴症”。一些关注农业和农民问题的有识之士，想农民之所想，急农民之所急，用各种方式积极向农民宣传党和国家有关三农问题的政策法规，匪夷所思的是，他们却往往遭到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的刁难、打击，他们编印出版的党和国家有关政策、法律、法规，被没收、被销毁，甚至受到处理。

71 岁的老共产党员贺荣清，就受到过这种待遇。

贺荣清是陕西省丹凤县龙驹镇贺家村一位老教师，1991 年退休后回家务农。他是一位有着 40 多年党龄的老党员，回家后被推选为贺家村党支部书记。当地农民普遍反映负担太重，都向他咨询国家政策，但他也知之甚少。

1996 年 12 月 30 日，贺荣清从《陕西日报》上看到一篇《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决定》，立即萌生出将这类文件摘录下来，编印成册供农民学习的想法，让他们了解国家政策。从 1997 年起，贺荣清特意订了报纸刊物，开始从报刊上搜集有关国家减负等涉及农业和农民问题的国家政策和地方法规。2000 年 7 月 1 日，贺荣清将自己搜集整理的有关农民减负方面的政策法规，编成一本小册子，书名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汇编》，自己掏钱印了 1000 册。四乡八邻的农民知道后，纷纷前来购阅，他连赠带售，每本 3—5 元，很快出手 300 多册。农民们对这本小册子爱不释手，高

兴地说：“我们迫切需要了解国家的减负政策，这样就能抵制各种乱收费的行为。”

谁知，7月27日丹凤县某派出所的民警突然来到贺家村，强行没收了贺荣清剩下的几百本《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汇编》。

面对奉命而来的民警，贺荣清自然无可奈何。但他怎么也无法理解：社会上到处充斥着淫秽下流封建迷信等毒害青少年的书刊，无人过问，自己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村支部书记，宣传党和国家的政策法规，帮助群众学习党和国家的政策法规，到底有什么错呢？

湖北房县桥上乡杜川村张先忠编印的《农民负担政策法规汇编》的命运，更令人深思。

当时47岁的张先忠，因科学栽培食用菌成了远近闻名的致富带头人，他编写的《早熟丰产香菇栽培技术》和《香菇栽培新法》两书曾获得农业部的金龙奖。为了科学扶贫，张先忠为全国十多个省市的农民讲过技术课，接受他培训的农民超过2万人，为农民科学致富作出了贡献。但是，他发现仅有技术扶贫农民仍难以致富的根子，就在于减负政策不落实，农民负担太重，而且出现了越穷越收、越收越穷的恶性循环。这使他认识到，“仅有科学扶贫还不行，必须搞政策扶贫。”

从1998年开始，他从自己订阅的报刊上搜集中共中央、国务院以及湖北省颁发的农村政策法规，自费复印给附近农民，很受欢迎。

1998年5月25日，张先忠向市里有关部门递交了印刷、宣传党和国家有关农村工作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请示报告，立即得到了市农经局局长和市“减负办”的积极支持。还给了他一本湖北省农民负担监督办公室编印的政策法规选编样本，这使他立即看到了这本书的重大价值，也给了他很大鼓舞。

张先忠说干就干。仅仅过了一个月零几天，2万册《农民

负担政策法规选编》（下称《选编》）就印出来了。他决定全部免费赠送给农民。刚运回来的当天，就有几十位农民纷至沓来向他索书。山沟里的农大哥都把《选编》当成自己的“宝书”，争相传阅。

没有料到的是，当地一些党政干部却把农民的“宝书”，视同眼中钉，肉中刺，乡政府立即向县政府告状，要求对印刷《选编》的县印刷厂进行追查。

县印刷厂当然顶不住官府的压力。随即由厂长、副厂长亲自带着十几个工人，出动两部汽车，分别赶到桥上乡杜川村张先忠家里，撕毁了2800多本《选编》封面；到县城关镇花宝村张先忠弟弟张先红家，撕毁了12000本《选编》的封面。

《选编》被撕去封面后，被称为“禁书”。但老百姓却如饥似渴地到处寻找和传阅这本被官府追查的“禁书”。已经习惯了对上则封锁国家政策，对下则蒙骗、恐吓农民的地方官员，对这本“禁书”，自然也不会放过。桥上乡甚至在横峪村召开群众大会，公然抓走农民王世珍，在会上批判他收集农民负担卡、宣传《选编》中的中央文件，影响了按人头征收特产税和乡集资，将王世珍拘留了三个月。桥上乡经管站站长胡昌武等乡村干部甚至不断在群众中散布：张先忠印这些乱书，影响税费收不上来，明年的税费还要增加，公开对农民进行威胁。

面对乡、村官员的威胁恐吓，农民们却照样成群结队上门向张先忠索求撕掉了封面的《选编》，他们需要党和国家的政策法规，很快就送出1800多本。农民掌握了政策，对地方政府乱收费，就有了抵制的底气和胆气。有一次，桥上乡经管站站长胡昌武、东坪管理局书记带着一行12人，浩浩荡荡前来收费，农民李显华、俞成远手拿国家政策法规与他们说理。但是，乱收费已收到横行霸道的地方官员，却气势汹汹地说：“你们这些政策没有任何用！”说完，就把李显华家的猪赶走了，把别人寄养在张先义家的一头牛也牵走了。张先义依法把乡长告

到了县法院，法院依据国家的减负政策法规下达了由桥上乡人民政府赔偿张先义 1600 元的裁定书，使受够了恐吓、威胁的山区农民第一次看到了政策法规的威力。

2001 年元旦刚过，桥上乡杜川村的村官们又开始挨家挨户逼着农民交各项摊派款，公开扬言：中央、省、市、县的政策法规，通通靠边，杜川村一概不认，只认乡上下达的任务。在村官们的眼中，桥上乡就是一个独立王国，什么中央、省、市、县算个啥？村官们乱收费已胆大妄为到这等地步，农民还能承受他们无所顾忌的“三乱”之重吗？

但是，掌握了国家政策的农民却第一次开始抵制“三乱”。2001 年 1 月 4 日，农民俞远成、李显华等 27 位农民来到市委大院门前，挂出请愿横幅，翻开《选编》，问：这本“禁书”到底有没有用？

接待上访农民的房县县委副书记陈耀林旗帜鲜明地回答：“当然有用！你们回去后组织农民认真学习，把它作为抑制乡、村干部不依法行政的‘尚方宝剑’！”

历尽坎坷的《选编》，总算得到了一位县委副书记的认可。人们难以理解的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制订的政策法规，要得到地方官员的认可，为什么会这样艰难呢？

我们再看看一本极受农民欢迎的“奇书”之命运吧。

江西省农工委机关杂志《农村发展论丛》以增刊形式，于 2000 年 7 月公开出版发行的《减轻农民负担工作手册》（下称《手册》），是一本罕见的“奇书”。全书仅 147 页，直接面对的是江西 4000 万农民。

《手册》的出版背景是——当时，江西的许多基层干部拒绝宣传、解释中共中央、国务院以及省里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法规，根本不按规定向农民发放负担监督卡，省里对这种状况也无可奈何，以致有关部门不得不亲自下乡张贴宣传减负政策法规的公告，而这些由省里直接张贴的公告，在不少地方

“连一个晚上都过不了，就会被乡村干部撕掉”。这些地方的官员，简直把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减负政策，视同洪水猛兽。

就是在这种中央减负政策根本无法贯彻落实，农民怨声载道的背景下，以“最敢为农民讲话，最能为农民解忧，最想为农民服务”为宗旨的《农村发展论丛》的常务副社长、主编桂晓琦，策划编印了《手册》。《手册》共收录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各部委有关农民减负工作的文件、政策法规汇编；江西、湖南等省贯彻中央减负精神和村民自治、土地管理、移民建镇等方面的有关文件和政策法规 15 篇；由江西省农民减负办主任蔡海康、江西省土地资源局政策法规处处长盛长生等人解答的农民负担热点 108 题。封面上赫然印着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和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关于农民减负问题的讲话摘要。

江西省新闻出版局收到杂志社的出版申请后，很快就于 7 月 7 日予以批准。仅仅过了 22 天，即 7 月 29 日《手册》正式出版。每本定价 10 元。

新书刚运回杂志社，闻讯而来的农民已经在杂志社排起了长队。其中来自新建县石港乡农民周翔一人就买了几十本。

《手册》出版后，江西省人民广播电台、江西省电视台等新闻媒体作了报道，不少地方的农民获悉后，揣着上百元钱，颠簸几百里专程来杂志社购买《手册》，在短短 13 天中就创造了售出 12000 册，购书者遍及江西省所有 11 个地区的奇迹。

不可思议的是，这本受到广大农民由衷喜爱的“奇书”，立即受到官员们的攻击、围剿。

丰城地区一些乡官对买到《手册》的农民说，这书是“法轮功”编的，不能信。

一些地方官员甚至告到了省里，说桂晓琦编的《手册》，破坏了稳定的大好局面；一些领导听了之后，一怒之下就撤掉了桂晓琦的副社长、主编职务。

8 月 11 日，《农村发展论丛》杂志社突然接到通知，立即

停止销售《手册》，立即收回已售出的《手册》。

“有关部门”更是闻风而动，组织人员分头下乡，依据购书农民登记的地址，“不惜一切代价”收回《手册》。要“挨家挨户”上门收回，不许遗漏。有的地方为了完成收回任务，甚至将书款提高到每本12元，以2元差价诱使农民主动交书。官府打出的口号是：“书卖到哪里（不良）影响就消除到哪里。”（引自2000年10月12日《南方周末》）

然而，“有关部门”太小看农民了。他们宁肯要书，也不要2元钱差价。

《手册》明明是一本经过江西省新闻出版批准的宣传中央政策的书，有关部门的官员收书时却说，封面设计不当，所以要收回。农民说，那我把封面撕下给你，只留下《手册》内文还不行吗？

无话可说的收书官员，最后根本不解释，大搞强行收书，甚至威胁农民：“谁藏书，谁就要负一切后果！”官员们简直把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的政策法规当成了异端邪说。谁知官员逼得越紧，农民看得越重，在一些地方标价10元的《手册》，被炒到每本150元。

官方历时近20天下乡强收，到八月底共收回11000余本。这本“奇书”在井冈山下的广大农村游历一圈以后，又回到了历史名城南昌，被锁入仓库。

一个省对一本宣传中央政策、法令的书进行如此围剿，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从未出现过的荒唐之举，当然引起了众多媒体的关注。《南方周末》于10月12日，以《一本奇书的奇遇》为题，全面报道了《手册》从策划到查封到桂晓琦被撤职的全过程；湖南卫视《有话好说》请桂晓琦做嘉宾，向全国观众讲述了“奇书奇遇”；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连续一个星期对“奇书奇遇”进行了系列报道，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10月12日《南方周末》在头版位置，刊登了李昌平应该给农民以国民

待遇的呼吁，全国多家媒体转载，使农民的国民待遇问题，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等等。非常遗憾的是，笔者没有在任何媒体上看到那里的地方政府和大小官员对《手册》宣传中央政策的正面评价，也没有看到官方对基层政府强行围剿宣传中央政策法令的错误行为进行批评。在这类地方，宣传中央政府的政策法令，被视为非法，遭到打击围剿；党中央和中央政府的政策法令，被肩负宣传、贯彻落实重任的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视同洪水猛兽而大加挞伐，党中央和中央政府的政策法令还能贯彻落实吗？中国农民日益加重的负担，还能按照中央政府的政策规定真正减下来吗？人们有理由问：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地方政府的责任到底是贯彻落实中央政府的政策法令，还是封锁、抵制、围剿中央政府的政策法令？如果中央政府的政策法令被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视为“异端邪说”而剿杀，中央政府的政策法令还能贯彻落实吗？

第五章 中国的耕地能养活中国人吗？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用只占世界 7% 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 22% 的人口。这无疑是一个奇迹。但解放初期中国只有 5.4 亿多人口，到改革开放前的 1979 年，中国也只有 9.7 亿多人口。随着人口的与日俱增，今天我国已突破 13 亿人口，到 2030 年，我国人口将达到 16 亿，中国的耕地还能养活中国人吗？这不仅已经成为世界关注的问题，也是中国自己必须认真考虑和对待的问题。

第一节 中国到底有多少耕地

一个国家拥有多少国土，国土上有多少可以生产粮食的耕地，无疑是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搞清楚的问题。如果连这样基本的也是重要的家底都没有搞清楚，怎么能对国家的经济发展作出正确的决策呢？

长期以来，我国的耕地面积一直沿用 1957 年公布的 17 亿亩，这个数字应该比较准确。一是因为土地改革时，是按人分田，这是对我国耕地的一次大清理；二是土改后接着搞查田定产，对每一坵田、每一块地都进行了具体的丈量，并立牌公示。1949 年至 1957 年由于当时的农民开垦了大批以前的荒地，我国耕地增加 2.09 亿亩，全国人均耕地达到 2.6 亩。1978 年国家公布的数字全国共有耕地 14.91 亿亩；1988 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是，截至 1988 年年底全国耕地面积为 14.36 亿亩，比

1978年减少5500万亩，当时全国共9.5亿人口，人均不足1.5亩。

但是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的耕地面积开始众说纷纭，令人莫衷一是。

1994年3月18日《信息周报》报道，“中国现有耕地超过19亿亩，而非人们习惯说的14亿多亩或15亿亩，这是正在进行的全国土地利用状况调查的最新数字。”

仅仅过了4个多月后的1994年7月27日《经济参考报》则报道，全国人大代表、前国家土地管理部部长王先进，“不辞劳苦，在全国各地奔波，就土地资源骤减、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进行深入调查后”，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了一份令人惊醒的报告”，列举了一组土地资源骤减的数字——“我国现有耕地14.3亿亩，人均耕地1.2亩，全国已有三分之一的省、市人均耕地不足1亩”（见1994年7月27日《经济参考报》）。三个月后的耕地面积相差4.7亿亩。

1995年3月9日《新华每日电讯》报道，我国960万平方公里国土如果折合成亩，约合144亿亩。在144亿亩国土中人均耕地仅1.2亩。

1995年《新华每日电讯》的报道，和前国土资源部部长王先进的调查一样，我国人均耕地都是1.2亩。

1995年第12期《瞭望》报道，按“国家土地局重新调查的1.25亿公顷（耕地）计算，我国人均耕地不过0.1公顷，即1.5亩（26AP26）。

1995年《新华每日电讯》的报道，和大约3个月后的《瞭望》第12期（6月出版）的报道，人均相差0.3亩，按10亿人口计算，全国多了3000万亩耕地。

1997年4月26日《农民日报》报道，由于开发区的热度不断增高及其他一些原因，我国耕地面积在保持了两年的基本稳定以后再度骤减，据各地上报耕地面积总汇，去年（1996年）共减少耕地1131万亩，比上年（1995年）多减少376万亩，

人均耕地面积降至 1.22 亩。这就是说在 1996 年减少 1131 万亩耕地后，反而比 1995 年人均耕地面积多了 0.02 亩。

1998 年 5 月 14 日《法制日报》报道，1996 年底，“我国耕地统计数为 14.32 亿亩，人均耕地 1.17 亩，不到世界人均耕地 3.75 亩的三分之一”。该报道还列出了一组详细数据——1986 年至 1995 年各项建设占地、农业结构调整以及灾毁等造成减少耕地 1.0266 亿亩，开垦荒地 7368 万亩，耕地净减 2899 万亩（土二 P52），堪称言之凿凿。

1999 年出版的《新中国 50 年统计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显示，到 1978 年底，我国共有耕地 99,389,300 公顷，合 1,490,839,500 亩，人均耕地 1.57 亩。

在笔者看来，以上各个数据虽然有些差别，但相差并不悬殊，可以视为比较准确。

谁知此后的数字，突然大相庭径，实在叫人摸不着头脑。

最有意思的是《科技日报》的报道。1993 年 2 月 10 日《科技日报》以《首次披露我国耕地资源家底》为题报道：“我国现有耕地约 20 亿亩，其中高产耕地 42827 万亩，中产耕地 74011 万亩，低产耕地 81940 万亩”，突然多出 5 亿多亩耕地，与原来公布的 14.3 亿亩，多出了将近 40%；同是这家《科技日报》到了 1995 年 5 月 2 日的报道则说：“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测算，1995 年 2 月 14 日中国人口（不含台港澳地区）达到 12 亿，到 2000 年我国人口将突破 13.5 亿，我国土地对人口的合理承载力为 8 亿，最大理论承载量为 15—16 亿。目前我国人均耕地已下降至 1.2 亩，即全国 14.4 亿亩。中国的耕地一下又减少了 5.6 亿亩。

到了 1996 年，国家公布的第一次土地调查结果是，全国耕地 19.5 亿亩。一下又多了 5.1 亿亩。

同样有趣的事，发生在《人民日报》。

2005 年 3 月 10 日《人民日报》报道：“2004 年我国耕地

减少量为 1422 万亩，全国耕地面积由 2003 年 10 月底的 18.51 亿亩，降为 2004 年底的 18.37 亿亩，人均耕地面积由 1.43 亩降为 1.41 亩”。仅仅过了 7 个月，2005 年 10 月 24 日《人民日报》的报道又说：“由于一些地方保护力度不够和违法占地现象较为严重，我国目前基本农田已不足 16 亿亩”，一下又减少了 2.37 亿亩。

到了 2011 年，《21 世纪经济报道》于 10 月 26 日的报道又说，“全国第二次土地调查和一年一度的变更调查发现，从 2005 年到 2010 年，全国实际耕地面积为 20.26 亿亩，较 2008 年全国土地变更调查数据（18.28 亿亩）耕地面积多出近 2 亿亩”。

2013 年 12 月 30 日，国土资源部副部长王世元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布，截至 2012 年，全国耕地数据为 20.27 亿亩（引自 2013 年 12 月 31 日《第一财经日报》）。

由中国如此众多重要媒体甚至是代表国家的权威媒体和权威官员披露，报道中国权威机构提供的中国耕地面积的众多数据中，最低和最高竟相差 6 亿亩，让人们看到的中国耕地面积数据，仿佛是一个变幻莫测的魔方。

此中特别是作为中国最权威、最高级别的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在 2005 年 3 月 10 日报道的数据是我国耕地面积为 18.51 亿亩，仅仅过了 7 个月，10 月 24 日报道的中国耕地面积又变成了不足 16 亿亩，一下减少了 2.5 亿亩，到了 2008 年全国土地变更调查数据又变成了 18.28 亿亩耕地，即在 3 年年内突然又增加了 2.8 亿亩，到了 2011 年又比 2005 年增加了 6 亿亩，比 2008 年增加了将近 4 亿亩，变成了 20.28 亿亩。

1988 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是，在 1978 年至 1988 年的 11 年间，全国耕地从 14.91 亿亩，减少到 14.36 亿亩，平均每年减少 550 万亩。自从 1992 年在全国掀起大办开发区高潮开始，在全国出现了一个历久不衰的乱批滥占耕地的狂潮，有时一年就减少 1000 多万亩耕地（比如 2005 年 3 月 10 日《人民日报》

报道，2004 年我国耕地减少量为 1422 万亩），处于土地财政状况的地方政府，为了大搞开发乱批滥占耕地越来越多，而我国有限的耕地不是越来越少，而是几亿亩几亿亩的增加，我们的统计部门和国土部门这许多前后矛盾的数据是怎么来的？

这些年“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现象非常普遍。有的地方官员为了“制造政绩”，弄虚作假的胆量已经大得惊人。原丹江市委书记张二江，居然敢将全市国民生产总值 38.2 亿元，上报时说成 82.6 亿元，其中的水分超过了实有产值的 116%，就是一个典型。处于“土地财政状况”的地方政府，一个时期以来，往往靠卖地运转，他们每年卖了多少土地，占了多少耕地，上报的数字是多少，和实际数字相差多大，谁也难以准确估计。

1991 年—1994 年，地方应报国务院审批的建设用地项目为 1080 起，但实际上只报了 202 起，瞒报了 81.3%。国家土地局在调查耕地保护情况时，运用卫星遥感技术监测一些重点地区的建设用地情况，通过卫星图片解读，发现某市有一个开发区规模甚大，问及该开发区的占地面积，当地领导回答：2000 亩。但在同一张卫星图片上，该市的飞机场远远小于这个开发区，而一座飞机场通常占地都不会低于 3000 亩。面对卫星图片，那位当地主管领导才不得不承认，开发区实际占地 9000 多亩，瞒报了将近 80%。这两个 80%，让我们看到的是，地方政府在土地问题上，上报的数据误差高达 80%，还有什么真实性而言呢？

1995 年国家土地局副局长李元，奉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之命，乘直升飞机考察耕地侵占情况后，根据拍摄的大量照片、录像和卫星图片数据，联合北京师大、首都师大、北京农大等高等学府的技术人员，制作了 17 个地区和城市的耕地监测图，结果令人大吃一惊——耕地实际损失超过统计数字的 2.5 倍。连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看了 17 个展板的图片资料，听了国土部领导结合卫星图片介绍耕地大量被占用情况后，也惊

叹：“不听不知道，一听吓一跳！”（见1997年5月26日《特区文摘报》转自《中国土地报》土五P1）。

多年来，我们不断呼喊：一定要保住18亿亩的红线。但是，我们却连到底有多少耕地都没有搞清楚，拿什么去保住18亿亩耕地的红线呢？如果我们连国家到底有多少耕地，这个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家底都没有搞清楚，怎么能对国家经济发展作出正确的决策？

第二节 频频敲响的耕地警钟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而且是一个人多耕地少的农业大国。据1985年一份资料显示，全球耕地面积210多亿亩，中国的耕地面积仅占全球耕地面积的7%，而人口超过20%。世界各国人均耕地面积中澳大利亚46亩，加拿大28亩，阿根廷14亩，美国13亩，印度3.6亩，菲律宾2.5亩，荷兰1.9亩，德国、英国1.8亩，而中国的耕地面积不过14.3亿亩，人均1.2亩。面对这样一种状况，珍惜我们的耕地，就显得格外重要。然而，我们对土地的珍惜程度，却实在令人难以理解。

自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在全国开展合作化以后，在很多地方就在大量开垦荒地的同时，开始搞耕地垵块合并，这既是合作社便于耕种，便于管理，也是为农民盼望的“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的机械化耕地做准备。而且因为在垵块合并中铲除了大量田埂，增加了耕地面积，可以多打粮食，堪称一举多得，利国利民。

1. 包产到户毁了2200万亩耕地？

1979年以后，我国在农村全面推行包产到户，在广大农村便出现了一种与当年合作社、人民公社搞垵块合并相反的局面。由于耕地有肥有瘦，距家有远有近，水利灌溉条件有好有坏，人们不得不将大垵大块的耕地，再分割成小垵小块进行分配，

人为地设置了大量田埂，占去了不少耕地。特别是华北、东北等平原地区，平展展的耕地一望无际，为了分田到户，不得不分割成面条似的小块，人为地垒起数不胜数的田埂，从而大大减少了耕地面积，即使在山区、丘陵区，坵块本来就小，因为包产到户损毁的耕地也不可小觑。

湖南省邵阳市高崇山乡短陂村党支部书记傅如斌曾就他们村分田到户的情况算了一笔账——

我们村有水田 828 亩，实行包产责任制前只有 1889 坵，平均每坵 0.44 亩。实行包产责任制后，全村水田变成了 2326 坵，增加了 437 坵，平均每坵减少到 0.35 亩，光增加的田埂就占用水田面积 10 多亩。

邵阳地处湘西，属山区和丘陵区，坵块本来就小，尚且因为实行包产责任制，一个村仅垒起的田埂就占用水田 10 多亩，按村支书傅如斌提供的数据计算，即占去水田面积的 0.015，而在诸如华北、东北等大平原，一马平川，分割成面条似的小块后，垒起的田埂所占耕地面积的比重自然更大得多。我们姑且以邵阳市高崇山乡短陂村的占地比例，按《新中国 50 年统计资料》所显示的，1978 年底全国共有耕地 1,490,839,500 亩计算，因为实行包产责任制，全国至少就减少了 2236 万亩耕地 ($1,490,839,500 \times 0.015$)。这对于我们这个人口多、耕地少的国家，无疑是一个触目惊心的数字。

2. 地方政府在开发热中卖地敛财

中国继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掀起疯狂的经商热之后，九十年代又掀起了一个更大规模的开发区热。从中央到省、市、县、区，都在大办开发区。搞不搞开发区，成了搞不搞改革的一个标志。当时全国 500 多个城市（包括县级市），拥有数千个开发区，有的媒体报道至少有上万个开发区。一些“先知先觉”的人们，立即看到了被称为“财富之母”的土地上蕴藏着巨大的经济效益，便开始疯狂圈地。不少地方政府为利益所驱动，更是胆大

妄为，越权批地，多头批地，下放土地审批权，上下连手层层批地，少批多占，不批乱占，化整为零大批土地，以致违法乱纪的圈地热潮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国家搞开发区，省里、市里搞开发区，县里搞开发区，乡（镇）也搞开发区，有的地方连村组都搞开发区，开发区简直像疯狂蔓延的野火，迅速在全国燎原。

由于开发区都是以城市为依托，再向四周扩张，就连乡镇开发区也是选在交通便利、条件良好的地段，都是把最好的良田拿来搞开发，以此吸引外商，当时开发圈地几乎全是占用良田。

当经商热风起云涌之时，中国官场出现了所谓的“吃饭财政”，即地方政府口袋里的钱，只够给官员们发工资，甚至连给官员们发工资都不够，不得不给官员们、教师们“打白条”，根本没钱办事。于是，在全国出现了一个大卖国有企业的热潮，靠卖国有企业维持地方政府的运转。开发热出现后，中国官场又冒出了所谓“土地财政”，即地方政府只能靠卖土地才能维持正常运转。有关资料显示，1992年前，在土地出让开发地区，卖土地的收入占财政收入的25%，四分天下有其一；有的年份甚至占到80%，十分天下有其八，甚至更多。比如，在被誉为“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苏州市吴中区，从2001年至2005年地方财政的实际收入为60.96亿元，而土地拍卖就高达56.43亿元，占92.57%（引自2009年5月15日《21世纪经济报道》）。这样的地方政府如果不卖土地还能运转吗？

一方面是一些地方政府离开卖地就难以运转，他们必须卖土地；另一方面是地方政府通过卖土地可以大肆敛财自肥。比如，土地拍卖年收入占到地方财政实际收入92.57%的苏州市吴中区，每亩土地的拍卖价为118.5万元，而他们转入土地基金账户，用于失地农民补偿和安置等开支的钱，每亩仅有区区3.8万元，只占3.2%（引自2009年5月15日《21世纪经济报

道》），地方政府拿走了 96.8%。诸如吴中区这样以地生财的现象并不少见。湖北襄荆高速公路荆州路段农民的安置补偿金是每亩 500 元，仅为法定最低标准 4800 元的 10.4%；浙江省上虞市在 2000 年的土地出让收入达 2.19 亿元，可付给农民的征地补偿仅仅 591 万元，只占 2.7%，而且少得如此可怜至极的一点补偿，还被层层克扣，根本到不了农民手里。有人说这是政府抢农民的地卖钱。这话有点难听，但事实却触目惊心。有人用国土资源部的最保守统计算了一笔账——从 1987—2001 年，全国非农建设占用耕地 3300 多万亩，其中 70% 是政府用行政手段征占土地，只以每亩地的最终价值为 10 万元计（这当然是一个大大缩小了的数字），以农民分得 10% 计，那么 20 年间农民最少丧失了 3 万亿元土地增值收入（见 2004 年第 19 期《瞭望》）；而据 2004 年 4 月 14 日《青年参考》报道，据有关专家测算，地方政府通过各种形式征用耕地的价格“剪刀差”，至少从农民身上拿走了 5 万亿元，以赚取土地差价推动的城镇化，使农民利益严重受损。据新华社报道，“过去几十年来，在这一运动中的土地差价，保守估计在 30 万亿元左右”（引自 2013 年 4 月 2 日《生活文摘报》）。如此巨额利益的丧失，能说政府不是在严重剥夺农民吗？

土地是升值的，地方政府当然很清楚土地升值的巨大空间，因此一些地方政府强征农民土地后，大搞“囤地生财”。

桂林市国土局就是一个典型。

从 2006 年 12 月至 2007 年 7 月，桂林市国土局以“城市发展的需要为由，先后从桂林市七星区彭家岭村和黄莺村征收耕地 946 亩。征地时，桂林市国土局“把村民组长和村民代表关到一个房间里”，给每人支付 5000 元奖金，让他们签字。至于土地的价格，国土局说，“政府出公告了，15.2 万元一亩，没得谈”。但是村里超过一半的村民，不能接受 15.2 万元一亩的低价。桂林市七星区政府于是又作出帮村里修路、通自来水、

给村集体征地工作经费等等承诺。通过这种“连哄带骗”，桂林市国土局土地储备交易管理中心，硬是以每亩 15.2 万元的低价，把村里的土地征走了。但这些土地并没有推向市场，而是被国土局土地储备交易中心囤积起来，直至 3 年后的 2010 年 9 月，这 946 亩耕地中的 396 亩耕地，才被切割成三宗土地出让，总共拍得 10.51 亿元，每亩合 264 万元，比征收农民耕地时涨了 17 倍多。地方政府部门如此“连哄带骗”强征农民农田敛财，能说不是掠夺农民吗？

尤其令人气愤的是，在 2010 年 9 月拍卖的三宗土地中，桂林市国土局勘测站出具的“红线图”中，居然把其中 50.6 亩没有办理任何征地手续的农地，也盗卖了（引自 2011 年 5 月 20 日《经济观察报》）。

国土局本是包括耕地在内的国有土地的保护神，而今为了部门利益，却堕落到了公然强征和盗卖农民耕地的地步，包括耕地在内的中国土地还有谁保护呢？

土地成了政府创收的主要对象，成了政府部门分而食之的“唐僧肉”，其获利之丰厚令人咋舌。据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研究院研究员管清友在 2011 年 9 月披露，1989 年至 2010 年的 21 年间，中国土地成交价款增长了 6732 倍，而卖地收入相当于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涨幅也超过了 300 倍。这就是说，地方政府卖土地价款收入平均每年增长了 320.57 倍，卖地收入在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平均每年增长了 14.29 倍。

从土地成交价款来看，1989 年为 4.47 亿元；1991 年为 101.87 亿元。自从邓小平 1992 年南巡讲话发表后的 10 年以来，这一数字便扶摇直上，一路飙升，2010 年达到令人吃惊的 30108.93 亿元，即 21 年间增长了 6732 倍。与卖地收入同步增长的是地方财政收入。1989 年地方财政收入总额为 1842.38 亿元，但从 2004 年开始突破万亿，到了 2010 年地方财政总收入已创造了 40613.04 亿元的奇迹。随着卖地收入和地方收入

的双双腾飞，卖地收入在地方财政收入中的比重也持续上涨，到 2010 年卖地收入已占到地方财政收入的 74.14%，相比 1989 年增长了 30.8 倍。（引自 2011 年 9 月 29 日《华商报》土六 P13）。土地财源如此滚滚流入地方政府的钱柜，地方政府的卖地积极性还能不高吗？但是，老百姓担忧的是：“卖了工厂卖资源，卖完资源卖土地，卖完土地卖什么？”一旦土地卖完了，没了土地收入，地方政府还能靠卖什么运转吗？

3. 愈演愈烈的土地违法案

因为卖地不需要任何成本，是一种“无本万利”的买卖，而地方政府手中有权，利用权力就能轻而易举把农民的土地据为己有，让它变成哗哗流淌的白银。于是，全国各地政府竞相卖地的热潮便一浪高过一浪。据媒体报道，2001 年，全国拍卖土地收入为 9100 亿元；到 2007 年已突破 10000 亿元，2008 年达到了 15000 亿元，2009 年底已飙升到了 27000 亿元，2010 年达到 30108.93 亿元，2012 年突破 4.1 万亿元，地方政府靠卖土地的收益之丰厚，由此可见一斑。

那么，如此一路扶摇直上的土地拍卖金，地方政府是如何获得的呢？我们且看看下面两组数字——

A.2003 年，全国共查处土地违法案件 168,000 起，与 2000 年相比，翻了 2 倍。按当时全国 2400 多个县（市）平均，等于每个县（市）在 2003 年发生的土地违法案达 70 多起；按全年 250 个工作日计算，全国平均每天发生土地违法案 672 起。而此前发生的土地违法案更是令人惊心动魄。1996 年，国家土地局对非农业建设用地组织的一次清查中，发现违法用地 32 万多起（见 1997 年 7 月 24 日《中国土地报》土二 P23）；而 1998 年 7 月结束的中国非农业建设用地的清查结果表明，共查处违法行为 380 多万件（引自 1998 年 7 月 10 日《房地产报》土二 P57），全国平均每个工作日发生 15200 起，平均每小时发生 163 起土地违法案。一个国家的地方官员制造的土地违法

案已经胆大妄为到了如此登峰造极的地步，中央政府的政策法规简直对他们已经毫无约束。

B. 据国家土地资源部专职副总督查甘藏青在 2007 年 7 月披露，从涉及违法用地面积来看，非法批地案件占到土地涉及面积的 80%，地方政府主导的违法用地占 80%。这两个 80%，实在令人怵目惊心。地方政府作为地方土地执法的主体，肩负着土地保护的重任，在利益的驱动下，地方政府在甩卖国有土地的交易中，居然不顾国家民族利益，变成了土地违法案件的“主体”，这大概也是改革开放以后的新生事物吧。

我们再看看如此浩大的土地违法案，是如何处理的吧。

中国国土资源部历史上时间最集中、参与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集中土地执法“百日行动”中，共立案 26000 多起，其中只有 300 余人被追究刑事责任，仅占不到 0.01%。

2006 年全国共发生土地违法案 131077 起，共给予相关人员行政处分的 1051 人，给予党纪处分的 2041 人，给予刑事处罚的 501 人，按以上数据平均每 261.6 起土地违法案，才有 1 人受到刑事处罚；违法土地共 10 万公顷（其中耕地 4.3 万公顷），即平均每 199.6 公顷违法土地才有 1 人受到刑事处罚，超过 96% 的土地违法案没有追究刑事责任，追究刑事责任的比例仅占不到 0.004%。

2003 年查处土地违法案 16.8 万起，仅有 678 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94 人追究刑事责任，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比例，不到 0.5%，而追究刑事责任的比例，仅占万分之五点六，这种比例，在数学上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国家对土地违法案件的处理如此“宽宏大量”，在客观上就造成了对土地违法的默认乃至纵容，地方官员们任意处置土地的胆子必然越来越大。据《瞭望》杂志披露，胶东某县县委书记居然胆大到在海边划出 100 亩土地，赠给国内的歌星、笑星、影星、节目主持人，让他们在那里建别墅。而且，此风一刮，

很快就从山东蔓延到了河北等地。一个七品芝麻官，就敢把国家的土地，当做私人礼物送人，中国的土地管理还能不乱吗？

4. 招商成了“招荒”

当开发成为地方政府一种重要的创收手段以后，在全国各地便出现了这样一种新景观——只要你到各地走一走，都不难看到大片大片的耕地被抛荒的现象。但是，抛荒到底有多严重，一般人恐怕难以想象。

据1995年10月16日《新闻报》披露，我国房地产开发申请批准的土地为18000平方公里，其中真正开发建设的仅有300平方公里，仅为1.67%，连2%都不到。也就是说，被地方政府拍卖的、开发商圈走的18000平方公里土地中，98%以上的土地都被抛荒。因此，人们说“招商”成了“招荒”。

河北省清河县葛仙庄村，是清河县城所在地，全村原有耕地3000多亩，自从“圈地热”出现后，清河县在几年间就占去该村2000多亩耕地，只剩下可怜兮兮的700亩“保命田”。1993年葛仙庄村的村官研究决定，再在剩下的700亩“保命田”里通过招商，建一个汽车摩托车配件城。但在汽摩城还八字没一撇，村官们就决定撤去电机，切断村里的电源，由此造成“保命田”撂荒。1996年汽摩配件城方案出台，但征地手续还没办，村官们就将700亩“保命田”以每亩1680元的价格，从农民手中强行收走。1997年国务院下文冻结一切非农用地，汽摩城被迫搁浅。700亩“保命田”也就成了一片荒地。农村改革以后，不知谁赋予了村官们如此权力，他们居然一句话就敢把农民的“保命田”变成一片荒地。保命田都没有了，农民用什么保命呢？如此招商岂不是祸国殃民吗？到底该谁管呢？

众所周知，土地都在增值。不少开发商之所以大肆圈地，其目的就是为着土地最大限度增值，于是圈占农民土地后普遍采取闲置土地坐等涨价。香港富豪李嘉诚父子，仅在北京、上海囤占的2块土地，闲置3年，就赚了30个亿。广州54宗“涉

案”土地至2010年闲置10年，增值达几十倍至一百多倍；泛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京繁华地段购置的4块土地，闲置6年，此期间，开发商仅靠坐收土地和房产自然增值的利润，就超过200亿元。（引自2010年8月7日《潇湘晨报》）

2010年8月19日，国土资源部通报房地产用地专项整治情况，截至5月底，全国仅各地上报的违法违规用地即达3070宗，面积共18.84万亩，其中闲置土地案2815宗，占91.17%；面积为16.95万亩，占89.97%。这就清楚地再次告诉人们，地方政府和开发商联手违规圈占土地后，绝大部分用于闲置坐等升值。据潘石屹对中国9家上市公司2008年年报公布的数据，土地储蓄数据和同年建成的建筑面积数据进行测算，发现最高一家上市公司储蓄的土地可使用151年，最低的也够开发20年。由此可见，开发商圈占土地后抛荒坐等升值的现象是多么严重。

由于囤积土地有着外人难以想象的丰厚利润，于是，在中国便催生了大批专门从事倒卖土地的土地贩子。据业内人士测算，在中国的48000多家开发商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开发商（即超过15000家以上的开发商）根本不开发房地产，而是专做炒卖土地生意。正是他们和地方政府官员联手炒地，使如火如荼的圈地热潮不断高涨。比如，1992年，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强力推动下，仅仅一个小小的北海市，一下就像春笋般冒出了各种圈地、炒地公司4000多家，全国30多个省、市、自治区和中央60多个部委，在北海设立的办事处就有49家，那时在北海根本不是炒土地，而是炒“红线图”。一些有权有门路的人物，刚办完手续的“红线图”，不等走出市政府大院，就会被早已等候在那里的买家一拥而上买走。当时涌入北海的资金，国内超过70亿元，外资不少于40亿美元。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在北海市造成的这种疯狂至极的炒地狂潮，完全是全国30多个省、市、自治区和60多个中央部委带头炒起来的。此中的主要动力，就是利益。

基层政府自然不甘落后，他们的办法是挥起权杖大搞违规圈地，对农民进行掠夺。河北省香河县就是一个违规圈地的典型。自 2008 年以来香河县打着“城乡统筹”、“建设新农村”等旗号，通过“以租代征”等形式，大规模圈占农民耕地。不少农民被迫与政府签订所谓“农地流转合同”。政府将土地拿到手里以后，随即以土地获取暴利。当地农民算了一笔账——地方政府拿到农民的土地后，以每亩 60 万元的价格，转手卖给开发商，我们只按目前（2011 年 5 月）3.25% 的基准利率计算，60 万元一年的定期存款利息为 19500 元，而政府给予农民的补偿仅仅每亩 1200 元，这就是说，政府圈占农民的土地以后，农民所得到的补偿，仅仅相当于政府圈地变现以后一年利息收入的 6%。而入驻香河县 30 家知名房地产企业的投资就超过 1000 亿元（见 2011 年 6 月 3 日《文摘周刊》），他们圈占了农民多少土地，政府从中可以获得多少利润，大概是一个天文数字。

如此肆意圈占农民土地，如此残酷掠夺农民，在中国历史上大概不曾出现过。

有关资料显示，1998 年至 2007 年 10 年间，全国土地流转平均每年递增 14%，2008 年全国土地流转猛增 70%，2009 年再增 50%，截至 2011 年 5 月，在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的联手推动下，全国已累计流转耕地 1.7 亿亩，超过全国承包耕地的 12%（引自 2011 年 6 月 3 日《文摘周刊》）。

当今中国的很多官员，对钱的追求已经膨胀到疯狂的地步，而圈地则是敛财最快的途径。因此，不少人一直在土地上大做“钱”文章。早在新世纪初，全国的 500 多个大大小小的城市中，就有 183 个城市的政府要建成国际大都市，而据各省（区）向国务院申报的计划和人均标准建设用地计算，他们规划的我国城市人口容量，早在 2004 年以前的规划，就已经达到 33 亿人口的规模。也就是说，按地方政府向国务院申报的城市规划，

可以安排当时全世界 60 亿人口中的一半以上，都住到中国的城市里来。（见 2005 年 7 月 16 日《中国财经报》）。

无论从国家财力、物力，还是从国家需要或现实可能来看，地方政府编造出来的这种“规划”，都只能是盲目到无知的国际玩笑。其结果除了使招商变成“招荒”，还能是什么呢？

5. 我们损毁了多少土地？

要准确地统计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到底减少了多少耕地，肯定比要准确统计我国到底有多少耕地更难。笔者只能根据国家公开媒体报道的一些数据进行推算。

1989 年 7 月 2 日《经济参考》报道，1988 年底全国耕地面积为 14.36 亿亩，比 1978 年减少 5500 万亩，平均每年减少 550 万亩。平均递减 0.4%，十年抹掉一个山西省的耕地。而十年间我国人口由 9.63 亿，增加到 10.96 亿。相当于增加一个四川省和上海市的人口。据《人民日报》报道，1996 年至 2004 年，全国耕地净减 1.14 亿亩，其中 2003 年一年就减少耕地 3800 万亩（引自《中国青年报》2004 年 2 月 15 日）

2006 年 5 月 12 日《生活文摘报》报道，“十五”期间 5 年间，全国耕地净减 9240 万亩，平均每年减少 1848 万亩

以上数据告诉我们，从 1978——1998 年平均每年减少 550 万亩耕地；1986——1995 年平均每年减少耕地 740 万亩；1996——2004 年平均每年减少耕地 1425 万亩，而“十五”期间平均每年减少耕地 1848 万亩。我们且以平均每年减少耕地最少的 1978——1988 年平均每年减少耕地 550 万亩计算，那么从 1978——2010 年的 32 年间，我国就至少已减少耕地 1.76 亿亩。如果我们以国家公布的 1978 年全国共有耕地面积为 14.91 亿亩计算，则到了 2010 年底，我国拥有的耕地面积仅有 13.15 亿亩，平均每人不足 1 亩耕地。

以上说的是明里减少的耕地。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我国隐性耕地的减少也相当惊人。

我国东南沿海农区，许多熟田每亩一年可产一千多斤至成吨粮食，而西部干旱半干旱地区，一亩地一年能产的粮食只有100多斤。在内蒙古，小麦都是一年一熟，亩产平均150斤左右，最高产量也不过200斤，而南方的吨粮田，年产量是内蒙古耕地的10倍。这就意味着，内蒙古虽然人均还拥有3.5亩耕地，几乎是全国人均耕地的3倍，但只不过相当于农业高产区人均拥有的0.35亩耕地的粮食产量。因此，在南方减少一亩吨粮田，比北方减少10亩低产田减少的粮食还多。据媒体报道，仅“八五”期间我国南方各省减少的水稻田即达4000多万亩，每年至少减少稻谷150亿公斤，这个数字相当于当时全球一年的大米贸易量。丧失这4000万亩气温、水肥条件很好的水田，比丧失上亿亩低产田的损失更大。我国的优质高产田，主要集中在中南沿海地区，而中南沿海地区则正是开发最早最热而且持续时间最长的地方，因而占用耕地自然也是最多的地区。以福建为例。据1994年5月20日《经济参考报》报道，福建各类开发区中占用耕地的比例平均高达65.5%，有的沿海地区甚至高达80%。许多地区“开而不发”，造成大量耕地撂荒。“八五”以后，我国到底减少了多少高产田，笔者手头没有具体数字，但可以肯定，一定是一个令人惊叹的数据。

第三节 农民的“命根子”想夺就夺？

土地历来被农民视为“命根子”。但是，自从农村实行土地承包制以后，随着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权利的不断膨胀，随着官场腐败的日益加剧，随着土地财政的愈演愈烈，土地这个农民的“命根子”，往往成了地方政府和官员们随意掠夺的玩具。

辽宁省辽阳市灯塔县沈旦镇后古村很多从未离开过土地半步、地地道道的庄稼人，在土地承包过程中，他们承包的土地就被任意占有。

后古村共有耕地 5028 亩，2100 多口人，在 1983 年全国大搞联产承包责任制时，人人分到了一份土地。可是到了 1993 年，村官们竟擅自决定，将村里的土地全部收回，说是要“重新承包”。最后的结果却是，大部分土地都包给了少数几个人，全村仅有 28 人得到了“口粮田”。

村支书成了全村土地的主宰。他“说包给谁就包给谁，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有的连合同都不签”。抢手的水田被极少数人大面积承包，每亩只收 40 元，而农民承包的“口粮田”和旱地，每亩却要收一百二三十元。村里的耕地，完全成了村支书和少数人之间的私人交易。而且，在不少农民还没有醒过神来的时候，全村的 5000 多亩耕地，已被村支书分得精光。

村里耕地被少数人抓到了手里，绝大多数农民无地可种。有的人不得不向外村租种土地，有的人被迫出高价从村里承包了大片土地的人手里二手承租土地。在后古村，通过所谓承包制，全村土地实际上成了村支书的私产，他想给谁就给谁（参见 1994 年 5 月 27 日《辽宁日报》23P57）。

一个 2100 多人的村庄，只有 28 人分到“口粮田”。对于农民来说，失去土地就等于失去生计。在后古村占 98% 以上的农民因土地被村支书剥夺，实际丧失了生计。可见农村改革后一个小小的村支书拥有何等可怕的权利，凭着这种权利对农民的掠夺是何等的残酷。完全可以说，这里已经成了村支书个人的天下。

黑龙江省桦川县苏家甸镇朱家村，全村 350 户农民，1983 年第一轮承包时，就有 9674.6 亩耕地没有列入承包范围，成为事实上的机动田，加上公开的 700 多亩机动田，占了全村 21900 多亩耕地的 50%。这些属于村民集体共有的耕地，在大包干后全是村支书、村主任、村会计三人暗箱操作，由个别村官发包。发包的田亩数量、价格、年限、续包情况、钱款总数及其去向，村民一概不知。也即是说，村里近半耕地成了村官

们的私产（见 2004 年 3 月 31 日《新华每日电讯》）。

诸如此类事例，各地屡见不鲜。

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强占农民的土地，则几乎到了为所欲为、无法无天的地步。1994 年 12 月 12 日，安徽省界首市环境卫生管理处，没办任何征地报批手续，就和该市小郭寨村的头头签下了以每亩 15.5 万元的价格，征用 23.95 亩耕地建垃圾场的协议。两天后的 12 月 14 日，界首市建委以建苗圃为由，同样是在没有办理任何征地手续的情况下，与西城办事处主任王子臣、书记牛凤仪等人决定，以每亩 5000 元征用的价格，征用小郭寨村 100 亩耕地；5 个多月后的 1995 年 5 月 10 日，界首市宝兰实业公司还是在没有办理任何手续的情况下，和王子臣等人商定，又在小郭寨村围起了 60 亩耕地，用于建公墓。

这些被政府部门强占的耕地，都已承包给农民。承包期限自 1994 年 5 月 10 日至 2024 年 5 月 10 日，共 30 年。但是刚刚承包几个月，就被政府部门掠夺。38 岁的农民郭继良面对这种无理强占农民耕地的霸道行为，手捧《耕地承包合同》，呼天抢地地悲喊：“难道这是一张废纸？！”

郭继东、尹从忠等胆大一些的农民，跑到界首市政府上访，要求归还土地。没料想，却遭到一名副市长的叱责：“你们村群众就是见地亲！即使没地，捡破烂也比种地强！”

这就是一位政府副市长，对“保命田”被政府强占后要求归还土地的农民的回答！

副市长是这个德性，下面的政府部门自然也不含糊。他们强占了农民的“保命田”，征地费却不给农民，而是被“有关部门挪用开支了”。

历时三年多，小郭寨村先后 30 多位农民到省、市有关部门上访 150 多次，村里的几任村委会主任因农民讨不回耕地愤而辞职或被上级免职，但土地就是讨不回。（参阅 1998 年 11 月 20 日《北京青年报》周刊）

还有一些地方官员们，公然借土地承包之机，把土地当成私有财产，他们想卖就卖，想卖多少钱就卖多少钱，而且不允许农民说话。

河北省蓉城县蓉城镇上坡村实行承包制时，全村共有 1600 多亩耕地，从 1983 年全国农村推行承包制时，上坡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就开始卖地。到 1994 年，全村 1600 多亩耕地，已被村官们卖掉 500 多亩。每亩卖了多少钱，这些钱到哪里去了，农民都不知道。他们对村官们这种违反国家政策法令、剥夺农民利益的做法非常气愤，从 1994 年开始上访告状。没想到上访告状的结果不是对村官们的非法行为作出处理，而是将一位上访村民抓去受审，而审讯的焦点居然是：谁是上访后台。

农民的“命根子”——土地被村官们随意卖了，却连上访都被视为非法，这到底是谁家王法？

1996 年 5—7 月，广西桂林市阳朔县福利镇枫林村 600 多亩“一级基本农田”，被镇政府辟为“鳊鱼基地”，由此导致 54 户农民无地可种。就在村里农民对镇政府强占农民土地进行抗议的过程中，18 位农民被关进县看守所。

还有的地方不仅任意掠夺农民赖以生存的“保命田”，连栖身的家园也被侵占。2001 年 10 月，山东菏泽市开发区都庄村农民都文斗，曾气愤地对《中国商报》记者说：“我们现在没有了耕地，而且也失去了家园。”自从 1993 年成立菏泽开发区到 1997 年为止，都庄村农民的土地，就被征用完了，由此导致 1000 多农民无家可归。

“我们的耕地和家园都是被非法占有的，”村民王干雨告诉记者。在上访过程中，农民们得知，开发区相关部门是采用瞒天过海的手法，利用批其他地区的征地手续，通过偷梁换柱搞征地，而且在强征都庄村耕地的同时，还将都庄村 206 亩村宅也算在内，非法摧毁了他们的家园（引自 2006 年 10 月 31 日《中国商报》）。

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利用权力进行暴力强征农民“保命田”，在今日早已司空见惯。江苏省泰州市高港区五营村的村民就遭遇过这种暴力强征土地。

2007年3月，五营村新华组的村民突然看到一则“告示”，得知自己的耕地莫名其妙被“征收”了，非常气愤的农民匆匆赶到高港区国土分局询问，在农民的强烈要求下，国土局才拿出了几份所谓《征收使用土地协议》、《征收土地协议书》以及苏国土资地函（2004）356号文等资料。

但是，村里农民谁也没有看到任何征地公告、征用土地方案和征地补偿安置方案；而且，根据国家法律规定，征地批文超过两年便自动失效，但高港区政府使用的却是2004年的批文，早已失效，这是明显违法。因此，新华组的农民拒绝交出自己耕种的“保命田”。

2008年10月，高港区居然出动数百人，在五营村新华组50多亩耕地周围，强制搭建围墙，禁止农民耕种自己的土地。

同年10月2日，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新华组的农民一起推倒了部分围墙，进入承包地准备播种小麦。没料想，灾祸就在当晚从天而降。这天凌晨，数百名警员包围了新华组60多户农民的每栋住宅。这些警察们强行破门砸窗，闯入农民家里甚至打人行凶，强行抓走了“很多人”，有的甚至连衣服都不让穿。其中陆吉林和戚邦香随即被高港区法院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处一年六个月有期徒刑。

五营村白杨组农民的遭遇也和新华组类似，耕地被暴力强征，补偿分文未得。

警察抓人事件发生几天后，江苏省江潮房地产开发公司就在土地上竖起了施工牌。该公司的法人代表为冯春桂，此人身兼数职——除了江潮公司法人代表、总经理，还是高港区建设局局长、城管局局长、高港区城投公司总经理，是典型的官商一体化。此人以每平方米1700元价格拿到农民的耕地后，转

手即卖给了另一家地产公司，上市房价每平方米高达 5000 多元。（参阅 2011 年 7 月 5 日《法人》）

仅从以上所述，我们也不难看到，为所欲为的权利对农民的肆意掠夺，对耕地的非法强占，不仅剥夺了农民保卫耕地的权利，也使国家的政策、法令，成为一纸空文，丧失了保护农民、保护国家信誉的能力，这是中国农民不愿意看到的悲剧，难道不也是中国人民不愿看到的国家民族的悲剧吗？

在这样一种大气候下，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在大力推行城市化过程中，不顾国情、省情、县情，以土地“投资”，强制征收农民土地，造就了大批无地可种的农民。

据一份调查资料显示，1999 年——2001 年浙江省征用耕地 57.7 万亩，就造成了 878 万农民失地。另一个资料显示，到 2003 年我国失地农民已达 4000 万之众。他们丧失了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和生存基础，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出现过的“三无农民”——种田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等于剥夺了他们的生存权。

据浙江大学王景新教授对河北、山东、河南、广西、浙江、云南等 11 省（区）134 个县的抽样调查显示，当时分到土地的人口只占 84.5%，据此推算，截至 2002 年全国约有 15% 以上的农民没有土地。而据国土资源部统计，仅 1987 年至 2001 年依法审批的征用土地数，加上违法批地，如果再加上农村超生等原因没有土地的黑户口，中国的失地农民，在 2002 年已超过 6000 万人。（引自 2003 年 12 月 19 日《中国改革报》土五 P24）

大包干 23 年后的 2002 年我国失地农民已达到 6000 万之众，那么 12 年后的今天（2013 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日益加速，这 12 年间，我们又造就了多少“种田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农民”呢？如此巨大的群体丧失了土地这个“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和生存基础”，该如何生活？给社会造成的将会是

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天天高喊公平、公正、依法治国，能这样对待我们的农民兄弟吗？

第四节 日益严重的弃耕抛荒

中国的事情就是怪。一方面是地方政府大肆征收甚至违法违纪强占农民耕地，农民为捍卫自己赖以生存的“保命田”，到处上访、申诉，往往付出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都讨不到公道；另一方面却是政府把田分给了农民，农民却掀起了一波又一波弃耕抛荒的浪潮，使当年稻花飘香的大片大片良田，变成了让人欲哭无泪的大片大片荒草。

自从 1992 年在中国大地上出现史无前例的“开发热”开始，一个空前规模的“圈地运动”立即席卷而来。而“圈地运动”带来的最直接后果，就是使中国农村出现了建国以来从未出现过的大规模农田抛荒。在以大包干闻名的安徽省滁县地区——凤阳县即属滁县地区管辖——大约从 1991、1992 年开始便相继出现了一个令人怵目惊心的弃耕抛荒潮，即第一波农民弃耕抛荒潮。据 1993 年 3 月 19 日《中华工商时报》报道，1992 年滁县地区弃耕不种的农户即达 57200 多户（相当于当时 3100 多个小岗村的农户数），抛荒耕地达 20.11 万亩，（相当于 1978 年 385 个小岗村的耕地），分别比 1991 年增加 4.8 倍和 2 倍。弃耕抛荒农户占全地区总农户的 7.8%，抛荒耕地占全地区耕地总面积的 3.2%。而据安徽省农业经济委员会对该省 16 个县（市）的统计调查，共有 115,300 多家农户将分到的土地弃耕抛荒，抛荒面积达 34.66 万亩。

滁县地区和安徽省这 16 个县（市）农民弃耕抛荒的情况，只是全国农民弃耕抛荒的一个缩影。如此众多的农户弃耕和如此大面积耕地抛荒，无论在滁县、在安徽还是在全国，都是新

中国成立以后没有出现过的“奇闻”，也是包产到户以后在中国农村造就的一道令人扼腕的“风景”。

我国人均耕地仅 1.2 亩，还不到世界人均耕地三分之一。特别是一些人口密集省份，人均耕地已少得可怜。以浙江为例。截至 1993 年，人均耕地仅 0.58 亩，远远低于了联合国规定的人均耕地最低保障线 0.8 亩。该省的播种面积 1992 年为 1502 万亩，到 1994 年减少到 1242 万亩，减少了 260 万亩，全省的粮食总产量也由 1992 年的 311 亿斤，减少到 1994 年的 281 亿斤，一下减少了 30 亿斤，如果以每人每年消费 800 斤计算，等于使 375 万人失去了口粮，使这个昔日江南水乡鱼米飘香的产粮大省，变成了缺粮省。但是，这样一个人均耕地已少得可怜的省份，农民弃耕抛荒现象却非常严重。1993 年初，浙江省和杭州市农业部门“披露了一个令人忧虑的消息”：去冬今春，浙江省和杭州市的冬荒面积大幅增长，一些地区冬季荒田占冬耕总量的 25%；杭州市的冬闲田，占春粮种植面积的三分之一。在宁波，据不完全统计，仅该市北仓区 1994 年夏季抛荒的土地就超过 1 万亩。在浙江的山区、半山区，冬荒也呈增长趋势，尤其大麦产区冬荒更多，杭州市的大麦冬荒田，占荒田的 70%。

农民抛荒的直接原因是“种粮不合算”。粮价不稳定，喊降就降，而且降幅很大，其中早稻收购价下跌 29%。而农资涨幅很大，如尿素从每吨 460 元一下涨到 580 元，涨幅超过 26%。国家政策的不断“变化”，使农民负担不断加重。据富阳县农业部门统计，该县农民年增负担达 800 万元。而地方政府官员“对粮食越来越不重视，田畈里看不到他们的人影子”。这种种伤农行为，使农民根本不愿种田。连富阳县民主村那样“赫赫有名的社会主义农村建设”老先进集体，播种的大麦也比往年减少三分之二（参见 1993 年 2 月 11 日《光明日报》26A/P8）。

在江苏省产粮大县射阳县，“老实巴交的农民不再‘老实’，他们不愿再干亏本买卖，不再种田了”。比如通洋乡是射阳县的产粮大乡之一，在1992年秋播时竟有20%的农民纷纷退田，该县六垛乡六垛村1992年秋播面积为2760亩，但是截至11月底，全村仅种大麦100亩，小麦600亩，蚕豆500亩，总共1200亩，另外的1569亩无人耕种，抛荒耕地占76.9%。在这个产粮大县如此大面积、大范围的抛荒现象，“是全县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没有过的”（引自1992年11月24日《华东信息报》）。

在鱼米之乡的湖南，弃耕潮也不断涌来。1991年春节刚过，该省衡东县大量农户便丢下责任田，举家外出广东、广西、云南等地找活干去了。该县大浦镇有一个村民小组共20户，于农历正月初四，大门一锁，便南下广东谋生去了。该县石滩乡新虎村20个村民小组，共453户农民，截至1991年2月已有87户举家外出，全村80%以上的精壮劳力都离乡背井而去，严重影响了春耕生产（见1991年4月13日《农民日报》）；1993年刚过完春节的农历正月初二，该县甘溪镇新阳村就有6户农户结伴来到村支书家，口称“一来拜年，二来交田”；该镇明桥村7组，有14户农民因人口减少应调出责任田，另有5户因人口增加应调入责任田，该调出的都要求调出，该调入的都不愿调入，弄得“村组干部束手无策”。该县大浦镇堰城村一组村民王湘林，欲将自己的3亩责任田转包他人，其条件是转包户不负担任何上缴任务，而且还倒给转包户每亩100元，但却无人愿意转包。据该县农业局调查，时值春耕大忙季节，农户备肥大量减少，每亩平均比1992年同期减少47%，还有41%的农户，到春耕大忙的三月下旬，还没有购买一两化肥。相当一部分农民对农田投入意识已是非常淡薄，只准备粗放经营：“收多收少无所谓”（据1993年3月30日《湖南日报》）。在鱼米之乡的湖南，种地的农民居然对“收多收少无所谓”，

这大概是盘古开天以来没有过的事。

第一波弃耕抛荒潮尚未退去，第二波弃耕抛荒潮，从1996年、1997年又开始兴起。

浙江省东阳市南马镇是一个一年三熟的地方，那里的农民历来重视耕作。但是，当第二波弃耕抛荒潮汹涌而来之时，竟出现了本来十分有限的耕地被大面积弃耕抛荒。比如南马镇南马村，当时共有1400多人，早些年拥有1700多亩耕地，由于村、镇建设被挤占、挪用，只剩下500多亩耕地，人均不足4分地。但是，到1998年全村500多亩耕地中，被弃耕抛荒的耕地就有400多亩，占全村耕地的80%。全村共有村干部14人，其中12人家里不种田，即86%的村干部家里都不种田，他们会关心耕地问题、用心组织领导农民种好地吗？

我们再看看产粮大省湖北农民的弃耕抛荒情况吧。

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湖北省委书记的点，八十年代是荆州地区行署专员的点，九十年代是县委书记的点。因为党委书记李昌平面对农民苦不堪言的负担就“农村真苦，农民真穷，农业真危险”上书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使棋盘乡名播九州。2000年4月，朱镕基指派贺军伟、潘文博两位处长赴监利调查，据贺、潘的调查显示，“棋盘乡有4个管理区，辖25个行政村216个村民小组共36197人，其中农业人口33018人，6245户农户，现有耕地面积47457亩。但是直到2000年春节后统计，无人承包的耕地面积达42980亩，占总耕地面积的90.5%。”两位处长的调查告诉人们，在棋盘乡的47457亩耕地中，农民自愿承包的耕地只占9.5%，仅为4470多亩，在历来视土地为生命的中国农民，90%以上的耕地无人愿意耕种，绝对是开天辟地以来没有过的“新鲜事”。面对这种尴尬局面，乡党委和政府不得不“召开多次会议研究解决弃耕问题”，直到3月30日，（此时离南方原来普遍要求“五一”前插完早稻，只剩一个月），才又落实30658亩。尽管“乡

党委和政府召开多次会议研究解决弃耕问题”，“仍有 12322 亩无人承包，处于撂荒状况，占耕地总面积的 16%”。在棋盘乡最富裕的黄桥 13 组，全组 35 户，外出 17 户，在家 18 户，只有 9 户打算种田，仅占 27.9%，直到朱镕基派出贺军伟处长等人来调查时，9 户中仅有 3 户（占总户数的 8.5%）准备了种子、肥料，其他 6 户无钱买肥料、种子，准备借高利贷种田。贺军伟问他们为什么不找信用社贷款，他们说：“找信用社贷款，既要托人担保，又要送礼，算下来和高利贷一样”（以上均引自《我向总理说实话》）。这大概就是农村改革后，中国农民的处境和为什么大片农田会抛荒的主要原因吧。

对于 1999 年夏收时节的湖北农民，《农民日报》记者做了如此描述：“今年 7 月，记者走进湖北武汉市江夏区雷作夫湾，但闻鸟鸣，不闻人语，一排土坯房大门紧锁，房前屋后杂草丛生；上百亩农田只有一小块水田长着秧苗，几头大水牛在荒田里低头啃草”。七月是夏收的季节，而武汉市江夏区却是一片冷凄、荒漠、萧条：“但闻鸟鸣，不闻人语”。因为“早在 1998 年底，江夏区耕地抛荒就达 8 万亩，至今仍有 2 万多亩抛荒地仍未找到新的承包主”。而地处江汉平原大粮仓的荆州市，在 1998 年初的弃耕农田达 93 万亩，直到这年 10 月，仍有几万亩耕地抛荒。而在水稻生产大县监利县，据 2000 年调查，抛荒农田达 41 万亩，占耕地面积的 26.4%，弃耕抛荒最严重的监利县毛市镇，弃耕比例高达 38.9%，在毛市镇崔呈村弃耕比例更达到惊人的 71.4%（见 2001 年 6 月 14 日《南方周末》）。实行分田单干以后，在江汉平原这片肥沃的土地上，一个监利县就有 41 万亩耕地抛荒，即超过四分之一的耕地，被历来视土地如生命的农民抛弃而成了荒地，这在中国历史上，有谁听说过吗？我们的农村改革，怎么竟改成了这个样子呢？江汉平原上这种“但闻鸟鸣，不闻人语，一排土坯房大门紧锁，房前屋后杂草丛生，上百亩农田只有一小块水田长着秧苗”的荒凉、萧条景象，不知是不

是中国农村的缩影？

中国农民是天底下最老实、最勤劳的人，也是全世界对土地爱得最深厚最炽热的人。人们不会忘记，当共产党实现中国农民盼了几千年的“耕者有其田”的梦想，分到土地的农民，是何等的欢欣鼓舞，扬眉吐气！为什么农村改革后，国家实行土地承包制，千千万万农民却厌弃土地，远离土地，毫不吝啬的任大片良田只长荒草不长粮呢？

让我们听听农民的回答吧。

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小有名气的种田能手李开明，1999年种18.3亩地，收粮18000斤，生产支出为 $18.3\text{亩} \times 160\text{元} = 2928\text{元}$ ，上交负担为 $18.3 \times 185\text{元} = 3385\text{元}$ 。李开明家里存有11000斤粮食。尽管粮食只能以每市斤0.35元价格出售，远远低于国家保护价每市斤0.55元，粮食收购部门仍以没有仓容为由拒绝收购，粮食市场基本上是封闭运行。李开明算来算去，种田收入是个负数。种田能手尚且倒亏，普通农民的种田收入自然可想而知。李开明得出的结果就是：“打死我也不种田了”！

与李开明类似的农民大有人在。山东淄博农民杜深忠在2014年5月初对记者说：“都说农民对土地有感情，实际上我对土地一点感情都没有。咱就是没办法，无奈！花十分代价以后得不到三分收入”（见2014年5月13日《文萃报》）。

在棋盘乡所属的监利县，1999年80%的农民种田亏本，甚至连简单的再生产也难以维持，农民种田已陷入这种困境，而县里的官员们不是为农民排忧解难，却“反复宣称：监利农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难道农民亏本就是“新的发展阶段”吗？

李昌平与一位45岁农民在外出打工途中有一次交谈。那位农民对李昌平说，他家1999年种了4亩地，一家三口人，面朝黄土背朝天，风里来雨里去忙了一年，交了政府的2万多斤粮食，除了种子、农药、化肥等开支，最后剩3000斤谷子。

谷子收完了，老婆也累病了，住院7天，花了2000多元。住院时把自家的粮食都卖完了，还借了老三2000斤，过年的粮食也是在媳妇娘家借的，说到这里那位45岁的监利农民气愤地说：“这真不是个世道，瞎子把胡琴不要了，还要抠眼睛！”

一个和他结伴外出谋生的青年农民随即冲口而出：“你们当官的心太黑，不出去没有活路！”李昌平听了无言以对。（参阅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2-6页）

由于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农用物资的价格则一路暴涨，弄得广大农民种地不仅难以赚钱，反而亏本，使千千万万世代代眷恋热土的农民被迫离乡背井四处打工，于是在农村出现了这样的景观——

2002年《瞭望》记者驱车1500公里，重点采访了湖北省的7个县10个村，一路所见都是“种田的老汉采茶的婆”。几乎村村“山清水秀，人老田瘦”。种田的基本队伍就是“妇女、儿童和老人”。当地人戏称“386199部队”，几乎见不到强劳力的踪影。

笔者老家所在的湘中某县原公社，实行承包以后的双雅堂生产队的双雅堂组，共有近50亩好水田，生产队1000米外有一个双冲水库，土地肥沃，水利条件很好。但今年（2011年）全组只有笔者年届66岁的弟弟、弟媳种了2亩“口粮田”，另有一位年近八旬的老农民种了3分“口粮田”，其余全都抛荒。全组除笔者年近古稀的弟弟、弟媳和一个正上幼儿园的小孙女外，就只有一对年过八旬的老年夫妻和一名年过古稀的单身老汉，总共6口人。想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全生产队男女劳力，一分一厘地挑土造田，面对当年稻穗飘香的良田而今长满荒草，他们对笔者说：“看到这样多好的田荒了，真是心痛啊！”

“乡政府的干部就没有人管一管？”我问。

“而今的乡干部，影子都难看到。”乡亲们回答。

这种荒凉景象，此后并没有向好的方向发展，而是朝着更

加令人不安的方向恶化。

“如果不算留守儿童，村里常住的劳动力里面，最年轻的是一对46岁的夫妇”，这是河北省崇礼县狮生沟乡西毛克岭村2011年的情况。该村在册人口458人，实际常住人口216人，青壮年全部外出打工。四川仪陇县五福镇笋店村是典型的传统农区，全村1290人中常年离乡的达660人，三分之一的家庭举家外出。该村第8村民小组，原有19户人家63人，现仅有3户人家7人留守农村。这种空心化农村，在西部地区非常普遍。2011年6月，中央国家机关青年“百村调查”发现，山西、湖南、内蒙古等其他省（区）的情况也大体如此。当今农村的主要劳动力都是60岁上下的农民，再过5至10年，这些老人再也无力劳作，粮食主产区的劳动力将后继无人，抛荒现象必将愈演愈烈。由于农村青壮年的大量流失，中国大量的行政村正在消失。据《中国统计摘要2010》的统计数据显示：从2005年至2009年，全国村民委员会逐年减少，平均每年减少7000多个村民委员会，平均每天有20个行政村正在消失（以上数据引自2011年10月27日《光明日报》），如此发展下去，再过10年、20年，中国农村将是一种什么情景，实在不堪设想。

一方面是一些地方的政府官员，对农业早已不再重视，他们只热衷于招商引资，热衷于城镇化，以各种手段征收农民的土地，往往使招商成了“招荒”，弄得数以千万计的农民无地可种，变成了城市流浪者；另一方面是，由于一些政府官员不顾中央政府三申五令，肆意加重农民负担，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而对农用物资价格不断暴涨，却束手无策，不闻不问，弄得农民种地入不敷出，致使农民公开声称：“打死我也不种地了！”导致大批农民被迫离乡背井外出打工，使中国破天荒出现了“老年农业”的困境，大批良田被弃耕抛荒，中国农业被弄到这种地步，中国农民到底该怎么办？中国农业该怎么发展？如果这样发展下去，中国的耕地还能养活中国人吗？

第六章 粮食！粮食！粮食

第一节 艾奇逊预言的破产

早在 61 年前的 1952 年，中国大陆只有五亿人口时，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就预言：“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是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解决，共产党政府也解决不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因此，艾奇逊断言：“中国将永远是天下大乱，只有靠美国人的面粉，才有出路。”在美国，持这种看法的远非艾奇逊一人。艾奇逊的断言也并非全无依据。中国只占有不到世界 7% 的耕地，却拥有占世界 22% 以上的人口。要用占不到世界 7% 的耕地，解决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吃饭问题，岂非易事？

但是，获得了解放的中国人民，在毛泽东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当家作主的豪情和火山般爆发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力，不仅一两一钱也没有靠美国的面粉，较好地解决了自己的吃饭问题，而且，以世界上罕见的速度，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在短短二十多年间，就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经济体系，组织起来的中国农民，依靠集体力量的巨大优势，迅速提高了粮食产量。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和苏美成为三足鼎立的航天大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

中国人民能够击碎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之流的预言，中国农民是立了大功的。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清楚地显示出中国粮食的稳步增长——

1949 年产粮 11318 万吨

1952 年产粮 16390 万吨

1970 年产粮 23995 万吨

1975 年产粮 28452 万吨

1980 年产粮 32056 万吨

1981 年产粮 32502 万吨

1982 年产粮 35450 万吨

1985 年产粮 37911 万吨

.....

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同时显示：从 1952 年至 1988 年，中国农民为国家积累资金 1189 亿元，累计向国家交售了 21.53 亿吨粮食，8062 万吨棉花，5982 万吨食用植物油，33.3 亿头生猪，2573 万吨鸡蛋，8195 万吨水产品，以及大批其他生活物资。在全国人民的所有生活消费资料中，80% 是农民提供的农产品及其加工品。组织起来走集体化道路的中国农民，凭着自己无与伦比的辛勤耕耘和爱国热情，用占世界 7% 的耕地，硬是较好地解决了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的温饱问题。

正如邓小平在 1982 年所说：“建国以来，我们做了一些事情，基本上解决了吃饭穿衣问题，粮食达到了自给。这是了不起的事情，旧中国长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405 页）。尤其不可忘记的是，1950 年我国只有 5 亿人口，到了 1979 年已增加到了将近 9.8 亿人口，几乎翻了一倍，而全国人均寿命则由 35 岁提高到了 65 岁，要保障人口数量和人均寿命都如此大幅增长，首先必须有人民生活改善为前提，而要使数量将近翻了一倍寿命也大大延长的人口能改善生活，粮食的大幅增长——从 1949 年 11318 万吨提高到 1980 年的 32056 万吨——乃是基础的基础。这就是中国农民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贡献，是令世界惊叹的奇迹。

第二节 人均上调粮食的“全国冠军” 变成了粮食调入大户

农村实行分田到户以后，随着国家对农业生产实际上的日益忽视和冷漠，在整个国民经济的基本建设投入比例中，对农业的投入比例不断压缩，而农业生产资料却日益上涨，乱收费、乱集资、乱摊派屡禁不止，愈演愈烈，加在农民头上的负担日益沉重，使种田成了一种微利、无利甚至倒亏的低效或无效劳动，连糊口都难以维持。以陕西关中平原为例。那里土地肥沃，灌溉条件优越，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之一。小麦亩产平均 300 公斤左右，玉米平均亩产 350 公斤左右。随着农、经结构的调整幅度不断增大，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不断上涨等原因，种粮的经济效益不断滑坡，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日益下降。我们且看记者杜明、木子“通过广泛调查”，为关中平原农民种粮效益算出来的两笔细账——

玉米每亩从种到收的收支表（表一）

项目	收（元）	支（元）	余
播种施碳铵一袋		17.50	
播种需种子 7 斤		7.00	
播种机耕费		12.00	
灌溉水费		20.00	
施追肥（尿素 30 斤）		16.20	
拉运费		3.00	
脱粒费		8.00	

项目	收（元）	支（元）	余
缴公价粮补差价款		5.00	
投 215 个劳动日		80.00	
收获 700 斤，每斤 0.3 元	210.00		
总计余纯利润	210.00	163.7	46.30

小麦每亩从种到收的收支表（表二）

项目	收（元）	支（元）	余
播种施碳铵一袋		17.50	
播种施磷肥一袋		18.00	
播种需种子 30 斤		27.00	
播种机耕费		12.00	
冬溉施尿素 20 斤		10.80	
冬溉水费		10.00	
春溉水费		10.00	
喷除草剂		1.00	
叶面施肥		1.00	
灭虫喷药		2.00	
机械收割费		30.00	
拉运费		2.00	
农业税教育基金		15.00	
缴公购粮差补价		10.00	
投 210 个劳动日		60.00	

项目	收（元）	支（元）	余
收割 600 斤每斤 0.38 元	228.00		
总计余纯利润	228.00	226.30	1.70

由表一、表二中具体列出来的收支细账告诉我们，在关中平原那样土地肥沃、灌溉条件优越的地区，一个农民如果一年种一亩小麦、一亩玉米的全部纯收入就是 48 元，平均每个月 4 元，还买不来一包香烟。且不说要看病，小孩要上学等等开支，就凭这每个月 4 元生活费，一年之中大概至少有 300 天只能喝西北风。

江西省是我国的产粮大省。据该省某县一个农调队 1994 年对当地农民种粮情况的调查结果显示，农民每生产 50 公斤稻谷，不算劳动力，要投入的化肥、农药等开支在 34 元以上，而国家收购的合同定购价是每 50 公斤 27.09 元，也就是说，不算劳动力，农民卖给国家 50 公斤稻谷要倒亏 14 元。那里的农民算了一笔账——1 斤尿素 = 3 斤米，一斤柴油 = 两斤谷，一斤谷买不到一支冰棍。

而对湖南邵阳、新邵两县的调查显示，1998 年农民每种 50 公斤稻谷，需要花费的种子、农药、化肥等各种费用约为 60 元，这还不包括农民所花费的劳动，而国家收购粮食的保护价是每 50 公斤 50 元。农民向国家每出售 50 公斤稻谷，净亏 10 元。在福建省霞浦县，1992 年农民每生产 100 公斤稻谷要亏 10 元左右，连江县农民每一亩责任田高的要亏 100 元（见 1992 年 10 月 8 日《福建日报》）。

江苏兴化市被称为全国农业第一县。据对该县中堡镇中三村调查，1989 年农民种地，平均每亩投入种子、化肥、农药、柴油、机械费等五项合计为 219 元，1990 年上升到 250 元，1991 年再上升到 269 元，1991 年与 1989 年相比，每亩平

均增加 50 元，与此相反的是，种粮农民的纯收入逐年下降——1989 年每亩净收入为 124.66 元，1990 年为 123.58 元，1991 年仅为 53.31 元。

农民不惜投入全力夺丰收，但结果往往却是田里大增产，农民大减收。

1989 年，湖北保康县夏粮产量达到 7.2 亿斤，创历史最高产量，夏油达到 343 万斤，成为历史上第三个丰收年，与此同时农副土特产品也获得丰收。从产出计算，农民的人均收入应该比上年同期增长 24.9%。

但是，仅由于化肥、种子、农药、苗种四种农用生产资料涨价，农民就比上年多支出了 312.96 万元，农业税、特产税增加 77.53 万元，农副土特产品降价，使农民减收 600 多万元，1989 年保康县农民与上年比较，增加支出 999.46 万元，增加收入 105 万元，两项相抵，在 1989 年这个全面大丰收年，农民反而比 1988 年减少收入 894.49 万元。（参阅 1989 年 9 月 5 日《农民日报》25P2）。

农民种地的高投入低收入甚至倒贴，大丰收却大减收，极大地伤害了农民的心，使他们深感种田太没搞头，由此导致农业收入在农民家庭费用支出中，逐年减少。据有关调查数据显示，人均中长期农业生产性固定资产投资 1989 年比 1988 年减少 22%，1990 年再减少 35.4%，1991 年又减少 18.2%；1989 年农民人均短期农业生产性投资比 1988 年减少 4.1%，1990 年再减少 7.9%，1991 年又减少 0.8%。

这就是农村改革后，中国农民辛辛苦苦的种田现状。

我们再看看广东这个雨水丰沛、光照充足、气候温湿，几乎没有霜期的地方，土地实行承包后，农民种粮的收入情况吧。

1993 年，广东省农业部门对省内不同类型的 9 个县共 2000 户农民的抽样调查显示，生产 50 公斤稻谷的成本为 47.2 元，秋收时市场价格为每 50 公斤稻谷 46——50 元。农民种地

根本无利可图甚至要倒贴。农民种一年地，完全是白流汗水白干活，风里来雨里去，从年头累到年尾，还要倒贴钱，这样的亏本事谁会干呢？该省三水市，原来是人均上调粮食的全国“冠军”，由于种田亏本，农民被迫将土地抛荒或者改种其他作物。该市乐平镇南岗村农民陈其芳，曾因种粮对国家贡献大，当选为全国劳动模范。陈其芳兄弟三人于1985年承包了140亩地种水稻，贷款13万元买了拖拉机等农用机械，本想借此种田致富。谁知8年过去了，连贷款都没有还清。一气之下于1992年断然抛荒100亩。由于种田不仅不盈利反而亏本，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使三水市这个当年人均上调粮食的全国“冠军”，在承包制推行十几年后，变成了“粮食调入大户”。

第三节 “我种80亩田，还不能养家糊口”

自古道：“湖广熟，天下足”。湖南历来被誉为鱼米之乡；而位处湘北大地上的洞庭湖区，更被称为湖南的“粮仓”。然而，农村实行土地承包后，在这个历来誉为“粮仓”的洞庭湖西岸湖南澧县车溪乡南阳村，一位远近闻名的“种田能手”罗善平，2003年说起今天种田就饱含辛酸和无奈：“我种80亩田，还不能养家糊口”。

罗善平所在的澧县，属洞庭湖区澧阳平原。那里土地肥沃，自然条件非常好，是湖南有名的水稻高产区。罗善平一家四口，从1999年开始，承包80亩稻田，是当地的承包大户。罗善平种田，从不吝啬力气和汗水，对土地勤于管理，精耕细作，因此被乡亲们称为“种田能手”。

但是，搞了十几年承包以后，罗善平越来越无法理解：为什么田越种越多，日子却越来越穷？

2002年，罗善平种的早稻，碰上阴雨天气，老天爷一个多月都很少开眼。阴雨加上低温，早稻几乎绝收。原来指望多

赚几个钱，结果却亏了几千元。面对这种欲哭无泪的局面，罗善平没有灰心，而是咬紧牙关，打起精神，当机立断将 80 亩稻田改插中稻，企图以此弥补早稻的损失。没想到结果亏得更惨。罗善平扳着指头算了一笔账：

80 亩中稻，每亩收了 420 多公斤稻谷，当时每 50 公斤稻谷 43 元。每亩毛收入 365.5 元。每亩投入的成本是：种子 20 元，肥料 68 元，农药 50 元，机耕 40 元，移栽 30 元，灌溉 35 元，收割 40 元，仅这几项，每亩就花了 283 元成本。加上 104 元租费，每亩水稻的实际成本是 387 元。也就是说，一年到头，辛辛苦苦种 80 亩田，罗善平倒亏 1720 元。这还不算罗善平夫妇的工钱，就算是一年到头白辛苦吧，可他还倒亏 1720 多元啊！这就是分田单干后，再也无力承受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必然结果。

谈到 360 天起早睡晚的辛苦和精耕细作，罗善平更是悲情难诉，“说我懒吗？乡亲们都可以作证，天刚蒙蒙亮我就起床下了地，施肥、打药、中耕、照料禾苗就像照料孩子一样从不敢疏忽；说我没有种田技术吗？事实是最好的证明，这些年，我种的田里，每亩产量都比当地平均产量多几十公斤”。

一讲到种田 80 亩却倒亏 1700 多元，罗善平就深感对不起自己的女儿。刚承包那年，因为田里收成不好，家里收入减少，当时才 14 岁的女儿，就被迫辍学，到广东一家眼镜厂去打工。工作很艰苦，工资又低，这些年每月就四五百元工资。去年（2002 年）种田亏了 1700 多元，女儿就将平时省吃俭用省下来的钱寄回了家里。

“要不是女儿寄回来钱，一家人靠我种田连年都过不好。”罗善平叹息不已地说。（引自 2003 年第 8 期《半月谈》）。

在鱼米之乡的湖南，在被称为“湖南粮仓”的洞庭湖平原，一位种了 80 亩稻田的农民，落到了如果打工的女儿不寄钱回家，就“连年都过不好”的地步，岂不是太匪夷所思了吗？

2005 年 5 月，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本科二年级学生李

强对山西老家农村的一篇调查报告《乡村八记》，在清华新闻网刊出后，《人民日报》原总编、后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敬宜，在推荐《乡村八记》的评语中写道：“了解国情是年轻人的首要任务，这就需要放眼 96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对占人口 80% 以上的农民有所了解才行”。范敬宜特别强调，“作为年轻人要懂国情才有底气”。

那么李强在老家看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国情”呢？下面是李强列出的二姨家 2004 年收支情况的明细表——

1. 全家全年总收入 = 农业收入 + 工商业收入 = 4886.5 元 + 10000 元 = 14886.5 元；

2. 全家全年总支出 = 税费支出 + 家庭吃用支出 + 教育医疗支出 + 农机支出 = 107.26 元 + 5428 元 + 8200 元 + 50 元 + 2000 元 = 15785.26 元

3. 2004 年收支相抵后的情况为：

14886.5 元 - 15785.2 元 = -892.76 元

李强这一算，顿时大吃一惊！像二姨这样的家庭，一年辛苦，居然入不敷出倒亏近 900 元！

姨父告诉李强，他们家的收入，在村里属中上水平，因为他家的工商业收入已占到全年总收的三分之二，而村里农民绝大多数是农业收入为主。这些家庭的收支情况也就可想而知。

湖北襄樊市被人称为“第二省会”，成为省里重点投资的地方。该市保唐县因为广种木耳蘑菇，农民致富较快，被评为全国科技致富文明县。可是，1993 年春节期间，《中国青年报》记者宁光强在该县采访时，所看到的情况简直令人难以相信。宁光强在一位赵姓农民家过年，团年饭桌上摆了六个菜——白菜、豆腐、萝卜、土豆、腌菜、火锅煮的是干萝卜。大年三十的团年饭，居然没有一点肉，这在笔者家乡自从土改分田后绝对是天大的笑话。人民公社时，每到过年，生产队杀猪宰牛屠羊捕鱼，按人分配是约定俗成的规矩。就是宁光强在那户农家

过年的女主人告诉宁：“我们三年才吃一斤猪肉”。这位宁记者在采访调查时，该村唯一的一家商店店主告诉他：“村里 2000 多口人，今年春节前后销售总额才 1020 元，平均每人 5 毛钱”。5 毛钱过个年，这就是被评为全国科技致富文明县里一个 2000 多人的大村庄，1993 年过年的消费，听起来简直是天方夜谭。

第四节 “粮食大王”不再种粮

从二十世纪中期开始，我国农村随着“大包干”的全面推行，各地出现了一批种粮大户、“种粮状元”、“种粮王”之类的典型。他们利用自己的某些优势，承包几十亩几百亩上千亩粮田，通过雇工耕种，普遍为国家作出了令人刮目相看的贡献。有的还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甚至进了中南海，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成了农业战线的明星。但是，他们的命运，后来都普遍不佳。

江苏省射阳县赫赫有名的“种粮大户”杨定海，最后落到破产的边缘，就是一个典型。

从 1983 年开始，杨定海在家乡承包了 300 亩地种粮。他凭着自己的辛勤耕耘和管理有方，年年获得丰收，到 1989 年的 7 年间，净赚 41 万多元，成了远近闻名的“种粮状元”，1989 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因此，进一步激发了他的种粮积极性，决心多产粮，为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

1990 年，他在本县洋河乡承包了 1700 亩荒地，将多年来的积蓄全部投入开荒种粮和养鱼。仅仅两年时间，就把 1000 多亩荒地改造成了高产粮田。这时他的固定资产已达到 30 万元，建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个体农业企业。他决定在这片土地上大干一场。

然而，随着农业生产资料“说涨就涨”，而“粮价却说跌就跌”，产出总是赶不上投入，种田老是亏本。杨定海算了一

笔账：

1984年时，包括化肥、农药、种子、用工在内，每亩地的成本约为108元左右，种一亩地可以赚50元。但是，自此以后付出的成本越来越高，到1992年每亩地的成本已上升到270元，8年间涨了2.5倍，这时种一亩地不仅没有钱赚，反而要倒贴80元。也就在这一年，杨定海种的1400亩水稻，因水灾减产，只收了40万公斤稻谷，全年种田亏了13万多元。

往年杨定海生产的粮食全由乡粮食所收购，这一年粮食部门走向市场，不愿多收粮。粮食销不出去，自己又没有粮仓，几十万公斤粮食在露天里堆放，成了一个沉重的包袱。而且，因为粮食变不成钱，贷款无力按时偿还，不仅每天都得支付不菲的利息，新贷款也不能再借，到1993年连生产都无法进行。（引自1993年4月5日《经济参考报》）。

福建省建阳县种粮大户邱健平，承包了65.7亩地，每年向国家交售粮食三万多公斤。随着生产资料不断涨价，种田成本不断上升，到1987年每亩成本已达到227元，这一年他把自己三万多斤稻谷全部卖给国家后，还亏损了1000多元。（引自新华社1988年5月26日北京电）

诸如杨定海、邱建平这样的“种粮状元”、“种粮大户”，因为种粮倒亏而不再种粮乃至破产的农民，却颇为普遍。

大连市政府从1989年至1991年，连续三年评选“十大粮王”，先后有18位“种田能手”荣获“粮王”称号。他们曾经承包数十亩至数百亩粮田，为国家增加粮食做出了重大贡献，也获得了国家给予的各种荣誉。

但是，仅仅过了三四年，到1995年被评选出来的18位“粮王”中，就有三分之二弃粮而去。

庄河市观驾山乡高屯村姜同清，1989年被评为大连市第一届“粮王”。早在1987年，姜同清就承包了250亩水田，跟村里签订了两年合同。按合同规定，姜同清每年向村里提交

37500 公斤征购粮和 10500 元钱。村里保证他的用电、用水。可是承包第一年就没有供上电。化肥不足，又遭灾，这一年平均每亩只收了 300 公斤粮，一下就赔了 6000 多元。1989 年是个好年景，每亩粮食达到 525 公斤，这是一个丰收年。可是村里却叫姜同清交 65000 公斤征购粮。按合同规定，几乎增加了一倍。由于村里违反合同，姜同清亏了 2 万多元，一气之下，就不再种粮。从此重砌炉灶另开张，投资搞果园。

瓦房店杨家满乡单家村邵成羽，26 岁就评选为大连市第二届“粮王”。但他很快就发现种粮没有出息，根本致不了富。由于政府总是“翻烧饼”，弄得农民种田心里老是没底。比如，化肥、农药等农业生产资料，一会儿说要“专营”，不能放开；一会儿又说多家经营好，要放开，弄得假冒伪劣农资满天飞，而且价格暴涨，老是坑农害农，农民还怎么种田呢？邵成羽当了“粮王”后，不仅不再种田了，甚至远走高飞，带着一家三口，到沈阳一家工程队搞建筑去了，彻底告别了农业。

45 岁的潘有财，曾连续三年被评为大连市“粮王”，堪称名声赫赫。他从 1986 年开始承包 180 亩土地，以后又不断扩大到 450 亩，截至 1995 年累计向国家交售粮食 95 万多公斤，其贡献不能说不大吧？但是，他承包了这么多土地，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向国家交售了那么多粮食，却并没有挣到多少钱。从 1986 年——1993 年，7 年间共挣了七八万元。其中 1991 年亏了 2 万多元，特别是 1994 年，一场大雨淹了水稻，最后颗粒无收，这一年就亏了十六七万元。其中的 8 万元贷款，月息一分九厘，光利息就是一笔不菲的负担。如此巨亏，农民亏得起吗？

潘有财谈起别的“种粮大户”，更是充满了无奈和同情。同村有一位张姓“种粮大户”，共承包了 500 多亩地，仅 1994 年一年就赔了十六七万元；临乡一位“种粮大户”更惨，1994 年一年就亏了二三十万元，他老婆承受不了如此巨大的压力，

深感绝望，竟喝农药自杀了（引自 1995 年第 32 期《瞭望》）。

而且，种粮大户亏损、倒赔现象，直到新世纪以后仍未改变。被誉为“万亩粮王”的重庆市永川农民梁自然，早在 2009 年就承包了一万多亩粮田，搞大规模种植，他组建劳务合作社，建立农机服务队，努力提高种粮效率；统一供种、施肥、植保，以保证粮食品质……但是到 2014 年已亏损 200 多万元，而以种粮破产告终（见 2015 年 2 月 9 日《半月谈》）。

由于种田成本不断提高，农民支出越来越大，种田亏损也就与日俱增。有关统计资料显示：1989 年至 1995 年的 7 年间，全国农民增收一万一千八百八十七亿元，而同期增支却是一万三千四百三十七亿元，增收与增支相抵，全国农民净亏一千五百五十亿元。

1990 年以后，国家曾将“合同订购”变成了硬性的“派购任务”，于是，原来农民完成“合同定购”后能够得到的那一部分计划农用物质也被取消。而且，即使完成“订购”任务的余粮，国家也不许拿到集市上去卖，只能以“议价”卖给粮店。而所谓“议价”，只是略高于“订购价”，比市场价低得多。以 1988 年为例，稻谷“订购价”为每 50 公斤 22.5 元，“议价”是每 50 公斤 35 元，而市场价是每 50 公斤 55 元以上，每 50 公斤相差至少 20 元。

与农资价格大幅上涨相反，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粮食等农副产品价格多次大幅下跌，农民因此付出的代价十分惨重。以产粮大省湖北为例。1995 年湖北农业获得大丰收，农民们用辛勤劳动的汗水，换来了粮食满仓。但是，当他们喜形于色地正在计算自己的收入时，变幻莫测的市场，却给了毫无抵御市场风险能力农民当头一棒。湖北老河口的农民易丰伟算了一笔账——

先看粮价：单就大米而言，当时每公斤 1.6 元，同上年每公斤 2.2 元相比，每公斤下降 0.6 元，只按每亩产粮 650 公斤

折合大米 350 公斤计算，一亩水稻的收入就减少 210 元。

再看生产资料：除农药总体价格同上年相比只上涨 10%，化肥价格由 1994 年每吨 460 元，上涨到 540 元，尿素由每吨 1600 元上涨到 2200 元，柴油每吨已涨到 3000 元，稻种每公斤由 10 元上涨到 18 元；还可以再细算一下，由于柴油和农机配件涨价，导致机械每整一亩地的费用由上年的 15 元上升到 25 元，农用水的价格也比上年涨了 30%，再加上近两年农民为了丰收，普遍增加了投入，每亩化肥施用量增加了 30% 左右，病虫害发生次数频繁，农药使用量增加了 50% 左右，每亩田的投入与上年相比增加了约 200 元，而收入却减少了 210 元，减收增支相加，种一亩粮食就减少了 410 元收入。

易丰伟列出的这一串数字，显示着农民丰产反而大大减收的现实，于是他深为感叹：农民怎么承受得住这样的经济压力？这田还咋种？（引自 1996 年 2 月 11 日《中国经营时报》）

从全国农民来看，同样不乐观。有人做过计算：如果粮食总产量平均以一万亿斤计，1996 年 11 月，大米、小麦、玉米这三种主要粮食的平均市场价格每斤为 1.0355 元，当年全国农民所得为 10355 亿元；到了三年后的 1999 年，这三种粮食的市场平均价格为每斤为 0.7075 元，这一年农民种粮所得为 7075 亿元。单就粮食这一项，中国农民的年收入就减少了 3280 亿元。如果把粮食以外的其他农业收入也粗略算进去，1999 年与 1996 年相比，中国农民从农业生产获得的收入，至少减少了 4000 亿元。

2000 年，农业减产又减收，农民从农业获得的收入，比 1996 年又减少 4000 亿元以上。从 1997 年至 2000 年，农民减收 16000 亿元以上。（引自《中国农民调查》第 227 页）。这类政策性带来的损失，往往比自然灾害更令农民害怕。

对我国农村在实行“大包干”以后出现的这种情况，一位负责农村工作的领导说得比较中肯而坦率：农业之所以经常出

现波动和反复，最主要的是缺少一个长远、稳定而有连续性的规划政策。国家总是在缺粮时，就想到农民，重视农业；一旦粮食丰收了，粮库里有了粮食，就把农民丢在一边了。一个又一个“种粮状元”、“种粮大户”和“粮食大王”，因为种粮不赚钱，甚至还要倒贴，纷纷弃粮而去，不就是最好的说明吗？

第五节 “农民兄弟不容易，十年粮价才涨了8分钱”

自从农村改革以后，农民种地长期不赚钱，甚至还要倒亏，严重伤害了农民的种地积极性。面对这种无奈，黑龙江省兰西县跃进村农民李庆山，在给《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具体算了他一家四口种14亩地，扣除成本什么也没有得到后，说了一句很幽默的话：“农民种田就是锻炼身体”。听来实在令人心酸。

对于农民种地的这种状况，只要对农村略有所知的人无不深表同情。为了缓解这种过去绝没有出现过、可能是其他任何时候都不曾出现的窘迫，国家多次提高粮食等农产品收购价格。但是，每一次农产品提价，都引发了生活资料和农业生产资料的大幅提价，以致使农民并没有从粮食提价中得到什么实际好处，甚至如很多农民所说：“粮食提价还不如不提”。

我们且看看国家几次粮食提价后的情况。

1994年是粮食提价幅度比较大的一年。水稻、小麦、玉米等几种主要粮食的综合提价幅度达到30%，即由1993年平均每斤0.4元提高到0.52元。这是农村改革后粮食提价幅度最大的一次。但是，与这一年的农业生产资料涨幅度相比，也仅仅是一个能够“适当补贴”的水平。仅化肥一项的涨价，全国农民就得比上年多支出120亿元，柴油一项要多支出100亿元。国家收购1000亿斤合同定购粮，每斤由0.40元提到0.52元，即每斤可增收0.12元，1000亿斤合同订购粮，也就增加120亿元，仅能抵消化肥涨价一项的开支；棉花收购了6000万

担，每担提高收购价 2 元，棉花可增加 120 亿元收入，但是仅柴油提价，国家就从农民手里拿走 220 多亿元。还有农药、薄膜、种子、农机等等的提价幅度也相当可观。由此可见，1994 年主要农产品平均涨幅达到 30%，仍然远远难以弥补农用生产资料涨价从农民手中拿走的钱。

1997 年的河北省是一个丰收年。特别是邯郸、邢台等地区粮食普遍大丰收，而这一年河北省的粮食也是历史最高价。但是，对于产粮区的粮农来说，由于“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涨价”，不仅完全抵消了粮食丰收和粮食提价所带来的收益，甚至还不如往年。

魏县后屯村农民李秋原算了一笔账——以每亩小麦、玉米各产 900 斤算，每斤价格比 1996 年上涨 0.1 元，一亩地两季所产的粮食可多收 180 元。“可花的总比挣的多”，李秋原说，先说生活资料的涨价，食用油去年每斤 2.6 元，今年涨到 5 元，土豆去年每斤 0.7 元，今年涨到 1.2 元等等。生产物资和生活物资涨得同样快，种子、化肥、农药、机播、机耕、浇地等等都涨。“粮食走着涨，农资跑着涨”。比如，复合肥去年是 95 元，今年涨到 115 元，农药涨价幅度高达 20% 等等，“粮食涨价的那点钱，根本落不到农民手中，我们反正不够本”，李秋原如此感叹。

我们再看看即使排除农资涨价，粮食提价后，农民能获得多少好处呢？

以河北魏县为例。1996 年 2 月，该县某村村干部孙岭谈起粮食提价，当地农民却乐不起来时，对《中国经营时报》记者赵新社说，由于耕地锐减，农民无粮可卖，粮食提价跟他们没有关系。由于人口增长，宅基地扩大，修路建厂等原因，他们村里耕地的上报数字依然是 1964 年时的人均 1.1 亩，但实际只剩下人均 0.7 亩，人均年产小麦顶多就 500——600 斤，除去上交公粮外，就只有口粮，没粮可卖，粮价再高，我们也得不到

好处。作为农民，我们只是“听着高兴”。

当了12年乡党委书记的该县边马乡党委书记陈连堂说，由于农业本身就是“质”弱产业，单用经济或行政手段去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刺激农业发展，很难长期凑效。特别是我国人多耕地少，发展来发展去，也只是口粮农业，市场手段很难推动农业发展。他举例说，像魏县及周边几个县，人均耕地都在1.5亩以下，土质好坏不一，农民每年收的粮食总量有限，口粮就占去70%——80%，根本没多少粮食卖，因此粮食再提价他们也得不到多少好处。就是卖一点粮食换一点钱，跟他们生产粮食付出的成本很不成比例。

我们再看看全国闻名的东北优质大米产区黑龙江省五常市农民在粮价上涨后的收益情况。2004年是我国经历了连续7年的粮食价格低迷后，出现的新一轮粮价上涨，对粮农应该是福音，但是，由于分田单干后，农民成了一家一户的小生产者，在组织结构，产业化程度、市场信息等方面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缺陷，即使不计农用物资涨价因素，农民也未必能获得多少好处。以该市背荫河镇背荫河村为例。该村是一个典型的种粮村，这一年全村种了3800多亩水稻，收成也不错，价格上涨后，农民理应获得一些实际好处，但该村57岁的农民黄世中，谈起粮价上涨就直摇头：“去年10月底，我家的大米就全部卖光了。我家种的是优质大米，每斤卖了0.82元，普通大米每斤才0.75元。没想到，过了年，米价一路上涨，现在（指2004年4月）已经涨到每斤1元多点了，可村里绝大多数人家都没有余粮卖了”。他说，自己家里仅留下“600斤口粮米”，再卖就得饿肚子了。

人们也许会问：田里丰收了，为什么不等粮价上涨再卖呢？

黄世中无奈地说：“农民手中都没有钱，打完粮食就得卖。首先得还信用社借的5000余元贷款，耕地、插秧、打稻子、

磨谷子，都得请人工，欠了人家的钱都催着要，不能不给；还有小孩读书、看病、油、盐、酱、醋都得花钱。农民的日子到处都是窟窿，就等着卖粮食补，除了卖粮农民还能卖啥呢？”

黄世中说的这种处境，也得到了背荫河镇党委书记张臣的证实。张臣说：“去年水稻是一个丰收年，可农民谁也料不到要涨价，而且农民还担心，粮食在家里放久了，万一发生霉变咋办？”

这显然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就五常市而言，市农委主任谭洪涛说：“全市农民除了留下口粮外，百分之七八十的商品粮都在春节前卖光了。春节过后粮价一路上涨，大米已从每斤 0.8 元，涨到 1 元多。按此计算，每亩水稻大约可增收 160 元左右，其中农民仅获得 30% 左右。可就是这点好处，也被农资涨价掏得差不多了。”（引自 2004 年 4 月 27 日《半月谈》）

那么，粮食涨价的好处被谁拿走了呢？

除了笔者在前面介绍过的生活物资和生产资料价格暴涨，极大地吞食了国家对农产品提价的好处外，粮贩子获利之丰也令人震惊。仅黄世中所在的背荫河镇上，收购大米超过 3000 吨的大户就有 3 家，超过 1000 吨的有 5 家。他们掌握的粮食是镇粮管所收购粮食的 2 倍多。而在五常市大大小小的粮商及其大米加工厂就有 400 多家。他们信息灵通，资金雄厚，每当秋收后农民急需用钱时，就大量收购农民手中的粮食。比如，背荫河镇兰旗村附近的天禾米业老板从 2003 年秋收后到 2004 年初，就收购了近 4000 吨稻谷，加工成大米后出手价每斤 1.3 元。收购价和销售价平均每斤相差四五角。如果按 65% 的出米率，4000 吨稻谷可出 2600 吨大米，以每斤赚 0.4 元计算，毛利就超过 200 万元，这样的收益与种田的农民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据 2008 年 7 月 28 日的《中国经济周刊》报道，在净调出粮食量一直居全国之冠的黑龙江省，粮贩子（又称粮食经纪人）

在粮食流通领域中的作用已经举足轻重，人数达百万之众。他们利用信息不对称，压低收购价格，然后再高价卖给粮食承储和加工企业，赚取高额差价。这无疑也是加剧农民增产不增收乃至增产倒亏的原因之一。而且，不少农民反映，粮贩子在收购活动中，总是极力压级压价，短斤少两，损害农民利益，有的人甚至使用假钞票欺骗农民，弄虚作假，骗买骗卖的现象，在一些地方相当普遍。他们从中获利之丰，往往超出普通农民的想象。有一位名叫赵永禄的黑龙江粮商，同记者谈起农民种田和粮商倒粮的收益时，得意之中倒是说了一句非常坦率的话：“种粮的永远赶不上倒粮的。”他用自己的经营实践道出了当今中国一个客观存在的现实——当资本垄断市场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文规定的“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已遭到毁灭性的彻底的破坏。由人民公社集体耕作变成一家一户的个体生产者以后，农民既无力抵御不期而至的自然灾害，也无力抵挡资本对他们的剥削。

对于中国农民这种不可思议的种田白种，甚至倒贴的状况，国家虽然发了很多文件，开了很多会议，制订了很多措施，但在“中南海制定的东西往往出不了中南海”的当今中国，几乎都没有落到实处，农民的正当利益根本得不到保障。1993年河南省省长马忠臣，在全省农业工作会议上算了一笔大账——1993年河南全省订购小麦31亿公斤，全省7656万农民，人均40公斤，按每公斤0.734元的均价计算，即29.36元，上年全省农民人均收入588.34元，按负担5%提取，平均每个农民负担29.42元，也就是，全省小麦订购任务完成后，农民不仅拿不到一分钱，还要倒欠6分钱。马忠臣算出来的这笔钱，是排除了县、乡、村都按国家规定的上年人均收入的5%提取负担，而没有任何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的前提下，全省农民完成国家定购小麦任务后还倒欠6分钱。而当今中国农村，完全没有“三乱”的地方，大概是凤毛麟角。

而且，农民种田白种乃至倒亏的现象，直到国家在农村强制推行大包干 30 年后的 2008 年，仍然没有改变。就在这一年的三月六日，国务院发改委主任马凯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两会”期间，坦率地说了一句真实的公道话：“农民兄弟不容易，十年粮食才涨了 8 分钱。”马凯指的是，我国人民的三种主要粮食——小麦、稻谷、玉米，平均收购价格 1997 年时每公斤 1.5 元，现在（即 2008 年 3 月）不过是每公斤 1.58 元，10 年才涨 8 分钱（引自 2008 年 3 月 10 日《文摘周刊》）。

近 10 多年来，万物飞涨，不少物资一年几涨、一月几涨、一周几涨，价格成倍往上翻，群众怨声载道，而农民种出来的粮食，10 年间平均每年仅涨 8 厘钱，岂不是太匪夷所思了吗？难怪农民悲叹：“粮食一分一分地微调，化肥一百一百地提价，农膜一千一千地涨价，农机一万一万地升价，粮食增收部分一年一年地倒贴价。地里种的不值钱，工厂产的卖大钱，亏农、卡农、伤农何时了？！”工业品一年几个价，农产品几年一个价，乃至高产穷省、穷县、穷乡、穷村、穷户的事例举不胜举。据对山西著名商品粮基地运城地区统计，因为农资涨价太快，导致生产成本过高，种粮获利太少甚至倒贴，仅其中的 4 个县就有上万名种粮大户转业歇锄，从事其他行业或扩大别的生产，压缩种粮面积（见 1993 年 7 月 15 日《农民日报》）。

然而，农村改革后，岂止谷贱伤农呢？菜贱伤农、蕉贱伤农、林贱伤农……几乎与农字相连的行业都在伤农。

2011 年作为我国香蕉主要产地海南，由于受“乙烯利”传言的影响，香蕉收购价骤降。6 月中旬香蕉大面积成熟，蕉园收购价降到每公斤 4 角，由于成本远高于卖价，致使不少蕉农干脆让香蕉烂在地里。据《广州日报》披露，这一年海南 95% 的蕉农都亏本。随着蕉农资金链的断裂，外来资本趁机大量涌入海南种蕉业，一些来自广东的商人，在昌江、东方动辄就种植 2000 亩以上，投资多在一千万元以上，他们搞规模化种植，

香蕉行业的成本和香蕉定价权都掌握在他们手里,普通蕉农根本没有发言权,使海南种蕉成了“有钱人的游戏”。事实反复证明,唯有依靠集体化,农民才能实现规模化种植,才能抵御不期而至的天灾人祸和外来资本的掠夺。

菜贱伤农也触目惊心。2011年春季各地菜价涨得全国城市居民怨声载道。在长沙市经常是一天一涨,一斤青椒竟卖到八九上十元至十多元,尽管市场菜价如此暴涨,但菜贱伤农的例子却触目惊心。

2012年10月,山东济南市唐王镇7000多亩白菜迎来了大丰收,但遭遇价格大跌,每斤仅5-6分钱。那里的菜农说:“一袋大白菜七八十斤,就卖三四块钱,只能买俩烧饼,要算上运费,一个烧饼也买不了”(据新华社2012年10月25日讯)。

山东寿光市是全国有名的蔬菜基地,大批蔬菜出口日本、韩国,该市郝家村郝振良从1992年就投身蔬菜种植,对市场变化十分熟悉。但是,令郝振良没有想到的是,在全国蔬菜一片涨价声中,菜农却苦不堪言。2011年4月当地大白菜“够级别”的每斤5分钱,“不够级别”的根本没人要,郝振良对记者说:“你现在去地里挖大白菜,不但不要钱,人家还感谢你呢!”

郝振良算了一笔账,大白菜都是弓字棚种植。一个弓字棚如果占地3亩种植大白菜、卷心菜等作物,一季总产量在6万斤左右。而当季的种子、化肥、薄膜等投资在1.5万元左右。据目前行情,即使都以每斤5分钱算,一个弓字棚的大白菜还卖不到3000元。这就是说,种植一个弓字棚大白菜,至少要倒亏1.2万元,这叫菜农怎么种菜呢?

济南市39岁菜农韩进的遭遇,比寿光菜农更惨。

韩进和妻子在2011年种了6亩卷心菜,从1月在暖棚育苗开始,经过育苗、分苗、培育、浇水、施肥,投入塑料布、竹坯子、草苫子、化肥等等,夫妻二人每天都在菜棚照看打理,到4月中旬开始上市,结果菜价大跌。按4月16日最低每斤

收购价 8 分算，一亩卷心菜只能卖 640 元，按最高收购价 1 角 5 分算，也只能卖 1200 元，根本保不住投资成本，更不用说夫妻二人日夜操劳的劳动成本。2010 年，韩进听说养殖业能赚钱，花了 1 万多元购进一批小羊，结果因瘟疫全死光，一万多元就丢进了水里。今年种的 6 亩卷心菜，不计劳动，又将倒亏上万元。韩进看不到一点希望，就在 4 月 16 日这天上吊自杀了（参见 2011 年 4 月 29 日《作家文摘》）。

农村改革后，作为一家一户的个体农民，完全丧失了抵御自然风险和变幻莫测的市场风险的能力，而一些资本大鳄则恶意掀起了一轮又一轮诸如“蒜（算）你狠”、“豆（逗）你玩”之类的黑色风暴，既扰乱了市场物价，又使农民长期处于这种被盘剥被掠夺的状况。我实在难以想象，那些制定农业政策，决定农民命运的高官大吏——诸如农村改革“真正的圣明天子”们，“农村改革的真正的先驱”者们，面对“农民种田白种”，“农民种地只是锻炼身体”，一对农民夫妇种 80 亩地还不能养家糊口而倒亏 1700 多元的现状，面对成千上万的“种粮大户”、“种粮能手”、“种粮王”，因为种田种出来不赚钱甚至倒亏被迫“转业歇锄”，他们作何感想？当他们端起碗，吃着农民白流汗甚至倒赔本供养的白米饭、白面膜和香喷喷的肉、鱼、鸡时，是一种什么心情？他们对得起面朝黄土背朝天白流汗水白费力养活他们的农民吗？

第六节 “缺粮了就想到农民，丰收了就忘了农民”

中国其所以能用只占世界 7% 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 22% 的人口，首先应该感谢中国农民。在全国人民的所有生活资料中，农民兄弟提供的农产品及其加工品，就占 80%。如果没有九亿农民源源不断地为我们提供堆积如山的粮棉油猪鸡鱼等等生活必需品，中国社会恐怕一天也不得安宁，艾奇逊等人预言

“共产党也解决不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中国将永远是天下在乱，只有靠美国人的面粉才有出路”，可能就不会破产。但是，近二三十年以来，我们对为国家做出了重要贡献的广大农民，却是极不公平的。他们普遍没有享受国民待遇，早已成了被视为“低人一等”的“弱势群体”，往往成为社会的牺牲品。比如，在向农民收购农产品时，长期存在违背自古以来就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交易法则，只给农民打一张并不承诺何年何月何日能兑现的白条，结果几个月或几年以后再付给农民的粮款，由于物价飞涨早已贬值许多，农民却只能哑巴吃黄连，有苦作不得声。这实际就是国家掠夺农民。而且，一旦国家缺粮，即使因自然灾害等因素导致粮食歉收，农民手中粮食很紧，甚至自己都缺粮时，国家却要强行征购甚至抢购农民的粮食。而一旦粮食丰收了，农民盼望早点把粮食卖给国家，粮食收购部门却压级压价扣称扣水份卡农民，甚至限收拒收，出现所谓卖粮难。

1988年，由于连续不断的涝魔和旱魃在中国七亿多亩耕地上肆意横行，导致中国政府预计的全年8200亿斤粮食生产计划，被自然灾害打破。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当年中国粮食产量为7880.2亿斤，相差310多亿斤，比1987年还减产170亿斤，而粮食部门估计，这一年粮食产量实际减少500—750亿斤，则与国家计划目标相差330亿斤—580亿斤，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窟窿。

如此减产所造成的粮食短缺和恐慌实实在在。连有“小麦王国”之称的黑龙江省，面粉也不够吃，城镇居民的面粉供应被削减三分之一；而以大米为主的南方各省，部分供应粮必须改为面粉。粮食部门的官员坦言：城市粮食供应这么紧张，是十多年来没有碰到过的。农民的情况比城市更糟。据时任国家民政部部长张德江透露，全国2亿多灾民中，有相当一部分缺粮（以上见1989年6月11日《文汇报》）。

风里来雨里去不辞辛苦耕耘的农民，处于这种状况，自然不愿多交粮。据有关部门调查，1988年是中国粮食收购最严重的一年。甘肃武威地区粮食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1989年6月，还“只有五分之一的农民顺顺当当，交清了合同订购粮”，有一半农民是政府采取“强硬措施”才去交粮的。地方政府采取的“强硬措施”是，“乡长、书记分片包干，去劝去催去哄去骂去抢，身后跟着司法助理或派出所民警，侍卫者们大都是腰里掖着或手里提着家伙，一个村一个村地过，拉网一样”（引自1989年6月11日《文汇报》）。

在农民遭遇灾年缺粮之时，地方政府由党政官员带队，出动公检法这类专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带着“家伙”，“去劝去催去哄去骂去抢”农民的粮食，引起冲突当然就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啰。

产粮大省江苏六合县竹程乡副乡长和司法助理等人前往古墩村山里组催粮，当他们踏进军属黄进义家后，分摊到黄进义头上的2104斤秋粮征购任务，已经完成2080斤，只剩下12公斤没交。黄进义对几位催粮的干部说：“12公斤粮食我自己会交。有几个问题得说清楚，村支书兄弟跑到外面做工，其订购任务和提留款为什么要分摊到全组100多号人头上？……”

黄进义仅仅提出一个村干部如此无理加重农民负担的问题，乡、村官员就动了肝火，发生争执后，黄进义和儿子被用拖拉机强行拖到乡政府，被乡长、书记一顿拳脚相加后，打得口吐鲜血，一头栽倒在地，昏迷不醒。（引自1989年6月11日《文汇报》）。

这就是一位仅有12公斤征购粮没有交清的军属，向上门催粮的乡、村官员们提出一个谁都会提出的问题后的不幸遭遇。地方官员如此野蛮而残酷地对待农民，还有什么“人道”可言吗？

其实，地方官员也有苦衷，有的乡村官员就说：是“上面

把我们推到了与农民为敌的第一线”（见1989年6月11日《文汇报》），连地方官员都承认，他们是在“与农民为敌”，这样的干群关系不是太可怕吗？

因为天灾粮食减产，面对农民不愿交粮的实际，地方官员为了完成任务，强征硬收所采取的各种手段更是五花八门。因为各地普遍采取层层加压，设立“军令状”，完不成任务要拿政府官员是问，他们便挖空心思，想尽办法，“去劝去催去哄去骂去抢”农民的粮食。比如，江西很多地方就采取“清班子、扫院子、进村子、拔钉子”等等手段，督促党政领导成员带队，全体机关干部出动，下农村，进农户，去“清理”不肯交粮的“钉子户”。有的地方为了缓和群众的抵触情绪，避免矛盾激化，安排有关部门干部回自己家乡划片包干收粮，而且与工资奖金挂钩，有的地方则采取收粮与计划生育挂钩，只有完成征购任务，才给生育指标，否则孩子不上户口，不准子女上学，考上中专大学的子女，则卡住录取通知不给，甚至赶猪、搬家具抵征购粮。

通过如此种种在农村改革前闻所未闻的“强硬措施”，1988年最终总算基本完成了全国5000万吨粮食合同订购任务。但是，一位农民对记者说：“皇粮国税是得交，可看咋个交法。以前国库里满库的粮，那是咱农民敲锣打鼓，车拉马驮送去的，去年的（1988年）国库粮是咋满的呢？”据对安徽、江西、江苏、湖南等产粮大省的调查，1988年入库的征购粮，70%是县、乡、村干部开车到农民家里拉来的（引自1989年4月11日《报刊文摘》）。

“农民敲锣打鼓，车拉马驮送去的”，和“县、乡、村干部开车到农民家里拉来的”形象而鲜明地反映了农村改革后，或者准确一点说反映了集体化和单干化两个时期农民的两种态度。此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分田单干以后，国家把农业投资的重担全推给了农民，无所顾忌地大肆削减对农业的投入，以农

业人口和粮食产量都居全国第一的四川省为例。1985年—1987年三年间，全省农业财政支出为15亿多元，而同期全省购买小汽车却高达20亿元，用于官员们坐车的钱，比全省人民吃饭穿衣的钱居然还多了25%，可见政府对官员们坐车是何等重视，而对事关人民吃饭穿衣的大事又是何等淡漠。产粮大省江苏的情况同样令人震惊：该省的农业财政支出，1979年为8.2亿元，1984年降到5.9亿元，1985年再降到4亿元，只剩下不到1979年的一半；而到了1987年，如果不忽略物价上涨因素，江苏对农业的投入只相当于1979年三分之一。从全国来看，1953年—1980年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在全部投资中所占的比例平均为10.5%，其中1979年高达13.5%，而分田单干以后的1981年—1985年，平均下降到5.1%，其比重已降到不足1953—1980年平均比重的一半；“七五”期间再降到3.36%，与1953年—1980年27年间的平均比重相比，已下降到连过去的三分之一都不到；1994年甚至下降到2.6%，此时若与1979年相比，已经连五分之一都不到。国家对农业的投入如此吝啬，如此一年比一年下降，能怪农民不愿卖粮吗？

就在1988年全国农村因天灾而大减产，国家向农民强行征购粮食的第二年即1989年，对于鱼米之乡的湖南，是一个全面大丰收年，这一年，湖南粮食总产量达到265亿公斤，比1988年增加了11.5亿公斤；油料产量1175万担，比上年增加90.6万担；棉花产量150万担，比上年增加60万担；烤烟270万担，比上年增加17.2万担；水果1200万担，比上年增加520万担；甘蔗3000万担，比上年增加100万担……

如此大丰收，对于一年辛勤劳作的农民，实在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卖难”却像蛇一样缠着农民。

就在这一年的上半年，湖南不少地方还在为粮食紧张，市场价格猛涨而犯愁。收割后，农民立即为“卖粮难”而揪心、焦心。

洞庭湖区的南县，这一年产粮达4亿公斤，比上年增加7900万公斤，直到1989年11月，还有好几千万公斤粮食不能出手。而且，不光“卖粮难”，苎麻、烤烟、茶叶、湘莲、木材等农产品无不严重滞销。

那么，湖南的粮食是不是多得吃不完了呢？回答是否定的。被称为“湖广熟，天下足”的湖南，1949年粮食产粮不过64亿公斤，经过几十年奋斗，随着水利灌溉条件的极大改善，化肥、农药、种子等等的不断改进和日益提高，到1983年达到265亿公斤。谁知1984年出现了“卖粮难”假象，立即使本应持续增长的粮食生产，连续五年徘徊不前，从265亿公斤一下跌到1988年的253.5亿公斤。全省人均粮食占有量从1983年的481公斤跌到1988年434公斤。人均降低47公斤，猛然间全省出现“恐粮症”，买粮限量还要主杂粮搭配，干部、职工每人减少1公斤指标粮，长沙等地甚至出现了抢购大米的风潮。

1989年全面丰收，全省产粮总量达到265亿斤，人均也只有440公斤，除去种子、饲料用粮，全省实际人均还不到350公斤，离国家标准粮食占有量，还差一大截。

由于“卖难”，农民辛辛苦苦生产出来的农产品，无法变成货币，给农民的生产生活都造成了严重困难，伤了农民的心。该省祁东县1989年产黄花250万公斤，到1989年11月下旬，农民手中还积压着100万公斤黄花卖不出去；洞口县产柑橘65万担，到11月中旬才销了30多万担；嘉禾县青山村农民谢本发一天清早借了31斤大米，放在家里“应急”后，挑着一担烤烟赶到收购站想卖点钱拿回去“度难关”，结果等了三天都没有出手。从郴州地区的桂阳、嘉禾，到零陵地区的新田等县，都发生农民气得把烟叶倒进粪坑，甚至一把火烧掉的心酸事。

1989年出现的“卖粮难”，和1984年第一次出现的“卖粮难”情况完全一样——资金严重不足。在这一年，除了财政增加农业资金3800万元外，其他几条渠道筹资问题都没有落实，

农业贷款不仅没有增加，反而比大歉收的1988年减少9亿元，而农资价格却一个劲猛涨，据岳阳市统计，全市仅化肥、农药两项涨价，农民就新增生产成本7000多万元；除了农业贷款比1988年减少9亿元外，全省3602个农村信用社，有1507个在1988年亏损的基础上，新增亏损2855万元。据省农委提供的数字表明，到9月底，全省收购粮食向农民打的白条已达3.12亿元。桂阳县敖泉乡船山村农民李能文到收购站卖了49公斤烤烟，应得214元，但他实际只收到4元现金，另外该得到的是200元转账支票，10元钱定期储蓄单，至于何时能换成现钞，那就只能听天由命了。岳阳市的调查结果更令人沮丧，全市晚稻收购资金，到1989年11月还有81.7%没有落实，全市80%的乡、镇粮食收购站只得关门停业（引自1989年11月20日《湖南日报》）。粮食收购情况，糟糕到如此地步，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闻所未闻。

1990年的湖南，又是一个丰收年。粮食增产，棉花增产，油料增产，鲜鱼增产，经济作物也普遍增产……但同时出现的是：卖粮难，卖油难，卖茶难，卖麻难，卖猪难……

湖南有名的产粮大县宁乡，直到1991年春天，全县还有近1亿公斤粮食没有卖出去而压在农民手里；

被誉为湖南粮仓的沅江市南大区，1990年从发出7月1日开仓收粮的通知后，仅7天时间就完成了全年合同订购粮的任务，并超交粮食400万公斤。但直到1991年4月底，农民手里还压着将近1亿公斤粮食卖不出去。

常德市所属的7个县（市、区），无一例外都卖粮难。该市鼎城、安乡、临澧、桃源4县（区），1990年人均产粮800公斤，除去口粮、种子、饲料、订购粮，人均还有178公斤粮食卖不出去；该市鼎城区冲天湖乡的钟儒华、鲁由海、周顺芝三人都是全国闻名的、交粮5万公斤以上的粮食大户，全省粮食生产的三颗明星，在这一年却成了卖粮“困难户”。全国劳

模钟儒华，有 15 万公斤粮食卖不出去无处存放，只好放在村部公屋里；全国劳模鲁由海的 6 万公斤稻谷，直到 1991 年 4 月底，还寄放在乡粮站；周顺芝卖了 2.5 万公斤，家里还积压着 2.5 万公斤。谈起“卖粮难”，他们无不满脸沮丧：“毫无办法！就是不收。为了卖粮真是操碎了心啊！”

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压在农民手里卖不出去的粮食，高达 20 亿公斤。

中央和省里在那几年都一再重申，一再强调：农民手里的粮食，有多少国家保证收多少，而且不准打白条，但是一切重申和强调，在实际中都成了一纸空文。

不光“卖粮难”，其他经济作物同样“难卖”。

沅江市南大区除了产粮，还是有名的“麻区”。但农民卖麻无门。据调查，该区一般农户家都积压着 100—500 公斤苧麻。其中新湖村农民曹迪华家积压的 250 公斤苧麻，用塑料布包好在阁楼里已堆放了一年，开始变色变质；

常德市澧县是有名的油菜之乡，1990 年全县产油 32 万担，除去自食部分，农民手里积压着 1100 万公斤卖不出去；

截至 1991 年 5 月，1990 年积压下来的茶叶逾万吨，肥猪达 200 万头；等等。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除了收购资金严重不足，粮库紧张无处存放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比如，沅江市南大区，1990 年全区产粮 8450 万公斤，除了口粮、种子、饲料，还有 5000 万公斤粮食靠粮食收购部门收购，全区共 15 栋粮库，有效容量不过 2000 万公斤，连一半都不到；澧县某乡近 3 万人口，3 万亩稻田，但乡粮站的粮库容量才 378 万公斤，而 1990 年全乡订购粮却有 500 万公斤。这就是说，按国家有关规定，即使有收购资金，连订购粮也无法储存。粮食部门只好不断向粮库加码，但最后还有 250 万公斤粮食压在农民手里无法收购。该县共 170 栋粮库，有 120 栋超容。超容最多的达 36%，远远超出

警戒线。从湖南全省来看，也非常严重。截至1990年底，全省库容为85亿公斤，其中有效库容为65亿公斤。按国际粮食库容科学比例，应该是1:2至1:2.5，即收购1亿公斤粮食，必须具备2亿至2.5亿公斤库容量，才能进行正常的储运周转。湖南的粮食库容比例却只有1:1，即全省至少缺一半库容。

匪夷所思的是，一方面是粮食库容严重不足，另一方面是粮食仓库被拍卖，被出租。据2008年3月31日《经济观察报》披露，该省洪江市洪江镇原有三座粮库，2003年进行粮食企业改制时，全部卖给了当地人孟仕刚。孟又将其中的一部分租给了一个木材加工厂。当时洪江市除有一座中央直属的国家储备粮库，另有18座地方粮库。2003年粮食企业改制时，14家国有独资粮食企业中，除市粮油总公司和那个国家储备粮库外，其余12家国有粮食企业全部被清算解散。据洪江市粮食局党委周副书记介绍，这种清算解散国有粮食企业的情况，“洪江市周边地区普遍存在。”因为“政府没有按协议给费用，就随行就市卖掉了”。就连怀化市洪江区“唯一的直属粮库同时承担着湖南储备粮任务”的粮库，“每年3000吨的储备任务只占了一部分仓容，其他仓库便用来出租。”比如，“有一个仓库堆放酒、饮料等物，一个月租金1000元”。

明明至少缺一半库容，却借所谓企业改制，卖掉粮库，出租粮库，岂不是胡闹吗？

这种粮库紧张当然远非湖南一地。直到1997年，获得粮食总产量153亿公斤特大丰收的内蒙古，由于仓储条件不好，粮食收购后，经过烘干晾晒，便只好装入麻袋堆起来，或者堆在仓屯里，这两种做法都是露天状况下的原始存粮方法，不仅费用很多（一般情况下，建一个存放10万公斤的粮食仓屯，需资金4000元，仅能使用2年），投入人工多，技术难度大，而且存放质量很难保证。1996年，吉林获得粮食丰收，共收购465亿斤粮食，但吉林的最大仓储能力当时只有320亿斤，

等等。

而且,这种有粮无处存放的状况,长期没有改变。据2011年3月17日《法制周报》报道,在全国产粮大省黑龙江,当年收购粮食180万吨,其中就有一半只能露天存放,即用一排排竹板、芦苇、稻草等简易材料,组成一个个圆形尖顶小屋,排列在院子里,远看像连绵起伏的蒙古包,其实却是粮库的露天粮囤。同样是产粮大省的吉林,也有50%左右的粮食靠露天储存。如此存放粮食,不仅容易造成粮食损毁,据专家统计,我国整个粮食储存环节的损耗量达到20%左右,照此计算,每年就是5.5亿吨。而且,万一引燃露天粮囤,弄不好就会出现“火烧连营”的惨况,那就不堪设想了。很多地方的粮库,都是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期修建的简易粮库,大多属超期服役,地面老化、龟裂、返潮,严重影响粮食储备质量。农村改革后,粮食丰收了,国家却盖不起粮库,岂不令人费解?

由于国家既缺少粮食收购资金,无法收购农民的全部待售粮食;即使有钱收购,国家也无法储存。因此造成的“卖粮难”,给农民的生产、生活,就带来严重的困难,据常德市的调查,截至1991年3月,全市农民手里仍积压了3亿公斤粮食没有卖出去,由此导致该市产粮区80%的农户缺少备耕资金,严重影响备耕。

粮食减产了,国家缺粮了,就向农民强征硬购粮食;粮食丰收了,粮库里有粮了,农民生产的粮食国家就不收了,这地农民还怎么种?

由于在粮食问题上存在诸多长期没有解决好的问题,使我国粮食形势越来越严峻。“十一五”以来,我国政府一直强调粮食自给率要达到95%。但是,这个目标早已落空。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2012年3月指出,2011年我国进口粮食已超过1200亿斤,粮食自给率已跌破90%。此外,这一年我国还进口了627万吨植物油、330万吨棉花,

超过国内棉花产量一半；200多万吨食糖，200多万吨猪肉产品；可见我国农产品越来越依赖国际市场（引自2012年3月30日《经济观察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在2013年2月披露，如果按每人每年消费800斤计算，2012年中国已有1.9亿人口是靠进口粮食养活。再如大豆，1996年以前，中国是大豆纯出口国，到了2012年，我国进口大豆5806万吨，相当于全世界可以出口的大豆中60%都买来了（引自2013年2月15日《生活文摘报》）。另一个数字还显示，仅2012年前11个月，仅大米、小麦、玉米三种主粮我国的净进口量即达940.4万吨，为2011年的3倍（引自2013年2月8日《特区文摘报》）。对此，国外的担心正日趋严重，认为中国的粮食需求将导致全球粮食供应紧缺。而且，如果中国长期不能自给，国外粮食价格必然上升，中国能不能承受？

近三十年来，各级官员购买各种轿车不差钱，公款吃喝不差钱，公费出国游也不差钱，成千上万亿公款甩出去，“脸不变色心不跳”，为什么收购农民生产的粮棉油茶等农产品，建造事关13亿人民吃饭大事的粮库，就没有了呢。

第七节 硕鼠如虎：猛吞粮食收购款大嚼农民“白条粮”

在老百姓都说贪腐不断加剧的改革大潮中，中国粮库养肥了多少如狼似虎的“粮耗子”，大概是一个国家统计局也无法准确统计的数字。“粮耗子”们一面张开血盆大口，疯狂吞噬国家投入的粮食收购款，一面用獠牙利齿大啃向农民打白条收购的国粮，真是何其毒也。

在河南和山东两省交界处的兰考县固始镇，有一座代号为0211粮食储备库（下称0211库），自粮食企业改革伊始，“粮耗子”们似乎就看到了千载难逢的良机，纷纷把黑爪子伸进了粮库。他们“上下串通，内外勾结，人人参与，”“通过合伙虚

开粮食收购发票，空打粮食入库单据”等手段，在短短三年多时间里，把 480 多万斤国家储备粮吞进了肚里，创造了在一个省级储备粮库里，个个是食我粮黍的“硕鼠”奇迹。

1997 年，吴平周出任 0211 粮库主任后，便乘改革的“春风”，安排亲信虚开粮食收购发票，侵吞国家粮食收购款。尝到了甜头，却无人过问，胃口越来越大，黑手也越伸越长。1999 年夏粮收购时，吴平周首先在粮库存入 7200 斤粮食，拿到代存粮本后，又以要交定购粮为名，在不缴代存粮本的情况下，让职工王春梅给他开出同等数量的粮食收购发票，取出现金据为己有。

主任带了头，上行下效也就水到渠成。粮库副主任宋绍明，随即让职工杨长信等人开出 4 张粮食收购假发票，各自拿回村里，顶了家里应交的提留、统筹等任务。于是，这个由粮库领导带头“开创”的办法，就成了粮库所有职工每年照例虚开粮食收购发票、侵吞粮食收购款的公开手段。一名职工坦率地说：“领导带头开谁不开？谁不开谁就是傻子！开假发票时，谁都不用说，一个动作，一个眼神，假发票就开好了。我一上磅（即收购粮食），就不由自主地想开假票。别人开（假）票都发（财）了，不开白不开，谁不开（假）票谁吃亏！”

就是在这样一种粮食系统的改革环境中，使这个省级储备粮库里的 60 多名工作人员，无一例外个个成了盗窃国粮的贼，如此国粮储备库大概是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奇迹”。据后来的调查表明，从 1997 年粮食系统改革开始，到 2000 年案发，每年夏粮收购时，0211 粮库的“粮耗子”们便会条件反射似的闻风而动，人人参与，或三人合伙或多人联手，虚开粮食收购发票。他们不仅以此为自己家里，为亲属，为亲戚家里充抵应交的订购粮，还把多开的粮食收购发票，卖给邻居或村里的其他人，有的人甚至把自己用不完的粮食收购发票，拿到街上用低于国家收购价 20% 左右的低价公开叫卖。粮食收购员黄

某英，家里不在固始，当地也没有亲戚，就把开出来的 13600 多斤假收购发票，卖给了西关村负责人，让他们顶村里的公粮任务。如此倒卖从粮库里公开开出来的粮食收购假发票，大概是他们个个成了偷粮贼以后创造的又一个“奇迹”。

国家储备粮库，既承担着国家粮食收购和保管任务，同时肩负着按国家保护价收购农民粮食和国家粮食安全的政治任务。历来有一套非常严格的规章制度和管理条例，这是新中国成立几十年间粮食仓库从来没有出过问题的根本保证。改革开放以后，各项规章制度都在改革的旗号下被冲得七零八落，以致使这样一个省级储备粮库，在长达三四年时间里，所有工作人员全体参与的疯狂虚开粮食收购发票，无所顾忌，畅通无阻，将 480 多万斤国家储备粮轻而易举就揣进了自己腰包，由此又造成大批农民把粮食卖给国家后，得到的只是一把谁也不知道何时能兑现的“白条”。对这种令人民痛心令农民伤心的怪事，这个省级储备粮库的众多管理机构及其官员，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他们还有半点责任心吗？

广东省湛江市徐闻县粮食集团公司，在粮食企业改革中，在湛江乃至广东都堪称闻名遐迩。一是因为它担负着管理省级储备粮和县级储备粮的双重任务；二是从 1999 年李培育出任集团公司总经理后，“大胆改革”，使这家亏损的国家粮食企业的经营额突破 1 亿元，企业“扭亏为盈”，“连连盈利”，李培育也因此成了有名的“优秀企业家”和县、市人大代表，头顶桂冠，光环耀眼。三是李培育在大力编织桂冠制造光环的同时，从 2006 年 3 月至 2008 年 9 月两年半时间内，“大胆创新”，擅自卖掉了省级储备粮和县级储备粮共计 3257 万多斤，获得销售款 2648 万多元，其中的 1631 万多元被李培育私自挪用、挤占，由远近闻名的“优秀企业家”，成了全省闻名的“粮耗子”，这家粮食集团公司自然也“名声大振”，“饮誉全省”。

储备粮是关乎国家粮食安危，国家经济发展和国计民生大

事的特殊商品。管理制度历来十分严格。储备粮的销售，不仅程序十分严格而复杂，而且其操作流程，受到广东省储备粮总公司、徐闻县粮食局、农业发展银行徐闻县支行等众多部门的严格管理和频繁检查，堪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2005 年底，徐闻县粮食企业集团公司与广东省储备粮管理总公司签订的合约就明文规定：“广东省储备粮管理公司具有监督管理徐闻县粮食企业集团公司按规定承储、轮换省级储备粮的责任；”作为合约第三方，徐闻县粮食局这个政府管理机关的责任是：“承担徐闻县粮食企业集团公司全面履行合同的监督管理责任”；农业发展银行徐闻县支行，则负有“定期赴现场查库对账”的责任，而且规定必须“月月有检查，次次有记录”；由这么多单位和部门编织起来的监管大网，对于徐闻县粮食集团公司来说，纵有三头六臂，也插翅难飞。然而，李培育在长达两年半时间内，却如天马行空，一次又一次轻而易举就把 3257 万多斤省级储备粮、县级储备粮擅自卖了。若按 60 吨的火车皮装运，这许多储备粮至少需要 271 个火车皮才能运走，而李培育却像农民卖自留地里的小菜一样卖掉了，岂不怪哉？

其实李培育既无任何超人本事，也没有什么神奇绝招。他使用的仅仅是“熏仓”这么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手法。“熏仓”本是粮库里一种十分常见而极其普通的除虫方法，只是李培育在“熏仓”的同时，也用烟酒大“熏”检查人员。只待烟酒“熏”完，检查官员们酒醉饭饱便满载而去，谁还记得什么检查粮库呢？对国家负责，对人民负责，都被“熏”得无影无踪。

至于直接负有监管责任的行政机关，如徐闻县粮食局的头头脑脑，更是利欲熏心，成了和李培育的同伙。徐闻县粮食局和徐闻县粮食企业集团公司就在同一栋楼上办公。粮食局长李堪玉和李培玉的办公室相距不到 30 米，此人把“监管”粮食企业集团的职权，完全变成了违法违规进行“骗购骗销”粮食

企业集团的私权。仅从2007年10月至2008年10月的一年间，这位“监管”粮食企业集团的粮食局长，从“骗购骗销”中就获得了511.8万元差价。本来负有现场对账，并必须做到“月月有检查，次次有记录”的银行系统，也被李培育熏得晕头转向，对粮食企业集团虚报报表，公款私存，虚报应收款科目等等，可以说是一目了然的违法违规行爲，一概视而不见。这就是说，从上级到同级，从内部到外部，那张本来编织得十分严密而又牢实的监管网，完全成了虚设。是众多监管机关的众多官员“全体失职”，他们用自己的失职，创造了一个从内部到外部，从上级到同级“谁也不负责”的粮食改革典型。只要其中有一个部门或者其中有一人“真正负起了责任”，李培育就绝无可能把需要用270多个火车皮才能运走的3257万多斤国家储备粮，轻而易举擅自卖掉。

如果不是2008年国家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格，粮库出现的巨大窟窿再也难以遮蔽，李培育不得不向财政打报告，要求“预借”2000万元巨款“补足库存”，引起了有关部门警觉而开始对此案展开侦查，还不知道李培育将会把这个国家储备粮库，弄到什么地步呢！

自从1992年邓小平提出改革“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以后，不少手中有权、头脑灵活的大小官员的胆子，便迅速增大。李培育敢于把3000多万斤国家储备粮擅自卖掉，这“胆量”至少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无人可比”。但是，若与黑龙江省富锦九〇粮库（下称九〇粮库）主任刘忠库相比，那可就小巫见大巫了。

九〇粮库位于黑龙江省三江平原产粮区腹地富锦市九〇公里，因此取名九〇粮库。该粮库建于1971年。粮库大门上方赫然高悬“九〇国家储备粮库”八个大字，威武气派。粮库可储粮120万吨，是东北最大的粮库，“占地面积居全国之首，收储能力在亚洲也屈指可数。”

匪夷所思的是，管理这样一座重要粮库的政府管理机关，在改革大潮中，居然把这座“占地面积居全国之首”，“收储能力在亚洲也屈指可数”的国家储备粮库，“大胆”地交给了一个“既不是工人，也不是干部”的所谓“职业经理人”刘忠库管理。如此“大胆”改革用人制度，自新中国成立以后肯定绝无先例。政府机关如此“大胆”信任刘忠库，自然给了他巨大鼓舞。刘忠库戴上九〇粮库主任的乌纱帽以后，随即“大胆”地将自己的一个又一个亲属、亲戚塞进了九〇粮库，让她们“占据着肥差”，把持粮库各个主要环节的大权。这就注定了九〇粮库的改革，是一场无法避免的灾难。

这座“收储能力，在亚洲也屈指可数”的国家储备粮库里，装着满满仓的粮食，这是令刘忠库这位“既不是工人，也不是干部，而是所谓社会能人”的粮库主任，两眼放光的发财资本。我们且看看刘忠库当上粮库主任后，由领导带头，全库偷粮的奇特景观是何等触目惊心。

说是偷粮，其实有点“冤枉”刘忠库及其一伙。偷者，乃避人耳目的偷偷摸摸之举。刘忠库掌管九〇粮库后，这个国家储备粮库就被当地人称为刘忠库的“独立王国”，知情人把这个“独立王国”概括为九〇粮库“个个都是贼，领导骗钱有术，四大金刚敛财有道，检斤员生财有路，装卸工和更夫得外财——偷粮卖”。所谓“四大金刚”，即指粮库仓储股、保卫股、质检股和化验股的四名股长。凡是“管事的”大小头目，“明目张胆”开着大货车，或者用公车一车一车公开把粮库里的储备粮“偷”出去倒卖；“正式工”也“不避人耳目”，他们都敢“在白天行动”；把大货车停在粮库外，装卸工和保安则在粮库四周的河沟上铺上跳板，把装满稻谷的麻袋，一袋一袋“往车上装”，而且搞的是成群结队的集体行动，三五分钟就能结束“战斗”。只有下层职工和临时工，才在晚上偷粮。

国家粮库里的储备粮，被粮耗子们用汽车、用火车一车一

车拖出去卖给了外地粮商，国粮库空了，刘忠库及其一伙，为了掩盖真相，干脆把粮库租给粮贩子，他们不仅可以继续得到国家规定的每吨 80 元计划指标粮保管费，套取大笔保管费，还能获得租金，可谓一举多得。

粮库里从主任到门卫都如此公开偷窃国家储备粮倒卖，刘忠库的好些个亲戚，自然也把手伸进了粮库。他们的办法是向刘忠库“借船出海”、内外勾结，大做粮食倒卖生意谋利。

弄虚作假，是一切粮耗子侵吞国库储备粮普遍使用的手法。但这个粮库的弄虚作假则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比如，1998 年 5 月 25 日这一天，该粮库出库粮食高达 28000 吨，并称“是通过汽车发往大连”。如果按每台汽车载重 6 吨计算，需要 4700 多台汽车，按常规情况，至少得 4 个月才能运完。但在该库 6 月 25 日的账面上其销售额已在当天全部入账。审计还发现，1997 年 3 月至 1998 年 3 月一年间，伪造假凭证 3000 多张，制造了收购国家储备粮 41570 吨的假象，套取农发行贷款 3967 万多元，骗取国家政策性补贴 339 万多元。骗取的 3967 万多元贷款中，除了一部分用于购买材料，还贷以外，大部分被以私人名义，存入当地储蓄所和信用社的 30 多个账户。为了把这种“空手道”玩得更“真实”，粮库将十几名专业人员在暗室集中，使用“流水作业”的形式，伪造票据。为了达到以假乱真，他们将以前农民交粮的存根上留下的姓名、村屯名称抄下来，编造收粮数量和金额，然后再盖上各个环节的经手人名章，真是绞尽脑汁，挖空心思，做得滴水不漏。

对于这座粮耗子窃粮已疯狂之至的国家粮库，富锦市政府、市粮食局的官员们，面对上级派来的审计人员，居然拍着胸脯保证：“请领导们尽管放心，我们这疙瘩绝对不会有问题。我们以党性作保证！”（引自《法制与生活》1999 年第 11 期）。而且，当地政府机关的这种极其不负责任的做法，早已有所暴露。1998 年 5 月，富锦市粮食局组织单位内部自查时，就已发

现该粮库虚购问题。局里不仅没有做任何处理，更没有追查下去，而且“想了个办法”，让粮库将虚购的粮食虚销了事，写下了粮食局和粮库联手欺骗国家的“新篇章。”

案发后，仅刘忠库供出的涉案人员即达 70 余人。在这个储备粮库内外，居然隐藏着如此众多的偷粮大盗，他们在上级庇护下无所顾忌地如此公开偷窃国粮库里的储备粮，我相信古今中外也绝对无人敢与匹敌，即使粮库里装着一座泰山，大概也不须多久，就会被他们偷空。国家用“白条”把农民的粮食收来，养肥了如此旷世硕鼠，叫农民兄弟怎么想呢？

更邪乎的是，在这座国粮库里，粮食还没有收购入库，就被偷粮贼偷走了。

每年收购粮食季节，都是检斤员（又称过磅员）等人大偷国粮、大发横财的黄金期。他们和粮贩子互相勾结，私下订立口头协议，在粮食收购上大做文章。粮贩子开着大货车来卖粮，过磅员过完磅开出票后，粮贩子将已经过磅开票的一车车粮食，开到粮库里转一圈，再开回来第二次过磅开票。如此周而复始，一车粮不等入库就能“套取五车粮的钱”，然后检斤员和粮贩子七三分成或八二分成，将套出来的粮食款装进自己腰包。刘忠库的外甥任成果（音），就是他塞进粮库做检斤员的亲戚之一。案发后，粮库第二把手——副主任王明安和刘忠库的外甥，都“不知所踪”，11 名副主任中的另一名副主任翟大辉在长春坠楼身亡。多名官员证实此人系他杀。

据中纪委派出的调查组截至 2008 年 4 月底的初步调查，仅账面上无法对账的资金数额即达 9 亿元之巨。如果按刘忠库被抓后供出的 70 多名涉案人员平均，每人涉案资金接近 1300 万元。

这是改革以后，又一座国家储备粮库打着改革的旗号，创造的又一个鲸吞国家储备粮款，大啃农民“白条粮”的旷世奇闻；也是从内部到外部，从同级到上级，谁也不负责任的又一

个典型。谁知道我们制造了多少这类典型呢？

改革以后，由于管理粮食部门的政府机关毫不负责，一座又一座国家储备粮库，被那些胆大妄为的粮耗子，弄到这种地步，不仅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怵目惊心的巨大损失，而且严重破坏了国家粮食市场的稳定和政府的形象！

据《财经》杂志披露，自1992年4月1日至1998年3月底，6年间，国家粮食系统出现的亏空达2140亿元，平均每个月出现29.7亿元的大洞，平均每天一个亿。如果按当时国家每100斤稻谷收购价55元计算，等于每天有9000多万斤粮食不翼而飞。如果用2140亿元收购粮食，能使多少农民免受“白条”之苦啊！

2140亿元，占全国粮食收购贷款总额的39.4%。用这笔钱，可以建100万所希望小学，可以建1万个工厂，如果以一个工厂1500人计算，可以解决1500万人就业。

如此巨额亏损延续6年之久，这大概是中国历史上绝对没有世界历史上也不可能有的“奇迹”。人们无法理解，那些管理国家粮库的庞大的政府机关及其享受着优惠待遇的大小官员，到底是怎么管理国家粮库的呢？我们这个还有数以亿计人口处于贫困线以下的国家，我们这个向农民收购粮、棉、油、麻等农产品，长期给农民只打白条不给钱的国家，怎么会出现这种怪事呢？

第八节 骗你没商量：骗了总理、副总理，再骗国务院

1998年5月22日，对于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来说，可能是终身难忘的一天。当时正是全国农村每一个地方，都在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决定》（即国发（1998）15号文件）和另外六个配套文件之时，也是我国1995年、1996年农业连续获得丰收后不久，当时的统计部

门向朱镕基报告，我国的粮食已多得“粮库装不了了”，朱镕基回答：“没关系，现在我们停产、半停产的企业多得很，可以把厂房腾出来装粮食。”（见2011年8月2日《作家文摘》）。各地农民“卖粮难”，卖了粮给农民打白条的现象，多年都没有解决，引起了农民强烈不满，而安徽是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又是有名的粮食大省，芜湖则是安徽久负盛名的米市，米市的靠山则是被誉为“安徽粮仓”的南陵县。因此朱镕基于5月21日抵达安徽后，第二天（即5月22日）就直奔南陵县进行实地考察。意在通过考察掌握实际情况，以指挥粮食流通领域的体制改革。

他考察的第一站是南陵县峨岭粮站。来到峨岭粮站时，朱镕基就问粮站站长：“你们敞开收粮了吗？”

“敞开收粮了。”

“你们去年收了多少粮食？”

“去年收购5000吨，前年才收1700吨左右。”

“你这个粮站收一个乡还是几个乡的粮食？有多少亩田？总产多少？”朱镕基一口气提了几个问题。

粮站站长也对答如流：“收一个乡，全乡23000亩，产粮一万五千吨。”

“你虽收了不少粮，但除去农民的口粮和种子，你还没有收尽余粮嘛！这怎么叫敞开收购呢？双季稻亩产不到700斤？你得讲实话啊！”

应该说朱镕基问得比较具体，那位粮站站长回答得很流利。

也许是朱镕基并不满足于数字，他在峨岭粮站考察时，还亲自察看三号粮仓，面对高高的粮食堆，他“忍不住亲自爬上粮堆的最高处”。这位国务院总理在南陵亲眼看到了粮食满仓的美妙现实。

朱镕基在安徽先后到鱼米之乡的芜湖、巢湖以及合肥等地，

考察了粮站、粮库、粮店以及收购、储存、销售等方面的情况。

据《芜湖日报》5月27日在头版头条刊登的《朱镕基总理来芜视察》一文中报道：“视察中，朱总理对我市贯彻国务院15号文件，深化粮食流通领域体制改革做的工作给予了肯定。”他不仅听到了“粮站站长敞开收粮”的汇报，还亲眼看到了“稻谷满仓”的美景。

然而，朱镕基做梦也不会想到的是，他在芜湖市南陵县峨岭粮站亲眼看到的，竟是当地三级政府有组织、有计划、有安排、有验收紧锣密鼓策划的一场骗人的假戏真做，而且这场在中国历史上肯定是绝无仅有的假戏，还把精明过人的朱镕基骗得眉开眼笑。

这场旷世假戏的大幕，是1998年5月15日拉开的。朱镕基要来安徽视察，首先当然只有省里极少数人知道。但这一天，鹅岭人也得到了朱镕基要来鹅岭粮站考察的消息。也就从这一天开始，各式各样的小轿车不断开进了鹅岭粮站。粮站工作人员都感到不断有各种“神秘指示”从上级传来，但那些神秘指示谁也不知道来自哪位上级领导。

鹅岭粮站其实是一个亏损粮站，为了把一个空空如也的粮站，以“粮食满仓”的美景展示在朱镕基面前，那里的政府从5月18日开始，就将已经组织安排好的运粮大军投入了抢运粮食的“紧张战斗”。几天之内，浩浩荡荡的车队从三里、烟墩、工山、陈桥等地的粮食仓库抢运来了1031吨粮食，把鹅岭粮站装得“粮食满仓”。参加粮食抢运和入仓前打包战斗的司机、工人等有关人员达200多人之众。仅运输费用就耗去十多万元。

从5月18日至5月21日这四天，鹅岭粮站的工作人员就没有睡过一个好觉。粮站站长刘鸿自然更加忙碌。第一个晚上忙到凌晨2点，第二天晚上忙到凌晨4点，以后几个晚上，因为时间太紧任务太重，干脆就没有睡觉。因为不知道朱总理会看哪个仓，所以对每个仓都不能有半点马虎。

南陵县委、县政府对迎接朱镕基的到来，当然更不敢掉以轻心。副县长汤春和始终在现场“坐镇指挥”，连晚上也不敢休息，让粮站人员第一次见证了领导屈驾和群众一起战斗的一幕。

为了使这场假戏做到万无一失，并且演得有声有色，5月21日上午，芜湖市委副书记倪发科领着省、市、县三级党政组织“一大帮”头头脑脑，亲临鹅岭粮站，对第二天就要给朱镕基演出的这场大戏，进行现场验收。（见1999年2月9日《羊城晚报》）

在这种上下“同心协力”，争分抢秒、紧锣密鼓的策划、准备中，三里中心粮站（鹅岭粮站属三里中心粮站管辖）站长俞水华，作为一线指挥当然很不轻松。他不仅要按照上级指示，把粮站的各项工作安排妥帖，还得抓紧时间背熟记牢预先由县里专门拟好的各种数据和有关情况。因为这些数据和情况，都是县里经过反复分析、考虑，朱镕基极可能提问的内容，决不能有半点纰漏。

也就在朱镕基第二天就要来峨岭粮站考察的5月21日，粮站职工被告知，“为了安全起见”，5月22日这一天，他们都不准入仓。与此同时，三里中心粮站站长俞水华通知刘鸿，5月22日这一天，刘鸿“临时”改任粮站仓库管理员，站长由俞水华自己担任。俞水华告诉刘鸿，这样安排是为了“更方便向总理汇报工作”；三里中心粮站站长则由县粮食局副局长杨赤峰临时担任。朱总理走后“你（刘鸿）还是峨岭粮站站长”。

5月22日上午十时许，朱镕基一行来到峨岭粮站。已临时改任粮站仓库保管员的刘鸿，“远远地站在一个不被人注意的角落里”。整个峨岭粮站，除了刘鸿没有一个真正的峨岭粮站职工，全部由上级安排的各色“演员”代替。

如此精心布置、精心组织、精心策划、精心安排，就是为着向朱镕基展示一个“真实”的假象。

朱镕基在峨岭考察，不仅看到的“稻谷满仓”是假的；不仅看到的所有峨岭粮站的职工全是假的（唯一的真职工刘鸿被安排“扮演”仓库保管员，站在远远的角落里，根本看不到）；他听峨岭粮站假站长俞水华“敞开收粮了”等汇报，也全是假的。南陵县根本没有执行中央以保护价收购余粮的政策，连计划内的订购粮，都只收 50%。也就是说朱镕基在那里看到的、听到的全是假的。他在峨岭看到的是一场由当地官员精心策划的、彻头彻尾的闹剧。

今天，当我们重温这段往事的时候，谁能为那里的党政组织及其大小官员如此胆大包天地把这场闹剧策划得如此周到、周密而惊叹吗？

然而，可能更令朱镕基惊叹的是，从他踏上峨岭这片土地之日起，南陵警方不知奉何方神圣之命，以各种借口，就软禁了当地三位农民。

比如，钱宏宽，他在峨岭乡是比较典型的特困户。两名年过而立的儿子，因为穷都打着单身。峨岭乡在搞乡镇规划时，拆掉了钱宏宽赖以栖身的房子。按规定，钱宏宽应该得到六间门面房的同等面积，但乡党委书记许长托（后任南陵县企业局副局长），只给三间门面房，却将另外的门面房地皮擅自卖给了他人，而将钱宏宽安排到一个偏僻地方去建房。钱宏宽自然不同意，只好住在一个临时搭建的破棚子里。他听说朱镕基要来峨岭，写了一个状纸，准备交给陪同朱镕基的上级领导。5月22日凌晨5点，峨岭乡派出所所长江安均就敲开了钱家的门，把钱宏宽带到了派出所，直到朱镕基离开才放他回家。

彭生华因为心中不平，听说朱镕基要来峨岭，也写了一份上诉状。当地派出所指导员朱堆发于先天晚上就带着三个人找到了正在住院的彭生华，对彭说：“你不要乱搞。搞不好省、市、县一大帮子人都要丢乌纱帽。你有什么要求，我们尽量办到。”

5月22日，朱堆发又赶到医院，发现彭竟走到了县政府，

身后已围着几个刑警队的人。彭生华要求回家，朱堆发说现在不行。后来彭生华回了家，但公安局的人也围了上去，不准他出门。

朱镕基当然不会想到，他的峨岭之行，会导致三位农民失去自由；他更不会想到，在统计部门向他报告国家的粮食已多得“仓库装不了”的时候，他正在指示把“多得很”的“停产、半停产企业”的厂房腾出来装粮食之时，他竟在被誉为“安徽粮仓”的南陵县粮食仓库里，看到的其实是空空如也。过去曾看到有人写文章，说“大跃进”时有的地方为了“放卫星”，把几垅田的稻子搬到一垅田里来打，以制造“高产”卫星。但笔者至今未看到哪位秀才具体交待是哪个省哪个县那个公社，由什么人指挥什么人操作这么干的，因此也只好存疑。而在1998年5月15日至22日，安徽省芜湖市南陵县却有组织、有计划、有安排出动200多名司机和打包工人，把三里、烟墩、工山、陈桥等众多粮库里的1000多吨共计200多万斤稻谷，搬到了峨岭粮库，经过芜湖市委副书记倪发科领着的“省、市、县一大帮”“党政官员”验收后，让朱镕基在那些本来空空如也的粮仓里，看到了令人喜笑颜开的“稻谷满仓”。造假造到这个份上大概是史无前例。

当天下午，朱镕基从南陵赶往芜湖市，立即召开了座谈会。朱镕基在会上说，在农业问题上，在中央要对农业做出重大决策时，我往往到安徽调查研究……在这方面，许多成功的经验都是从安徽来的，安徽做出了很大贡献（引自1999年2月7日《燕赵都市报》）

能够为中央做出重大决策，提供“许多成功的经验”，理所当然令安徽人自豪。由此可见朱镕基是何等倚重安徽。朱镕基先后五次到安徽考察，其他四次的考察情况，不知其详，至少这一次朱镕基在峨岭粮站亲眼看到的是彻头彻尾的假象，是一场地地道道由地方党政组织精心策划的假戏，是一个旷世罕

见的骗局。

朱镕基被安徽骗了，但他并不是第一个在安徽被骗的国务院高官。第一个被骗的是温家宝。

比朱镕基考察芜湖市南陵县早5个多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于1997年11月25日至26日到安徽芜湖调研时，也到了南陵。由于此前还没有这样的高层领导，来南陵这样的小地方考察，安徽省各级领导都非常重视。当地政府都想借温家宝来南陵调研的良机，为地方争取点项目。市里县里想的是，南陵在黄墓镇已有一座省级储备粮库的基础上，再建一个中央级粮食储备库。只要这个储备库一立项，财源就会滚滚而来。他们希望得到温家宝的帮助和支持。为此就必须让温家宝看到南陵的粮食无处存放的“危机”。但当时已是11月下旬，田里的稻子早已收割完毕，稻谷都已入仓，而且那个省级储备粮库也没有装满，还有空余的库容，温家宝怎么还会支持再建中央级储备粮库呢？为了充分表现南陵粮食很多，农民卖粮非常踊跃，粮食多得没地方存放，那里的官员们纷纷开动脑筋，终于有人“出奇制胜”，从蒙古包得到启发，决定以类似蒙古包的形式，在粮库外面大搞露天堆放粮食。

至于需要的大批粮食从哪里来，那里的政府官员自有办法。领导决定：从外地调！下面立即闻风而动。从11月20日开始，由中心粮站向各个粮食分站下达调粮指标，具体落实从东塘、朱池、奎湖、仙坊等几个粮站调运，大约四天多后，就用从以上各粮站紧急调来的粮食，做好了10个露天堆放粮食的蒙古包。耗资数十万元。每个蒙古包堆放了约20万斤，总共在蒙古包里露天堆放了约200万斤粮食。这个数字和从外地调粮向朱镕基展示的数据几乎相等。放眼望去，在粮库外面一溜排开的10个蒙古包，气势非凡地向人们展示出南陵粮库爆满的“盛况，”和不得不露天堆放的窘迫。而真实情况是，由于限制农民卖粮，卖了粮也打白条，那里的“粮库基本上是空的”。

经过如此策划，地方官员们似乎觉得还不足以显示南陵粮食无处存放的“严重危机”，粮站还特意贴出布告，并公告粮价，欢迎农民踊跃卖粮，以显示粮站是向农民“敞开收粮。”当时南陵确实有粮食，但因资金等方面的问题，粮站总是以各种理由拒收农民的粮食，农民就只好把粮食卖给粮贩子而不来粮站卖粮，这也是温家宝来南陵调研时粮库无粮的重要原因。现在粮库居然贴出布告收粮，有的农民明知是粮站在“做戏”，却故意在这天来卖粮。组织策划者本来是在演戏，需要的只是农民争卖粮食的“热潮”，却害怕农民真的来卖粮。一些农民则抓住粮站怕丢脸的心理，拼命卖粮，气得粮站的人直翻白眼。

经过如此策划、组织、运作，温家宝当然看到了南陵粮食多得放不下的“美景”。看完粮站后，温家宝在11月25日下午5时许，又到了粮站附近的皇墓镇俞村。在温家宝进俞村前，村干部“奉上级指示”，“要村里老百姓像过年一样，菜要买好些，衣服要穿着艳丽些，”村里还特地购买了一批挂历，每本18元，一定要村民“买回去挂上”，还有的村里，叫村民借来彩电和新家具摆放在家里……（引自1999年2月7日《燕赵都市报》）。温家宝看到的自然是粮食无处放，家家丰衣足食的美景。

在1997年11月至1998年5月的短短半年时间内，就有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副总理温家宝，相继在安徽被骗。就凭这“两骗”如果评选中国历史上的“蒙骗高手”，我相信非安徽的这些官员莫属。但是，令人惊叹的是这种蒙骗，以后还在安徽继续上演。

2004年，安徽阜阳劣质奶粉夺命伤人案，使数以万计的中国儿童，受到丧失人性的摧残，使数十万儿童父母及其亲人，惨遭巨大痛苦和终身难愈的伤害。此案震惊中央，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可安徽阜阳在查处时，居然胆敢欺骗中央，欺骗国务院，欺骗全国人民。当地政府仅对太和县城东工商所正副所长予以免职，将两名管理员予以开除了事。这种处理本来就

是罚小不罚大，丢卒保帅的搞法。在全国造成那样严重的夺命惊人大案，难道就是两名工商所长的责任吗？而更加令人愤慨的是，这种完全是象征性的处理结果上报国务院，并通过诸多媒体向全国人民公布后，时隔月余，新华社记者却发现，被撤职、被开除的四个人，竟照常上班，“待遇不变，职权不变。”所谓上报国务院的处分，只是为了“应付上级”，领导还向他们承诺对处分“不上传不下达”，你们照旧“上你们的班，执你们的法。”那里的县太爷们，就是用这样的假丢卒真保帅，给中国历史写下了“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的安徽版。

也就在这一年（即2004年），安徽省淮南市风台县刘集乡山口村，通过虚报骗取国务院移民建房补助资金300万元，再次写下了“小村”骗到“国务院”的安徽版。（引自2004年第18期《时代潮》）

一个省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欺骗国务院总理、副总理，欺骗国务院，肯定是中国历史上绝对没有的“奇迹”。而更加令人瞠目的是，朱镕基在峨岭粮站被安徽上上下下有组织、有安排、有指挥、有验收制造的假象欺骗后，峨岭镇副镇长胡林英向中央电视台进行了实名举报，中央电视台于5个月后的1998年10月下旬派记者到当地调查，看到的峨岭粮站已是空空如也（从各粮站运来的200多万斤粮食在朱镕基离开后已陆续退还各粮站），相关的采访对象，向央视记者叙说了造假内幕。11月12日晚上焦点访谈播出了《粮食“满仓”的真相》，将芜湖欺骗总理造假案公诸于天下。按理安徽方面首先应该深刻检查，而事实却恰恰相反。

南陵县粮食局以文件形式对焦点访谈做出的反应是“虽然报道内幕与实际不尽相符，但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们的工作确实存在不足的信号”（见1999年2月17日《羊城晚报》），如此彻头彻尾的造假，居然只是工作中“存在不足的信号”。

芜湖市委、市政府也发了文件，文件只承认“搞了形式主

义”，不仅不承认弄虚作假，甚至继续弄虚作假。比如，将从各地抢运粮食耗费十多万元，说成三万多元；甚至编造谎言继续行骗，说朱镕基来芜湖南陵考察时，适逢安徽师范大学周年校庆，返校参加纪念活动的校友要求参观南陵粮仓，为迎接专家、教授们参观，南陵在许镇、峨岭沿途开放了粮仓，以供校友们参观，因粮食不够，只得从本地调粮补仓。期间恰逢朱总理来视察，偶然巧合了此事云云，《羊城晚报》记者，为此专门“查阅了安徽师范大学周年校庆活动日程安排及院系校庆活动安排表，根本就没有什么校友参观粮仓的活动（以上引自1999年2月7日《羊城晚报》）

一级市委、市政府，在当地制造欺骗国务院总理的惊天造假大案曝光后，竟然还敢如此编造谎言欺骗天下，也是够让人咋舌的了。至于那位“领着省、市、县一大帮”官员对峨岭粮站造假进行亲自“验收”的芜湖市委副书记倪发科和亲自参与“验收”造假的“一大帮省、市、县官员”，已全部退隐，全部失声。他们似乎与峨岭造假欺骗总理一事毫不相干。

对于这样一个堪称史无前例的欺骗大案，安徽理当进行严肃处理。但结果只是南陵县委副书记徐某受警告，粮食局长张某被撤职，副县长汤某受严重警告，撤职后的张某被安排到芜湖半汤温泉去疗养。

令人惊叹的是，那位精心策划、落实，并亲自领着“省、市、县一大帮党政官员”，到峨岭粮站验收造假合格的芜湖市委副书记倪发科，不久后就升任六安市委副书记、市长，接着，又升任安徽省副省长，堪称官运亨通。不知是不是造假有功？

如此惊天骗局的如此结果，不能不使人想起那个震惊中央，引起全国人民公愤的安徽阜阳毒奶粉夺命案。安徽方面只是对太和县城东工商所两名所长免职，两名管理员“开除”了事。而且，之后“免职”或“被开除”的人，全部“待遇不变”，“照常上班”，“照常执法”，完全是欺骗国务院和全国人民的一个

骗局。人民要问：南陵兴师动众调动 200 多名司机和工作人员，从几个地方把几百万斤粮食运到峨岭粮站，一名县委副书记、一名副县长就敢决定？芜湖市委副书记倪发科亲自领到峨岭粮站进行造假“验收”的那“一大帮省、市、县官员”，难道一点责任也没有吗？到底是谁在幕后指挥和操纵了这起惊天骗案呢？这样的惊天骗案都敢制造，还有什么假不敢造呢？

朱镕基“在中央对农业作出重大决策时”，往往到安徽去调查研究，并先后五次到安徽考察。但安徽前后四次骗了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再骗国务院，这与安徽有关方面对峨岭粮站这样的欺骗大案尚且如此“宽容”，难道没有关系吗？如果国家领导人都像朱镕基在峨岭粮站那样，看到的，听到的，全是假的，对他们“作出重大决策”，会是什么样的影响呢？

第九节 粮食警报频频传来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世界上最大的问题，就是吃饭问题。粮食对于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仅是粮食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必须引起执政者和全国人民高度重视的政治问题。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耕地少的农业大国，更显得特别重要。1949 年我国粮食总产量不过 11318 万吨，平均每亩才产六七十公斤；1980 年提高到 32056 万吨，30 年间翻了近 3 倍，但是，我国粮食产量并不稳定。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二十世纪末，我们虽然有过几次大丰收年，比如，1984 年获得大丰收，人均占有粮食达到 392 公斤，但 10 年后的 1994 年又降到人均不足 370 公斤；1998 年再次获得大丰收，创造了我国粮食产量的最高点，粮食总产量达到 5000 亿吨，但是随后即连年下降。从 1984 年—2003 年 20 年间，全国粮食总产量只增加了 2338 万吨，即由 40732 万吨提高到 43070 万吨，平均增长率仅 0.3%，这个增长速度还不及文革时期的十分之一。2003 年全国人均粮食

占有量比 1979 年还低。

中科院院士、著名植物遗传学家、农业专家李振声在 2004 年 6 月,对 1998 年的粮食状况,用三组数字进行了表述——

一. 粮食总产量大幅下降。1998 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到一万亿斤的最高点以后,持续下降,到 5 年后的 2003 年,已降至 8613.4 亿斤,与 1998 年相比,减少了 1386.6 亿斤,减幅达到 15.93%。

二. 人均口粮大幅减少。在粮食总产量达到最高峰的 1998 年,人均达到 821 斤,而此后的 5 年间,人均占有粮食退回到了 20 年前的水平,2003 年已降至 666 斤,人均减少 155 斤,这是新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粮食总产量大倒退。

三. 粮食亏损情况严重。其中仅 2003 年就亏损了 1136 亿斤,差不多占了我国粮食总产量的 10% (引自 2004 年 7 月 5 日《经济参考》)

以上情况说明,我国自 1984 年后粮食产量并不稳定,粮食生产并不乐观。但是,浪费粮食却非常严重。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某些高层领导曾盲目倡导高消费、高享受,由此导致奢靡之风、炫富之风、攀比之风,像瘟疫一样在全国蔓延,使我们这个并不富裕,粮食并未过关的国家,出现了触目惊心的粮食浪费。

2001 年 10 月 15 日“世界粮食日”到来之前,北京大视野社会经济调查公司以“你的餐桌干净吗”为主题,对京、沪两市市民就餐时的浪费现象进行了一次入户调查,结果表明:仅北京市每天倒掉的剩饭就有 1600 吨,等于全年倒掉的剩饭就是 584000 吨。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还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组数据:在 2006 年至 2008 年,该学院通过对大、中、小三类城市共 2700 桌不同规模的餐桌中剩饭剩菜的蛋白质、脂肪进行系统分析,按“保守的全国餐饮平均总剩余 10%”计算,

全国一年仅餐饮浪费的食物蛋白质和脂肪，分别达到 800 吨和 300 吨，等于我们丢掉了相当于 2.6 亿人一年所需的蛋白质和 1.3 亿人一年所需的脂肪。

据对北京多所大学餐后剩饭剩菜情况的调查表明，倒掉的饭菜约为购买饭菜总量的三分之一。如果以 2009 年全国大专以上在校学生为 2860 万人计算，则每年仅“天之骄子”们倒掉的食物就能养活 1000 万人。而据专家们推算，全国各类学校、企事业单位规模以上集体食堂，每年至少倒掉了可以养活 3000 万人的食物。

中国农业大学于 2004 年，对我国 22 个省 574 个县粮食产后损毁情况进行的一项抽样调查显示，我国粮食在收购、储藏、调运、加工、销售和浪费中的损毁，高达粮食总产量的 18.2%，即每年有超过 850 亿公斤粮食在收割后被人为糟蹋。

据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武维华测算，全国每年浪费的食物总量可以养活 2.5 亿——3 亿人。

不可忘记的是，当今世界每年有 600 万儿童死于缺粮；同样不可忘记的还有，在我国很多老少边穷地区，不少孩子因为食品不足营养不良，正严重影响着他们的身体发育，某些地方的青少年，从新世纪以来，甚至出现了身高负增长的悲剧。我们却如此触目惊心暴殄天物，糟蹋粮食，难道是可以思议的吗？

由于地方政府长期以来，普遍只顾追求 GDP 的增长以提升“政绩”，他们往往较少考虑由此造成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使土壤污染日益加剧，从而导致生产出来的粮食受到污染。环保专家告诉我们，一节一号含汞电池烂在土壤里，就会使 1 平方米土地丧失使用价值。然而作为看不见的污染，土壤污染往往被人忽视。土地如同地球的皮肤，水体和大气的污染，最后都会归结到土壤中。土壤污染后，又会通过挥发，渗透进入大气以及地表和地下水体，形成恶性循环。经济的发展，各种污染物排放的增加，已经使土壤污染日趋严重。1997 年中国环

境状况“公告”写道：“我国耕地污染较重，有 1000 万公顷耕地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即 1.5 亿亩耕地受到污染；到二十世纪末，中国受污染的耕地面积达到 2000 多万公顷，此时被污染的耕地面积已超过耕地总面积的五分之一；每年因土壤污染造成的粮食减产即达 1000 万吨；此外还有 1200 万吨粮食被污染；直接经济损失达 200 亿元；到了 2003 年，据中国基础研究网第 212 号香山科学会议——污染土壤修复与生态安全学术讨论会报道，“全国受重金属污染的农田有 6000 多万公顷”。6000 多万公顷农田，已占到全国耕地面积的一半以上（引自 2009 年 4 月 24 日特区财经报）

尤其令人忧虑的是，被污染的耕地，主要分布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即多是高产粮田。而且，从目前的状况来看，无论土壤污染，水污染，工业污染，都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甚至在利益的驱动下，因地方政府只顾追求 GDP 的增长，还使污染不断加剧。在这些已经或正在受到污染土地上生产的粮食，正在严重影响我国的粮食安全和人们的身体健康，其中有的粮食其实只能称为“有毒粮”，根本不能食用。

比土壤污染更严重更可怕的是化肥、农药污染。

农村改革后，精壮劳动力几乎全部外出打工挣钱，从事农业生产的都是被称为“386199 部队”的妇女儿童和老人，他们根本无力耕地。过去主要靠精壮劳力耕种农田，而今在一些地方甚至村里死了人，出殡时连抬棺材的人都凑不齐。过去的精耕细作，普遍变成了粗糙耕作。过去南方农村普遍都推广紫云英等绿肥，如今已是踪影难觅。笔者家乡，过去都要在入冬前把农田耕翻，让土地“浸冬”，既能酥松土壤，又可冻死病虫，而今已看不到哪怕有一坵一块田翻耕“浸冬”，以致土壤板结，虫灾加剧，不得不大量施用农药。绿肥，土杂肥，人畜粪已消失。农民只是一味施用化肥。笔者家乡一位当过生产队长的老农说，农药使用量比上世纪七十年代至少翻了十几倍。而化肥的使用

量，从全国来看，从五十年代每亩使用不过 8 斤左右，已增长到现在的 860 多斤，增长了 100 多倍。据河南省农业厅土肥站在 2010 年进行的一次调查显示，该省每年施用的 300 多万吨化肥中，只有三分之一被作物吸收，三分之一进入大气，还有三分之一沉留在土壤里，不仅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成本，还造成土壤的板结，土质的恶化和大气的污染，是一举多害。

湖北省农业厅植保总站做过一次大型试验，结果显示，我国粮食产量几乎由农药主宰，说白一点，我国人民主要吃的是“农药粮”。

负责这项实验的湖北省植保总站站长王盛桥介绍，他们在全省选择 10 个水稻病虫害灾害和防治区，区内水稻凡未使用农药防治田里的产量损失 80% 以上，凡农民习惯性防治田里的产量损失 5% 以内，凡指导防治区田里的产量损失在 1% 以内。

这一组数字清楚地告诉我们，如果完全不使用农药防治，水稻的产量就要降到不足 20%。

这个实验还显示，棉花未防治区田里的产量损失 50% 以上，农民习惯性防治田里的产量损失 5% 以内，指导性防治区田里的产量损失 2.3% 以内。

王盛桥说，2001——2005 年，如果不是及时防治，湖北省就有 152 亿公斤粮食、100 万吨油料、1290 万担棉花要毁于虫口，直接经济损失超过 260 亿元。

这仅仅是一个湖北省。

“如果不打农药，我们的粮食几乎没什么收成”。国家农业部种植业管理司一位专家如此慨叹道（引自 2005 年 9 月 26 日《中国改革报》）

由此可见，农药对我国粮食、棉花、油料等农作物的污染有多么严重。几乎可以说，我们吃的粮食、油料都是从农药里“泡”出来的。而农药对人体危害之重，人们也许难以想象。我国停止使用“六六六”已经三十多年了，但是，在我们的孕

妇乳汁中,至今还可以测出“六六六”。今天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如果不打农药,我们的粮食几乎没什么收成”的年代,而且,随着农药的长期超量使用,各种病虫害的抗药性日益加强,为了增产,农民不得不使用“高效农药”或加倍使用药量,人们吃了这些“高效农药”“打”出来的粮食、油料,谁知道会遗祸到何年何月呢?

人为的粮食污染,同样触目惊心。自从我国放开粮食管理以后,由于政府对粮食企业管理的缺失,企业考虑的主要是盈利,乃至过氧化苯甲酰增白剂的大量使用,以工业用磷酸钙盐和滑石粉当增白剂,“吊白块”和工业用油大量进入粮食加工而屡禁不止,正在严重影响国家粮食安全和民族的健康肌体。社会各界和新闻媒体已频频发出了“我们还能吃什么”的责问。早在2000年,国家质监总局公布对京、沪、粤、豫等10个省市小麦产品进行的质量监督抽查,结果就显示,作为北方各省主要口粮的小麦粉,合格率仅40.4%,连一半都不到,而当时安徽省面粉抽查合格率仅35.2%,对辽宁省本溪市市场上供应的27种面筋进行抽查,合格的仅5种,22种不合格,合格率为18.5%,连五分之一都不到(引自2002年1月5日《中国食品报》)。

中国人民如果长期食用质量如此低劣的主食,我们这个民族的健康还有保障吗?如果把那些严重污染的粮食,把农药“泡”出来的粮食,把人为污染的粮食都排除在外,我们还能吃什么呢?

我们的国情是,人口正在不断增长,到2030年,我国人口将达到16亿,按人均每年消费400公斤计算,若按现在的全国总产量,届时我国粮食缺口将达到2亿吨,现在(2013年)距2030年不过17年多时间。从1949年开始,我国每增产1000亿公斤粮食,分别用了17年、12年、6年,要在17年多时间内,增产2亿吨粮食,这是摆在我国政府和全国人民面前

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17 年一眨眼就过去了，我们能完成这个任务吗？

第七章 转基因食品触目惊心涌入中国

第一节 “转基因工程——新一轮鸦片战争”

被称为“危险食品”、“避孕食品”的转基因食品，已在全世界闹得沸沸扬扬。早在 2000 年，全球 828 名科学家（其中美国 181 名，英国 115 名）就致信各国政府，呼吁暂停向环境释放一切转基因作物及其产品。对于由美国孟山都、杜邦、陶氏益农等公司研发生产的转基因玉米、水稻、大豆、棉花等作物的安全性报道，早已层出不穷。2005 年俄罗斯科学家叶尔玛科娃博士的实验证明，在小白鼠交配前两周以及在怀孕期间，喂食经过遗传基因改变的大豆，一半以上的小白鼠刚出生后就很快死亡，幸存的 40% 生长发育也非常迟缓，它们的身体都比那些没有喂食经过遗传基因改变的大豆的小白鼠所生的幼崽小。而且发现有些母鼠不再有母性本能。转基因大豆对老鼠生育能力的摧残之严重由此可见。2010 年俄罗斯科学家再次公布了新的研究成果，进一步证明，老鼠食用转基因大豆，三代就会绝种。2007 年，法国科学家通过实验证实，美国孟山都公司生产的转基因玉米，对人类的肝脏和肾脏都具有不容忽视的毒性。2008 年 1 月 3 日，印度科学家公布安德拉邦一个小村庄里，水牛吃了含有 Bt 转基因棉花后，所有 13 头水牛第二天全病了，在随后的三天内全部死亡。德国也传出了母牛因食用含有 Bt 转基因玉米后的死亡报告。

在首先研发出转基因作物种子的孟山都公司所在地美国，也出现了与美国农业部极力吹捧转基因作物完全相反的声音。

2008年美国科学家证实了长时间喂养转基因玉米的小白鼠免疫系统受到严重损害。美国环境医学科学院在2009年5月公布的报告，用16年时间的实践和统计数据显示：“一些动物实验表明，食用转基因食品有严重损害健康的风险，包括不育、免疫力衰退、加速老化、胰岛素的调节和主要脏腑及胃肠系统的破坏”，该报告同时清楚地指出：转基因大豆里的基因，会转移到人们肠道里细菌的DNA里面去，并继续发挥作用。也就是说，只要吃了一次转基因食品以后，即使你不再吃转基因食品，体内仍然会不断产生有着潜在危险的基因蛋白质。说得通俗一点，就是只要你吃了一次转基因食物，就会把你肠道里的细菌转变成活的农药厂，继续危害你的身体健康。“直至死亡为止”（引自2010年7月6日《国际先驱导报》）

美国环境医学科学研究院的报告还显示，长期种植转基因作物，给农民造成的是“无法弥补的副作用”。面对“报告”中16年的实践事实和无可辩驳的统计数据，一直坚持认为美国农民从种植转基因作物中能够获益的美国农业部，不得不改口，承认：“种植转基因作物后，农田作业的燃料成本提高了一倍多，农药的用量超过了天然作物种植，种子成本也大幅上升”（引自2010年7月6日《国际先驱导报》）

然而，尽管美国农业部在事实面前不得不承认转基因作物的巨大危害，但它依然在支持孟山都、杜邦、陶氏益农等种子巨头继续推广转基因农作物。2010年6月8日，杜邦公司宣布，其下属公司开发的新一代转基因大豆已获得美国农业部与美国食品和药物局批准，将于2012年上市；随后，孟山都公司也宣布，即将推出新一代转基因大豆。

美国政府部门一方面不得不承认老一代转基因作物危害很大；另一方面又批准新一代转基因种子继续上市，岂不荒唐？这就不得不对美国发动的全球“农业革命”略作介绍。

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为了把美国的商业化农业引入主

要发展中国家，洛克菲勒家族提出了‘绿色革命’的理念，其实质就是以传输先进农业科学和技术的方式，来控制发展中国家的粮食生产”。设立于墨西哥的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设立于菲律宾的国际水稻研究所和设立于尼日利亚的国际热带农业研究所，都是由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共同设立的‘绿色革命’向发展中国家输入缺乏繁育能力的新型杂交种子、昂贵的化肥和农业技术，使得接收国对美国的依赖越来越大，甚至被迫接受许多苛刻的政治附加条件。而围绕粮食展开的是一个由少数人策划的阴谋，他们正在图谋控制全世界的粮食供给，控制世界大多数人生存的物质基础，从而控制世界大多数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存空间，让全世界的人们成为他们猎食的对象，成为他们永远的奴隶。（引自美国威廉·恩道尔《粮食危机》第 25 页，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8 年 11 月出版）

美国经济学家恩道尔把这场粮食阴谋称为“转基因工程——新一轮鸦片战争”，而且是美国“仅次于核武器控制的头等大事”，（引自恩道尔《粮食危机》第 112 页）

为了推行这场“新鸦片战争”，孟山都、杜邦等种子巨头，实际上与美国政府结成了非同一般的联盟。

以孟山都为例。

该公司与美国政府以及与老布什的中央情报局都有着非同一般的“合作关系”。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越南战争期间，为了毁灭丛林中的树叶，使越南游击队无处藏身，孟山都就奉命为美国军队研发了一种致命除草剂——橘剂。据美国退役海军上将宗姆瓦特在 1992 年奉命负责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从 1962 年至 1972 年，美国军队在越南喷洒了 7200 万升除草剂，其中绝大部分是橘剂。超过 100 万越南人和 10 万美国及盟国部队暴露于这种喷洒之下。因受橘剂影响，在越南感染上疾病的平民受害者和退休军人，在越战结束 30 年后仍向美国政府提起了诉讼。（引自美国威廉·恩道尔《粮食危机》第 279 页）。

1986年，当时的美国副总统老布什在白宫主持了一个“特别战略会议”，与会者都是孟山都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这次秘密会议讨论的就是撤销对发展中的生物技术行业的管理问题，即支持孟山都、陶氏化学等公司开发转基因作物。1988年老布什当选美国总统后，1992年就宣布了对生物工程实行所谓新政策，把转基因这个害人恶魔从笼子里放了出来，并被美国政府摆到了谋划已久的粮食战略的位置上。他们一方面通过科学基金，大力支持孟山都进行长期研究实验；一方面对未经检测、风险很大，很可能危及国家乃至全球基本粮食安全的做法，大开绿灯。

华盛顿被称为“旋转门政府”（revolving-door government），也即是一些大公司直接雇佣政府官员担任高级管理者，利用政府的影响力和官员的人脉关系获取利益。而孟山都是玩这种“官商游戏”的高手。在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候选人之间，孟山都始终脚踏两只船，同时充当两党竞选人的赞助商。

将公司高管设法安插到政府部门任职，和接纳政府官员到公司任（兼）职，是孟山都等公司推行自己计划的“高招”。

小布什政府的农业部长安·维尼曼，在2001年进入政府前，是孟山都公司下属的卡尔京公司董事长；美国前国防部长康德，也曾是孟山都公司下属的西尔列公司的高管；前总统克林顿的律师米·坎奇，离开政府后，就进入了孟山都董事会；孟山都董事会高管成员中还包括了尼克松政府和里根政府的环保署长威尔斯豪斯；孟山都公司制药事业部高级副总裁，曾担任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代局长；孟山都公共事务副总裁琳达·J·菲舍，曾任美国环保署预防杀虫剂和有毒物质办公室主任，孟山都的法律顾问杰克·华森，曾任卡特政府白宫办公室主任，孟山都公司负责英国政府事务的董事玛莎·霍尔曾是克林顿总统的政府事务助理，等等。

仅从上面介绍中，我们已不难看到孟山都等粮食巨头与美

国政府那种“官商一体化”的关系是何等密切。他们之间不仅有着不可分割的利益关系，孟山都等公司还是美国政府推行粮食战略棋盘上的一颗重要棋子，得到美国政府部门支持和庇护也就不言而喻。美国政府部门明明知道转基因食品危害很大，却继续批准转基因种子上市，充分说明美国政府决不会轻易放下作为粮食战略中的转基因武器，也不会改变他们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输出转基因技术的步伐。

不可忘记的是，尽管美国政府极力支持转基因技术，但美国政府始终严守着自己的底线——决不容许转基因作物侵入天然农作物生产系统和天然食品供应系统，从而在美国就堵住了转基因食品最终流向餐桌的渠道。美国政府对转基因作物的种植控制也很严格，不仅所占的农田面积很小，而且都是远离天然农作物或者是与世隔绝的新开田地，以此保证转基因作物不致扩散和危害天然农作物。美国生产了大量转基因玉米，但它的转基因玉米主要是用于制造燃料酒精和出口发展中国家。而它出口的价格又相当低，因为玉米种子背后站着财大气粗的美国政府。美国政府每年对玉米的补贴就高达 30 亿美元，也就是相当于 200 亿人民币。说得明白一点就是，美国力挺转基因产品，完全是为着向发展中国家输出，是作为粮食大战的武器在发展，在使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地沿政治学家在其新书《目标中国：华盛顿的屠龙战术》中指出：如今人类食品和动物饲料已经被武器化。美国农工商巨头借助强大的金融力量，用几十年全面创新了粮食武器的动用技法，除了洋快餐等等垃圾食品大量涌入中国，在各大中城市遍地开花，美国进攻中国食品安全的第二条战线，就是转基因主粮。美国农业部与孟山都等四大粮食巨头以及农用化学品巨头，为此紧密勾结，联手行动，其中的第一大目标就是水稻——中国和亚洲人民的主粮作物。其目的就是控制中国和亚洲的主粮，进而控制整个亚洲国家（见 2013 年 2 月 23 日《羊城晚报》）。

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企图用包括转基因技术在内的高科技灭绝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人口的阴谋，直到在“查尔蒙特饭店会议”上，才赤裸裸暴露无遗。

1995年9月27日至10月1日，由美国出钱的戈尔巴乔夫基金会，邀请了当今世界500多名最为重要的政治家、经济界领袖、学者和科学家，其中包括美国小布什、英国撒切尔夫人、首相布莱尔、新保守主义大师布热津斯基以及索罗斯、微软总裁比尔·盖茨、未来学家索斯比特等一大批大名鼎鼎的全球热点人物，在纽约召开“查尔蒙特饭店高层国策会议”。会议认为，人类历史上一个崭新的时代已经到来，即由精英组成的新时代。会议提出了，“灭绝世界80%人口”的主张，他们将世界人口分为20%的全球精英人口和80%的垃圾人口，并简化为“20/80”（1/5，4/5）的一对数字新概念。要由20%的精英人口灭绝80%的垃圾人口。这些垃圾人口绝大多数分布在目前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具体实施分为两步。一、“弃置和隔绝那些无用而贫穷的垃圾人口，不让他们参与地球文明生活的主流，而由20%的精英人口将一些消费残渣供他们苟延残喘”，使“未来的人类社会是1/5的社会，这个社会，必须将其中4/5的废物人口排挤出局并依靠喂养过日子”；二、“如果80%的垃圾人口不愿接受这个方案，或者1/5的精英人口不愿再对无用的4/5人渣实施喂养，就用高技术手段消灭他们”。所谓“高技术”手段，包括“干净”核子技术、遗传基因武器技术和生物武器技术。

参加会议的精英认为，人类中多余的80%人口是垃圾人口。他们的存在，对于“仅占20%的有价值”的人口，有着“巨大的麻烦”，他们会“制造极大的安全问题”，“这些国家和地区中的这些垃圾人口成为产生‘无赖国家’的根源”，“这些‘无赖国家’持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就会成为反对地球精英的‘邪恶轴心’”，所以必须灭绝他们。地球上“只有20%的人口

有权积极地参与生活、挣钱和消费”（引自中华四社区 Club.China.com/）。

这是由美国发起的世界少数精英正在实施的一个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罪恶阴谋。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但它是比人类历史上任何一场有硝烟的战争都要残酷千万倍的战争。它要绝灭的是世界人口的 80%，是前无古人的人性绝灭。

第二节 中国不应该承受这样的风险

美国刮什么风，中国“精英”就下什么雨，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某大人作出“跟着美国走”的决策以后，在中国出现的一道奇特风景。

当“查尔蒙特饭店会议”于 1995 年在美国纽约召开并提出要灭绝世界 80% 的人口以后，中国一些拥有话语权的“精英”们随即遥相呼应。比如，自称“我不在乎拿外国人的钱，也不在乎拿资本家的钱，我不拿他的钱拿谁的钱，谁给我钱”的“著名”经济学家茅某轼，不仅主张中国放弃钓鱼岛——“那儿的领土压根儿就没有人居住，争夺那儿的领土完整，却要老百姓付出沉重的代价，有什么必要？”不仅公开宣扬汉奸是英雄——“也可能有一些汉奸并不是为了自己升官发财，而是为了减轻人民的痛苦，作为抵挡日本人对中国欺压的缓冲器，这样的汉奸非但没有错，而是真正的英雄”；不仅公开声称卖国有理，爱国有罪——“卖国并不是什么严重错误，出卖人民才是严重错误”云云，更极力主张在中国大力推行转基因，此人于 2011 年 12 月 25 日在回复北方至尊时大谈：“全球已有 70 亿人口，但全球最适合的人口数量为 5 亿，其余人是多余的。他们的存在，将威胁到整个人类生存”，“必须把人口降至 5 亿以下，这样才能实现人类的永久生存和可持续发展，这就是共济会的目标”，“这个目标是正义而伟大的，因为它是为了挽救

人类。能留在这个世界上的，自然是优等民族。”因此，茅某轼称赞：“转基因食品是一个伟大的发明，它能让人慢慢失去生育能力，和平地断子绝孙……是一种可以把地球人口减少至5亿的绝佳手段”，“转基因食品不让人流血，不让人痛苦，体现了一种人道主义精神，这样的科学家不服不行”；“转基因食品能在中国迅速推行，且有法律保障，说明我们的领导人是顾全大局的（虽然他们自己及家人并不吃转基因食品，而吃特供食品），可敬可亲”。

这个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在中国极力鼓吹“和平地断子绝孙”难道不是和参加“查尔蒙特饭店会议”精英的主张，遥相呼应吗？

由于这样一批拥有话语权和某些决策权的“精英”人物，大肆吹捧极力主张在中国推广转基因作物和转基因食品，在全世界各国奋起抵制、拒绝转基因作物、转基因食品及其种子输出的风暴不断高涨之时，中国却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另一种情景。

1996年，美国开始大规模种植和出口转基因大豆，中国也开放了一直管制的大豆市场，洋大豆开始进入中国。作为历来就是大豆出口国的中国，1997年从美国进口了237万吨大豆，其中绝大部分是转基因大豆，90%以上用于提炼植物油，供国人食用。而且，当时的中国，在农产品进口上，根本没有采取检验和限制措施，这种敞开国门的进口世界罕见。于是，来自美国、巴西和阿根廷的转基因大豆像潮水般涌入中国，迅速占领了中国大豆市场。到了2001年，中国进口的大豆竟达1304万吨——是1996年大豆进口量的10倍，其中80%以上是转基因大豆。

2001年以后，中国开始建立转基因产品进口规划，出台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和《农业转基因生物进口管理办法》。根据规定，国外的转基因产品供应商必须从农业部获得安全证明以后，才能进入中国市场。但是，为了减

少所谓贸易摩擦，农业部竟在进口规则出台后的 2002 年 3 月、2002 年 10 月、2003 年 7 月，连续三次推迟安全证明制度的施行，任凭国外转基因产品涌入中国。直到 3 年后的 2004 年 2 月，国外转基因产品才有准入制度。令人气愤的是，中国转基因大豆的进口，并没有受到这个准入制度的任何影响。而且，在此后 10 年，大豆进口量一路高歌猛进。特别是美国转基因大豆，很快就占据了我国大豆市场 90% 的份额。作为世界上最早种植大豆，种植历史已超过 4000 年，历来是只出口不进口的中国大豆，迅速被洋大豆挤垮，4000 万豆农几乎全部失业或破产。据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于 2013 年披露：“目前我国大豆产量约 1300 至 1400 万吨，但是需要量超过 7000 万吨”。不得不进口大豆，而进口的几乎都是转基因大豆。

水稻是中国占半数以上人口的主粮。但是连美国农业部也不得不承认转基因作物危害很大的时候，中国农业部却于 2009 年 11 月 21 日，批准华中农业大学申报的“华恢 1 号”、“BT 汕优 63”两种转基因水稻，批准中国农业科学研究院申报的 BVLA43101 转基因玉米的安全证。获得两种转基因水稻安全证的是中科院院士、被称为“中国转基因之父”的华中农业大学教授张启发及其团队。安全证是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种植之前，最难闯过的一道关口，获得了安全证，就可以申请生产许可证，离商业化生产便只有一步之遥。

对于即将出现在十几亿中国人餐桌上的转基因水稻的安全等问题，理所当然立即受到环保组织和社会舆论比以往更加强烈的质疑和反对。

国际环保组织“世界绿色和平”公布了一份题为《中国转基因水稻对健康和环境的风险》报告。该报告指出：“中国农业部为转基因水稻打通商业化的大门，等于将中国的农业、国民健康与粮食主权三个方面，都置于巨大的风险之下。”（引自

2009 年第 36 期《凤凰周刊》)

绿色和平食品与农业项目主任方立峰，对此作了进一步解释：“中国有多种珍贵的野生稻种，转基因水稻可能通过花粉传播而‘污染’传统的水稻品种，对环境和生物多样性造成严重威胁……转基因水稻因涉及多项国外专利而对国家的粮食主权埋下定时炸弹。”（引自 2009 年第 36 期《凤凰周刊》）。著名反转学者、广东东莞理工学院教授郭丹红也发出了警告：转基因技术违背自然规律，如果选择，忽视其潜在风险，人类可能面临毁灭性的危机；而且，由于改变了生物的自然天性，自然界的食物链和农业的生态平衡就难以继续维持，整个自然界的生态平衡也将被打破（引自 2013 年 6 月 14 日《潇湘晨报》）。作为主管国家农业和国家粮食生产的农业部批准转基因水稻的安全证，竟会给国家农业、国民健康和国家粮食主权都造成如此巨大威胁，无疑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这种做法使中国成了美国孟山都、杜邦等国外转基因生物巨头的试验地。转基因巨头之所以选在中国——一是因为中国人口多，是全世界最大的水稻生产和消费国，占领中国市场后有着无可比拟的广阔前景；二是中国是全世界唯一被美国控制了精英核心阶层的国家——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生物学家是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培养和控制的，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是美国福特基金会培养和控制的，中国自由主义精英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培养和控制的，通过他们控制中国舆论和误导中国民众，比控制美国舆论和误导美国民众更方便更可靠（参阅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宏良《人民感谢你们——向全国唯一的女省委书记致敬——关于〈福建省禁止转基因大米在省内销售〉的报告》）。安全证的批准，正好迎合了转基因巨头的选择。

由中国研发并已大面积推广的杂交水稻，早就以高产稳产安全可靠而居于世界领先地位，截至 2013 年，袁隆平和他率领的团队已经创造了杂交水稻亩产突破 988.1 公斤的纪录。而

世界水稻平均亩产还不到 400 公斤，先进国家也不过亩产 450 公斤，连中国的一半还差一大截，中国水稻产量在全世界遥遥领先。而且，一场代表世界杂交水稻领域最高水准的国际盛会于 2013 年 11 月 30 日，在长沙隆平国际会展中心召开，吸引了联合国粮农组织、国家农业部和世界亚、非、拉、美 10 多个国家的政府官员、技术和产业代表，共同探讨“杂交水稻和世界粮食安全”时，央视《对话》栏目特意搬到隆平国际会展中心和袁隆平对话，袁隆平说，自己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明年，我们要突破亩产 1000 公斤，向亩产 1200 公斤进军”，而且，在 2014 年已突破亩产 1000 公斤，达到亩产 1026 公斤，这是十分鼓舞人心的。

不可思议的是，某些决策者对我国遥遥领先世界水平、为解决中国人民吃饭问题立下了汗马功劳的杂交水稻，却并不热心。

早在 2008 年，国家对转基因的专项投入就达到令人惊叹的 240 亿元，而对非转基因项目的投入却只有区区 19 亿元，前者超过后者 12.6 倍。由于决策者对转基因如此钟情，如此倾心，舍得投入，使某些转基因项目主持人一下子就掌控了上亿元的科研经费，随便与转基因沾边的研究人员，也有几百万至上千万经费可供支配。这也就是那些对转基因情有独钟的科学家极力鼓吹将转基因快速端上中国餐桌的重要原因。

对决策者如此重洋轻中，重转基因轻非转基因的决策，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田松指出：“我们怎么能够相信科学家不会被巨大的利益冲昏头脑？”这难道不是让热衷于推广转基因的科学家，获得不遗余力推广转基因作物的巨大动力吗？

中国人民大学农学院教授周立则指出，就转基因而言，至少有七股力量已经联合，形成了一个利益同盟：跨国粮商得利润、外国政府得战略、地方政府得政绩、中资公司得好处、科研院所得经费、国家部门得租金、种粮农民得闲暇。（以上参

见 2014 年第 4 期《中国周刊》）。

通过这个纠结在一起的“利益同盟”，人们不难看到，农业部 and 某些农业科学家不是热心推广我们自己早已饮誉全球的杂交水稻，却要为各国科学家都不认可安全且极力抵制的转基因水稻、转基因玉米发放安全证的某些原因。

要了解此中的某些奥妙，还不得不对某些精英人物与孟山都等外国转基因公司的关系作一点介绍。据报纸披露，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出国热中，不少受国际咨询机构、跨国种子公司资助回国的精英，有的已擢升为院士、政协委员、政府官员，他们在国家科技方面有一定的话语权，在社会上有一定的执行力，甚至能左右媒体的宣传导向。由于转基因食品早已牵扯到各方利益，再无法排除某些官员和学者参与转基因食品的幕后交易。转基因食品之争，也早已不是一个纯粹的科学问题。那位获得两种转基因水稻安全证、被称为“中国转基因之父”的中科院院士、华中农业大学教授张启发，既是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水稻生物技术国际合作计划科学委员会委员，又是孟山都公司的商业合作伙伴，还是华中农业大学孟山都奖学金评定委员会主任，替孟山都掌管着向中国大学生发放推广转基因奖学金的决定权，与孟山都公司的关系之密切，自不待言。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以研究员郭×堆、贾×荣等都是孟山都公司在中国的商业伙伴，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黄×琨其妻子，是孟山都公司的高级雇员，有关资料显示有一个执掌大权的大官还因为大力在中国推广转基因作物，获得了美国授予勋章的嘉奖……

丰厚的利益更是精英们竭力追捧转基因的巨大动力。除了能获得巨额科研经费外，据国际绿色和平组织披露，种植转基因作物最大的受益者，既不是国家也不是农民，而是转基因科学家和生物公司。由于转基因技术具有专利权，而专利权属于科学家和生物公司，他们从转基因种植中能获取巨大的利益。

因此，中国的某些科学精英们无不在利用自己的话语权和各种关系，替外国转基因公司在中国推广转基因生物大事宣传。先是以“保密”为由，对中国老百姓封锁消息，有意遮蔽人们对转基因的知情权；继而又以“不争论”为幌子，对人民群众和有识之士纷纷提出的质疑，不予理睬；当网上出现强大的舆论压力后，他们则以5克/公斤BT蛋白仅仅喂养8天老鼠，就断定转基因大米“绝对安全”，忽悠老百姓。

中国精英们的做法，和美国政府的做法如出一辙——极力封锁转基因的害人信息。

1998年，英国一位顶尖基因科学家向媒体发布了一项研究成果——实验证明，转基因食品可能对免疫系统造成损害。这个来自客观实验的结论，对科学研究是一个重大贡献。但是，在研究成果发布后的短短48小时内，这位科学家和夫人同时被研究所解聘，而且被告知不许透露任何研究消息，否则连养老金都保不住。随后，英国皇家学会等机构和人员对这位科学家群起而攻之，对其肆意抨击毁谤。此中的原因就是，英国首相布莱尔接到了美国总统克林顿的警告电话，布莱尔直接打电话到研究所进行直接干涉，而这些打压，首先是源于孟山都公司的一个电话（引自美国经济学家威廉·恩道尔《粮食危机》第55页）。孟山都公司向美国高层的一个电话，就震惊了美国总统克林顿、英国首相布莱尔，他们直接干涉而向研究所和科学家施压，封锁转基因的坏消息，可见其害人之心是多么歹毒。中国的转基因精英千方百计封锁转基因的负面消息，难道不是一脉相承如出一辙吗？

面对西方强权势力，正在把“转基因工程”当做“新一轮鸦片战争”，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推进之时，中国某些科学精英及其支持他们的某些政府部门和高官大吏，急不可待地在中国推广转基因主粮，却不惜将中国农业、十三亿人民的健康和国家粮食主权都“置于巨大的风险之下”，岂不是太

匪夷所思了吗？中国不应该承受这样的风险！

第三节 中国人不能成为洋人转基因试验的白老鼠

世界绿色和平组织向中国人民指出的，“中国农业部为转基因水稻打通商业化大门，等于将中国的农业、国民健康与粮食主权三个方面，都置于巨大的风险之下”（引自 2009 年第 36 期《凤凰周刊》），并非危言耸听，更非空穴来风。

早在 2002 年，继国际绿色和平组织揭露美国孟山都对中国野生大豆提出专利申请，并引发巨大关注后，2004 年，农业部授予孟山都 5 个转基因农产品安全证书，接踵而来的是，美国和阿根廷的转基因大豆，立即以价格低、出油率高的优势，潮水般涌入中国，彻底挤垮了国内非转基因大豆种植业，牢牢占据了国内 99% 的市场份额（见 2010 年 12 月 21 日《东方早报》）；2005 年，绿色和平组织又发现，转基因大米在湖北种植，并污染了武汉和广州的大米；2006 年，绿色和平组织对中国市场上的婴儿食品进行检测，发现亨氏米粉含有未经安全试验的非法转基因大米成份；2007 年，绿色和平组织首次发现美国转基因 LL601 被非法进口到中国；2010 年，绿色和平组织发布《超市生鲜散装食品调查报告》，揭露沃尔玛出售非法转基因大米，伊藤洋华堂超市出售非法转基因木瓜（引自 2010 年 12 月 21 日《东方早报》）。在如此长的时间内，国外转基因食品如此纷纷涌入中国，抢占中国市场，在超市出售，而所有与转基因食品有关的“揭黑消息”，全部是国际绿色和平组织揭发的，国内那么多与食品有关的官办组织和机构，特别是肩负为人民食品安全把关的那些政府部门和官员，居然全部失声，难道不令人费解和震惊吗？他们是不知道还是有意遮蔽？

更没有想到的是，据 2011 年 9 月 7 日《生活文摘报》转自《环球时报》报道，国际绿色和平组织食品与农业项目再次

揭露，美国科研机构，早在 2008 年就在湖南一所小学进行转基因大米人体试验，立即在中美两国均引起轩然大波。事件被揭露后，领导这项试验的美国塔夫茨大学，承认进行了这项试验，并称，在中国进行的这项临床试验，经过了中美双方相关伦理评估委员会的批准，也获得了两国相关监管部门批准。与此同时，《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网站，则发表了一篇题为《黄金大米中的 β ——胡萝卜素与油胶囊中的 β ——胡萝卜素对儿童补充维生素 A 同样有效》的论文，论文称，美一科研机构选取中国湖南一所小学的多名学生，进行了转基因“黄金大米”的人体试验。

这项“黄金大米”人体试验，是美国塔夫茨大学、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湖南省疾控中心、浙江医学科学院等工作机构的研究人员一起搞的。他们于 2008 年共同在湖南省一所小学，针对 6-8 岁的健康在校学生进行试验。论文共有 7 名作者，他们的排名顺序是：美国塔夫茨大学研究员汤光文、湖南省疾控中心胡余明、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荫士安、浙江医学科学院研究员王茵等，并注明了各自分工（见 2012 年 9 月 17 日《新京报》）。

这项以中国儿童为对象的“黄金大米”试验，于 2002 年 12 月由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批准，2003 年 9 月，荫士安以课题中国部分项目负责人身份，与浙江省医学科学院签订了美国 NIH 课题合作协议书，塔夫茨大学于 2004 年 8 月与浙江省医学科学院签订了合作研究协议备忘录，合作项目负责人为汤光文，中方负责人是荫士安和王茵（见 2012 年 12 月 14 日《生活文摘报》）。

“黄金大米”人体试验，选在湖南省衡阳市衡南县江口中心小学进行。这项试验领导者、美国塔夫茨大学华裔教授汤光文（又作汤广文）回应，承认让湖南 72 名儿童试吃了转基因“黄金大米”；中国疾控中心却否认参与组织转基因“黄金大米”

人体试验。参与这项试验的衡南县疾控中心副主任伍剑桥则表示，该课题是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研究所于2008年委托湖南省疾控中心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研究项目；伍剑桥还表示，他们给学生吃的大米，是本地的“桃花香米”；荫士安则发表声明称：“我对美方论文中涉及菠菜和 β ——胡萝卜素的实验知情，签字同意发表论文，但对黄金大米不知情”；王茵也称“对论文不知情”（以上均见2012年9月6日《人民日报》、《北京时报》）。2012年9月1日，衡阳市政府声明称，在江口小学进行的是与中国疾控中心合作的一项国家课题组项目，所用食材均采购于当地，不含转基因食品，试验也未与美国及任何境外机构发生直接关系（见2012年9月17日《新京报》）；中国疾控中心于2012年9月5日公布的调查情况，承认当年被课题使用的菠菜由美国塔夫茨大学提供；该课题组负责人、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研究所研究员荫士安也表示，对是否使用黄金大米不知情。但是，该项试验领导者、美国塔夫茨教授、论文第一作者汤光文承认让湖南72名儿童吃了转基因黄金大米；记者从多个渠道获悉，江口小学共有88名6-8岁的学生参与人体试验，25人食用了黄金大米（见2012年12月6日《东方早报》）。当年被选入参加试验的江口小学学生贺鹏后来对记者是，试验就是吃“营养餐”，“一共吃了两个阶段的营养餐”。老师说，“学校免费提供的营养餐可以让学生长得更高、更健康”。4年后，贺鹏依然“记得早餐有米粉，中餐菠菜、米饭”。中国疾控中心公布的情况称，此项研究设计，通过了中国疾控中心营养所伦理审查委员会审批，参加试验学生的家长均签了知情同意书。但记者在江口镇历时10天的调查中，相关家长都表示只知道学校的免费营养餐，“不知道有试验这回事”。面对记者，一名当年的受试儿童贺某，泪流满面，以为自己吃了“黄金大米”，再也不能生育，但懂事的贺某反过来安慰父母：“爸爸、妈妈，没关系，我长大以后领养一个宝贝”（见2012年

12月14日《生活文摘报》转自央视《新闻调查》)。

当地政府和专家一方面再三解释,“黄金大米”不会危害健康,另一方面官方却对参与试验儿童给出了一个补偿方案,未食用“黄金大米”的儿童,家属每户补偿1万元,食用了“黄金大米”的儿童,家属每户补偿8万元,并且承诺,如以后有后遗症,政府会负责(引自2012年12月6日《东方早报》)。

众说纷纭的这项由美国人和中国人联手对中国儿童进行的“黄金”大米试验,最终以当地政府对参加试验但“没吃黄金大米”的每名儿童补偿1万元,对“吃了黄金大米”的每名儿童补偿8万元,并承诺“如以后有后遗症,政府会负责”了局。一方面称食用黄金大米没有危害,另一方面又给予“吃了黄金大米”的儿童8万元补偿,不知是什么意思?

令人深思而不解的是,这么多中国相关部门和单位参与了试验,都对给数十名中国儿童分两个阶段喂养了“黄金大米”表示“不知情”。如果国际绿色和平组织不揭露,或者美国杂志不公开发表该项试验的论文,论文第一作者也承认给72名中国儿童试吃了黄金大米,则包括被试验的儿童及其父母在内的中国人,根本不可能知道,湖南衡阳市江口小学的几十名6-8岁在校健康儿童当了一回转基因“黄金大米”人体试验的白老鼠,他们更不可能获得政府的补贴。

更没有想到的是,几乎与此同时,“黄金大米”人道委员会网站,又曝出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除了湖南儿童的转基因大米试验,“黄金”大米还曾在中国进行过一次成年人试吃试验。但是,这次试验在哪里进行、由谁组织操作、有多少人被试验,“均是秘密”,谜团至今未见解开(见2012年9月8日央视《新闻周刊》报道)。

那些被选(或被骗)参与“黄金”大米试验的中国成年人,比衡阳儿童更可怜、可悲。他们当了外国人“黄金”大米试验的白老鼠,不仅没有任何补偿,甚至根本不知道有这回事。

人们要问：为什么那些外国科研机构就敢无所顾忌在中国进行“黄金”大米人体试验？他们到底经过了谁的批准？连续在我国发生的这类问题，有没有人管、该由谁管？难道中国人就是洋人进行转基因试验的白老鼠吗？

第四节 转基因作物引发的异常

事实上，在农业部还没有为转基因发放安全证以前，由于一些热衷于转基因的“精英人物”的大力推动运作，美国转基因作物就已经在中国农田里种植，而且其危害性也开始暴露。且看看江苏省转基因抗虫棉的种植情况吧。

江苏省从 2004 年推广转基因抗虫棉，开始几年对抗拒棉铃虫确实有效。但是到了第五年即 2009 年，却出现了盲蝽蟥、棉蚜虫的大爆发，导致农药用量大增，成本自然也随之上涨。但转基因作物的产量，并不比非转基因作物产量高，遇到天气不利时，转基因作物的产量反而比非转基因产量更低（引自 2010 年 2 月 2 日《国际先驱导报》）。

此中的原因就是，侵害一种作物的病虫害有很多种，转基因植入的抗虫基因在抵御了第一种最厉害的病毒“A”以后，B、C、D、E 等病毒就开始扩张。这是因为病毒 A 没有被控制以前，其他病毒的毒性没有它强，被它压制了。当 A 病毒被控制后，其它病毒便乘机而起，农药用量自然就得猛增。这就是江苏推广转基因抗虫棉几年之后，之所以出现盲蝽蟥、棉蚜虫等病虫害大爆发的原因。比新的病虫害爆发更可怕的是，能抗拒这些新病虫害的特效农药，唯有孟山都公司和它的一家姊妹企业德国的巴斯夫能够生产。而且，因为孟山都等公司已经把各种转基因作物在不同环境、气候、生产条件下的种植技术，都申请了国际专利，其涉及面几乎涵盖了所有农产品，因此，到时候都得向转基因公司缴纳昂贵的专利技术使用费。

相对于并不进入肠胃的转基因抗虫棉，转基因粮食就可怕得多。

2004 年开始，美国转基因玉米，就在吉林、山西、内蒙等省区，占有一席之地。也是在短短几年间，就使人们感受到了转基因作物带来的各种“异常”。

山西晋中地区张庆乡农民刘昱家一直深受鼠害之苦。“过去家里的老鼠，经常窜上窜下的，从 3 年前（2007 年）我就发现，即使不投老鼠药，也少有老鼠吃家里的东西了”。刘昱对记者金薇说。

记者金薇对刘昱所在村庄 300 多户农民进行的调查显示，所有农户家和刘昱所说的情况大同小异，大老鼠大大减少，只有一些小老鼠，而且都是呆头呆脑，似乎连方向都分不清。金薇对晋中地区其他农村和吉林榆树农村进行的调查，除了进一步印证了老鼠异常外，还发现母猪下崽少，不育、假育、流产等情况非常普遍，特别是 2007 年以后，母猪死胎、流产现象呈加剧之势。榆树市秀水镇苏家村农民陈红军是老养猪户，2007 年以后，“至少损失了三分之一的仔猪”。起初，他“以为是配种时间没把握好，但增加配种次数以后依然无济于事”。村里不少养猪户都遇到了同样的情况。

除了老鼠和猪，羊、狗、牛也出现了类似的异常。兽医无法治好农家的畜病，也无法解答农民的疑问。但记者的调查找到了答案。

在排除生态环境破坏等原因后，记者发现，这些出现异常的动物，都吃过同一种玉米——美国转基因先玉 335，所有的养猪户都表示，家里种了先玉 335 玉米，这些玉米就成了猪饲料。猪出现异常，也都是在以这种玉米作饲料以后。晋中的羊并没有直接吃先玉 335 玉米，主要饲料是当地用玉米做完醋以后的玉米渣，也出现了异常。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有一家养猪户的猪，没有出现异常，就

是家里没有种植先玉 335 玉米的农民。他种的是“信誉 1”国产玉米。答案就如此明明白白摆在我们的面前。

众所周知，老鼠是人类的替身，因为老鼠的身体结构和基因等方面和人类的相同度达到 90%，某一种药品、食品的安全性，无不都是首先通过老鼠实验，再根据实验结果提醒或指导人类是否使用及使用注意事项。

吃了转基因玉米的老鼠出现异常，猪狗羊也出现了异常，人吃了能不出现异常吗？只是因为老鼠一年可以繁殖四五代，猪至少可以繁殖一代，而人的一代至少相隔 20 年，所以在山西、吉林等地，老鼠反应最突出，猪羊也有反应，但人还不到出现异常的时候。

第五节 “到处都是转基因，我们还能吃什么”？

转基因作物打入中国后，转基因公司一直在奋力加速向中国推广的步伐，而且往往得到政府部门的支持。广西从新世纪初就开始种植美国孟山都公司的“迪卡”系列转基因玉米。为了加速抢占中国南方这块尚未开发的土地，孟山都公司表现得非常“慷慨”——不仅不收种子专利费，甚至连种子成本也几乎不收，基本上是免费发放种子。当地政府更是非常“配合”，不惜使用“红头文件”的行政手段，推广转基因玉米。

孟山都等美国转基因公司，抢占别国粮食阵地的惯用手法，都是先“让利”。除了低价或免费提供种子，还常常辅以技术指导，让你先尝一点甜头。孟山都转基因大豆打入阿根廷时，采取的就是和在广西同样的手段。开始很“仁慈”，直到 2002 年转基因大豆已占到阿根廷 99% 的市场份额，它才开始向阿根廷农民收取昂贵的专利使用费。此时你已欲退无路，只能任其宰割，最后导致阿根廷贫困人口大幅上升。

广西原来是一个玉米种植并不多的地方，因为孟山都的“优

惠”迷惑了农民，加上当地政府用“红头文件”向农民推广，使种植面积迅速扩大，到2009年已达1062万多亩，玉米成为继水稻之后的广西第二大主食农作物，成了广西5000万人口中1000万人口不可缺少的重要口粮。

作为中国人第一主粮的水稻，据在湖南临澧考古发现，在中国大地上至少种植了9000年以上，这是全世界无可比拟的，而今却遭到外来的转基因水稻侵袭。早在2004年，美国《新闻周刊》就撰文，对那位孟山都公司的合作伙伴张启发在湖北推广转基因水稻的情况，作了报道：“……张启发说，在进行着中国最大的转基因田间试验的武汉，一家种子公司获得了转基因种子，并已经开始向当地农民销售。张启发还说，有超过100公顷转基因水稻正在种植……”

早在2005年前，一种被种子宣传可以不打农药而又能高产的转基因稻种，就出现在湖北江夏、孝感、咸宁等地区。有这等好事，农民当然很兴奋，大家都抢着种，种植面积迅速扩大。但当时农民都不知道那是转基因水稻。

因为不用打农药又能高产，农民很高兴种植转基因水稻，但对吃这种大米却非常谨慎，普遍都把打下的稻谷卖给私人米厂或粮管所，剩下的则用来喂鸡喂猪，自己吃的是自家留种的传统大米。

湖北种植转基因水稻的种子源头，都指向华中农业大学。江夏区五里界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的魏武就向记者证实：“刚开始种子都是华（中）农（业大学）发的。”也就是来自孟山都的合作伙伴张启发的公司。

“国际绿色和平”组织在2004年至2005年，对湖北种植转基因水稻进行了多次调查，并于2005年4月23日发布了一份“震惊世界的报告”——《非法转基因水稻污染中国大米》。该报告称，根据种子公司和农民提供的数据，湖北在2004年至少有950—1200吨转基因大米流入市场，这些大米已

流入广州、中山、顺德、珠海等地。到了2010年，湖北种植的转基因水稻面积至少达2万亩到2.5万亩，可产转基因大米10000—12500吨，而且因为转基因水稻被混入普通水稻种植，受到污染的大米数量大大超过这个数字。

由于转基因水稻具有省事（不打农药），增产的功能，种植销售一直在私下进行。《每日经济新闻》记者2009年从湖南汨罗获悉，当地种子公司早在2005年就向农民销售湖南怀化市非法种植的转基因“华恢1号”种子。而“华恢1号”就是农业部发给张启发安全证的转基因品种。据获得“华恢1号”种子的汨罗农民说，种子是“通过关系到长沙购买”。尽管粮食法第12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在主要粮食品种上应用转基因技术”，但据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研究员佟屏亚透露，中国农田里早已大片种植转基因玉米和水稻了。违规商业化玉米品种在四川、湖南、贵州、辽宁、吉林等省种植面积多达几十万亩。转基因水稻种子的销售渠道早已遍布南方十多个省（据2013年3月1日《时代周报》、3月3日《羊城晚报》）。

转基因水稻之所以在湖北、福建、江西等广大农村出现“规模种植”，就是因为此中的诱惑太多。其中投入的240多亿转基因研究专项资金和巨大的转基因种子市场价值，无时无刻不在刺激各个方面的利益神经。见利忘义的事早已层出不穷。

“200多亿资金，搁在哪个部门，都至少解决了未来10年的吃饭问题。而且转基因是‘金种子’，一旦市场化落地生根，对生物公司来说，简直就是滚滚财源”。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研究所研究员、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首席研究员薛达元一针见血地道出了转基因水稻在中国竞相种植的内幕。

这里有一个根本的原则不能不区别。我们支持对转基因生物技术进行研究实验，但反对引进推广转基因作物作为国人的主粮，这就和我们支持科学家对各种细菌进行研究实验，但是

坚决反对像日本军国主义、美帝国主义当年在中国使用细菌战，杀害中国人民是一个道理。

但是，不顾中国人民可能承受巨大的安全风险，在中国大搞转基因作物种植的事正日益严重。据农业部等五部委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于 2011 年在山西、吉林、黑龙江、山东、广东等多个省份对转基因生物安全进行调查，重点调查先玉 335。先玉 335 是美国杜邦先锋公司研发的转基因玉米，同时也是山东登海种业、甘肃敦煌种业的拳头产品，其辐射面包括了西北、华东等广大地区。而且，这些上市公司与中国顶尖的几所农业研究机构都有着非常亲密的合作关系。共同的利益使他们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对我们抑制转基因作物种植极为不利。玉米专家佟屏亚在 2011 年 5 月参加国务院召开的转基因座谈会上的发言就指出，今年至少又有几百万亩农田被转基因污染，既有“违规商业化”玉米，也有“违规商业化”水稻。佟屏亚要求严惩违规转基因作物所涉及的单位和个人，重塑农业部的公信力。而在转基因作物种植失控中尤以转基因棉花更加严重。郑州市新支点农业咨询公司负责人李鑫坦言，早在 2005 年以前，含有 BT 转基因的棉花品种就已经被违规大量种植，像河南南阳，黄淮河棉区，绝大部分都是种植转基因棉花。

目前中国农村是一个一家一户个体生产的汪洋大海，那些与外国转基因公司有着各种关系的农业科学家和政府官员，一直在力挺转基因作物，在他们的误导乃至欺骗和推动下，并不了解转基因作物危害的广大农民，到底在中国田地里种植了多少转基因作物，大概是一个谁也无法准确统计的数字。但是，全国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的比例越来越大，品种越来越多，却是不争的事实。截止 2008 年，“大豆面积的四分之三，棉花面积的一半，玉米面积的四分之一，油菜面积的五分之一，都是转基因品种”；作为热带水果的木瓜，国内只有广东和海南能栽种，现在海南非转基因木瓜已经很少，“全国各大超市中，

转基因木瓜已占到 90% 以上”；而据国家检验检疫部门提供的数据，我国从转基因国家进口的大豆、油菜、玉米等大多数都是转基因产品，到 2007 年“已超过 2000 万吨，十五六年间，进口转基因作物增长了 200 多倍”（以上数据均引自 2008 年 8 月 6 日《特区文摘报》）。

某些跨国公司在中国开设的大型超市，自恃财大气粗，完全无视国际公德和中国法律法规，公然在超市向中国公民销售转基因主粮及其制成品，媒体早有披露，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2006 年，“世界绿色和平组织”就查出在各地超市大量出售的 5 种亨氏婴儿米粉中含有转基因成分，责令各大超市撤架销毁；2010 年又发现麦德龙 AKA 饼干（巧克力味曲奇）含有转基因成分；全球最大的食品生产商雀巢的婴幼儿补充谷粉“牛肉蔬菜米粉”，也检测出含有抗虫转基因 BT 基因。在世界各国都在抵制转基因食品呼声日益高涨之际，这么多跨国公司却在中国公开销售转基因食品，能说是偶然的吗？为什么就没有人管呢？

最令人惊心动魄的是堪称劣迹斑斑的沃尔玛。不仅一次又一次在它开设的超市里销售过期食品、不合格食品，搞虚假宣传欺骗消费者。据重庆市工商局统计，沃尔玛在重庆仅 2006—2011 年 10 月就先后 12 次受到工商局处罚，其中 2011 年 1—8 月就被处罚 8 次。据统计自 2010 年 1 月至 2011 年 10 月，重庆市沃尔玛的多家分店，以低价普通冷鲜肉假冒高价“绿色猪肉”6 万多公斤；长沙市消费者则发现沃尔玛大型超市有大量食品擅自改变产品保质期向消费者出售的劣迹；在江西沃尔玛店，一女消费者因一张小票与沃尔玛员工发生争执，竟被活活打死的血案。公开销售转基因主粮更是屡罚屡犯。2010 年 5 月，“世界绿色和平组织”，对湖北武汉、广东深圳、东莞等地的沃尔玛超市的散装大米进行抽查，结果发现沃尔玛不少分店里出售的名为“国产香米”的样品，呈转基因阳性；2010 年 9 月，“世

界绿色和平组织”在调查中，又发现沃尔玛、百佳、吉之岛等超市都在销售转基因大米及大米制成品。来自沃尔玛长沙市雨花亭店的沃尔玛自有品牌惠宜江西米粉、百佳超市深圳太阳广场店的“奇兰香”散装香米、吉之岛超市深圳中信城市广场店的金稻鱼“中国香米”都含有转基因成分。

尤其可怕的是，某些跨国公司在中国开设的超市，已经开通了一条“黑色”的进货渠道，将一些危害人体健康的主粮及其制成品，源源不断输入这些超市向消费者出售。据2010年7月2日《每日经济新闻》报道，有一些“能量相当大”的所谓“管理咨询公司”的“主要任务”，就是只要给钱就能保证任何产品进入沃尔玛的各大超市。深圳一家名为“玖玖泰丰”的公司只要你交上1.8万元，就能保证不管什么质量的产品都进入沃尔玛，因为玖玖泰丰的老板就是从沃尔玛出来的。这类与洋超市勾结在一起的所谓“管理咨询公司”，其实就是这些公然非法销售转基因大米及大米制品的洋超市的附庸，他们是一伙害国害民的毒虫。与跨国种子公司千方百计推广转基因作物一样可怕的是，一些跨国公司在中国开设的大型超市非法销售转基因食品的手法，同样令人担忧。人们不难看到，几乎在所有的大型超市食用油货架上，都摆满了鲁花、金龙鱼、汇宝、胡姬花、金象等转基因食用油。这些油几乎都在显目位置标注着“QS认证”、“国家免检产品”、“绿色食品”等迷人的字样，有关转基因的标注却极少。据对某大型超市销售的30多种食用油统计，仅有两种在商标背后的角落里，标注了印刷极小的“本品为转基因大豆制成”的字样，不仔细辨认，根本看不出来。而中国的现状是，80%的市民对转基因几乎一无所知。面对泛滥成灾的转基因食品，他们成了受害者却并不知情。粮食部门一位朋友告诉我，在大型超市非转基因食用油已经难觅踪影。他多年不再买超市出售的食用油，而是到老家乡下去买农家自产的菜籽油或茶油。一位大学教师听到大豆、玉米、水稻、番

茄、土豆等众多作物和蔬菜，都有转基因品种，大吃一惊：“到处都是转基因，我们还能吃什么？”

第六节 转基因食品敲响了民族繁衍警钟

各国科学家通过用转基因食品喂食老鼠，使老鼠生育能力受到摧残的报道，早已频传不断；法国科学家用实验证实，美国孟山都公司出产的转基因玉米，对人类肝、肾具有毒性的报告，早已公之于世；连美国科学家也向人们发出了警告的声音：“一些动物实验表明，食用转基因食品有严重损害健康的风险……”

各国科学家的报告，在中国也已得到证实。由于转基因食品已经充斥中国各大超市，转基因大米、玉米、大豆等主食或制成品，实际上早已送上中国餐桌。转基因食品无处不在已是不争的事实，潜在的危害，也露出了端倪。除了媒体早已公开报道的山西、吉林等地区几年前就已有老鼠和猪羊等食用过转基因饲料的动物，出现“异常”之外，人也开始出现“异常”。

2009年11月19日，广西新闻网报道，广西在校大学男生的生殖健康，超过50%的抽检男生，精液不合格。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男性学科主任梁季鸿博士说：“我们对广西19所高校的217例大学生志愿者的精液进行了质量分析，竟有56.7%的大学男生精液质量异常，这个结果连我都吓了一跳。”梁季鸿告诉记者，精液质量是男性生殖健康的“晴雨表”，56.7%的男生精液异常，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

这个数据来自《广西在校大学生性健康调查报告》。该报告是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参加世界银行卫生几个项目中的一个子课题。

217例大学生志愿者的年龄在18岁至25岁之间，平均年龄21.6岁。均未婚。都是青春焕发，精气神旺盛的年龄。而

且在获得精液检查前，从未进行过精液检查，但检查结果却触目惊心地告诉我们，他们中超过 50% 的人精子都已有“病”，这与广西大量种植转基因玉米后，转基因玉米成了广西 5000 万人口中 1000 万人口不可缺少的主要口粮，以及各大超市充斥着转基因食用油等转基因食品，难道没有关系吗？

在湖南长沙也出现了和广西类似的情况。

2010 年湖南都市频道报道，最近长沙精子库供不应求，有关方面呼吁优秀青年踊跃“捐精”。据报道，目前长沙每 6 对夫妇中，就有一对要借精生子。几乎与此同时，网上出现了《长沙千人排队借精生子》的文章。据长沙市妇幼保健院生殖中心负责人姚小燕证实，在长沙市每 6 对夫妇就有一对不育夫妇要靠借精生子，但要找到精子，至少得等半年。姚小燕告诉记者，最多的一天就来了 4 个不育男申请借精生子。

2012 年长沙市中心医院在湖南省地区引进“自动取精机”后，对所取的 1000 多份精液标本进行分析，各项数据完全正常的仅占 30%，精子总数无明显改变，精子活力下降占 50%，无精症占 20%，精子不完全液化占 15%（引自 2012 年 10 月 29 日《潇湘晨报》）。

从广西高校半数以上大学生精子异常，到湖南长沙所取精液标本各种数据完全正常的仅占 30%，乃至千人排队借精生子，都向我们敲响了中华民族繁衍生存的警钟。

然而，随着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和转基因产品进口的不断增加，转基因产品对中国人生存繁衍的侵害越来越严重。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工程学院选取 17 种豆制品进行检测，其中包括大豆油、酱油、面酱、大豆磷脂、豆腐、豆浆等原料和加工品，都是人们最常用的食品，其中 13 种豆制品含有转基因成分，占被检测食品的 76.5%（引自 2013 年 7 月 5 日《生活文摘报》）。这就是说我们的下一代，从小就被迫接受转基因的侵袭。不可思议的是，尽管腾讯网发起的有 9 万多人参与的

一项调查显示，93%的人反对农业部批准进口转基因大豆，农业部在2013年6月13日，又“闪电批准了三种转基因大豆的进口”。这种作法实在有故意用转基因产品喂养中国人，和广大国民的意志对着干之嫌。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在2010年告诫国人，转基因粮油的“危害远远超过清朝末年的鸦片”（引自《郎咸平说新帝国主义在中国2》第201页），而农业部却如此钟情转基因产品，在转基因产品已经遍布全国城乡，还“闪电批准三种转基因大豆进口”，如果再放任被称为“避孕食品”的转基因作物，在神州大地上推广、泛滥，中华民族出现“断子绝孙”的事，就绝不是危言耸听。

第七节 在生存问题上不能搞双重标准

自从农业部批准两种转基因水稻，一种转基因玉米的安全证以后，农业部某些官员和热衷于推广转基因主粮种植的科学家互相呼应，上下配合，一方面组织转基因专家联名公告，发动全国媒体大肆宣传，派出专人向质疑转基因主粮的政协委员竭力做解释、说服工作，组织人大代表进行集中宣讲，大讲转基因食品安全无害，大家可以放心食用，并且通过转基因名家公开宣告，转基因主粮在五年内搬上全国人民的餐桌；另一方面却“对自己的餐桌严防死守”，生怕误食了转基因产品。

我们且看看农业部为了保证部机关幼儿园远离转基因产品所制定的保健措施。

2009年7月8日，农业部机关幼儿园网站公布的该园“儿童保健”第二条对“幼儿园的营养配餐及食品安全”作了如下规定——

1. 计划膳食：

幼儿园实行计划膳食，使全年伙食达到合理膳食要求。我园严格按照《北京市托幼儿园所、幼儿园儿童营养管理常规》

中规定的一级伙食标准进行膳食管理，保健医定时通过营养计算对幼儿伙食进行调整和监督。

2. 营养膳食：

每月制定两套食谱——营养代量食谱（用于食堂营养配餐）、一周食谱（根据代量食谱制作的食品名称，张贴在幼儿园大厅），代量食谱由保健医按照北京市儿童保健部门提出的标准和要求制定，精心计算出每名幼儿一日早、中、晚三餐两点（早、午点）的营养量；食堂人员根据每天班级提供的准确幼儿出勤数按代量食谱标准计算每天主、副食的使用量，进行精致的加工制作，并做到色、香、味俱全。

3. 安全保证：

幼儿园的主、副食品统一由大型超市购买送货，到货后严格执行食品验收制度，索要产品合格证，查验食品生产日期、保质期，确保在保质期内食用。鱼肉类食品统一由农业部机关食堂供货的优质水产品公司供货。食用油采用非转基因油。

农业部机关幼儿园的小朋友，都是农业部官员的后代，只能食用“非转基因油”，对所有食品都必须严格把关，“鱼肉类食品”只能统一由“为农业部机关食堂供货的优质水产品公司供货”，这种对自己和后代负责的精神，我想人们都可以理解。但是，农业部官员和他们的后代，为了远离转基因食品，专门设立了“为农业部机关食堂供货的优质水产品公司”之类的特供单位，为他们供应食品。他们拒绝转基因，远离转基因食品。作为主管全国农业和粮食安全的国家农业部，却和转基因专家一起，竭力把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后代都拒绝食用的转基因主粮，推上全国人民的餐桌，他们如此对自己和老百姓搞两种标准，至少在客观上是和西方国家实施“和平地断子绝孙”是一脉相承，叫人怎么理解？

国家财政部为了切实保证机关食堂主、副食品原材料供应与小卖部供应出售的食品“绝对绿色安全”，采取的措施也毫

不逊色。早在 2008 年以前，财政部领导就对机关食堂主、副食品供应拒绝转基因食品，引起了高度重视——谢旭人部长多次就保障职工健康做出指示，要求机关服务中心高度重视食品卫生，把职工健康当做头等大事来抓。刘红薇部长助理专门召开机关服务中心有关人员和部门会议，强调“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要求“严把部机关食堂原料质量关，确保部机关食堂、小卖部供应和出售的食品绝对绿色安全，牢固树立职工健康高于一切，食品安全重于泰山的优质服务理念；凡是对保证食品安全有利的工作，我们要舍得投入，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大力支持，为确保食品安全提供强有力的物质技术支撑。”（以上均引自财政部服务中心网站《为职工构筑食品安全的绿色屏障》）

财政部还成立了以部机关服务中心主任王彦欣为组长的部机关食堂食品安全工作检查小组，从“食品采购、验收、入库、领料、加工、自助各个环节的卫生安全保障”，到“严把进货渠道关、食品验收入库关、仓库管理关、工艺流程卫生关、个人卫生关和从业人员准入与培训关”，以及“对部机关食堂食品原材料质量和加工制作过程”进行“严格安全检查”；必须严把的关达六道之多，可见其何等重视。而且，还由部长助理刘红薇亲自带领机关服务中心主任王彦欣等深入山东、河北等为财政部食堂提供食品原料的基地进行考察调研。在山东寿光他们走进蔬菜大棚和农药残留物检测室，查看蔬菜种植情况和农药残留物检测全过程，了解质量标准体系，各项技术指标、安全监控制度等等。为了保证蔬菜质量绝对安全，在设施建设上采用了温湿度自测仪、碳纤维加温机、智能二氧化碳发生器、飞利浦农艺钠灯和大棚自控滴灌系统等先进设施；在种植模式上，发展了无土栽培、主体种植、间作套种，‘园艺蔬菜’生产，并采用蜜蜂授粉和生物防治病虫害等技术；在安全检测上，建立了拥有液相色谱仪、气相色谱仪和农药残留速测器等先进设

施的农药残留物检测室。”

在为财政部机关食堂供应蔬菜的蔬菜基地，配备了如此众多的先进仪器设备，对为他们提供的蔬菜进行如此细致周到的检测监控，使检查结果表明，没有发现任何卫生安全 and 产品质量问题，特别是对食品原料的采购，“我们（指财政部机关服务中心）选择的供应点和厂家都是国家、省、地市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消费者信得过单位，每批产品都是经过市级防疫站检查验收合格后方可进行收购加工的，部机关食堂采购的东北大豆油、大米、鲁花生油都是天然、绿色、营养、安全和非转基因产品，蔬菜则全部来自全国闻名的山东寿光，产品已实现由‘无’（无公害蔬菜基地）到‘绿’（绿色蔬菜基地）和‘有’（有机蔬菜基地）的转变。采购的调料、水果也都是全国知名品牌和绿色环保食品”（以上均引自2010年12月11日财政部机关服务中心网站《为职工构筑食品安全的绿色屏障》）。

财政部在“人力、物力、财力上”，“舍得投入”使部机关食堂、小卖部供应的所有食品，都是“天然、绿色、营养、安全和非转基因产品”，并且已优化到由“无”到“绿”再到“有”的绝妙境界，确实令人叹为观止。他们创造的这种食堂卫生安全的先进事迹，自然引起了上级的重视。国管局主办的《中国机关后勤》杂志，多次刊登加以宣传推广，餐饮部也一次又一次接待“其他部委同行业学习观摩”，在人们长叹“我们还能吃什么”的今天，财政部的先进经验，自然成了各地机关学习的榜样，而且从中央部委迅速辐射到全国各地。新华社在2011年9月16日的调查报道中，披露“特供”时指出，浙江省农业厅（本身承担着管理农业的重任）、水利厅、国土资源厅等政府部门大搞“特供”，已“发展到无所顾忌和巧立名目的程度”；《凤凰周刊》2011年第4期在披露“国家机关自建农场”的消息中，对山东省国土资源厅、省高院、省纪委等政府机关在济

南南部山区相继自建蔬菜基地，陕西省高院等机关在高陵县租地雇农民为单位种菜，媒体也已进行了报道；而且，这股风已经刮到了乡一级政府，2010年3月，湖北省通城县四庄乡政府在四庄村租地10亩，建起来乡政府的蔬菜基地。通城县委组织部甚至在全县掀起了“推广干部租地种菜运动，近2000名机关干部纷纷扛起锄头当业余菜农”。

从中央机关直至乡政府都搞自身的“特供”，损害的是公众利益。权力部门在自保的同时，放弃的是全社会的保障。“特供”越“特”，普供必然越糟。他们的示范作用，造成的结果，必然是普通群众的食品安全问题日益严重。苏州大学法学院教授周永坤，在分析这种状况时指出，特供潮虽然是官方唱主角，但新富群体必然成为加盟者，中国的食品灾难必将更难解决，对社会肌体的损害也更大，如果长此下去，受到摧残的就是整个民族。诚哉！斯言。

有关来华的外国人在中国享受“超国民待遇”的报道，早已人所共知。对他们的饮食安全更是呵护有加。特别是亚运会、奥运会、世博会这类重要活动的饮食安排，不光绝对拒绝转基因食品，其要求之严简直叫人难以相信。

以奥运会食品中的蔬菜为例，普通老百姓肯定不知道为奥运会提供的蔬菜，是“吃”什么长大的。说出来就会让人们大吃一惊——蔬菜都是吃豆浆、牛奶、白糖、食醋等高级营养品长大的。

奥运蔬菜培育的全过程，都采用有机方式，决不允许使用化肥、农药，防治病虫害则是通过物理和生物方式。延庆市是奥运蔬菜培育基地，培育蔬菜的底肥中就掺入了不少黄豆，在蔬菜生长期还要把黄豆打成浆，再经过发酵，浇灌到菜地里。在蔬菜成长过程中，菜农要定期喷施由牛奶、白糖、豆浆、食醋等按一定比例配制而成的营养液，给蔬菜补充营养。其中，黄豆（豆浆）促进生长，牛奶、白糖提高蔬菜的口感，增加甜

度；食醋使蔬菜的颜色更加好看。

如此不惜成本培育出来的蔬菜，不光绝对非转基因，当然也绝对安全、营养、绿色、环保。

来华的外国人享受着“超国民待遇”；国家农业部、财政部等中央部委官员和他们的后代，一些省市的厅局直到某些乡镇政府官员也都能通过“特供”远离转基因食品，健康不会受到影响。但是主管全国农业、肩负 13 亿人民主粮安全的农业部却批准发放了转基因水稻和转基因玉米安全证，并和中国的转基因精英一起，加紧把转基因主粮推上中国人的餐桌，如此把潜藏着巨大风险、被称为“避孕食品”、“清朝末年的鸦片”的转基因产品，强加给无法享受“特供”产品的中国老百姓，在中国实施双重生存标准，岂不是有意让老百姓承受转基因产品可能爆发的严重危害？

第八节 “中国需要保护自己的粮食安全”

某些狂热追捧转基因主粮的中国精英人物，由于在外得到了美国生物资本集团的支持，在内则得到了某些政府部门及其官员的支持，很有几分“胆壮气雄、无所顾忌”的味道。他们一方面利用自己掌握的话语权，借助媒体一个劲地宣扬转基因食品安全无害；一方面却在还没有获得国家批准任何转基因主粮生产许可证和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利用手中的某些优势和各种关系，急不可待地向并不知情的农民销售水稻、玉米等转基因主粮种子，在许多地方搞起了转基因主粮的“规模种植”。

这种有悖常情常理的违法行为，理所当然遭到了另一部分中国科学家的反对和质疑。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蒋高明曾指出，转基因至少存在三个方面的不确定性——一是转基因对生命结构改变后的连锁反应不确定；二是转基因导致食物链的“潜在风险”不确定；三是转基因污染、增殖、扩散及

其清除途径不确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带头将转基因引入十三亿人的主粮，害莫大焉！转基因生物出问题，根本无法控制！”再说，转基因水稻是在水稻中植入抗虫基因，使水稻分泌出一种 BT 毒蛋白物质，虫子食后会被毒死，从而产生防虫效果。但是，水稻是中国人的主粮，“虫子无从下口，人类长期食用难道就没有害处吗？”

对蒋高明等科学家提出的这类有关生命安全的质疑，难道能够回避吗？

就在农业部给张启发批准两个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之前的 6 个月，即 2009 年 5 月，美国环境医学研究院推出的一份报告指出，“一些动物实验表明，食用转基因食品有严重损害健康的风险，包括不育、免疫力下降、加速老化、胰岛素的调节和主要脏腑及胃肠系统的破坏”，这份来自美国环境医学科学研究报告的报告还指出：插入转基因大豆里的基因，会转移到我们肠道里细菌的 DNA 里面去，并继续发挥作用，这就是说，吃了一次转基因食品以后，我们即使不再吃转基因食品，体内仍然会不断产生潜在危险的基因蛋白质危害我们的身体。说透彻一点就是，“吃了转基因食品，会把我们的肠道细菌转变成活着的农药制造厂，可能直至我们死亡为止”（引自 2010 年 7 月 6 日《国际先驱导报》）

然而，热衷于推广转基因主粮商品化的“精英们”，不仅对反对转基因主粮商品化的中国科学家和各界人士的质疑之声，不予理睬；对包括转基因发源地美国科学家在内的各国科学家，通过动物实验，频频发出的警告避而不谈，为了实现他们公开宣布转基因主粮五年内搬上中国餐桌的目标，在各地大搞转基因主粮“规模化”种植的同时，和支持他们的某些政府部门及其官员一起，动员各地媒体，大造舆论，攻击、围剿转基因主粮种植的反对者和质疑者，封杀他们的声音。例如，山东电视台制作的转基因专题片《餐桌上的世纪悬念》，刚播出

第一集，就被下令停播；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宏良在 2011 年本来已经与两家出版公司签署了有关转基因主粮问题的出版合同，由于受到干扰，结果全部“流产”。出版方公开声明，取消合同是“因为害怕”被支持转基因的权势人物“砸饭碗”。有关转基因安全问题的讨论、文章，在电视、报纸、杂志及主流网站，长期被封杀。所有这些做法，就是剥夺老百姓对转基因主粮安全问题的知情权，剥夺反对推广转基因科学家的发言权，让那些转基因食品安全无害的不实宣传欺骗人民。由此可见，那些极力支持和推广转基因作物的精英，手中握着非同一般的大权。

令人费解的是，国家至今没有批准包括水稻、玉米在内的任何转基因主粮的生产许可证和经营许可证，2011 年 11 月，由美国生物资本集团和国内买办势力支持操纵，在武汉召开的推广转基因主粮大会上，一些转基因布道者却在会上大喊大叫：“转基因主粮是总理批准的，不食用转基因就是对抗总理，干部要撤职！”咄咄逼人之势，令闻者不寒而栗。

笔者没有亲耳听到或在什么文件报刊上亲眼看到，是哪位总理下令中国人都得“食用转基因”主粮，转基因精英们如此咄咄逼人，到底是拉虎皮作大旗还是假虎皮作大旗？即使哪位总理真的批准了转基因主粮，难道就应该不管青红皂白，不管对国家民族是福是祸，都得当成圣旨执行吗？

我们切不可忘记的是，转基因已被美国列入称霸全球的战略部署，成了一种投向发展中国家要“灭绝垃圾人口”的武器。美国经济学家、《粮食危机》一书的作者威廉·恩道尔，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我……把转基因工程的推进比作新一轮鸦片战争。”这场“新一轮鸦片战争”，正在加速向发展中国家推进，中国当然是他们的主要目标之一。

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为了把美国的商业化农业引入主要发展中国家”，美国洛克菲勒家族就提出了“绿色革命”的

理念，这无疑是对当时世界的“红色革命”而来的，“其实质就是以传输先进农业科学和技术的方式，控制发展中国家的粮食生产”，设立于墨西哥的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设立于菲律宾的国际水稻研究所和设立于尼日利亚的国际热带农业研究所，都是由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共同设立的“绿色革命”基地，向发展中国家输入缺乏繁育能力的新型杂交种子、昂贵的化肥和农业技术，使得接收国对美国的依赖越来越大，被迫接受许多苛刻的政治经济附加条件（以上均引自美国威廉·恩道尔所著《粮食危机》第11页、145页）

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极力反对、抵制和抨击别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红色革命”，他们却不择手段地向发展中国家输出绝灭人性的“绿色革命”。

在受害国中，阿根廷的教训最为惨烈。

美国洛克菲勒家族当时凭着与拉美国家之间不错的关系，向阿根廷等国家大力推销转基因作物。到2004年，阿根廷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已占到全国耕地总面积的48%，种植美国的转基因种子，只有用美国孟山都公司提供的农药才有效。由于种子和农药都得向美国孟山都公司购买，孟山都公司在专利费用上则坚持采取“强硬态度”，仅仅十年时间，在所谓技术进步的名义下，阿根廷的粮食自给率逐年丧失，整个国家的农业经济彻底受控于外国权势集团（引自美国威廉·恩道尔《粮食危机》第205页）

而且，问题的严重性并未止于此。当美国转基因大豆主宰了阿根廷经济以后，杜邦公司又在阿根廷成立了一个名字听起来很美妙的“生命蛋白”的组织，大力宣扬人类应食用大豆，鼓励阿根廷人用大豆替代蔬菜、肉、奶、蛋等健康食物，并且作为一场运动，杜邦公司向布宜诺斯艾利斯成千上万的穷人分发大豆强化食品，这种做法在所有国家中是破天荒第一次。“到目前为止，阿根廷人在很多方面都成了活体试验品”（引自美

国威廉·恩道尔《粮食危机》第 225 页)

从推广转基因大豆开始,阿根廷的国家农业经济彻底受控于美国权势集团后,首先遭殃的当然是阿根廷百姓,阿根廷人不仅在很多方面成了美国人的“活体试验品”,而且变得越来越贫穷。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处于独立自主经济时,阿根廷的贫困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只占 5%,1998 年上升到 30%,到了 2002 年,已激增至 51%。以前阿根廷闻所未闻的营养不良现象到 2003 年,已上升到占全国总人口 3700 万中的 11%~17%(引自美国威廉·恩道尔《粮食危机》第 221 页)

阿根廷因为推广美国转基因农业,造成了如此严重的后果难道不应该成为我们的前车之鉴吗?

那么,中国的情况如何呢?

“世界绿色和平组织”和第三世界网络组织于 2010 年,发表了一份《谁是中国转基因水稻的真正主人》的调查报告,该调查报告告诉我们,中国正在申请商业化种植及研究的 8 个转基因水稻品种,没有任何一个拥有独立自主的知识产权,而这 8 个转基因水稻品种至少涉及 28 项国际专利技术。这些专利技术分别属于美国孟山都、杜邦和德国拜耳三家跨国生物公司。我们还必须记住的是,孟山都等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公关战略是:“低调地避开公众视线,主走高端政府公关路线,由于(孟山都)和美国国家利益高度一致,孟山都在世界各国的业务拓展都由美国农业部等政府机构保驾护航”(见 2010 年 12 月 21 日《东方早报》)。也就是说,孟山都等生物公司为了达到控制发展中国家农业经济命脉的目的,公关的主要对象是政府部门和官员,而他们的行为,都是得到美国“政府机构保驾护航的”政府行为。我们只要开始大量种植转基因水稻,拥有这些水稻专利的外国公司,就会在他们的政府支持下,像在阿根廷一样以“强硬态度”,收取高昂的专利费。而且,所要付出的专利费,竟有 28 种之多。正如国际绿色和平食品农业项目主任方立峰所警告的:

“这就给我国的粮食主权埋下了定时炸弹”。作为中国十三亿人口主粮的水稻，一旦陷入这种境地，谁能保证中国不会像阿根廷一样，“粮食的自给能力逐步丧失”，乃至使“整个国家的农业经济彻底受控于外国权势集团”呢？

美国经济学家、《粮食危机》的作者威廉·恩道尔在2009年接受《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采访时，谈到美国“对华的全方位主导战略”时，忠告我们：“中国需要从更加广泛的方面看待中国的各个问题，尤其是粮食安全。非常重要的一点，中国需要保护自己的粮食安全，免遭美国转基因的侵害。”

在转基因精英们不遗余力要把转基因主粮推上中国餐桌的今天，我们面对的是西方霸权主义者发动的转基因工程这场“新一轮鸦片战争”，在这种内外呼应力推转基因食品的情况下，龙的传人难道能对美国经济学家威廉·恩道尔，“中国需要保护自己的粮食安全”的警告充耳不闻吗？

第九节 福建吹响了抵制转基因主粮的号角

由美国生物资本集团和国内买办势力支持操纵，在武汉召开的推广转基因主粮大会刚刚结束，转基因精英们在会上叫嚷：“转基因主粮是总理批准的，不食用转基因就是对抗总理，干部要撤职”的声音，还没有从人们耳畔消散，被他们动员起来的众多媒体正在连篇累牍围攻转基因主粮反对者、质疑者，甚至不顾斯文扫地对转基因主粮反对者破口大骂之时，2010年11月26日下午，在北京却发生了一起“令人震惊的事件”，——被称为中国转基因水稻之父、中国科学院院士、华中农业大学教授张启发，应邀到中国农业大学做转基因学术讲座时，“遭遇意想不到的谩骂、围攻，在提问题环节时，一位中年妇女突然站起来高喊：你这个卖国贼，为了你的美国主子，把十三亿人当成了白老鼠！随后，一个自称‘工程师’的中年男子，冲

到讲台前，试图抢夺话筒；有人打出了反对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的横幅；一位情绪激动的长者，甚至将水杯掷向讲台……”（引自 2011 年 9 月 29 日《人民日报》）

当时会场内之混乱，人们情绪之激愤，读者不难想见。

中科院院士应邀到中国农业最高学府做学术讲座，参加者大概都是专家学者，普通老百姓肯定无缘获得这份“荣幸”，很可能连这类消息也难以得到。在如此高层次的学术讲座中，发生这种建国以来闻所未闻的“震惊事件”，让人们看到的是普通群众和中国知识界一部分人对转基因精英们在中国强行推广转基因主粮所表现出来的强烈不满和愤怒。

接踵而来的是，在中国农业大学发生这起“震惊事件”后第七天，即 2010 年 12 月 3 日，福州晚报、新华网、东南新闻网、乌有之乡等众多媒体几乎同时发表或转发了福建全省“封杀转基因大米”的报道。据福建省粮食局行业管理处有关人士介绍，前段时间有消息说转基因大米已流入福建市场，引起了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要求省里几大部门依照国家有关规定，提出加强大米监督的具体措施，并组织落实。遵照省委、省政府指示，福建省粮食局、福建省食品安全委员会、福建省农业厅和福建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发出了《关于加强转基因大米监督的通知》。该通知称：“今年以来我省陆续接到市场销售转基因大米的报告，目前社会各界对转基因大米的安全性及潜在风险存在争议，我国尚未批准转基因水稻进行商业化生产，为确保人民群众大米食用安全，我省要求各环节严查转基因大米”。

通知措辞非常具体，不仅“要求各地粮食部门要重视加强储备粮、政策性用粮经营环节转基因大米（稻谷）的把关，督促粮食购销企业、储备粮承储企业把好粮食采购、入库关，严禁采购转基因稻谷（大米）用作储备粮或政策性用粮供应，对可疑转基因大米，要组织抽样、送检，发现转基因成分的大米，及时向当地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同时积极配合农业行政主

管部门对转基因生物安全法规的宣传培训力度，提高种子研发者、生产者、经营者的法律意识，促进源头管理工作责任落实，加强种子抽样、检测和监控，依法加强水稻种子的监管，从源头预防转基因种子流入种植环节，对非法销售转基因种子和非法种植、生产、销售转基因的案件，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坚决给予查处。”

福建是我国第一个用红头文件形式，以法律法规为武器，公开反对和彻底封杀转基因主粮的省份。福建省委书记孙春兰是中国大陆三十一个省（市、区）中唯一的女省委书记。而当时的背景是，急于要把转基因主粮推上中国餐桌的转基因精英们，正在某些政府部门及其高官大吏支持下，四面出击，围剿转基因主粮反对者、质疑者，甚至以“转基因主粮是总理批准的，不食用转基因就是对抗总理，干部要撤职”进行威胁，大有“乌云压城城欲摧”之势，而孙春兰治下的福建省却以对人民生命安全高度负责的精神，断然发文从源头到终端彻底封杀转基因主粮，他们所承受的风险和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但是，一切对人民对国家有益的事，绝无例外都会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福建的做法让人们看到了在中国抵制和封杀转基因主粮的希望，理所当然受到社会舆论和各界人士的赞扬。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宏良看到《福建多部门联合发文禁止转基因大米在省内销售》的报道后，“忍不住的泪水滚滚而下，心里不住的欢呼——人民有救了！中华民族有救了！”称赞福建封杀转基因主粮“其意义不亚于当初林则徐火烧鸦片”，（引自张宏良《人民感谢你们——向全国唯一的女省委书记致敬——关于福建禁止转基因大米在省内销售的按语》）

美国经济学家恩道尔把美国推行的“转基因工程”，称为“新一轮鸦片战争”。中国经济学家张宏良把福建封杀转基因主粮，视同当年林则徐“火烧鸦片”。在这场转基因大战中，孙春兰主政的福建省举起了抵制转基因主粮的大旗，向中国人民吹响

了保卫中国餐桌的号角，令人鼓舞。

然而，中国的事情非常复杂。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造就了难以计数的拜金主义信徒，见利忘义成了社会痼疾；西方反华反共势力的强劲渗透，培养了一大批崇洋媚外乃至卖国求荣之辈，唯洋是崇，唯洋是举之流无处不在，他们之中不乏对转基因狂热追捧之流。

科学家的实验一次又一次显示，转基因食品潜在着危害人体健康，影响人类生育的巨大风险。但并不是今天吃了转基因食品，明天就得病，就不能生育。这种危害有一个过程，可能要经过几代人、几十年时间才会发生。但一旦发生就是一场不可逆转的灾难，可能造成一个民族的灭绝。但这种可怕的后果，被热衷于转基因的中国精英们有意遮蔽、封锁，那位人们熟悉的温某人，在2009年被美国评为对美国“作出重大贡献”的十大明星中唯一的外国人以后，就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宣称：“转基因只会造福中华民族”。当记者提出转基因的危害在几十年后一旦发生，就可能造成中华民族的灭绝，难道就不害怕这种后果吗？温某人却振振有词地说：“我以前说过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话，在这种认识面前，还有什么害怕的吗？”

由此可见，面对西方强权势力的压力和外国生物资本集团的诱惑，手握转基因主粮决策权、话语权的某些精英们，显然不会轻易放弃把转基因主粮推上中国餐桌的图谋。因此，在福建吹响封杀转基因主粮的号角以后，中国能不能抵制和封杀转基因主粮，使我们民族免遭转基因极可能造成的巨大危害，仍是一道令人忧虑的难题。

第八章 中国人的一日三餐不能受制于洋人

第一节 中国大豆业的崩溃

在一日三餐中，人们首先想到的是粮食，这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要求和基本保障，是事关国家稳定、民族存亡的头等大事。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就制定了美国称霸世界的粮食战略：“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的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

控制了所有的国家，未必能控制所有的人；控制了所有的人，当然也就控制了所有的国家。可见粮食在美国称霸全球战略中的重要位置。

美国经济学家威廉·恩道尔在《粮食危机》中如此写道：“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粮食与石油一起成为美国维持新经济霸权中的关键支柱。主导全球粮食市场与主宰全球石油市场和主导武器市场一样，成为华盛顿政策的核心。”

1973 年的世界粮食危机成为美国新粮食政策的标志性事件。当时国际市场粮食价格和石油价格都以 300%~400% 的速度上涨。在粮食危机中，美国的六家跨国公司控制了世界粮食储备的 95%，华盛顿和粮食巨头间的紧密联系成为美国粮食武器的核心（引自美国经济学家威廉·恩道尔《粮食危机》第 73 页，知识产权出版在 2008 年 11 月出版）。例如，1996 年为了向阿根廷推广转基因大豆，孟山都公司以极其优惠条件向阿根廷农民出售种子，而且不惜放弃“技术使用许可费”，以加速其转基因种子在阿根廷的扩散。后来，阿根廷种植转基因大豆的土

地很快增到了 14 倍，孟山都公司的转基因种子已遍布整个潘帕斯平原，而且进入巴西、巴拉圭、玻利维亚、乌拉圭等国。

到 1999 年，即转基因大豆引入三年后，孟山都公司便正式要求农民们为种子支付“延期专利费”。尽管这种要求不符合阿根廷法律规定，孟山都为此便发起了一场精心策划的公益宣传运动，将自己装扮成农民们“滥用”和“盗窃”行为的受害者，孟山都提出，为了收回用于转基因种子的“研究和开发投资”，必须收回专利使用费。阴谋制造者成了受害者。

2004 年初，孟山都紧锣密鼓对阿根廷政府施压，强硬宣布，如果阿根廷拒绝支付“技术许可费”，孟山都将在进口大豆的欧美国强制收取专利费，因为这些地方都承认孟山都的专利，这就必然使阿根廷商业化农业在出口市场受到毁灭性的打击。阿根廷政府面对孟山都的高压，不得不妥协。阿根廷政府随即设立了一个由政府管理的“技术补偿基金”，阿根廷农民不得不向他们支付高达转基因大豆销售额的 1% 的专利使用费。比支付专利费更严重的是，由于这场由孟山都公司发起的“转基因大豆革命”，摧毁了传统农业的生产方式，阿根廷人能够获取的食物面临着急剧的变化；而且，以大豆为主的单一农作方式，使这个国家在随后面临的经济萧条表现得“十分脆弱”。

阿根廷当然不是接受转基因种子出现的第一个悲剧。美国在入侵伊拉克的小麦种子库后美国国际开发署便强迫伊拉克接受美国的思考基因种子（参阅 2012 年第 4 期《看世界》）。

中国是一个拥有 13 亿多人口的大国，中国巨大的粮食市场，理所当然成为引人垂涎的目标。包括美国粮食巨头在内的跨国粮食巨商，多年来就虎视眈眈盯着潜力巨大的中国粮食市场，却苦于欲进无门。中国对外开放粮食市场以后，他们随之急不可待地携着雄厚的资金，纷纷涌入中国粮食市场全面布局，以凌厉的攻势，向包括水稻、玉米、大豆、棉花、油料等主要农产品生产及加工、流通、销售领域全面出击，步步进逼，往

往使我们很难招架，以大豆为例，美国农业科技化、现代化、规模化程度非常高，大豆成本非常低。在美国大豆大量打入中国后，中国东北大豆一下就彻底失去市场，中国市场彻底崩溃。短短几年内，使中国主产区的大豆生产、加工和大豆种植者全部陷入绝境，在大豆主产区黑龙江，68家规模以上的大豆榨油厂几乎全部倒闭，中国原有的93家大型榨油厂，64家被外商掌控，中国政府随即丧失了对食用油的定价权。中国大豆的全面崩溃，使4000多万一直以种植大豆为生的豆农，立即陷入失业和生存危机。主产区的大豆加工企业几乎全部瘫痪。中国大豆业出现的这种前所未有的悲剧，正如中国大豆产业协会专职副会长刘登高所指出的，我国大豆市场的对外开放，既不设过渡期，仅仅3%的低关税，又没有数量限制，而且还不及及时采取WTO允许的“两反一保”等措施，由此导致国外转基因大豆如潮水般涌入，使中国实际上成了国外转基因大豆的倾销地。

令人不解的是，正当举国质疑、反对转基因食品端上中国餐桌的呼声不断高涨之时，我国农业部又于2013年6月批准了三种转基因大豆的安全证书。为国外转基因大豆堂而皇之走上中国餐桌打开了大门。至此，我国已发放了82个转基因作物的安全证书。准许进口的转基因作物涵盖了大豆、玉米、油菜、棉花等主要农产品领域。令人震惊的是，《2012年中国肿瘤登记年报》公布后，黑龙江省大豆协会一份与肿瘤高度相关的报告，让人触目惊心。黑龙江省大豆协会副秘书长王小语说，河南、河北、甘肃、青海、上海、江苏、广东、福建等地，基本都是我国转基因大豆油的消费集中区域，这些地区同时是我国肿瘤发病集中区（据2013年6月20日央视网报道）。

中国不仅成了美国转基因大豆的最大买家，中国每年进口的玉米和棉花，大部分也来自美国。美国转基因大豆彻底挤垮国内非转基因大豆种植业后，已牢牢地占据国内90%的市场

份额（见 2010 年 12 月 21 日《东方早报》）。这是一个十分惨痛的教训。在中国农业产业化、科技化、规模化程度都十分低下的情况下，轻而易举就把农产品市场开放给美国等发达国家，这种对民族产业缺少保护意识更无保护措施，几乎是不设门槛、敞开国门的对外开放，给中国农业造成的打击之沉重以及后果之严重，恐怕是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的。

第二节 中国人炒个荷包蛋都要看洋人的脸色？

在当今世界上，四家欧美公司掌控了全球粮食的 80%。因为他们的英文名字头一个字母分别是 A、B、C、D，被称为 ABCD 公司。这四家粮食巨头都与美国政府和华尔街有一种相当暧昧的关系。它们进入中国后，在整个大豆产业链上不仅很快就控制了我国大豆 70% 的加工能力，同时进入了种植、贸易、流通等各个领域。而此中就有美国不可磨灭的“功劳”。

2003 年，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规模达 200 亿元的食用油市场，分布在全国的上百家榨油企业，在 2003 年实现利润 21.98 亿元，而且，这个市场正在以每年平均递增 20% 至 25% 的速度高速发展，前景令人欣喜。

谁也没有料到，到 2004 年却陷入了“冰封期”。

此中的背景是，美国农业部首先有意降低大豆产量，美国金融炒家立即猛炒大豆期货，芝加哥大豆期货交易价从 2003 年 8 月到 2004 年 4 月的短短八个月内，价格就翻了一倍。中国在 1995 年以前，一直是大豆净出口国，从不进口大豆。随着大豆业的崩溃，到 2000 年中国的大豆进口已突破 1000 万吨。面对 2004 年出现的全球大豆价格暴涨，中国榨油业普遍出现了“心理恐慌”，于是在 2004 年每吨大豆已涨到 4300 元的高价时，从美国“抢购”了 800 多万吨大豆。随后，美国农业部又调高大豆产量，导致大豆价格直线下跌，在进口大豆的惨败

中，一下使大批中小企业陷入绝境。比如，山东日照市一家刚刚建好还没有正式榨油的企业，就是在每吨已涨到 4300 元的高价时，从美国购买了一船大豆，谁知大豆还没到岸，就已跌到每吨 2000 元。这家等着正式生产的榨油企业，就这样，不等正式开工榨油就倒闭了。

中国是大豆原产地，这种农作物在中国大地至少生长了 4000 年以上。中国长期以来都是大豆出口大国，外国大豆根本进不来。美国大豆协会等农业机构，为了使他们的大豆能打入中国，曾派出代表团，不远万里到中国大豆主产区黑龙江省等地进行“考察访问”，极力劝说黑龙江省放弃榨油生产，理所当然遭到黑龙江省大豆协会否决。但是，国家取消大豆进口关税和配额限制后，洋大豆立即像潮水般涌入中国。其中尤以美国大豆来势异常凶猛。中国一下就成了美国大豆的倾销地。以 2007 年为例，据美国农业部公布的大豆出口销售报告显示——截至 2007 年 7 月 15 日当周，美国净出口销售大豆总量为 180.76 万吨，比前一周增长 39%，为前四周平均水平的 2.13 倍，远远超出分析师预测的 80—120 万吨区间的上限，其中仅向中国出口大豆即达 119.62 万吨，占美国出口大豆总量的 66%。洋大豆如此涌入中国，不到几年，中国就从大豆出口大国变成了大豆进口大国。据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透露，2011 年我国共进口大豆 5838 万吨，其中绝大部分都是转基因大豆。这些转基因大豆主要来自美国、巴西和阿根廷。进口大豆占我国大豆消费的 70%~80%，甚至更多。中国的大豆进口，已经被美国粮食巨头如嘉吉、ADM、邦吉等操纵。中国大豆市场，完全被洋大豆垄断。

与此同时，国外粮商还把手伸入了油脂加工业。

先看看国际四大粮商的“A”吧。该公司与新加坡丰益集团联合投资组建的益海嘉里集团（下称益海集团），不仅拥有金龙鱼、香满园、胡姬花、口福、鲤鱼等多个知名品牌，还参

股鲁花、福临门等知名企业，它已“迫使国内大豆加工企业集体缴械”。（郎咸平语）其工厂遍布全国各地，是中国最大的粮油加工集团。截至 2010 年 7 月，已经把中国大陆食用油市场 50% 的份额牢牢抓在手中。也就是说，13 亿中国人，每吃 1 斤食用油，就有半斤是从益海集团购买的（参阅 2010 年 8 月 1 日《羊城晚报》）。而且海益嘉在从黑龙江、辽宁、天津、河北、秦皇岛、营口、连云港、山东、张家口、泉州到广东等沿海地区，都设有油厂，这是益海嘉在中国谋篇布局的套路。因为靠近港口，物流便利，从国外进口的原料大豆，可直接进入车间加工，大大节省了成本。但同时又背靠几亿人口的巨大市场，消费潜力巨大，利润诱人，而且油脂油料加工及油脂产品的销售网络，已覆盖县级城市，不少地方已深入广大农村，实现了就近供应，抢占市场十分便利。一旦生变，祸患无穷。

四大粮食巨头中的“B”，从 2000 年进入中国后，很快就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大豆和油籽供应商，在中国已拥有四家大豆加工厂。

“C”在中国 20 个省市投资的独资或合资企业多达 43 家，其投资项目包括饲料、蛋白、植物油、动物饲料、化肥各个门类。

“D”不仅持续增长向中国出口玉米，而且是美国棉花公司在中国的最大供应商。仅 2003 年，在中国的销售额就超过 16 亿美元。

自从 2004 年，我们被美国政府和华尔街金融大鳄联合发动的大豆“金融战”击败后，外商在短短几年之内，就将我国 90 多家榨油企业中的 64 家，变成了他们的独资或合资企业，牢牢地控制着中国 85% 以上油脂加工总量，从而把中国食用油定价权抓到了手里。2007 年以来，中国食品价格大幅上涨，其中上涨幅度最大的是食用油，其原因就是我们丧失了食用油定价权，受外资控制的结果。而且，此后的情况并不是向好的方向发展，而是更加恶化。据 2011 年新华社第 15 期《半月谈》

报道，各地不断传来食用油价格上涨的消息，除了外资公司控制了食用油定价权之外，则是政府对农业的冷漠，对油料作物种植的忽视。据对安徽、湖北、山东、黑龙江四省油料作物主产区调查显示，我国大豆、油菜、花生等油料作物生产都呈萎缩趋势，油农收入、种植愿望、种植面积出现三“下滑”。以安徽为例，油菜种植面积从2007年的1200万亩，下降到2010年的950万亩；减少20.8%；总产量从40亿斤下降到24亿斤，减少40%。花生虽然出现了历史最高的价格，补贴政策也实行双重利好，但农民种植花生不但没有出现预想中的高涨，反而持续低落。与油料作物种植量持续下降相对应的是，食用油进口量大增。据中国粮油学会油脂分会会长王瑞元披露，我国大豆进口，到2009年已达到425万吨，我国食用油净进口折油总量已由2000年的461万吨，上升到2010年的2088万吨，10年间增长了4.5倍，国际市场一旦出现波动，我们就要吃大亏。

更令人震惊的是，国内一些重要央企，为了部门利益，正在牺牲国家和人民利益，配合中国转基因产品公司，对中国人民发起的那场“新鸦片战争”。据记者在湖北、四川等油菜籽主产区调查了解，包括中粮、中储粮等承担国家油菜籽托市收购任务的央企，大量采购进口转基因油菜籽和转基因菜籽油，冒充国产油菜籽和菜籽油。目前，进口转基因菜籽到岸完税后，每吨比国产油菜便宜500多元，进口菜油比国产菜油便宜1000多元。国家每年确定菜籽托市收购数量后，负责国内粮食和油脂托市收购的中储粮就在各省选择委托收购和加工企业名单，将指标分配给委托企业，这些企业可获得每吨220元的委托加工费，有存储能力，并获得国家油脂代储资格的企业还可以从中储粮获得每年每吨120元代储费。业内人士算了一笔账，如果某企业拿到一万吨收购指标，就能获得120万元代储费，一万吨油菜籽收购指标，按35%折油率就是3500吨菜油，按托市菜籽折油价每吨10400元计算，每吨可赚2000元差价，

总共可获得 700 万元差价（综合 2013 年 8 月 22 日《21 世纪经济报道》、8 月 23 日《证券日报》）。此类为了部门利益，而牺牲国家、民族利益的行为，难道不应该受到谴责吗？

一个 13 亿多人的大国，人们的食用油都得从外国人手里买，那是不可思议的。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对这种情况，用“炒一个荷包蛋都要看华尔街的脸色”来形容，可谓入木三分。

中国人“炒蛋的油都要由华尔街来定价”，看华尔街的脸色，这样的日子，这样的生活，是什么滋味呢？

第三节 外商在中国掀起的粮食抢购大战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强权国家，通过热线在粮食市场兴风作浪，他们一方面策划、制造了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危机，同时又利用他们的强势宣传工具，将世界粮食短缺的责任，归之于发展中国家。国际粮价上涨的原因明明是与他们关系暧昧的国际粮食巨商有意炒作，却被他们说成是发展中国家粮食消费大量增长。美国人布朗早就著书恶意为中国耕地不可能养活中国人大造舆论；美国媒体则公开指责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该对全球粮荒负责。

美国人这样宣传，完全是服务于它要称霸全球的粮食战略。早在 1974 年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就在他的“秘密备忘录”《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中写道：“世界越来越依赖于发展中国家的矿产资源供给，如果迅速增长的人口妨碍了它们未来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由此而产生的不稳定可能会对这些资源的增长和持续供应的环境造成破坏”。基辛格所说的世界越来越依赖于发展中国家的矿产资源供给中的“世界”，其实就是“美国”。美国一直在掠夺发展中国家的“矿产资源”。基辛格这些被美国经济学家恩道尔称为“冠冕堂皇的官方语言表述，在实际上就是：如果这些劣等人种妨碍我们获得充裕的高价原材料，我

们必须想办法除掉他们”（引自威廉·恩道尔《粮食战争》第10页）。而控制粮食是除掉发展中国家“这些劣等人种”最好的办法。

正是在这种国际背景下，国际上四大粮食巨头等外国资本，在控制了中国大陆85%的食用油市场，夺走了中国食用油定价权的同时，大举抢占中国粮食市场。他们从粮食的上游种子种植、小麦收购、面粉加工、稻谷收购、大米加工；到中游的食品生产，再到终端的流通销售，实现全面渗透。

随着外资的强劲渗透，中国食品领域即中国人的“一日三餐”，完全被外资掌控，今天已不再是那句哄小孩的“狼来了”。

2000年小麦收购期间，国际四大粮食巨头中的法国达孚、新加坡丰益国际有限公司旗下的益海集团等外资公司，纷纷加入了粮食抢购潮。益海集团在这年“三夏”期间，抢先插手山东、河北等小麦产区的粮食抢购，仅在山东济宁一地就投放了6亿元巨资，按当地市场价可收购不少于30万吨粮食。

我们不合理的价格体制，也帮了外资在中国抢购粮食的忙。在国际粮价大涨，粮食危机已经凸现的情况下，国内粮食价格却“波澜不惊”。而且，粮食部门收购资金普遍不足，而农资却不断涨价，农民种粮收益一直不佳。比如，2008年，全国夏粮丰收，国家规定小麦最低收购价为每斤0.77元，与农民预期相差很远。这种“谷贱伤农”的“托市价格”，导致农民不愿卖粮，从而出现夏粮丰收，国有粮食部门却收不到粮食的尴尬局面。这就给了外资抢购粮食以可乘之机。

比抢购粮食更可怕的是，财大气粗的国际粮食巨头，首先追求的并不是经济效益，主要是着眼于开拓和抢占粮食市场。他们收购粮食的出价普遍高于国家规定的价格。2010年秋天，益海集团粮食有限公司，从8月1日早稻收割开始，就抢先挂牌收购早稻，每100斤出价98元。这个价格既高于国家制定的每100斤93元的收购价，也高于市场平均价，站到了粮食

收购价的最高点，不仅使粮食抢购战更加激烈，也加重了中国粮食企业收购粮食的难度，使不少中国粮食企业陷入困境。截至2010年9月，仅江西省就有超过2000家大米企业陷入倒闭或停产困境。面对资金雄厚的国际粮食巨头们旨在抢占中国粮食市场的粮食抢购大战中，很多中国粮食企业缺少招架之力。

为着抢占中国粮食市场，外商还不断改变策略。比如，益海集团往年主要是靠购买国有粮库的粮食，用于满足自己加工厂的生产需要，从2010年起，已改为直接委托粮食主产区一些私人粮食企业以及粮食系统通过改制后，被剥离出来的粮库等粮食收购主体，帮他们代收代储。益海集团为了多收粮食，总是先给那些私营粮食企业和商人，提供优惠的收购价格和收购资金，完成任务后再发给丰厚的佣金，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而且，他们还会每天给关系户打电话，及时了解收购情况，其目标是“只要有粮，就想方设法拿下来”，“找粮食就是要先下手为强”，而在价格上都比较“宽松”。

外商利用这种办法，通过私营粮油渠道进入粮食市场，使政府部门根本无法掌握粮食库存和销售情况。因此，很难对粮食问题做出正确决策。而那些受雇于外商的私营粮食企业和粮商，由于拥有多种关系，都是熟门熟路，价格又比较宽松，收购粮食很容易。一旦粮食出现通胀预期，他们就会大量囤积粮食，同时放出虚假信息，制造紧张空气，趁机抬高粮价。人们不该忘记，饱受大蒜、绿豆价格暴涨之苦，就有外资企业的炒作身影。2008年在河南一袋大蒜，才卖两三元，到了2010年，同样一袋大蒜，要价已飙升到200元，几乎涨了100倍，大蒜可以不吃或少吃，“一日三餐”，粮食是不可或缺的。

资金雄厚的外商打入中国粮食市场后，由于开出的收购价格普遍高于市场价格，往往能左右粮食市场，使中国粮食部门处境被动。在河北早就有粮食部门无可奈何地说：“我们的粮储企业要制定粮食收购价格，还得与跨国粮商益海嘉里协商”。

中国粮食企业在中国大地上收购中国粮食，制定收购价格还得与外资“协商”，岂不是天大的笑话吗？这就说明，在一些地方收购粮食的主动权，已被外商掌控。

第四节 中国人的“一日三餐”也要受制于洋人？

如果国际巨头只收购粮食，对我们的威胁也许并不十分可怕。但洋人并不满足于收购而是立足于全面控制粮食。比如，隶属于世界四大粮商之一的某外资粮食企业，就已在河南、河北、山东、黑龙江、湖南等众多粮食主产地区迅速建立或并购了一批粮食加工企业，在江苏等省建立了粮食储存企业，实行“一条龙”布局，其加工能力已非常惊人。比如，益海集团到2010年7月，就已具备日处理小麦5000万至6000万吨的面粉加工能力。这个规模已超过中粮集团，成了中国大陆仅次于五得利的第二大面粉加工企业。但这远远不是益海集团的目标。2010年4月，益海集团已公开宣布，未来三至五年内“稻米油”年产量要达到10万吨。按此计算，仅此一项，益海集团每年处理的稻谷就超过800万吨即16亿斤。如果以每人每年消费600斤计算，中国每年就有超过2660万人的“一日三餐”，掌控在益海集团手里。2011年益海集团看准潜力巨大的东北水稻以后，立即斥巨资，再在东北布局大米深加工企业。他们在佳木斯市政府的“积极配合下”，一举收购了东北最大的富锦九二粮库（原为国粮储库），同时在佳木斯市建立水稻生产基地，而且在不断扩大规模。益海集团的官方网站公开宣称，从2005年开始，他们就将以有“中国粮库”之称的黑龙江作为粮油新项目开发的重点，规划在东北建立一系列粮油加工项目，用产、购、销“一体化”实现立足东北，面向中原、辐射全国的目标。

在中国这样向粮食系统进军的，当然远不止益海集团。国

际四大粮商中的邦吉、嘉吉、路易达孚等跨国粮食巨头都通过和益海集团类似的途径，纷纷打入中国粮食流通市场的广大领域。他们从种子、化肥等生产环节到建立自己的运输通道等流通环节，正在对中国粮油的“产、购、销”实行整个链条的掌控。

跨国公司在中国粮食领域其所以能够如此畅通无阻，能够轻而易举抢占中国市场大把赚钱，与某些地方政府及其官员总是把洋人看得高人一等，让洋人在中国享受特殊待遇密切相连。比如，在被人们称为“泥潭”的中国股市，洋人就享受着中国老百姓做梦都不敢想的“超国民待遇”。以中国石油为例。外资购买价是1块多人民币（股），中国1%运气好的老百姓抽签价是16.7元人民币（股），99%的中国老百姓平均购买价是三四十元人民币（股）。银行类股票也不例外。兴业银行的外资购买价格是每股2元多人民币，国内1%老百姓的抽签价格是16元人民币，99%中国老百姓的购买价格是每股四五十元人民币。中国老百姓在中国购买中国的股票价格，是洋人在中国购买中国股票价格的十几倍至几十倍。这类特殊股民自1990年以来的21年间在A股就圈走4.3万亿元。中国老百姓还能不亏死，洋人还能不赚肿吗？当然，那些通过国企私有化改革到手的法人股，比洋人赚得更多，因为他们到手的股票根本就不花钱（参阅2011年12月30日《生活文摘报》《泥潭：中国股市》）。

为了吸引外资，不少地方政府同样都给予外资以“超国民待遇”，对外商有求必应。不少外商就是凭着“外资”的空牌子，利用中国的土地，向中国的银行贷款，办起了自己的企业，再低价雇佣中国工人为他们制造巨额利润，这种引资策略极大地助长了外商在中国包括粮食领域在内的不少行业，攻城掠地抢占市场的速度。

在抢占中国粮食市场的硝烟中，当然少不了把粮食作为重要政治武器的美国政府的“英姿”。美国媒体早就公开指责中

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应对世界粮荒负责。对中国这个举世无双的粮食市场，美国一直虎视眈眈。他们的粮食巨头在中国粮食市场开放伊始，就涌入了中国。到2010年9月17日，美国农业部在东北中心城市沈阳正式挂出农业贸易处招牌后，已是继北京、上海、广州、成都之后，美国农业部在中国设立的第五家办公室，它标志着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战略布局，已进入中国“最核心”的粮仓。至此，美国农业部在中国设立的农业贸易处已辐射到华北、华东、中南、西南、东北浩大的粮食产区。

按照美国沈阳总领事馆在该市成立这家农业贸易处提供的公开新闻稿所说，该农业贸易处的任务，就是“帮助美国的农业、渔业和林业产品在东北地区的推广销售”。东北是我国大豆、玉米、粳稻的主产区，是中国最大的粮仓之一。美国农业部的农业贸易办公室进入东北，毫无疑问，就是代表美国政府进一步加速占领中国农业、渔业、林业市场，从更大范围控制中国粮食。

在沈阳农业贸易办公室正式成立前，东北还只是美国注目但尚未开发的潜在市场。随着东北加大开放力度，美国在已经击败中国大豆产业以后，必定有更多的美国农产品大量涌入中国。尤其可怕的是被称为“危险食品”的转基因农产品正是美国粮食战略的重武器，他们的转基因农产品如大豆、玉米正如潮水般涌来，只需短短几年，就可控制我国市场。据中国食品土畜进口协会提供的数据，早在2009年中国共进口大豆4255.3万吨，其中美国大豆2180.9万吨，占进口大豆总量的51.3%

美国所有粮食巨头对发展中国家实行的粮食战略，都是政府行为，他们的后面都站着强大的美国政府。为了击败对方，政府对农产品都实行高额补贴。美国农民搞的是产业化耕作，不仅其规模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的小型农户，而且由于得到政府的高额补贴，其收入的大约三分之一都来自政府补贴，

因此在农产品价格上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农民根本无法和他们竞争。以玉米为例，一个 1500 亩耕地农场，年产值约为 50 万美元，而政府补贴超过 7.5 万美元，和这个农场的利润相当。也就是说，农民种地完全可以不考虑利润，利润有政府给。从 1998 年至 2009 年，美国政府对玉米的补贴就高达 290 多亿美元，等于 2000 亿人民币。特别是 1996 年新一轮粮食补贴政策出台后，补贴更多，倾销比例最低的大豆达到 12%，销售比例最高的棉花高达 48%（引自美国威廉·恩道尔《粮食危机》第 22 页）。因此，美国倾销到世界各地的农产品，其价格都低于成本价。

中国实行分田到户以后，国家对农业的投入在整个基本建设中的比重，多年来持续大幅削减，使农民种地普遍倒亏，甚至出现了如湖南澧县车溪乡南阳村农民罗善平一家四口种 80 亩水田，不仅不能养家糊口，反而倒亏 1700 元那样的种粮户（见 2003 年第 8 期《半月谈》），而今中国广大农村青壮年劳力几乎都已外出打工谋生，实际从事农业生产的是被称为“386199 部队”的老弱妇幼，由这样一些人组成的一家一户的靠锄头铁锹种地的小生产者，面对的是一个经济居世界第一的发达国家政府，及其能获得政府高额补贴的一个个机械化生产的农场，他们怎么竞争？

跨国粮食巨头已经掌控我国植物油的定价权，而在粮食领域，只要掌握粮食价格流通，就掌握了粮食制成品的定价权。他们不仅自己拥有强大的资金优势，又能得到本国政府的高额补贴，而且通过掌控中国食用油，已经建立了庞大的营销网络，树立了一系列品牌，利用这些优势，对处于严重资金劣势的中国粮食企业有着几乎是无法抵御的杀伤力。他们进一步取得粮食流通领域的控制权，获得中国粮食定价权，显然不是什么难事。中国在已经丧失食用油定价权之后，如果再丧失粮食定价权，对我国粮食的宏观调控和整个社会的稳定，造成的危险就不堪设想。

跨国粮食巨头正在“步步为营”，抢占我国粮食市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还能不警惕我们的“一日三餐”会被洋人掌控吗？

第五节 警惕外资公司和外国禽兽垄断中国餐桌

说起一日三餐，除了粮食和食用油，不能不说猪肉。中国人的食用油，85%的份额已被国际粮食大鳄垄断，我们丧失了定价权；中国人吃的粮食，已受到国际粮食巨头越来越严重的威胁，中国猪肉市场也正在受到外国公司日益疯狂的蚕食、挤占。

外国公司凭着雄厚的资金，向中国猪肉市场发起的进攻，起点都很高。其中最典型的当属国际知名投行高盛，仅在2008年就斥资3亿美元，在湖南、福建一口气全资收购了十几家专业养猪场。德意志银行也不示弱，早在2008年前就开始大规模布局中国养殖业。其中一次就注入6000万美元，将上海宏博集团30%的股权收入囊中，而且在迅速融资的同时，策划在海外上市。

盯上中国养殖业的当然远不止高盛集团和德意志银行。就在2008年3月，荷兰某银行亚太地区高管突然将广东信桥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高级畜牧师梁皓仪拉去赴宴，直言不讳地对梁皓仪说，他们对中国的养殖业“很感兴趣”。

在向中国养殖业进攻的外国公司中，以高盛最“高明”最隐蔽也最疯狂。它采取的策略往往是假别人之手干自己的事。比如，2008年11月，就是托在内斯达克上市的美国艾格菲集团负责，在中国大举布局养殖业。据总部设在南昌的艾格菲网站公布的资料，2008年高盛集团在中国收购养殖业的投入远远不止3亿美元，而是10亿美元之巨，而且收购范围也远远不止湖南、福建两省，而是包括了湖南、福建、江西、上海、广西、海南等众多省（市、区），

为了迅速向中国养殖业扩张，具体负责高盛在中国收购养猪场事务的艾格菲旗下的南昌百世腾牧业公司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养猪事业部”，员工达五十人之多，其职责也并不是在某几个省（市、区）而是放眼全国各地为高盛集团收购养猪场。据 2008 年 8 月 8 日《潇湘晨报》报道，百世腾“养猪事业部”一位殷姓总监接受记者采访时称 2008 年他们仅在上海、江西、广西、福建四地就收购了 26 家养猪场，年出栏生猪 50 万头。这位殷姓总监告诉记者：“我们的目标是（2008 年）年底前控制 100 万头左右的出栏量”。

高盛通过百世腾早就把目光盯住了养猪大省湖南，他们谈起长沙、衡阳、株洲、湘潭、岳阳、邵阳等地的养猪场仿佛如数家珍。他们收购的目标也相当高，其条件是拥有 500 头母猪基础产量规模的养猪场，也就是年出栏生猪达到 10000 头规模的养猪场。而据湖南省畜牧水产局畜牧处处长陈志军介绍，尽管湖南在全国是数一数二的养猪大省，年出栏生猪达 7000 万头，拥有 500 头母猪基础产量规模的养猪场也不过 200 多家。目前在中国建设一家 500 头母猪基础产量的养猪场，大约需要 800 万——1000 万元人民币。也就是说，对于在 2008 年实际投资 10 亿美元的高盛集团来说，即使把湖南 200 多家拥有 500 头母猪基础产量的猪场全部收购，也不过 2.5—3.2 亿美元。

令人惊愕的是，一出手就投入 10 亿美元在中国收购养猪场的高盛集团，它的钱是轻而易举从中国赚取的。其手法之卑劣更令人瞠目。

早在 2004 年底，当中航油（新加坡）在国际原油衍生品交易中巨亏 40 多亿元时，人们通过随后曝光的“欺诈门”事件就发现，当年“指导”中航油（新加坡）进行交易的就是高盛新加坡杰润公司。高盛作为投资顾问指导中航油看跌油价的同时，却在国际市场暗中进行反向操作，提高油价，由此造成中航油巨亏 40 多亿元，高盛从中获利之丰，外人自然无法知道。

2007年，高盛有意发布报告，称原油每桶要涨到200美元，并指导中国“拼命购买”每桶价格为147美元的原油，与此同时，高盛还与深南电、东航等中国企业签下“对赌协议”，而自己则在暗地里悄悄大量抛售原油，到当年年底原油价格降到了34美元一桶，连原来的零头都不到。高盛此举又是一箭双雕，不但给中石油、中石化等中国企业造成巨额损失，还使深南电、东航、南航等中国企业出现巨亏，高盛则成了最大的获利者。

中央财经大学投资系教授、《揭秘高盛》一书作者李国平，谈到高盛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高盛在中国赚了很多钱，手段恶劣。”其中“最恶劣的行为就是推动银行改制，使得银行资产被贱卖”。“2002年高盛曾发布报告称，中国四大国有银行的债务达到40%，但当时所有的研究都表明债务不超过20%”，李国平说，“高盛有意把中国银行业的问题说得非常严重，其目的就是不遗余力推动中国银行改制”。

2004年，中国国有银行进行改制时，高盛又陆续发布报告，说“中国银行业坏账太高”，故意再次把中国国有银行的问题说得非常严重。而我们的银行高管和决策者，不仅不知道中国银行业的债务到底有多少，坏账有多高，也不顾当时有的研究都“表明债务不超过20%”；更不去作深入调查研究，弄清中国银行债务到底有多高，就被高盛恶意夸大的债务牵着鼻子走，使高盛等国际投行企业通过推动中国银行改制大捞一把的目的得以实现。李国平对此扼腕慨叹：“中国国有银行改制代价太大了！花了高额的手续费给高盛等投行，又以很低的价格将股份卖给了他们，仅某个国有商业银行上市时，高盛等华尔街公司就赚走了1300亿元人民币”。（引自2010年5月7日《国际先驱导报》）

然而，高盛等华尔街公司通过恶意夸大中国银行的问题，从某商业银行一下拿走1300亿元，仅仅是境外公司从中国银行业大把捞钱的冰山一角。国家金融安全和信用评级业务课题

组组长吴红在 2010 年 4 月披露的情况更加触目惊心——美国通过大规模收购中国信用评级机构，到 2010 年已经控制了中国的信用评级机构三分二的份额，几乎垄断了中国信用评级的发言权。他们一方面对我国经济稳定增长、外汇储备稳定增加的十年，有意将中国 13 家商业银行的信用级别评为“垃圾等级”，即最坏的等级；另一方面则高调支持境外投资者积极参股中国银行业，为国际垄断资本攫取中国国有资产造势，让他们在中国疯狂圈钱。仅 2006 年一年，国际垄断资本就在工商、建设、中国、交通等国有银行身上就圈走了 7500 亿元，加上从其他商业银行获得的利润，国外投资者仅这一年就从中国拿走了超过 1 万亿元，而这一年中国全国财政收入也不过 8.1 万亿元。（参阅 2010 年 4 月 12 日《经济参考报》）。

2010 年 6 月 4 日《国际金融报》，再次披露“高盛隐身背后”，通过总部设在深圳，主要生产和出口肝素钠原料的海普瑞公司的“造假案”，使高盛旗下的全资子公司 GSPharma 在入股海普瑞上市公司三年间，就“狂赚”65.89 亿元。高盛在中国还包括西部矿业的“不道德敛财”，深南电及众多央企的所谓套期保值巨额亏损等案例，尤以西部矿业案例最典型。2007 年，西部矿业上市时每股业绩为 0.81 元，股价最高 68.5 元。当时高盛鼓吹大蓝筹，以人民币 9615 万元投资，上市后套现 70 亿元，收益超过 70 倍。两年后西部矿业业绩仅为 0.02 元，使不知其数的股民被套。仅从以上介绍不难看到，高盛在中国的“不道德敛财”不是比扫帚扫钱还容易吗？

高盛等外资公司在中国疯狂圈钱后，即用这些中国钱并购中国股权、并购中国企业，收购中国猪场，抢占中国市场。而且高盛为代表的国际私募股权资本，渗透的不仅是中国养殖业的整条产业链，更涉及中国整个农业上下游的各个领域。由于高盛等外资的收购目标是规模化养猪场，新希望集团副总裁王航观察到这种现象后，早在 2008 年就不无忧虑地说：“到明

年（2009）规模养猪会超过 50%，这为国际资本的并购提供了很好的机会”，中国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张海森博士更为担心的是：“中国处于该行业的企业普遍较小，实力较弱，国外资本通过股权融资的方式能很快介入，不用很多资金就能控制终端市场（引自 2008 年 8 月 5 日《文摘周刊》）。一旦外资控制包括生猪在内的中国整个农业上下游各个领域的终端市场，我们就会像食用油一样，丧失定价权，受制于外商。

在外资收购中国养猪场方兴未艾之时，大量低价洋猪肉纷纷涌入中国。2011 年继美国大规模向中国出口猪肉后，墨西哥、芬兰、加拿大、法国等众多国家的猪肉竞相登陆中国。尤其令人愤怒的是，伴随洋猪肉大举进入中国的同时，危害人体健康的问题洋猪肉也“汹涌而至”。据国家质监局公布的数据，仅 2011 年 1—8 月，就发现 40 批次共 116.65 吨洋猪肉含有瘦肉精，而瘦肉精是致癌物质。向中国出口瘦肉精猪肉的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丹麦、法国、西班牙、爱尔兰等国家，而这些国家在国内都是严禁销售这类猪肉的，因此可以说他们是有意为之。如此众多国家同时向中国出口瘦肉精猪肉，岂不令人恐怖？

同样令人不安的是，当洋猪肉大举进军中国后，中国土猪肉难有招架之功。首先在价格上就处于严重劣势。2011 年 8 月，长沙猪肉已涨到每斤十四五元时，美国猪肉的到岸价才 7 元，在养猪规模上更加无法匹敌。美国等发达国家几乎全是规模化、现代化、科学化养猪，在中国就连数一数二的养猪大省湖南，年出栏生猪达 7000 万头，达到每年出栏 10000 头的规模猪场也不过 200 来家，即 95% 以上是一家一户的农民散养，哪会是人家的对手呢？而且，尽管中央政府提倡支持大型标准化养猪场建设，而地方政府却总是从地方利益出发，不断削弱规模化养猪。此中的主要原因是，与热衷于大搞开发区、大搞房地产相比，养猪很难从税收及其他方面获利，而且又脏又臭，形象也不好，不愿扩栏。广东东莞甚至从 2009 年起干脆在全

市范围内全面禁止养猪，养猪大省福建沙县原有 108 家规模化养猪场，居然下令拆除其中的 70%。中国如此赶猪、禁猪，其结果必然造成猪肉供应更加紧张，这就不仅为外资在中国收购猪场、建设猪场，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机，也为洋猪肉甚至问题猪肉大量涌入中国，创造了外资公司求之不得的条件。

同样令人忧虑的还有，我国众多畜禽品种中，正日益衰落，被外来品种占据。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马月辉，多年来来往于偏远、人烟稀少的山区进行调查。他告诉记者，不少地方第一次去时，本地猪、本地鸡品种很常见，几年后再去调查时，“已经很少见到了”。

由于我国盲目引进产于美国、丹麦、加拿大、英国等西方国家的洋白猪，使我国各地的土猪，几近消失。比如，湖北秭归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大量养殖的本地土猪，在短短几年间，就几乎被洋白猪“彻底代替了”。这种土猪的消失，仅仅是我国地方品种猪逐步消失或面临危机的一个缩影。最近一二十年来，全国各地都经历了这个变化。马月辉通过对全国畜禽遗传资源的动态调查，确认有 7 个品种资源已经灭绝，37 个品种资源处于严重濒危状态。而据 2003 年至 2010 年我国第二次畜禽遗传资源调查显示，15 个地方畜禽品种再未发现，55 个处于濒危状态，22 个品种濒临灭绝，濒危和濒临灭绝的品种占地方畜禽品种总数的 14%。以上数据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濒危和濒临灭绝的地方畜禽遗传资源正在加速消亡。其中尤以名牌品种为甚。北京鸭是全球著名的优良肉用标准品种，是闻名中外的“北京烤鸭”的基本制作原料，原产于北京西郊玉泉山一带。英国一些农场主发现很多英国人非常喜欢食用北京鸭做的烤鸭，便组织科学人才集中在一个叫“樱桃谷”的地方专门研究北京鸭的育种问题。这种源于中国北京的优良肉用鸭，最后在英国形成“樱桃谷鸭”，并很快从英国杀回“中国”，迅

速占领了北京烤鸭市场。现在端上中国人餐桌的北京烤鸭，包括享誉中外的中华老字号“全聚德烤鸭”，使用的原料都是英国的“樱桃谷鸭”。由于中国本土物种遗传资源的流失，真正的北京烤鸭几乎绝迹。

北京烤鸭的这种状况，其实只是中国物种资源流失、洋品牌占领中国餐桌的一个缩影。

餐桌的争夺，说到底生命和健康的争夺，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命运、前途的争夺。

我们的餐桌，正在受到外国公司和国外食品越来越严重的袭击，保卫我们的餐桌，难道还能不提上决策者和全国人民的议事日程吗？